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近代早期的
欧洲经济组织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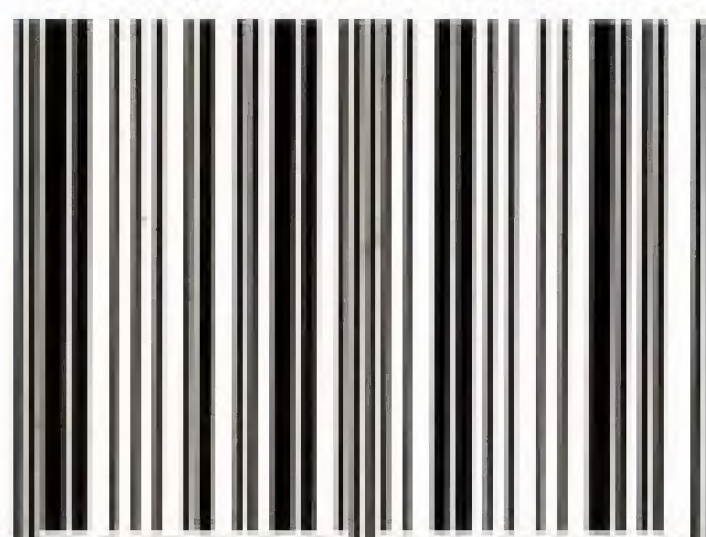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近代早期的
欧洲经济组织



ISBN 7-5058-2889-4
F·2257 定价：102.00 元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V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E.E.RICH

Sometime 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Sometime Master of St Catharine's College

AND

C.H.WILSON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at Florence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

E.E.里奇 C.H.威尔逊 主编

高德步 蔡挺 张林 等译

高德步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英）波斯坦等主编；（英）里奇等分册主编；王春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9

书名原文：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SBN 7-5058-2889-4

Ⅰ．剑…　Ⅱ．①波…　②里…　③王…　Ⅲ．经济史—欧洲—近代　Ⅳ．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2980号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五卷）

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

E.E. 里奇　C.H. 威尔逊　主编

高德步　蔡挺　张林　等译

高德步　校订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787×1092　16开　50.25印张　870000字

2002年9月第一版　200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058-2889-4/F·2257　定价：102.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译　序

（一）

所谓经济史，无非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的历史，是历史演进的经济方面，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总称。但是，作为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经济史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的学科，它既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没有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失去了依据和方向。

关于经济史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对此加以否认，而且许多国外著名经济学家也都精心撰写过经济史著作，如刘易斯关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研究、弗里德曼关于美国货币史的研究等等。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要进行经济学研究，有三门专业知识必不可少，即经济史、经济理论与经济统计，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这是因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

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麦克洛斯基更在1976年对经济史与经济科学的关系做了精辟入里的论述。根据麦的观点，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它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理论，更好的经济政策，更好的经济学家；而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学科的贡献是：更多的事实，更好的事实，更好的假设，更好的数据解释，更好的历史学家。[②]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战后初期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对经济周期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历史上国民收入账户的考察，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来研究经济史，从而使经济史的量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相得益彰的结合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③]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迄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对经济史的功能和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贬斥经济史的地位和作用的现象，而真正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的中国学者，至今还不多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是世界经济研究，之所以迟迟不能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经济史研究的严重滞后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入。

(二)

就其学科体系而言，经济史学科可谓枝广叶茂，体系庞大。

---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经济史”条。

按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可以有国别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国际经济史（研究国际经济的兴起、崩溃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来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等；按其涉及的经济部门，可以有农业经济史、工业经济史、银行金融史、贸易史等；按其所研究的历史年代，可以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当代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行为主体，可以有企业史、企业家史、总统经济史等；按其研究的经济专题，又可以分为经济增长史、经济危机史、通货膨胀史、钱币史、经济政策史等等。事实上，我们所阅读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这种学科分野来撰写的。

但是，如果从研究方法来分类，则所有的经济史著作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描述性经济史和分析性经济史。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进的？其轨迹如何？作用和意义如何？在这类经济史著作中，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观察问题的角度上受到当时当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它们一般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详尽描述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一般而言，由于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是任何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其学术价值也主要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描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因此，越是客观详尽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就越能够为更为深入的经济史研究和经济分析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实验场，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从史出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反，分析性经济史主要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们往往更强调特定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

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以论带史。在这里，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目的不仅仅是要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的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在这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堪称先驱。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① 也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影响增长实绩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所附的大量表格主要是对这些经济分析的数据支持。事实上，在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用经济理论去研究历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此高彼低之别。没有一套符合历史发展真实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析性经济史，更不要谈高水平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描述性经济史也存在着对某些具体经济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分析性经济史也需要对经济发展过程给出基本的描述，因此，具体到一部经济史著作究竟是描述性的还是分析性的，只能依据其基本倾向性做出判断。据此推断，我们可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是一部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作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以及美籍俄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隆等。

（三）

既然以应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已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而《剑桥欧洲经济史》又主要是一部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选择这样一部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呢？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

①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

其一，正由于目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分析性经济史，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世界经济史著作大都受过严重的“理论污染”，是试图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解释的著作，而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却比较少见。即使是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色彩，充满了作者个人对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新制度主义式理解和判断。从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的角度来看，这固然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性经济史著作越多，就越需要一些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经济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以便从中抽象出经济演变的内在规律，并据此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工作。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经济史，首先就要准确地知道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需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才能够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便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而不是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加以选取和解释的经济史著作。这样一种比较纯粹的经济史，事实上就是我们赖以进行研究的基础和标杆，也只有这种经济史著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理论实验场的功能，各种经济理论也才能够以不同的透镜来观察和解释这种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才能够真正还经济发展的历史以本来面目。我国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说，建国以来，除了樊亢、宋则行等学者主编的四卷本《外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三卷本《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以外，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国别经济史著作，如美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苏联经济史或者日本经济史等等，品种和数量都极为有限。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虽然也翻译了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史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

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一些经济史著作仍然属于分析性经济史之列，因而无法给我们提供一部比较纯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其二，《剑桥欧洲经济史》虽然名为欧洲经济史，但它所探讨和涉猎的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是涵盖了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美国、拉美、澳大利亚、东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因而是一部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史。我们知道，所谓世界经济史其含义基本有二：一是世界经济的历史，旨在探讨特定阶段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样一种作为人类历史新现象的世界经济孕育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期；二是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旨在探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这样的世界经济史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就前者而言，宋则行、樊亢主编的《世界经济史》可为其代表；就后者而言，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综合详尽的描述性世界经济史著作，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增长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西欧起源的，欧洲经济的发展过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的近代经济发展历程。因此，当我们以一种全球视角来考察和理解人类经济活动及其组织的演进时，欧洲作为人类先进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会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关注欧洲之发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注其他地区之为何不发达以及如何才能走向发达，关注欧洲之发达是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之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关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繁荣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欧洲经济史》显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它本身是研究欧洲的经济发展进程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国家，而是由此向外延伸至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远东的日本、中国以及印度等，在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中研究和探索欧洲的经济发展规律，从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了欧洲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而将整个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视为欧洲起源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

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仅如此。由于欧洲联盟是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世界各国也都正在深入开展欧洲一体化历史与机制的研究，力求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求欧洲统一的深刻内涵。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中国经济界来说，《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综合性经济史著作显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

其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描述性的经济史著作。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而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进程。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演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欢迎与青睐，而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诺思等学者对历史上欧洲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其代表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对西方民族国家经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统一。但是，经济史是丰富多彩的，使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它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那么，诺思从制度视角所给出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这种历史变迁的内在机制又是怎样维持运转的？除了诺思的解释以外，我们从那一段历史中能否找到另外的解释或者说启迪？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制度创新与演进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客观详尽的描述，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进而由此确认诺思理论中的真理颗粒。惟其如此，学术界对以探讨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恰恰就是这样一部以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史著作。事实上，从《剑桥欧洲经济史》的总体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侧重于欧洲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在此过程中的

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问题，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及其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其总体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一部分恰恰是近年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而我国研究又极为薄弱的一部分。从编排体例上看，《剑桥欧洲经济史》不仅非常重视欧洲国家在中世纪的经济增长积累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变迁，而且将工业化及其随后的全球扩散置于一种自然延伸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从而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变革时期的制度演进过程与机理提供更加可靠与丰富的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欧洲经济史、特别是从中世纪到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史，也就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方面也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

（四）

《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 **M. M.** 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西方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部著作的策划工作始于战火纷飞的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克拉彭爵士和艾琳·鲍尔是丛书的主要发起人，第一卷出版于 1941 年，第八卷出版于 1989 年，从策划之始算起，历时近 60 年。数十年磨一书，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

大体说来，《剑桥欧洲经济史》可以分为三部分：

其一，前三卷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其中，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探讨了农业与农民生活的转变过程；第二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则探讨了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渠道与转变；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则分析了随着经济活动领域与重点的变化，经济组织方式与政府政策的

相应转变与调整。事实上，近年来非常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通过对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转变的重新解释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其二，第四卷和第五卷构成了该书的第二部分，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其中，第四卷《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即人口增长、科学思想与成就、价格、贸易模式与贸易线路、劳动力供应、大规模公司的组建以及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等；第五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则主要分析工业生产的核心机制、信贷机制、国际贸易机制以及国家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财政当局的功能等。作者的这一内容安排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早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仅仅从工业化自身并不足以回答为什么欧洲国家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本书的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第六卷《工业革命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收入、人口及技术变迁》重点分析工业革命展开的外部因素；第七卷《工业经济：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则主要分析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如资本、劳动力以及企业家资源的供应等，并且主要是按国家展开分析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发展》主要分析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演变。因此，大体上说，这一部分的三卷主要分析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部欧洲视角的经济史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对此我们应予以注意。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是最先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发源的。无论是从工业化的国际扩散来说，还是从世界经济形

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都居于中心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接受或者说承认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欧洲中心论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接受欧洲经济发展进程所昭示的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在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往往忽略了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端于欧洲的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所确立的制度安排、规则选择等至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于欧洲国家的这种中心地位客观上是否合理，是否增进了整个人类的福利，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专门加以探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关注站在时代发展最前列的国家或地区，把它们作为自己模仿的榜样和赶超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欧洲视为现代世界经济发育和成长的中心因而予以充分注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体现。当然，对于由于欧洲经济发展优于其他地区而形成的欧洲种族优越论，以及书本中可能隐含的种种欧洲殖民倾向以及作者出于自身立场、观点等对历史事实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是应该予以注意和批判的。

（五）

本书的中文版翻译可谓历经坎坷，备尝艰辛。早在199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就斥巨资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本）的中文版权，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春法博士组织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方面则由卢元孝编审负责编辑事宜。双方在多次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的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在随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主译人员的调整及其工作岗位的变化，而且翻译及编辑加工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致使译稿完成的时间一再延迟，以致在原定的 2001 年 12 月这个最终出版日期之前，我们不得不致函剑桥大学出版社，请求推迟出版时间，并得到了理解与慷慨允诺。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行们，没有他们的理解与帮助，这样一项文化工程的命运是难以逆料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编辑，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这部著作是难以完成的；感谢各位主译人员，在市场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甘于寂寞，勇于承担起书稿翻译的重任，从而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魄，这样一部宏大的经济史著作是不可能在中国面世的。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声势浩大的“融入世界”运动，如果本书能够对此有所助益的话，则幸莫大焉。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一直未放松对译稿质量的要求，但是，翻译出版这样一部大型的经济史著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原书所引文献涉及大小语种数以十计，古今雅俚，纷繁复杂，其中部分虽经多方努力而无法翻译者，只好照录存疑。又比如，由于本书所涉及人名、地名繁多，时间跨度甚大，个别人名、地名因卷而异的情况也恐难以避免。另外，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稿中其他错误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都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以期未来再版时加以改进。

王春法
2002 年 9 月于北京

前　　言

《剑桥欧洲经济史》的这一卷与它的前一卷（出版于 1967 年）在构思和计划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正如第四卷的编者序言所说，第四卷的重点集中于它所谓的“构成因素”，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环境的、智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近代经济。而第五卷的重点则在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体制，商业销售和交换的运转机制，货币、信贷、银行业和种类繁多而复杂的支付形式的构成，以及近代经济的某些社会特征。

没有人比本书的编者为本书的推迟出版感到更为遗憾。一些撰稿人的疾病和退出，以及另外一个撰稿人大卫·乔斯林（David Joslin）的早逝，都推迟了本书的交稿日期。如果我们放弃当初的写作计划，转而用一些临时拼凑的文章来凑数，那么本书本来还是可以出版的稍早一些。虽然寻找有能力而又有兴趣的撰稿人来代替那些我们失去的撰稿人必然是耗费时间而又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坚持我们最初的写作计划。在此，我们要感谢那些替补的撰稿人，同时也感谢那些以极大的耐心等待他们已经写好的稿子出版的人。遗憾的是，那些稍早一些的撰稿者（尤其是萨普教授）已不能利用最新的文献修订他们所撰写的章节了。

威尔逊（C. H. W.）
剑桥
1976 年

目　　录

图　目

第一章

近代史中经济增长与萧条的历史研究

1.1 经济史研究的目标和手段：一些变化着的概念

近几十年来，经济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均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与实践的综合（即一方面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实践，而另一方面又作为普通历史学家或政治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实践），经济史的发展经常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徘徊状态，有时更多地受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实践的推动，而有时又主要受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史“学派”均反映着其不同渊源所具有的特点，然而所有的经济史学派都受到传统的、“制度性的”、历史的强烈影响。通过对我们已经熟悉的著名的制度安排——行会、公司、殖民地贸易组织、公立银行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进行或多或少极为不同的分析，这种一代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使得我们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而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史进行初步的研究，也可以对它们的宏观

经济情况获得大概的了解。需要明确的是，后一种方法的兴趣和影响随每一个具体国家实际历史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据信在尼德兰这样具有深厚的地方城市自治和联邦制传统的国家，相对于近代德国的经济史而言，这种方法所提供的经济发展的轮廓则要更模糊一些。德国后起而进展迅速的革命性的工业化，在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和“历史学派”强烈的政治性和策略性导向中得以体现。同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也在诸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奥特·斯伯瑟夫（Artur Spiethoff）等德国历史学家的社会—经济分析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因此，根据心理学上的“完全形态理论”，即“理论的最可能的近似就是可观察到的事实”，“理想模式”是第一位的，“体系”是第二位的，而孤立则是第三位的。[①]

德国的经济史与法国的不同。后者反映了自孔德（Comte）以来法国哲[1]学中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力，然而它与德国经济史一样强调归纳性论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往往由经验性数据归纳产生。这种获取客观事实的强烈愿望，以及认为观察者必须将其自身完全置于其所研究的情况之外的观念，正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研究自杀或劳动分工，以及弗朗克斯·西曼德（Francois Simiand）在研究价格和工资的波动时所采用的。对这种方法而言，数量型的数据（尽管它并不是这种方法的全部）是至关重要的。自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欧内斯特·莱布劳斯（Ernest Labrousse）、乔治·莱费布（Georges Lefebvre）和现代年鉴学派（Annales）以来的法国社会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持续不同地加强了法国经济史中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个传统体现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身上，就是他强调对历史的“理解”。为此，有关专家的必要工作应当与其他的目标结合起来，即寻找出历史变化的基本“起因”，以及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后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差异性”。这便是比较历史学所必需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功能所在，据此人们便可以鉴别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制度所具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与法国传统极为不同的是著名瑞典历史学家埃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的思想。作为一名深受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的经济学家，赫克歇尔难以接受在如此众多的经济史文献中经济理论与历史证据之间完全分割的思

---

① 见斯派瑟夫（A. Spiethoff）：《纯粹理论和经济完全形态分析：理想模式和现实模式》，由弗里茨·莱德林克（Fritz Redlich）博士翻译，载 F.C. 莱恩（F.C. Lane）和 J.C. 瑞莫斯玛（J.C. Riemersma）所编的《企业和现实的变化》[荷姆伍德（Homewood），伊利诺斯州，1953 年]。

想。作为一位理论家，他坚定地认为由于“所有时期的经济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①] 因此，经济理论（他所指的主要是有关供给与需求的古典经济理论）应当是历史学家们选择并解释经济史中各种事实的基本工具。赫克歇尔接着又说，在每一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的真正经济意义”都可以通过运用经济理论而得到清楚的解释。他还确信：若缺乏（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的理论训练，在面对历史中的这类问题时，学者们将会感到束手无策。

赫克歇尔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巨著《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他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理论的主张的正确性。但是，这同时也显示出将理论应用到历史中的危险，因为历史上的情况与理论所得以产生的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这种应用也可能轻易地抹杀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副主教（Archdeacon）许多年前在其著名的三卷本著作《英国工商业增长》中，苦心造诣地做出的：[②] [2]

>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假设性的，它主张在一个严格限定的生活中描绘经济力量的变动轨迹，进而揭示出在经济力量自由作用的条件下将发生的事情……但**经济史**就不同了，它所研究的领域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由于英国政府及英国人在不同时期内的影响不同，经济史研究所包含的领域会随之扩大或缩小……历史必须描绘出人们有意识的努力……去开发王国的资源和扩张其商业。[③]

作为新的剑桥经济史讲座的第一位任职者，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爵士采纳了坎宁安所遗留的观点。然而，克拉彭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坎宁安则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克拉彭同时又是一名统计学家，其收录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④] 中的论文《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史》提出了若干问题，并提出了运用统计数据以及灵活地降低理论的要求来建立新的经济史。他认为理论常常将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价格和工资）移交给使用归纳方法的经济学家，而这些经济学家很少是历史学家。在一些分析灵活而又具洞察力的章节中，克拉彭指出了那种仅仅将经济史视为一般历史的传统分支的观

---

① 参见埃利·赫克歇尔：《为经济史中的理论辩护》，载《经济史》（《经济杂志》的副刊），1926～1929年第1卷，第525～534页。

② 见威廉·坎宁安：《英国工商业增长》（第5版，剑桥，1922年），第1章第21～22页。

③ 同上。

④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30年），第5章第327～330页。

点的弱点。同样，他也总结了德国的历史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错误之处，他认为他们过度而片面地强调了历史发展过程中“阶段”的重要性，而对于一些基本的框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接着写到：

> 每一位经济史学者都应当获得统计学的感觉，养成在研究相关的制度、政策、集团或趋势时问以下几个问题：多大规模？多长时间？频率如何？有多大的代表性？上述要求看起来均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以往绝大部分的政治—制度经济史由于忽略了这些问题，致使其应用价值大为削弱。

除了这种数量上的统计感觉之外，还需要具备空间规模的感觉，这就是说经济史学家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地理学家。

或许人们会说这只是手工业劳动者的观点而不是学者的观点。这种说法所反映的是蓝皮书（Blue Book）的时代，那时克拉彭仍然是人们所公认的大师。然而，这时的经济史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史。这些批评确实有一些道理，尤其是后一种批评。因为它得到了当代研究成果的证明，诸如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欧洲经济的早期成长》（1974 年），该书大[3]量而生动地使用了社会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然而，大体来看，克拉彭著作中的智慧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预示并描绘了经济史许多方面（不是全部）最新进展，这些新的进展被冠以“新经济史”的名称。这个名称有些武断，因为它意味着对克拉彭在自己的不朽著作中所展现出的数量技巧的忽视。

克拉彭并未满足于仅在经济史的技术问题方面设计一个实用的方案，他也运用朴实的热情抨击了经济理论本身的空洞之处，如他所说经济理论是一个用空盒子排列起来的书架，即完全没有实质内容的抽象。克拉彭的继任者作为剑桥经济史讲座的教授，清楚地提出了将这些经济的抽象原则与它们原有的环境重新结合起来的问题。起初为了分析和掌握的方便，将这些抽象理论的具体环境省略掉了的波斯坦（Postan）教授曾经这样写到：“将理论及其环境重新结合的工作，最适合于由其任务在于揭示事实及其完整的社会形势的学者们来完成”，也就是说，由那些适合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完成填补与经济和社会理论中的空白相对应的经济史中的空白的任务。①

以理论来解释历史的广泛的尝试并不能够轻易地被扼杀。约翰·希克斯

---

① M. M. 波斯坦：《约翰·克拉彭爵士：经济史学家》，载《利兹大学评论》第 17 卷第 1 期（1974 年 5 月）。

(John Hicks) 爵士通过其著作《经济史理论》(1969 年), 勇敢地面对来自两个领域的批评。道格拉斯 · 诺斯 (Douglass North) 和 P. R. 托马斯 (P. R. Thomas), 在他们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1973 年) 中追随希克斯。上述两部著作均被历史学家们批评为与历史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在对这些试图对经济史做出综合性解释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历史学家们所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中, 又加入了 E. L. 琼斯 (E. L. Jones) 的批评: "现在看来更必要的实际上并非是实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 而是经济史与历史的结合。"① 这样的推理是合情合理的。不仅如此, 它还有助于解释有关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关系持续不断的争论的本质在近期所发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趋势是更加远离外生理论而更靠近内生理论。正如社会科学所日益强调的那样, 随着经济史中的社会因素 (如通过对人口和家庭结构的调查) 的增长, 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操作性特征受到了持续增加的强调。单纯的外生理论必然会被证明要么是过于泛泛, 要么是根本不能满足历史学家们的需要。其逻辑模型将继续是有效假说的一个有用来源。然而, 历史学家更大的需要却是有效的分析工具, 而这一切正在被创造出来, 崭新的经验性的、统计的方法正在从历史资料本身中内生出来。 [4]

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经济史文献所具有的普遍特征, 是过去曾经是半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一体化程度不断的提高。这种半独立性部分, 是前面所提到的历史与经济理论之间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结果, 部分是由经济史研究中一些社会因素分析技术上的缺陷造成的, 以及历史学家倾向于假设那些与农业、商业、工业、金融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相关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可以被当做相互独立的现象而得到满意地处理。接下来的问题是: 尽管早先的经济史在许多制度研究方面获得了具有持久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对庄园组织、行会、公司、殖民地贸易组织、工业创新、技术等等的研究, 然而, 在涉及社会和历史的抽象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仍旧很薄弱。人口变动趋势, 它的起因及后果, 价格、工资、薪金和利润等因素的研究通常是有名无实。一部被广泛阅读的教科书如 E. 利普森 (E. Lipson) 的《英格兰经济史》, 或者 H. O. 梅瑞狄斯 (H. O. Meredith) 的同一名称的著作的研究, 只将人口变动趋势视为不重要的变量 (en passant)。与同时期许多其他欧洲的研究一样, L. 德驰斯恩 (L. Dechesne) 的《社会经济史》(1932 年), 给出了一些有关人

① E. L. 琼斯:《制度因素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载《经济调查》第 12 卷第 1 期 (1974 年 3 月), 第 121 页。

口增长的基本数据，然而他却没有尝试将这些数据与其他变化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税收问题曾长时期地占据政治史的中心位置，然而它也同样长时期地为经济史学家所忽视，且直到现在才刚刚引起人们的认真关注。

不考虑其通常所说的高度描述性的优点，这种传统的制度性历史几乎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如果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这种历史显得结构过于松散，以至于无法进行逻辑分析，那么，对于在政治传统中成长的学者而言——例如具有社会主义热情的托尼（Tawney）[①] 的追随者，提倡自由放任的安文（Unwin，Geoge）分子，或者像威廉·坎宁安这样的反对自由放任的坚定分子——这种历史也是不成功的历史。经济史似乎描述得太多而解释的又太少。由于人们觉得它缺乏解释能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具有了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学说至少提供了一整套使得各种极为不同的制度联系起来的解释，这些制度形成了在任何给定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国民经济。当客观碰到需要将观察到的棘手的历史事实套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预先注定的历史结构时，困难就出现了。其结果是相当多的狂热者都被迫面对这样一个窘【5】境：或者放弃原有的结构，或者使其放宽到除了在语意上之外不再有任何实质意义，或者冒着使理论和事实产生冲突的危险。

研究兴趣的最近变化是使社会—经济史的各个因素更加统一，但这种变化并未消除经济史中马克思主义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和国家干预（*dirigiste*）学派的思想。然而，它还是大大降低了以往有关“外生”理论与历史的关系的争论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实践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从老的教义对事件说明的影响上转移开来。对于前者，出现了对人口变化趋势以及人口危机的研究，研究人口总量的增长、停滞或下降，出生、死亡和结婚率，社会就业结构、预期寿命等等的影响，价格、收入及其关系与人口运动的关系。简而言之，社会和经济的、非经济的和经济的因素共同影响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特别是那些研究前工业化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学家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了人口数量的增减与经济扩张、经济萧条之间的密切联系。上述农业社会的产量水平很低且经济发展既受“内在的”障碍（技术上的无知、习惯势力及保守主义）的限制，又受到外部灾难（歉收、瘟疫、黑死病、暴风雨和洪水）的阻碍。这种社会—经济分析的扩展和改进出自于像波斯坦和 B. H. 斯里彻·冯巴斯（B. H. Slicher van Bath）这样的

---

① 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2 年，英国经济史学家。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而著名，包括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 年）。——译者注

学者绝非偶然，因为他们最初研究工作的重点就放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变迁上。

在人口与危机之间的基本联系的符合逻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学者们回头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有关全球人口数量，价格和收入数据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并非是一致的，它既包括生产者又包括消费者，而且他们并非完全相同但也绝非完全不同。即使是那些在数量上占据近代农业社会主体的小农，他们也同样既是买者又是卖者。通常，他们的生产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有时则会产生剩余。他们生产什么，对了解他们在早期经济中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谷物生产中，他们是否局限于单一谷物种植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的状况？或者，他们有能力实现其产品的多样化，分散其风险并获得适当的在市场上购买非必需的但却值得要的商品？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基本问题——经济是增长了还是没有增长？——的答案。【6】

这种形式的历史在思想革命的早期就出现了。在这种历史的研究中，弗朗克斯·西曼德遇到了折磨着所有追求全面解释历史的历史研究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在尝试消除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确定他所研究的对象的数量的极大值中，西曼德发现他自己不得不承认，外生于其理论和方法的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的存在，而这些事件又对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产生无可否认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对一个具有经济逻辑的人来说，由国家将货币的信用发行带入不间断的循环，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美洲的发现，其贵金属财富的开发及其对欧洲的出口，仍旧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16 世纪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是对日益明显的主导经济变化的自然法则的背离吗？以数量经济形式出现的经济科学，在这里有助于解释对“内生”解释准则的背离吗？或者说“价格革命”能够由先期出现的而且伴随始终的人口增长来解释吗？或者我们是否将对那个只能以大量人口、更大量的需求，以及数量更多的货币供给来解释的问题的处理上过于简单化了？同样地，这种主观上的倾向在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可以见到，如在牺牲外生的、在逻辑上解释力不强的原因的情况下，用历史上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解释来说明增长趋势。

人口统计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例子。马尔萨斯信条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它认为 18 世纪的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救济院外贫困援助制度［即被称为“斯品汉姆兰（Speenhamland）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对大家庭提供津贴，鼓励了更多的生育。这种解释，作为一种直接观察的结果

和经济逻辑的混合体，支配了很长一段时间。剑桥历史学家塔尔伯特·格雷菲斯（Talbot Griffiths），在一篇由三一学院资助的论文中，改变了马尔萨斯信条，认为人口的增长源于死亡率的下降，而死亡率的下降则归于医学知识增长和医院条件的改进。这篇论文与其他这类文章一样，对历史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但这种异端学说并没有能够坚持多长时间。人口出生率总是恢复到经济逻辑主导历史发展过程的状态中。因为经济学家们痛恨外生因素就像大自然痛恨真空一样。即使经济史学家，迅速抛弃那种认为偶发的医学发现甚至医院的发展能够降低18世纪的死亡率的理论，然而，仍有足够的证据[7]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持如下的观点，即认为黄鼠对黑鼠的驱逐在黑死病结束中起到了直接而根本性的作用，至少从淋巴腺鼠疫上看是如此。对外生因素而言，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吗？绝对不是。其他的历史学家随即提出了一个假设，即人对瘟疫的易感染性要比瘟疫本身的致病力更重要。和其他疾病的情况一样，对这种疾病的易感染性，或者说抵抗力直接和营养不良或其他因素有关。从而，人口统计学又回复到不间断的经济因果关系中。

另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列颠早期工业化现象），毫无疑问也引发了同样的对人口变化和农业变化的关注。正如艾什顿（T. S. Ashton）和伊丽莎白·熊彼特（Elizabeth Schumpter）构建的出口统计数字所表示，不列颠工业增长的早期迹象的出现早于人口增长的任何迹象。考虑到出口数字实实在在的上升，这种认识似乎验证了工业化进程是出口导向的假设。部分产业部门着眼于出口（尤其是殖民地）的需求，这似乎是真实的。同样明显的是，工业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提高农业占主导的社会各个阶层的购买力，才能够实现。不需要过多地依靠统计数据，我们似乎可以将这样的印象（即可耕地产量的巨大增长，牧场、羊毛及皮革的价值的升高）作为可靠的证据，证明17世纪后期农业的财富确实有了增长。18世纪30~50年代之间经济衰退毫无疑问的发生了，而似乎在内陆地区要比其他地区严重得多。东英格兰以及不列颠西部和北部的福利经历了稳定的增长，这种福利增长随着18世纪60年代之后制造业、农业和人口变化加快进入持续增长而成为普遍进步的一部分。支撑国内需求增长的因素除了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之外，还应该加上工业部门内部供给和需求相互间联系网络的稳定的扩大，这其中包括极为重要而又未被充分认识的水路交通联系。在不列颠，有两位学者，即艾什顿和钱伯斯（Chambers，J. D.）的工作，特别有助于揭示这些联系对于从整体上全面理解18世纪的经济意义。

在有关人口研究的大量著作的基础上，虽然这些著作的细节通常是模糊不清的，但历史学家们最近发现了一系列广泛的变动趋势。在这部经济史的第四卷中的第一章，海勒纳（Helleiner）教授描绘了人口引人注目的增长时期，它起始于15世纪末，持续到16世纪，只是在17世纪消亡了。研究人 [8] 口状况的下一章，即米歇尔·弗林（Michael Flinn）教授撰写的工业化之前欧洲的“死亡率的稳定”，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有关严格的经济变化进程的外生因素的新证据，这些因素解释了人口危机的结束。[①] 他的论断源自于以下的发现，即阻碍欧洲人口稳定而持续地增长的高死亡率本身，既不是稳定的，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个发现，为海勒纳教授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有关人口波动的那一章，提供了崭新的衡量尺度。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比率”，通常仅仅是几十年中死亡率的平均值，而这几十年的实际死亡率，是在较低的比率和灾难性的高度“危机”时的比率之间变动。而这种死亡“集中”是各种灾难突然同时出现引起的。比如在战争时期，战斗中的死亡、相伴随的对平民的破坏和劫掠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特别是伤寒）的爆发。比战争更严重的是饥荒，它破坏巨大而又频繁出现，例如1598年、1602年、1623年、1667年，17世纪90年代、18世纪20年代及18世纪40年代。当死亡率上升到一个极不正常的高度时，较高的死亡率危机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以巴塞尔（Basle）为例，与前5年和后5年人口死亡的平均数337人相比，1667年的死亡人口为1 626人，超出了1 289人，或者说超过了382%。这些“饥荒”在17世纪后半期西欧最后一场瘟疫过后，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极为可怕的。很明显，英格兰遭受谷物歉收的破坏程度要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法国要小得多，然而在18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的歉收年份中，英格兰的死亡率仍旧很高。

“饥荒”并未从历史上消失。约翰·克拉彭爵士曾经写到：“如果说19世纪在其他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但它至少可以获得这样的赞誉，即第一次减少了，也许可以更公平地说，排除了长期以来西欧的农民和其他人对饥荒的恐惧。”[②] 近来，历史学家们将“饥荒边界”向后推移，至少在西欧的某些地方如此。法国历史学家戈贝尔（Goubert）和穆怀特（Meuvret）指出，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曾经破坏法国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物质短缺最终开始逐渐消退。在其他地方同样如此。虽然各国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

---

① 见M. W. 弗林：《工业化之前西欧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载《欧洲经济史杂志》1974年第3卷第2期，第285～318页。

② J. H. 克拉彭：《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3版，1928年），第402页。

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某一时刻，粮食歉收已失去了其以往所具有的致[9]命的破坏力。许多因素促成了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这一根本改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面对饥饿威胁做出的直接反应。在诸如爱尔兰、苏格兰、波兰和西班牙等国，人们从贫困的地方迁移到相对富裕一些的地方以缓解食物短缺。欧洲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增加，或许使这样的迁移变得较为容易。运用卓有成效的企业家技能，运输（通过荷兰及其他商业船队从波罗的海运来谷物）毫无疑问的可以有效运作，以减轻欧洲（不仅在大西洋沿岸国家这样，在其他地方同样如此）16世纪和17世纪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在法国和瑞士，有逐渐增多的证据表明人类的技能以及人的深谋远虑，也在对付饥荒时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建立粮食储备以防不测，以及剩余的粮食从供应好的地方运输到供应不足的地方。更加多样化的种植品种，有时更高产的作物品种如马铃薯、玉米和水稻的种植降低了单一种植农业所固有的风险。

如前所述，将医学的进步视为对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或者直接影响的观念，在近年来并不流行。虽然这一点无疑也适用于药物治疗，但是预防性药物同样也许更有效。近年来，由卡罗·希波拉（Carlo Cipolla）教授所作的研究表明，更严格地执行检疫规则有助于控制传染病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曾经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巨大的差异或多或少地减少了，繁荣而健康的地区开始防止出现贫困或者传染病的邻居，而贫困地区则受益于降低了的丰年和饥年之间的粮食价格差。

研究危机中的各种因素，尤其是价格和工资，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在英格兰，它可以追溯到出版于1838~1857年间的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和威廉·纽马克（William Newmarch）的6卷本《价格史》(*History of Prices*)，以及绍洛德·罗杰（J. E. Thorold Rogers）的著作。后者是一位古典学者、哲学家，也是一位拥有进步社会观念的牛津运动者（Tractarian）牧师。他任职于伦敦大学图克统计学讲座，使得他可以集中其全部余生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搜集和分析一系列价格与工资资料。罗杰的主要著作是1866~1887年间出版的6卷本《农业和价格的历史》，这其中体现了图克自己的思想。到19世纪末，乔治·韦贝（Georg Wiebe）更是在国际层面上对价格历史继续展开科学研究，他所收集到的欧洲的价格资料，经过分析可以[10]证明16世纪确实存在一场价格革命。弗朗克斯·西曼德以其对法国价格史熟练的研究继续了这一进程。除此之外，在由威廉·柏弗瑞知（William Beveridge）、豪瑟（Hauser）爵士、埃尔莎（Elsas）、波斯托缪斯（Posthumus）、普瑞伯莱（Pribram）、汉密尔顿（Hamilton）等人组成的国际协会及

柏弗瑞知本人的赞助下，许多作者都对各个不同国家的价格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填补了相应的空白。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出价格史是极其复杂的。以尼德兰为例，正如荷兰作者N. W. 波斯托缪斯所揭示的，贵金属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波动，不仅在日益增长的荷兰经济中被吸收、熨平，而且很可能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对我们的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有利影响，这要归功于生产力水平与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之间的平衡”①。不考虑其间断性，有关价格和工资的历史受到了广泛的科学对待，它在对广泛的经济运动趋势进行的历史分析中具有极大的价值。亨利·费尔普斯·布朗（Henry Phelps Brown）和希拉·霍普金斯（Sheila Hopkins）的有关英格兰长达7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及工资的论文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研究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技能相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例证，其中克拉彭贡献颇多。

经济史文献中更为典型的多样性历史，是由美国历史学家E. J. 汉密尔顿（E. J. Hamilton）所作的尝试。他用西班牙和英国对美洲白银的反应，解释了西班牙经济的衰退（以及相应的英国经济的兴起）。他指出，到1580年时，财富的流入已在西班牙造成了巨大“利润膨胀”。由于工资水平赶上并最终超过了价格水平，导致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退。受益于是转变为受损。汉密尔顿的论点被J. M. 凯恩斯（J. M. Keynes）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而凯恩斯的巨大权威性为这种观点赢得了很高的影响。然而，在汉密尔顿的美国同僚J. U. 奈夫（J. U. Nef）看来，情况并非如此，他在一篇送交英美历史学家1936年年会的论文中，猛烈地驳斥了这一论点。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从增长的价格和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寻找到的话，那么为什么法国会如此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又持续如此之长？这种争论现在看起来是古典的，而且与其他古典的问题一样，已经消失了。然而，由于它揭示了历史编纂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因而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第一，人们必须注意到有关利润方面的历史资料的缺乏。而有关价格和工资方面的资料，如奈夫所示，还存在着较多的争议。所以说利润水平（这对了解生产者极有价值）的资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利润数额则是通过从平均价格中扣除平均工资得到的，这一方法与那种通过投入的原材料的统计数字来计算出生产利润的尝试一样，似乎可以获得值得信赖的结果。在近代，没有什么问题会比精确地计算总的利润水平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净利润了。对农 [11]

① N. W. 波斯托缪斯：《荷兰价格史探索》（两卷本，莱顿，1971年），第2章第65页。

业部门而言，这一任务由于有关大量农民及小的和中型农场主资料的缺乏而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即便是对于那些拥有大面积领地的贵族和绅士阶层这样的土地所有者而言，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贵族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制造业部门也存在着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如凯伦本茨（Kellenbenz）教授在对同一时期欧洲制造业的研究所揭示的[①]，前工业化年代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出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商业资本对制造业过程日益强化的控制，如纺织业组织中场外生产体制、矿业中的大规模资本投资以及酿酒业中的建筑、农场和设备。当然，在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这种控制会有所不同。为能够满足生产资本的需要，绝大多数这类投资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其流动性。正如萨普（Supple，Barry）教授在其对 17 世纪初期处于危机及变化中的英国经济所做的研究中揭示的那样，企业家们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突然变化而迅速改变其流动资产的投向。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批评之前，他看到了产业资本面对人性时的多变性并忽视了其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这一记录与其商人资本主义的先驱的记录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出于一个极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更高级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没有更有说服力的原因的话，则是以利己主义的名义，固定资本的所有权需要以极大的努力促使这种或多或少不可移动的投资获得回报。经济繁荣以及家族主义情感都与此有关。那些控制着近代欧洲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商人资本家与其前辈相比，均有更大的易变性和暂时性，也更加令人捉摸不定。[②] 任何规模的企业通常都是合伙制的，而许多合伙制企业又是由频繁变化的集团构成的。对真实利润的计算历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成为制造业的基本特征之前，它带有更多的投机成分。因此，毫不奇怪，历史学家们通常愿意采用简化的方式，假定可以从【12】产量或营业额中确认利润的数额。而如果不能获取单个企业、农场和行业的产量或营业额时，则不得不将单个企业的财产含糊地等同于假设的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对社会或经济的历史进行如此粗略的判断的吸引力和压力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这并不能减轻这种随意的方法所造成的错误。历史学家们经常回顾早期的历史，在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通过有效的、强大的运输体系而进一步一体化的大国的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或多或少地对普遍的商业和技术

① 见后面的第 495 ~ 526 页（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下同——译者注）。
② 见后面的第 426 页、460 页。

影响，以及资本大规模流入做出了一致的反应。这种年代错误扭曲了早期经济学的实质。我们同样十分熟悉因粗略的、现成的假定而造成的历史事实的模糊，例如假设阶段A是一个国家的繁荣阶段（如纺织工业），而阶段B是一个衰退阶段。在这样的假设中，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纺织工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差异，均被模糊掉或忽略掉了。使用一般的分析工具（如利息率）来解释增长和衰退的尝试，也没有能够注意到在整个经济中表面上相同的产业，实际上却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例如，在18世纪早期，德文郡（Devon）的哔叽（serge）业出现了衰退，而诺福克郡（Norfolk）的毛织业却兴旺起来；而到该世纪中期，诺福克郡的工业开始衰退，而其竞争对手约克郡（Yorkshire）则兴旺起来。英格兰"新型布料"繁荣起来，而荷兰的产品则开始衰退。同样重要的是对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和服装）价格波动的研究，这是因为它们也会对非必需品以及（近来开始研究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T. S. 艾什顿（T. S. Ashton）在这一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迄今为止，有关19世纪以前各个时期的情况还有待探索，而有关19世纪70年代前后的价格下降却是显而易见的。

价格变化对18世纪英格兰农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然而，王政复辟至18世纪末期工业化之前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制造业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生活必需品总体价格水平的稳定和下降，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其他欧洲国家中，情况同样如此，有关这一点凯伦本茨教授在本卷的第七章中提供了详尽的证据。

简而言之，对价格、工资和利润的研究为人们提出了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无数问题，包括储蓄、投资、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借贷，以及上述这些因素对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影响。为了评估这些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们将不得不依赖于那些在经济学家看来软弱无力和不甚可靠而弃之不用的数【13】据。在历史领域中必定存在着许多领域，在这里，历史学家们必须依赖于他对各个不同时期的总体"感受"，以及他的直觉和正确计量的技术手段。

更冒险的是，经济史学家们则常常被人口统计史和价格史引导到社会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史领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R. H. 托尼（R. H. Tawney）就已经运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英格兰的租金与价格差额作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社会理论的复合体。这个理论包括：不动产所有者和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佃农的社会地位的上升；精明的商人利用乡民的无知及贵族的漫不经心或愚蠢而开展经营；资本主义对顽固的、建立在相互义务基础上的中世纪社会结构具有瓦解作用，这一过程随着价格和利润上

升的加剧，使得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荡然无存。斯通教授一直在追踪由托尼提出的、反映伊丽莎白时期贵族命运的发展轨迹。特雷弗－罗伯（Trevor-Roper）教授认为，受到16世纪几个革命的影响，“没落贵族”演变为贫困阶层以及政治和宗教上的反对者，这一主题不时地出现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历史文献范围中。在这里，历史学家们的问题是对先行者包罗一切的概说进行完善和调整。然而，研究越是变得社会文化化，人们越感觉到应该用彻底的改革来代替先前所作的完善。于是，在理想的历史文献中，在引人注目的章节，将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新教伦理相关联的韦伯—托尼式的主题已成为人们的一个思想障碍，最好能够抛弃它们。运用现有的有关法国、低地国家、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教教徒聚居地的社会和职业结构知识，人们越来越难以想像，加尔文教的伦理，被设计成适应社会地位上升的中产阶级“意识到其自身的标准与不严肃的社会的标准之间的反差，并为其作标准的经济美德体现者而自豪。”① 几年前，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就注意到加尔文实际上很少关注高利贷的核心问题，在其出版的整整二十多卷著作中仅仅占有两页讨论高利贷问题。在很久以前，古斯塔夫·雷尼尔（Gustaf Renier）就曾经说起吉斯伯特·弗特斯（Gisbert Voetius），这个冷酷无情的加尔文主义的支持者，是如何将不幸地嫁给当铺职员（也算是高利贷者）的敬畏上帝的妇女驱逐除他的教区的。吉斯伯特·弗特斯是乌德勒支（Utrecht）严厉的反兰阿明尼乌派的长老，也是荷兰共和国（绝大多数[14]为非宗教信仰者）商人统治者的批评家。随着时间的流逝，加尔文主义或许具有了政治上的革命性，但从社会意义上说，它仍旧是中世纪的。李·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教授所作的统计表明，加尔文主义教徒的聚居地是朗格多克（Languedoc），那里的教徒主要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例如，在1560年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561人构成的雨格诺教徒（Huguenot）社团中，69%为手工艺人。职业（15.4%）和贸易（4.5%）代理人也包括在其中，然而在所有能够区分开这两个行业的地方，占据主体的还是手工艺人和城市中的劳工。按比例而言，“商人”和“资本家”在占主体的城市新教徒之中也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乡村中的新教徒，直到很久之后才有所耳闻。东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情况则与这里几乎相同。

对人数的简单统计远远不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当然，若没有充足的证据或者能够解释现存证据的技术，便有可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50年前

---

① R. H. 托尼：《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第3页。

的韦伯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如此。数量化方法本身难以解决社会历史中因果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就使得学者们不得不继续研究。如果在“新教伦理”逐渐削弱时，心理上受压迫的少数派的问题仍旧存在着，他们偏爱从事商业（像他们所经常做得那样），是由于心理或社会本能方面复杂而神秘的动机呢？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其他的谋生手段？大卫·奥格（David Ogg）指出，不遵国教者（Dissenters）在1660年之后英格兰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可以用后一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在塞维利亚（Seville）和其他西班牙城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庶务修士（*conversos*）和隐秘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原因吗？理论上无法解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种族上的素质从本质上说也不能用来解释。如果鲁斯·派克（Ruth Pike）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在积累财富和创造“社会流动性的奇迹”① 等方面，显露出来的天才则似乎只是一种暂时的表现，即逃离备受折磨的忧虑不安而进入由西班牙下级贵族特权保障的社会和政治安定的快乐天堂的痛苦尝试。在揭示城市中不断增长的读写识字能力，商业社会及其会计事务所，社会对能够读、写、算的人的需求，和对能够提供一些共享机会的宗教形式（正如新教徒所作的那样）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经济上的因素能够解释16世纪和17世纪中，由于宗教上的敌对情绪而造成的歇斯底里的暴力冲突吗？卡罗尔·高斯凯（Karol Gorski）曾经指出，与动物身上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疲劳和营养不良或许也可以诱发人群中的恐慌心理。然而，他的推理却到此为止。他的结论是，精神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所有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基本的食物供应之外，【15】人们还会寻求其他方式的满足，如舒适、防止恐惧的武器，通过美术家、建筑学家和音乐家的天才而使自然环境更加丰富多彩。护身符被发明出来以抵御魔鬼、术士和女巫。陌生人和外来人（如犹太人）通常在社会上被隔离并成为牺牲品。然而，充满恐怖及驱除恐惧的世界的同时，也是一个时尚的世界，人们用歌曲和故事来消磨冬夜的漫长时光。各种娱乐和游戏使人们远离妓院和酒馆而留在了家中。我们对社会历史中的这些方面挖掘得越深入，人们所假定“基本的”经济解释的相关度就显得愈低。休闲的、精神的、智力的文化活动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人们很可能出于简单的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制造动乱和给当权者制造麻烦，正如17世纪的英格兰农民、泥瓦匠和木匠联合起来抗议对公共土地的圈地，反对贪婪的陌生人，这些人威胁到他们

① 鲁斯·派克：《贵族和商人：16世纪的塞维利亚社会》（纽约，1972年），第100页。

的放牧权利、在森林中砍柴的权利、在沼泽和湿地内捕鱼及捕获野禽的权利。近代史上折磨每一个社会的长期失业、就业不足和贫困，毫无疑问孕育着产生社会骚乱的危险，增加由盗贼和流浪者而造成的社会暴力。然而，在许多其他例子中，社会动乱似乎与富裕或贫困的一般水平之间并无多大联系。荷兰共和国（该社会或许拥有最高水准的生活水平）就曾像法国一样，出现过对统治者进行暗杀的活动。而远比法国要贫困得多的西班牙，虽然也长期出现过抢劫等行为，然而大规模社会动乱的爆发却比法国少得多。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 omew）的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16世纪的第三个25年间出现过许多类似事件，如果说是小规模的话，尤其是“宗教”大屠杀，毫无疑问，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然而，诸如此类的麻烦往往出现在宗教节日，集中在宗教过程或异端审判中。新教徒亵渎或侮辱其他宗教的圣物，以发泄他们的怨恨并揭露其对手思想的欺诈性。罗马天主教则将加尔文教徒攻击为魔鬼和反耶稣的化身。这些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拘泥于仪式的，其根源则在于内心的恐惧、怨恨和复仇心理。这并非源于经济利益上的不满，而是源于作为组织人类情感概念的教义上的冲突。我们应区分哪些社会动乱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而哪些又不是，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经济方面的因素并非在全部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作用。

近代史，即“现代国家时代”在传统上，被经济史学家视为重商主义国家和经济的时代。“重商主义”这一概念，作为促进一国权力及表面上的【16】财富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的复合体，历来就是历史学家们争议的一个根源。而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的最近趋势则倾向于支持这个概念的原创者，并承认其在实践上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结果。李·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教授将柯尔贝尔（Colbert）放回到他所处的时代，即农业社会正经历一般性的经济衰退。拉杜里教授将柯尔贝尔对“工业化行为”的鼓励，视为穿透那个阴暗时代的一缕光明和希望。这预示着如果法国要想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与生产停滞的“剪刀”结构的话，是多么的需要经济活动的多样化。那种“剪刀”结构在促进物质生产进步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间歇性地发挥作用，而在最差的情况下则根本不起作用。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16世纪的失败是因为当时缺乏使得政府良好运作的人或技能，而将这种批评应用于以后的两个世纪时，其说服力则大大减弱。法国、德国、英格兰和一些意大利城市，至少可以说在政府管理的某些特定领域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法国和瑞士更采取了持续有效的步骤来处理传染性疾病和饥

荒。有些这类“预防性”措施（在历史记载中通常忽视医药的作用而过分地强调医疗方面的作用）来自于意大利城市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经验，在那里，隔离检疫以及对旅行者和货物的健康的强制性要求，很久以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

重商主义具有其独特的成功之处，这一点很难否认。同样，人们也难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即重商主义代表包罗万象的概说，这些概说来自于凯恩斯提出的经济、货币和投资理论，而这些理论被用来解释和证明例如重商主义者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出现了一个趋势，即强调人类和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的能力，这一点成为16世纪和17世纪中在各个地方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新学说的核心特征。虽然出现了许多次失败并出现了惊人的浪费，这些因素构成了使人们相信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内在动力。在我们这个时代，M. 莫内（M. Monnet）早就指出，有关计划的特定实践所取得的一时的成功与失败，与那种相信目标本身具有极大重要性的观念相比，要次要得多。鉴于会出现年代错误，我们不应当进行所谓的类推，然而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在这几个世纪中，随着贫穷光荣这种观念的消退，以及产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回报的例子的增多，人们想要获得物质利益的雄心和抱负在不断增长。这些变化并没有逃脱政治家、行政官员和商人们的注意。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动机通过大量的论文集、书籍和小【17】册子得以反映，而所有这些又形成了“重商主义”思想的经典大全。当然，国家并不总是需要依靠技术官僚政治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时的“国家”仅仅是指君主专制的国家，以这种观点来看，当时新组成的联合省则很难被视为一个国家。与法国和英国的相比，这里尤为缺乏“重商主义”的组织机构和立法保证。然而，这里却对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一些基本的社会事实存在共识，这在精明的常识中表现出来而又不需要复杂的管理和实施机构。荷兰共和国（一个松散的城市经济联盟）的半自由放任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信念，即社会容忍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好处以及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同时，这种自由放任在政策（上述观念在其中得到了特别的体现）上则体现为可以自由地移居到新建立的共和国，而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新“国家”在制造业、商业及金融技能方面的至关重要的发展，促使个人之间商业关系网络的形成，以及资本和船舶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它们分别来自于尼德兰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和英格兰。离开这些因素，荷兰的进步则将慢得多、小得多。

在必要的程度上，对近代欧洲经济史的研究应在一国国民经济的环境中

进行。从一个方面来看，对国内需求尤其是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需求进行分析，这种宏观经济史甚至在为了收集证据的方便而经常用出口来衡量贸易和工业进步的那个时代之前，就已经牢固地确立。历史文献中的这种变化也与 18 世纪政策与思想的实际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同步出现。当时受出口导向政策支持的有关贸易平衡的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已经让步于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的强烈批评（至少在西欧如此）。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拓展了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利用其丰富的在逻辑和修辞方面的全部技能，轻视和嘲笑了柯尔贝尔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对商人及其事业潜在的不信任和轻视，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并进而延续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观念从未彻底消失。虽然法国的宣传家为减弱这种轻视商业的思想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反对土地贵族积极从事商业和贸易的偏见依然十分强大。身为法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在【18】《国家的财富》中，作者充分表明了其社会态度：轻视商人的社会风气至少是一个亚当·斯密和柯尔贝尔共同拥有的信念。

重商主义过分地关注贸易与工业而低估土地与农业。随着国际主义潮流的兴起，对它的反对日益传播，这在休谟著名的宣言中得以明确的反映："不仅作为个人，而是作为英国国民"，他将"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于法国本身商业的繁荣而祈祷"。在与之相似然而却晚了一个世纪的潮流中，维多利亚时代资本的输出则引发了 1900 年强烈的反抗英帝国的运动，它要求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

经济史的最新趋势，可以被看做成历史现实的长期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相似性。将所得到的结论称为"新"历史是危险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怀着对"新"经济史最近的代表人物的主张的尊敬，我们应当说，除非冒着在有根有据的观念看来根本就不是历史的风险，否则，任何历史都不应声称是"新"的。任何一种继承了该行业早期开拓者留下来的大量的方法和观察到的遗产的真实的、不可获取的历史都可以说是"新"的。人口史和综合历史学中的新因素，部分的来自于对新材料的使用，部分来自于对新技术的使用。有时，它继续使用国民经济学的框架以作为其研究的范畴，而有时其研究范围则更地方化一些，或更普遍化一些。通常，由于受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的影响，人口的运动会呈现出普遍的不明显的特征，而在另一些时期，在某一大洲的范围内，则呈现出波涛汹涌之势，这有可能导致或大或小的地方动乱。于是，作为研究人员，需要从国际的角度来把握他们的研究。这样，他们及其研究成果会在许多方面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

有国际性。而研究综合情况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发现，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律来支配工资、价格、利益、货币等等（这些是“综合”的基本要素），但是，对那些观察视野足够宽广或长久以至于能够发现潜在的相似性的历史学家来说，某些趋势会重复出现，而且可以被观察到。例如，欧洲的历史学家们与其北美同行相比，或许对货币政策的“社会”重要性认识不足，这是因为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均不会如此），以放松银根和农业债务为一方，以紧缩银根和信贷供给为另外一方的关系，变成一场明显的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本身可能是广泛和持久的。在这个相对不为人【19】们熟知的领域中，比利时历史学教授 R. 冯·尤特文（R. van Uytven）教授，近年来揭示了货币升值和货币贬值政策（银根的紧与松，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使用，对于政策的支持和反对的分化组合所起的巨大作用，例如 16 世纪尼德兰查理五世（Charles Ⅴ）和菲力浦二世（Philip Ⅱ）所作的那样。紧缩银根的政策得到了地主及放贷阶层的支持，而放松银根的政策获得了贸易商和出口商的欢迎。他们看到，通货紧缩和较低的币值会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银根紧缩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然而这却对那些给富有的放贷者（如绝大多数地主）、提供奢侈品的贸易商和制造商有利。这些富有的放贷者反过来因为他们收取的租金价值的提高而花费更加大方。工资收入者将忍受（通常明显地沉默）由于货币贬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因为贬值减少了其未调整的收入的实际价值。贵族阶层通常很少对此逆来顺受。聪明人菲力浦，即佛兰德人（Flemish）反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起义活动的领导者，为了争取佛兰德斯（Flanders）的各诸侯国和城镇站在自己一边，认为大公持续不断的货币贬值损害了放债人和富人的利益，同时使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有所上升。

上述证据不仅表明改变收入的相对价值的货币政策如何有助于解释通过其他方式难以解释的政治联盟，而且也可以解释在一定时期内，在整个结构中单一因素如何能够深刻的影响整个区域中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波兰的历史学家同样证明，通过降低出口货物的价值，17 世纪波兰货币的贬值增加了将农民降为农奴的压力）。无论是马克西米利安的货币政策还是聪明人菲力浦的争论，都未能改变政治历史的发展阶段，这就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黄金十字架”的讲演，并不能免除我们对美国激进政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一样。冯·尤特文教授的分析仅仅表明，不需要将箱子推多远，综合结构分析可以为某些历史时期和事件提供更多的解释。正如他所说，当综合考察 16 世纪的货币政策时，人们就会看到荷兰贵

族反对一再实施货币贬值政策的菲力浦二世，而不反对其在整个执政期间始终坚定不移地实施货币稳定政策的父亲，这并不是简单的偶然巧合。

在最近的经济史研究中，乡村、地区或者大陆［如 E. A. 里格利（E. A. Wrigley）的鼠鸟镇（Colyton），皮埃尔·戈贝尔（Pierre Goubert）的博韦（Beauvais），李·罗伊·拉杜里的朗格多克（Languedoc），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开始日益变成最为适宜历史学家们利用各种技术和达到目标的，以及适合采取多种特定的因素进行社会—经济历史研究的“研究对象”（或许这种变化更适合新一代的口味，至少在西方如此，他们通常将“国家”等同于在现在看来其历史是最不可信的东西）。【20】

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新的技术已经被用于分析国民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这些技术在分析荷兰共和国、从 16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欧洲经济奇迹、17 世纪的法国时，是相当成功的。而在分析西班牙的案例时，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西班牙经济从其在 16 世纪第三个 25 年的巅峰，滑入到了 17 世纪初的经济停滞和衰退。

1.2 一些案例

第四卷和第五卷的最初计划是在这两卷之间进行粗略的分工。第四卷研究近代欧洲历史的大背景，包括社会的、地理的、科学的和人口的背景。而第五卷则研究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等的具体过程。我们可以说遵照了这个写作计划，但作了一些修改，这是为了适应自本卷计划写作到本卷出版之间这些年研究的发展。农业发展史在 B. H. 斯里彻·冯·巴斯撰写的本卷第二章中得到了详尽的探讨。欧洲大陆的工业、商业和社会发展在由格拉曼（Glamann）教授、凯伦本茨教授和白伦斯（Behrens）小姐撰写的有关章节中得以研究。这些章节写完之后，研究发生在法国、荷兰（Netherlands）和西班牙的相互联系的变化过程——农业的、人口的、商业的和工业的——的重大成果已经出现了。这些都特别值得一提。

直到 16 世纪后期，才有确实的证据将荷兰北部各省的农业经济与其他许多地区的农业经济区别开来，至少从“增长点”上来说是如此。当 1568 年 8 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开始时，像欧洲其他的小农经济国家一样，荷兰仍旧遭受着长期的危机——食品短缺、饥荒和普遍贫困的共同折磨。在

法国，李·罗伊·拉杜里以其杰作《朗格多克的农民》，回顾了人口和农业增长和收缩的长期波动。紧接着的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人口扩张而来的是生产的急剧扩张，但是当时间发展到17世纪时，人口增长明显地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经济已经不能支撑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而在17世纪末，经济和社会的相对停滞状态有所缓解。接下来又是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波及欧洲大多数地区的经济萧条。只是在这次萧条之后，才出现了长期而持续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迹象。在这一长期努力的过程中，一度出现的人口增长压力受到农村地区经济停滞的约束和抑制。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通过在谷物种植之外增加特种作物——特别是葡萄和橄榄，法国的小农经济才开始多样化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21]

阴暗而常常是血腥的法国社会发展史和荷兰新成立的共和国的社会发展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荷兰，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17世纪中叶，一种新型的国际交换经济开始兴起，这种经济高度城市化而且极度依赖于食品和原料的进口。然而，这种经济为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层、大多数城市劳工和农村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较高的生活水平。新的金融机构和制度革新，包括公立和私立银行、生产和运输贸易的存货、新的造船技术和新的商业手段，都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这是经济增长，即真正的经济增长。近来研究荷兰发展的一位历史学家弗里斯(Jan de Vries)，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扩张”做了仔细的区分。而“经济扩张”早在16世纪就在欧洲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经济扩张表现在土地开荒、新的城市、大小港口的出现，以及欧洲和欧洲人扩展到其他地区和大陆。然而，就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改进在过去最多也是零星或间歇性的。重复出现的粮食短缺使得人们的实际收入降低；小农经济对财产的分割降低了劳动的生产率。这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无情的发展过程，其间经济活动的偶然爆发受到阻止，从而使得经济发展过程陷于停顿。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失业、不充分就业、过高的死亡率、饥荒和瘟疫。这种波动起伏而又变化不定的经济扩张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正如弗里斯博士指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现象”①。只是在17世纪，荷兰北部各省（从前与其南方富裕的邻居关系不和）才出现了新的、真正的经济增长。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它是

① J. 弗里斯：《1500～1700年：荷兰农业经济的黄金时期》（耶鲁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19页。

如何发生的？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增长的动力源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贸易。在亨利·皮尔（Henri Pirenne）的经典解释中，城市的经济生活传播了“其（对农村的）影响，将农民从懒惰中唤起”。B. H. 斯里彻·冯·巴斯和他在韦直宁根（Wageningen）农业大学的助手的研究成果，在一些对历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而言极其重要的方面对这种解释进行了修改。他们的工作由弗里斯得以推进。在新的解释中，经济变革的动力不仅仅源于城市的积极性，而且也来自于在农村和城市互动中**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内部变革。

有关荷兰经济史最近的、广泛的研究，成为我们纵览近代欧洲经济增长和衰落进程的合适起点。

特别是在荷兰省，一个“新的乡村”逐渐出现了。与南部各个省份以及西部和南部的国家不同，土地贵族没有在荷兰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它的农业和欧洲的“庄园”地区不同，并未受到合作农业经营或混合所有制的任何强求一致的限制。甚至在1500年以前，小农土地所有制就已经普遍流行。人口并非过度稠密而城市化水平却非常高。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荷兰省的人口数量继续增长，这种增长由农村的高生育率来支撑。距离较短的地方性移民（16世纪中期以后从南方迁来为数不少的移民）有助于增加城市的人口，进而促进经济繁荣。但是，荷兰省的城市和其他城市一样，既为众多的人口提供工作，又是人口的杀手。荷兰城市和同时代其他城市一样，是通过进一步的移民来抵消持续较高的城市人口死亡率，从而补充人口并使人口得以增加。虽然与此相伴有运输业、对外贸易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荷兰北部小农**农业**的革命，那么荷兰17世纪持续的经济进步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荷兰的农民生产者在更早的时期就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经济作物的生产中进行专业化。由此出现了一个繁荣的独立的农场主阶层，他们受益于更大的农场规模，数量更多、健康程度更好的畜群，以及产量更高的牛奶、奶酪、干草、苜蓿、小麦、大麦、燕麦、产油果实、亚麻、油菜、大麻、洋西、蛇麻草、烟草等等。更有效的劳动、良好的灌溉系统以及更大方地使用肥料带来的这些产品，都拿到城市市场上出售。卷心菜、豆类和植物茎块、球茎植物和花都成为一度丰富的有效的园艺农业的产品。相对于农业经营而言，多余的农村人口会迁移到城市或者被吸收到农业发展的辅助（但却必不可少的）部门，例如各种各样的堤坝、围海造田或运河的修筑和维修，五金机械的制造，运输和港口工作。

想要农村地区的进步和城市的增长之间不断发展的相互关系不被物质短

缺抑制的话，那么，海洋、河流和运河运输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成为建立一个以流动船只（*fluitschip*）为基础的、规模庞大而且有效的运输船队的刺激因素。流动船只（通常）是没有武装的航海帆船，造价低廉而且运营费用也低。从16世纪后期开始，这种船队使得新成立的共和国所需的基本食品的越来越多的份额依赖于进口，起先是从波罗的海地区，接着是从法国、英国和尼德兰南部进口。进口记录显示，截至17世纪中期，外国进口的粮食提供了荷兰省（Holland）、乌德勒支省、弗里斯兰省（Friesland）和格罗宁根（Groningen）超过50万居民的食物。进口的粮食不仅供养了居民，而且为荷兰共和国集中的酿造业提供加工原料。这就释放了本国的资本、土地和资源，使其可以集中从事（前面已经列举的）特种经济作物的生产，而种植这些特种经济作物的利润要比种植可以制造面包的谷物的利润高得多。由此，土地、劳动和资本可以得到更集约化的利用。

内地运输几乎也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到17世纪早期，遍布全国的运河网和河流、道路将尼德兰北部各省紧密地联结成一个经济体，这一点与这一地区出现的政治上的非集中化形成奇特的对比。这一运输体系用来满足重大笨粗的货物，尤其是泥煤（peat）和肥料的运输。泥煤是这个只有有限的木材供应且没有煤（coal）的国家最重要的燃料。城市家庭用煤和不断增长的工业（例如纺织业、制糖业、酿造业等）的用煤需求，使得泥煤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其主要采掘地［在艾吉（Ij）和马斯河（Maas）之间］运送到城市。相反，粪便则有规律地从城镇运送到乡村。在18世纪中期，单单是莱顿就有11条特殊的运肥船（*vuilnisvaarders*）繁忙地将粪便从莱顿运到乡村。新的轮作体系和大量的施肥，使得荷兰的谷物种植获得了独一无二的高产。粪肥对于像大麻这样的特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业特别关键。

在大约六七十年的时间里，许多方面的有力投资，使得荷兰农村社会可以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当时的欧洲，这一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因素也有助于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例如特别高的识字率，到1660年，识字率达到40%～60%的水平，这给贵施蒂尼（Guicciardini）和其他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衣饮食的水准也同样高于欧洲其他地方（可能不包括英国）的水准。【24】

但是，早在17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的1730年和1750～1751年，观察家就不安地指出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良好的。对荷兰经济“衰退”的分析再一次得到扩大和改进。这个过去以来其经济崛起依赖国际需求和国内需求（尤其是16世纪新增人口带来的需求）的结合的经济体，在17世纪中

期开始受到欧洲普遍的人口保持不变甚至下降的影响。作为欧洲和世界市场的中间人，荷兰商人可以被视为恩人或入侵者，而重商主义者的抱负，使得荷兰商人在17世纪下半叶通常扮演入侵者的角色。由于荷兰商人通常特别具有进攻性，因此他们成为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普鲁士和西班牙等国具有进攻性的重商主义的主要攻击目标。有迹象显示，1650年以后，荷兰的海上扩张再也没有重大的突破了。而莱顿这个欧洲最大的单一工业集中地的纺织品产量，在1654～1667年间达到其顶点，随后成为来自东英格兰、德文和约克郡以及法国甚至波兰的低成本的竞争对手的牺牲品。但是荷兰的危机并不仅仅限于贸易和工业，而且还出现了人口增长枯竭的迹象。随着妇女结婚年龄的增长，生育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独身主义者，更多的寻求妓女，以及采取一些可能的生育控制措施，都导致了家庭规模的减小。

在这一切因素之外，还存在一些更不易觉察的、更不易衡量的影响因素。例如，共和国的规模仍旧很小。它以激烈的、敏感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方式，反抗西班牙企图将尼德兰作为其反对异教徒的圣战的财政来源的图谋。然而，就像无王时期（Interregnum）的英国一样，荷兰发现在一个战争不断的世界里，保卫其领土边界、运输业和贸易会带来惊人的困难，与留在西班牙帝国内相比，几乎无法以更低的成本维持它们自己国家的正常运转。债务和税收无情地高涨。荷兰人似乎逃避了什一税（Tenth Penny），但却以货物税（*accijns*）的形式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17世纪，沉重的间接税负担令几乎每一位荷兰经济事务的观察家感到震惊。大体上，荷兰共和国从相当于英国1/2而相当于法国1/6的人口身上，征收了和英国同样多的而相当于法国1/3的公共收入。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一个在普通的饭馆吃不起一道菜的人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付出19%的消费税。这并不比事实更令人奇怪"，来自海牙（Hague）的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在1658年或1659年1月这样写到。他重复了这一时期其他人【25】的评价。税收对制造业成本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早在1651年，一位匿名的英国作家在经过计算后认为，英国布料行业的劳动成本大约相当于"荷兰的一半，这是因为分摊到所有荷兰劳动者工资中高昂的居住和食物费用"。

但是间接税并不是惟一的原因。荷兰共和国的人口总量较小，土地稀少而且开垦、排水和保养的成本较高。因此，排水费用和土地税收就非常高。到18世纪，这些负担沉重地压在土地所有者的利润上。到1700年时，这些负担非常之重，以至于许多土地被抛荒或者移交到联合省政府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所有者负担不起土地的税收。城市和乡村同时出现的困难使得人口

增长停止，这种停滞状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的原因前面已经讲过。在此也许应当补充的是城市人口高死亡率这一持续不断的问题，一位四分之三世纪以前的荷兰人口学家写到，“我们看到，早期的城市可以比作为弥诺陶洛斯（Minotaur），它吃掉希腊的孩子们。而卫生学则可以比作为杀死弥诺陶洛斯这一怪物的特修斯（Theseus）。而雅典（还利用这个比喻）则是每年给城市送去大祭（hecatombs）的乡村。”① 据估算，18 世纪荷兰诸城市每年就需要大约 250 万移民来保持其人口规模。因此，城市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吸收人口。

然而，黄金时代过去以后的荷兰共和国的状况，不能简单地（就像我们常常所看到的那样）被描绘为由彻底的经济崩溃和道德沦丧而导致的社会僵化。即使所谓的“假发时代”（Periwig Period），当时法国、英国和其他“异己的”影响力有时固执地削弱荷兰人坚强的神经，也并不像有时描绘的那样，是经济上和道德上的衰落时期。先前时代的耀眼光芒在逐渐消退，整个图画都在无情地褪色，但不同部分的程度却不是相同的。整个景象是斑驳的、不规则而又不均匀的，但是，像教区牧师的球一样，有一部分仍旧是完好的。亚当·斯密仍旧会认为这时的荷兰共和国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它的海外贸易和运输业，虽然与 1648 年的最高峰相比有所下降，但仍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的捕鱼业也同样如此。它的工业状况也是不均匀的。莱顿的纺织业，特别是由 1560 年以后从洪德斯库特（Hondschoote）来的难民发展起来的、使得这个一度衰败的城市复兴起来的新式布料业（*Nieuwe Draperijen*），在 17 世纪 70 年代以后状况不佳，而到 1750 年几乎完全消失。一度著名的哈勒姆（Haarlem）亚麻漂白工业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像后来的代夫特（Delft）和其他地方的陶瓷业一样，这里高成本、劳动密集型的荷兰工业无法与其英国对手展开竞争。但在另外方面，受到高昂的劳动成本影响不明显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情况则要好一些，酿造业、蒸馏业、制糖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等仍旧保持着高度的繁荣。

【26】

如果说荷兰工业的命运是多变的，那么荷兰的银行业和金融业却在大量仍旧寻求获利机会的资本的基础上得以繁荣。整个 17 世纪，荷兰人建立了广泛的世界贸易网络。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它出现了以银行、慈善机构、地方官员和个人掌握的大量储蓄的形式存在的生产剩余。这些剩余资金在国内

① 考尔布鲁格（J. H. F. Kohlbrugge）：“Over den invloed der steden op hare bewoners en op de bewoners van het land”，*De Economist* LVI（1907），372～393。弗里斯在《荷兰乡村经济》第 117 页引用。

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①] 因此就被有系统而又灵巧地投入到18世纪欧洲各国名目繁多的不断增长的国债中，这些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德国和奥地利帝国、俄国、西班牙、葡萄牙、萨丁那、法国以及最重要的英国。在英国，荷兰投资者的决定甚至成为决定财政部首席议员的重要因素。在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3年）之后，许多荷兰资金转而投向法国和北美。曾一度被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即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Napoleonic）统治摧毁了外国投资储备的观点，现在看来是太夸大其词了。总体看来，这些灵活投资的储蓄和利润给荷兰带来大量、定期的年息。像佩尔家族（Pels）、缪曼（Muilman）、克利夫特（Clifford）、德斯麦斯（de Smeth）、豪格·豪奈卡（Hogguer Horneca）和霍普（Hope）这样的专业银行家，在各自的领域内利用专门知识经营。他们受益于一大群投资客户，他们管理客户的资本。

荷兰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发展、科学知识和观测数据历史，以及在此后面蕴藏的敏捷的商业智慧，但荷兰人为什么没有继续向前推进到发展的最后一个符合逻辑的阶段——全面工业化呢？历史学家们在回顾时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8世纪后期，荷兰的时事评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得到的答案是多方面的：国内市场狭小，海外市场日益增强的保护，荷兰的成本高昂，资本家可以从对海外证券的投资中获得更高而且更慷慨的回报。此外，至少在19世纪后期之前，荷兰商业社会传统的主旋律从未改造成工业社会的基调。因此，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生活的更为舒适相伴随的，是对其他阶层而言的越来越多的失业和社会不幸（虽然这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那个时代的特征）。在英国出现的衰落中的传统制造业和新兴的大量生产产品行业之间的鸿沟，在荷兰也没有缩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上层到下层，普遍存在着结构上和心理上的障碍，从而没有可能将传统的经济改造成为新型的经济。然而，在衰落时期和增长时期一样，农业部门的极度重要性仍旧保持着。在荷兰经济黄金时期被商业和工业夺去光芒的经过改造的乡村经济，仍继续为19世纪荷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在那个时代，城市光辉尽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堆栈贸易市场及其相关活动才逐渐消失。

要使这种专业化的农民经济得以继续，就必须付出代价。荷兰农民经营

① 参见一个荷兰观察家在1774年的感觉敏锐的评论，我在《18世纪英国与荷兰的商业和金融》（1941年）的第188页曾经引用过。

的农业具有进取性、多样性，这就使得农业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商业经济活动，而不仅仅是面对自然灾害的持久威胁而挣扎的落后的谋生方式。这是一种从技术上说和贸易以及工业一样，需要其从事者足智多谋并需付出极大耐心的行业。18 世纪荷兰农业仍旧是先进的，那种认为荷兰农业没有采纳技术发明（其中一些对荷兰的情况具有不确定的价值）的批评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荷兰农业的主体并不是谷物生产。而另一方面，荷兰城市的制造业面对英国（以及在更低的程度上的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当不同的社会和技术环境下兴起的乡村工业，失去了竞争力。[①] 城市的吸引力使得尼德兰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一个持久的乡村贫穷阶层，从而为分布广泛的农村工业提供劳动力。例如英国的外出工作人员和纺纱工人，他们成为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工业的一大特征，并为英国的全面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正像弗里斯教授所说的那样，也许正是使得尼德兰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超过其他国家的经济进步，制造了 18 世纪荷兰全面工业化不可逾越的制度性障碍。

在经济发展上和荷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班牙。由于汉密尔顿的开创性成果，历史学家拥有了一个从货币供给和政策的角度来继续研究西班牙经济衰荣的非凡基础。确实，表现流入西班牙的美洲白银的曲线，对那些面对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答案的人来说，是太有吸引力了。美洲白银的输入量从 16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上升，在 16 世纪 90 年代达到顶点，以及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不可避免地下降成为相对细小的流量。对汉密尔顿来讲，经济学和政【28】治学是相互联系的，但是“经济力量的失去相对于政治衰落的结果而言，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②]。他的基本解释是工业“适应白银的流入”，这创造了繁荣的假象，一个诱使西班牙君主和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幻想。尼德兰的异端新教徒、英国、法国、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伊拉斯姆斯（Erasmians），以及本国的新教徒、摩尔人（Moriscoes）和犹太人，这一切都成为反对的目标，并为此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圣战，无论是海战还是陆战。进行这一切时，根本就不考虑代价——无论是鲜血还是财富。因此，汉密尔顿认识到战争本身的经济后果是灾难性的，而将整个过程推向灾难的似乎就是白银，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白银的流入可以用魔法召唤出没有止境的繁荣和不可一世的权利的幻想。由此看来，对于西班牙的衰落，即从 16 世纪中期的顶峰到 17 世纪中期的低谷的解释存在于货币供给领域。

① 参见弗里斯：《荷兰乡村经济》，第 234 ~ 235 页。
② E. J. 汉密尔顿：《西班牙的衰落》，载《经济史评论》第 8 卷，1938 年。

其他历史学家，包括大多数早期的政治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罗伯特·瓦特森（Robert Watson）的《菲力浦三世统治时期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Philip III*) 在 1783 年发表之后，这些学者就宣称西班牙的能力"与它的愿望不相配"，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西班牙吞下了超过它的消化能力的东西。因此就有了 J. V. 韦弗斯（Jaime Vicens Vives）所描绘的物质和道德上的衰落：沉重的税收负担引起了卡斯蒂利亚（Castile）居民大量持续的外迁，这使得西班牙部分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对摩尔人的驱逐使得巴伦西亚（Valencia）和阿拉贡（Aragon）多达几百的村庄空无一人；普遍的营养不良使受害者容易得病；所谓的贵族精神，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牧师、修道士、强盗、流浪汉和小偷的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包括耕作业和畜牧业在内的农业的衰落；卡斯蒂利亚传统的工商业城市［包括伯格斯（Burgos）、托莱多（Toledo）、塞戈维亚（Segovia）、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ilid) 等］的衰落，其中有些城市到 1650 年时，失去 1559 年人口数量的一半；最后是 1599 年到 1630 年的通货崩溃，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源泉的所有者，发现自己已穷到了铸造铜币的地步。除了 1627 年到 1634 年这一段不稳定的中间期（在这一阶段政府尝试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之外，整个 17 世纪的危机都反映在长期的、不可控制而且是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中。

如果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补救措施对经济疾病有所补救的话，那么西班牙就已经非常的富有了。金银通货主义者和限制主义者（他们认为西班牙的首要政策就是将金银保持在国内)，以无休无止的争论反对像刘易斯·奥茨(Luis Ortiz) 这样的重商主义者，刘易斯在《反对金钱从西班牙王国流出的请愿书》[*Memorial against the Flight of Money from this Realm*(1558)] 中，提出了与后来那不勒斯（Neapolitan）的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 Mun)、法国的包丁（Bodin）和吉恩·伊昂(Jean Éon) 的思想相似的诊断和治疗措施。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主张国际收支差额的人，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刺激工业增长，禁止原料的出口和制成品的进口，为航运业和战略性的产业提供奖励金和补助金。而限制主义者(*arbitristas*) 并不缺乏想像力和创造性智慧，他们缺乏的只是对政府的冷漠，或者对官僚机构的无动于衷产生些微影响的能力。导致他们彻底失败的一个惊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主张对依照环境而定的事情进行哪怕是最小的精神控制。

[29]

和对其他国家经济的研究一样，对西班牙历史的最新研究，已经致力于弥补共同导致 16 世纪后半期和 17 世纪西班牙经济问题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

素之间的不平衡。艾里特（Elliot）教授在最近的1961年的研究中还可以宣称："对于西班牙的土地契约和耕作情况，或者人口变化，或者伊比利亚半岛上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财富而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并不比50年前知道的多。"[①] 时间又过去了15年，我们对西班牙经济、社会演变的一些方面的了解并未增加，而更多的方面仍旧是模糊不清的。

整个欧洲发生的激烈通货膨胀的年代和机制，在英格里德·海莫斯庄（Ingrid Hammerström）的分析中得到解释，这一研究表明，在西班牙美洲白银造成的影响被人们发觉之前，西欧许多地区的物价就已经开始上涨。在解释通货膨胀时，在增加的货币供应之外，还需要考虑原产欧洲的白银、降低货币成色以及最重要的不断增长的总需求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政府对战争和奢侈品、庞大的陆军和海军以及更富丽堂皇的宫廷的需求，贵族和绅士阶层对炫耀性消费的需求，大庄园和城市豪宅的奢侈生活，这一切都增加了对纺织品和金属、劳动和服务的需求。对农业和工业的这些新增需求只有通过增加产出才能得以满足，但在人口增长以及相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下降时，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新增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进口来满足（这正是西班牙所发生的事实），那么结果也最终是一样的：从东西印度群岛（Indies）流入的财富，在解决不可避免的国际收支赤字时又再次流出。限制主义者精明地看到了这一点。【30】

当18世纪的晚期重商主义者回顾他们国家的历史时，他们发现在黄金时期之后跟随着一个长长的衰落期。晚期重商主义者詹尼穆·久泰瑞兹（Geronymo de Uztariz）在18世纪30年代注意到，在西班牙殖民美洲的16世纪中，有大约20亿美元的白银运到了西班牙。而在随后的截止到1724年的一又四分之一世纪中，又有15亿美元的白银抵达西班牙。这就是说大约有35亿美元的白银流入西班牙。但是，到1724年时，只有1亿美元的白银仍旧留在西班牙。久泰瑞兹计算出白银和黄金以每年1 500万的速度流出西班牙，这一切都是西班牙与外部世界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的结果。只有通过恢复和发展像塞维利亚、塞戈维亚（Segovia）、托莱多、巴利阿多利德等城市一度辉煌的工业和贸易，才能纠正这种白银外流的趋势。这就需要废除西班牙税收体系引起的通货膨胀而且欠考虑的混乱状态，需要鼓励普通人劳动，建立更强大的海上力量和有效的商业舰队，制定合理的其目标在于扩大西班牙贸易和工业的国民经济政策。久泰瑞兹的文章被当局焚烧。但是，后

① J. H. 艾里特：《西班牙的衰落》，载《历史和现实》1961年，第20期。

来的开明专制君主都极力企图实现他所描绘的这一切。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取得什么结果的话，那么他们则是依赖于18世纪后半期人口的普遍增长和对企业的各种鼓励和奖赏。

对17世纪“西班牙衰落”（例如托莱多地区及其周围）的更进一步详尽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费尔南多·布罗代尔、J. V. 韦弗斯、吉恩·韦乐(Jean Vilar)、B. 贝纳萨（B. Bennassar）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即在西班牙经济和社会所患疾病的表面症状之下，埋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上的原因，其中人口下降也许是最严重的原因。

到1620年时，一度是卡斯蒂利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的托莱多已经荒芜了，它的制造业毁灭了，它的房屋大门紧闭且空无一人。周围的农村地区荒凉而人口稀少。到1646年，托莱多的人口下降为不到1571年人口数量（超过12 000人）的一半。这是1594年大瘟疫造成的吗？或者是像有些人所说，是马德里（Madrid）在1607年成为宫廷所在地而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结果吗？或者是在这两个事件之前的其他原因造成的？迈克尔·韦瑟(Michael Weisser)已经收集了重要的证据显示出，在更早的几十年就已经出现严重的食物短缺。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土地肥力衰竭，部分是由于随着衣料工业的发展而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改作养羊的牧场，其结果就是出现粮食产量无法满足人口发展趋势的需要。所以人们就不得不面对饥荒；商业性农业（commercial farming）和贸易衰落了；因为农业技术无法满足食物性农产品和工业用农产品的共同需求，出现了明显的向糊口农业（subsistence [31] farming）的恢复。在1590年开始征收的米林税（*millones*），到1626年增加到其原先数量的4倍。政府的这一举动使得本来就无法解决的危机雪上加霜。我们只需要看看N. G. 帕克（N. G. Parker）在《佛兰德斯的军队和西班牙的道路》(*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中叙述的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的令人惊愕的费用，就可以理解西班牙是如何竭尽全力做它办不到的事情了。

在1579年以后重新回到“西班牙人的管辖权”下的尼德兰南部诸省的历史的复杂程度，并不比西班牙本身小多少。先是从以前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优势地位开始下降，一旦度过16世纪后半期可怕的危机之后，它们就设法尽可能地恢复到其先前的繁荣状态。一些比利时历史学家，如范豪特（van Houtte）、沃林登（Verlinden Charles）、斯窦（Stols）等人，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揭示了尼德兰南部的古老的工商业技巧是如何复兴起来的，再次创造了适度的、地方的而且具有西班牙—尼德兰特色的经济。虽然它遭受了棘手的

社会分裂，在这些一度著名的港口和城市也存在惊人的贫困，但是这个社会仍然可以称为17世纪、18世纪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一个有益的好地方。

意大利的情况则特别复杂。卡罗·西波拉在其有关意大利经济衰落的简洁的论文中，将其研究对象限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在1600年以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在意大利中北部，我们看到的是近代世界中最发达的经济和社会之一，仍旧保持着富裕而有活力的文明，仍旧是欧洲艺术、建筑和文学的典范。布罗代尔、西波拉、塞拉（Sella）、莱恩（Lane）、普兰（Pullan）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已经纠正了早期人们有关好望角对意大利尤其是威尼斯的贸易造成的影响的错误观念。威尼斯的贸易不仅仅是幸免于难，而且它在1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获得了惊人的恢复。接着当贸易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更为困难时，威尼斯的企业家再次展示他们极有想像力的灵活性，他们抓住了米兰、都灵（Turin）、帕维亚（Pavia）、佛罗伦萨（Florence）、科摩（Como）等其他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因战争而失去的主动权。在16世纪下半期，威尼斯织布工业从几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所有意大利城市中最大的织布工业，其年产量达到28 000匹。织布业和其他使威尼斯出名的制造业，如造船业、印刷业、陶瓷业、玻璃制造业、制糖业、丝绸加工业，使得威尼斯的繁荣一直保持到了17世纪。接着，大约在1620年以后，随着竞争对手的工业的复苏，威尼斯的纺织业逐渐衰退，到17世纪末其产量小得不值一提。然而，威尼斯人的足智多谋再一次表现出来。他们的资本【32】再次改变投向，这一次是投向农业。这是因为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小于制成品价格下降的程度。尽管威尼托（Veneto）区的一部分投资是消遣性的或者是炫耀性的，但是，这些要么由管家管理要么出租给农民的大地产，并不必然意味着耕作水平的降低。

由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组成的四角地区经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或工业的衰落。多美尼哥·塞拉（Domenico Sella）已经指出威尼斯衰落的详细原因：威尼斯制造业在价格或吸引力方面无法与其荷兰或英国竞争对手相比；手工业行会的权力对生产力和产品设计的限制；垄断集团的行动抬高了原材料成本；不合理的苛刻的财政体制抬高了原材料成本并进而破坏了制成品的出口。与它的竞争对手不同，威尼斯必须支付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规模因为16世纪70年代及以后的瘟疫而受到限制，威尼斯的居民再也没有达到其在1563年的规模——17万人。因此，在这个空间受到限制的岛屿上，工人在讨价还价上是占据优势地位的。

在意大利所有著名的城市经济体中，威尼斯也许是最为顽强的。其他城

市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威尼斯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一度占据商业和技术重要位置的所向披靡的城市贸易和工业的衰落，就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化程度相对要高一些，这些城市的衰落能说明整个意大利经济都在衰落吗？城市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被增加了的农业投资、农作物的多样化或者乡村经济更高的生产率所抵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不同地区在土地的使用和占有、庄园管理以及社会状况和关系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做出一般化的结论是很困难的。奥尔多·麦德林纳（Aldo de Maddalena）已经表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南方的情况总是与此不同）的庄稼产量和播下的种子之间的比率，虽然不如低地国家或英国高，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如皮埃蒙特（Piedmont）和罗马涅（Romagna）区］却和它们相当的接近，而且这个比率一定要比德国大多数地方、中欧和东欧或者西班牙高许多。在皮埃蒙特、托斯卡纳（Tuscany）、米兰、曼图亚（Mantua）和威尼托区可以发现许多经营良好的庄园，它在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工之间进行了明智的、合理的分工，而且引进了新的作物品种。大米这个“沼泽地的谷物”，改进了农作物的循环，而且在[33]随着培育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产量。16世纪大米的产量为种子的7倍到9倍，而到18世纪这一数字为15倍到18倍。玉米这种产量极高的作物业在16世纪中期引入意大利。家畜一般来说仍旧矮小，而且从后来的标准来看，质量较差。但是伦巴第（Lombardy）记录的产奶量却大大高于欧洲的一般平均水平，到18世纪，（如果这些含糊的数据可以信赖的话）伦巴第的产奶量超过了除弗里斯兰省（Friesland）以外的所有欧洲地区。

坦白地说，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意大利的部分农业经营良好，这是一个由麦德林纳收集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的财产记录证实了的事实。但这些局部材料能说明当时的总体状况吗？在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问题的答案仍是悬而未决的。与个别庄园和地区所引用的证据相反，我们不应当忽视西波拉教授的观点，他认为意大利走向了与其理想的、应当的道路相反的方向。土地所有权集中到了少量的“封建的”所有者手中；麦扎椎（*mezzadria*）的数量在增加；意大利一些曾经“发达”的大区逐渐变成“欠发达”地区，例如进口制成品和服务而出口初级产品。在17世纪后半期，农业本身也遇到困难，特别是那些需要有规律地排水的沿海地区，以及罗马涅区和受到政治问题折磨的意大利南部地区，甚至伦巴第和波河河谷地区（Po Valley）也遭受了严重的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过来的人口下降。此外，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政治特征也传染到乡村地区，以至于农村的“改善”常常具有

新封建的特征。最后，意大利从贸易和工业转向农业的转变，不幸地发生在正当欧洲即将经历大范围的农作物产量下降之时。这一现象我们所知不多，但正如奥尔多·麦德林纳所表明的那样，这确实是社会和经济上难以承受的负担。

因此，这是一幅变化多端的、复杂的但绝不是毫无希望的图景。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仍旧是先进的。与这些片断的经济体相比，近代英国是先进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更为统一的但仍按地区划分的经济是稳定而平衡的。正像费希尔（Fisher）教授所说，都铎（Tudor）王朝统治时期的经济成就，在于成功地吸收了相当大量的人口增长“而又没有陷入大面积的饥饿和大量失业的马尔萨斯陷阱”①。当然，作物收成对社会（并不仅仅是农村社会）的这一幸运结果是至关重要的，萨普教授在其 17 世纪英国危机和变革的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17 世纪早期，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的绅士土地所有者写到：在经过了三个潮湿多雨的夏季之后，他的佃【34】农们已经放弃了土地耕作而将农场留给绅士自己，极度贫穷和失业在各地极为普遍。

> 狗肉在这时已成为美餐，人们到处找狗，而且将马肉作为诱饵放在陷阱里以诱捕猎狗。有一天，有一个人只是因为饥饿而偷了一只羊，并扯下了一只羊腿生吃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食物短缺的最严重时刻仍未来临。②

然而，威廉·佩勒姆（William Pelham）爵士的大声呼喊仍旧回荡在人们的耳边，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典型的而是因为它们是非典型的。焦虑的音调时常回荡在 17 世纪的英国乡村上空。危机是罕见的。萌芽中的贸易（包括殖民地贸易）和各种各样的工业成长起来，与其一起成长的还有通过经验主义的创新、科学的知识［这些知识通过诸如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这样的制度以及个人的热情而传播］以及对佛兰德人和荷兰人的模仿而缓慢成长的农业。英国海上运输的机会和进步则仅仅屈居尼德兰之后。

---

① F. J. 费希尔（F. J. Fisher）：《经济史评论》（1975 年 2 月号），第 119 页。

② 参见约翰·特斯凯（John Thirsk）在《英国的小农耕作》（伦敦，1957 年）第 192 页所引用的话。

1.3 历史分析的局限

发生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好是那些两、三百年以来其农业产量、耕作方法、产品种类和利润高于别国的那些国家，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吗？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是否使用了从高效的农业绩效中积累的资本？或者说乡村和城市相似的结果是因为不断增加的企业家自由、不断升高的识字率和社会的进一步理性化吗？或者说这一结果是以上两种原因的结合造成的，而与之比较的东欧国家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这些国家，贾巴隆斯基（Jablonskis）和拉德兹韦尔斯（Radziwills）、容克地主（Junkers）和马札尔人（Magyar）的领主可以从土地得到巨大的个人财富，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随之而来的商业革命，更不要说工业革命了。

近代史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并不是一条可以轻易探寻的始终如一的曲线。它包括了意大利北部的持久衰退，许多经济技巧和技术都源自这一地区早期的成功中；西班牙引人入胜的兴起以及同样引人入胜的衰亡；也许最重要的是政治上支离破碎、经济禀赋并不高的荷兰共和国的迅速崛起，其经济达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成熟程度。然而，到 1700 年时荷兰的经济奇迹似【35】乎失去了创造性，稳定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而无法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针对欧洲各地经济社会进步的差异，最近的研究采取了与以往的制度的、传统的解释极为不同的方法。在试图给"增长"和"衰落"下定义时，卡罗·西波拉就指出"衰落"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增长"反面，因为（至少从逻辑上）增长没有极限而衰落却又有其不能继续的极限。他认为在使用"衰落"一词时，我们是在指一国经济**相对**衰落，通常是指该国不能继续维持其相对于他国的经济优势，而不是指该国经济的**绝对**衰落。他也分析了表现这种衰落特色的种种迹象和征兆。一般而言，包括公共开支的上涨、税收的加重、价格上涨、生产率下降、创造力的衰竭、主动性甚至接受变化的能力的下降。创造革新让位于墨守成规，冒险精神让位于停滞不前；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权利"，而不是"责任"；享乐主义或懒惰代替了勤劳工作的愿望；节俭储蓄被奢侈消费代替；这种压力和失败反映在经济体中公共部门无限制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收支赤字；而在私人经济部门，人们争相转嫁经济损失；随着社会斗争的激化，公共精神逐渐减小并最终消失。"人们之间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合作慢慢减少，对国家的疏远感

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集团和阶层的自私自利。"[1]

如果对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进行进一步的细察，我们就会发现伴随这些国家总体发展过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内部变化。对托莱多、莱顿、威尼斯和其他以前曾经取得巨大工商业成就的衰落地区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每一个个案中经济衰退都是不可恢复的，经济重点的些微改变就使得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寻求这种发展和衰落的社会—经济进程的清楚而全面的原因的研究仍在继续。面对克伦本茨教授对欧洲制造业所作的纵览所提供的工业发明的非凡证据，我们自然会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开辟了通向持续而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的新时代的道路？[2] 显而易见，对此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每一次试图得出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的努力，使得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每一种情况都由它自己的特殊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因素的"混合"。构造国家这个 [36] "生物体"的 DNA 的"社会"等价物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可以立即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试图的公式化并不是建立在科学证据（科学证据对得到科学的、无懈可击的答案是必不可少的）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头的使人联想起有效假设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科学证据包含研究特殊地区和问题的不同学者的极为不同的努力。惟一可能的结论是：这些不同研究结果的综合者应当适可而止，他应当记住他要求得到普遍适用答案的无理要求是非常危险的。

最近几十年，经济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历史中应用抽象原则和外来理论的局限性。对经济学家的抽象理论进行最简单的应用确实助益匪浅，但即使是如此，也极有可能使任何特殊的研究发展到使人误解的程度。因此，为了解释中世纪和中世纪之后英国完整的农田安排，提及蓄意的"风险回避"，就不仅仅是忽视了在传统的"土地条状分割"的体系之外还存在至关重要（而且是大量）的例外情况，而且将通过理性地运用经济才能改变基本经济安排的能力，归因于受制度上和心理上的保守倾向束缚的社会。在这里，历史学家本身的基本直觉，即对历史状况的"感觉"一定要超过经济学家的抽象逻辑。

---

① 卡罗·西波拉：《帝国的经济衰落》（伦敦，1970年），第13页。
② 见本卷第7章。

原书缺页

仔细分析导致成功或失败的相互联系的各个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地理的、地质的和气候上的特征，这些因素一直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优越的自然禀赋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仅仅意味着为了避免贫乏的自然禀赋造成的不良后果就需要特殊的创造性（就像在尼德兰），以将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同样，人口增长本身也不是抵御衰退的保证。当增长达到极高的程度而不是最适宜的程度时，增长就将是暂时性的，而且最终将成为经济灾难的诱因。一般说来（而且只能如此），自然禀赋和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常常成为农业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健康的农业通常是商业和工业发展的必要先导。在依靠动力的运输出现之前的时代，对市场扩张从而对交换经济的限制，使得社会高度依赖于自然或者人造的水上运输。海洋、[38] 河流以及运河运输不再限于运送粮食（例如三排桨战船、四排桨大划艇、五排浆大船将谷物从非洲运到罗马）。到 1600 年时，荷兰的造船业、纺织业、制糖业、酿造和制酒业等等，都全面依赖于从水路运来的补给。在海洋经济体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将海船、大小驳船视为真正的生产要素。在这些基本要素之外，还必须加上适用的工业技术，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验主义方法的推动，而且也受到科学思想和试验的推动。而科学思想和试验正是意大利北部以及尼德兰活跃的工商业社会的特殊（但并非独一无二的）特征。

最后就是政府（无论是专制主义、君主制的或者多多少少具有代议制性质的政府）有意识的政策制定。近来编史中的后自由、“后政治”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他们的前辈（通常是临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一样，重视财政方面因素的研究。而正统的经济思想轻视此类因素，它们将“政策”视为马车上的一只苍蝇，认为它无足轻重。但这种态度在进来有所变化。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历史学家，最近已经强调由政府的过度开支以及与之相伴的税收而引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对这个重要领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要做的事情仍旧很多。同样，尽管重商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名誉，尽管传统经济理论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主义”深深的敌意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应当谨慎对待那种认为“重商主义”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积极的推动力的研究方法。J. R. 黑尔（J. R. Hale）教授，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府描绘为因经济和统计上的无知而陷入瘫痪，这时的政府几乎完全没有熟练的、有经验的经济管理者。因此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猜测，

而这种猜测大多数都是错误的。[1] E. L. 琼斯（E. L. Jones）最近提出了一种更为客观的见解，他认为政府政策的本质并不在于看它是否设计了某种诱导增长的“卓越的安排”，而是看它是否废除了“那些古老的阻碍人们自然交换倾向的障碍物”（例如通行税、关税、行会、降低货币成色、强制借款、财产充公、垄断、殖民地法律、限制费用的立法，等等）。[2] 然而，尤其在【39】研究 17 世纪时，这些制度本身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吗？L. A. 哈珀（L. A. Harper）和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经过仔细的研究，总体上支持那种认为航海法案对英国海上力量的增长而言具有积极作用的说法。这一结论又当如何？D. C. 科尔曼（D. C. Coleman）认为保护性的关税是英国造纸工业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又如何理解？同样人们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法国、英国以及后来的普鲁士）的整个制造业争辩，认为进口替代政策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保护性行动才能得以推进。

无论如何，所有影响社会经济未来增长或衰落可能性的政府政策，都需要复杂的经济知识或全面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荷兰或英国自由的移民政策与法国或西班牙驱逐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个问题具有极重大的经济意义。但这更多的是出于物质福利与宗教上的正统思想哪个具有优先权的对比，而不是经济上的专业知识或经济上的无知的对比。这时专家性的管理还没有出现。

如前所述，在技术知识实际上就等同于人以及工匠技巧的时代，移民具有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威廉·坎宁安就呼吁英国学者关注他们国家的移民问题。[3] 工业制成品可以出口，偶尔也可以仿制，但在工业化之前的世界中，移植技术的惟一安全可靠的办法，就是迁移那些头脑中掌握技术秘密的人。如果要进一步争论西班牙或法国因驱逐摩尔人或雨格诺教徒而造成的损失的程度，那么任何人也没有否认过 16～18 世纪尼德兰北部、英国、普鲁士从技术熟练而足智多谋的佛兰德人、瓦隆人和雨格诺教徒移民中得到的巨大的而具有决定性的好处。如果前者（指西班牙、法国）说明了不容忍的统治者的愚蠢，那么后者（尼德兰北部、英国、普鲁士）则同样明显地代表了明智的政府政策的智慧，即更宽大的容忍带来更高程度的社会经济繁荣。

---

① J. R. 黑尔：《1480～1520 年：文艺复兴中的欧洲》（伦敦，1971 年），第 162 页。

② E. L. 琼斯：《制度决定论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载《经济探索》第 7 卷第 1 号（1974 年），第 121 页。

③ 坎宁安：《英国的外国移民》（1897 年初版；第 2 版由查尔斯·韦尔森作序，1969 年）。

如果说一度时髦的所谓“新教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那么确定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一般的和特殊条件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则依旧存在。一些条件可以量化（甚至只要大概就行），就像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在其1695年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税率对照表中所做的那样。他计算出荷兰人的人均收入高于法国或英国，但荷兰人的收入却遭受到了相当于法国两倍以上的税率。即使考虑到荷兰共和国政府追求和平的愿望、中立的【40】政策以及政府本身适度的开支，也只有非常高的税率才能补偿它统治较小人口的花费。其他许多条件正是由于它们的性质而无法进行衡量，但是将源于政府和法律的“生活的品质”从经济史学家的视野中排除的做法却是相当轻率的。[①] 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教授曾经说，新的更精确的计量经济史的任务，是集中研究那些小的、很好地用公式表达的问题，这样即使“我们不能学到更多，但我们知道在学什么”[②]。然而，历史学并不仅仅是由细小的、用公式很好表达的、等待经济计量学家分析的问题组成的细胞结构。但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仍旧存在着，有一些人继续认为，在所有专业的历史学家中，经济史学家应当是从H. A. L. 费希尔（H. A. L. Fisher）对历史学家“利用大地图”的著名指令中获得最多理性利益的人。那种不考虑人（甚至经济人）在日常生活中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和安全保障需要的历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扭曲的历史。英国都铎王朝的和平，法国专制的、柯尔贝尔式的经济管理，荷兰共和国贵族对商业利益的重视以及对机会主义的容忍和中立政策，这一切都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这些也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在每一种情况下，宣称其有利于物质进步时需要考虑它们的成本，而计算成本则需要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存在与经济史和政治以及文化领域之间。在本卷所研究的时期中发生的一个影响最为广泛（也是最难计量）的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世俗观点的普及，其中物质进步、国家和个人经济获利的信念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这种信念本身也成为政府和个人的主要责任。【41】

---

① 查尔斯·韦尔森：《税收和帝国的衰落》，载《经济史和历史学家》（伦敦，1969年），第120页。

② E. L. 琼斯：《制度决定论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18页

第二章

生命革命*中的农业

2.1 这一时期的一般性特征

1. 对历史研究的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土地所有权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即从法律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和单纯从农业技术的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前一种方法主要研究社会各群体（自由人、执政党议员、农奴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与农奴制度和公共土地（*Marken*）相关的法律。早在奥地利和德国，多普西（Dopsch）和冯·比洛（von Below）就日耳曼时代的土地使用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接着英格兰的学者们为解决有关采邑制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法律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有许多缺陷，其研究领域几乎只局限于中世

---

* 原文为"Vital Revolution"。——译者注

纪的土地所有权历史。它没有从经济学角度研究采邑制以及公共土地使用的特征，也没有考虑到以下事实：历史曾经演义了活生生的现实和有血有肉的人类活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经对这种只从法律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说："在这些博学的人眼里，以前的农民似乎只是为了提供好笑的司法论述才存在"。这个评价虽然带有轻视色彩，却非常恰当。以法律为主线研究的农业历史，开始于日耳曼王朝（Germanic）和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的大量宪法中，到公元1300年以后农奴制度结束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最终在1500年左右结束。

对农业领域的考察通常只限于农作物历史、农产品的轮作制、畜牧业养殖或者农业机具方面。然而，这种技术史式的研究，通常只是罗列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资料和数据罢了。除了东英格兰作为一个特例以外，这种被称为"产业革命"的现象一般仅出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通常情况下，这种研究注意不到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在提供某种原理方面做出努力。

两种研究方法——中世纪以前从法律角度的研究方法和19世纪、20世纪以前从技术角度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时间空缺，是造成对公元1500～1800年之间的农业史研究空白的直接原因。这三个世纪对从法律角度研究历史的方法尚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离从技术角度研究历史的农业历史学家的时代更是相差甚远。

[42] 大约只有在近四十年来，人们才从经济和社会的视角研究农业历史。有关农产品价格的资料的出版，为人们从经济角度研究农业史提供了可能。1932年，西曼德（Simiand）和莱布劳斯（Labrousse）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价格变动，对以往几个世纪的整个经济结构都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同一年，阿瑟（Usher）论证出，根据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数据资料建立起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线具有可能性。按照他的说法，影响长期趋势线的基本因素包括"人口总量的变动、人口分布范围和密度的变化以及用人均消费量表示的生活水平的变动"。然后，他又补充道："对历史学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观察这些数量指标的变动率。"

1935年，阿瑟的观点被阿贝尔（Abel）、格瑞奥提·克茨曼（Griziotti Kretschmann）夫人和凯胡尔的著作采纳。在这三个历史学家中，阿贝尔的著作最为重要，因为他揭示出了人口统计数据与物价，尤其是与谷物价格和肉类价格之间的联系。历史学家们已经掌握了大量人口统计数据，也掌握了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详尽资料，然而却没有对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过系

统研究。阿贝尔以前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1800年以后贸易活动的短期波动上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口因素对贸易活动的短期波动的影响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但是，阿贝尔在其著作《13世纪到19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土地耕作和农业》(*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中研究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价格变动趋势，发现在这一趋势中不能忽略人口规模的增加或减少因素，尤其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前工业化时期。

阿贝尔的学术观点被历史学家所了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情，那时国际性论著中普遍谈论的话题，是中世纪末期的危机和17世纪中叶的衰退。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理论开始盛行。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历史学家们逐渐将农业视为一般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并且努力将农业发展纳入经济史的一般范畴之中。人们的兴趣更加广泛，开始注重研究各种相互联系的因素：人口、农业、货币问题、物价、市场比价、食物供给条件和社会环境等等。由于决定这些相互依赖的因素的运行机理非常复杂，对问题的解释不可能采取简单、随意的态度。

对宏观经济的历史考察是紧随着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后者主要考察单个或多个农场的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想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农场经营情况的著作，包括威廉·马歇尔 [43] (William Marshall)、阿瑟·扬 (Arthur Yong)、范·施瓦茨 (von Schwerz) 和冯·屠能 (von Thünen) 等人所进行的研究。但是，这些作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农业活动。他们希望对这些活动有更好的理解，以便能够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来提高农艺水平。在哈雷 (Halle)，J. E. C. 康拉德 (J. E. C. Conrad) 教授的部分学生对农业历史进行了纯史学性质的研究。然而，这个学派的学术成果在长期内不受历史学家的重视，虽然18世纪初就产生了，但直到1953年才被黎曼 (Riemann) 采纳，用于其对前工业化的德国的可耕种农业土地和养殖业的研究之中。在英格兰，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农民和有身份的农场主的账目和日记，以及中世纪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的账目，特别是在绍洛德·罗杰 [Thorold Rogers (1866～1902)] 的著作出版以后，这种研究进一步加强。

社会耕地史主要研究如下问题：以阶层和群体为单位的农村社区的社会分层问题、职业构成、思想先进的农场主的性格特征、农村家族的构成、农场主和其雇工之间的关系、知识和创新思想的传播、教育、文化修养以及人对环境的适应性等。

2. 前工业化社会：农业、人口和物价

就本章的编年史知识来说，所用资料受到 L. 根考特（L. Genicot）的著作《危机：从中世纪到当代》（本丛书第一卷）和 F. 达文锐（F. Dovring）的论文《欧洲农业转型》（本丛书第六卷第二部分）的启发。就本章的理论知识来说，采纳了海雷纳（K. F. Helleiner）在其著作《从黑死病到产业革命前的欧洲人口》，以及布罗代尔（F. P. Braudel）和斯普纳（F. Spooner）在其著作《从 1450 年至 1750 年的欧洲物价》表述的观点，这两本著作均被收录在第四卷。

如果缺乏价格历史和人口历史方面的知识，就难以理解农村社会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状况甚至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情况。后面几章与本章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由于农业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论述这一主题，对人口和物价问题的着重点也有不同。我们对人口问题的兴趣集中在从事种植业的人口或农家的数目上，也就是生产者，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总人口减去婴儿数目后的剩余量。农产品的价格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我们不仅对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价格比率（PA/PI）、食物价格与工资之间的比率（PA/W）给予关注，还对农产品内部种类间的价格比率给予了特别关注。

[44] 由于缺乏对那一时期著述的基本理论知识的了解，人们在解释影响我们的前工业化社会中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有关因素时，遇到了困难。人们听到的解释常常具有片面性，半真半假，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人们没有系统地考虑过前工业化社会的建立和发展问题，只有借助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才能揭示这一社会形态的局限性。本章所涉及的内容并不能填补这一理论上的空白，我们只能抓住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对这一领域中的探索最近才由黑宁（Henning）开始做，他在其著作[①]中论述了 18 世纪的农场主、收入和支出行为，并且专门对德国东部地区进行研究。

1500 ~ 1800 年期间，在欧洲各地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几乎都在半数以上。虽然早在 1800 年以前，有一些地方的人们已经不仅从事农业，还通过从事工业、贸易、航运、渔业来谋生。据说，当时的荷兰和佛兰德斯提供了这种非农业经济结构的典型例子。但我们无法得到有关非农业产业存在的准

① 原书名为：Dienste und Abgaben der Bauern im *18.* Jahrundert, 1969. —— 译者注

确史料。我们只知道，即便是在像上艾瑟尔省（Overijssel）这样的对传统商业模式有些背离的省份，按1795年所做的人口统计结果，仍然有4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

另一方面，前工业化社会中有些地方虽然不再把农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农业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业活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农产品的加工过程。例如纺织工业就需要使用亚麻和羊毛做原料；从啤酒、蒸馏酿酒、榨油、磨面、面包和绳索到布匹染料制造和烟草加工等行业，都离不开农产品提供的原料。穿越丹麦海峡的货船情况，可以反映出谷物在贸易和商业中的重要性：17世纪，在穿过丹麦海峡西行的荷兰船只中，50%左右的货船装载的是谷物。

城市中富裕的中产阶级也对农业很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财产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土地、农场和农田构成的。投资土地仍然是人们利用从商业、工业或官僚机构中赚取的资金的颇具吸引力的方式。18世纪中期，在上艾瑟尔省城市中，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中，土地和农场占到30%～50%。

因此，在前工业化社会，即使那些非常明显地存在非农部门的地方，也离不开农业活动，农业仍然保持着其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支配地位。

进一步地，1800年以前，欧洲的绝大多数地方的种植业多以谷物为主。[45] 16世纪和17世纪，在西欧和中欧地区，荞麦的种植日趋普遍。在南欧，引进了水稻和玉米的种植。然而，这并未改变单一谷物种植的传统，许多地方的人们仍然保持着这种做法。直到马铃薯被大量种植后，单一谷物种植的传统才开始发生变化。

谷物的种植使农民有机会消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有时甚至是全部产品。而当所收获的全部产品都进入市场时，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单个农民的生产能力较为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改进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可用能量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能量既包括人力也包括马、骡子、驴和牛，有时甚至还包括奶牛的牵引力。于是，每个劳动力只能耕作有限的土地，以至于个体生产力低下，永远不会超过一定限度。很明显，农业生产能力与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反之亦然。

对于不同的农场而言，其生产能力也是不同的，小农场的生产效率要比大农场低得多。在1685年的不伦瑞克（Brunswick），一个“正常”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47英亩可耕地），意味着每个成年男性劳动力耕作20.25英亩，而在一些小农场上，一个劳动力只能耕作7英亩。但同样在不伦瑞克，只不过到了18世纪，在阿可莱尤特（*Ackerleute*）的农场上，我们发现一个

成年男性劳动力耕作 14 ~ 23 英亩，而在海布斯派纳（Halbspänner）的小农场上，一个劳动力只能耕作 10 ~ 16 英亩。在小佃农农场，每个劳动力只能耕作 5 ~ 8 英亩。由此看来，小农场上使用的劳动力是正常家庭农场的 3 ~ 5 倍：实际上，它们对单个劳动力没有充分利用。对劳动力的这种使用有时是种植特殊农作物，如亚麻、马铃薯的需要，这些作物需要采用集约化经营。有时则是为了发展村舍工业的需要。小型农场不仅在人力资源的使用方面存在着浪费，在畜力的使用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在耕地及其他作业中通常要使用 2 匹马或 2 头牛。

一座农场每年的产量都有较大变动。必须从这个经常波动的产量中扣除一个固定的数量，包括为来年种植预留出的种子和留做全家的口粮的部分。如果用所收获的粮食与种下的种子之间的比率表示生产能力，也即产出率，很明显，当单位种子的产出量减少时，产出率较低的农场的产出量减少情况，比产出率较高的农场的情况糟糕得多。假如说产出量是种子量的 4 倍，那么，收获量中的 25% 便要预留出来作为来年的种子，但当产量为种子量的 6 倍时，则只需把其中的 6% ~ 7% 预留出来。同样地，当产量较低时，留做生产种子的土地面积要比产量较高时大得多。所以说，产出率的提高具有一种累积效应，因为这会使更多的土地有广泛的用途。[46]

农场中的食物消费数量主要由家庭成员及其雇工的数目所决定。农产品中实际进入市场的数量不仅与土地面积直接相关，还随着农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数量之间的比例变动而变动。实际上，它与劳动者的总量相关。

扣除用做种子及自身使用的“固定”的数目之后，每年进入市场的产量则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数量。这一事实意味着市场价格将受到供给变动的影响。16 ~ 18 世纪的显著特征就是，谷物价格处于剧烈波动之中。

从长期看，人口因素不仅对需求有显著影响，对供给影响也很大。我们已经发现，较低的个体生产能力影响人口总量和市场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供给会影响价格。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则决定于那些不能通过自己家庭的生产来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者的数目。消费者数目的变化也随着人口总量的变化而变化。毫无疑问，长期趋势很明显地表明人口与谷物价格的波动具有一致性。

农业收成的总价值通过市场销售总量乘以当期市场价格计算而来。市场销售总量是指总产量减去留做种子、家庭自己消费和饲料粮以后的数量。此外，还要扣除各种租金、什一税、其他税费以及支付给固定工人、临时工人的工资。如果支付方式采用实物形式，这部分数量也应从总产量中扣除

出去，因为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工资通常被直接消费掉了。同样地，收租人及什一税的所有者也可能通过在市场上的实物交换方式来取得租金和什一税。

为交换而进行的农业活动，必须考虑农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每年发生的剧烈变动。与价格和产量相比，物价、税赋和工资水平要稳定得多。当然除了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地租和什一税以外。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对农场产生影响的方式随农场的不同而不同。当产量下降时，为了满足自己需求而生产的农民的数量将下降。而当产量增加时，这类农民的数量则会增加。如果农业歉收，对农产品的需求会大于供给；当农业丰收时，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这两者都会加速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一个不存在谷物的大量进口和出口、其产出和消费均依靠自己来满足的经济中，这种波动尤为显著。至于对消费水平，即个人一年中能够消费掉的粮食数量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变的这一点上，存在不同观点。即使说消费量是可变的，它也【47】在大家公认的一定范围内变动：其最大值取决于人们胃口的最大容量，而最小值则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最低摄入水平。当食物数量下降时，农业生产力也将下降，这是因为人的体力会下降，而后者正是基本生产要素之一。

一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是影响工资收入和支出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单个人的消费量可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家庭成员的数目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却要低得多。减少家庭中人口数量的惟一途径是，减少仆人的数量或者将正在成长的孩子送到其他农场或城里去做工。在诸多情况下，决定于一个家庭对固定工资收入的依赖程度、收入的稳定性以及收入是否随着农产品的价格和产量的波动而波动。工资一般说来变化不大，即使在较长一段长期内也是这样，这是工资的一个特征。但是，玉米和面包是 1500 ~ 1800 年间人们食物消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而谷物价格的显著波动会引起人们对它们消费支出的变化。于是，一方面是“固定”的工资，一方面是人们对重要食物不断变动的消费支出，这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显然，在购买食物之后剩余的可供满足其他需要的那一部分支出，也将出现巨幅的波动。那些收入水平随着农业产量变化而变化的人们（通过实物方式收取地租和税的地主和什一税所有者）和收入随着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变动的人们（收取租金的土地出租者），则不会遭遇“固定”工资所带来的弊端。但是，这些人可能会受到其对农业收入的支出方式的影响。当然，那些为市场交换而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也会受到其支出方式的影响。

衡量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多种方法。可以用已经种植的土地数量的全部（包括可耕地面积和适合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来表示，也可以通过比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来表示。还有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根据为一个非农人口或非农家庭提供食物所需要的农业人口或农田的数目。我们还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产出量和消费数量，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必须将进口和出口因素考虑进来。最后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比较各年农业产出的货币价值，但必须考虑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人们通常接受这样的说法：在影响生产和消费的因素中，有些比较稳定或者变动较小，有些则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当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相互组合时，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矛盾。例如不稳定的收成和每个劳动者有限的生产力之间、更为稳定的播种数量与农业家庭中的食物消费数量之间等等。[48] 与不断变化的农业纯收入相对照，我们看到食品量、种子量、税赋多少、工资水平相对而言是“固定”的，有时包括地租在内。一方面，固定的工资要供养数目一定的、其消费水平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家庭成员；另一方面，人们消费的食品，主要指面包和谷物，极易受到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固定工资和可变价格之间的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前工业化社会中，成为当时的特征。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重要的一点：有些因素，如产出率、粮食价格以及农场净收入，在短期内发生变动，但在长期内却保持稳定。这在当时有例可证，如东欧国家在 1500～1750 年的收益率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①] 当然也有一些因素，从短期来看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从长期来看则是可变的。由此看来，这些因素共有四种可能性：

短期	长期
1. 固定	1. 固定（c c）
2. 波动	2. 固定（f c）
3. 固定	3. 可变（c v）
4. 波动	4. 可变（f v）

通过考察影响农业生产的 73 种因素（外生的因素如天气条件、政治因素、政府决策及战争等不包括在内）时可以发现，有 55 种因素在短期内表

① 见《收益率》，第 79 页以后（特别是表 7），第 81 页。

现为稳定，18 种表现为波动。这体现出了农业的刚性，即在短期内不易发生变动。从长期来看，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我们看到只有 13 种因素是不变的，其余 60 种均是可变的。在 1500 ~ 1800 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因素包括：每英亩土地所需要的种子数量、东欧地区的产出率、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单个家庭的消费量、奶牛的产奶量、牛的饲养年限及宰杀时的重量、羊皮的重量、单位面积土地上葡萄的产量和橄榄产量、农舍、农具、土地制度（不包括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在内）以及完成特殊的农业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通过分析影响消费的因素发现，短期内有 8 种固定因素，12 种波动因素；长期则有 18 种可变因素，只有 2 种因素是不变的【49】（以单个家庭和单个人的消费量为单位）。

表 1　　短期和长期内的固定、可变因素

短期	长期	影响生产的因素	影响消费的因素
固定	固定（cc）	13	2
波动	固定（fc）	—	—
固定	可变（cv）	42	6
波动	可变（fv）	18	12
影响因素总量		73	20

通过对土地面积、劳动力和畜力数量、总量、货币数量等因素的考察可以发现，土地面积在短期内是固定的，但在长期内则是可变的；劳动力和畜力数量在长期内都是可变的，在短期内则是半稳定的；至于总量，像我们所见到的，几乎不发生变动；货币数量处于经常波动之中。虽然人口和物价从长期看都是可变的，但价格在短期内也会发生变化，人口则相对稳定不变。

表示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的价格，是在市场上经过谈判形成的。对农产品而言，共有三个层次的市场：本地市场、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我们所熟知的供给量与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一般只在本地市场上出现：大量的供给意味着较低的价格，反之，较少的供给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本地市场与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差异，仅凭主观认为在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上也存在着价格和供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在区域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生产、消费范围的扩大和收缩受制于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价格比率。当价格差异扩大时，会带来扩张，也即市场上的供给增加，消费量也随之扩张。当价格差异变小时，则带来收缩，表现为生产

和消费的市场份额都变小。一般说来，谷物在区域间和国家间的运输成本倾向于不变。由于谷物贸易和不断波动的价格差异密切相关，当价格差异减小时，“固定”的运输成本将影响到谷物的运输。

我们必须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考察价格的波动。它们对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产出—价格比率的变化可能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50】

(1) 产出增加，价格下降（二者负相关）；

(2) 产出增加，价格上升（出现在16世纪以及18世纪下半叶）；

(3) 产出减少，价格上升（二者负相关）；

(4) 产出减少，价格下降（出现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

产出和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短期波动中，尤其适于本地市场。如果缺乏有效的途径来增加消费，生产就会出现过剩。这给农民带来的灾难不亚于歉收时带来的损失。第二和第四种趋势则在长期的波动之中（即长期趋势）出现。其原因要追溯到农业以外的领域，如人口变动、货币数量及其流通速度以及像战争、灾难、瘟疫、气候异变等突发性事件。

如果我们假设产出量、谷物价格和人口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意味着在：(1) 市场谷物的数量；(2) 谷物价格与市场上其他商品价格及工资的比率；(3) 消费者的需求；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特别是在区域市场、国际市场形成以后，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我们已经在谷物价格的变化趋势中观察到了大量频繁出现的现象：

(1) 所有粮食价格的波动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 通过对比发现，廉价谷物价格的波动幅度大于相对昂贵一些的谷物价格的波动。在出现短缺时，人们转向对廉价谷物的消费；而当粮食供应充裕时，廉价谷物一般无人问津。

(3) 谷物价格的变化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在作物刚刚收获时，价格降到最低点；在春季和初夏，价格会出现最高点。

(4) 在没有进出口的情况下，当出现饥馑时，价格会飞涨；当粮食过剩时，价格又会迅速下降［格雷戈里・金定律（Gregory Kinglaw），杰文（Jevon）和邦尼阿田（Bouniatian）规则］。

(5) 在谷物价格、土地价格及地租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比较稳定的关系，但这一关系可能由于人口压力而出现波动。因为人口压力，会引起对土地和佃户农场的需求的不成比例地增加。另外，在那些土地所有权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被社会上有身份的人士孜孜追求的国家，对土地的需求也会增加。

(6) 谷物价格波动不仅在每日、每季和每年都会发生，在更长时期内【51】也会发生，并且长期变动趋势意义重大。

(7) 18 世纪和 19 世纪期间，谷物价格波动的幅度减小，这是由种子的改良、对作物疾病的研究、更好的施肥以及从欧洲以外的地方进口谷物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

我们也可以描绘出谷物价格、其他商品价格及工资之间的关系：

(1) 比较谷物价格指数与牲畜或肉类、奶油、乳酪等乳制品的价格指数以及对谷物价格指数与工业用作物价格加以比较发现，谷物价格波动幅度要比后两者大得多。

(2) 比较农产品价格指数与非农产品价格，前者波动的幅度同样比后者大得多。在经济繁荣阶段，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而在衰退时，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幅度也大。

(3) 在经济繁荣阶段，工资指数通常要落后于商品价格指数。后者是不断上涨的，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指数。在经济衰退阶段，工资指数则要比物价指数下降得慢。因此，谷物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相反，谷物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上升。

(4) 当由于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没有那些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幅度显著。反过来，当由于劳动力短缺而导致实际工资上升时，熟练工人的工资上升幅度相对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升幅度要小一些。

当然，上述结论只适用于一般性情况，而例外的情况总是存在的。16 世纪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Schleswig Holstein）从事牛的养殖业和贸易的地区，小公牛价格的上涨速度比裸麦价格的上升要快得多。1620 年以后，牛价的下跌又比裸麦价格的下降快得多。16 世纪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日德兰半岛（Jutland）主要从事动物饲养业，因为它对其主要消费地区（德国西部和荷兰的城市）的经济状况依赖很大，所以对这两个地区的市场环境极为敏感。

酿酒制造业也是一个例外，因为丰产意味着有更高质量的品种。与酒价格相比，窖藏容器的成本更高一些。其结果是，当优质葡萄获得大丰收以后，装有次等陈酒的酒桶一般会被腾空以便装入新酒。

一项对价格和工资关系的现有资料的研究表明，在谷物价格、其他商品【52】价格和工资的比率中，中世纪末期（14 世纪的全部和 15 世纪的一部分），谷物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从 15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期或中期，其地位则有

所提高；进入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其地位再次被削弱；最后，1750年以后，谷物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谷物价格较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农业规模扩张的时期（可耕地增加，农业技术改进等），价格较低的时期也是农业衰退的时期（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技术几乎停滞不前）。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使用的词语“农业”，仅限于指谷物的种植。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用法并不准确，但从谷物直到今天仍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上来看，用谷物的种植来反映一般的农业生产状况还是可行的。

在谈到17世纪的危机或衰退时，我们实际上指的是谷物危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谷物与其他商品价格和工资之间的比价关系中，谷物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这就使得本时期的其他一些经济部门（如啤酒、酿酒、纺织和烟草等）不可能繁荣起来。

由繁荣转向萧条或者由萧条转向繁荣的分界线难以准确划分。每一场衰退也不会在同一时期内影响到所有国家。真实情况往往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并最终演化为一场危机。这一趋势会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比起那些只生产原料的地区，在克服危机方面要有利得多。受打击最重的往往是那些经济结构极其单一的经济，如那些只种植谷物或只从事养牛业的地区。17世纪和18世纪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处于困境之中，与此类似的是，19世纪、20世纪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处于不利情况中。二者的一致地方在于：惟一的收入来源都是出售原料。当农业处于衰退阶段时，更具优势的地区，是那些能够及时从粮食生产转向畜牧业或者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如种植酿酒原料或橄榄）的地区。而当农业处于繁荣阶段时，谷物的种植更为有利。

总体而言，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幅度要比其他产品价格和工资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在短期内，工资不会像谷物价格那样发生频繁的变动。这样，当谷物价格上升时，工资收入者将蒙受损失。而当农产品价格下降时，那些收入完全依赖于谷物价格的农民们，则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在租金、赋税及贷款利息等方面的支出是固定不变的。

很明显，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谷物价格本身，而是谷物价格和工资收入之间的比率关系。这一比率的变化对各个集团或阶层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一部分人的收益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损失。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反映，我们就有必要仔细研究每一阶层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形势变化做出的反映。但是，社会分层的意义往往被一些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只重 【53】

视对产出量、谷物价格和人口指标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

研究表明，农业扩张时期与人口增长的时期是同步的，而农业衰退时期的标志是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见第55～56页，表2）。很难说产量增加和人口增长这两个因素哪一个出现在前。因为所谓的次要因素也往往对另一个因素起到强化作用，这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不断提高的生产力，确保了一个农民及其家人依赖更小规模的农场就可以生存，这样剩余的土地就可以分配给更多的、结婚较早的新婚者，由此带来更高的出生率。不仅如此，农业产量的提高，还可以为农业本身以及与农业相关的非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潜在劳动力。

这种不断强化的次要因素也会促进人口的下降，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世纪末期和17世纪的经济衰退的原因。经济衰退反过来又延缓了人们的婚姻，产生了大量的单身汉，由此进一步引起出生率停滞或下降。

3. 农业的扩张和衰退

要列出农业的扩张和衰退过程中，在农业、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是可能的。这里将进行概括性的描述，这一描述包括了一组简单的经验上的事实。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只应被视为一种分析的工具而非理论上的信条。这里所涉及的环境也只是特定时期的典型情况，它并不是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具有适用性，会发生背离一般形式的情况，也会有区域的特殊性。但特殊性并不能证明我们研究的失效性，这只能说明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值得进一步仔细研究的背离现象。虽然所罗列出的现象是与特定的经济条件相关联，但它们往往代表着更一般的原因和因素。这些因素有可能与人口、货币、政治—经济或单纯的政治有关。这些现象和农业社会的【54】变革当然都不能仅仅归于某种单一的原因。

表2　与农业扩张和衰退相关的环境图解

扩张阶段	衰退阶段
1. 15世纪末～1600年或1650年 2. 1750年以后	1. 14世纪初～15世纪末 2. 1600年或1650年～1750年
农业扩张的特征	**农业衰退的特征**
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或工资、谷物价格上升；贸易条款有利于谷物。	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或工资谷物价格下降；贸易条款不利于谷物。

续表

经济和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现象
1. ——	1. 农业部门的衰退并不是全面的危机，它只影响到谷物，因而并不排除经济中其他部门会出现繁荣。
2. ——	2. 在由扩张向衰退阶段的过渡过程中，没有突发性的危机发生；没有同时影响所有国家的危机发生；谷物的生产与出口国比进口国更早受到影响，受影响程度也较大；在农业地区与工业化地区或贸易区存在着对立；衰退对谷物出口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不利，而对谷物进口国（荷兰）有利。
3. ——	3. 谷物价格发生剧烈波动。
4. 实际工资下降。	4. 实际工资上升。
5. 熟练工人的工资比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要高。	5. 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要高。
6. 土地租金上升。	6. 土地租金下降。
7. 对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有利。	7. 对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不利。
8. 加大农业人口中社会各阶层的差异，较低阶层的人数倍增。	8. 社会集团的数目减少。
9. 小农数目增加。	9. 小农数目减少。
10. 乡村中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产生。	10. ——
11. 有时发生工业向农业的转移。	11. 乡村工业产生，特别是纺织业。
12. ——	12. 谷物被用于工业目的，例如啤酒制造、酿酒、淀粉制造等。
13. 清理土地以用做农耕，土地开垦，出现新的开拓地和泥炭地。	13. 可耕地面积减少，土地闲置，村庄受冷落，洪水出现。
14. ——	14. 土壤被冲蚀，沙土飞扬。
15. 产出率提高。	15. 产出率下降。
16. 由畜牧业转向种植业，草场和牧场改种庄稼。	16. 由种植业转向畜牧业，耕地改为干草地或牧场。
17. ——	17. 牲畜所需饲料生产增长。
18. ——	18. 廉价谷物（如大麦、燕麦和荞麦）产量增加。
19. ——	19. 用于工业消费的作物（如亚麻、啤酒花、芥菜和茜草等）产出增加。
20. 葡萄园减少。	20. 葡萄园增加。

[55]

续表

经济和社会现象	经济和社会现象
21. ——	21. 羊的数目增加，羊毛产量增加。
22. 有良好的施肥，购买有机肥，撒泥灰土。	22. 不再为耕地购买肥料，不撒泥灰土。
23. 新农具出现（犁和耕作机械）；出现了谷物种植的新的专用设备；新工具的目的是增加产出（犁、开挖垄沟的机械）。	23. 几乎没有引进新农具出现；出现了生产乳制品及收割牧草的新的专用工具；设备着眼于提高生产的速度（搅拌机）。
24. 单个农场规模缩小。	24. 农场规模变大。
25. 地块的分割变小。	25. ——
26. 有关农业的新书出现。	26. 有关农业的旧书重印。

我们已经指出，表 2 所列的现象并不必然都在农业的扩张或衰退时期出现。例如，在农业衰退阶段，尽管农产品价格很低，农业人员也不会转向生产其他商品或从事畜牧业，这完全合乎情理。为了保持其收入水平不变，农业人员可能会把重点放于更加集约化的谷物种植，如实行较为健全的轮作制度或为土地施更多的肥料。这样一来，其收成将会增加，即使价格较低，其收入水平还是大致可以维持不变的。但是，1929 年以后的危机向我们显示，这种做法对市场价格具有灾难性影响。不断增加的产出量，导致价格实际下降的幅度比产出量不增加时下降的幅度大。马斯特里希特（Maastricht）附近的农场，为我们提供了在 17 世纪下半叶的农业衰退期间粮食种植业集约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的例子。在那里，农民们转向了更为集约化的谷物生产，并且开始种植豌豆及其他饲料型作物。在 1600 ~ 1700 年间，土地的单位产量迅速提高。更高质量的粮食，如小麦，也生产出来了。为了满足啤酒业的需求，大麦的种植量增加了。

【56】

2.2 农业生产

1. 外生因素

能够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影响的外生因素包括天气状况和动植物疾病等。天气状况与年产量密切相关，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把气候定义为

30年内天气状况的平均表现，那么我们可能会问气候变动是否在较长时间内影响生产。

植物生长和天气状况的关系比历史文献中所做的主观臆测要复杂得多。有三种重要的因素影响植物的生长：温度、降水量及光照强度。在小麦生长的八个阶段中，要求每种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每一阶段，数量过多和过少都会对小麦造成伤害。在适宜的温度区域内，以下显示了小麦要求的理想天气条件：

(1) 9月末	适度潮湿
(2) 10月、11月到12月20日	适度干燥，温暖程度不要太高
(3) 12月21日到2月底	适度干燥，小雪，温度不超过10℃，没有大风
(4) 3月	当小麦开始生长后不要有霜
(5) 4月	日照充足，定期下小雨
(6) 5月到6月15日	温暖，没有热浪，有少量雨水
(7) 6月16日到7月10日	阴凉，多云，当进入花期后没有降水
(8) 7月末、8月至9月初	干燥，温暖，阳光充足，没有热浪

研究发现，在6月10日至7月20日期间，降水量与谷物产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然而，在3月20日至5月10日期间，日照强度与谷物产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7】

其他农作物对天气条件的要求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小麦相类似的情况。裸麦和大麦可以生长在更加寒冷的地方，因为它们比小麦更加耐寒。对大麦而言，由于其生长期短，因而寒冷的春天和潮湿的夏季都是有害的。燕麦的生长周期较长，尽管它不喜欢凌晨前的寒霜，但可以在非常潮湿的环境中生长。马铃薯需要寒冷、潮湿的气候。让人烦恼的马铃薯枯萎病通常发生于温暖、潮湿并且缺乏光照的天气。

由于葡萄树是多年生植物，因而气候条件对它的影响要比对谷物的影响复杂得多。葡萄树要获得良好的收成，必须具备以下天气条件：

(1) 前一年夏天必须温暖，这样才会有许多新芽；

(2) 秋季足够温和，以确保嫩芽能够长成；

(3) 在冬、春两季霜冻不严重；

(4) 夏季和早秋气候温暖，使果实能够成熟。葡萄酒质量的高低与光照强度有直接关系。

当聚集的热量能够引起谷物凋谢时，此时的天气条件正适合酿酒，不仅

可以酿出好酒，而且可以多多酿酒。而多雨的夏季只会降低葡萄酒的产量和质量。对葡萄园而言，栽种5年后才能出现丰收，并且，再过25年，葡萄园就被消耗殆尽。因此，天气状况对葡萄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橄榄树获得丰产需要经过20年的培育。在朗格多克（Languedoc），由于缺乏肥料，橄榄树每两年才结一次果。橄榄树对于霜冻，尤其是1565年和1573年那样的严冬极为敏感。在法国南部，1690～1700年间的天气，尤其是1709年的冬天，给橄榄树的种植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对牧草的研究发现，温度高低和蛋白质含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光照强度和粗纤维含量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对干草而言，淀粉含量在很大程度上随4月到7月底这一期间内的降水量和日照量而定。干燥且有充足日照的夏季，有利于提高淀粉含量；相反，湿润的夏季虽然能增加粗饲料的产量，但质量不高，淀粉含量很低。而淀粉含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冬季牛奶的产量。牛奶的产量也直接受天气状况的影响，过热的夏季和多雨的秋季都不利于提高牛奶的产量。

【58】一般来说，生长期越短，产量变化的幅度也越大，荞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种用的植物，特别是蝶形花冠的植物，由于在花期内对外界条件特别敏感，因而相对于球根植物和块茎植物而言，要承担更大的种植风险。

按照种植风险大小，谷物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1) 高风险：包括用做牛饲料的甜菜、亚麻子，用做马饲料的豆类和豌豆；

(2) 中度风险：包括油菜、冬春小麦、冬大麦和亚麻须根；

(3) 低风险：包括早茬马铃薯、夏大麦、苜蓿和燕麦；

(4) 无风险：包括干草、马铃薯和裸麦。

尽管大多数地方已经种植了夏大麦、燕麦和裸麦等种植风险较低的谷物，再引进马铃薯这种几乎没有风险的新品种，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不言自明的。

产量是否稳定还取决于土壤条件。欧洲最早的永久殖民地开发的土壤——黄土上种植的作物，其产量波动的幅度在所有作物中最小。耕种粘度稍轻的土壤，风险也稍大一些，粘度较大的土壤和沙地则意味着高度的风险。因此，即使在很小区域范围内，由于土壤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产量就变动很大。

因此，很清楚的一点是，为了研究历史上谷物收成与天气或气候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不能只满足获得一般情况下可以获得的资料，我们需要获得有关天气和土壤条件的更为详细的知识。也就是说，诸如“寒冷的冬天”

或“潮湿的夏天”一类的词语表达的含义已经超出了其本来意义。

研究表明，在一定温度条件下种植谷物，产量对降水量变化的反应比对温度变化的反应要敏感得多。有一种观点认为，秋冬季节的降水量和土壤的酸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较高的降水量提高了土壤的酸度，从而使收成水平下降。在以往，同一地块被连续利用来种植农作物，其土壤酸度会增加，过多的降水只会使土壤的酸度进一步提高。过多的降水也会降低土壤中钙、磷酸盐和氮的含量，因此造成作物的减产。特别是土壤中含氮量发生变化，一定会造成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当然在今天，这些因素对产量的影响已基本消除，因为现在对土壤实行了更广泛的施肥，也使用了化肥。

在属于温彻斯特（Winchester）主教的四十多个采邑中，农作物的收成状况受到了上述这些因素的影响，它们或者同时或者单独发生作用。根据J. 迪图（J. Titow）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数据，在1211～1350年间，如果夏季和秋季非常干燥，接下去的冬季寒冷或正常，第二年夏季又是较为干燥的年份，通常这都是丰年。潮湿的或非常潮湿的秋季和潮湿的冬季往往带来糟 [59] 糕的收成。严冬之后，一般也会有好收成，除非在这之前的秋季过于潮湿。从18世纪的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发现，在经过类似1784～1785年和1785～1786年那样的严冬（在上述两个冬季里，伦敦的雾天分别为89天和112天）及随后而来的干燥炎热的夏季之后，农业会获得大丰收。

在降水量相同的地区，不同种类作物的收成在数年内会呈现出相同的波动。这是因为不同种类的作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的方式相同，而后者正是由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降水渗入土地累积形成的。目前，干燥年份的小麦和裸麦的收成一般要比潮湿年份高出1～1.5倍。而对湿度异常敏感的豌豆，干燥年份的产量是潮湿年份的3倍。

在以往，最大产量几乎是最小产量的3～5倍。假设正常的产量为100，表3显示了1500～1800年间的最高产量和最低产量，这只是个大致统计，实际上还存在着更高或更低的产量。

表3　　1500～1800年间谷物收成的最低和最高产量

谷物名称	最　低	最　高	最高/最低
小麦	40～80	120～140，150～190	4.75
裸麦	50或60～80	120～170	3.50
大麦	40～70	110～150	3.75
燕麦	50～90	110～140，150～170	3.40

很明显，谷物产量发生了显著波动，这说明19世纪以前谷物收成受天气条件影响的程度要比现在大得多。今天，高质量的种子、人工施肥、对植物疾病的研究、除草技术的发展、农具的改进以及轮作制度的健全都确保了谷物产量较为稳产。

按照惯例，我们将产出率在85%~115%之间的产量视为正常的收成水平，把产出率超过115%的收成水平视为丰收，低于85%的视为歉收。于是，我们会看到，1800年以前约一半的年份的收成属于正常范围之内，有四分之一的年份歉收，另四分之一的年份丰收。平均来说，每四年中便有一年存在着歉收的风险。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歉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那里的居民对当地市场的依赖性很大。

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内考察欧洲的天气状况，可以把其划分为四个气候区域：

(1) 北欧，这里温度条件对植物的生长尤为重要。这里更适合种植春[60]季作物，因为冬季作物需要非常早的播种准备期。

(2) 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的作物生长严重依赖降水。由于这里春季降水极少，不能进行春播，因而主要种植冬季作物。

(3) 俄罗斯干草原地区，这也是一个降水量对作物成长至关重要的地区。

(4) 西欧气候温和地区，这里降水量和温度对植物的生长都极为重要。降水过多、日照不足会引起秋季温度过低，从而对作物的收成产生不良影响。

西欧和地中海两个地区的气候完全相反。在“潮湿”的年份里，南欧会出现丰收而西欧则会出现歉收。相反，“干旱”的年份则有利于西欧而不利于南欧。法国是惟一一个兼跨这两区的国家，因此根据经济和农业发展的不同，法国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戈贝尔（Goubert）对北方的比尤外西斯（Beauvaisis）所作的历史性研究，以及对南方的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只有当两个区域的价格差异足够大时，将谷物从一个地方贩运到另一个地方才有利可图。16世纪末，由于南欧谷物短缺，西欧的谷物才通过海运到达地中海地区。

欧洲各地不同的气象台自1770年就开始了对气温的记录工作，这些统计数字表现出大致的相似性，尽管这些原始仪器记录难免存在差错。但是，在降水量的数字统计方面，则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欧谷物产量更加依赖于降水而不是温度。这样，产出水平便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只有在经历一个严冬及一个晚春之后的

收成的区域差异性才不那么显著，因为这时的温度大大低于其常规水平。

现有的历史资料也证明了这种区域差异性的存在。在相邻地区，由于天气条件或多或少地具有相似性，其产出水平也颇为相近。波兰的茨高—高堡达兹（Rzgów-Gospodarz）、维斯克奴（Wiskitno）和德路陶（Dlutów，1564～1569年）三地的小麦产出率基本相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克斯马（Cismar）和克尼可（Körnick，1648～1653年）两地的小麦产出率也大致一致。在波兰的12个地区（1564～1569年），裸麦的收益率变动极为接近：都是在1567年提高，在1568年下降。同样的情况在爱沙尼亚的5个地区（1681～1685年）、在瑞典的斯卡哈尔特（Skarhult）和瑞德堡赫尔姆（Rydboholm，1724～177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布劳（Bürau）地区、欧裴多夫（Oppendorf）和斯考浩司特（Schönhorst，1728～1781年）等地也可以发现。【61】

从手边的资料绝对找不出在国际范围内产量具有一致性。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该存有这种希望。因为国与国之间相距遥远，气候变动很大。1728～1745年，布劳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法国的芬特毛格尼（Font-morigny）的小麦产出率存在着巨大差异。瑞典的斯卡尔哈特（Skarhult）和瑞德堡赫尔姆地区（1724～1778年）裸麦的产出率，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三个地区的收益率完全不同。同样，劳济茨（Lusatia，1779～1799年）的库考（Kuckau）和德茨贝斯利茨（Deutschbaselitz）的裸麦产出率，与瑞典的劳斯台德（Löfstad，1768～1797年）的产出率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19世纪初期，瑞典（1803～1820年）的比角恩（Björno）、劳济茨（1800～1820年）的库考，以及巴列丁奈特（1803～1812年）的普菲德瑟姆（Pfeddersheim），也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趋势。

根据气象仪器记录的数据，人们尝试建立气候变化周期方面的较为稳定的模型。但是就降水量来说，由于观测角度不同，所记录的数字有很大差异，要建立周期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又经过一段时期的尝试，绝大多数学者也承认要为温度建立周期模型同样是不可能的。在以往，那些被称为“时段搜索者”的人常常以不加甄别的方法来确定周期。气候变化周期好像和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没有什么联系，后者大致为11年、22.5年、37年、83年和300年。曼利（Manley）在非规则时段内考察气候波动情况，这一时段为22年±10年（即12～32年）。在这一时期内，平均每年温度大致变化1华氏度。在100年至300年更长的阶段，每年气温变化也仅为2华氏度。对于温和地区谷物的生长而言，这样的波动无关紧要，然而它对条件恶劣地区，如对阿尔卑斯山区和北欧地区的谷物生长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人们采取了多种方法试着填补现有的、有仪器记录时期之前的历史资料的空缺。有关过去天气状况变化的资料可以从历史记录中查到。要得到更多的信息，需要研究冰川的收缩和扩张、港湾和湖泊的冰冻、树木的年轮、葡萄的成熟期及樱桃的花期等。当然，所有这些事实，只能用于反映特定区域的面貌。在“时段探索者”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堆砌所有的资料进而草率得出结论的不良倾向。我们以严冬为例，说明慎重对待上述事实的必要性。英格兰的冬季与德国的冬季之间的相关系数很低；英格兰与俄罗斯的冬季之间也是如此。在 1530 ~ 1700 年间的冬季，英格兰和俄罗斯的寒冷程度要比德【62】国北部更为显著。我们可以追溯 1691 ~ 1700 年间出现在英格兰、瑞典、芬兰山区及阿尔卑斯西麓的冷夏、多雨和降雪，但这种天气在中欧并未出现。

通过对树木年轮的研究，可以发现，有时它反映的是温度状况，有时则反映降水状况。加利福尼亚著名的美洲杉就反映了降水情况；而英格兰和挪威的树木反映的则是夏季的温度；从海森（Hessen）和巴伐利亚（Bavaria）的树木年轮，更多地可以看到降水的变化痕迹而不是温度的痕迹。与谷物一样，年轮也显示出不规则的变化曲线。这里，同样可以证明，年轮变化和太阳黑子周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同样，葡萄采摘日的变动显示出不规则摆动的曲线。从这些日期中，可以反映出夏季的温度。较早的采摘意味着气温温和、阳光充足，而较晚的采摘日期则是由于夏季潮湿和阴凉造成的。利用采摘日期作为气候状况判断工具的方法通常不用于谷物。这是因为，相对于温暖的夏季而言，秋冬播种时的降水量对谷物收成的影响更大一些。不仅如此，夏末秋初的气候对于葡萄的成熟极为重要，而此时谷物已经收获完毕。

仪器记录法发明之前，一项对气候状况的研究表明：气候的确出现过大幅度变化。以 50 年为时间段，对比各个时期的天气状况，发现 1551 ~ 1600 年间的冬天以及 1651 ~ 1700 年间的冬季，要比这一时期其他阶段更冷一些。由于 1540 ~ 1850 间出现的严冬年数众多，这一阶段被称作小冰川时代，也有的人把 1590 ~ 1860 年称为小冰川时代。在瑞典北部，有很清晰的迹象表明，17 世纪中期谷物产量的下降源于其各地区温度的降低。

有人可能会问：17 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温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产出率的轻微下降。这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资料中反映的事实。实际上，17 世纪的气候一直变化无常。1591 ~ 1650 年间，冬季较为寒冷，夏季潮湿阴凉；1651 ~ 1680 年间，冬季寒冷而夏季温暖；1681 ~ 1740 年间的冬季则相对暖和一些。因此看来，引发收益率下降的主要还是经济方

面的因素。在这一特定阶段，下降的不仅是单位面积产量，而且还包括耕地数量的减少。这必然会造成谷物总产量的大幅下降。如果其他因素都是固定不变的，这一时期谷物的价格应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实际上，在许多国家，谷物价格趋向于下降。这意味着一定出现了能够影响需求的某些变化。我们知道，由于多种原因，17 世纪许多国家的人口规模减少，还有一些国 [63] 家人口处于停滞状况。产出率的下降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农民们将他们原先施与谷物的肥料用到了更为合算的经济作物上。

要想评估天气状况对谷物价格的影响，必须明白一个地区的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降水量，因为各地的降水量有很大差异，产量也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因此，某地区的天气状况只能影响一定范围的市场或当地市场的谷物价格。当然，在每个市场上，产量与价格之间都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一旦谷物贸易扩大到区域外的更大范围，各地区间的产量波动会互相抵消，价格差异也随之消失。然而，如果说生产的波动源于以温度变化为主的天气状况的改变，例如出现漫长的寒冬，那么来自于各方面需求的压力将推动价格急剧上升。

毫无疑问，跨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和产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许多学者忽视了这一事实，他们仅仅将国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视为其产出水平的一个指标，例如艾什顿（Ashton）、高尔德（Gould）和赫克歇尔（Heckscher）都是这样做的。赫克歇尔就曾尝试研究 1680 ~ 1780 年间瑞典谷物的估算产量与结婚率、死亡率之间的联系。后来的布鲁林（Brolin）对瑞典进行的研究证实，这些所谓的产量是按照当时的乌普萨拉（Uppsala）的谷物价格估算出来的。当然，乌普萨拉和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 1800 年以前，瑞典的谷物尚不能自给，每年都需要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一部分。因此，这些价格是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并不能反映瑞典本国的产出状况。

要找出气候变化与价格之间的相关性几乎是不可能的。16 世纪上半叶经历的严冬时期，并没有对当时的谷物价格走势产生影响。实际上，谷物价格早在 15 世纪就开始上涨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伴随着谷物价格下跌的农业衰退，也早在 17 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过。诚然，18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冬季温和且谷物丰收的时期，然而在 1690 ~ 1810 年间却经历了 12 个严冬。这其中，有 6 年谷物价格较高，而在另外 6 年里，价格却出现了下降。

为了解释价格的长期变化趋势，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倾向于列举出一系列的严冬年份、歉收年份甚至丰收年份。然而，他们均无法阐明为什么这种偶 [64]

然性天气状况会对谷物价格产生如此长久的影响。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们对是将丰收年份还是歉收年份定义为适合谷物种植的气候尚未达成共识。他们的研究一般只建立在对当地市场上产量与价格呈负相关关系的假设之上：丰收会造成价格下跌，歉收则会带来价格上升。然而，在长期趋势中这一假设并不起作用，因为必须考虑人口因素。不仅如此，他们也忽略了谷物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及工资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是极为重要的。最后，他们忘记了比价关系的变化对不同阶层消费者的影响，这些阶层因其收入水平、支出模式及食物结构的不同而在消费方式上也有差异。

还有其他一些外部因素会影响农产品的生产。19 世纪，在许多国家，马铃薯的生产遭受到马铃薯霉菌的侵害，葡萄则受到了葡萄根瘤蚜的侵扰，棉花染上了棉虫病。1800 年以前，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带有更多的地区性特征。田野及谷仓中的粮食常受到蝗虫和老鼠的损害，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病虫对农作物的损害只限于当地范围或者某一区域。

18 世纪，不断袭击欧洲广大地区的牛瘟具有特别严重的杀伤力。第一场瘟疫发生于 1709 年，由亚洲沿着里海传播到欧洲的俄罗斯，并从那里传播到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但是英格兰几乎未受影响。直到 1720 年，牛瘟才停止了大肆侵害。第二场瘟疫发生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初。1740 年，匈牙利出现了关于此次瘟疫的最早记录。1744 ~ 1745 年牛瘟的横行达到了顶点，并一直持续到 1765 年才消失。也就在这一年，又爆发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牛瘟。这次瘟疫始于东巴尔干地区，1769 ~ 1770 年达到顶点。如果记录可信的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瘟疫波及的区域，牛死亡的数目高达约 60% ~80% 以上。造成这种灾难性后果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过量地放牧，由此造成了饥荒。18 世纪，由于牛及其乳制品的价格比谷物的价格更加有利可图，人们对畜牧业情有独钟。

面对这场灾难，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将其视为上帝给予的惩罚。每个受到损害的国家的当局都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将牛从疫区运出。在所有限制措施中，只有一种途径产生了效力，即把所有受到传染的牛立刻宰杀掉。这个办法是由意大利医生吉温尼·兰西斯（Giovanni Lancisi）建议的。1714 年，英格兰采用了这一方法。在第三次瘟疫发生时，奥地利、尼德兰和法国南部也采用了这一方法。1754 年，英格兰引进了接种疫苗的技术。后来，这种技术在瘟疫中存活下来的母牛所生的小牛身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762 年，第一家兽医学校出现在里昂，其目

【65】

的之一便是同这场灾难进行斗争。

农民们所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当权者及地方当局同样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农民们无力支付税金和地租。在弗里斯兰和荷兰等以畜牧业为主的地方，由于乳制品价格的上升导致牲畜的数量迅速回升。养羊业同样有所增长。然而，在那些以种植业为主的拥有沙地或轻度粘性土壤的地方，牧场则被改做耕地。在这些地方，牲畜数目的恢复极为缓慢，因为畜牧业在这些地方只处于次要的地位。

2. 影响生产的一般性因素

有许多因素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可耕地的数量及其使用方式，例如是用做种植业还是畜牧业、用做葡萄园还是橄榄林、用做园艺还是果树种植等等；气候条件，作物覆盖的范围，耕作的密度和在休耕期间的下降程度，轮作及收获水平，牲畜的数量和重量，奶产量，羊皮的重量，葡萄酒及橄榄的产量，施肥，农具，工作时间和平均每小时或每天的耕作量，最后是农民的体力和智力水平等等。1500～1800年间，上述因素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了变化，并且在农业扩张与农业衰退时期，这些因素的变化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由于谷物在作为整体的农业中所占的比重非常显著，上述各种因素的变化程度，总要直接决定于谷物价格与其他农产品价格的比率。

3. 土地的开垦与抛荒

15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的土地开垦数量重新获得增长。这一新的扩张阶段于16世纪末在一些国家中结束，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一直持续到1660年。毫无疑问，对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及工资上升的结果。1450年以后，价格比率的这种逆转与人口的普遍增长，以及日益向尼德兰、莱茵河西部地区、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66】以及巴黎、伦敦、马赛、罗马、那不勒斯及其他大城市集中有密切的关系。

1450年以后进行的拓荒活动，与11～14世纪期间随着大规模殖民活动出现的拓荒行为完全不同。在这几个世纪中，地主、修道士及个体农民都疯狂地进行土地开拓活动；大量的新的耕地被不断开发出来。16世纪和17世

纪中，这种大规模的开拓活动转移到了美洲及俄罗斯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在欧洲，尚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空地，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劣等土地，以当时所拥有的工具及所掌握的技术来开发这样的土地是无利可图的。直到19世纪，当人工合成肥料被发明出来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15世纪、16世纪期间的开垦活动，部分地是对自1300年以来由于农业衰退及人口下降所形成的废弃土地的恢复。例如，德国的记载显示，曾一度沦为荒野的伍斯坦根（*Wüstungen*）的土地又恢复了耕作，在德国中部和南部尤为如此。然而，那些废弃的小村庄仍然人烟稀少，因为人们更愿意继续留在较大的村庄里，或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在那些从事暂时性耕作或实行“园内—园外耕地”制度的地方，几乎看不到土地的开垦。14世纪，部分耕地开始荒废，并由此再一次变成公用土地。直到1450年，这些土地才重新恢复耕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公共土地在用作种植业还是用作养殖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尽管这种农业体系的内容广泛，却具有容易适应的优点。

阿尔卑斯山区的居民，在1300年之前通常居住在高海拔的山坡上。1300年以后，由于阿尔卑斯山区气候的变化，他们没有在海拔高的地方重建家园，而是移居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自1540年起，出现了“冰川期”，意味着冬季更为寒冷和漫长，降雪量也更大。

除了恢复被废弃的土地之外，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的拓荒活动主要集中在荒地和沼泽。当然，垦荒本身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但其规模却比以前都大得多。从沼泽地排水及填海造地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资本家和技术专家的联合支持下，承包商致力于从事具有较高风险性的拓荒项目。中世纪时【67】期，低地国家已经和附近城市中的居民合作开垦土地。然而在当时，对个人而言，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快速致富还是史无前例的。有时，他们是幸运的，但更多时候，则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这一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有时，承包商会低估技术难度，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资本，以及投入资本所产生的回报通常很慢且难以预料。

在欧洲，参与拓荒或排水的技术专家几乎均来自西兰（Zealand）、荷兰、弗里斯兰和佛兰德斯，在英属芬兰工作的温缪顿（Vermuyden），在米地（Midi）工作的杰若姆·考曼斯（Jérome de Comans），在普罗旺斯（Provence）工作的杰·冯·恩斯（Jan van Ens）和在墨西哥工作的阿瑞恩·布特（Adriaen Boot）等人就是其中的几个典型。荷兰的筑堤专家也为邻近的

费拉拉（Ferrara）工作。[①] 在与本国洪水的斗争中，这些人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有时候，荷兰的钱商或商业机构也为部分地区的拓荒活动提供资本。这些地区包括：法国［简·侯弗特（Jan Hoeufft)］、英格兰［雅克布·凯茨（Jacob Cats)］，冯·瓦尔肯伯斯（van Valckenburghs)，康斯坦丁金·胡恩斯（Constantijn Huygens）及其他地区、德国北部［威廉·冯·登豪夫（Willem van den Hove)］以及尼德兰北部的泥煤沼泽地区［如威尔德范克（Wildervanck）和特里普（Trip）家族］。

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垄断性种植。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摩洛哥、那不勒斯、保加利亚、特瑞斯（Thrace)、考夫（Corfu)、西西里（Sicily)、克利特岛（Crete）和塞浦路斯等地，一些大型企业垄断了谷物、葡萄、橄榄、棉花及甘蔗的种植。与15世纪末期的波河（Po）流域出现的水稻种植一样，这种“垄断种植”通常也为城市中的富人所拥有。从这些活动以及其他开发沼泽及拓荒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大规模地从事农业的首批例子。

17世纪，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放弃了开垦新耕地的努力。文件资料再一次显示，那时出现了曾于中世纪末显现过的现象：村庄被废弃了、耕地闲置了、堤防损毁了等。30年战争使波希米亚、德意志、波兰和勃艮第大片土地荒芜，特别是波兰在1655～1660年的瑞典战争中损失惨重，中欧则是与土耳其人作战的主战场。即使在那些未受到很大影响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们也对不得不放弃一些村庄和农场而不满，例如在罗马南部坎帕尼亚（Campagna)、托斯卡纳（Tuscany）及塞莱曼堪（Salamancan）主教辖区。【68】

与中世纪一样，17世纪下半叶和整个18世纪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因此造成的损失在萨克森、图林根州（Thuringia)、弗兰科尼亚（Franconia)、巴伐利亚、洛林（Lorraine）和香槟等地引起了抱怨。有一位学者认为，三步轮作制中休耕期间的地表裸露是造成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到18世纪末，在休耕期间的土地上种植了牧草，水土流失现象便消失了。

1660年以后，在尼德兰以及东弗里斯兰（德意志）的排水及拓荒活动仅仅以很小的规模进行。对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德意志、英格兰和波兰等国的历史研究表明，17世纪被荒废的村庄数目并没有中世纪后期那么多。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17世纪的农业衰退并不十分显著。[②] 出现在欧洲

---

① C. 威尔逊：《荷兰共和国》（伦敦，1969年），第79～88页，地图在第80～81页。
② 见《对农村荒地历史的经济学考察》，1965年第14～18期中的多篇文章。

各地的耕地面积的减少，是 17 世纪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战争以及在 17 世纪流行的瘟疫绝不是引起这一现象的惟一原因。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我们均可以发现农产品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关系的完全逆转，这从总体上来看，对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见到的，伴随着价格下降的耕地面积减少，只能解释为是人口数量减少引起的。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被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人口方面的数据所证实。

德国土地在 30 年战争中损失惨重，但于 17 世纪的最后 20 年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恢复。而在其他地方，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新的拓荒活动。荷兰各省、奥地利属尼德兰、法国、普鲁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英格兰基本上都属于后一种情况。

表 4 清楚地反映了农产品价格与拓荒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指出的是，1565 ~ 1589 年间的绝大多数排水工程设施由于 8 年战争的影响而陷入停滞。这一点必须充分注意，因为卷入战争的省份正是排水工程集中的省份。战争阻碍了新的拓荒活动。尤为显著的是，1664 年起，大规模的拓荒活动停止了，而恰好在同一时期，谷物价格趋向下跌，总体经济形势也随之恶化。直到 1765 年，每年进行排水的土地面积仍然很小。但只要农业处于不景气中，任何增加耕地面积的投资都是毫无意义的。进入 1755 年以后，谷物价格再一[69] 次回升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前景。人们又立刻重新从事排水活动。这是农产品价格与农业行为直接相关的一个明显的实例，东弗里斯兰（德意志）的拓荒活动以及尼德兰北部泥煤沼泽的拓荒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表 4　尼德兰由拓荒而来的耕地面积指数与小麦价格指数的比较（1501 ~ 1864 年）

时期	每年由开荒而来的耕地面积(公顷)	开荒面积指数（1715 ~ 1739 年 = 100）	阿姆斯特丹小麦价［1721 ~ 1745 年 = 100，坎尼斯堡（Königsberg）小麦］	时期	国际小麦价格指数（1721 ~ 1745 年 = 100）
					最低　最高
1540 ~ 1564	1 474	346.0		1501 ~ 1550	41.4 ~ 78.8
1565 ~ 1589	321	75.3	95.5a	1551 ~ 1600	133.2 ~ 180.4
1590 ~ 1614	1 448	339.9			
1615 ~ 1639	1 783	418.5	146.6	1601 ~ 1650	124.2 ~ 176.8
1640 ~ 1664	1 163	273.0	135.8		
1665 ~ 1689	493	115.7	101.4	1651 ~ 1700	98.9 ~ 151.2

续表

时期	每年由开荒而来的耕地面积(公顷)	开荒面积指数（1715～1739 年 =100）	阿姆斯特丹小麦价［1721～1745 年 =100，坎尼斯堡（Königsberg）小麦］	时期	国际小麦价格指数（1721～1745 年 =100）
1690～1714	501	117.6	124.4		
1715～1739	426	100.0	88.7	1701～1750	99.1～114
1740～1764	404	94.8	113.0		
1765～1789	717	168.3	142.2	1751～1800	123.3～154.3
1790～1814	634	148.8	250.0		
1815～1839	684	160.6	189.6	1801～1850	169.9～220.5
1840～1864	1 568	368.0	209.9		

a：西兰岛小麦，1575～1589 年。

【70】

4. 农作物的轮作制度

通过减少定期休耕土地的数量而不是去开拓新的耕地来提高农产品产量，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采用的是二步轮作制，则有一半的土地需要休耕；如果是三步轮作制，则有 1/3 的土地要休耕。为了恢复被上一茬作物所消耗掉的土壤养分，有必要实现休耕制度。通过在休耕土地上种植牧草或豆类作物，可以增加土壤中氮的含量。早在中世纪时期，在靠近科隆恩（Cologne）的莱茵河西部地区（1277 年）以及佛兰德斯（1278 年），就已经开始采用这种增加地力的方法。这一方法还有一个优点是，通过种植牧草，农民们不仅可以饲养更多的牲畜，而且可以有更多的肥料供耕地使用。

圈舍饲养的方法也已经开始使用。有些牲畜几乎终年被关在圈舍内，依靠饲料为生。用亚麻籽和油菜籽制成的饼是主要的饲料，所产生的粪肥则存放在专门的堆肥棚中。由于这种集约化的农业方法很早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所知，因而对 18 世纪所谓的“农业革命”而言，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这种方法只在部分地区被采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农业中没有引入现代化的方法，其主要原因应当归于那里的农民缺乏进取心、墨守成规及由于保守的天性而造成的无知。然而，这样的结论对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那些从集约化经营中受益的地方，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然而，这种方法一般只限定于人口稠密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利润（*débouchés*）和合理的价格

才是有保障的。

16～18世纪期间，欧洲各地农业发展的水平并不是均衡的。欧洲各地分布着小范围的集约化农业：从佛兰德斯、布拉班特（Brabant）、西兰、荷兰、弗里斯兰、莱茵河西部地、拿骚（Nassau）、巴列丁奈特河流域、加泰罗尼亚、波河流域、诺福克（Norfolk）、萨福克（Suffolk）到艾塞克斯（Essex）及伦敦周围地区。1800年的情况与1500年是否存在重大的差别，这一点尚不清楚。德国部分地区的集约化农业在30年战争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另一方面，在英格兰、荷兰的部分省份以及18世纪的德国北部，集约化耕作方式的地位则有了显著的提高。【71】

与工业革命相对应，人们已经为农业革命在18世纪的爆发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对这一时期的农业进行观察时，就会清楚地发现，所谓革命性的重大变革实际上并未出现。虽然在较早实行集约化农业的地方，确实在本地或者本区域实现了生产扩张，然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真正出现。当然，这是建立在更加广泛的农业规模的基础上的。

17世纪和18世纪，可以同时存在以下几种耕作制度：

（1）临时性的耕作，在苏格兰、爱尔兰、瑞典和其他地方仍然使用；

（2）园内—园外耕地制度，如苏格兰和纳慕尔（Namur）；

（3）连续不断的裸麦种植，如东尼德兰和德国西部；

（4）二步轮作，如法国南部和英格兰等地；

（5）三步轮作，其中两年休耕，如在安大路西亚（Andalusia）；

（6）各地普遍使用自由的三步轮作，其中一年休耕，不实行限制，如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何种作物；

（7）各地普遍使用受管制的三步轮作，其中一年休耕，实行限制，例如规定必须种植的谷物种类和在公共土地上放牧的牲畜必须依靠秸秆为生；

（8）四步、五步、六步或更多步的轮作，通常同时种植豆类作物，存在于英格兰、尼德兰和阿尔萨斯（Alsace）；

（9）可转换的牧场，通常土地在被耕种几年以后，再当牧场用一段时期，如在佛兰德斯、格罗宁根（Groningen）、英格兰、阿尔萨斯（Alsace）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等地；

（10）谷物的轮作，包括饲料谷物在内，如在登博施（den Bosch，属尼德兰）的梅杰瑞（*Meijerij*）及其他地区；

（11）谷物的轮作，在休耕的年份种植饲料作物，例如佛兰德斯和诺福克。

以上是根据日益增加的土地使用密度或者日益降低的休耕地数量安排顺

序的。

在使用土地方面，要实现向更高程度的集约化转变，不仅取决于土壤条件，同时还取决于收益水平能否超过追加的劳动和投入的成本，此外还包括与交易市场间的交通是否便利等多方面因素。战争环境及经济衰退会引发由集约化向非集约化发生逆转。因此，按照时间顺序，农业发展绝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的。15 世纪、16 世纪，德国北部土地肥沃地区的农民使用的耕作制度是每 4 年、5 年、6 年甚至 8 年休耕一次。18 世纪，在同样的地区，由于 30 年战争造成的土地荒芜和人口减少，农民们改用了三步轮作制。【72】

对更为集约化的耕作制度的采用，并不意味着谷物产量一定会有所提高。18 世纪期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可转换牧场便是有力的证明。这里的谷物收益率（即小麦、裸麦和大麦的平均值）从 1600 ~ 1699 年间的平均 5.0，增长到 1700 ~ 1799 年间的平均 6.7。在旧的三步轮作制度下，每 3 年中有 2 年种植谷物，而在 18 世纪的可转换牧场中，在每 11 年当中只有 5 年播种谷物。较高的收获量也不能完全弥补由于种植年份减少所造成的总产量的下降。因此，平均每年的谷物产量出现了少量的下降。实行这种新制度的优势在于，土地在每 11 年当中有 5 年可以作为放牧牛的牧场，只有 1 年是没有任何产出的真正的休耕，而在以往的三步轮作制中，每 12 年当中要有 4 年休耕。

18 世纪，两种耕作制度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名字。一种叫“诺福克制度”，它代表了英格兰“新牧业”的基本特征；另外一种叫“可转换牧业”，出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丹麦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诺福克制度大约在 1650 年前后出现，它是在位于安特卫普与根特（Ghent）之间的“冯·瓦斯”（van Waas）土地上所采用的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那里，英国人理查德·韦斯顿（Richard Weston）爵士确立了如下制度：亚麻收割以后立即种植芜菁；在下一年的 4 月，开始种植燕麦，随后种植苜蓿；当燕麦收获以后，苜蓿刚好发芽，这样土地可以作为牧场，直到圣诞节。在此之后，苜蓿可以种植 4 年 ~5 年。从不同时期的标准来判断，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的收益率的确是相当高的。在诺福克制度中，小麦和大麦等谷物是与做饲料用的芜菁和苜蓿轮流播种的。对饲料作物的种植，无论是作为在谷物收获以后的接替作物，还是在休耕期间内种植，都已经在中世纪时期开始为人们所了解。13 世纪、14 世纪的有关账目，记录了 1278 年佛兰德斯的道尼克（Doornik）附近及 1382 年马斯特里希特（Maastricht）附近，对乌野豌豆的种植、15 世纪大瓜草［迈斯克（Maaseik）于 1446 年］和饲料用芜菁［阿尔斯特（Aalst）附近的迈斯布鲁克（Messelbroek）于 1404 年，以及根特附

近的如杰姆（Rooigem）于1446年］的种植。艾伯特斯·麦格诺（Albertus Magnus）在其著作《自然史》（13世纪中期）中记录了当时种植苜蓿的情况。我们从其他史料中也可以了解到16世纪在意大利（布雷西亚于1550～1560年）、布拉班特（1566年）及荷兰［斯凯根（Schagen）于1599年］均有苜蓿的种植。在这方面，诺福克制度也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新牧【73】业”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及后来在其他国家中的繁荣也归于众多因素，如使用泥灰、肥料、圈地、长期的租赁合同以及财产规模的大小等。18世纪下半叶及19世纪初谷物价格的大幅度提高，使采用集约化的耕作制度更加有利可图。虽然对通过这一方式来提高产出的办法的了解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经济条件一直没有为大规模使用这种制度提供充分而有力的支持。

德国北部和丹麦的“可转换的牧业”制度，与早在14世纪就已经在佛兰德斯使用的制度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在2年的谷物种植之后有1年的休耕，以及3年～6年的放牧。17世纪，在佛兰德斯一般用牧草来代替苜蓿。在德国北部和丹麦，实行的则是5年谷物种植、5年放牧和1年休耕的轮作制度。

5. 对经济条件变化的适应性

土地的使用深受谷物价格与乳制品价格之间比率关系波动的影响。在农业衰退阶段，当谷物价格与肉类、奶油、乳酪及羊毛的价格相比相对较低时，耕地有时就会转变为牧场。相反，在农业扩张阶段，牧场也有可能被开垦以播种谷物。在前面所讨论的各种耕作制度中，有两种制度会促进土地使用方式发生这种变化。在临时耕作（*Feldgraswirtschaft*）制度下，废弃的土地，也是天然的牧场，可能部分被播种；而在条件不利时，则有可能重新被废弃。在“可转换的牧业”中，可以根据需要对牧场扩大规模，甚至可能把其变成永久性的牧场；或者用苜蓿代替牧草，这样便可以提供永久性的耕地。这两种制度都具有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优势。在其他耕作制度下，在牲畜饲养和作物栽培之间的衔接上往往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土壤条件、土地分配、农场规模以及农舍能否满足需要等多方面内容。畜牧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此外，在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农民之间，还存在着智能方面的差异。由一种农业形式向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变有时也是政府政策促进的结果，例如在西班牙占领下的尼德兰的冯·赫维（van Herve）的土地上（位于列日和亚琛之间）所发生的转变就是如此。在这个曾经大量出口谷物的地方，16世纪上半叶开始实行出口禁运，这使谷物价格大幅度降低。结果，许多农民开始

转向畜牧业。1673年以后，英格兰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因为这一年，谷物价格与乳制品价格相比处于不利地位，政府出台了鼓励谷物种植的奖励措施。[74] 9年战争（1688～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所造成的谷物进口量的下降，为法国南部造就了有利于谷物生产的条件。

在由畜牧业向种植业的转变过程中，从长期趋势来看，价格总是在特定的方向上运动。除可转换的牧业和临时耕作制度以外，农业在这种转变中几乎没有灵活性。比利时的冯·赫维的土地使用方式的变化，就形象地说明了农民们受到其所分配的财产的多少和形式的束缚而面临的各种难题。由于属于每一个农民的土地过于分散，过去足以种植谷物的肥沃土地，在从事畜牧业时则显得过于狭小了。

我们掌握有从14～19世纪初的34宗由耕地变为牧场，以及23宗由牧场转变为耕地的记录（详见表5）。

政府部门常常会对种植业向畜牧业的转变感到忧虑，因为它们担心国内的谷物供给会发生危机。一旦战争爆发，粮食的进口将极不可靠，因而政府的目标一般都是要实现最大程度的粮食自给。它们同时也担心大量的粮食进口会使本国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从而破坏贸易的平衡。与众多国家采取的这种一般性做法相反的惟一特例，是荷兰共和国。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荷兰一直依赖粮食的进口。

在种植葡萄的地方，也有记录显示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即从耕地转向葡萄园种植或者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变化和谷物价格与酒类价格比率的变化相关联。我们发现，当谷物和面包的价格较低时，对葡萄酒和啤酒的需求会有所增加；而当谷物价格相对较高时，对葡萄酒和啤酒的消费则会下降。发生这种变动也与人口中特定阶层的消费支出模式相关，这些阶层主要包括城市居民、其他从事非农产业的人以及那些赚取固定收入或工资的人。

这里，在实现从耕地向葡萄园的转换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若干障碍：葡萄园规模通常都比较小，对分佃耕制是极为常见的，同时葡萄种植和酿酒业的发展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如制桶匠、马车夫和船夫。多数地方产出的葡萄只在当地或附近区域内消费，因而其价格比率，与那些在更为广泛的市场范围内消费而种植葡萄的地方的价格比率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例如，在典型的酒类出口地区波尔多（Bordeaux）的周围的价格比率，就与朗格多克有较大的区别，在后一地区，为出口而进行的酒类生产直到很晚之后才开始。

在我们手边的资料中，从农业耕地向葡萄种植的转变以及相反方向的转变共有24项（详见表6）。[75]

表 5　　1825 年以前从种植业向畜牧业的转换及反向运动

耕地变为牧场	牧场变为耕地
14～15 世纪 英格兰：约克郡，林肯郡（Lincolnshire），米德兰（Midlands） 德意志 奥地利：维若堡（Vorarlberg），蒂罗尔（Tyrol） 意大利：伦巴底（Lombardy），罗马附近的平原（Campagna） 法兰西：塞尔瑞克（Thiérache） 比利时：布拉班特 挪　威	
	1550～1650 年 英格兰：雷塞斯特郡（Leicestershire），芬兰 德意志：东弗里斯兰 尼德兰：弗里斯兰，格尔德兰（Gelderland） 挪　威 西班牙
1650～1750 年 英格兰：米德兰，肯特（Kent），萨里（Surrey） 爱尔兰 德意志：什未林（Schwerin），阿尔高（Allgäu） 奥地利：维若堡（Vorarlberg），布根则沃尔德（Bregenzerwald） 瑞　士：艾门泰尔（Emmental），佩斯・恩浩特（Pays d' Enhaut），格里尔（Gruyères） 法　国：萨瓦（Savoy），朱拉（Jura），勃艮第，塞尔瑞克，佩斯・奥格（Pays d' Auge），百森（Bessin），科坦登半岛（Cotentin） 比利时：冯・赫维的领地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e）	1660～1750 年 英格兰：东英格兰（Anglia），威尔特郡（Wiltshire）
	大约 1700 年 法　国：荆棘地（Landes），派瑞高德（Périgord）

续表

耕地变为牧场	牧场变为耕地
	1750～1820 年 英格兰：林肯郡（Lincolnshire），瓦维克（Warwickshire） 爱尔兰 德　国：西利西亚，东弗里斯兰 法　国：塞尔瑞克，法属佛兰德斯，勃艮第 尼德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 瑞　典 西班牙
1823 年 英格兰：南英格兰乡村，米德兰 爱尔兰	

【76】

表 6　从耕地向葡萄种植园的转换及反向运动（1825 年以前）

耕地变为种植园	种植园变为耕地
14～15 世纪 德　国：哈茨 比利时：布拉班特，林堡（Limburg）	
16 世纪早期 德　国：上莱茵河，斯图加特周围地区	16 世纪 瑞　士：哈维尔（Hallwil） 法　国：梅恩(Maine)，巴黎周围，朗格多克，朗雷德(Langlade)，尼姆(NÎmes)周围地区 德　国：伍兹堡（Würzburg，从 1550 年或 1580 年起）
1630～1771 年 瑞　士：沃利斯（Wallis），哈维尔，苏黎世州 法　国：荆棘地，派瑞高德，斯特(Sète)，蒙特利埃（Montpellier）朗雷德，勃艮第，罗亚尔河（Loire），阿尔萨斯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弥补较低的谷物价格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工业用作物的种植量，这类作

物主要包括亚麻、大麻、啤酒花、油料作物、菘蓝、茜草、淡黄樨草和番红花等。当农业进入衰退阶段时，往往会有许多新的工业部门诞生，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必须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城市，而且也出现在广大乡村中。中世纪晚期以及 17 世纪，纺织工业非常兴旺，特别是农村。例如，在整个 17 世纪及 18 世纪初期，爱尔兰、苏格兰、梅恩（Maine，法国）、佛兰德斯、屯特（Twente，荷兰共和国）、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曼斯特（Münster）周围地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地，乡村中的纺织工业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一般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遵循的是同一种模式：最初，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口的相对过剩，穷人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他们为从事纺纱和织布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农村生产的棉纺品一般为富裕的商人购买并出口。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在商人、纺纱工及织布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通常情况下，商人不属于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往往是外来移民，有时则是某个不同宗派的成员。

在很多情况下，乡村工业为 19 世纪工厂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77]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8 世纪下半叶，当谷物价格相对提高时，一些产业从其所在的农村地区消失了，人们转而重新从事种植业。在屯特（尼德兰）的部分乡村，在佛兰德斯的奥德阿得（Oudenaarde）周围地区的乡村及苏格兰的部分地区，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17 世纪、18 世纪，谷物的生产和需求受到了能够取代谷物的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影响，这些新的作物包括水稻、玉米、荞麦和马铃薯等。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均可以找出某一国家最早引进这些作物的时间，但难以判断它们从何时起开始在人们的食谱中占据重要地位。对马铃薯而言，这一进程是相当迅速的。1750 年左右，在欧洲一些国家中，马铃薯还是一种鲜为人知的东西，然而 30 ~ 40 年后，它已成为人们的常食作物之一，每天要被食用两次，而且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对马铃薯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由此看来，那种认为农民总是墨守成规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1710 ~ 1740 年间，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谷物消费量下降了10%，而在 1740 年以后，所出现的变化还要更大一些，此时谷物的消费量下降了近 30%，到 18 世纪初，谷物消费量下降到了 62.5%。

每英亩土地上马铃薯的产量是小麦的 10.5 倍，是裸麦的 9.6 倍。马铃薯较高的产量弥补了较低的含热量值，其热量值只有同等数量的小麦的 20% 和裸麦的 23%。一英亩的马铃薯所能供养的人口，分别是同样面积的小麦或裸麦供养人口的 2.1 倍和 2.3 倍，但它需要的肥料却是后两者的 3 倍

或更多。

在某些地方，被马铃薯取代的不是粮食而是豆类作物。人们的消费也是如此，马铃薯不仅取代了谷物，而且取代了豆类、豌豆和胡萝卜。中世纪时期，流行的菜类包括豆类、甘蓝、芜菁（即胡萝卜），一些种类的香草以及某些肉类。后来，马铃薯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品种的蔬菜。

根据史料记载，水稻在17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首次大规模种植。18世纪，尤其是1730年以后，大量的水稻从美洲运抵欧洲。在经历了瘟疫和饥馑肆虐的1630年以后，玉米开始成为意大利人的主要食品。17世纪下半叶，随着玉米种植的扩大，它在葡萄牙人食谱中的地位也有了引人注目的提高。到18世纪中期为止，玉米在西班牙的粮食种植业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在低地国家及德国西部，荞麦的种【78】植可能也有了快速发展。

由于玉米和荞麦的消费主体通常是社会中的贫困阶层，因而我们可以推测，在谷物价格上升阶段，对玉米和荞麦一类粮食的消费会有所增加，正如16世纪以及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情况一样。谷物价格上升造成了对最廉价商品的最大程度的需求，这样最廉价商品的价格同样也会出现最大幅度的上涨。18世纪下半叶，在少数欧洲国家出现的马铃薯消费量的上升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爱尔兰，引进马铃薯的时间更早一些，当时谷物价格较低。这里的农民种植马铃薯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当经济形势变得对他们不利时，农民们往往会将其拥有的谷物出售以降低家庭中的消费支出。17世纪，其他国家中的农民则可以通过种植和食用荞麦、玉米较为有效地降低家庭生活费用的支出。

6. 收益率

要提高谷物的产量，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种植的集约化程度，而且可以通过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在对以往农产品产量的研究过程中，对有关资料中数据的解释，常常由于难以用现代的计量单位来表示作物的收成状况而使问题复杂化。除了各个地区的计量单位和方法有很大不同外，在将过去的计量单位转换成现代计量单位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困难。这些难题可以通过用播种量来表示收获量的方法加以解决。换句话说，就是引进收益率的概念，这与以前使用的计算收获量的方法相一致。有关资料表明，谷物产量通常是种子的4~5倍。之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反映收获量，是因为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种子和谷物的数量是比土地面积更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排除使用其他方法来计量农业生产率。在法国，对农业收成的绝对量和什一税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什一税的登记者对总产量和什一税都有认真的记录。然而，使用这些数据却很难进行国际间或区域间的对比。不仅如此，在很多地方，什一税并不总是总产量的1/10；在以总收获量为基础进行计算时，不同品种谷物的种植面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理所当然地认定是固定不变的。①

【79】

近年来，人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公布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在波兰、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对收益率的问题研究更多。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有关东欧和中欧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然而就欧洲其他地区而言，可以获得的资料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无论是按照年代次序，还是按照地理分布，都是如此。这样一来，在对这些数据进行解释时，就需要格外的细心。在超过27 000个收益率数据中，有24 400个是有关4种基本作物的，它们是小麦、裸麦、大麦和燕麦。有8 900个收益率数据属于中世纪时期，这样反映1500~1820年间的数据还剩下15 500个。

小麦、裸麦和大麦在所有国家中均表现出了相同的发展进程，然而燕麦常常生长在贫瘠、潮湿的土壤上，其产量也较低。燕麦的发展模式与其他三种作物的发展模式有一些区别。通常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舍弃燕麦而只考察小麦、裸麦和大麦这三种作物的平均收益率。反映三种谷物的收益率的数据为12 080个。对收益率的一般性研究表明，18世纪末在欧洲4个生产区域内的平均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4个区域是：温和的北海沿岸地区（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南欧和西欧地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中欧和北欧地区（德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东欧地区（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情况。西西里的收益率在1650~1699年间就曾经达到过很高的水平；德国反映收益率的数据，也由于1700年以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较高的收益率而有所膨胀；另外，瑞士和莱茵河西部地区的模范农场，与东弗里斯兰（德意志）的较高的农业发展水平，也使1800~1820年间中欧的平均收益水平有所提高。同时，我们也掌握有一些低水平收益率，包括朗格多克（1550~1599年）、丹麦和瑞典（1600~

① 对通过什一税计算收获量所面临的困难的讨论，参见A. L. Head-Koening和B. Veyrassat-Herren的文章“La production agricole du plateau suisse aux XVIIᵉ et XVIIIᵉ siècles”，Schweizer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xx（1970）。

1649 年）以及 1800 年以后的俄罗斯。

当剔除这些因受特殊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过高或过低的收益率指标以后，我们手中的数据只剩下了 9 586 个。表 7 反映的是在上述 4 个区域中，以每 50 年为一个时间段的三种作物（小麦、裸麦和大麦）总的平均收益率。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欧洲，收益率存在着由西到东递减的趋势。西欧的收益率一直要比中欧和东欧好一些。我们还发现，1750 年以后，各地的指标均有所提高，增加的幅度从西欧的 10% 到东欧的 25% ~30% 不等。在整个考察阶段内，第二区域的收益率始终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这是因为法国的产出水平在 1500 ~ 1800 年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从表中可以发现，[80] 1600 ~1749 年间的收益率总体上是下降的，但这种下降在西欧和中欧并不十分显著（大致在 8% ~9% 之间），而在东欧地区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达 19%）。我们还发现，除匈牙利外，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收益率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同时，大麦和燕麦收益率的下降幅度要比小麦和裸麦的下降幅度大得多。

表 7　小麦、裸麦和大麦共同的平均收益率（1500 ~ 1820 年）

阶段	区域 I		区域 II		区域 III		区域 IV	
	N	YR	N	YR	N	YR	N	YR
1500 ~ 1549	15	7.4	16	6.7	32	4.0	36	3.9
1550 ~ 1599	17	7.3	—	—	87	4.4	1 531	4.3
1600 ~ 1649	55	6.7	—	—	142	4.5	823	4.0
1650 ~ 1699	25	9.3	12	6.2	120	4.1	1 112	3.8
1700 ~ 1749	—	—	125	6.3	32	4.1	820	3.5
1750 ~ 1799	506	10.1	181	7.0	578	5.1	2 777	4.7
1800 ~ 1820	157	11.1	192	6.2	195	5.4	—	—

注：1. 区域 I：英格兰、低地国家；区域 II：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区域 III：德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区域 IV：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2. N 为产量；YR 为收益率。

1500 ~ 1820 年间收益率提高最明显的地区是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在佛兰德斯、布拉班特、荷兰、西兰和弗里斯兰等地，出现这一局面并不奇怪，因为自中世纪以来，它们一直保持着改进农业生产水平的传统。如果近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并不否认农业发展中出现过这样一种突发性增长的话，那么在英格兰出现的收益率的巨幅提高便意味着一场农业革命。在英格兰尚处于

“学徒身份”时期（1603～1763年），它们从低地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验。以此为基础，英国的农民在18世纪一直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农业体系。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收益率指标明确阐明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17世纪，小麦、裸麦和大麦三种作物放在一起的平均收益率在这里为5.0，在德国其他地区则为4.0。1700年以后，差异明显扩大，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三种作物的收益率上升到6.7，而其他地区只有4.9。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已经完成了由种植业向可转换牧业的大规模转变。

生产的增长不仅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耕作制度，而且还可以通过播种机的使用来实现。早在中世纪时期或许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但直到1800 [81] 年以后，它才普及开来。还有一种方法也能产生相同效果，即改变冬季作物的早秋播种，当然这要冒霜害的风险。19世纪初，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东弗里斯兰的收益率从10.0上升到了11.0。

在不同国家中，收益率的普遍性增长都不是突然出现的。相反，它们是在由个别的农民所创造的零星进步的基础上，经过积累和扩散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后来的众多的人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模仿少数前人的创新活动。只有当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种植业之后，收益率才能提高。投资的方式包括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施用更多的肥料、使用更好的农具和更多的畜力、采用更合理的作物轮作制度等等。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企业家精神，其次是施肥。在较高的收益率和更多的施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那些具有较高产量、能够大量施肥以及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农场，一般只出现于人口稠密的地区，并且是谷物价格较高的时期。经济因素决定了农场或特定区域内的农民们是否会去追求较高的收益率。资料显示，早在14世纪和15世纪时，收益率就有可能达到了非同寻常的水平，即使在1800年后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也承认这一点。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14世纪以来，收益率超过10.0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可以认定，收益率水平没有提高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能力，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利于提高收益率。

在13世纪的英格兰、16世纪的英格兰和低地国家、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英格兰以及18世纪的德意志各国中，均出现过收益率与人口数量同步增长的现象。然而，一旦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时，我们发现无论是人口

数量还是收益率方面的数据都是匮乏的。

收益率的下降不仅出现在1600～1749年间，正如我们已知道的，它在中世纪这个更早的时间就出现了（主要指1300～1349年间以及1400～1499年间）。收益率下降的时期同时也是农业衰退时期。一般来说，收益率的波动反映了收益率与谷物价格长期运动趋势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里，正如我们所预料到的，二者之间呈现正的而不是负的相关关系。我们已经把谷物价格在长期内的上升和下降的波动，解释为主要是由人口和货币因素造成的。【82】

7. 谷物的生产和消费

对这一时期的土地使用状况尚没有国家统计资料。我们所掌握的是乔治国王（Gregory King）于17世纪末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估算，以及维赞斯基（Wyczański）对16世纪下半叶波兰谷物的生产和消费的计算。按照乔治国王所做的推测，英格兰的土地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耕地900万英亩、休耕地200万英亩、草地和牧场1 200万英亩、林地及公共土地600万英亩。他还估算出每英亩耕地的谷物产量为11蒲式耳，英格兰所有耕地的年均总产量为7 000蒲式耳，约为178万吨。然而，若按照他所估算的平均亩产量来看，当时的谷物总产量只需要640万英亩的耕地便可以生产出来。这个数字刚好是当时除谷物以外的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然而，耕地和休耕地之间的实际比例，可能比他的估算更为不利。但是由于二步轮作制的深化及园内—园外耕地制度的建立，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因此，我们认为有1/3的土地休耕是合理的。对乔治国王的推测做以上修正，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土地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种植谷物的耕地为640万英亩、休耕地370万英亩、种植其他作物的耕地为90万英亩、可耕地和休耕地的总面积为1 100万英亩。

借助于乔治国王所做的有关土地使用状况的指标，我们可以发现谷物生产与消费的平均水平，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仅仅是一个大概测算而已。假定17世纪末英格兰谷物的年均总产量为178万吨，收益率平均值为7.5，那么每年大约有1/7的产量（约25万吨）要留出作为来年的种子。

消费总水平可以通过人口总数乘以平均每人的谷物消费量计算出来。海雷尼尔（Helleiner）在其文章中引用的数据是，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520万人（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69页）。很遗憾，

我们对人均消费量尚没有准确的数据。在政府统计中，有关人均谷物消费水平的记录差异很大，最少的仅有 118.5 千克，而最多的达 520 千克【83】（见表 8）。

表 8　人均谷物消费量（从 15 世纪到 18 世纪末）

地　区	时　期	每年谷物消费量（千克）
安特卫普	15 世纪和 16 世纪	200
朗格多克	1480 年以前	392
帕多瓦	1554～1555 年	236～253
海茨姆（Hitsum），佛兰德斯	1569～1573 年	153～191
朗格多克	1580～1590 年	490
巴利·阿多刹德（Valladolid）	16 世纪	158
汉诺威	1750 年	240
斯考姆堡—利浦（Schaumburg-Lippe）	1772 年	243
荷兰	1798 年	118.5
尼尔奥尔良	18 世纪	200～300，大多数为 250
勃艮第	18 世纪	520
法兰西	1700 年以前	212～240
	1750～1760 年	220～275
	1775～1780 年	235～275
	1789～1790 年	216～275
东普鲁士	1750～1800 年	460（12 岁以上）
万德莱肯（Wandlacken，德国）	1758 年	320（12 岁以上）
		160（12 岁以下）
普鲁士	18 世纪末	160
德意志	18 世纪末	250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有关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谷物消费量指标（如表 9 所示）。18 世纪的谷物消费明显呈现下降趋势，最有可能原因的是这一时期马铃薯消费量上升了。

表 9　　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人均小麦或裸麦消费量（1557～1791 年）　　单位：千克

时　期	小　麦	裸　麦	
1557～1601 年	260	243	
1648～1692 年	267	250	
1693 年	298	279	
（1694 年）	（344）	（322）	政府规定数量
1710 年	277	259	
1740 年	248	232	
（1758～1759 年）	（158）	（148）	军队消费量
1781 年	174	162	
1791 年	173	162	

注：人均消费的谷物数量，以小麦或裸麦表示（包括酿制啤酒的消费）。

因此，不同国家的谷物消费量呈现出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对其他产品的消费量。荷兰在 1798 年总人口已经达到828 532人，但谷物消费量数目不大。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他们消费了大量的乳酪、奶油、奶类、肉类、鱼和蛋。由于谷物的消费量高往往意味着食物结构不平衡，因而它自然而然地会同较低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估计英格兰人均每年消费的谷物量为 240 千克，我们可能犯了一个片面性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英格兰对[84]肉类的高消费量。这样说来，17 世纪末，英格兰人谷物的年均消费量可能为1 248 000吨。17 世纪初，英格兰的粮食产量还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1660 年以后，粮食开始出现盈余，到 18 世纪初，英格兰谷物每年的平均出口量已达35 000吨。

17 世纪末，英格兰的谷物平衡表如下：

消费	1 248 000 吨
种子	250 000 吨
出口	35 000 吨
饲料或工业用途	247 000 吨
总计	1 780 000 吨

在上述统计中，饲料和工业用途的谷物的有关指标只是分账记录。很明显，出口所占的比重很低，只有谷物总产量的 1.8%～2.1%。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出口量在各年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 4%。

虽然我们没有 18 世纪末英格兰谷物供给量的指标，也有可能对当时的

生产和消费问题进行评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迅速膨胀。到1800年，人口总数已达960万人。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人口的谷物消费总量为2 304 000吨，谷物的平均收益率也从1600～1699年间的7.5增长到了1750～1820年间的9.5。此时的总产量为17世纪末的2.5倍，达2 670 000吨。而这期间，留做种子的数量却没有多大变化。

消费量	2 304 000 吨
种子量	280 000 吨
饲料及工业用途	86 000 吨
总计	2 670 000 吨

对这些指标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可以发现，人口增长的速度比收益率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

时　间	人口指数	收益率指数
17世纪末	100	100
1800年	185	127

[85]

谷物的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已变得相当微小，通过改进耕作方法来增加产量的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增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我们知道这一时期，许多牧场都被改做了耕地，新的耕地也不断被开垦出来，然而这些耕地一般都比较贫瘠。以往的谷物出口国最后不得不依赖于粮食的进口。由此看来，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担心也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

我们现在掌握有16世纪下半叶波兰的谷物生产与消费的估算指标，这些指标与16世纪和17世纪对西欧国家的大规模出口有着重要的关系。表10显示出了每年的收获量。

表10　　　　波兰的谷物生产（1560～1570年）

谷物种类	扣除种子以后的年产量（单位：吨）	收益率	包括种子的年产量（单位：吨）
小麦	172 577	4.6	220 515
裸麦	597 424	4.0	796 564
大麦	140 595	4.8	177 595
燕麦	457 885	3.8	621 415
总计	1 368 481		1 816 089

从表中可以发现，波兰谷物的总产量比英格兰要高，而其人口则少得

多，虽然这些估算和对比随不同的作者差别很大。上述这些数据中大多数是从维赞斯基的研究中得到的。根据他所作的推算，当时“王冠领土”的总人口约为240万~260万人，人均谷物消费量为219千克。波兰的人口总量指标似乎被高估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其人均消费量为240千克。因而在维赞斯基的指标中，作为饲料及工业用途的谷物有大量过剩。同时波兰的出口量为74 600吨。这样，他所得出最终计算结果为：

表 11

消费	527 800 吨
种子	451 100 吨
出口	74 600 吨
饲料及工业用途	762 600 吨
合　计	1 816 100 吨

从在出口量中占首位的裸麦的有关指标中我们可以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以下数据以100吨为单位统计。【86】

表 12　　单位：吨，%

本国农产品消费量	414 900	52
城市人口消费量	112 900	14
出口*	74 600	9
种子	199 100	25
总计	801 500	100
波兰南部的进口	6 000	
波兰的产量	795 500	

* 在1560~1570年间，只有裸麦一种谷物出口。

波兰裸麦的总产量为187 500吨（112 900吨+74 600吨），占谷物总产量的23%，占裸麦净产量的（扣除种子数量以后的产量）31%。全部小麦及近半数的大麦都被波兰人自己消费掉了。

17世纪上半叶（1600~1649年），波兰的裸麦出口达到了高峰，其年均出口量达137 000吨。下半叶，裸麦出口量下降至111 600吨。出口量最多的年份是1619年，高达290 000吨。这里的数据指的是由波兰港口经丹麦海峡运送到阿姆斯特丹的数量。然而，出口量的增长是否是总产量提高的结果却令人怀疑。17世纪上半叶，波兰大麦的收益率确实略微有所提高，

然而小麦、裸麦和燕麦的收益率则出现了轻微的下降：

波兰的收益率

时　期	小麦	裸麦	大麦	燕麦
1550～1599年	4.7	4.0	4.8	3.7
1600～1649年	4.2	3.5	5.1	3.3

耕地的数量可能也增加了，然而这里也有一个消费习惯改变的问题。如果尼德兰人的经验对波兰人的消费习惯的转变具有某种示范作用的话，则裸麦出口的增加可能是因为波兰人更加愿意消费廉价谷物，尤其是适于在沙地上生长的荞麦。

假定17世纪上半叶裸麦的消费水平与16世纪下半叶一样，同时假定只有裸麦一种谷物出口（实际上，此时的出口总量中已包含有10%的小麦），【87】那么裸麦的出口量在谷物总产量及裸麦净产量中的比重为：

时　　期	在谷物总产量中的比重	在裸麦总产量中的比重	在裸麦净产量中的比重
16世纪末	4.1	9.3	12.3
1600～1649年平均值	7.6	17.1	22.8
1600～1649年最大值	15.9	36.2	48.1

从上述指标可以清楚看出，谷物的出口一定对波兰的市场关系和价格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生产的影响则可能更大一些。

如此规模的谷物运动不仅会对其生产地区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消费地区产生影响。比利时的历史学家估算了低地国家中的谷物消费，同时对1562～1569年间谷物进口的重要性进行了评估。按照他们的说法，低地国家中的人口数量应当为250万人。这一估算是偏低的，因为当时联合省仅仅北方的人口数量就已经达到120万～130万，而南方的人口密度还要大于北方。这样，低地国家每年的谷物消费量至少应为600 000吨（人均240千克），其中进口量为100 000吨。此阶段波兰的出口量，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见到的，只有74 000吨，这就是说低地国家还要从法国北部、德国北部、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阿尔萨斯进口部分谷物。低地国家的谷物总产量当时可能已达到500 000吨，这其中包括了种子、饲料及工业用途部分。这一地区谷物进口量占其总消费量的16.7%。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

如300千克，那么进口量将占到总消费量750 000吨的13.3%，此时国内生产一定大大超过650 000吨。

17世纪上半叶，北方各省的人口总量为170万人，年消费量约为408 000吨。每年从波罗的海一地的进口量就达137 000吨，但还不够，尚需从其他地方进口谷物。然而，由于有部分谷物的进口是为了再出口，因此很难准确计算出进口量在总消费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尽管如此，进口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在欧洲的大多数地区，较低的收获水平使将所有的耕地都种上谷物以便养活其人口成为必要。这一点可以从英格兰种植谷物的耕地数量在耕地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中得以反映。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收益率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与这个一般规律相悖的一个特例是低地国家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和北部），那里的收益率水平甚至比英格兰还要高。【88】

现有的有关英格兰、德国、法国北部及低地国家的单个农场的资料显示：耕地中的50%～70%甚至更多被用于种植谷物。然而，自中世纪后期以来，豆类在中欧及部分低地国家占据重要地位。对单个农场的考察有可能难以恰当地反映农业生产的全貌。我们所拥有的资料均来自于各农场的记录，而这些农场通常都是一些大型农场。大型农场一般可以为市场提供充足的产品。但是，在某些地方，规模较小的农场集中于种植那些需要更为集约化使用劳动力的作物。这意味着诸如亚麻、大麻、油菜、芥菜、用做染料的植物及酿酒原料的植物通常适合小型农场，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农场才能够提供其所需的集约化的劳动力。

8. 畜牧业

畜牧业生产力的提高既可以表现为产量的扩大，也可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改善，如更为健康的生长、宰杀时更大的重量、更优品种的奶类、更重的羊皮或更高质量的羊毛等。有关1800年以前所拥有的牲畜数量的资料是极少见的。按照格雷戈里·金的估算，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拥有牛450万头，羊110万只，猪200万头。这一数量大约位于目前拥有量的1/3～1/2之间。然而当时的人口数量仅为目前数量的1/8。

其他地区牲畜的数量指标见表11①。马与牛的比例通常为1:4或1:6。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存在。在拉茨堡（Ratzeburg）和香槟（Champaigne）

① 此处的“11”疑应为“13”。——译者注

的大主教领地，拥有更多的马，而在芬兰西部，马匹却较为罕见。猪的数量取决于当地森林的数量。1500～1800 年间，法国许多省份中猪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是由于森林的过度砍伐所造成的。当马铃薯成为一种新的猪饲料以后，猪的畜养量又上升了。随着沼泽地的清除，羊的数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少。

低质量的草地和牧场给牲畜数量的增加带来了诸多方面的限制。通常，人们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喂牛的饲料均为遍野生长的低质量的杂草和野草。由于缺乏有效的排水，牧场里经常泥泞不堪。为了防止过度放牧，农民们在[89]某一地块上放牧牲畜的数量通常会受到限制。

表 13　　16～19 世纪不同国家马、牛、猪和羊的数量

地　区	年　份	马	牛	猪	羊
上艾瑟尔 a (Overijsel)	1602	12 146	54 000	10 914	40 987
上艾瑟尔 b	1800～1844	11 992	72 683	19 531	32 921
拉茨堡	1630	4 254	3 116	3 859	2 625
勃艮第 c	1688	50 208	203 361	54 152	112 523
芬兰西部 c	1719	9 918	75 633	?	53 845
香槟 c	1732	153 666	213 480	96 845	713 015

注：a. 马的数量只统计两岁以上的马；同时包括蜜蜂6 346箱。
b. 马为 1844 年数据，牛为 1800 年数据，猪为 1812 年数据，羊为 1844 年数据。
c. 牛的数量：勃艮第60 293头，芬兰西部14 824头，香槟37 782头；羊的数量：勃艮第37 145只。

冬季里圈养牲畜所产生的粪肥数量与耕作过程中实际需要的肥料数量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通过不断的拓荒活动来持续增加耕地数量的话，则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土壤条件较好的土地来耕种，这会出现可供放牧的劣质土地逐渐减少的现象。从理论上说，随着拓荒活动的进行，牲畜的数量也应当按一定比例增加。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农作物对肥料的需求。然而，现实中，这种情况只能在依然拥有大面积荒废土地的地方或时期才会出现。历史上，早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起，德国和荷兰等地的一些管理组织就制定了法规条例，规定废地是用做种植业还是用作畜牧业。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像，从那时起，这些地区便存在着种植业从事者和畜牧业从事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通常，这种冲突只有通过种植饲料植物才能得以有效的解决。有些国家自 13 世纪开始，就已经采用了这种解决方法。

在种植业居支配地位的地方，牲畜的饲养处于次要地位。对从事种植业

的农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肥料的产出能力以及马和牛等牲畜能够提供多少牵引力。至于能够为市场或家庭消费而提供多少乳酪、奶油、奶类、肉食、皮张和羊毛等，对农民来说并不很重要。自 16 世纪起，就不断有是否在耕种农场保留更多的牲畜问题的争论，不少农业著作都反映了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在有关畜牧业的统计中通常会出现赤字，这是因为牲畜所产生的肥料的价值以及它们所提供的牵引力的价值，通常未被考虑进来。

在那些畜牧业占支配地位的地方，情况则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畜牧业：一类是粗放型的畜牧业，一般都拥有较大面积的牧场，主要生产皮张、肉食和羊毛；一类是集约化的畜牧业，在这里，更 【90】 加注重乳酪、奶油的生产，后来也开始重视奶类和羊毛的、羊肉的生产，有时也进行羊奶及乳酪的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牲畜被放在由大门、壕沟或天然的篱笆分割成的小块牧场上实行高密度的饲养。

起初，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粗放型的畜牧业，这些地方一般都饲养绵羊或山羊，而不是母牛。1300 年以前，西欧地区拓荒活动的两个重要结果，是耕地数量的增加以及人们将畜牧业的重点转移到了对马和牛的饲养上来。在西欧和南欧的某些地区，农业的发展趋势与当时的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直到 1500 年左右，粗放型的畜牧业仍在一些外围国家中得以保留。这些国家包括：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巴尔干国家和西班牙。这些覆盖西欧、南欧及其周边的国家可以被形容为以中欧为中心的边缘地区，或者按照冯·屠能的同心圆学说，它们属于外环，其农业的组织方式也最为粗放。

这些外围地区畜牧业的特点是“季节性迁徙”，即牛群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来回转移，有时甚至是长距离的转移。不仅如此，自 15 世纪以来，牛群还从这些外围地区不断地向中心的消费地区转移。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在 16 世纪下半叶和 17 世纪上半叶，达到了最高峰。但从那以后，迁移数量开始迅速下降。牛群的主要迁移路线包括：从苏格兰和威尔士到英格兰中部；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Schleswig Holstein）、日德兰半岛、丹麦群岛和斯凯恩（Skåne）到德国汉萨（Hansa）各城市、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荷兰；从瑞德（Ribe，日德兰半岛）装船运抵荷兰、匈牙利、巴尔干各国；从波兰到德国的南部和中部等。

在被出售以前，牲畜通常都要在靠近市场的地方饲养一段时间，通过增加额外的饲料以使在长途旅行中损失的体重得以补偿。日德兰半岛的牛的贸易，向人们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商业活动的重要性。17 世纪初，日德兰半岛

每年出口的牛的总价值为30 000千克白银。把这个数字与每年通过丹麦海峡运往西欧的谷物的价值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其重要性，后者的价值为白银55 000千克。

只要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远距离的牛的贸易就有利可图。长途旅行总是充满着风险，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通[91]常，牛的体重会下降，在沿途还必须做好各项复杂的保障工作，在许多地方还要支付“买路钱”。因此，这种远距离的牛的贸易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的存在必须是环境极为有利才可以。

在所有需要在扩大畜牧业生产和增加更多的耕地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地方（例如在冯·屠能所说的同心圆的中心地带），畜牧业生产的扩大不仅可以通过从外面进口更多的牛来实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出栏时的体重、从羊的身上生产更多的羊毛以及增加奶的产量等多种方式来实现。通过宰杀年幼的牲畜，也可以增加肉类的产量。

从现有的资料中尚不能肯定1500～1800年间的畜牧业生产是否真的有所提高。虽然我们现在已掌握有关奶牛、小牛、公牛、猪和羊的存栏及出栏时的体重、奶牛的牛奶及奶油的产量（包括日常的和整个哺乳期的）以及羊皮的重量等资料，然而，这些变化的数据往往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其地域分布也极为分散。

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奶牛的平均存栏重量在225～325千克之间，公牛则在300～400千克之间。在每个哺乳期，奶的产量从600～1 100升不等。羊皮的重量在0.6～0.8千克之间；猪的存栏重量在50～60千克之间变动，而羊存栏重量的变动范围在20～30千克之间。

从总体上看，肉类消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估算，中世纪末期，德国消费了大量的肉食，其人均消费量甚至大大高于18世纪的水平。肉食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从家庭预算中扣除面包和谷物之后的剩余，这也意味着与对肉食的消费相比，对面包和谷物的消费更为稳定。人们所消费的肉食的种类也发生了一定变化。15世纪、16世纪，人们比较偏爱牛肉；后来，在18世纪、19世纪时，猪肉变得日益普遍。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可以用马铃薯来喂猪，猪肉也由此变得较为廉价。18世纪，羊肉开始成为英格兰国民普遍食用的商品，这是集中生产肉食而非羊毛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这只是（且至今仍然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

人们不仅通过增加牲畜的数量或体重，而且还通过宰杀更为年幼的牲畜来满足对肉类的需求。牲畜的平均寿命开始迅速下降，这一趋势是极为显著

的。例如在斯凯兹菲尔德（Schmatzfeld，哈茨），1750 年时寿命超过 5 岁的牛有 24 头，到 1760 年时只剩下了 9 头，而到 1770 年时，则没有 1 头牛的寿命超过 5 年。1740 年时，尚有寿命超过 3 年的母猪，到 1750 年，则不存 [92] 在这样的母猪了。1750 年以前，农场中奶牛的最长寿命达 16 年。在立陶宛（Liesheim，东普鲁士）的一个大型农场中，1740 年时，马的年龄从 3 岁到 20 岁不等。在每 12 匹马中，有 8 匹马的寿命在 13 岁或者更大。在同一地区的巴基斯坦的母牛寿命也在 3 岁到 12 岁之间，在 177 头牛中，寿命在 10 岁以及 10 岁以上的占 67 头。那时，奶牛首次生产小牛的年龄也是很晚的。在沃尼格鲁德（Wernigerode），16 世纪时，6 岁、7 岁甚至 8 岁的牲畜仍像 4 岁的羊或 3 岁的猪一样被视为幼畜。

18 世纪中，英格兰的部分牲畜饲养者如罗伯特·巴克维尔（Robert Bakewell）、托马斯·格斯雷（Thomas Gresley）爵士、维斯特（Wester）、弗勒（Fowler）、库雷（Culley）兄弟、考灵（Colling）兄弟及其他一些人士，采用了新的饲养方法。然而，当时这些新的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直到 19 世纪新方法才被普遍采用，因为这时人们对牲畜的需求已经完全发生改变。最初，人们养羊是为了获取羊毛和粪肥，养牛则是为了利用它的强大的牵引力，养猪是因为它有较重的头部和强壮的前肢，这几种牲畜都可以自己在树林中寻觅食物。为了增加猪的可利用部分的重量，人们开始注重通过饲养促使其后半部多多长肉，以增加重量。在过去的 200 年间，人们在增加可食用的肉类的重量而不是增加总的重量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牲畜的皮变得更薄了，骨骼也变得更轻了。

马、公牛有时甚至是母牛所具备的牵引力和工作效率使其常常被作为动力使用，这一点在 1500～1800 年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期间，一匹马能够拉动大约为 200～300 千克的货物。人们能够犁和耙的耕地数量也取决于作为牵引力的牛的行进速度，1500～1800 年间，仍然是这样。这就是说，在使用畜力牵引的地方，要想缩短工作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用马来取代牛可以加快耕作进程，然而养马的成本要比养牛的成本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只有在那些天气变化无常，以及耕作可以在条件适宜时用较短的时间便可以完成的地方，使用马来耕种才是经济的。当然，在某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地方，农场里也会存在着过剩的马匹，例如，在低地国家、丹麦、德国北部和阿尔萨斯。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地方饲养牲畜是为了贩卖，这些马 [93] 匹很可能为农场自用，可能是用于运输粪肥。

9. 施肥

虽然肥料的生产对种植业极其重要，然而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却很难找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发现了一些真实可靠的信息，包括1740～1825年间在奥斯坦（Ostra）领地上（萨克森），以及1772～1870年间在白斯道弗（Bersdorf，属西里西亚）的肥料生产情况。在奥斯坦，1740年时，每头成年牲畜年产粪肥5 900千克。到1760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8 800千克。在白斯道弗，1772～1774年间，每头成年牲畜年产粪肥4 025千克。18世纪末，若一头成年牲畜年产粪肥3 000～4 000千克，在德国和瑞典则会被认为是正常的。这一数字指的是冬季圈养期间内（大约为120天）所产生的数量。若全年都实行圈养的话，则正如我们在奥斯坦、白斯道弗和瑞士所发现的那样，每年牲畜肥料的产量将达10 000千克。当饲料作物开始种植以后，圈舍通常在全年都使用。但是，一直存在着这种现象，即每当粪量增加时，几乎总要伴随着耕地的扩张。然而，这种扩张是以牺牲牧场的发展为代价的，因为这时需要的牲畜减少了。被保留下来的草地需要特别的施肥，而在以前，这一工作一般是由牛在放养时完成的。因此，从总体上看，单位面积耕地的施肥量较以前是否有所增加尚是不确定的。全年均实行圈养的优点在于，耕地的总量可以扩大。

施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重度施肥，即每英亩耕地施肥量达28 000～36 000千克。在阿图瓦（Artois，1336～1337年）、海特姆（Hitsum，1570年以前属弗里斯兰）、巴列丁奈特（1800年以前）、维艾尼（Vianen）、斯提维克（Steenwijk）、艾登（Etten）和豪登（Houten，1800年以前属尼德兰）均采用过这种方法。另一种为轻度施肥，每英亩的施肥量在8 000～15 200千克之间。18世纪的瑞士、西里西亚、哈茨以及靠近里尔（Lille，法国）附近的农场中所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不同的施肥量取决于收成的频度：轻度施肥适用于2茬收成，而重度施肥通常可以连续维持6茬作物。这意味着实行两步轮作制的施肥方式，平均每块耕地12年才需施肥一次。在哈维尔，可以见到这样的耕作方式和施肥方式的实例。通常，对平均每英亩土地的某种作物来说，所需肥料的总量在4 000～5 600千克之间，这里没有考虑所采用的是重度还是轻度的施肥方法。

在不种植饲料作物的地方，夏季和冬季中饲养一头成年奶牛所需要的草的数量，约为2.5～3.75英亩草地的产草量。为了给7.5英亩的耕地（每年

实际的耕种数量为5英亩）提供足够的肥料，需要6头牛及15~22.5英亩的草地。耕地与草场面积之间的这一比例，与16世纪中瑞恩克·海迈莫（Rienck Hemmema）的弗里斯兰人的（Frisian）农场所报导的粪料实际分配情况相符合。这里有耕地21英亩、草场42英亩、牲畜14~16头。由于采用的是高度集约化的生产制度，即每年只有1/7~1/6的土地休耕，这家农场需要21头牛来提供肥料。因此，这里的农场主不得不从附近的城镇弗兰克（Franeker）购买相当数量的肥料。如果农场主采用的是三步轮作制，则17头牛便可以满足对肥料的需要。购买额外的肥料可以确保他采用更为集约化的耕种制度。【94】

17世纪初期，英国农场主罗伯特·劳德（Robert Loder）在牛津附近的哈维尔拥有的农场中的数据，证明了施肥量和谷物产量之间有联系。在若干年间，这一农场东部地区的施肥强度一直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小麦的平均收益率为15.5，大麦为8.0。同一时期的西部地区平均收益率则要低得多，小麦仅为7.8，大麦为5.8。几年以后，劳德决定在西部地区实施与东部地区同样数量的肥料，其结果是西部地区的收益率显著提高，小麦的收益率上升到14.1，大麦上升到7.9，东西部两块土地的收益率基本持平。这一实例对施肥的重要性的说明可谓再清楚不过了。

重度施肥也存在负面作用，虽然与正面作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这种施肥方式有加快作物退化进程的风险。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在谷物的轮作过程中必须加入油料作物的种植。18世纪末，人们就开始采用这种轮作方法。

为提高产量而购买更多肥料的行为，只有在粮食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才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一些工业用作物如亚麻、啤酒花及烟草等被农民耕作以作为替代廉价粮食作物的优先选择。这些替代品也需要实施重度施肥。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将肥料施到工业用作物上而使粮食作物得不到有效的施肥，还是将肥料出售给那些愿意出高价钱的其他农民，对农民来说都是有诱惑力的。

出售肥料确实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17世纪、18世纪期间，政府和土地所有者经常为由于工业用作物的大量种植及其对肥料的大量需求，而对谷物的生产造成威胁而担忧。限制肥料买卖和出口的相关法令相继出台，尤其是限制与外国人发生买卖关系。以低地国家为例，它们制定法规，禁止向其他省份运输某些肥料，如在烟草种植中必不可少的鸽子的粪便。施肥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下降，很可能是1600~1750年间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出现的收益率轻微下降的原因之一。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充分证据的。【95】

10. 农具

通常，人们使用工具是为了节省劳动力。然而，与北美的情况有所不同，劳动力的短缺历来不是欧洲的主要问题，虽然它是一个长期困扰北美的难题。欧洲农场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它们所面临的通常是劳动力的富余而不是短缺。实际上，在广大乡村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隐性失业者，有时他们会被家庭手工业所吸收。农民们一般不会将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劳动计入成本，当生产力水平很低时，他们只有通过更勤奋的劳动，或通过种植需要更为集约化使用劳动力的作物，来设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

个人生产力水平较低、收成少、牲畜瘦弱以及奶产量不高等，都阻碍了欧洲农业发生更大的进步。旨在提高产出水平的措施包括加深犁地厚度、改进播种及脱粒技术等等。当生产实现了较大的增长之后，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即传统的脱粒方法无法满足提高了的收成水平。当奶类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后，也会出现相似的问题，即农夫的妻子和女儿无法将所有的鲜奶都制成乳酪和奶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使用脱粒机械和改进了的奶油搅拌器。

在许多欧洲国家中，由于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及各块土地采用的耕作制度不同，阻碍了对新型农机具的使用。18 世纪、19 世纪，绝大多数的农具只用于谷物的栽培。这种单一谷物的栽培常常因为作物品种的种植而中断，包括饲料作物、豆类、马铃薯及其他不断增加的其他谷物品种。早期的农机具只能用于开阔、平坦、各个地块紧密相连的地方，且这些耕地或多或少远离石块。在西欧国家中，农场规模较小、土壤类型不同、地形不便利及作物品种不良等都阻碍了这些机械的使用。

直到 1800 年，在农业耕作中才出现了机械动力。在此之前，只有人力和畜力，其中又以马和牛为主。水车和风车应用的历史较为悠久，然而，它们一般只用于排水和制造农产品。对种植业而言，确实需要能够灵活转动的机械，而这一要求是通过蒸汽动力和拖拉机的方式来达到的。在长距离运输方面，还没有这样的动力。因此，1800 年以前，农业中可获得的动力可以从当地劳动力的人数及牲畜的载重量直接反映出来。当然，劳动者数量的增【96】加并不总是带来产出水平的同步增长。农场中耕地的数量与劳动者的人数密切相关，特别是对那些小农场而言，要在耕地数量和人口数量之间达到这一理想的平衡特别困难。除此之外，在农场中还存在着少量甚至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的人，如病人、老年人和弱智人等。有时，农场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可能会多得令人吃惊。

一般来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必然会影响到农民对改进的或新兴的农机具的购买行为。然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尚未就什么情况下更有助于农民购买新的农机具的问题达成共识。按照西曼德和巴布劳特（Bublot）的观点，农民们会在农业衰退阶段采取这一步骤。与之相对立，堪卓泰夫（Kondratieff）和穆尼埃（Mousnier）确信农民们会在农业扩张阶段采用新的发明。按照前一种观点，由于（衰退期间——译者注）较低的农产品价格和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迫使农民要千方百计地降低其生产成本。而在后一种情况（扩张时期——译者注）下，农民们将较高的价格视为赚取高额利润的基本途径（尽管这可能并不正确，因为他的成本同样有可能提高）。在缺乏完善的会计制度的情况下，农民们会将高价格与高利润等同起来，并且会尽力通过购买新的工具来增加其收益，因为在农业扩张阶段，农民会把更多的资金转化为创新活动。此时，利润大幅度上升，而实际工资相对较低。作为一条规律，租金的上升并不会有价格上升那么高。

从总体上看，现有的资料更倾向于农民们会在农业扩张阶段采用新发明的观点。从许多农业发明出现的时间来看，也大多出现在农业扩张阶段。这再一次证明，农民们采用新的农机具的目的不是为了节省劳动力，而是为了增加产出。一般情况下，劳动力总是充足的。

由于数据稀缺和不完整，人们难以计算出通过使用新制造的和改进的农机具节省了多少劳动力。例如，脱粒的数量有时以蒲式耳/天计算，但并没有说明这是何种谷物。实际上，小麦、大麦或裸麦的脱粒速度会有很大的差异。还有一个问题是工作日的持续时间。在中世纪时期英国的有关资料中，“工作时间”通过工作日来计算，然而，它很可能只是一天当中的一部分，即从日出到中午。但在另外一些资料中，一天则意味着从日出到日落的全过程。

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在工作时间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人和牲畜的潜在动力也没有大的提高。1750 年马或牛的牵引速度不比 1250 年更快。在 17 世纪的哈维尔（瑞士）和不伦瑞克，每个农民一天可以犁地 0.9 ~1.2 英亩。在英格兰，同样的时间内，用牛可以犁 1 英亩，用马则可犁 1.25 ~1.5 英亩。在 18 世纪的俄罗斯，由 4 匹马牵引耕地，每天可以犁 2.5 英亩，用一匹马则每天可以完成 1.25 英亩。18 世纪，英格兰农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改进，人们发明出了更轻便的诺福克犁，它每天可以完成 1.5 ~2 【97】

英亩。由于工作日较长，随着耕作时节的推进，作为牵引动力的牲畜也变得日益虚弱。在耕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头牛每天可以轻松地犁地1英亩，然而2周或3周以后，其工作效率便下降到了0.5英亩。

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2匹马每天可以犁地2.5英亩。然而，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则需要4匹马才能够完成相同的工作量。18世纪，在已经开始使用镰刀的诺福克，要完成1英亩小麦的收割、捆扎和堆垛，仍然需要1.4~2个劳动力。在德国东部，一个劳动力使用小镰刀可以收割0.3~0.6英亩的小麦（每英亩约合1.7~3.3个人工）；使用大镰刀，则可以收割0.9~1.25英亩（每英亩合0.8~1.1个人工）。在俄罗斯，两名农民每天可以收割1英亩的裸麦或2.5英亩的大麦或燕麦。通常，当3名劳动力收割30英亩的土地时，2周的时间只勉强够用。在没有雇工的普通农场中，很少使用3个以上的成年劳动力从事收割工作。对家庭农场而言，谷物播种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收获季节里家庭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

1613年，哈维尔的罗伯特·劳德的农场上，在使用脱粒机的情况下，每名工人可以脱粒3.5蒲式耳的小麦和10.5蒲式耳的大麦。对经营规模较小的农场主而言，脱粒在冬季里作业，但对大农场而言，这是一项高成本的工作，因为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如果使用畜力而不是用连枷来脱粒谷物，则可以处理更大数量的谷物。当使用3匹马时，每天可以脱粒23.4~30蒲式耳，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谷物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在18世纪末的法国，借助于脱粒机，每天可以处理小麦13.75~26.5蒲式耳。尽管这种机器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与以前使用连枷进行脱粒所需的时间相比，它所需要的时间仅为以前的1/4~1/8。在俄罗斯，2名工人每天可以割干草1 920~2 880千克。

农机具通常用木头制作（因为当时铁较贵），只有关键部位才使用铁制作或以铁皮包覆。以发明于17世纪的牛奶搅拌器为例，它们通常都装备有较为复杂的木制齿轮，且在高质量的铁可以被廉价生产出来之前，牛奶搅拌器及其他农机具在设计方面不可能有较大的改进。从这一角度来说，农业的进步完全依赖于冶金工业的发展。【98】

通过比较农场全部财产的清单，可以发现农机具所占的比例是极低的。从现有的有限资料中可以看到，17世纪期间农具所占比例从未超过3%~4%。从苏塞克斯（Sussex）的一些农场中的数据可以发现，这一状况在18世纪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农机具的价值在全部财产中的比重上升到了9%。

在16世纪的农业扩张阶段，有关农业的发明、试验和改进都极为活跃。

许多新型的播种设备出现了，使得人们能够用播种机播种，因此使用较少的种子就可以保证相同的收成水平。农作物通常种植得非常紧凑，这是控制杂草繁茂生长的惟一有效方法，播种稀少容易导致杂草丛生。在以马牵引的锄头于18世纪被发明之前，人们还无法有效地铲除垄沟间的杂草。凯梅劳·泰若尔（Camillo Tarello）、泰迪欧·加瓦里尼（Tadeo Cavalini）、约瑟夫·鲁克泰里（Joseph Locatelli）和约翰·沃里极（John Worlidge）等人的设计，对以后的播种机的发明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设计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应用于实践。

17世纪以及18世纪初的农业衰退的出现，极不利于培养能够促进农机具发明和改进的企业家精神。带有小支脚的犁，取代了自13世纪起便在英格兰及14世纪起在西兰使用的带轮子的犁。在有些地方，则可以同时发现两种犁——带支脚的犁和带轮子的犁。在长时间的耕作过程中，农民们更喜欢带支脚的犁，因为它比较轻，而且所需要的马或牛较少。在16世纪的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单轮犁取代了带支脚的犁。带有凹面犁铧的铸铁犁的出现是另一项重要的进步。这种犁几乎不需要牵引力，却可以将地表的土壤完全翻过来并加以粉碎。有证据表明，18世纪在奥地利属尼德兰曾经使用过这种犁。这种“布拉班特犁”，被视为目前在英格兰和美国颇受欢迎的现代犁的原型。

在荷兰和弗里斯兰，各式各样的牛奶搅拌器被发明出来，乳酪挤压机也已广泛使用，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牛奶产量增加的结果。在牛奶的脱脂过程中，瓷器和铜器取代了早期的木制容器。

荷兰人从中国引进了脱粒设备，随后这一设备就传遍了整个欧洲并有效地提高了谷物和谷壳的分离水平。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为人所知的畜力脱粒机（由马牵引，其圆锥形的卷筒围绕轴心旋转），到16世纪时在意大利已广为使用，进入18世纪则传播到了更为广泛的地区：西兰岛（Seeland，属丹麦）、瑞典、尼德兰北部、法国南部和奥地利。 【99】

1750年后的农业扩张，制造出了许多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的创新。然而，像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这些创新直到19世纪才被广为使用。

11. 精神面貌和知识方面的进步

很明显，新的农业方法和技术设备吸引了那些比普通人更具有进取意识的农民的注意力。这部分农民会比其他农民收获更多的谷物、牛奶和肉类。

在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进行生产时，他们必然要考虑收支平衡。在安排生产计划时，他们已经将农产品的价格比率以及影响这些价格比率的变动因素考虑进来。合理的预期收益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这样的农场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少了家长制的特征而多了商业化的色彩。在丰收季节，他们雇佣以天计费的劳动工。因为他们想要节约工资开支，他们的人事经常发生变动。

从账簿、私人日记和报告中（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生产分析时的主要资料来源），我们发现这种革新思想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例如，在阿图瓦、弗里斯兰（16世纪、17世纪）的瑞恩克·海迈莫（Hemmema，Rienck）和迪克·杰兹（Dirck Jansz），英格兰（17世纪）的罗伯特·劳德等都是具有这种创新思想的农民。他们一般都是受过较多教育的有文化的农民。海迈莫就曾在卢万大学学习过数年，而他的弟弟则是一位研究罗马法的著名学者。

实践中，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农民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从这种技术进步中受益呢？在对市场条件变化的适应性方面，不同的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时，土壤或气候条件会抑制农民的创新精神，有时农场坐落的位置及耕地的分布状况等因素影响农民的创新。坐落于城市附近或交通便利地方的农场上的农民，会较为容易地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偏远地区的农民则相对要慢一些。小型农场比大型农场拥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因为前者在建筑物和农具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由私人所拥有的农场，也要比租赁经营的农场能更容易适应市场的变化。在租赁经营的农场上，由于在改变耕作方式或种植品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限制，从而阻碍了一般发展进程。

【100】因此，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并不仅仅是农民的态度问题，许多因素是农民所无法控制的。例如，单个人不可能将旷田变成圈地；由此，最低限度的乡村社团的团结是极为必要的。有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农民的生产规划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由谷物作物向牧场、葡萄园或工业用作物种植的转变（或相反方向的转变）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已经有所考虑。然而，除了长期趋势以外，还存在着每年都出现的价格波动。那些生产计划受这种年波动影响的农民，对其主要销售市场上各种条件的变化是极为敏感的。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他们常常会依据前一年度的农产品价格比率。在两位弗里斯兰的农民瑞恩克·海迈莫和迪克·杰兹的账目中，清楚地说明了其生产计划编制的原则，即根据各种作物不同的价格来安排各个不同地块上的种植品种。瑞恩克·海迈莫

的有关 1569 ~ 1570 年度到 1572 ~ 1573 年度间收成情况的账目中，就记载着他曾依据前一年的价格比率来调整本年度大麦、小麦、燕麦和豆类的种植数量。海迈莫的做法一点没错，因为那时，谷物价格波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曾有一段时期，裸麦的价格非常高，海迈莫出售了全部的裸麦存货。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种植裸麦，这些存货都是他买进来供仆人们食用的。

迪克·杰兹的 1601 ~ 1608 年间的有关账目也得以保存下来，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是根据小麦、燕麦和豌豆价格的波动来决定各类农作物的种植数量。而罗伯特·劳德只向市场提供大麦和小麦，因而他随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整和活动的空间相对较少。即便如此，他的账目，也为我们提供了依据市场价格的波动来确定种植数量的证明。

这些农民身上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征和以收益最大化为动机的精神，还可以从他们与仆人之间更为合理化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毫无疑问，这里面已经不再有保护主义的、家长制的作风。然而，虽然农民的商业化行为日益增加，他们也并不总是高效的，他们同样会遇到阻碍其农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各种难题。雇工的生活条件极差，在瑞恩克·海迈莫的例子中尤为如此，那里的工资水平相当低。不堪忍受的工作条件迫使工人不断地离开这里，海迈莫不得不在每年的 5 月去招募新的农业工人和女工。

农场主们一直在抱怨生产进行得很糟糕而工人们又缺乏纪律观念。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农忙时开除工人。劳德就曾抱怨他遭到了“抢劫”。在购买劳动力时，他们一般都坚持了如下标准，即只和那些将工人工资视为一项非必需收入的雇主打交道。在高物价的年份中，只为他们提供食宿而不支付工资要合算得多。当然，维持一个最低数量的工资水平还是必要的。【101】

具有革新思想的农民毕竟只占极少数。他们通常都具备读写能力，甚至还具有书面记录的初步知识。劳德可能是一位值得我们关注的农民，他是第一个将注意力由对种子和牛群上的投资转移开来的人。在他的账目中，他本人、他的妻子及家庭成员的劳动都进入了账簿中的借方。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最近，有人就乡村人口的读写能力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18 世纪中期，在不太发达的省份如上艾瑟尔，约有 20% ~25% 的农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该省的沿海地区，情况则要好一些，这里具备读写能力的农民占 10%。在更为发达的尼德兰西部和北部各省，情况则要好得多。

16 世纪中，朗格多克的约 90% 的乡村劳动力和 65% 的相对富裕一些的农民不会写字。这其中，约有 10% 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25% 的人只会写

名字的首起字母。在读写能力方面，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 1/3 的城里人会写自己的名字，另有 1/3 的人会写名字的首起字母，其余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写。在 17 世纪末的法国，以阿维然克—日内瓦城（Avranches-Geneva）两地之间的连线为界，在南北两个区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南部地区，只有 10% ~15% 的人在签署结婚契约时能够写出自己的名字，而在北方，这一比例达 33% ~40%。据估算，17 世纪末，全法国约有 20% 的人会写字，到 18 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37%。当然，这里只是平均数，还不能揭示出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在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女性的文盲率要比男性高出 15 ~20 个百分点。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农民拥有的教育背景、决定采用集约化的农业制度和实施农业的革新这一判断并不一定成立。然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在低地国家中存在着这样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关系也存在于诸如东英格兰、巴列丁奈特、阿尔萨斯、波河谷地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吗？很少有专门为农民所设计的农业理论，理论家们设计的理论只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后者一直对作为自己私有财产的土地给予严格的管理。对于有关的农业理论，农民们当然也能向土地所有者学习。英格兰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那里，【102】居住在城里的大土地所有者对经营农业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相反，在法国、低地国家和东欧，土地所有者一般都避免直接与农民打交道，他们通常会指派一名代理人或公证人（主要在法国）来处理这类事务。

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在 18 世纪期间都出现了一个农业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最为著名的几个社团是：农业知识改良者社团（the Society of Improvers in the Knowledge of Agriculture），1723 年成立于爱丁堡；1736 年的都柏林社团［Society of Dublin（1736）］；1747 年成立于苏黎世的费斯凯利斯克（耐特弗斯垦德）格素斯凯弗特法理协会［Physikalische（Naturforschende）Gesellschaft ot Zürich（1747）］；1753 年成立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地理学术协会（Accademia dei Georgofili）；1757 年成立于雷恩的农业技术协会［Société d' agriculture, du commerce et des arts（Rennes, 1757）］；1759 年成立于波恩的经济和公共福利社团［Ökonomische und gemeinnützige Gesellschaft des Kantons Bern（1759）］，以及 1765 年成立于圣彼得堡的农业经济社团［Société libre d' économie de Saint-Petersbourg（1765）］。由于这些社团主要由土地所有者构成，因而，那些缺乏农业经营实际经验但却很有学问的成员往往会受到嘲笑。然而，这些人又值得赞扬，因为是他们出资为农业方面的书籍或文章提供奖学金。通过这些书籍和文

章，许多农业问题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农业试验首次出现，专门用于试验的农场也建立起来，官方举办了多种调研活动，各种类型的农机具也被收集、试验和对比。为了学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社团成员在国内外频繁地旅行。这是一个总结和提高的时期，也是一个人们普遍对农业发展感兴趣的时期。到 18 世纪下半叶，这些组织为 19 世纪出现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书本知识对低地国家中的集约化农业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这是因为早在这些书被写出来之前，这里的农业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现有的有关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荷兰农业状况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到这里参观的外国农业专家的考察报告。这一地区高水平的农业发展一定是由这里高密度的人口所造成的。这样的地方迫使人们必须集约化地使用较小的地块。向更为集约化的种植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为了增加谷物的产量，而是对必然趋势的一种顺应。1776 年的一篇有关佛兰德农业状况的法国论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首先指出这里的土地从总体上说比法国的大部分地区相对贫瘠之后，然后将这里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归于更多的施肥以及农民的勤奋和节俭。文中指出，“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为了生存，佛兰德的农民几乎对所有的物品都讨价还价，且能够从所有的物品上都能获取收益”。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理查德·威斯顿爵士在佛兰德斯的冯·瓦斯的领地上旅行时，也【103】为这个原本只能生长金雀花和石南属植物的贫瘠土地能够取得如此好的庄稼收成，而感到惊异。

这些地区高水平的农业发展并不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而是以在当地极度艰苦且苛求的环境条件下取得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实践经验作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会代代相传。然而，在这种新型的农业方式中，首先必须面向市场的需求，因此某些传统的思想观念便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如果农民们想在这种贫瘠的土地上获取一定的利润以维持再生产的话，他们就必须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创造能力。

通常，调整的幅度要依据影响生产的环境或因素而变化，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短期或长期趋势。人们应该将按照每年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做出的政策调整与依据长期趋势而将牧场转变为耕地的做法区分开来。

（2）农业的一般经济形势：农业扩张或衰退。

（3）一定区域中的特殊环境，如土壤条件、气候、与人口密集区的联系、交通和运输条件等。

（4）农民的智力水平。

2.3 农业经营中的收入与支出

要想准确地了解一个典型农民的收入与支出所包括的内容以及其纯利润的大小，是极为困难的。尽管我们并不缺少这方面的相关记录、账目和统计，然而回答这个问题仍然很难。这是因为，无论是从性质上还是从规模上看，各个农场之间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样就不可能对现存账目提供的信息加以对比。不仅如此，现有的书面记录通常都过于简单。

在德国，农民每年的纯收入在总收成的14.8%～53.4%之间波动。在低地国家的一些农场中，这一比率在16.5%～27.6%之间。在法国，根据粗略的划分方法，所得中的1/3归土地所有者，1/3归佃户，其余的1/3则抵消了生产过程中支付的成本。在维罗纳（Verona）附近的一些小农场中，资本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727～1737年，8.1%；1738～1748年，8.9%；1749～1759年，11.5%；1760～1771年，15.4%。

[104] 当我们研究农场收入及商业投入资本的收益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纯粹的货币经济学领域。在这方面，1500～1800年间，正是支付方式由传统的实物或劳务方式向现代的货币支付方式转移的时期。通常，可预先估算出总的收获量，把各种负担都按照相应的比例表示出来。什一税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当然，也存在着其他种类的费用支付方式，如经常出现的“分成租佃制”（按照总收获量的1/4、1/3或1/2纳租）或其他以实物方式进行的支付。由于各年的收成水平会有很大的波动，因而，地租、什一税及其他费用也会出现相同幅度的波动。然而，对农民来说，他要留做种子的数量、个人的消费量却是固定的，或者说只能在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波动。以实物方式进行支付的优点是，农民们至少还可以与土地所有者、什一税所有者及其他有资格获取实物收益的人共同承担歉收的风险。

只有在那些收获水平可以或多或少地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以固定方式（无论是实物方式还是货币方式）支付租金的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来。这种制度使得我们可能对未来的收益水平做一个合理的估算。总收获量和市场价格都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如果以货币形式来表示收获量，会存在一定难度。然而，由于在价格和产量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关系，因而在地方市场上，这些变化能够被抵消。后来，随着区域性和国际市场的出现，负的相关

关系消失了，原有的波动最终趋于稳定。

在那些农民们以实物或货币的方式支付固定租金的地方，每年的收成是波动的，但其主要支出则是固定的：租金、为来年预留的种子数量及养家的费用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风险都要由农民独自来承担，而其每年的纯收入也是大幅度变化的。

中世纪早期，农民的支出方式一直以实物为主，只有零星的支出采取货币形式。到了晚期，货币支付方式变得普遍了。这时，在买卖双方进行交换的是产品的市场价值而非产品本身，这样每年的货币数量就随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各种费用支出非常少，产品就有了标准的附加值。这些价值可以在数个世纪里保持不变。由于货币本身是逐步贬值的，特别是16世纪，这种现象尤其明显，这对那些费用征收方有利，但对作为费用缴纳方的农民不利。支付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绝不是直线型的，特别是在17世纪的经济萧条时期，货币在许多国家尚嫌稀缺，交易中的实物支付方式又占了上风。

【105】

中世纪时期，农民们不仅要承担各种赋税，而且还要完成其他特殊的劳务。1500~1800年间，这种劳务的残痕在部分西欧国家中仍可以找到。甚至在17世纪下半叶，当实际工资已经相当高时，在法国、德意志及尼德兰东部地区都可以发现这种劳务制度复活的例证。这些地方的土地所有者试图再一次引进消失已久的劳务制度。在后面，我们还将讨论中欧与东欧的在支付各种费用及劳务方面的各种变化中的方式。

在土地所有权出现的早期阶段，土地的租期一般都很长（通常为一代至三代人），逐渐地，租期开始变短，直到最终将租期缩短到每次1年。有时，租期也会和耕作制度相联系，耕作制度中出现了为期3年的租期或3年倍数的租期，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三步轮作制的要求。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普遍。在一些地区，采邑中的农民或从前的农奴，只有在新接受采邑的土地或首次承租土地时才会交纳租金。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制度对农民是有利的。然而，在疾病流行期间，当佃户频繁地发生变动时，它又变得对农民不利了。

从对若干年间的租金水平的统计来看，它既受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也受对土地需求状况的影响。在上述两种因素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对土地的需求主要受以下四方面因素的影响：

（1）土地的价值在于其潜在的农产品收获量，因而这部分农产品的市

场价值与土地的价值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

(2) 在有了一定资本积累的商人和实业家看来，土地也是一种投资对象，他们将农业视为有限的几个值得投资的领域之一。

(3) 土地被视为能够快速获得回报的投机性商品，这也是拓荒者之所以进行开荒活动的动机。

(4) 土地被视为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在一些国家中，如英国和法国，通过获得土地，有可能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了贵族头衔。

从长期趋势看，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地位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15世纪的朗格多克，由于实际工资较高，15世纪被视为工资收入者的黄金时代；进入16世纪，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较为迅速，它又变成了对农民有利的【106】时期；17世纪则是土地所有者的全盛时期，因为土地的价值和地租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在1665年以后，1650～1750年的经济衰退开始发生作用，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开始恶化。15～17世纪期间，在西欧的其他许多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在1650～1750年的衰退期间，由于货币收入的减少，许多土地所有者被迫自己经营农场，或者采用半分成租佃制（即出租人和承租人平分收获物）来经营。后一种做法在尼德兰、法国和比利时尤为普遍。土地所有者一般要提供种子和农机具，有时还会提供牲畜。必要时，他还要预测出收成状况并向佃户提供食物，以减轻佃户对他的完全依赖。偶尔地，会有中间人在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起联络作用。早在中世纪时期，在意大利北部就曾出现过这样的中间人。16世纪，在法国出现了转租制。最初，它只被用来处理教会的地产，到18世纪时，发展成为对王室和贵族土地的代理。公证人、商人和专注于商业活动的村民（如小店主、铁匠及面包师等）都充当了转租人的角色。专门从事转租业务的公司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不久便传播到了贝里（Berry）、勃艮第、纳维斯（Nevers）和波旁（Bourbon）的周边地区。在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大面积的土地以优惠的方式租给了军队将领家庭，而他们又直接控制了这些地区的下属土地的承租者。

除土地所有者以外，经常有其他一部分人或机构部分地充当了生产者的角色。一般说来，这些生产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通常仅为一只鸡、几磅奶油、一二蒲式耳的谷物、一磅豌豆、少量的亚麻及蜂蜡等。每年，这些产品都必须送到教会、修道院或牧师等宗教机构。此外，部分产品也用来交纳什

一税。最初，什一税的收取者是教会或教区牧师，但若干年后，它逐渐转变到了世俗手中。所有这些负担的总量有可能超过全部地租的数量，以至于原始土地所有者的权益，会因为其他团体加总力量的强大而遭到严重侵蚀。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圣雅各布（de Saint Jacob）提到，“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土地和人的地位的形式多种多样，土地法更加复杂了。”按照他的观点，土地的使用和占有比土地所有权更为重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财产，整套形式又都汇成一点，即对财产的拥有。”

农业部门所承担的税赋负担是极为沉重的。当权者的行政干预和代价高昂的战争（在17世纪尤为严重），使政府的财政需求急剧上升，而此时的经济正处于最不景气的阶段，特别是农业领域。在大多数国家中，农业依然【107】是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土地及农产品也自然成为主要的征税对象。尽管农业生产由于经济的衰退而受到很大影响，然而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土地税还是在不断提高。因为那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政府，为了保护工业和贸易的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损害农业发展。对过度征税的抱怨遍布整个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及尼德兰，后者在1672年战争之后提高了税收标准。不公正的税收尤其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有些国家对贵族和修道士所应承担的税赋往往给予全部或部分免除。在另外一些地方，征税的权力被掌握在拥有爵位的土地所有者手中，他们往往会安排归他们管辖的农民只交纳少量的税金。

战争是灾难性的。军队的给养都由乡村来提供，而它们又往往敌友不分。军队可以自由地掠夺和征税。村庄被烧成一片瓦砾，牲畜被盗走，农民的儿子或雇工被强征入伍。最具毁灭性的破坏是中欧爆发的30年战争。

农民们既要与地方官吏也要与国家打交道。许多国家君主的权力从中世纪一直维持下来，尽管其管辖权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对地方自卫组织中的贵族们失去了效力。例如，在尼德兰，君主已完全失去了管辖权，法国君主也失去了司法裁判权。但他们对乡村社会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如征收通行税的权力和摆渡权，在公共土地和林地中的狩猎权，称重及丈量权，经营烤炉和面粉加工厂的权力，当土地被出售时的优先购买权，对空地的控制权等等。在法国，1667年的法案通过以后，贵族们获准将公共土地的1/3作为个人财产。17世纪，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扩大自己的权力。这或许是当时的经济衰退造成的。然而，它同样会遭到来自于农民的强烈反抗。这期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司法案例，还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激烈的动乱和冲突以及同样激烈的镇压活动。尽管如此，西欧农民的反抗活动，如英格兰农民对圈地运

动的反对以及法国农民对征税及贵族特权的反抗等，与中欧和东欧相比，其影响面和激烈程度都要小得多。在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反抗的主题并不局限于政治和经济方面，宗教上的争论也包括在其中。在瑞士（1652～1653年）、巴伐利亚、奥地利（16～18世纪）和法国，尤其是17世纪时的诺曼底、布伦（Boulogne）、贝阿恩、比戈尔（Bigorre）、古耶恩（Guyenne）、布列尼塔（Brittany）、朗格多克和塞文山脉（Cévennes），我们均可【108】以发现农民起义的历史。

2.4 土地所有制

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都曾试图对社会各阶层所拥有的土地数量进行认真的探讨。所有这些研究，都着眼于土地在五个社会阶层（王室、贵族、修道士、市民和农民）之间是如何分配的。然而，由于人们往往用现代的所有制概念来考察历史，或受到基于非本质的特征而做出数量上的推断的干扰，导致了这类研究活动多以失败而告终。

所有这些研究均是以现代的、含义相当明确的所有制概念为起点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见到的，1800年以前的所有制形式要比现在复杂得多。谁拥有那种只有在转移和继承时才需要进行支付的土地的所有权？又是谁拥有那些只需要少量纳贡的物品？这里面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例如，当佃农将他们承租来的土地再转租出去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土地的主人。父母们也会将自己的农场出租给自己的子女。这里面已经包含着转租的问题。

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土地所有制的不同方式时，通常会表现出支持农民们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的倾向。这种"所有者—使用者"制度通常被认为优于佃农制度。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者—使用者制度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往往是耕地质量较为贫瘠的地方。在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的地方，土地一般都由佃户来耕作，而这样的地方也要比那些实行所有者—使用者制度的贫困地区繁荣得多。在小的土地所有者和佃农当中，存在着比大农场中更高比例的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与富裕程度之间远远不是相伴而生的。当所有者—使用者因为每年要支付比佃农的租金还要高的利息费用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时，我们又如何来评价这一制度呢？

在对五个阶层的所有权进行数量上的测算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在计

算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时，可以参考以下几方面标准。

（1）农场的数量。不考虑农场规模或者价值。

（2）土地的亩数。这里的问题是只考虑严格意义上的农业耕地的面积，还是将森林、荒地和沼泽也包括进来。对那些属于王室、贵族或教会的土地来说，严格意义上的耕地只占很少一部分，在他们的领地中，包括了大量的非生产性的狩猎用地以及用于其他娱乐目的的禁地。 [109]

（3）价值。计算的依据应当是购买价格、租金或征收土地税的数量。

依据以上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必然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标准的选择，也通常受制于可获得的资料的性质。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各个地方的条件差异极大。有的地方的众多村庄彼此相邻，土地所有权在五个阶层中平均分配。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贵族或教会则占据着支配地位。

18 世纪，奥尔良周围 9 个村庄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土地所有权的多样化：贵族土地所占的比重在 11.2% ~73.2% 之间；教会土地所占比重在 0% ~21.2% 之间；市民土地所占比重在 1.4% ~32.6% 之间；最后，农民土地所占比重在 18.8% ~78.4% 之间。

一些历史学家揭示了引进新的农业方法及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与市民阶层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往往被视为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在欧洲大陆，这一特征并不如在英格兰那样显著。在英格兰，城市公民常常亲自经营其所拥有的土地并更为主动地将自己的处境与土地的经营状况联系起来。尼德兰的城市居民一般也都具备这种商业思想，但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新耕地的开拓而不是对已有耕地的经营。居住在城里的土地所有者，并不关心农民们在土地上如何耕作，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按期拿到租金。当然，在土地租赁合同中，会包含有禁止过度消耗土地的条款，在期满以后，佃户所交回的耕地状况必须与当初租赁的时候完全一样。

多种因素造成了土地在五个阶层中分配状况的实质性变化。宗教改革以后，在新教国家中过去为教会所拥有的土地变成了世俗的财产。在中欧，30 年战争造成的土地荒芜和人口下降，也使以往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内战中的英格兰及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也出现了与此相类似的变化。由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变化则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在一些新教国家中，由于政府急需现款，因而出售教会土地的工作进行得极为迅速。其结果是土地市场出现饱和，待售土地并非随时都能够顺利地

找到买主。在其他一些地方（如尼德兰），这些土地在当权者的手中一直掌[110]握了数百年，其收益则被用来支付大臣和教师的薪金、教会的日常开支及对贫困阶层的援助。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英国议会以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土地出售，以此作为对某些特殊家族的恩惠。然而，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说法缺乏可靠的依据。在英格兰，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制，1642 年以后，价值 350 万英镑的王室土地和价值 250 万英镑的教会土地被出售，价值 100 万英镑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原属于 700 多名保皇党人。

在德国，30 年战争使乡村人口显著减少。为了使遭受浩劫的农场尽快恢复生产，大的土地所有者将荒芜的农场和土地，有时也包括正在耕作的土地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型的农场并亲自进行经营。18 世纪，当谷物价格开始上升时，这种驱逐小的土地所有者的政策仍在执行。然而，此时农业的基本特征却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新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更加注重商业开发活动。少数几个君主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采取了一些行动来反对这种商业化趋势。在易北河（Elbe）以外的德意志各国，并不是所有的大型农场中都包含有从小的农场主那里获得的土地。1800 年，米特尔马克（Mittelmark，勃兰登堡）的大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全部土地的来源是：

表 14 单位：%

中世纪殖民阶段	26.2
中世纪的荒地（Wüstungen）	27.7
17 世纪的圈地	18.7
30 年战争期间荒芜的土地（Wüstungen）	18.2
18 世纪的圈地	5.5
18 世纪的拓荒	2.1
未知的原因	1.6
合　计	100

从上表可以发现，源于 18 世纪的圈地运动的土地所有权在德国所占的百分比是相当低的。相反，这里实行了积极的保护小农的政策。

在英格兰，圈地运动最早出现于中世纪。这一概念本身也包含多重含义。

（1）将以往分散于各处的耕地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紧凑的大块耕地。这些耕地通过篱笆、栅栏和大门被包围起来。

（2）由耕地转为牧场。

（3）大的土地所有者将若干个农场合并起来以扩大耕地面积，土地上的农舍也随之被拆除。 [111]

（4）大的土地所有者限制或完全否认其他农民的权力而独占公共土地。

上述这四方面的活动都会使公共土地制度部分或完全瓦解，单个的农民也开始摆脱社团的控制。

如果我们通过圈地运动来考察上述四方面含义中的任意一个的话，则可以发现它并不是英格兰所独有的现象。18 世纪，勃艮第的大土地所有者也将其拥有的土地用栅栏包围起来，而这一进程却遭到了农民们的强烈反对。在德国，农场（*Bauernlegen*）圈地运动所包含的主要是第三方面的含义。

在英格兰，圈地运动受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中世纪及 16 世纪的政府政策也是倾向于保护农民，同时反对有实力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然而，进入 18 世纪，当圈地运动开始获得议会法案的授权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当在某一区域内的足够多的人士（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土地所有者）要求对圈地运动加以允许时，政府便会向该地区派出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很多情况是，小的土地所有者向该委员会表达说，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然而，在那种圈地运动的赞成者拥有 80% 以上的土地的地方，他们的反对意见不会对政府政策产生丝毫的影响。如果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认为是可行的，那么在这些存在争议的地方的圈地运动便会得到议会的授权。地方的土地所有者要负担制定圈地规划、调查委员的费用及建造栅栏的费用等一系列成本支出。对小的土地所有者而言，这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尤其是相对于较大的土地面积来说，在较小地块上每英亩土地所分摊的建造栅栏的成本要高得多。1702～1760 年间，按照议会法案的授权，有338 177英亩的土地被圈了起来。1760 年以后，圈地运动仍在以较高的速度推进，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了 1815 年。

同时代的文献和许多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如哈蒙德（Hammonds）、劳恩阁下（Lord Ernle）、哈斯巴克（Hasbach）、曼陶克斯（Mantoux）、特里威廉（Trevelyan）、利维（Levy）和斯莱特（Slater）批评这一政策偏向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批评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带有偏见，以及有实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土地所有者施加了压力。圈地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被指责应当对小农场的消失，以及小农场主和农民失去拥有可以放牧的公共土地的权利负主要责任，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是这些小农场主和农民不得不减少所拥有的牲畜的数量，它同时也意味着能够获得的肥料数量的减少。最终，他们不得不将其土地出售给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则在工业

领域中去谋取一份工作。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艾什顿、克拉彭（Clapham）、塔特（Tate）、哈特（Hunt）、吉姆巴斯（Chambers）和明吉（Mingay）］则认为圈地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了。他们认为，小的土地所有者对圈地【112】运动的反对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调查委员会也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1793~1815年间，小农场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圈地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集中。乡村人口并没有被推向工业领域。相反，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被吸引到工资相对较高的部门。当然，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是有保障的。

在法国，如果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状况来考察，那么，从表面来看，农民的处境是有所改善的。在少数几个省份，农民们或者拥有部分具有实际价值的土地，或每年只需交纳少量的租金。单个农民所拥有的耕地通常面积很小且比较分散。1789年以前，农民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所有权而引起，相反往往由农场规模过小或贵族拥有特权而引起。18世纪下半叶，随着谷物价格的上涨，情况开始恶化，特别是对那些生产尚且不能满足自身家庭需要的农场的影响尤为严重。

乡村中的贵族利用特权便可以获得相应的收入。即使他并不拥有土地，也不会影响收入的取得。尽管如此，这些收入往往赶不上日益增加的生活费用。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那些早已消失或被人们遗忘的特权，虽然这种特权往往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这些封建复辟活动引发了大量的流血事件。直到1789年8月4日深夜，当国民议会将贵族和庄园主的所有权力都废除才告一段落。法国大革命期间，修道士和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了。一些革命党人主张将这些没收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小的农场主，以及那些根本就没有土地的人。然而，由于新政府急需现金，这些土地最后还是被出售了。贵族的土地又被那些流亡者的代理人或其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买了回去。教会的土地也主要出售给了富裕的城市居民和大农场主，而后者在对公共土地的分配过程中就曾经获得过巨额利润。其结果是，从整体上看，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了。

2.5 中欧和东欧的农奴制度

1200~1800年间，东欧与西欧在政治经济自由化或农奴制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在西欧，自易北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庄园制、土地

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封建性质的关系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农奴制度在12世纪至16世纪逐步消失。1500年以后，许多国家甚至在1500年前数个世纪，乡村中的人口就可以自由地迁徙和买卖土地。农民们在婚姻、继承、土地占有及使用方式（包括出租、占有、半参股方式的出租或者封建的采邑制）等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权。他们以货币或实物的方式支付租金，当他们从农场获得土地或继承土地时，则需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早在12~13世纪，就已经开始废除庄园制，到16世纪时，庄园制被完全废除。【113】

与此相反，在易北河以东的中欧和东欧地区，中世纪时期，相对于西欧而言，这里的乡村居民拥有“更多”的自由。然而，进入15世纪初期，情况开始恶化。各国都加快了建立农奴制度的步伐。这一进程于18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达到了最高峰。在这里，农奴像牲畜一样被买卖，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继承的惟一财产就是各种义务负担，他们不知自由为何物。按照18世纪的法规，农奴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下，与其说是农奴还不如说是纯粹的奴隶。

有关农奴制度在中欧和东欧再度复兴的根本原因，很久以来便受到了历史学家的关注。由于所考察的国家不同（包括德国东部、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和俄罗斯），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也各异。同样，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有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德意志的和斯拉夫的），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必然会有差异。

现实的问题是，在这些国家中是否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因素。借助于这些因素，我们可以，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农奴制度在中欧与东欧国家的强化做出解释。政治环境的差异自然应当给予考虑。奥地利的农奴制度与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或俄罗斯的农奴制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各国的农奴制度有怎样的差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与西欧出现的逐渐废除农奴制的进程截然相反，这里的农奴制是逐渐强化的。

与中世纪时期西欧出现的佃农制相比，中欧和东欧农奴制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种制度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在法律地位上，它们存在着相同之处，因为佃农和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或者农场上，他们都拥有继承这种身份的权利。实际上，相对于那些在一段时期内自己去租赁农场的现代承租人而言，农奴们的处境要安全得多。从佃农和农奴这两种制度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它们均存在着强制性的支付，大多数是以实物的方式［即俄国奥布鲁克（*obrok*）］，如入账税、婚姻或死亡的交费、赎身的价钱等。

佃农和农奴制度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私有土地的开发方面。在西欧国家[114]中，佃农制会从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这里极少出现由大土地所有者经营的使用佃农劳务的大庄园。通常，属于某一庄园的农场分散于多个村庄之中，而其他土地所有者在这些村庄中同样也会拥有自己的农场。有时，由于农场的分布过于分散，以至于部分农场及其佃农距离庄园过于遥远，从而使得在庄园本身的土地上无法使用这部分佃农的劳动力。在中欧和东欧（主要在德国东部、波兰和波希米亚），全部村民都属于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另外一些地方，尽管农场分布较为分散，但各个孤立的农场则可能只属于一个人。在俄罗斯，大庄园的领地也会被农民的小块土地分割开来。大土地所有者并不总是拥有大的企业。①

使用佃农进行耕作的庄园制度，在梅罗文加（Merovingian）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西欧分布极为广泛。在易北河穿流的欧洲，这种劳务方式在16世纪有了迅猛的发展并成为整个农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奴们被迫每星期提供3~5天，有时甚至是6~7天的劳务。这些劳动包括在耕地上犁地、播种、耙地和收割作业。此外，还包括脱粒、割干草、将农产品运送到庄园或供出口的港口（例如在波兰）。在那些每星期要提供6~7天劳务的地方，其工作量有时还要由农奴的儿子来帮助完成，或者由农奴出钱请一位帮工来共同完成贵族布置的任务。这样，耕作土地的劳动力成本被转移到了农奴的身上。同样地，他们也必须承担作为牵引动力的马和牛，以及马车和其他农机具的成本，这些畜力和工具都必须由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农奴自己来解决。于是，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其耕地经营的成本便降低到了最小程度。这在西欧是闻所未闻的。在德国中部和东部，还有另外一种劳务形式，即庄园雇工的强制性劳务。这一方式最早于1543年出现于勃兰登堡。其内容是农奴的所有子女，都必须在土地所有者的家里做1~4年的仆人。这一制度是强加在“正常”的农业劳务之外的一项额外负担。

实际上，耕地面积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它受制于土地的规模与农奴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由于农奴们既要在自己的耕地中生产自身所需要的食[115]物，又要在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中从事劳作，因此有必要在土地所有者的耕地面积，与农奴们为自己的需要而必须耕作的耕地面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很难估算出土地所有者通过亲自经营土地能够节省多少开支。在波

① 康夫农（Cf. M. Confino）：'grands domaines... mais n' étaient certainement pas de grandes exploitations'，in *Domaines et seigneurs en Russie vers la fin du XVIIIe siecle*(1963)，P. 117.

兰，在相当于2～4个农场的私有土地上的收益，据说等于在一个拥有10～15个由农民耕作的农场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所能够得到的货币或实物地租的数量。

不仅仅在中欧和东欧，还包括在西欧，具有贵族身份的土地所有者享受着对经济部门的垄断所带来的利润。他们在诸如风车、水车、渔业、烤炉、酿酒、啤酒及饮料的销售以及牛的贸易等多个领域中享有特权。渔业是波希米亚贵族主要的收入来源，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匈牙利的牛的贸易、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酒类贸易以及波兰的酿酒工业。16世纪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贵族，从这些部门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8世纪，由于谷物价格降到了特别低的水平，波兰的贵族从对酿酒和饮料制造业的垄断中，获取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从耕地上获得的收益。

在西欧国家中，到16世纪末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成功地取代地方贵族，在法律和管理方面发挥作用。相反，在中欧和东欧，或许是出于自愿，也可能是迫于贵族阶层的强大压力，政府放弃了所有的裁决和管理方面的权力，在17～18世纪尤为如此。农奴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且没有丝毫反抗能力，他们完全受控于土地所有者，后者是他们命运的裁决者。有些国家的土地所有者还承担了征税以及为军队招募士兵的义务，例如俄罗斯。

到此为止，我们仅仅强调了东西欧之间的差异。但是，与极为复杂的现实相比，这种对比过于简单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许多地区仍然残存着庄园制度。农奴制度同样也在有些地区存在着，如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占领了这些地区，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农奴制度才得以彻底废除。然而，我们却不能轻视这些农奴的能量。18世纪东尼德兰最大的农场都掌握在这些农奴手中，因为当地的法律禁止通过继承的方式而将农场割裂开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奴有时会成为乡村中最为富有的人。由于他们只有在死亡、结婚或接纳农场时才会交纳较重的费用，因而其每年的平均费用负担甚至比普通的农民还要低。而另一方面，在法国、德意志和东尼德兰，拥有土地的上层社会群体拥有经济上的垄断权（如在面粉加工、通行费和摆渡等领域）及其他方面的权力（如狩猎），这也会给乡村人口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116】

与之相对照的是中欧和东欧的生活舒适的不劳而获者和农民。在匈牙利和乌克兰边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山区及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等荒凉地区，农民们享受着高度的自由。

在中欧和东欧的某些地区，如在哈普斯堡君主国、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土

地上，政府或者君主对农民的社会和法律处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他们的动机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然而，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农民的关注则出于将其视为纳税人和军队的潜在兵源的立场。从这一考虑出发，他们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农奴免受土地所有者的压抑。1597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将上奥地利的农民提供的劳务时间缩短到每年两个星期，当然，这并不能阻止 1710～1720 年间新增加的各种名目的劳务。1680 年和 1738 年都通过了一项被称为“罗伯特法（Robert Patente）”的法令，它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利西亚的劳务时间缩短至每星期最多 3 天，而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王室和国家土地上的劳务，更是先后于 1781 年和 1783 年被完全废除。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二世（Frederic Ⅱ）通过立法，反对土地所有者为了扩大其耕地面积而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做法。1749 年，他颁布取消圈地运动的法令，1759 年又禁止出售没有土地的农奴。但是由于许多保护农民的政策都是与贵族的利益相冲突的，因而，只有在那些政府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这些政策才能够被执行下去。

在那些贵族力量相对强大的地方，如梅克伦堡、上劳济茨（Lusatia）和瑞典属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农奴们完全被贵族所控制。在梅克伦堡，1755 年时，将农奴从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做法甚至受到了法律的保护。19 世纪，在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废除农奴制之前，君主们有关保护农民的政策从来就是刚刚颁布就趋于流产。

易北河基本上是德意志自由制度和农奴制度粗略的分界线。当然，在易北河以西的一些地区，如在勃兰登堡的奥特马克（Altmark），也存在着德意志东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大庄园。

农奴制度的出现过程并不是旧有特权的突然消亡，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和渐进的过程。我们很难找到标志这一进程开始的具体日期或年份。在有些国家中，农奴制度从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展而来。在斯拉夫国家中，早在中世纪初期，最初的生产活动便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不自由。当基督教传播到俄罗斯以后，教会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与拜占庭（Byzantium）一样，它们都是由自己来经营。这种类型的土地最早出现于 1146 年。后来，贵族们也开始自己耕种大面积的土地。种种迹象表明，在波兰也出现了与此相似的情况。人们不知道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战争中，[117] 以及被鞑靼人统治时期丧失了多少耕地。很可能，它与中世纪末期农奴们耕作的土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14 世纪、15 世纪，在中欧和东欧各地，耕地使用农奴劳动。这种做法

甚至早在14世纪初便已经在某些地区出现，包括德意志东部、波兰、俄罗斯、1410年于坦尼堡（Tannenberg）被波兰军队打败的条顿骑兵所拥有的土地上、1514年农民起义后的匈牙利及其于1526年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后的部分乡村、在1500年前后的波希米亚等等。

最初，农奴们在土地上的劳务负担并不是特别沉重，在14世纪的波兰。每年的劳务只有15天，这与1597年以后上奥地利的情况是相同的。1421年，波兰加大了这一负担，规定每星期劳动1天。这也成为匈牙利在15世纪末及1514年以后采用的标准。16世纪中期，在波兰和俄罗斯，劳务负担进一步增加到每星期3天。16世纪末，匈牙利没有对劳动时间做出明确的规定。18世纪的俄罗斯，除了在个别省份仍然保持着每星期3天或4天的标准外，劳务负担一般都增加到了每星期5～7天。

16世纪、17世纪期间，农奴制在下列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发展到了顶点。按年代顺序排列，包括1526年后的条顿骑兵的土地；16世纪下半叶沙皇伊凡四世（Ivan Ⅳ）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尤其是在1750～1780年之间；16世纪末的匈牙利和瓦拉几亚（Wallachia）；1620年的白山（White Mountain）战役之后的波希米亚；1621年后的摩尔达维亚；1628年后的摩拉维亚；30年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以后的德意志东部诸国；对抗瑞典的战争（1655～1660年）结束以后的波兰；17世纪的一系列战争结束以后的爱沙尼亚。在东普鲁士，18世纪初的黑死病过后，农奴的处境再一次恶化，而在1762年尤其是1775年之后，俄罗斯农奴的处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

对土地私有制的快速发展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条件的恶化的成因，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只能从经济的、人口的、政治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同时从不止一个方面研究这一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消费市场和谷物价格是解释上述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德国和波兰的历史学家强调了这两个因素对西欧谷物出口的重要意义。在有关荷兰和英格兰是否从东欧国家的衰退中受益的问题上，人们已争论很久。这一国外市场理论也被用于研究德意志东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状【118】况，虽然对波希米亚的说服力并不强。产自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谷物出口到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大型消费市场上。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出口市场理论，可以从宏观上对农奴制度的全部现象做出解释，农奴制度的建立被视为是对外国谷物需求的结果。然而，即便是在波兰，出口仅限于维斯瓦河

(Vistula) 沿岸地区的某些特定地方，因为维斯瓦河适合作为港口。国外市场理论还有一个缺陷，即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农奴制度的国家（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根本就没有谷物的出口。在这些地区，本国市场的需求或许可以提供某些解释。德意志东部、上劳济茨、西利西亚、俄罗斯和波希米亚都是这样的国家。

然而，无论是从国外市场还是从本国市场出发的理论，均不能完全解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许多国家的私有领地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在俄罗斯和匈牙利均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匈牙利历史学家派克（Pach）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在土地私有制的扩张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农奴。农民日益贫困的结果是国内市场的萧条，但同时大土地所有者则变得日益富足。货币经济被自然经济代替，这一进程导致了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萧条。这样的结果与土地所有者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矛盾吗？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经济状况的一般性趋势就是萧条的。在这一背景下，少数大土地所有者必然会寻找一切机会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公共利益。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相对于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价格因素而言，市场本身并不重要。谷物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也必然会对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当谷物价格上升时，土地所有者有动力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去扩展其拥有的土地。15 世纪、16 世纪，在德意志东部、波希米亚、1530 年以后的上劳济茨、18 世纪下半叶德意志东部和俄罗斯的土地所有者当中，均存在有上述意向。有关土地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同当时盛行的市场价格之间关系的论断，已被一些历史学家上升为一般性的理论，这些历史学家将私有土地的增加和货币贬值联系起来。

相反的情况是，经济衰退可能会促进土地所有者扩大其耕地面积，同时【119】产生对农奴的更大量的需求。较低的谷物价格迫使土地所有者生产出更多的谷物，以维持其以往的收益水平。与此同时，工资下降的幅度相对要低一些，这样实际工资是上升的。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土地所有者会增加劳务需求，因为这些劳务非常廉价，尽管其效率通常比较低。这样一来，农奴制的发展又被归因于谷物价格下降和经济衰退，在 14 世纪、15 世纪和 1500 年之后的德意志东部（1650～1690 年）和俄罗斯，以及 17 世纪的匈牙利出现过这些现象。

另外一些学者对于劳动力的兴趣超过了对市场和价格的兴趣。在造成人

口下降的战争及流行性疾病过去以后，开垦那些被农民们荒芜的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现象。这种劳动力的短缺，迫使土地所有者增加侥幸生存下来的农奴的劳务负担。而能够阻止劳动力从乡村流失的惟一有效途径，便是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

人口的减少也被用来解释某些地区农奴制度的发展，包括 13 世纪和 1550 年以后的俄罗斯、1526 年以后的匈牙利、30 年战争后的德意志东部、17 世纪的爱沙尼亚以及 18 世纪初黑死病流行过后的东普鲁士等地。

许多历史学家将横穿易北河的欧洲各地的农奴制度的发展归因于战争的影响。的确，一些战争所遗留的可怕后果并不能被轻易否认掉，特别是 30 年战争及波兰反对瑞典的战争（1655～1660 年）。此外，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也被认为进一步强化了农奴制度。这些战争包括：1410 年在坦尼堡（Tannenberg）对条顿骑兵的作战、1525 年在条顿骑兵（Teutonic Knights）土地上的农民战争、1514 年的农民战争及奥斯曼（Ottoman）帝国征服匈牙利的战争、1593～1606 年的奥地利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1534 年的胡斯信徒（Hussite）战争的结束、1620 年波希米亚的白山战役、16 世纪下半叶（1558～1582 年）和 17 世纪初（1605～1613 年）俄罗斯境内的战争、德意志东部和波兰的 30 年战争、波兰反对瑞典的战争、17 世纪末爱沙尼亚战争等等。

制度或国内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例如，16 世纪下半叶小土地所有者出现，他们主要由更依赖于沙皇而不是旧式贵族的诸侯构成；1490 年以后匈牙利中央政权没落；1620 年以后波希米亚的哈普斯堡元首赐予权力的新兴贵族（主要由外来移民构成）的行为等。

然而，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贵族权力不断扩大的重要性，认【120】为他们的司法功能以及商业活动动员能力是农奴制度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尽管土地私有制有时是在具有强有力的国家元首的地方［如在 1620 年以后的波希米亚，在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统治下的匈牙利，在彼得一世（Peter I）和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统治时的俄罗斯等］取得立足之地的，然而，在波兰、匈牙利、梅克伦堡、上劳济茨和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等地，这一进程又是伴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的不断削弱而进行的。

国内政策的作用甚至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例如，在 16 世纪的匈牙利，当时这一国家正被分裂成三个部分：被哈普斯堡占领的西部地区，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南部地区以及仍然独立的东部地区。尽管这三个地方的政权各不相同，然而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土地私有制而言，以哈普斯堡占领的地区为先行，上述三个地方的发展方向是相似的。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

例子。1648年后的德意志北部被瑞典所占领的区域内，如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模式，便与横穿易北河的欧洲各国的发展模式完全相同。在易北河以西的维登（Verden）领地同样也在瑞典人的统治之下，然而这里的土地经营方式却与德意志西部诸国的情况极为相似。

为了进一步论证私有制领土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注意到前面所有的对农奴制度兴起的解释，也同时适用于对中世纪晚期农奴制在西欧国家消亡的解释。这些论据包括，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谷物价格的上升，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新的拓荒活动和人口的增长，以及另一方面，自1350年起的长时期的经济衰退，这是由谷物价格下跌及疾病和战争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那些土地私有制兴盛的国家，通常都是以种植谷物为主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大土地所有者都雇用了相当数量的农奴来种植谷物，要么是满足市场需要，要么是满足自身消费的需要。那时东欧和中欧国家中，农业占据绝对优势，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谷物收成水平都是很低的，在1600～1750年间，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因素的影响以及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强迫劳动所具有的低效率。裸麦的收获量从来没有超过播种量的3.7倍。在一般情况下，这里的产量水平要低于西欧，甚【121】至比南欧和德意志西部还要低。这意味着在东欧和中欧地区（一个收成水平很低的农业社会）国内生产总量也一定是很低的。我们无从知道这些种植谷物的耕地数量是否维持不变，然而16世纪以后的单产水平却降到了与中世纪时期一样低的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政府施加的各种负担不断增加。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会导致与经济发达国家的战争，为此，政府迫切需要通过税收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谷物收成水平很低的国家中，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比率。后者的增长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此外它的增长也要视生产者本人（如农民）的投入水平而定。在非农业部门的人口中，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情况预示着在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平衡已被打破。

在东欧，确实存在某种贸易和工业形式，虽然它们通常被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绝大多数城市的规模都相当小，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市中产阶级。其结果是，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由于经济生活的停滞，致使这些城市的发展日益退回到乡村社会的水平。然而，这种趋势并没有阻碍中欧和东欧的各国政

府参照12世纪和13世纪的资料数据制定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策。导致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生产性的投资。实际上，增加生产的机会也相当的少。君主们都将其收入投入到了军备、建造豪华宫殿及其他大型皇家园林上。许多富裕的贵族也纷纷效仿他们，生活在豪华的城堡或乡村别墅中，使用着大批随从。与此相反，许多较低衔位的贵族则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最终，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都加入到了反对债务负担的队伍之中。

降低谷物种植成本的可能性是极为有限的，在收获总量中能够进行再次播种的数量同样是有限的，所使用的农机具也都是极为粗糙的，它们一般都属于农奴所有。在土地私有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可以把劳动力成本转嫁给农奴。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对农民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种对乡村人口的压迫必然引发革命性的效应，这是显而易见的。整个东欧和中欧地区都进入了一个农民频繁进行反抗和起义的年代。这一特征在俄罗斯、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西利西亚和上劳济茨尤为显著。在这些起义中，较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斯坦卡·拉辛（Stepan Razin，1670~1671年）和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yov，1773~1775年）所领导的起义，但二者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22】

在西欧，同样也存在着大面积的贫困地区，其生活水平与中欧和东欧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在这一时期的西欧国家中，通过高度发达的、多样化的农业经营的分散化体系，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这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有些起源于中世纪，还有一些存在于人口稠密地区，它们根本没有出现在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现象。

2.6　社会阶层、价格和人口

在最近20年，有关对1200~1800年间的历史人口统计及经济的长期波动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努力找出1500~1620（1650）年间以及1750年之后人口增长与价格上升之间的联系，二者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同样，历史学家也注意到1620（1650）~1750年间人口的下降或停滞与价格下跌之间的联系。然而，学者们就这种人口和价格比率波动对社会各层次人群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却没有达成共识。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当我们从农民的立场出发时，那些谷物价格相对较高的阶段是值得提倡的；还有一些人

则认为，当谷物价格较低时，由于实际工资相对会有所提高，因而，对工资收入者来说，又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对前工业化社会的研究不够充分的结果。

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和长期价格变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人们（至少是相对贫困的那部分人口）只能对诸如农业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等突发性事件，做出被动的反映。在饥荒面前，他们必须寻找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充饥。长期的比价关系变化会引发结构性变化。以生产领域为例，长期的比价关系可以使其引进先进的技术、投入更多的资本及增加或者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在消费者领域，比价关系的变化会导致人们支出方式和食物结构的变化，但同时会带来营养失调的风险，这是值得重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部门发生的变化也会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从而影响到它们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及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当然，人口总量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导致社会各阶层发生等比例的变化，但是它会造成人口在不同阶层之间【123】相对或绝对的流动，因为人口总量的变化打破了各阶层之间原有的平衡。

由于比价或者人口总量发生变化时，生产者并非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有必要找出能够区分各种反映方式的评价标准，以便对生产者按照不同的社会层次进行划分。同样，对于消费者也应当按照其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的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一些人群或家庭在收入水平和食物支出方面是相似的。因此，消费者的社会层次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者的社会层次与消费者的社会层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所包含的群体要比后者少得多。消费者实际上包含了除婴儿以外的全部人口。不仅如此，生产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不仅难以达成一致，而且还时常发生冲突。当然，我们这里不考虑许多生产者同时也是其部分产品的消费者这一特殊现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掌握的历史文献中，对于社会层次以及不同群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的差异，均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人们常常假定所有的农民、消费者甚至全部人口都会对环境变化做出相同的反应。人们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没有意识到用于定义生产者的标准与定义消费者的标准是全然不同的。

通过考察价格波动和人口因素对乡村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影响，可以发现，最为基本的食物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和工资的提高，对那些每年能够向市场出售其部分产品的家庭将是有利的。如果它们以工资方式支付雇员，则实际收益还会更高。而当以实物方式支付雇工时，则这一比价关系的

变化对它们来说又不利了。这里，适用于工资的原理也适用于租金和税赋，不管是用货币还是用实物作为支付方式。当一个家庭的生产仅能满足其自身需要时，则它既不会从食物价格上涨中受益也不会亏损。食物价格上涨对于那些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自身需要的农场，以及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属于非基本食物的农场，均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价格下跌则对那些尚不能为市场提供足够农产品的农场有利，而对那些能够为市场提供充足产品的农场不利。整个农业社会都贯穿着区分有利的经济因素和不利的经济因素的分界线。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在开放的市场上农民做买卖的程度不同。那些实现了自给自足的农场处于中间的缓冲地带。

从 1500 ~ 1800 年间小范围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小农户或小农场而不是大农场数量增加的原因。一般说来，乡村【124】人口的增加会促使社会阶层具有向下发展的趋势。受市场状况影响的人口数量将会增加，而且非农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人们已经难以在农业领域中找到就业机会。当死亡率提高而导致人口总量减少时，小的农户由于营养不良等因素更容易受到打击。而如果是大的农场面对这些情况，许多亲属愿意集中到一个农场上（即采用家庭式、家族式或三代家庭联合式）；或者几个兄弟们联合起来，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在人口下降或工资相对较高的阶段，这种大家庭更容易在那些土壤条件较差的地方见到。因为，通过使用无需支付工资的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可以大大节约劳动成本。在中世纪末期及 17 世纪均可以发现这种大家庭，例如在朗格多克、勃艮第、瑞士和奥地利。在俄罗斯，1679 年对住房采取新的税收政策，导致了 1678 ~ 1715 年间家族式农场规模的日趋扩大。

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比价关系和人口变动对不同消费群体造成的影响时，可以发现，食品价格水平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和工资的提高，将对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对非农部门的消费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而这种价格变动对那些既为自身消费又为市场销售进行生产的农民则是有利的。因为，就这部分农民来说，他们作为生产者要比作为消费者的地位重要得多。食品价格的相对上涨，也有利于那些以实物方式从农场中获得支付并将这些实物带到市场上出售的人。同时，如果租金可以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则那些接受货币支付的人，如土地出租者，也会从这一价格变动中受益。然而，当食品价格相对上升时，那些从农场得到固定收入的人处于不利地位。食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对大多数消费者群体都是有利的。比价关系的变化，对于那些既不为市场提供产品也不充当购买者的人不会产

生影响。

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非农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尤其是那些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其基本食物需要的人口的增加。它也会促进生存式农民，即仅为满足自身需要而生产的农产品消费者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减少则会对那些不能（或仅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群体产生影响。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将农场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市场而生产基本食物或必须从市场上购买食物，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125】位于这两个端点间的是那些生产水平仅仅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农场。为了进行社会层次的划分，确定这一“中间地带”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满足一个普通家庭的需要，假设按照大多数家庭的情况由5人组成，生产基本食物需要的耕地面积最小应当为多少？当然，对于分散在不同地方、处于不同环境的农场而言，最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家庭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土壤的肥力、种植的品种、所采用的轮作制度、农民的智力和适应能力、农产品价格、租金、什一税、地方税及其他方面的负担等等。另外一个难题是，农民，特别是小农，在食物消费结构中除了谷物之外，往往还包括豆类、豌豆、胡萝卜、甘蓝和芜菁等。

在17世纪的佛兰德斯，一个拥有5名家庭成员的农场，种植2英亩小麦或1.75英亩的裸麦便可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而在17世纪的其他地方，如上艾瑟尔，由所有者自己来耕作的最小的农场，通常拥有耕地2.5～3.5英亩。更为常见的是较大一些的家庭农场，拥有的耕地面积在10～12.5英亩之间，然而，它们通常为租佃农场。在农场的收益中，还必须扣除掉租金（通常占收成总量的1/4）、什一税、政府税及其他方面的税金。在奥弗涅（Auvergne），家庭农场所拥有的耕地面积最小为7.5英亩；在山区最小为12.5英亩。在俄罗斯，10英亩被认为是最小的耕地面积，然而也必须负担各式各样的税赋。

在大农场中，为市场而进行生产的数量会随着耕地面积和收获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得到进入市场的确切数量或百分比数字。据估算，在西欧国家中，约有一半的收成进入了市场，而在东欧国家，这一数字只有20%～25%。在东欧，农业收益率水平较低，收成中必须有较高的比例留做种子以供来年用。用以满足自我消费的程度仍然很高，1570年，西班牙农民自己就消费掉了约一半的国内总产量。

在许多地区，传统上，按照家庭财产的多少，把乡村人口划分成2～3个群体：

（1）至少拥有2匹马或2头用做耕种牵引力的牛的农民；

（2）没有马的农民，在牵引方面只能依靠自身的臂力，通常为小农、佃户和按日计酬的短工。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苏波尔（Soboul）就曾使用过上述划分方法，把第二个群体称为劳动者，把第一个群体称为管理者。根考特给纳慕[126]尔的人口增加了一个中间阶层：拥有1匹马、1头母牛或小牛的农民。在圣马丁德拉梅尔［Saint-Martin-de-la-Mer，属于奥克苏斯（Auxois）］，1442年其人口可以划分为三类：农民，一般拥有4头公牛；半农民，拥有2头公牛或母牛；佃户，没有强壮的牲畜。萨克森的农民也被分为三类：农夫、园丁和佃农。园丁所拥有的耕地从来不会超过一般农场面积的1/4，也有少量的牛，有时没有马。佃农只有少量的土地，或根本就没有土地，他们通常以打短工为生，偶尔也会从事家庭手工业。在波希米亚，我们发现在18世纪时，存在着拥有30～60英亩耕地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以及佃农、仆役及按日计酬的短工。不伦瑞克存在着四个阶层：农民、半农民、大佃农和小佃农。其他一些地方也使用不同的分类标准。然而，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我们所见到的都是将农村人口划分为2～4类。在英格兰、法国、比利时、尼德兰东部、阿尔萨斯、瑞士、萨克森、德意志东部、西利西亚和波兰均出现了类似的划分。人们可以假定，那些富有的农民及拥有“中等规模”的家庭产业的人，能够为市场提供产品。小农阶层从一般意义上说是满足自己生存的阶层；乡村家庭工业中的工人以及部分按日计酬的短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们的供应品的市场状况。

对于某些地区，我们可以揭示出人口增长对乡村社会中各阶层的划分所产生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贫困阶层处境的恶化。在哈维尔（瑞士），人口被划分为豪夫保恩（*Hofbauern*）和陶纳（*Tauner*）两类，前者是指拥有大的或中等规模土地的农民，后者包括小土地所有者、按日计酬的短工或工匠、拥有少量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的佃农。陶纳首次出现于1300年前的人口扩张时期。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人口已经在130年间增长了3倍，而陶纳阶层的增长速度更快。许多农民的排行较小的儿子也进入了这一群体。1693年，每5个家庭中，只有1个能够生产出足够的满足自身消费需要的谷物。土地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分配如表15所示。

表 15　　瑞士哈维尔的土地所有者状况（1693 年）

状　况	%
没有耕地的家庭	19.8
拥有 0.25 ~ 7.5 英亩耕地的家庭	59.2
拥有 7.5 英亩以上耕地的家庭	21.0

那些土地数量少于 7.5 英亩的小土地所有者，只有通过从事农业以外的第【127】二副业才能维持其基本生活。这些职业包括种植葡萄、从事运输和牲畜贸易等。

从朗格多克的莱斯匹南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1492 ~ 1607 年间中间阶层的数量是减少的，而大农场及佃农的数量则是增加的（如表 16 所示）不足 12 英亩耕地的产量仅勉强能够提供 2 名成年人所需要的谷物。

表 16　　朗格多克的莱斯匹南（*Lespighan*）的土地所有状况

	1492 年		1607 年	
农场规模	农场数目	耕地面积	农场数目	耕地面积
66 英亩及以上	5	1 112.4	12	1 624.8
12 英亩 ~ 24 英亩	59	1 659.0	44	1 239.6
小于 12 英亩	39	219.0	115	498.6
合　　计	103	2 990.4	171	3 363.0

在蒙彼利埃西北部的阿格利尔斯（Argelliers）的极为贫瘠的土地上，要满足一个农民及其家庭的食物需求，需要 54 英亩的耕地。在这里，平均拥有 10 英亩耕地的小农场，由 1531 年时的 3 户增加到了 1664 年的 34 户。

在德意志中部和东部地区，早在 13 世纪时便存在小土地所有者。15 世纪末以后出现的人口增长，导致了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迅速增加。17 世纪、18 世纪，许多地区出现了佃农（详见表 17）。

萨克森 1750 年所拥有的人口数量比 1550 年时增加了 85%。下面列出了这两个时期的农场及小农的数量：

	1550 年	1750 年
农场	43 150	42 787
小农和佃农	4 000	36 700

萨克森的农场数目自 12 世纪、13 世纪的殖民时期以来基本维持不变。人口的增长主要带来了佃农和按日计酬的短工数目的增加。特别是在山区，这一趋势尤为显著。这些人在诸如采矿、伐木、牧羊和纺织等工业部门找到

了就业岗位。那些在 1750 年时拥有大量佃农的地方，到了 19 世纪中都发展成了工业中心。

人口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按日计酬的短工和佃农数量的增加，在 18 世纪的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和曼斯特的领地上，以及在不伦瑞克、佛兰德斯、勃艮第和瑞典均可以发现。【128】

表 17　德意志中部和东部地区乡村社会的阶层（1374～1807 年）

单位：%

地　区	年　份	农　民	小　农	佃　农
玛利斯特 (Marienstern)	1374	88.6	11.4	—
	1777	30.5	14.5	54.9
霍耶斯维达 (Hoyerswerda)	1568	78.4	12.7	8.9
	1620	61.4	15.7	22.9
	1777	55.7	14.1	30.2
科尼斯布克 (Konigsbruck)	1560	81.3	18.7	—
	1670	59.0	35.1	5.9
	1750	58.0	27.0	15.0
	1777	47.4	21.4	31.2
	1807	54.9	12.3	32.8
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的 52 个小村庄 a	1700	66.1	13.2	20.7
	1760	28.4	1.5	70.1

注：a. 瑞典属波美拉尼亚 1700～1760 年间人口增长了 76.6%。

上艾瑟尔省的有关数据指标极好地说明了农村社会阶层在更大范围的发展。从上艾瑟尔省 1602 年的税务登记中，可以发现其农业人口的构成情况。

农民	3 718 人	拥有 2 匹马或更多的马，农场规模大于 6 英亩
佃农	2 336 人	拥有 1 匹马或没有马，农场规模小于 6 英亩
总计	6 054 人	税务登记中的记录

根据上艾瑟尔省 1795 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来判断，在加入仆人占有量和牲畜保有量之后，当时的人口包括：

农民	4 614 户	拥有 4 头或以上的牲畜，一些仆从
佃农	3 429 户	拥有少于 4 头的牲畜，没有仆从
散工	1 803 户	没有牲畜
总计	9 846 户	农业家庭使用的牲畜和仆人数目

上艾瑟尔省在 1602～1795 年期间的人口增长状况见表 18。【129】

表 18　　上艾瑟尔的人口（1602/1675～1795 年）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总人口	1675	100	1795	217.6
非农人口	1675	100	1795	291.2
农业人口	1602	100	1795	162.6
在家庭规模农场上的农民数量	1602	100	1795	124.1
在小农规模上的佃农数量	1602	100	1795	146.9
佃农和按日计酬的短工数量	1602	100	1795	224.0

注：1675 年的人口指标与 1602 年的人口指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1602 年，按日计酬的短工数量还相当少，这使 1795 年按日计酬的短工（不包括佃农）的数量指标显得相当高。

下面对上艾瑟尔省在 1700～1795 年间的农村社会阶层的发展情况的统计进行了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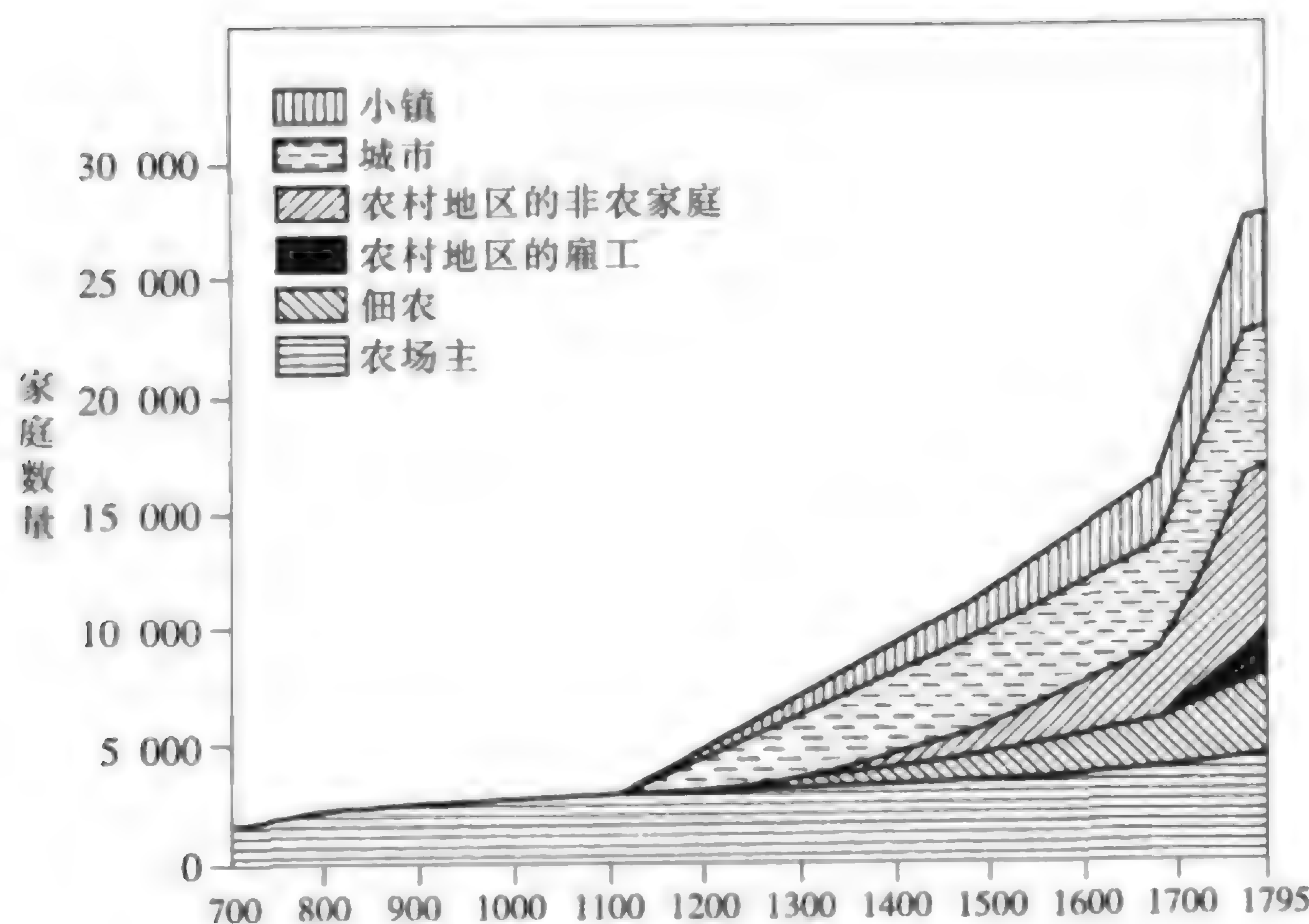


图 1　上艾瑟尔省的家庭数量

表 18 的数据表明，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比，农业人口的增长相对落后，因而 1602～1795 年间，新增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在非农部门寻找工作。1602 年，农民仍是农业人口中占比重最大的群体（占 61.4%）。但到了 1795 年，农民占总农业人口的比重则下降到一半以下（46.9%），而佃农则保持了其相对数量（1602 年在总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为 38.6%，1795 年则为 34.8%）。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对于大量的乡村居民甚至佃农来

说，其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了。按日计酬的短工队伍则越来越庞大，到1795年，其在农业总人口中的比重已达18.3%。他们当中只有少部分人进入了种植业部门，绝大多数的人则进入了畜牧业部门。

有关1602～1797年间人口增长与耕地、草场面积以及马、猪和羊的数量增长的对比情况见表19。

表19　　上艾瑟尔省耕地、草场面积以及马、猪和羊的数量增长情况（1602～1749/1844年）*

（指数：1602年=100）

	年　份	指　数
农业人口	1795	162.6
可耕地面积	1749	106.4
	1812	135.6
牧场面积	1749	104.2
	1812	223.3
马的数量	1812	100.4
猪的数量	1812	179.0
羊的数量	1844	80.6

* 1602年牛的数量不详。

上述指数清楚地表明，1602～1795年间耕地与牧场数量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农业人口的增长。由此导致了农场规模日趋缩小，而佃农的数量大幅度增加。马匹的数量基本维持不变，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等规模农场的数目与1602年相比并没有新的增加。养猪业是佃农农业制度的特征，我们也确实看到猪的数目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羊的存栏量的减少则是由于19世纪上半叶闲置土地数量减少了。

乡村中非农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职业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著。在低地国家中，非农行业的出现大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18世纪，在欧洲各地均出现了对各类工匠所提供的服务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工作在以往都是由农民完成的，如制造木器、建房和盖屋顶等。因为这时已不再要求农民必须成为一个“万事通”，因而他可以更加专心地从事农业生产。在那些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方，非农产业的发展通常也极为迅速，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

通过对18世纪上半叶上艾瑟尔和维卢屋（Veluwe）乡村地区就业结构

的研究，可以发现在总共21 664户的乡村人口中，63.3%的人在农业部门就业，36.7%的人在非农部门就业（包括工业、贸易、运输、金融和社会服【131】务等）。有些职业是各个大村庄共有的，如小店主、裁缝、木匠、商人、与农业相关的一些部门（如磨坊主、铁匠和车匠）以及乡村产业（如纺织、盖屋顶、烤面包和酿酒）等。相对罕见的区域性职业，包括石膏匠、外科医生、木鞋制造者和铜匠。我们很少见到所谓的城市职业，包括油漆匠、给瓷器上釉的工匠、助产士、药剂师、理发师、布商和屠夫。每个有教堂的村落里（称为“教堂村庄”，以区别于小村庄和孤立的农场），都会有牧师和教堂司事各一名，大多数地方还会有一名学校校长。

医疗保健的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1795 年，在上艾瑟尔省，每4 000人拥有一名外科医生，每8 000人拥有一名助产士。在乡村地区，情况还要更糟一些，因为医生和助产士一般都集中在城镇。在精神疗养和教育方面，乡村地区同样极度缺乏，每1 600人才拥有一名基督教牧师，每4 300人拥有一名天主教牧师，每 900 人才有一名教师。

一个男劳力同时从事农业和其他职业的现象，并不像人们有时想像的那样普遍。有人甚至指出农业与其他职业过于频繁的结合，使得人们不可能把农业职业和非农职业区分开来。在上艾瑟尔和维卢屋，从事混合职业的只有 247 例（仅占全部职业的 1.1%）。在上艾瑟尔，纺织工业早在 1795 年便从农业部门中完全分离出来。1675 年时，绝大多数的纺纱工还居住在农场上，而到 1725 年之后，人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大多数纺织工人居住在条件极差的凯岛盆（*kerkdorpen*）中。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张和牲畜数量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上艾瑟尔不得不依赖从其他地区进口的谷物。进口谷物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了食物，而且也进入了村镇和广大乡村地区。人们所摄入的谷物和动物蛋白均严重不足，这对贫困阶层的健康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据说，阿尔默洛的家庭纺织工业中的工人都极为虚弱且缺乏能量。由于住房条件较差，这部分人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只能居住在茅屋、窝棚、面包房甚至猪圈中。许多新建的房屋面积不超过 4 码 ×4.5 码，高不超过 2 码。房屋的建设同样落后于人口的增长。18 世纪下半叶，人口的高速增长进入尾声。人们遭受了流行性疾病和饥荒的痛苦，特别是 1770 年以后。上艾瑟尔为我们展示的图景——同时普遍存在于 18 世纪的欧洲——说明农【132】业社会的人口虽然在增长，但是却缺乏充分发展的经济资源的供给。

第三章

近代初期的欧洲渔业史

决定渔民收获量（也称为“海洋的收入”）大小的条件与制约陆地上收成大小的条件相比，存在着本质区别。在很多方面，渔民收入更为接近猎人的报酬，而不是农民。在欧洲，与农业用地不同，对大型渔场的占有，并不是通过法律或传统的习惯，而是通过渔民所具备的技能、必要时甚至通过武力取得的。渔民生产中的自然波动也要比谷物生产的波动复杂得多。商业化的渔业活动需要进行资本化的设备包括渔船、网具以及岸边的储藏库和腌制鱼的仓房等等。商业化的渔业同时也需要普通渔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技能。所以说，渔业所面临的许多压力，与近代初期其他工业所面临的压力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商业化的渔业活动本质上是一项海洋产业，由于所处理的均是极易腐烂的物品，因而迫切要求渔民与商人的利益密切相连。

本章集中阐述渔业与渔类贸易的一般性关系和限制因素，还将分析鳕鱼和鲱鱼捕捞业产生的一般性财富。当然，这里所做的研究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如网具、船舶设计等）进行的，尽管这些因素也都很重要。人们从直觉上推测，16 世纪、17 世纪期间，渔类食物的迅速扩张是对人口压力的反映，因为后者扩大了城市市场，这种扩张同时也是新的销售技术发展以及商业经济和渔业之间的象征性联系的自然反映。然而，只要上述这些因素不能

获得更大限度的实现，就有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因素，阻碍渔业的发展。这些因素可以概括如下：

工业化之前的经济不仅在饥荒出现时束手无策，在产品过剩的阶段同样如此。农产品和鱼类的价格完全按照格雷戈里·金定律（Gregory King's Law）运动，这意味着10%的产品过剩会导致价格下降30%；而10%的产品短缺，同样会使价格上涨30%。于是，渔民便有可能因为产品的过剩而遭受严重的打击。当然，在饥荒出现时，也会获得超过产量下降幅度的额外收益。从各方面因素来看，渔民的处境都是极其脆弱的。自然条件复杂的变动常常致使其收入难以预测。欧洲绝大多数地方的渔民多为穷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要依赖商人提供的恩惠，后者能够支付得起船只设备的预付款和储藏鱼所需要的高额成本。更为不利的是，在战争期间，捕鱼的船队极易遭受【133】攻击。渔场的方位是能够预测的，在捕捞作业中，船只多多少少来说是固定不动的。由于渔船的设计并没有防卫的功能，又由于捕捞渔船数目众多，并且在捕捞过程中彼此之间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因而难以进行有效的护航。由此看来，我们再次引述乔治·克拉克观察到的，在整个17世纪只有4年的和平时间能够用来熟悉渔民们所面临的问题。

3.1 有关捕鱼历史的资料

有关欧洲渔业的确切历史至今尚未被写出来的一个原因是，1750年以前有关捕鱼业的数据资料的记录极为稀缺。人们最容易得到的同时也是被广为引用的，往往是那些出版小册子的英格兰作家对荷兰鲱鱼捕捞业加以颂扬的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常常存在着论证上的错误。即使他们声明其结论［如约翰·肯姆（John Keymor）和威廉·曼森（William Monson）爵士所做的那样］是建立在对原始资料的考察基础之上，也很少有关于捕鱼业的第一手资料。H. 克伦恩保夫（H. Kranenburgh）博士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反驳了同时代研究中有关英格兰对荷兰捕捞船队在规模、利润及其他方面的推测。①

无论是确立有关投入作业的渔船数量，还是更为重要的总捕捞量的长期趋势，几乎是不可能的。本章的结尾复印了几个最优的关于这方面的模型。

① 克伦恩保夫：*De Zeevisscherij van Holland in den Tijid Republiek*（阿姆斯特丹，1946年），第25～43页。

自18世纪中期开始，得以保留的原始数据增加。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恰好与欧洲渔业史中的一个转折点相吻合，即欧洲渔业经过了长期的衰退（至少是停顿）之后开始新的增长。1760年以后的数据与1500~1750年间的事实几乎没有丝毫关联，它只属于19世纪蒸汽动力渔船出现以前的历史。因此，由于资料分散，写作近代初期的渔业史只能像摆弄拼图玩具一样，具有不稳定性。克伦恩保夫博士对荷兰海洋捕捞历史的研究，E. 达德尔（E. Dardel）的有关法国鲱鱼捕捞的著作，[①] 以及莫兰迪尔荣誉勋爵（Ch. de la Morandière）的有关法国捕鱼业的著作，都是这方面有名的著作。有关渔类贸易的结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英格兰的海关记录和丹麦海峡的税收登记中，也无法考证出经加工以后的鱼的贸易流向，并且这种考证还会带来新问题，数目不亚于它们所能够解释的问题的数量。从西班牙历史档案的详细记录中，或许可以获得一些有用信息，这些信息与纽芬兰的水产品运抵西班牙有关。从根本上说，本章建立的基础并不仅仅是对已出版的著作的总结上，同时也是建立在西欧各国的档案材料上的。 【134】

由于缺乏可信的资料，致使第一个问题，即16世纪的渔业增长情况，难以得到准确的回答。即使参与捕捞作业的船只数量具有可比性，有关其规模和平均收获量的数据通常也不全面。从一般意义上讲，16世纪欧洲渔业生产确实有所增长。然而，有关两处重要渔场的资料否定了这一趋势。一个是斯堪尼亚（Scania）的鲱鱼渔场，由于报道的产出量过大，以至于人们对其准确性产生了怀疑。不仅如此，实际上，这里鲱鱼资源的枯竭还导致低地国家鲱鱼产量的增加。在投入捕捞作业的船只数目方面，到16世纪中期，这一后起的产业已经与17世纪时一样多。第二处问题出在英格兰渔场。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渔业的发展极为缓慢。直到16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才可以肯定地说英格兰捕捞船只的数量超过了工业革命前的水平。北美洲渔场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地区，然而，英格兰北海和冰岛的鳕鱼渔场的总产量要大于英属纽芬兰渔场的总产量却是极为可能的。有一件事似乎是清楚的，欧洲渔业总产量的增长速度抵不上其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

① E. 达得尔：《法国的鲱鱼捕捞业》（巴黎，1941年）。

3.2 自然波动

由于许多明显的原因，各种类型的渔业活动的产量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暴雨会阻止渔民出海，或者在他们抵达渔场之后阻止他们进行捕捞作业。狂风及反复无常的气温也会加大自然界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存在于捕捞阶段本身，同时也存在于鱼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各种不利的条件，无论是气候方面的，还是与鱼类的食物供应相关的，还是在鱼类孵化阶段的侵扰因素，均会造成未来 3 ~ 4 年内的坏收成（如北海鲱鱼的例子），也存在长周期和波动。15 世纪波罗的海鲱鱼渔场陷入萧条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尽管对其的研究尚不充分。气候史也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同时因为有关渔业史的数据资料过于稀少，我们难以建立起这一时期内气候的长期变化与渔业之间精确的关系。

【135】那些对浮游鱼类有依赖的部门的波动尤为显著。这样的浮游鱼类包括鲱鱼、鲭鱼和沙丁鱼。这类鱼的捕捞带有很强的季节性，通常是在产卵期内进行，此时它们会在滋生地以庞大的鱼群出现。布尔纳夫（Bourneuf）的地方长官，曾于 1717 年向主管法国渔业的最高长官报告了有关沙丁鱼的资源状况，说："沙丁鱼成群聚集而捕鱼人很少的情况，已经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鲭鱼的状况与沙丁鱼类似，在某些年份中，其捕捞量的价值可达到 25 000 ~ 30 000 里弗。其他种类的鱼也有相似的情况。英国渔业公司试图在刘易斯（Lewis）的小岛上建立商业化的鲱鱼渔场，但是失败了，因为其最初的捕捞量大大出乎预料，但在随后的几年却又未能达到预期的数量和质量。不仅如此，即便是在雅茅斯这个鲱鱼产量最为丰富的地方，英格兰、荷兰和法国船队都参与作业，也出现过捕捞量少且质量差的时期，如 1610 ~ 1620年间。①

深水鱼类如鳕鱼、石南及其他白色鱼类的捕捞同样是难以预测的。这种鱼一般生活在海底，因而只有在钓钩上装有诱饵的长鱼线才能钓到它们。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水面上观察到它们，因为它们不会游到浅滩之中。这种鱼的捕捞季节也有弹性，主要依赖于天气条件是否适合捕捞。然而，在任

① 高提夫·海姆派尔（Gotthiff Hempel）已列举出影响鳕鱼在 30 ~ 60 年的好收成以后出现 50 ~ 80 年的坏收成的因素（最后一次好收成在 1906 年年底结束）；他还指出长达 500 年的周期中出现的情况。



图2　主要的鲱鱼渔场，渔场里有欧洲各地都能捕捞的基本鱼种

【136】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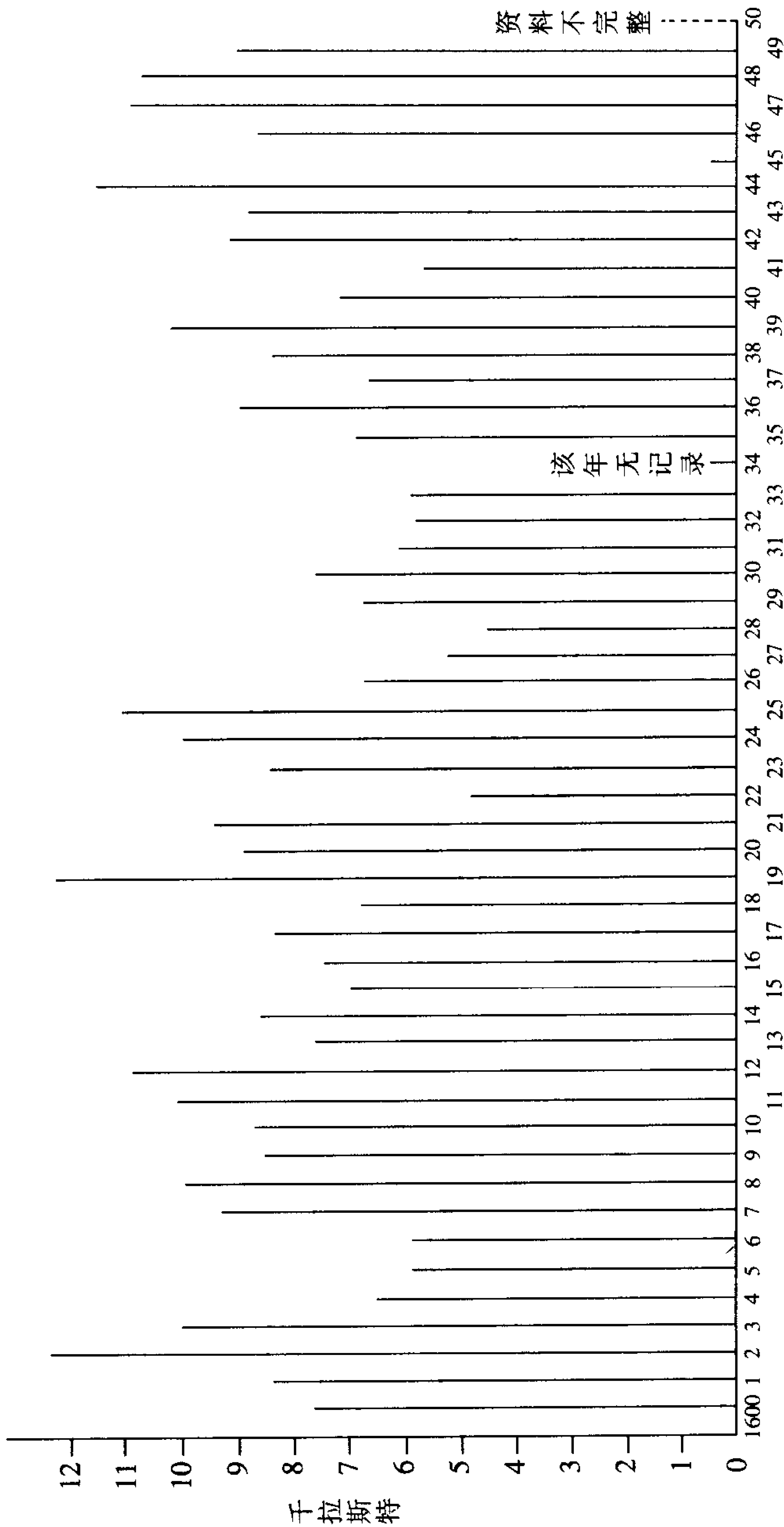


图 3　1600~1649 年间流经丹麦海峡的荷兰鲱鱼的年产量波动图

何一个地方，鳕鱼的捕捞量一般来说都要取决于当年鳕鱼资源丰富与否。英属纽芬兰渔业在 1676 年以后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对白鱼产业的产量控制和对浮游鱼类产量的控制一样不容易。如果鲱鱼、鲭鱼或沙丁鱼不出现的话，人们便不知道它们究竟藏在哪里。而如果纽芬兰、冰岛和多哥之间的某一鳕鱼渔场的产量看起来不甚理想的话，通常会有多方面的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同样地，不可预测性也是那些较大品种的鱼类（如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中巡游的金枪鱼以及水中的哺乳动物鲸等）的产量的特征。设在斯匹次卑根的英格兰渔业公司，曾于 1654 年宣称"无功而返的出航次数比满载而归的次数要多得多"，它们的收益依赖于每 3 年或 4 年内出现的大批鲸群。

捕捞量的这些波动产生了值得深思但同时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同品种的鱼类在从渔民到消费者手中的各个环节，价格均会出现相当大的波动。那些产量最难以预测的渔场，同时也是勘察最少的渔场。产量最有保障的常常 [138] 是那些不仅仅依赖于某一个渔场的渔业。荷兰的渔民可以找到三个鲱鱼捕捞季节，第一个在每年的 6 月、7 月间，地点在奥克尼群岛（Orkneys）附近、设得兰群岛（Shetlands）和苏格兰北部沿海；第二个季节是 8 月份，地点是从苏格兰的顿巴（Dunbar）到约克郡；第三个季节从 9 月末一直到 11 月份，地点在雅茅斯。当时的人们确信荷兰渔民跟踪的是同一个鱼群，它们每年从大西洋出发，围绕英伦诸岛做全程巡游，第二年再回到故乡。然而，实际上，鱼群的巡游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有规律。近来的研究表明，这种鱼汛是由完全不同品种的鱼，在各个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上的运动交织而成的。雅茅斯的鱼汛就是由两种不同品种的鱼群的运动构成，一群沿着海岸游动，另外一群则是向着海滨的方向游动的。这些事实使上述三个鱼群出现的主要季节各具特色。1715 ~ 1730 年间，恩克辉森（Enkhuizen）的渔船在首次出海时会收获丰富，而第二次出航就少得多了，一般要比第一次少 20% ~ 50%。但自 1731 年起，这种情况完全逆转过来，第二次出海的收获颇丰，而首次出海的捕捞量则要少得多。

雅茅斯从事深海捕捞的渔民在进入鲱鱼捕捞季节之前，会在整个春季和夏季都从北海和冰岛附近捕捞鳕鱼。东盎格鲁（Anglian）沿海的渔民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们在冬季和春季捕捞鳕鱼、白色鱼类及扁平鱼类；在 6 月、7 月间则转入到鲱鱼的捕捞之中；之后，自圣巴塞罗缪节（St Bartholomew）庆典开始直到米迦勒节（Michaelmas）转入到鲱鱼捕捞之前，他们一直都在从事鳕鱼的捕捞。埃塞克斯的巴克（Barking）的渔民使用的是拖网（这种网具在西部沿海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因为它会极大地破坏渔业

资源。然而，从政府的有关法规来看，并未禁止这种网具的使用），他们每年都在东盎格鲁沿海水域从事捕捞作业。英格兰南海岸的渔民每年两次由布赖顿出发，向东前往北海航行，第一次在初夏，主要捕捞鳕鱼；第二次在秋季，主要捕捞鲱鱼。他们同时也从当地的肯特郡和萨塞克斯沿岸进行捕捞中受益。法国迪拜的渔民可以分成两大类：从事深水捕捞的渔民和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大型船队每年出海四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捕捞鲭鱼（第一次是在春季的爱尔兰，第二次是在诺曼底之外的英吉利海峡）。一些规模较小的渔民一年四季都使用鱼线来捕捞白色鱼类及扁平鱼类，从未停止过。相反，一些规模较大的渔民则停止了在英吉利海峡捕捞鲱鱼和鲭鱼的活动。在欧洲沿海的各个渔港中，都拥有各具特色的渔业模式，每个港口都与邻近的港口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每个港口也都在试图尽可能地延长捕捞季节，同时也尽可能容纳更多种类的鱼。在这个一般性规律之外，也有特殊情况，如英[139]格兰西部地区的纽芬兰渔船、每年出海一次寻找白色鱼类的各式各样的法国船队、捕鲸船队以及近海渔民。后者通常会用尽一切办法捕捞他所能获得的鱼类，所使用的网具和鱼线也五花八门。他们之所以能够得以生存，是一条基本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即对某种鱼类产生危害的不利条件通常会对其他品种鱼类的繁育和生长有利。

还有一些问题也值得讨论。除荷兰的鲱鱼捕捞业外，整个欧洲的渔业无论在横向方面还是纵向方面都明显缺乏联合。渔民非常可怜，不同的捕捞季节必须使用不同的设备，捕捞鲱鱼所使用的网的网眼比捕捞鲭鱼的网要小一些，捕捞鳕鱼所需的网具与它们相比又有所不同。英格兰当时推算显示，在船队的成本支出中，捕捞鲱鱼的网具占不包括船只成本在内的总成本的66%。在英格兰民众的经过公证的财产清单中，鲱鱼网具的价值大约为许多渔民可动产的20%。网具极易受到暴风雨的破坏，例如，1715年雅茅斯城中约有1/4的渔船的网具都丢失了。迪拜（Dieppe）沿岸渔民要依靠适合捕捞鲱鱼或鲭鱼的季节满足生活需要，但却由于太贫困了，买不起满意的网具。相反，使用鱼线来钓鱼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开支。“可以肯定地说，在欧洲最好的生意是钓鳕鱼”，17世纪时一名法国人曾经评论道，“因为（钓鳕鱼）除了付出捕捞和销售的努力外，几乎不需要其他成本。”[1]

---

① 引自布罗代尔（Braudel）：《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1400～1800年》（伦敦，1967年），第149页。

3.3　渔业的不同结构

在欧洲，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领域都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唐纳德·克莱曼（Donald Coleman）发现纺织工业具有这一特征，他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其他许多行业都具有同样的特征。然而，没有一个行业比渔业在这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更为显著。在欧洲沿岸，从黑海到冰岛，都存在着大量自给自足的渔民。他们依赖海洋，通常也都是非专职的农民。他们从事渔业的首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自身消费后剩余的鱼类才拿去出售，或者像设得兰（Shetland）的渔民那样，用剩余的部分去换取谷物等其他食品。这些社区均处于远离人口中心的较为偏远的地方，如挪威、苏格兰西海岸、爱尔兰和布列尼塔，并且常常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大多数的鱼会很快腐烂掉。因此，这些社区总体上来说，是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如果开办企业的商人找到他们后，他们会在主要的渔港中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所捕捞到的鱼。按照约翰·斯普尔（John Spreull）的观点，17世纪末，在雅茅斯北海【140】从事鳕鱼捕捞的渔民发现，通过从苏格兰渔民手中购买鱼要比自己亲自去捕鱼能够使船舱满得更快。

“我到船上去了解渔业的状况，从船长那里获取了许多信息。他告诉我刚刚在北方进行完捕捞作业，现在是满载而归。他隐藏了捕鱼的准确地点并夸大了在一些远程国家的捕捞量。然而，在与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他告诉我他出去时要带上专门供给他船队的压舱船，同时还要备有一些金钱。他们直接航行到苏格兰的寇克尼（Colkenie），在那里购买盐，并在此地经过讨价还价，购买下当地渔民所能捕捞鳕鱼的总量。之后，他们便巡回在北阿伯丁（North Aberdeen）沿岸各港口间，购买鱼类，直到其船只被装满为止。当然，购买的价格正像任何渔业交易者可以想像的一样，非常低。通过我们在附近海岸和利斯（Leith）购买鳕鱼干和鳕鱼的经验，我猜想，他付给渔民的钱不会超过1.2英镑，即使最大批量的售卖和零售，价格也只是2先令6分”。①

从上述记录及其他丰富的史料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在绝大多数沿海地

① J. 斯普尔（J. Spreull）：《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交易记录及其评价》（爱丁堡，1705年，初版；哥拉斯哥，1881年，二版），第68页。

区，新鲜的鱼和干燥的白色鱼类通常是较为廉价的，甚至在利斯和爱丁堡的外港口也是如此。那些自给自足的渔民，有可能与那些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进行了很小程度的合作，后者更希望对其捕捞量中的绝大部分进行销售而非自己消费掉。这不仅包括使用小型渔船进行作业的渔民，也包括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岸边的渔民，后者通常会在浅水区域，特别是在江河的入海口设立固定的网具或其他装置来捕鱼。在皮卡第、诺曼底和布列尼塔沿岸地区，这种捕鱼方式尤为普遍。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还包括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即从事淡水渔业的渔民，他们同样要使用网具、鳗鱼捕捞装置甚至渔船。以诺里奇（Norwich）为例，从其渔业市场的记录可以发现，16 世纪时，尽管该城的 15 000 人口可以获得来自于雅茅斯的充足的海产品供给，但大批量的淡水鱼类（现如今没有几个英国人会多看一眼的）如鲤鱼仍然很畅销。绍洛德·罗杰（Thorold Rogers）所做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无论距捕捞地点远近与否，淡水鱼类总是较为廉价的，它们也主要为穷人所食用。在任何一个有廉价鱼类供给的地方，淡水鱼都是被大量消费的食品。由于这种鱼在其腐烂之前必须尽快地销售出去，这导致了 17 世纪的人们不得不长时期地忍受消费此类鱼的单调口味。这反过来也训练了人们的忍耐力。被伦敦的渔业公司认定为不适于人类消费的鱼类，在泰晤士河下游的小城镇中却【141】极为畅销。遗憾的是，这个从其本质属性上可以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并且与大量人口的食物供给问题密切相连的捕渔业，却极少留下数量方面的指标。实际上，若从鱼的捕捞量上来看，它或许可以成为同一产业内其他得到人们认同的部门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鱼的买卖都是现金交易，它有可能发生在市场的摊位上或在海岸上，也有可能是渔贩甚至是渔民妻子沿街叫卖。这种类型的交易方式几乎不会留下什么书面记录。因此，对第三和第四类的渔业，人们也必须给予较大关注。

继自给自足的渔民和满足地方市场需求的近海渔民之后的第三类渔民，产生于一些品种所具有的季节性特征。在鲱鱼、鲭鱼、鲱鱼属的小鱼或沙丁鱼的捕捞季节，运抵港口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当地市场的容量。此时，迫切需要对这些鱼类进行保存和运输的商人的参与。这种季节的交易已经接近于经济形式的商品交易。1566 年，在威尔士（Wales）的阿伯多维（Aberdovey），只有三家贸易公司。而当鲱鱼的捕捞季节来临之际，“为数众多的渔商带着船、长统靴和容器云集到这一渔船的王国。”[1] 在设

---

① P. R. O. SP. 12/38/30.

得兰，汉萨同盟商人们设立了自己的摊位，收购当地捕捞的鲱鱼和石南；同样地，在每年的7月、8月间，当地人也会设立自己的摊位满足荷兰人的需要。这种交易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体现这种重要性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鲱鱼交易市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内，雅茅斯的“自由”交易市场是这类渔业活动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如此多的人从英格兰、法兰西、荷兰和西兰岛等各地来到了这里。”卡姆登（Camden）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最后一种也是第四类渔业，是最为先进的捕捞方式，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并建立在商业化公司的基础之上。处于这一先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是荷兰的帆船鲱鱼捕捞业，荷兰的做法被法国、英国和爱尔兰的鲱鱼捕捞业，纽芬兰的渔业和冰岛的渔业及捕鲸业所效仿。

3.4　鲱鱼捕捞业

决定鲱鱼业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如果在24～48小时以内未及时对鲱鱼采取必要的保存措施，则鱼就要变坏，这样一来，除了最为贫困的阶层购买以外，在市场上将无人问津。由于鲱鱼的主要渔场紧靠英伦诸岛，因而法国、荷兰及其他大陆国家中参与鲱鱼捕捞的渔民们，必须在船上完成从腌制到装桶的全过程。而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本土的渔民们则可以省出一部分船只，将在每天夜里捕捞到的鱼运送到近便的港口中，从而使腌制、装桶等工序得以在岸上完成。所以，荷兰人不得不使用载重量高达80吨的大船（当时英国渔船的平均载重量仅为2～15吨）。英国的一些编纂小册子的作家被这一数据所震惊，错误地判断船舶运载量重是获得经济利益的必要条件。① 实际上，19世纪英国辉煌的鲱鱼捕捞业，就是建立在对小型船只的使用及在岸边进行腌制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精明的荷兰人船舶使用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了经济上的必要。要弄清利益这个实际问题，应当把荷兰的帆船渔业同法国、西班牙属尼德兰、汉堡和东法兰德斯等其他国家之间加以对比。 【142】

① 为便于理解，所有计量单位均以吨或拉斯特（last）表示。

1. 英格兰的鲱鱼捕捞业

我们不考虑阿伯多维、普利茅斯（Plymouth）和丹麦海峡东部各港口外的小型渔场，只重点考察两个重要的鲱鱼捕捞区域。第一个也是相对次要一些的是约克郡北部沿海，在这里在从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到布瑞丁顿（Bridlington）的小渔村的鲱鱼捕捞业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这里所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为“5人卵石”的渔船，其构造直到20世纪才有所变化。船的侧面装有便于泊岸的龙骨，船载重量一般不超过6吨。在约克郡北部沿海港口的记录中，几乎找不到有关鲱鱼从海边运输的记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捕捞量一定很小，且主要是为满足当地的消费需要。这些渔民也会带着他们为数不多的捕捞量到第二个主要渔场中，即雅茅斯和洛斯托夫特以外的海域中。在这里，他们的船与那些来自于东盎格鲁沿岸的规模相当的渔船、雅茅斯城里的8~15吨的渔船，以及从萨尼特到布赖顿这一段的英吉利海峡的渔船（其规模通常都较大，到17世纪时已达到了24吨）并肩作业。加入到这一行列的还有来自于荷兰、法国的少量近海渔民及更少量的西班牙属尼德兰渔村中的小渔民。这些外国的渔船，包括“覆盖草地的石竹花”、“荷兰蟾蜍”、“螃蟹壳”、“胡桃壳”及大大小小的“尤尔”（yeuer），均由于规模过小而难以完成像帆船所能够完成的一系列工作，包括在船上腌制、保鲜或初步腌制，然后将这些鱼出售给雅茅斯的城里人等全过程。雅茅斯人将购来的鱼的大部分进行熏烤，制成“红色鲱鱼”，以区别于产自荷兰渔船上的腌制鲱鱼或白色鲱鱼。①

约在1600年，鲱鱼的捕捞活动达到了第一个顶点。当时这里的渔场（按照雅茅斯的记录）吸引了大约500~600艘小渔船。17世纪初期以后，这一数目开始下降。“海洋变得日益荒芜，人烟稀少。”正如一位牧师于1627年所观察到的（但是，这种说法从年代顺序上看，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到1627年，雅茅斯海域已经恢复了其往日的繁荣）。② 另外一次高潮出现在1670年以后，此次作为繁荣标志的不是船只数量的增加，而是船只载重量的增加。船只数量只有300艘。这种繁荣持续到1720年，此后不久，就又重新进入到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这期间鲱鱼腌制数量和包装数量（鲜

【143】【146】

① T. 珍图曼（T. Gentleman）：《英国的财富之路》（伦敦，1614年），第26页。

② G. 海克威尔（Hakewill）：《在政府存在的世界上上帝的宣言和神意》（伦敦，1627年），第21~22页。

鱼的消费量无法估算，但是，即使腐烂速度非常快，消费量也不可能超过100拉斯特）如下（单位：拉斯特）：1598～1604年，3 000；1619～1637年，1 500；17世纪60年代，3 500；1678～1688年，3 800；1689～1711年，2 000；1712～1720年，4 000。[①] 有必要指出，17世纪初期出现的高峰离不开低地国家（主要是西兰岛）的渔民和法国渔船的帮助。即使在整个16世纪，英国大多数年份的捕捞量都包括国外英国人的捕捞量在内（当时允许这样）。从17世纪30年代起，英国的捕渔业开始更多地依赖其自身的资源。开始的时候，查尔斯一世对荷兰捕渔业在总体上采取敌对态度，随后进行的三次荷兰战争加剧了这一趋势。166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禁止外国船只运送鲜鱼上岸。而实际上，这一法令只在东盎格鲁沿岸间断性地执行过一段时间。

表20　　大雅茅斯的捕捞船队*

年份	捕捞鲱鱼渔船数量	捕捞鲭鱼渔船数量	第一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第二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冰岛的渔船数量
1581	99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82	不详	不详	47	59	不详
1583	—	—	—	—	—
1584	116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85	不详	不详	46	57	不详
1592	97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93	107	47	31	不详	不详
1594	111	37	30	不详	10
1595	111	41	43	51	19
1596	98	34	34	27	27
1597	113	36	32		35
1598	98	39	38	51	39
1599	115	27	32	32	27
1600	104	32	40	42	21
1601	104	51	46	49	25
1602	113	49	61	74	26

① 这些数据主要来自于P. R. O. E. 190册，代表的是形式上的捕捞量，而不是数学平均数。由于捕捞量每年都会发生巨幅波动，运用数学平均值的计算方法并不准确。例如，1629年的捕捞量出奇的大，大概等于1598～1604年间捕捞量的总和。

续表

年份	捕捞鲱鱼渔船数量	捕捞鲭鱼渔船数量	第一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第二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冰岛的渔船数量
1603	119	41	65	71	15
1604	120	41	57	72	6
1605	114	39	69	81	5
1606	109	36	82	87	—
1607	108	36	75	85	11
1608	100	不详	80	91	17
1609	95	37	83	95	13
1610	92	32	85	87	20
1611	84	23	83	90	17
1612	86	32	84	100	17
1613	83	31	88	90	18
1614	82	28	92	105	22
1615	68	30	95	119	24
1616	68	39	100	125	20
1617	63	25	126	109	13
1618	46	19	116	144	18
1619	49	20	108	94	不详
1620	41	19	87	96	31
1621	46	17	82	64	29
1622	44	12	85	59	23
1623	46	12	79	76	36
1624	45	不详	86	81	43
1625	46	不详	87	不详	不详
1626	40	4	58	20	34
1627	不详	7	77	49	49
1628	85	6	69	21	19
1629	124	12	83	75	32
1630	103	14	97	70	50
1631	113	15	110	110	48
1632	99	14	141	122	51
1633	103	8	145	131	44
1634	91	7	158	138	43
1635	88	7	160	120	63
1636	78	7	145	142	48

【144】

续表

年份	捕捞鲱鱼渔船数量	捕捞鲭鱼渔船数量	第一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第二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冰岛的渔船数量
1637	83	8	149	161	39
1638	86	9	156	144	50
1639	92	6	150	145	35
1640	89	5	154	140	36
1641	89	不详	157	154	25
1642	87	6	159	153	23
1643	82	8	49	131	25
1644	77	5	182	182	3
1645	78	6	136	97	10
1646	76	7	127	119	20
1647	76	6	139	136	25
1648	74	4	160	155	33
1649	80	4	122	91	17
1650	75	4	132	96	39
1651	68	5	102	20	34
1652	53	5	81	23	18
1653	55	4	31	11	20
1654	162	4	60	37	15
1655	44	4	81	67	21
1656	33	不详	46	3	15
1657	不详	4	42	11	31
1658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59	45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60	46	1	23	17	57
1661	40	不详	25	26	23
1662	不详	2	18	10	20
1663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6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65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66	30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67	47	不详	6	不详	13
1668	56	6	20	15	17
1669	64	9	24	19	27
1670	60	11	28	22	36

续表

年份	捕捞鲱鱼渔船数量	捕捞鲭鱼渔船数量	第一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第二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冰岛的渔船数量
1671	77	13	42	25	40
1672	76	9	26	10	8
1673	68	16	12	5	17
1674	86	14	32	26	27
【145】1675	102	12	48	48	32
1676	102	6	51	31	21
1677	105	8	45	40	13
1678	96	12	23	140	12
1679	87	11	50	27	23
1680	92	16	50	42	14
1681	不详	10	43	36	10
1682	8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683	81	8	40	26	15
1684	63	7	33	31	15
1685	44	8	25	20	15
1686	49	5	5	11	12
1687	49	5	21	15	12
1688	46	5	21	15	12
1689	51	3	不详	30	6
1690	41	不详	8	1	全部
1691	22	7	2	2	2
1692	15	4	3	3	3
1693	16	2	7	3	4
1694	19	5	9	0	3
1695	16	4	8	3	2
1696	14	5	1	3	4
1697	18	4	2	0	3
1698	24	6	16	12	4
1699	32	6	16	1	2
1700	10	7	15	4	2
1701	19	5	2	1	1
1702	10	5	1	0	1
1703	9	9	3	0	0
1704	3	不详	0	0	1

续表

年份	捕捞鲱鱼渔船数量	捕捞鲭鱼渔船数量	第一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第二次北海航行渔船数量	冰岛的渔船数量
1705	7	6	0	0	1
1706	4	7	0	0	1
1707	9	8	3	0	0
1708	9	7	3	3	2
1709	13	7	3	0	1
1710	13	12	13	0	0
1711	18	12	1	0	1
1712	17	15	2	6	2
1713	21	17	9	7	5
1714	22	13	7	3	1

* 资料来源：大雅茅斯公司（Great Yarmouth Corporation）MSS27/1－4。这些数据只包括在大雅茅斯渔港中过冬并且获得赢利的渔船数目。

2. 苏格兰的鲱鱼捕捞业

苏格兰鲱鱼的捕捞主要是在一年的某一时间，集中在苏格兰沿岸的海域进行，大多数渔民均在近海的浅水中从事捕捞作业，所使用的多是较小的船只。16 世纪时，丹麦和汉萨同盟的商人们会在每年的 7 月造访奥克尼，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购买鱼。然而，可供出售的数量一般都很少，大多数鱼类都在当地被消费掉了，保存下来的鱼类极少。只有在东海岸的主要港口邓迪和邓巴以及西海岸的港口克莱德，才存在着大批量的用于交换的鲱鱼。而作为重要的桂鱼出口中心的阿伯丁（Aberdeen），在鲱鱼贸易中则显得无足轻重。

渔业在苏格兰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远高于其在英格兰的地位。莱司（Lythe）推测，1625 年以前，渔产品的出口量在苏格兰出口总量中占 20%，而在 17 世纪 30 年代以及 17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年份中，其比重可能更高一些。现存的资料也表明，在苏格兰北部王国中，鱼类的消费量也要比英格兰高出许多，然而其出口所占的比重则要比东英格兰低一些。16 世纪 90 年代，东部各港口出口量在 200～250 拉斯特之间，而克莱德河（Clyde）的出口量在 400～500 拉斯特之间。东部各港口出口中的绝大部分鱼类都输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自 1600 年起，每年通过丹麦海峡的数量大约有 300 拉斯特；到 1620 年以后，这一数量增加到 400 拉斯特。然而，进入 17 世纪 40

年代以后，通过丹麦海峡运输的量开始减少，以后就再没有超过 200 拉斯【147】特，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 1696 年才有所改变。和平年代恢复之后，出口量迅速回升，一举突破 1 000 拉斯特，这实际上超过了由丹麦输往波罗的海的大为减少的鲱鱼数量。1731 年以后，事情又发生改变，苏格兰的出口量再次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西部各港口中的产量情况很难跟踪。鱼产品的交易几乎全部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各港口进行。17 世纪末，有两个作家都肯定地提到，和平时期从克莱德运送出去的鱼的数量在 2 500 ~ 3 000 拉斯特之间。与许多小册子中提供的资料一样，这些数据也是大大夸大了。现存的少量港口记录（1681 年以前的全部记录）中，没有一份显示离开克莱德港口的数量超出了 100 拉斯特。除此之外，路易十四颁布的禁止从国外进口鱼类的法令以及法国战争的爆发，都极大地破坏了鱼类贸易的发展。

3. 荷兰的鲱鱼捕捞业

荷兰的鲱鱼捕捞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用于捕捞鲱鱼的帆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前制造出来的船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最近，这种船舶又在捕捞作业中重新使用。编纂小册子的作家宣称这种船的载重量在 30 ~ 1 001 拉斯特之间，然而所有的记录都表明帆船达到最佳经济规模的载重量为 30 拉斯特（在 16 世纪，也曾经出现过载重量达 46 拉斯特的渔船）。在整个出海阶段，这艘船能够完成从清除内脏、腌制和捕捞等工序。由于它备有充足的盐、食物和木桶，可以在海上停留 6 ~ 8 个星期。在荷兰白色鲱鱼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严格的管理措施，如对于盐和鱼质量的控制等等。为了检验其质量，所有的鲱鱼在运抵荷兰口岸之后均要进行再包装。这里的鲱鱼捕捞业受到了高层组织的严格监督。这一机构有荷兰 5 个主要渔港的代言人：布里尔（Brill）、鹿特丹、斯希丹（Schiedam）、代尔伏和恩克辉森。这 5 个城市的代表执行所有与鲱鱼产业相关的法令。这一机构诞生于 1575 年的一次由奥朗日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组织的会议上，并在 1580 ~ 1582 年通过法律的确认成为一个官方机构。

这一阶段低地国家的鲱鱼捕捞业发展得很好，尽管比其他地区的分布要均匀一些。据说，1562 年时有 700 艘领头渔船，其中 400 艘属于荷兰，200 艘属于西兰岛，100 艘归法兰德斯所有。有一种能站住脚的说法是，当时敦刻尔克（Dunkirk）港口拥有的渔船数量已经达到 200 艘。然而，在随后的

20 年间，船队却迅速衰落，直至消失。雅茅斯的有关记录也确认在 16 世纪中期，为数众多的敦刻尔克渔船把鱼运送到自由交易市场。克伦恩保夫估算 17 世纪初，约有 450 艘荷兰和法兰德斯的渔船在此从事捕捞作业。近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算中没有把西兰岛的渔船包括在内。西兰岛的渔业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种打击与其所遭受的以敦刻尔克［1601 年以后为奥斯坦德（Ostend）］为基地的海上掠夺相差无几。费尔勒（Veere）和济里可泽（Zieriekzee），可能是 1600 年之后仍旧有渔船在从事捕捞活动的两个城市。 [148]

克伦恩保夫博士所做的估算必须加以校正，要增加 20～30 艘渔船。他根据盐税推断出 1599 年的总捕捞量约为 8 000 拉斯特。克伦恩保夫相信，17 世纪 30 年代以后参与捕捞作业的船只数量已达 500 艘以上。然而，斯希丹的记录（也是有关这一阶段中惟一保留下来的资料）并不支持他的推断。在这里，1600～1625 年间似乎只有 50～60 艘帆船，而进入 30 年代之后，出航的渔船只剩下 20～25 艘。但是，17 世纪 40 年代通过丹麦海峡的荷兰鲱鱼捕捞船只的数量，只相当于 1599～1612 年间的水平。图 2 给出了通过丹麦海峡的捕捞船只数量的记录。克伦恩保夫估算出的 17 世纪 40 年代的平均年捕捞量为 200 000 拉斯特。历史学家不会忘记，编纂小册子的作家所宣称的 1 000～2 000 艘渔船能够捕捞 100 000～300 000 拉斯特的图景，也刚刚达到他的推断。特别是这些推断都必须做向下的修正。例如有人推断 1537 年斯堪的纳维亚的捕捞量为 50 000 拉斯特，从而声明这是波罗的海鲱鱼捕捞的最后一个高峰年。不仅如此，所有现存文件均支持捕捞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判断。或许克伦恩保夫博士对平均捕捞量的估计过于悲观；他忽略了西兰岛的渔业，同时可能高估了有关记录的真实性。然而，无论什么形式的调整，都不会使荷兰在整个捕捞季节的平均捕捞量超过 25 000 拉斯特。17 世纪 60 年代，这一总量下降到 16 000 拉斯特；直到 18 世纪 20 年代，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此时，参与捕捞作业的船只只有 200～250 艘，捕捞量仅 8 000 拉斯特。1654 年以后，通过丹麦海峡的鲱鱼捕捞量超过 4 000 拉斯特的年份只有 4 次。1714 年以后，如前所述，苏格兰鲱鱼的出口量超过了荷兰。

造成鲱鱼捕捞量下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并且有待以后做出更为详细的检验。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几乎没有渔船在一年当中会出海三次。即使经常有描述说，捕捞业具有出海三次的特征，但如果在三次出海中的某一次捕捞量很少的话，则通常被忽略不计。同样，前两次的捕捞量越丰盛，则第三次被吸引出海的人越少。

表 21　　代尔夫特沙文的渔船船队（1633～1750 年）

年份	鲱鱼船 (Herring jagers)	鲱鱼船 (Herring busses)	总捕捞量 拉斯特 (lasts)	平均捕捞量/双桅渔船 (buss)
1633	—	85	2 559	30. 1
1634～1638	—	—	—	—
1639	—	61	2 516	41. 2
1640～1641	—	—	—	—
1642	—	67	2 754	41. 1
1643	—	64	2 129. 5	33. 2
1644	6	63	2 580	40. 9
1645	—	68	2 764	40. 6
1646	—	61	2 117	34. 7
1647	—	64	3 012	47
1648	—	61	2 581	42. 3
1649	—	62	2 973	47. 9
1650	—	70	3 262	46. 6
1651	—	72	3 035	42. 1
1652	5	69	1 538	22. 2
1653	—	34	1 194	35. 1
1654	8	64	3 267	51
1655	—	43	2 083	48. 4
1656	5	45	1 593. 5	35. 4
1657	9	46	1 822	39. 6
1658	13	49	2 111	43
1659	—	46	1 874	40. 7
1660	8	47	2 222	47. 2
1661	8	50	2 115. 5	42. 3
1662	8	45	1 838	40. 8
1663	—	45	1 465	32. 5
1664	—	48	1 703. 5	35. 4
1665～1666	—	—	—	—
1667	—	32	824. 5	25. 75
1668	4	39	2 029. 5	52
1669～1678	—	—	—	—
1679	3	40	1 242	31. 05
1680	4	46	1 851. 5	40. 2
1681	—	51	2 001	39. 2

续表

年份	鲱鱼船 (Herring jagers)	鲱鱼船 (Herring busses)	总捕捞量 拉斯特 (lasts)	平均捕捞量/双桅渔船 (buss)
1682	—	53	1 608	30. 3
1683	3	45	1 709. 5	37. 9
1684	3	47	1 420	30. 2
1685	6	43	2 503. 5	58. 2
1686	4	46	1 743	37. 83
1687	—	42	867. 5	20. 6
1688	7	37	968	26. 1
1689	—	26	736	28. 3
1690	—	28	880. 5	31. 4
1691	—	26	627	24. 5
1692	1	17	659. 5	28. 7
1693	—	20	744	37. 2
1694	—	27	899. 6	33. 2
1695	—	23	792. 5	39. 4
1696	—	26	500. 5	19. 2
1697	—	17	327. 5	19. 2
1698	—	28	1 089	38. 8
1699	3	35	1 460	41. 7
1700	1	44	1 663. 5	37. 7
1701	—	29	542	18. 6
1702	—	19	390	20. 5
1703	—	25	120	4. 8
1704	—	8	238. 5	29. 8
1705	—	10	121	12. 1
1706	—	6	122	20. 3
1707	—	13	233	17. 92
1708	—	19	429. 5	22. 6
1709	—	19	628. 5	33
1710	—	17	409	24
1711	—	17	391. 5	23. 29
1712	—	14	270	19. 2
1713	—	18	735. 5	40. 9
1714	—	17	686. 5	40. 4
1715	—	16	871	54. 4
1716	—	18	663. 5	36. 9

[150]

续表

年份	鲱鱼船 (Herring jagers)	鲱鱼船 (Herring busses)	总捕捞量 拉斯特 (lasts)	平均捕捞量/双桅渔船 (buss)
1717	—	19	975	51.3
1718	—	17	913.5	53.7
1719	—	19	843	44.3
1720	—	14	315.5	22.5
1721	—	16	537.5	33.5
1722	—	17	727.5	42.8
1723	—	19	715.5	37.6
1724	—	19	520	27.3
1725	—	17	828.5	48.7
1726	—	18	978	54.3
1727	—	18	697	38.7
1728	—	18	441.5	24.5
1729	—	18	450.5	25
1730	—	16	577	36
1731	—	16	495	30.9
1732	—	17	615.5	36.2
1733	—	15	622.5	41.5
1734	—	14	673.5	48.1
1735	—	13	808.5	62.1
1736	—	15	702	46.8
1737	—	9	521	57.8
1738	—	10	490.5	49
1739	—	13	489.5	37.6
1740	—	16	404.5	25.3
1741	—	17	486	28.5
1742	—	18	351	19.5
1743	—	14	332	23.7
1744	—	14	321	22.4
1745	—	12	468	39
1746	—	12	689	57.4
1747	—	11	318.5	28.9
1748	—	11	234.5	21.2
1749	—	11	300	27.2
1750	—	12	173.5	14.4

[151]

特别注意各年中每艘船平均捕捞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怀特恩（H. Watjen）：'Zur Statistik der hollandischen Heringfischerei im 17. u. 18. Jahrhundert',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1910）.

有时，对温特哲格（*ventjagers*）的使用同样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在首次出海的早期，会有温特哲格快船将已经在海上包装的鱼运送到岸上以换取必要的给养。随后，它们返回家乡想办法以垄断高价出售这些鱼，直到鲱鱼大批量的上市为止。鲱鱼捕捞业的联合组织对这些快船的行为颇为忧虑，曾竭尽全力来限制它们。它们主要担心这些渔船有可能不把鲱鱼在岸上进行再包【149】装就运送到国外，从而败坏荷兰鲱鱼的声誉。于是，渔船只被允许在7月间出海作业。虽然毫无疑问仍会有违规行为发生，但联合组织所提供的护航用的军舰也会承担起维护渔场秩序的责任，这一点也不应该被忽视。1668年，温特哲格所带回来的收获量仅占总捕捞量的1.75%，其他年份的记录也显示了同样低的比例。

虽然渔业管理的联合组织是建立在5个主要的渔港之上的，然而在其他的一些沿海村庄和城镇里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渔船，这种情况尤以埃格蒙特（Egmont）、泽根的韦克（Wijk-op-Zee）、迈克恩（Maerchen）、泰瑟尔岛（Texel）和维库森（Venkuysen）当地为甚。17世纪，捕渔业的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来自于恩可赫伊曾和其他港口的渔船数量明显增加，而从布里尔和代尔夫特沙文（Delftshaven）出港的渔船量却逐步下降。而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仍是一个重要渔港的符拉尔丁根（Vlaardingen）的帆船数量，由1693年时的7艘激增到1699年的70艘还要多。

荷兰渔业取得的真正成就并不在于建造了大型船只，而在于实现了其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工业革命前期，没有什么比保证500艘不同渔船的产品质量符合标准更困难的事了。雅茅斯也曾经模仿过荷兰的这一做法，它们聘请荷兰的渔民来完成腌制工序。这些渔民多为受阿尔巴的迫害被驱逐出来的移民。尽管雅茅斯也曾试图使用英格兰和荷兰的监工来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然而实践证明，监控不到的地方实在太多，最终这些努力行为不得不在17世纪初取消了。荷兰产品众所周知的高质量，使其得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市场上均具有价格方面的优势。1575【152】年，荷兰的鲱鱼在鲁昂市场上的售价为每拉斯特24英镑10便士，而雅茅斯的鲱鱼纺织品的价格最高也仅为20英镑12便士。这样的水平对雅茅斯来说，已经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了。

因此，就竞争而言，荷兰具有一种牢固的内在优势。的确，荷兰在渔业上的资本支出要比英格兰、苏格兰及其他沿海渔民开办的企业高出许多。但是在荷兰，获取资本的渠道极为顺畅，利息率相对也较低。我们通过比较，人们便可以明白英格兰在试图按照荷兰的模式组建渔业公司时所遇到的各种

难题。英国人首先确立了如下想法，即最适合建立渔业基地的地方或者是刘易斯岛上的斯托挪威（Stornoway），或者是奥克尼群岛。但是，英国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包括要以英国的利息率水平筹措足够的资本、过分夸大荷兰的收益率水平以及缺乏经验等。除此之外，建立渔业基地还必须承担若干额外的负担，如引进必要的劳动力、原料、盐和木材等等，而这些要素在荷兰或者英格兰的东海岸均是极为容易获得的。在实践方面，查尔斯一世时期以及建立渔业基地的项目即将取得成功的阶段，英国第一家渔业公司通过对有局限性的手段的分离，进一步混合了各种困难，因为，它们在斯托挪威，以公司形式保持了一个渔业基地。与此同时，它们还使用着以雅茅斯为基地的另外一些渔船。

当英格兰终于捕获到足够数量的白色鲱鱼并准备销售时，它们遇到了来自荷兰的互不相让的竞争。据说，后者准备在短期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以便将英格兰的产品逐出市场。这里所包含的涵义（在后面还将讨论）是，尽管欧洲面临着人口压力，但是对鲱鱼总的消费量是有限的。因而，在正常年份中，荷兰人希望能够保持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除了用帆船捕捞鱼类之外，荷兰的近海渔民还在雅茅斯附近海域中捕捞鲱鱼（前面已经介绍过），同时也在自己的近海区域内尤其是在拥有特有鲱鱼品种的须德海（Zuider Zee）从事捕捞作业。据推测，后一类捕捞量大约在600～700拉斯特之间，其中的绝大多数要通过熏烤，被加工成熏鱼。

4. 法国的鲱鱼捕捞业

法国的鲱鱼捕捞中心是迪拜，以及自17世纪起呈下降趋势的加来（Calais）和布伦（Boulogne）。人们所开辟的最为重要的航行都是通过雅茅斯海域的，接着经过布伦旁边的海峡渔场。然而，后者在1686年以后便逐渐消亡了。法国船队经常在东北沿海从事捕捞作业，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与英格兰、荷兰或西班牙交战时，法国的渔船极易遭受攻击。战争给 [153] 16世纪上半叶（截止到1569年）的法国渔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1672年以后法国船队又陷入同样的困难。16世纪50年代，一个拥有250只渔船的法国船队，曾被误会入侵了英格兰东海岸。法国最大渔船的载重量为35拉斯特，与荷兰渔船的规模不相上下。和荷兰一样，法国鲱鱼的腌制工序也是在船上完成的。法国捕捞船只的数目变动非常大，由迪拜出发去雅茅斯渔场

的船只数目在1694年的高峰时达120艘，而在1715年的低潮时只有34艘。1650年以后，法国参与捕捞鲱鱼的船只的年平均数为60艘左右，其中40艘来自沿加来海、皮卡第和诺曼底海岸等线路的多个港口。由于数据不充分，我们不可能做出更为准确的推断。如果从逻辑上说，这个数目要大一些。1715～1723年间，在迪拜（法国捕捞到的鱼大多数都在此地上岸）上岸的数量年平均为7 877拉斯特。这其中，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峡中捕捞的鲜鱼。每条船的年平均捕捞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分布曲线也类似于荷兰。单单从渔民的能力这一角度来看，法国渔民一点也不比荷兰逊色。法国的问题主要是鲱鱼腌制环节的质量难以保证，以及对盐业贸易缺乏有效的管理。最早出现于加来的来亨红鲱鱼（指那些专门为地中海地区加工的鲱鱼）的加工，成为雅茅斯的一大传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那么16世纪的法国渔业要比之后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高的生产率。17世纪期间，几乎没有鲱鱼制品出口到法国以外的地区。

5. 其他地区的鲱鱼捕捞业

当斯堪的纳维亚渔业呈现出衰落迹象时，挪威近海海域就成为最为重要的鲱鱼捕捞的渔场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一般都驾驶着小型渔船从事捕捞作业。在整个捕捞季节内，鲱鱼鱼群的出现并没有达到商业所要求的数量。在后期，鲱鱼鱼群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长达40年。显然，16世纪80年代，确有大量的鲱鱼存在，只是此时的鲱鱼大量的进入了波罗的海。同样，人们认为1699～1784年间存在着鲱鱼鱼汛的年份。然而，即使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市场见不到挪威产的鱼，也并不能表明鱼群在挪威不存在。实际上，在总捕捞量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进入了市场。农民们从事捕捞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其自身的生活需要，另外换取一些零用钱和生活必需品。农民或渔民们都必须带上自己捕捞上来的鲱鱼到卑尔根去腌制。而到此时，这些鱼往往已经开始腐烂，以至于那些“普通的极地人和俄国人”无法再食用它们。面对荷兰强大的竞争力，挪威的渔民们只能寄希望出现荷兰人捕捞量减少的年份，这样就可以扩大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对挪威渔产品的【154】需求。自1753年起，丹麦政府为了提高渔产品质量，开始对渔业进行整顿。卑尔根的居民则开始在岸边建造用于腌制鲱鱼的房子。同时，在这10年当中，瑞典各海域中的渔业资源也得以恢复，其中鲱鱼资源恢复尤为显著。

同样，东法兰德斯和汉堡渔业的衰落也是在与荷兰的竞争形成的。16世纪时，两地曾试图利用帆船发展起自己的渔业。然而，由于荷兰的产品充斥着它们的市场，迫使爱登和汉堡的渔民们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两地更宏伟的计划，则是在17世纪60年代建立了以布鲁日（Bruges）为渔业基地的帆船捕捞业。查尔斯二世颁布了法令，允许外国人在英格兰水域中自由地捕鱼。受这一政策的鼓舞，同时借助于1666年完工的通往泽布吕赫的运河，布鲁日的居民创建了拥有50艘帆船的船队，并按照荷兰人的方式进行捕捞作业。然而，由于17世纪后期不稳定的经济环境，这种尝试不得不走向破产。1664～1676年间，只有少量的产自布鲁日的鲱鱼进入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市场。自此之后，所有的鲱鱼只能在国内市场出售。

整个欧洲的鲱鱼捕捞量大约近五万拉斯特，这一数量与20世纪头10年的荷兰、雅茅斯和洛斯托夫特的产量之和相当。考虑到可获得的资源及小得多的市场规模，这个数字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可信的进步了。

3.5 鳕鱼捕捞业

另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的渔业活动是鳕鱼的捕捞，它主要集中在纽芬兰和冰岛沿海及北海。人们已对前者给予了极大关注，对后者则重视不够。就对渔业的贡献而言，约翰·凯伯特（John Cabot）于1497年所做的航行与哥伦布航行相比，具有更为直接的重要意义。1497年12月份，意大利流行着这样的传言，“这里的大海到处都是鱼，在这里捕鱼不仅可以使用网具，而且可以用吊上石头的篮子。英国人甚至说他们能够获得足够多的鱼，以至于英格兰王国不再需要冰岛渔场了。他们每年要从冰岛渔场进口大量的鳕鱼干。”① 与约翰·凯伯特航线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由布里斯托尔（Bristol）人和西部农民所做的航行，他们至少开辟了北海和冰岛海域的渔场。到1522年，英国的“新发现的小岛船队”的规模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可以使用军舰护送外出渔船返航。【155】

① H. P. 比格（H. P. Biggar）：《杰克司渔船的先驱者1497～1534年》（渥太华，1911年），第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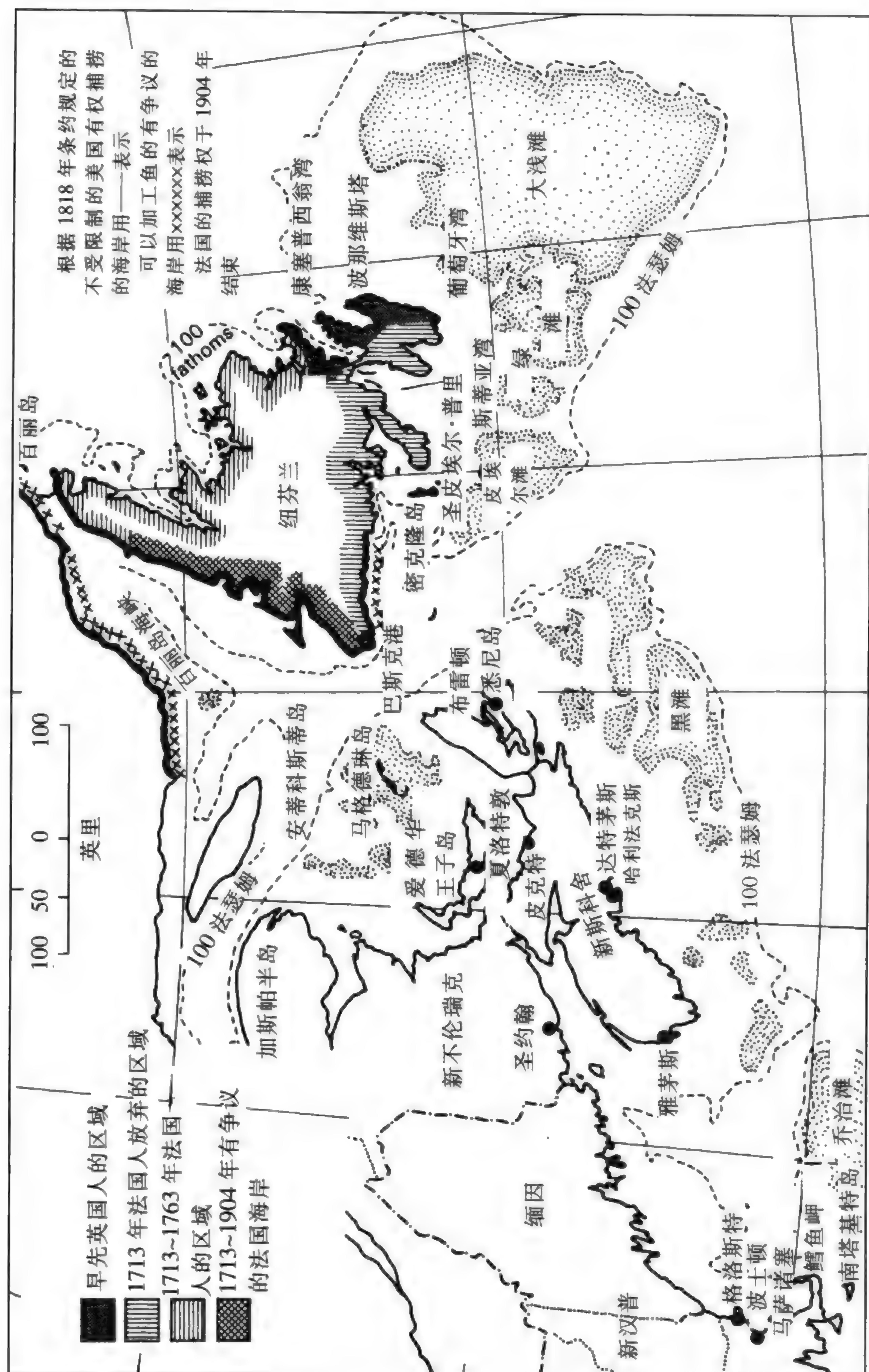


图 4　从鳕鱼岬到拉布拉多的渔场分布

然而，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葡萄牙人是首先充分利用鳕鱼捕捞业的人。按照哈克路（Hakluy）的说法，1 艘英格兰的渔船在 1517 年已经发现有 50 艘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渔船在那里进行捕捞作业。据称，1550 年，单单阿维罗（Aviero）就已经派出 150 多艘渔船前往纽芬兰。根据推测，这里所提到的西班牙渔民很可能是指巴斯克渔民，而这里的法国渔民很可能是指来自于诺曼底和布列尼塔的渔民。纽芬兰渔业的结构、融资以及贸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得多。现在，我们还没有详尽的证据来对这些说法做出统计上的验证。这些说法使我们可以对纽芬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的重要性，做出正确的比较。以下的概括性论述，可以通过对伊比利亚有关资料的研究加以修正，这些资料可以为我们揭示一些重要的统计关系。

1.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鳕鱼捕捞业

在整个近代史的初期，伊比利亚半岛一直被证明为是鳕鱼的最佳市场，特别是那些稍加腌制而后风干的鳕鱼。在长短不等的时间内进行的风干过程，是保存鳕鱼的最佳方式。这是因为鳕鱼的脂肪含量较低，并且这一方法也比全部腌制要廉价一些。在不同的地方，这种鱼的称呼也不同，通常有鳕鱼干、“可怜的约翰”、哈布阿丁（Haberdine）及其他一些名称。对这种鱼的消费量相当高，甚至在天主教国家中，由于满足食物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也不得不进口大量的鱼。汉密尔顿（Hamilton）注意到，鱼类价格上涨的速度要比其他品种的食品快得多。毫无疑问，在 16 世纪上半叶伊比利亚商业活动的全盛时期，巴斯克和葡萄牙的渔民们会竭尽全力增加鱼类商品的供应。尽管葡萄牙渔业早期曾出现过繁荣，但 1550 年以后从总体上来说呈现下降趋势而非上升。正因为如此，比那一时期其他的观察家受到更多信赖的安东尼·帕克哈斯特（Anthony Parkhurst），曾在 1578 年，也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日的 3 年前，推断葡萄牙渔船的出海次数不超过 50 次。但实际上，西班牙的出海次数在 100 次以上。尽管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的渔民却都在各自的国家中，按照英属爱尔兰渔民的方法风干他们所捕捞到的鱼。

西班牙渔业的衰落可以直接归因于其与英格兰之间的对立，以及因此所带来的巴斯克渔港在 17 世纪初的衰落。与敦刻尔克人带给北海捕捞业的打击一样，英格兰人也沉重地打击了纽芬兰的捕捞业并使其崩溃。早在 1517

年，约翰·雷斯特尔（John Rastell）在纽芬兰海域的渔业探险活动便趋于停止，因为其船员认定掠夺（比捕捞）更加有利可图。甚至在与西班牙的战争（1582～1585年）结束之后，英国的水手仍然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渔民进行大肆抢劫。在随后的两年中，又禁止巴斯克船队出海。法国人同样不失时机地对西班牙渔民进行攻击。当伊比利亚船队的力量被大为削弱以后，英法两国之间的竞争开始日趋激烈起来。那些绵延不断的敌意在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捕鲸活动中反映出来，这使纽芬兰的鳕鱼捕捞业有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渔业活动。【157】

2. 法属纽芬兰的鳕鱼捕捞业

1578年，法属纽芬兰船队拥有船只的数量超过了150艘，是英国的3倍，后者当时只有50艘。然而，有关单个船只的载重量却难以计算。在各个国家中，绝大多数船只的载重量均在50～60吨的范围之内。当然，法国的一些渔船有可能小于40吨（就经济支出而言，是最小的规模），尽管这时期也发现了超过200吨的大船。显而易见，从遭受攻击的危险性这一角度而不是经济角度来看，大型船只具有明显的优势。17世纪和18世纪纽芬兰贸易活动的特点之一便是，在这里船只载重量的大小并不比其他渔业活动更能代表其地位的高低。以干鱼为例，在捕捞季节里，那些横渡大西洋的大船往往闭门不出，而那些使用鱼线钓鱼的小船则布满了整个海域。

鳕鱼的捕捞是一项沉闷而又别无选择的工作。装着诱饵的单钩长线被拖在海口，有时为了区分开相互之间的区域还会使用浮标（比如在北海），有时则使用船只（如在纽芬兰）。用单钩长线钓鱼的基本方法在除了冰岛、纽芬兰等地的整个欧洲沿岸，均被广泛地使用。这种方法只需要很小的专门设备，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另外，它还可以使用任何一种船只。在共和国时期，为冰岛渔民保驾护航的英国船只只需要通过非官方途径进行，以至于冰岛取得了异乎寻常的丰收。但是，冰岛渔民担心他们的市场会遭到破坏。纽芬兰的渔业同样并不一定要求专为捕鱼目的而建造的船只（如帆船捕鱼中的船只）。在战争期间，这些船只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更加有意义的是“口袋船”的发展，这种船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英国的渔业使用。口袋船向渔民们提供盐、食物等，同时从他们手中购买鳕鱼并直接将其运到欧洲南部的市场上。这样，渔民们便不再受其船只

容量的限制了。这也意味着纽芬兰的殖民者不必离开岛屿便可以参与到渔业活动中。

[158] 自16世纪中期起，法国在渔业活动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是第一批在纽芬兰和邻近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的人。然而，由于法国人缺乏英格兰所具备的好战精神，因此，从1583年圣约翰的财产被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爵士接管，到1759年魁北克（Quebec）被沃尔夫（Wolfe）所掠夺的事情发生后，法国人逐渐被从英国人自认为最适宜从事渔业的地区排挤出去。1550～1650年间，渔业活动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16世纪，鲁昂（Rouen）、拉罗谢尔（La Rochelle）和波尔多（Bordeaux）成为法国纽芬兰捕捞船队的重要中心。逐渐地，这些地方发展成为重要渔港如勒阿弗尔（Le Havre）、翁弗勒尔（Honfleur）、圣马诺（St Malo）、南特（Nantes）和萨布莱奥隆（Sables d' Olonne）等地的主要财政来源。按照1664年所做的统计，它们为352艘渔船提供了约71%的财政支持。第二个变化是在鳕鱼风干、粗加工、腌制以及取出内脏等过程中专业分工的加强。来自布列尼塔和巴斯克（Basque）乡村的渔船基本上专门从事前面的工序，而来自于奥隆（Olonne）和诺曼底的渔船则主要集中于后面的工序。1664年，有132艘渔船专门捕捞用于风干的鳕鱼，另120艘渔船捕捞供粗加工的鱼，剩余的100艘渔船的专业化分工则不太清楚。法国人主要在纽芬兰或加拿大沿岸风干他们捕捞到的鱼，而粗加工则与帆船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在船上完成去除内脏的工序。毫无疑问，后面一种方法需要更为专业化的装备、更熟练的工人及更多的盐。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更加适合于那些缺乏资本有效供给的较为贫困的港口。

渔民之间彼此相互依存的现象同样可以见到。大的鳕鱼通常并不适于风干，而小的鳕鱼又不适于腌制和去除内脏。迪恩斯（Denys）在其1672年的著作中指出，在同一区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巴斯克和诺曼底渔民，经常按照两条小鱼换一条大鱼的标准交换所捕捞到的鳕鱼。这是因为，诺曼底的渔民并不在巴黎出售风干后的鳕鱼，而巴斯克人也不在南部地区销售腌制过的鱼。这种做法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还很难说。与英国人不同，法国人更加倾向于在纽芬兰、其他岛屿及大陆上更为广泛地开展渔业活动。法国在纽芬兰的渔业活动很可能在1688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的船队数量曾达400个。也是从那时起，与英国之间的战争严重损伤了法国渔业企业的活力。部分属于法国的殖民地被掠夺，其中包括重要的渔业基地阿卡迪亚（Acadia）和普雷散斯（Plaisance）。

直到 1748 年，法国的以拉布拉多（Labrador）和罗亚尔岛(L' Isle Royale）为基地的捕捞业，才恢复到其先前的水平。然而，不久以后，爆发了 7 年战争，这使法国渔业再一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渔场分布过度分散，法国渔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船只的出发地分散在从圣瓦莱里—考克斯（St Valery-en-Caux）到圣让—德吕兹（St Jean de Luz）的各个港口之中，其作业范围也分散于从拉布拉多到最南端的大海岸(Grand Banks）之间的广阔的区域内。由于彼此之间缺乏任何形式的协调，因而在相对较为团结的英国渔船面前，它们极为容易成为遭受攻击的靶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 1750 年，它们才开始使用多钩鱼线，尽管法国 [159] 近海渔业早已采取了这种做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每根鱼线都要一直握在手中直到钓上鱼为止。

3. 英格兰的鳕鱼捕捞业

直到 16 世纪 70 年代，英国人才开始重视对纽芬兰海域的开发。仅在 4 年之间，其渔船的数量便由 30 艘猛增到 50 艘。这些船只均来自于西部地区的各个港口，尤其是达特茅斯（Dart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比迪福德（Bideford）和巴恩斯特布（Barnstaple）等地。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时期纽芬兰的鱼是经过法国的港口进口到英国来的。17 世纪上半叶参与捕捞作业的船只数目很难统计。对于那一时期船只数量所做的绝大多数推测，都有可能是不精确的。一方面，在 1629 年的官方文件统计中，每年包括南安普敦（Southampton）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等港口在内的船只数量为 300 艘；而 1622 年编纂小册子的作家则认为船只的总吨位达到 26 700 吨的最高值，船只数量至少为 267 艘。同一时间，由恩尼斯（Innis）和朱达（Judah）推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果，“1524 年从西部地区到新英格兰捕鱼的船只数量达 50 艘，到 1637 年只剩下了 15 艘”。① 1615 ~ 1640 年间，英国船队所拥有的渔船总量很可能在 200 ~ 300 艘之间，而前面所提及到的 4 个港口便占据了 70%。这代表着英国船只数量达到了最高峰。由于“口袋船”已进入了纽芬兰的渔业活动之中，导致了那些每年要做固定航行的船只有所下降。1677 年，由西部地区出发的渔船数量为 103 艘，而由伦敦、埃克斯特

① 恩尼斯（H. A. Innis）：《鳕鱼捕捞业》，第 80 页。奇怪的是，恩尼斯并没有像朱达（《1713 年前北美渔业与英国的渔业政策》，1933 年）那样测算船队的总量，但他却用自己测算的数据代表了整个纽芬兰的渔业。

及其他港口出发的口袋船则为89艘。

在对英国渔业的讨论中，评论家们忽略了对技术问题的考虑。的确，对于多钩鱼线的使用，英国人要早于法国人。然而，是否其一开始就使用多钩鱼线却很难说。但如果英国在17世纪已经开始使用单钩鱼线的话，[①] 则通过与冰岛渔业的对比，可以说明某些问题。

纽芬兰的殖民化程度是否在17世纪下半叶得以提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劳动力是从西部地区被诱骗出来并被殖民到纽芬兰。纽芬兰和新英格兰或多或少地已经参与了这种活动，或者说至少有可能参与了这种贸易活动。是否应该从英格兰岛屿撤出殖民制度的议题，曾在政府内部【160】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与法国逐渐陷入敌对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1713～1714年间异常艰难的严冬，打乱了鱼群正常的分布方式，进而其后几年的捕捞量始终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所有这一切，使西部地区在渔业领域出现了实质性的萎缩。相反，纽芬兰和其他殖民者的船只数目则由1677年的300多艘，增加到1636～1739年间平均每年的1 118艘。逐渐地，西部地区各个港口也开始转向以贸易为主。这里，一般不从事粗加工和腌制，它们只从事最终产品——干鱼的生产。

1760年之前的法国渔业中有关捕捞量的数据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对英法两国的渔业在效益方面进行比较。到17世纪70年代，当较为详尽的英国资料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由于两国的渔业在结构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因而我们很难从投入到捕捞业中的船只数量上推断出法国总的捕捞量。不同渔场中的渔船捕捞量之间的差异有可能达一倍以上。表22给出了英格兰的捕捞量。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鳕鱼中有一部分被用于生产“鲸脂”，其实际数量被低估了。[②]

表22　英格兰从纽芬兰贸易中获得的收益（1615～1731年）

年份	总量	渔业	“掠夺”	美洲[a]	吨位数量	船只数量[b]	当地船只	总量	捕捞公担	炼油吨数
(1615)	250	不详	不详	不详	(15 000)	不详	不详	不详	(300 000)	—
1675	172	不详	不详	不详	13 106	688	277	965	不详	—
1676	212	126	86	—	不详	894	206	1 190	219 443	1 063
1677	231	109	112	—	16 949	892	337	1 229	221 220	1 382

① 见第166页。
② 见第171页，关于“捕鲸业”。

续表

年份	总量	渔业	“掠夺”	美洲[a]	吨位数量	船只数量[b]	当地船只	总量	捕捞公担	炼油吨数
1677[c]	102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 836	550 800	不详
1679	不详	不详	138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9 059[d]	不详
1680	198	99	99	—	17 428	793	361	1 153	201 250	412
1681	172	151	21	—	不详	806	361	1 167	(83 240)	不详
1682	87	32	55	—	不详	183	299	482	(76 830)	不详
1684	110	43	67	—	不详	294	304	598	115 420	不详
1691	不详	不详	88	—	不详	不详	275	不详	104 450	325
1692	不详	不详	54	—	不详	不详	274	不详	95 900	624
1693	96	59	37	—	不详	92	92	303	129 050	2 737
1694	70	40	30	—	不详	不详	不详	1 000	100 000	1 000
1698	252	不详	不详	—	24 318	532	397	929	215 922	不详
1699	236	不详	不详	—	不详	920	467	1 387	不详	不详
1700	220	171	49	—	不详	890	674	1 564	不详	不详
1701	121	75	46	—	(7 991)	435	558	993	216 230	1 049
1702	41	16	25	—	(1 330)	44	206	637	82 140	366
1703	63	23	40		不详	44	214	258	75 000	300. 5
1704	(65)	23	42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68 000)	97
1705	60	20	20	20	(2 400)	100	160	260	78 000	455
1706	83	46	37			136	368	504	106 270	537
1707	116	70	30	16	不详	236	217	453	120 682	412
1708	97	49	33	15	10 995	170	356	536	135 934	772
1709	97	35	57	5	9 770	130	258	388	90 364	503
1710	93	49	26	18	(5 748)	204	314	518	139 528	535
1711	127	62	55	10	(6 880)	261	346	607	120 546	729
1712	103	66	17	20	(8 000)	268	389	568	64 430	666
1713	106	46	40	20	(5 520)	357	288	645	104 750	325
1714	150	85	45	20	(8 000)	500	500	1 000	115 000	520
1715	188	108	38	42	(11 925)	573	468	1 041	98 856	1 029
1716	147	86	30	31	(8 070)	503	408	911	88 469	320
1717	166	89	33	44	(7 530)	389	402	791	113 990	417
1718	156	95	35	26	(7 902)	511	393	904	100 823	1 574
1719	119	69	28	22	9 835	333	341	674	94 599	393
1720	151			36	12 210			617	80 220	590. 5
1722	143			—	12 240			679	107 880	696. 5
1723	221			—	17 554			966	139 756	801
1724	195			23	15 253			677	109 530	654
1725	158			12	13 118			637	120 998	1 698
1726	167			18	11 770			735	174 670	861
1727	185			15	16 126			1 008	207 530	1 117

【162】

续表

年份	总量	渔业	"掠夺"	美洲[a]	吨位数量	船只数量[b]	当地船只	总量	捕捞公担	炼油吨数
1729	190			42	12 880			705	170 220	1 234.5
1730	269			56	19 240			984	250 040	1 314.5
1731	182			24	14 680			840	181 350	1 009

资料来源：P. R. O. C. O. 390/6。

注：( ) = 仅为渔船的指标。

a 缺乏 1750 年前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船只的数量。尽管有文件资料显示当时存在这样的船只，只不过量较小罢了。

b 这一数据包括了独立的渔船，即这里的渔船和渔民要独立于其他渔民，在西部各国渔民看来他们仍是农民。

c 由英国估算的法国捕捞量。

【163】 d 仅指掠夺性船只。

4. 冰岛和北海的鳕鱼捕捞业

18 世纪之前，纽芬兰的鳕鱼极少会在欧洲西北部打开销路，甚至在伦敦的市场上能见到的纽芬兰鳕鱼也很少。纽芬兰的鱼主要占据着包括英伦诸岛西部在内的诺曼底南部的市场，而其最为重要的市场则在南欧，后来转移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东盎格鲁的鳕鱼以及通过汉萨网络进口的鳕鱼干，很早以前就开始为伦敦提供食物。然而，与纽芬兰鳕鱼捕捞业受到的重视相比，这里的鳕鱼捕捞业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英国捕捞量中的绝大部分在国内就被消费掉，只有很少的部分用来和法国北部进行贸易往来。斯堪的纳维亚捕捞到的鱼被越来越多地在北欧国家消费，同时产自纽芬兰的鱼也将冰岛的鳕鱼干挤出了市场。在设得兰海域捕捞到的石南和鳕鱼，则通过汉萨同盟进口到了德国。总而言之，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不是渔业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物供给，而是渔业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以及对大量投资的吸引。正因为如此，英属纽芬兰的渔业比法国渔业引发了人们更大的关注，同样对鲱鱼的关注也要比对鳕鱼的关注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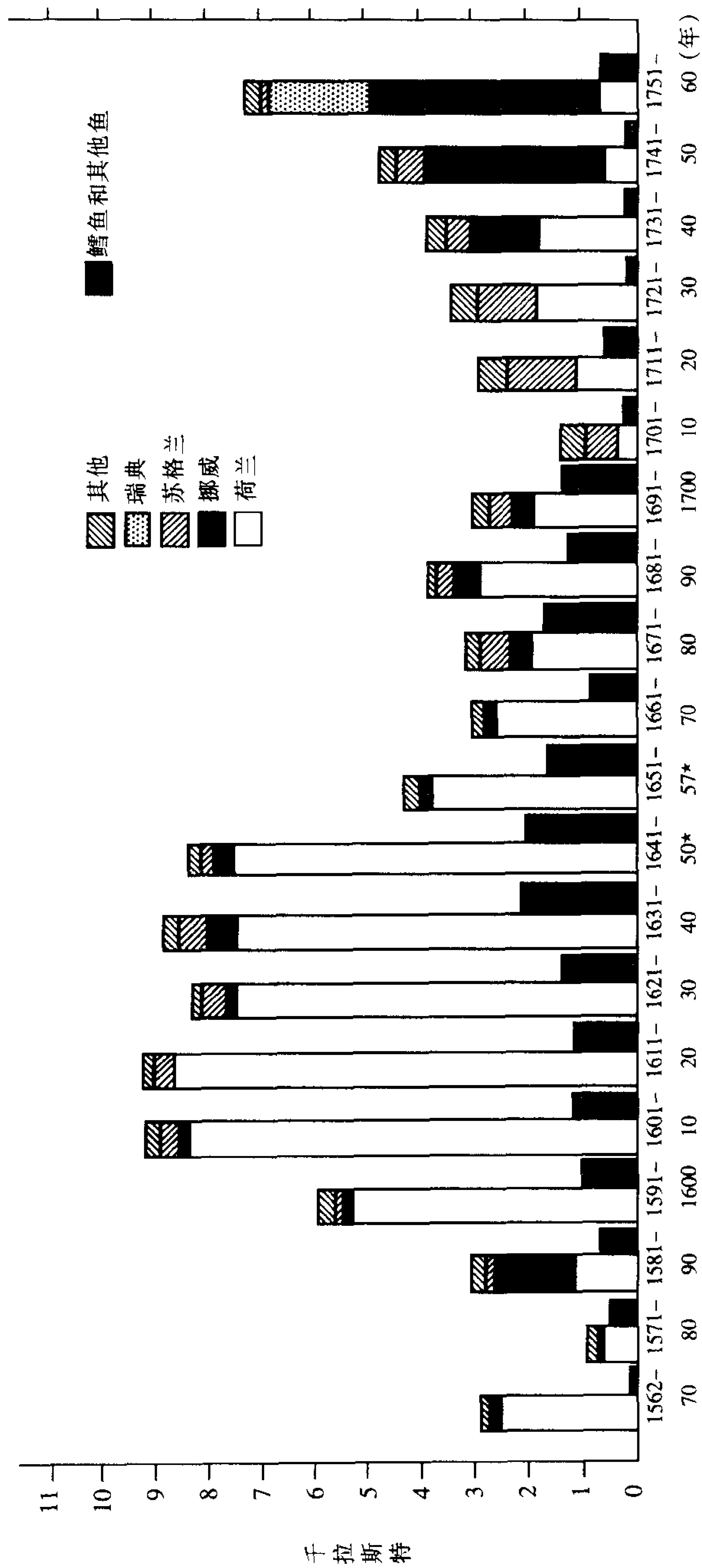
凯鲁斯—威尔逊（Carus-Wilson）写到，从表面上看，英国在冰岛的渔【161】业在 15 世纪丹麦的限制面前消亡了。① 然而，实际上，它却稳健地生存了近 250 年。1528 年，有 149 艘渔船沿着从伦敦到波士顿沿岸各个港口驶往

① 凯鲁斯—威尔逊：《冰岛贸易》，载保恩（E. Power）和波斯坦（M. M. Postan）编著的《英国贸易研究》（伦敦，1933 年），第 182 页。

冰岛渔场，与此同时另有222艘渔船从远至黑斯廷斯和惠特比的港口驶往北海渔场，此外，还有78艘渔船在苏格兰海域捕捞鳕鱼。在这些渔船中，有62艘（占13%）来自于雅茅斯。到了17世纪初，由雅茅斯启航的渔船达120艘；到17世纪30年代，当英国鳕鱼的捕捞业达到其顶峰时，这一数量又进一步上升到200艘，或者说达到了英国渔船总数的一半。17世纪50年代英国鳕鱼捕捞的黄金时代走向终结。17世纪70年代，雅茅斯船队的总数达70个，进入到18世纪之后只剩下30个。在其他港口中，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只不过是下降的幅度要更大一些罢了。

除斯堪的纳维亚以外，英格兰是在北海和冰岛海域从事鳕鱼捕捞的最为重要的国家。自迪拜向北的法国港口中，也有少量的渔船前往捕捞鳕鱼。敦刻尔克在冰岛海域的捕捞活动曾出现过繁荣，然而与这个地方的鲱鱼捕捞业一样，在16世纪面临的种种难题面前，鳕鱼捕捞业也很快走向消亡。法国和巴斯克的渔船偶尔也会在冰岛海域从事捕捞作业。荷兰近海的渔民则会在多格（Dogger）浅滩以外的北海海域中捕捞鳕鱼，同时也会试着前往冰岛海域。有时，他们也会租用雅茅斯的渔船来从事这些工作。17世纪早期，迪拜的渔民也曾尝试说服雅茅斯的渔民向其传授使用带有风向标的渔船在北海中捕鱼的方法。到17世纪末，在冰岛海域常常可以见到荷兰和法国渔民的身影。使用小型船只的冰岛人和挪威人捕捞了更多的鳕鱼，与那些在其近海海域从事捕捞业的设得兰岛的居民一样，他们也将其捕捞的鱼风干。汉萨同盟竭尽全力去阻止任何与冰岛之间的直接贸易，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作为卑尔根主要物产的鳕鱼干中的全部。现在，我们无法准确地推测出这一重要的贸易活动的规模。图5比较了丹麦海峡税收登记中的鲱鱼与其他品种的鱼类的贸易量，其中占据比重较大的是由卑尔根运出来的鳕鱼。乍看起来，鲱鱼数量好像远远超出鳕鱼的数量。毫无疑问，波罗的海的鲱鱼要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丰富和受欢迎。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拉斯特只是一个容量单位而不是一个重量单位，因此如果我们以吨为单位来重新测算这些鱼的话，鳕鱼的作用一定比表中所显示的要重要得多。①　【164】

① 妨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的首要问题是，在有关原始记录中，使用公担或其他计量单位表示的是加工过的还是未加工的鱼从来就不是非常明确的。一条储藏起来的鱼的重量只有被捕捞上来时的20%。风干的鱼的重量一般为捕捞上来时的35%～50%，而腌制的鱼会更重一些。1拉斯特能包括1 000条鳕鱼，而通常情况下1 000条鳕鱼的重量应该更接近于4吨而不是2吨。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所有重量都是指加工过的鱼。



*资料不完全，没有记载荷兰 1650 年、1651 年、1652 年的船只数。

图 5 经过丹麦海峡的鲱鱼数量

[165]

对英属北海和冰岛海域以及纽芬兰海域中的捕捞数量，只能进行最为粗略的比较。现存的英国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捕捞量的数据见表 22。从中不难发现，其收获量在 20 000 公担到 219 443 公担之间波动，且远远超出了参与捕捞作业的船只数目的波动。到了 17 世纪 20 年代，年捕捞量超过30 000 公担已经变得完全可能。对东盎格鲁的捕捞量进行推算难度更大。从每艘渔船的平均捕捞量来看，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总捕捞量，至少等于英国在纽芬兰渔船中的收获量，如果前者不比后者更多的话。由于用于捕获中的渔船的吨位一般在 30 吨以下，而冰岛海域中的三桅渔船通常达 50 吨，于是，人们便可以说，从使用捕捞船只的每吨位的角度考察，在 17 世纪上半叶，纽芬兰渔业的生产率是很低的。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工业以前的社会中，生产率不直接地取决于投资的大小；相反，投资的规模是由从事该项行业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对于欧洲渔业史的研究不止一次地验证了这一观点。欧洲鳕鱼的总捕捞量等于 140 000 吨未加工的鱼，这一数据为 1900 年英国白色鱼类总捕捞量的近三分之一。

3.6　沙丁鱼和鲭鱼捕捞业

沙丁鱼是出产于英格兰西部、爱尔兰、法国西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摩洛哥海域中的一种基本鱼类。沙丁鱼与鲱鱼较为接近，都是季节性地以较大规模的鱼群出现，特别是在饥饿的时候更加容易聚集在一起。用盐腌制的沙丁鱼由英格兰和爱尔兰出口到了法国、伊比利亚和地中海地区。一项官方的估算表明，英国鲱鱼的出口遇到了沙丁鱼的竞争，并于 1714 年后被后者完全取代。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间内，沙丁鱼在西部地区发挥了与鲱鱼在东盎格鲁一样的作用。当然，在这一领域中并没有来自于荷兰的竞争。在布列尼塔、葡萄牙和地中海地区，这种鱼在渔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样，它们也构成了南欧海洋捕捞的主体。

鲭鱼是与鲱鱼和沙丁鱼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鱼。它在外形上与金枪鱼较为接近，而行为则与鲱鱼较为相似。捕捞鲱鱼所使用的网具同样可以被用做【166】捕捞鲭鱼。鲭鱼保存的难度极大，以至于英国人已经厌倦了在鲭鱼保存方面进行任何新的尝试。所有的鲭鱼一般都是在新鲜时就被消费掉了。对于其发臭的形容，在英语语言中还没有哪种鱼像鲭鱼这样有那么多的词汇来形容。法国人曾尝试以大量的盐来腌制，并且在国内大面积地销售。当然，其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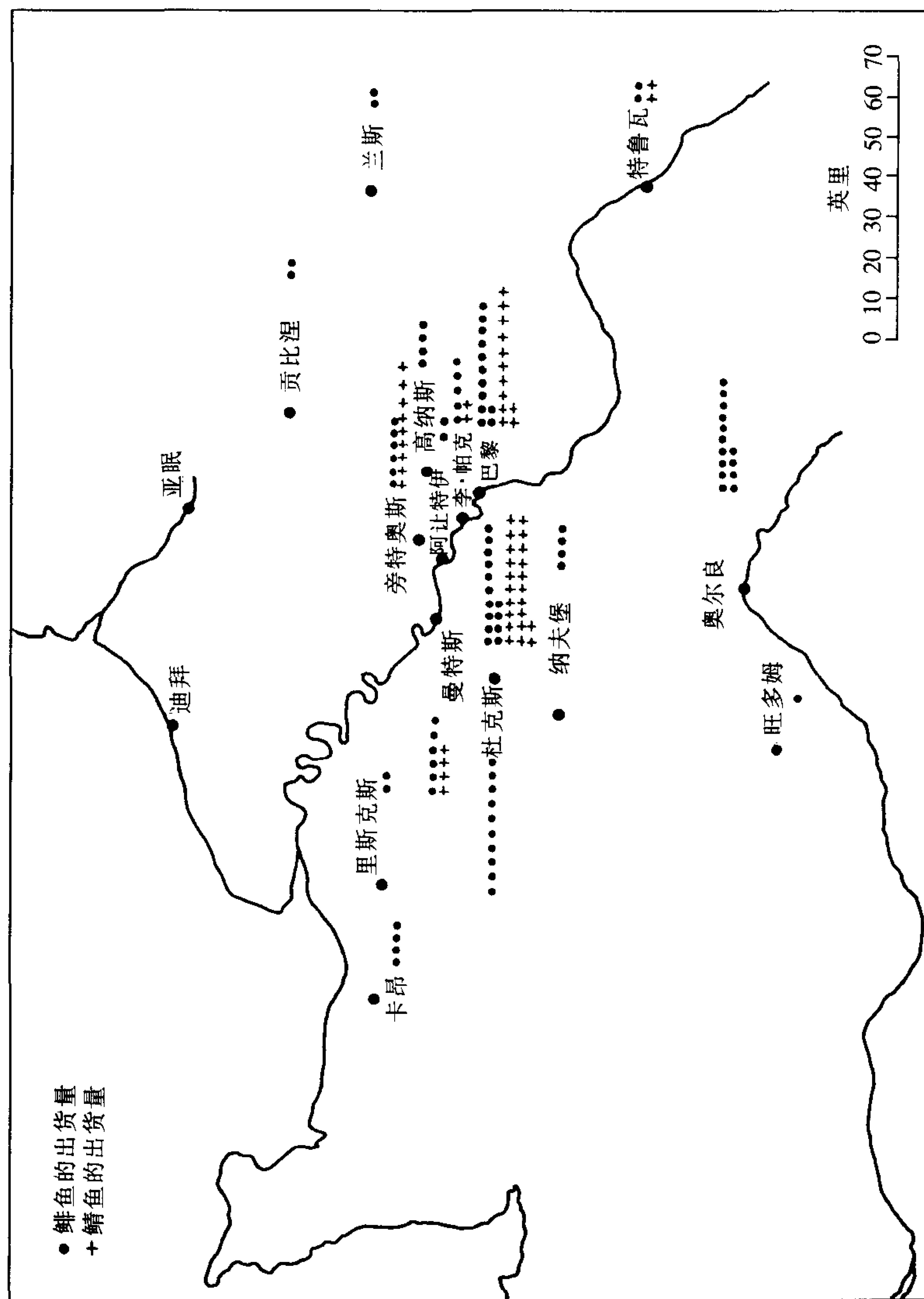


图 6　一个迪拜代理商在 1729 年的渔业运输分布

【167】

面还是要比鲱鱼小得多。所有从事鲭鱼捕捞的渔民均使用近海小船，尽管法国人也曾使用捕捞鲱鱼的渔船在更远的海域中捕捞鲭鱼。

3.7 捕 鲸 业

纽芬兰鱼类捕捞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捕鲸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通常，渔民们必须航行到距家乡很远的地方才能捕捞到鲸鱼，而生产鲸脂和肢解鲸鱼，还必须在陆地上建立起相应的基地。在纽芬兰，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这类基地一般都建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因此，对于那些强有力的后来者来说，武力的使用便显得极为重要。

最先从事捕鲸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当比斯开湾的鲸鱼被捕捞得几近灭绝之后，巴斯克人于16世纪初将本来的范围扩展到了北极圈内。据说，16世纪70年代时，在环绕纽芬兰的海域中，曾吸引了三十多艘渔船从事鲸鱼的捕捞。然而，到16世纪、17世纪之交时，人们又普遍认为斯匹次卑尔根（实际上是与格陵兰相混淆了）是最理想的捕鲸地。紧跟在巴斯克人之后到这里捕鲸的是另外两个傲慢的海洋民族。最初，它们雇佣巴斯克人作为向导，但很快它们便消灭了一切竞争对手。最后，它们彼此成了竞争的对手。在纽芬兰渔场，英国人还可以竞争过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然而在斯匹次卑尔根，面对着荷兰人，他们便无任何优势可言了。

从两个国家捕鲸业的比较中，也可以发现两国经济中的一些典型的弱点。最初，斯匹次卑尔根的捕捞业为英国的莫斯科公司（English Muscovy Company）垄断。这家公司的成员既缺乏资本，也明显地缺乏进一步发展其所从事的事业的愿望。最初的捕捞活动都是由那些无执照者进行的。1608年，公司开始了首次捕鲸探险，在斯匹次卑尔根，它们遇到了来自于赫尔（Hull）和伦敦的捕鲸船。1611年，公司仅有的两艘船均沉没了，而其船员则被那些无执照者救了起来。1622年，俄国公司将其鲸鱼捕捞权拍卖给了一个独立的当事人，后者开始对那些无执照者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至此，该家公司要在两条路线上疲于奔命，一方面要打击那些来自于赫尔、雅茅斯的无执照者，以及拥有向苏格兰供给鲸脂特许权的伦敦公民；另一方面又要【168】应付来自荷兰的竞争。在诺得斯克（Noordsche）公司的赞助下，荷兰人组建了规模更大的企业来从事捕鲸业。诺得斯克公司实际上是对所有申请赞助的人开放的。在内战结束之际，特许公司和无执照者达成了协议，总共提供

12 艘捕鲸船，其中有一半来自伦敦。同一年，荷兰从事捕鲸作业的船只达70 艘，并配备有 3 艘军舰护航。而在 25 年前，英国渔船的数量要多于荷兰。到 1670 年，按照兹奥卓格（Zordrager）的说法，荷兰的捕鲸船为 148 艘，而英国的捕鲸业则几乎完全崩溃。一项重振英国捕鲸业的措施是，英国 [170] 1672 年放开了对参与捕鲸的限制，但收效甚微。就这样，直到 18 世纪下半叶，英国才重新成为重要的捕鲸国。荷兰的捕鲸业同样遭遇了一系列障碍，战争期间，水手们被征用到国家的战舰上服役。虽然 1691 年确有一些捕鲸船只自爱登（Emden）和汉堡（Hamburg）出发去捕鲸，但从总体上来说，捕鲸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了战争的损害。17 世纪 90 年代，平均每年出海次数下降到了 90 次，而在上一个 10 年当中，则为 197 次。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格陵兰（Greenland）航行次数的最高峰。18 世纪 20 年代，戴维斯海峡（Davis strait）成为另外一个重要的捕鲸地，尤其是在 40 年代，曾一度短暂地成为第一大捕鲸地。

表 23　　荷兰捕鲸业统计（1670～1760 年）

年份	前往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的渔船数量	格陵兰的鲸鱼捕捞量	前往戴维斯海峡的渔船数量	戴维斯海峡的鲸鱼捕捞量	备注
1670	148	792			
1671	155	630.5			
1672					这几年，格陵兰贸易处于禁止状态
1673					
1674					
1675	148	881.5			
1676	145	808.67			
1677	149	686			
1678	110	1 118.75			
1679	126	831			
1680	148	1 373			
1681	172	889			
1682	186	1 470			
1683	242	1 343			
1684	246	1 185			
1685	212	1 383.25			
1686	189	639			

续表

年份	前往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的渔船数量	格陵兰的鲸鱼捕捞量	前往戴维斯海峡的渔船数量	戴维斯海峡的鲸鱼捕捞量	备注
1687	194	617			
1688	214	345			
1689	163	243			
1690	117	818.5			
1691					(仅为从汉堡和不来梅出海的数量,在共和国范围内捕鲸是被禁止的)
1692	32	62			
1693	89	175			
1694	62	156.25			
1695	96	201			
1696	100	380			
1697	111	1 274.5			
1698	140	1 488.5			
1699	151	775.5			
1700	173	907			
1701	207	2 071.75			
1702	225	697.75			
1703	208	646.5			
1704	130	651.5			
1705	157	1 664.5			
1706	149	452.5			
1707	131	128			
1708	121	525.33			
1709	127	190.5			
1710	137	62			
1711	117	630.5			
1712	108	370.5			
1713	94	256			
1714	108	1 234			
1715	134	696.5			
1716	153	519			

续表

年份	前往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的渔船数量	格陵兰的鲸鱼捕捞量	前往戴维斯海峡的渔船数量	戴维斯海峡的鲸鱼捕捞量	备注
1717	180	391			
1718	194	281.75			
1719	182	308			
1719~1728	1 504	3 439	748	1 251	
1729~1738	858	2 198	975	1 929	
1737	88	149	106	355	
1738	74	113	112	360	
1739	58	51.75	133	676.5	
1740					
1741					
1742	48	50	125	508.5	
1743	49	74.5	137	850.5	
1744	39	182.5	148	1 311	
1745	31	206.5	153	362.5	
1746	40	341	130	820	
1747	37	135.25	128	820	
1748			93	217	
1749	116	470.64	41	206	
1750	112	533.5	46	62.5	
1751	117	264.95	45	65.5	
1752	117	438.75	42	107.5	
1753	118	539.5	48	100	
1754	135	654.95	36	18	
1755	152	685.5	29	31	
1756	160	529.5	26	39	
1757	159	413.5	20	10	
1758	151		7		
1759	133	425	22	39	
1760	139	376.5	15	78	

资料来源：A. 尤金（A. Beaujon）：《荷兰海洋渔业史》（伦敦，1883 年），附录 B 第 583 ~ 584 页。

与此同时，英国的捕鲸业陷入萧条之中。1672 年，英国废除了对捕鲸业的限制，同时取消了消费税。但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捕鲸业不

景气的问题。给一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暂时授予垄断权的尝试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在英国，已经难以找出富有捕鲸经验的渔民。在这家股份公司进行的数次航行中，只有最后一次似乎是赢利的。然而，在返航途中，这惟一的一艘渔船却又撞上了冰山。1707 年，鲸鱼可以进行自由贸易，但同样没有对捕鲸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720 年，组建了一家“振兴格陵兰捕鲸业”的公司，拥有资本额 200 万英镑（17 世纪 90 年代时，资本额仅有 8 200 英镑）。实际上，这是一家产生于金融泡沫之中的金融公司。令人奇怪的是，真正致力于振兴英国捕鲸业的却是这家南海公司。据推测，当一艘渔船捕捞到 3 头鲸鱼时便会有赢利。然而南海公司平均每艘渔船的捕捞量仅为 1 头。1725～1732 年间，该公司的亏损额高达 177 782 英镑。1733 年，英国出台了第一个奖励法案，规定按照船舶的吨位，为每一吨补贴 20 先令。然而，这种奖励措施并未产生有效的鼓励效果。直到 1749 年，当补贴标准提高 1 倍之后，英国捕鲸者的数量才翻了一番。

捕鲸业与人们的食物需求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有捕鲸的渔民和沿岸的居民才会去处理那些搁浅的鲸甚至吃鲸肉。鲸脂通常被用于提炼“鲸油”，后者可以用来制造肥皂或用做灯油。鲸的骨骼用途广泛，特别是在纺织过程中，用途很大。由此，可以说，捕鲸业所反映的是欧洲工业史，而非人口史。英国处于其商业霸主地位的顶峰时，在鲸鱼制造业方面却不能做到自给自足（更不用说过剩了）。相反，尽管从整体上看，荷兰经济状况不景气，但其捕鲸业却保持了传统的优势地位。这一点很有趣。德国沿海城市中的居民和丹麦人也都试图在捕鲸船队的规模方面，保持住其远远大于英国人的水平。发展捕鲸业不仅仅意味着取得垄断地位，或是在财政损失的年份中获得生存，最重要的因素是提高捕捞的技巧和增加对当地渔业发展的了解程度。无论是捕捞鲱鱼、鳕鱼还是鲸，道理都是一样的。渔业是一项传统的产业，其经验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对于任何一名新手而言，一般需要经过很长【171】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这些经验。弗里斯兰人（Frisians）花费了 30 年的时间，才成为像巴斯克人那样的捕鲸专家。在渔业的各个分支部门之间，很难移植新的技术。甚至在 20 世纪，一些捕捞沙丁鱼的葡萄牙渔民，仍然在使用那些发明于史前时期的装置。

最为成功的盎格鲁—萨克森捕鲸者，是那些在新英格兰海域中使用印第安人传授如何使用小船捕鲸的人。渔业的繁荣持续了 100 年，直到 18 世纪，随着楠塔基特（Nantucket）的崛起和大型远洋捕鲸船的建造，渔业开始走下坡路。

3.8 鱼类的市场和消费

鱼类消费因国别、社会阶层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差异。现存的有关饮食的历史资料，也难以确定表24和表25中的数据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揭示了在食物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以及鱼类的相对重要性。当然，这些数据并未给出各个不同的阶层消费的鱼的种类，以及外面运来的鱼与本地捕捞的鱼各占多大的比重等更为详尽的信息。对16世纪时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的鱼类消费的推断，强调了本地渔业比起那些经过长途贩运而来的鱼更具有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推测出近海渔业的规模，即便在那些文件资料相对完善一些的地方同样如此。这些资料所起的作用就是揭示出，欧洲近海渔民而非商业化地从事鲱鱼和鳕鱼捕捞的渔民的捕捞总量，在欧洲大陆渔业总产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近海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从事有壳类水产品的捕捞活动，捕捞品中的绝大部分被运送到了重要的城市中心。

工业革命以前的问题，如通讯不便以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损害了渔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廉价的食物会引发大量的消费，然而由于水产品一般都面临着很快就会腐烂的问题，因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在那些靠近大海的地方才会存在大规模消费廉价鱼的情况。一旦将腌制、装桶和运输的费用核算进去以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鱼则变成了贫困阶层支付不起的商品。正如托马斯·纳希（Thomas Nashe）在雅茅斯所观察到的那样，"贫困阶层会将其食物分成三个部分：作为正餐，最贫穷的劳动力也会像一位西班牙公爵那【172】样享用它，但此后最小的一口将花他6个便士。"[①] 一个意料之外的丰产则会使贫困阶层对鲱鱼的消费量激增。"一个便士可以买到12条鲱鱼时，则会撑饱许多肚皮。" 1665年，当鲱鱼的价格下降到正常年景的一半时，诺里奇（Norwich）的一名市政官员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人们也进行了各种努力来降低成本。16世纪时，在英国和荷兰沿海，红色鲱鱼通常使用半桶运输，使用草来包装。另一方面，对于东部沿海需要使用大量的盐来保存的鲭鱼，则几乎完全在捕捞上岸之后即刻食用。由于鲭鱼捕捞的季节，通常是其他所有被保存下来的鱼类在一年之中价格最高的时候，因而这一消费方式也得以强化。

---

① 托马斯·纳希：《纳希大斋戒期间的食物》（1599年初版，1958年牛津再版），第179页。

表 24　　16 世纪和 17 世纪鱼类的消费量

单位：日消费量（克）

		意大利	波　兰	瑞　典
上层社会	面包	1 017	1 056	1 026
	肉类	297	169	235
	鱼	27	30	266
贫困阶层	面包	968	962	
	肉类	145	20	
	鱼	28	4	

资料来源：维赞斯基（A. Wyczański）：'Consommation Alimentaire en Italie'，*Mélanges en l' honneur de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1450～1650年（图卢兹，1973 年）。

表 25　　瑞典的鱼消费量（1573 年）

单位：每日摄人的卡路里昂

	农业仆人	王　室	伯　爵	瑞典 1912～1913 年
面包	2 370	2 870	4 195	1 795
肉类	540	945	935	577
鱼	370	450	325	58

资料来源：赫克歇尔（E.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剑桥，马萨诸塞州，1954 年），第 69 页。

正如在前面已经见到的，尽管渔民们已经准备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售其捕捞的鲜鱼，渔业商人还是期待着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利润。这样一来，便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迪拜，鲱鱼在到达巴黎市场之前要经过两道中间人之手。渔民们首先要将鱼出售给本地商人（hostmen），他们垄断了所有鱼的销售。在经过必要的腌制和包装之后，本地商人要将这些鱼出售给外来的一【173】批代销商，并由他们将鱼运送到巴黎或其他城镇。在巴黎和鲁昂，对外来的鱼的征税很高。实际上，1640 年，运输费用的提高使鱼的价格平均上涨了 38%。于是，鲁昂失去了作为法国重要的鲱鱼供应市场的地位。按照达德尔的观点，这种做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蒙受了损失。代理商可以将自己的价格强加在迪拜的本地商人身上，"其结果是，这些从事渔业的人的生存条件紧密相连"，通过他们在普瓦西（Poissy）、圣杰门恩拉伊（St Germain en laye）、蓬图瓦兹（Pontoise）和李·派克（Le Pecq）的信息来源（magas-

ins）而有效地控制了巴黎市场。[①] 更为不利的是，巴黎的商人们对于本国渔业生产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通常会更偏爱荷兰产的鲱鱼，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荷兰鲱鱼的质量要优于法国鲱鱼。渔民和本地商人之间的这种固定关系在法国北部沿海普遍存在，甚至在那些并不重要的渔港如埃塔普勒（Etaples）也是如此。在英国，这种体制在外国商人的本地商制度消亡之后，依旧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布莱顿（Brighton）、信克（Cinque）港和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均可以见到这种制度的残余，而在雅茅斯，一直认真地执行着这一制度。

在法国，迪拜的本地渔民要受到来自圣瓦莱里—考克斯（St Valéryen Caux）的外乡人的支配，后者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本地商。相反，在雅茅斯，城市中的渔民则不受这种干扰，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将鱼出售给任何人。但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自由要小得多，因为绝大多数的鲱鱼在到达迪拜时已经腌制完毕。相反，在雅茅斯腌制工序一般在鱼将要被出售时才开始。于是，对雅茅斯的渔民来说，他们寻找买主的机会便十分有限。地方性的法规也保证了商贩［主要是奔走于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出售新鲜鲱鱼的商贩］可以按照其意愿自由地收购。在渔季中其他到岸的鲱鱼都出售给了充当本地商的自由商人。不像他们迪拜的同行们，雅茅斯的商人是幸运的，他们在与伦敦商人讨价还价时，包括有争议时，一般都处于支配地位。不仅如此，在讨价还价过程中，雅茅斯的商人还可以受到政府的支持，这一点也是法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关荷兰鲱鱼贸易的地位却不十分清楚。高层管理机构出台的有限的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产品的质量而不是针对销售上的垄断。并且人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荷兰的鲱鱼贸易是完全自由的。当然，荷兰在捕捞活动的筹资方面比起其他国家来，是建立在一个更加优越的基础上的。至少在整个 17 世纪，绝大多数的渔船是由股份公司来经营的，而已见雏形的“银行”以及对出资者周期性的拜访则是必不可少的。英国【174】编纂小册子的作家们确信渔船的股份有时是为寡妇和孤儿买的。然而，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因为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渔业领域以外的个人不会对其进行投资。这种投资体制使得荷兰的渔业具备了英国和法国渔业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后两个国家，渔船的所有权基本掌握在渔业人口中的较为贫困的部分。同样，自由贸易的条件也使得荷兰人在竞争过程中，能够以英国人

① E. 达德尔（E. Dardel）：《法国的鲱鱼捕捞业》，第 108 ~ 111 页。

和法国人看来十分荒谬的价格进行销售。对低利率的预期以及股份制体制使得荷兰的渔业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时候，能够在承受一定程度的亏损的情况下继续销售。1700年，一位法国观察家确信，荷兰渔业的捕捞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量，而在此前一年，它们也曾经在包括地中海地区在内的市场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这种情况是与欧洲沿海通常出现的情况相矛盾的。在欧洲沿海地区，一个丰收的渔季预示着在下一年度会有更多的渔船出海，在歉收的年份里则正好相反。19世纪初，人们仍可以见到这种现象。从上述对比中可以发现，与其他国家的渔业相比，荷兰鲱鱼捕捞业的融资体制，使荷兰能够有效地缓解在船只数量上的巨幅波动。

人们，尤其是英国的作家们，常常认定是宗教改革使欧洲的渔业开始走下坡路。当然，这种观点还需要多方面地验证。我们有必要区分几种不同的需求：对作为基本的食物要素的鱼的需求，在斋戒的日子里如四旬斋中人为刺激出来的对鱼的需求，以及作为一个重要的消费阶层修道士们的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鱼类被作为食物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如荷兰、挪威、苏格兰、伊比利亚和从特隆赫姆（Trondheim）到君士坦丁堡的欧洲沿海地区以及北美洲的沿海地区，宗教改革（在所有发生过的地方）的作用似乎并不显著。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则似乎减少了渔船的数目，于是有关新鲜鱼的出售似乎成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不仅如此，加工后的鱼的市场也同样减少了。在其他地方，这种影响要小得多，而受打击最大的则是收获量较低的淡水渔业。尽管如此，甚至在英格兰这种地方，产自萨里（Surrey）湖泊以及其他河流中的淡水鱼，仍是17世纪伦敦水产品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在里士满（Richmond）地区的泰晤士河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拖网的渔船。在捷克斯洛伐克，从渔业中获取的收入甚至会占到土地所有者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由于鱼类的交易日及四旬斋祭礼等因素而人为扩大的对鱼的需求，主要出现在城镇、小酒店和小康家庭中。这是因为，对贫困阶层而言，即便在最 [175] 宽裕的时候也很难支付得起买肉的费用。能够支付得起保存鱼的费用的人是市场上鱼的消费主体，因此，他们也是对高度商业化捕捞船队影响最大的人。1540～1563年间，英国所经历的情形当然很可怕，但在欧洲其他基督教国家中并未出现这一情况。自然，这是英格兰所独有的经济错位时期，同时也是雅茅斯的渔业最为困难的时期。与之相伴随的现象还有，这时的鲱鱼鱼群比正常年份不仅小得多，而且也难预测得多。同样，在这一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渔业也逐渐丧失了其重要地位。1563年，英格兰颁布了渔业方

面的自由化政策，并随后进行了修正。本地渔商对这个政策非常感兴趣，这一政策允许鱼类以自由出口取代对鱼的交易日的限制。另一方面，鱼的交易日和四旬斋的实施，也吸引了伦敦的渔业公司以及其他重要城镇的渔商的兴趣。17世纪中期以前，英格兰的渔民们也的确要依赖于四旬斋的实施。对于在北海和冰岛海域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尤为如此，因为它的实施使鳕鱼尤其是在诸如威尔斯（Wells）、克罗默（Cromer）、南伍尔德（Southwold）和奥尔德堡（Aldeburgh）等小城镇风干的鳕鱼所受到的影响最大。以风干方式保存鳕鱼也是所有保存方法中最为廉价的一种。当17世纪60年代四旬斋被最后一次实施之后，英国在北海和冰岛海域鳕鱼渔船队的衰退速度进一步加快。一个人也会用谷物换取鱼类以备不测之需，由此导致了鱼类价格在16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这使作为一个重要渔业国家的英格兰，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鱼类消费国。

在没有任何由国家出面安排的鱼类交易日的情况下，荷兰的渔业依然获得了生存。挪威的沿海渔业同样如此。1610年，“像其他进行着有效的管理的国家一样”，詹姆士一世认为有必要将每个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设立为鱼的交易日。然而，这实际上只是国王本人一时的兴致而已。此时，他正在与北安普顿的伯爵筹划着第一个早产的渔业计划。

修道院在扩大对鱼类的需求方面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对加工过的鱼存在着大量的需求，而且相当稳定。一旦它们取消了订单，那会给英国渔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由于修道院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使其购买鱼的资金得到保证，因而渔民们所蒙受的损失要比一般情况下小了许多。作为一种补充，渔民们也会在欧洲天主教国家的修道院中寻找市场。历史上一件[176]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由以清教徒占绝大多数的雅茅斯加工的鲱鱼，深受意大利的罗马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欢迎。另一方面，在西班牙的收容院中已允许解除对鱼的斋戒，同时，意大利人自己也能以鸡代替鱼。

丹麦海峡的税收登记显示了波罗的海地区对鱼类的持续性需求。在17世纪的前20年，荷兰每年鲱鱼的出口量达12 000拉斯特。这里面包含着“倾销”的因素。1604~1632年，高层管理机构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温特哲格（*ventjagers*）和其他破坏市场的因素。它们急于控制这种既损害渔民又损害代理商的利益，使二者均不能从中受益的行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是惟一一个能够吸纳如此大量鲱鱼的市场，这个地区细微的变化就会引起法国和意大利市场上发生更加灵敏的调整。波罗的海市场的容量有时简直是一个奇迹。有人推测这些鱼都被交换成为谷物，其真正的利润来源在返程贸易中。于

是，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波兰和波罗的海各港口的谷物价格。当然，其他地区存在着不同种类的鱼之间的相互替代问题，并且这种替代是大量存在的。人们也都在期待着这种现象能在容量有限的地区性市场上反映出来。荷兰人控制着对汉堡、莱茵河西部地区以及西班牙属东尼德兰（1560～1714年间，由于受持续不断的战争的影响，这一地区一直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渔业）等地的海产品供给。与此同时，汉萨同盟生产的鱼干对荷兰也是极为重要的。

在路易十六开始对腌制鱼的进口干预之前，法国是许多国家重要的鱼类出口市场。法国自己生产的鱼一直都能够满足其人口的需求。由于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干扰，法国渔业的产量一直极不稳定。这样，东盎格鲁的鳕鱼就能够进入法国北部，荷兰腌制的鲱鱼以及雅茅斯的红色鲱鱼能够进入鲁昂（Rouen）和塞纳（Seine）河谷地。而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中，来自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北部的鲱鱼捕捞者在相互竞争。同时英国和爱尔兰的沙丁鱼，也分别同它们本国的其他鱼产品相竞争。另一方面，法国生产足够的纽芬兰鲱鱼和沙丁鱼出口到了伊比利亚半岛，这些鱼类产品同国内的、英国的、爱尔兰的以及荷兰的产品展开了竞争，不过与荷兰竞争的程度稍低一些。伊比利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居民，相对而言更为偏爱风干的鱼或熏制的鱼而不是腌制的鱼。在纽芬兰，来自法国、巴斯克和挪威的渔民也相互交换大大小小的鱼类。这样一来，双方都得到了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产品。

16世纪下半叶，伊比利亚在纽芬兰的渔业衰退以及大西洋和东地中海渔业资源的相对匮乏，在许多方面都被证明了给英国在纽芬兰的渔业和法国南部的渔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在一份于1558年致国会的请愿书中，主张 [177] 所有在卡斯蒂利亚消费的鱼都只能来自卡斯蒂利亚的港口。1600年以前，外国的鱼占据主要地位。在所有种类的食物都需要进口的地方，鱼类同样被视为是一种基本的食物。有关的会计账目中总是会把这一点强调出来。由于人们从对一种鱼的消费到对另外一种鱼的消费的变化较为频繁，这不仅要求有关账目要精心安排，同时也使汉密尔顿（Hamilton）的价格指数很难准确地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在西班牙存在的持续高涨的对鱼的需求，以及正在不断增长的新英格兰和纽芬兰渔业在西印度群岛的市场，便很难发现西欧在参与北美洲的渔业活动时，怎样成功的避免了18世纪的北海和冰岛海域的渔业活动中所面临的那些问题。

与西班牙一样，意大利也为国外鱼类进入本国市场提供了良好条件。16

世纪 70 年代为雅茅斯红色鲱鱼专门开发了里沃纳（Leghorn）市场，这可能比所有的塞西尔（Cecil）鱼类交易日的效果都要好得多。但尽管这样，到 17 世纪中期，在里沃纳和威尼斯都已经出现了红色鲱鱼过剩的不良征兆。甚至荷兰人在地中海地区也存在着对鱼的无限需求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还是潜在的。实际需求表明了这样一种价格弹性，即在北欧商人所要求的价格水平下，仅有有限的几个接受者。由此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为取得最为理想的价格，市场需要给予极为精心地管理，这种观念具有普遍适用性。

3.9 渔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及政府的反应

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观察欧洲渔业，获得的结论往往是扭曲的。除了荷兰各州外，欧洲国家的政府中，没有一个像英国政府那样对发展渔业感兴趣的。然而，荷兰政府的态度纯粹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渔业是荷兰各州和西法兰德斯的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感兴趣的只是保持渔业在日常生活中的平稳运行。英国政府各种干预措施的着眼点却放在“维持”海军和船运业（本国基本力量）的地位上。[①] 也就是说，其基本动机是出于战略上考虑而非经济上的。维勒·若雷福（Walter Raleigh）爵士及其以后的学者所做的大量经济学著作，加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荷兰人从渔业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描绘了要建立一只具有荷兰人同等实力的船队和涉足渔业这一重要贸易领域是多么容易。渔业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双重重要性，为英国所有的政治家所认可。“人们都沉浸于【178】某种渔业形式”，《对东印度贸易的思考》［阿尼（Anon），伦敦，1701 年］的作者曾经这样挖苦道。这也是当时对英国政治家的观点的最为深刻的评论。

在伊丽莎白执政时期，渔场被视为海员的“托儿所”。海员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为渔业提供有用的船运。到詹姆士一世执政时期，更具有重商主义的观念出现了。英国人认为，荷兰人从英伦诸岛近海海域的捕鱼中获取了巨额收益，英国应该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船队以及对荷兰渔船征税的方式从荷兰人手中夺回这一产业。詹姆士本人也似乎对这一设想非常热心，而到查尔斯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动用其船只向荷兰人的船队征税。显而易见，渔业纠

---

① 《四旬斋宣言的前序》。

纷是引起第一次和第二次英荷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第一次战争于1652年爆发以后，海军司令布莱克（Blake）的三个重要指令之一便是摧毁集结在苏格兰海域中的荷兰船队。有关东海岸的渔民都是潜在的海军后备力量的说法，在克伦威尔战争中彻底破灭。当时，船长强烈请求海军司令部派给他船员而非渔民。1660年王朝复辟之后，除了那些经济学界编纂小册子的作家们仍在重复着其前辈的陈词滥调之外，人们已经很难再听到这一论调了。166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国外的鲜鱼进口到英格兰，这是一项有限度的渔业保护措施（该措施是在英国的渔船所有者力促下通过的，在此之前曾通过了禁止进口爱尔兰牛的法案）。与此同时，对于具有渔业优势的地区（主要是指雅茅斯）在捕捞季节消费的啤酒征收的税部分返还，以后又返还了部分对用于腌制出口鲱鱼的盐征收的税。英国对本国渔业采取的后一项奖励措施，正是被亚当·斯密和最近的巴白克（R. H. Barback）所严厉谴责的。[①] 这种优惠是不平等的，它在助长沙丁鱼渔业的发展的同时，损害了鲱鱼渔业的发展。在英国的食物供给中，鱼类从来没有被作为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人宣布以表面价值来实施四旬斋，那么其目的是降低新鲜鱼类价格并削减人们屠宰牲畜的倾向。一些具有预见性的小册子作家，尤其是在伊丽莎白执政时期，都将渔业视为一个能够救助穷人、保护富人、改造歹人和游手好闲之辈，以及增进上千个不知道如何生活的人的福利的一项有效措施[②]。罗伯特·海特考克（Robert Hitchcock）于1580年向议会提交了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渔业发展计划，把渔业看做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有效途径。“当穷人们一无所有时，便会自暴自弃；只要有些微的物品，他们就会保有它，直到死亡。”

当然，发展渔业的鼓吹者也热情地指出了与渔业所具有的向后及向前的联系的其他行业。一位提倡发展渔业的博学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他将这些相关行业列举如下：“铁锚制造者、面包师、压舱石制造者、筐篮制造者、铁匠、酿酒师、屠夫、木匠、填塞船的缝隙的人、护墙板制造者、指南针制造者、桶匠、细帆布织工、亚麻梳理工、鱼钩制造者、网具制革工人、铅管工人、滑轮制造者 、水泵制造者、绳子制造者、风帆制造者、木材加工商、船用蜡烛制造者、船只制造者、牛油蜡烛制造者、纺线工。”[③] 当然，雅茅 【179】

① 巴白克（R. H. Barback）：《渔业的政治经济学：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约克郡经济和社会研究公告》第19卷，1967年，第71~84页。

② 罗伯特·海特考克（R. Hitchcock）：《一副政治图景：为了君主的荣誉》（伦敦，1580年）。

③ 普克尔（J. Puckle）：《英国通向财富和荣誉的道路》（伦敦，1700年再版），第30页。

斯的商人们雇佣远至金斯林(King' s Lynn) 的桶匠制造木桶，以预防鲱鱼的捕捞季节到来。渔船上所有的木匠都是在每年的二月、三月间雇佣的，目的是为去北海和冰岛的航行做准备。

如果说这些向后的相关行业对东盎格鲁沿海地区的地方经济较为重要的话，那么它在荷兰是不是更为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据估算有2 500人长期受雇于编织捕捞鲱鱼所用的网具。在荷兰北部贫瘠的土地上，大批人口在与渔业相关的部门就业。尽管鹿特丹和代尔夫特（Delft）很明显地具有多样化的经济形式，代尔夫特沙文（Delftshaven)、斯希丹、恩克辉森、佛兰德符拉尔丁根（Vlaardingen）及其他许多较小一些的城镇的经济则是以渔业为主的。约翰·维特（Johan de Witt）甚至推断荷兰有450 000人就业于渔业及其附属部门。这个估算的真实性几乎为零，因为1622年时，荷兰和西法兰德斯的总人口分别只有671人和675人。尽管如此，荷兰从事渔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在欧洲却是独一无二的。鲜鱼可以运抵荷兰国内的任何地方，鱼类的消费量也同样高于欧洲的其他地区，其中鲱鱼更是以“穷人的牛排”而闻名。这在一个本质上不是自给自足的国家里，是一份颇为珍贵的资产。在鲱鱼捕捞季节到来之际，人们看到在通往荷兰内地的道路上，马车络绎不绝地争着成为最先到达市场的人。

很明显，与荷兰渔业相比，法国、德国、伊比利亚和意大利的渔业在国内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则要小得多。在法国，渔业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地区，并在那里占据重要地位。一位17世纪的作家曾经声明，法国约有一百万人依靠渔业为生。然而即便是在诸如不来梅（Bremen）和汉堡（Hamburg）这样的港口城市，绝大多数的鱼似乎也是进口的。在与渔业具有向后联系的部门中，盐业从来没有被人们提及过。盐是欧洲大批量船运的重要商品之一。在渔业高层委员会的鼓励下，荷兰的各个公国都积极主张使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盐。早在14世纪就发明了保存鱼的方法，传统上认为发明者是威廉·布[180]克尔茨（William Beukelsz)。这时，荷兰人使用本地盐，这是通过燃烧煤泥而获得的。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又积极地鼓励使用伊比利亚出产的精制盐。① 由此，盐的运输成为荷兰自南方返程贸易中的重要内容。在对荷兰船舶采取没收政策的年份里，如1585年、1595年和1598年，荷兰人也曾不得不使用布尔加纳夫的法国海湾的盐。不过，即使在80年代战争期间，仍有荷兰的船只到葡萄牙装运渔业中使用的盐。荷兰的“海湾船队”，为近

① 精致盐的制作过程是把粗盐加进海水，再提炼一次。

海渔业和波罗的海的渔业提供了所必需的盐。荷兰的盐甚至还出口到了英格兰，以做渔业方面的用途。在与西班牙人的战争期间，尤其如此。

英国人在绝大多数渔业品种的加工过程中，通常愿意使用法国出产的盐，但在鳕鱼加工过程中一般使用纽卡斯尔或苏格兰的盐。17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盐业专卖制度严重阻碍了其渔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制度禁止对外国盐的进口。同样地，法国盐业政策的小规模管制也阻碍了法国渔业的发展，其管制的目的在于保证用于国内渔业的盐，不会发生逃避盐税的欺诈行为。19 世纪的作家，如比尤金（Beaujon）确信，政府对荷兰渔业的过分管制，包括一直限定鱼的质量、提供各种资源及护航等，是荷兰渔业最终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除了这些限制措施之外，荷兰也对盐和捕捞所得征税。与之相对照，英格兰的渔业可以说是相当自由的，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弥补与荷兰渔业之间的差距，因为后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水平筹集到资本，同时它们也愿意接受一个较低水平的利润率。

法国政府对于渔业的态度是完全放任自流的，直到柯尔伯特执政期间，才对渔业加以重视。当然，法国的渔民在将其捕捞到的鱼运上岸时要交上岸税，许多法国人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法国的产品与荷兰相比缺乏竞争力。除此之外，渔民们还要交纳地方税。柯尔伯特非常迫切地想发展法国渔业，然而他缺乏像荷兰以及（1650 年以后的）英国那样的可以为渔民提供护航的海军。因此，他的各种努力大多停留在劝戒和鼓励上。直到路易时期，才采取实际措施发展渔业。路易通过了禁止进口腌制鱼的命令，这沉重地打击了荷兰出口商。直到进入 18 世纪，法国人一直使用法律手段发展本国渔业。而到此时，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仅仅法国人设立了渔业委员会。

在战时条件下，护航成为渔业活动面临的首要紧迫问题。沿着欧洲西海岸，传统上存在着一种合作（*trêves pêcheur*），这是一种使近海渔民或所有的渔船之间消除敌对状态的做法。但是自 16 世纪以来，在战争期间，这一中世纪流行的观念遭到了沉重打击。西班牙政府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售卖专门保护法国或荷兰渔船的许可证。1598 年，这种做法达到最高峰，至少有 879 艘荷兰渔船购买了这种许可证。基于这一原因，西兰渔民自 1597 年拒绝对其捕捞成果交纳税金，因为，当初西兰政府向他们征收这些税金是由于政府向他们提供了保护，而此时他们已经转向从西班牙人那里购买这种保护。从那以后，西兰各公国从来没有征收过税金，这一点与荷兰各公国不同。即使在 17 世纪 70 年代，这种为渔船提供保护的许可证制度仍在上述三个国家之间断断续续地实行着。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进了这一制度的崩溃。

【181】

首先，敦刻尔克人和奥斯坦德人（Ostenders）反对这一制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使他们在登上某个渔船之前，无法判断这条渔船是否拥有许可证，从而不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掠夺活动。其次，抱有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们［例如沃班（Vauban）］认为，既然荷兰拥有绝大多数的渔船，许可证制度可能只是保护荷兰人的利益。最后一个原因是英国人对这一制度丝毫不加理会。尽管英国及欧洲大陆各个渔业港口都发出了实行许可证制度的要求，然而从来没有进行过官方的休战协议。当然，一些双边停战协定，如 17 世纪 90 年代多佛与加来之间的协议也并不是不为人知。随着英国对外战争的不断升级，这一制度在 17 世纪后期几乎完全消亡。1703 年，法国人在布雷塞海峡焚毁了 100 艘荷兰渔船，这是荷兰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有关政府干预的最后一个例子也值得一提，这便是丹麦国王对待冰岛渔业的态度。丹麦人和汉萨同盟，决定将冰岛渔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禁止与外界发生任何贸易活动。虽然长期以来，丹麦用渔船运送进口到东盎格鲁的瓦德麦尔呢布料和猎鹰，削弱了丹麦国王这一计划的效率，但总体上来说，这一计划还是成功地阻止了冰岛向除汉萨同盟以外的任何地区出口鱼干。汉萨同盟将鱼干运抵其最后一个大的原料基地卑尔根（Bergen）。然而，这一政策同时加重了冰岛渔场的危机，因为无论是由于天气的原因还是由于人为事故的原因，进入冰岛渔场港口的渔船都极易遭受侵袭。

3.10 18 世纪的问题

1689 年之后，欧洲渔业的收获量的确比此前少了许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自然条件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鱼类对于温度细微的变化都是相当敏感的。17 世纪 80 年代是气候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它代表着葡萄生产年份的终结及冰河时期的回归。在传统的渔场里，各种鱼类的数量也同样大为减少。但即使如此，相对丰富的其他种类食[182]物的增长也一定具对渔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纽芬兰的渔商抱怨在天主教国家中四旬斋越来越难以观察到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一是人口的减少，二是食物的相对增加。1650 年以后，与其他绝大多数食物一样，鱼类的价格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法国，某些特定的鱼类，主要指淡水鱼以及比目鱼的价格基本上维持不变。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渔民和渔商来说，均面临着价格较低、捕捞量较少的难题。早在

18 世纪初，在北海从事鳕鱼捕捞的渔民，就曾在洛斯托夫特抱怨他们想像不出其上几代人是如何从这一行业中获利的。在加来，传统的鲱鱼鱼群自 1689 年起便不再出现。18 世纪 20 年代，恩克辉森的鲱鱼捕捞记录显示：由于本国和海外需求量的下降，降低了获利可能性，导致荷兰渔业陷入了螺旋式下降的困境之中，并最终进入了持续的无利可图的状态。

随着衰退的出现，渔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至少在英格兰如此。在所有的欧洲沿海地区，渔民们的收入传统上都是通过分配捕捞上来的鱼或者分配利润等方式来支付。这种收入通常被称为“津贴”。在船员之间的分配是按照预先协商好的支付标准进行的。在法国，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在 18 世纪初期的东盎格鲁，辅以奖金的货币工资取代了“津贴”，这是朝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个明显步骤。渔业的收缩很可能在最为富裕的国家更加严重，在荷兰和英格兰，尤其在后者，以捕鱼为职业的人数大为减少。荷兰鲱鱼捕捞业的规模甚至收缩到了其以前规模的 40% 以下，这也是造成荷兰渔业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这种悲观景象相对立的是 1700 ~ 1730 年间苏格兰渔业的发展。苏格兰鲱鱼，很可能还有鲑鱼的产量增长迅速。在波罗的海地区，苏格兰渔业的大量出口完全掩盖了荷兰的光彩。苏格兰渔业复兴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令人费解。是因为苏格兰赖以生存的资本在 17 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中幸免于难，而英国的鳕鱼船队却遭到战争的伤害吗？或者是因为苏格兰渔场忽然间能滚动出更多的财源？还是因为 1726 年之后的奖励机制以一种亚当 · 斯密认为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了渔业的发展？或者是在蒸蒸日上的苏格兰经济中，国内需求反而不断下降，而这是与不断增长的商业能力相符合的？同一时期的挪威的经验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鲱鱼鱼群更加赢利以及荷兰渔业缺乏竞争的问题。经济史学家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是，18 世纪下半叶，整个欧洲的渔业都重新开始散发活力。伊比利亚市场上开始消费更多的鱼，有些甚至来自于此前从未向南部地区出口过的设得兰。这一新的活力的出现 【183】 是与人口数量的增加及谷物价格的上涨相吻合的。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人口的增长促进了渔业的发展。但即使有如此有利于渔业发展的条件，渔民们的命运仍然无法摆脱海洋的不可预测性的制约作用。

3.11 结　　论

在近代历史初期，渔业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其他部门的增长掩盖了渔业取得的巨大进步。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荷兰殖民地进口的货物总值，已经超出了荷兰鲱鱼的出口值。英国港口城市如雅茅斯在16世纪时曾完全依赖于渔业，到了17世纪30年代才开始发展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尽管如此，如果研究者倾向于相信当时对渔业规模所做的推断时，17世纪初期的荷兰渔业与19世纪的船队相比，规模仍然是可观的。

渔业对经济增长真正起到促进作用的最重要的领域是"新世界"。纽芬兰和新英格兰渔业在加拿大及北美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怎样估计也不为高，即使其鳕鱼总捕捞量并不比其他地区的捕捞业占优势。最后，人们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远距离地区之间渔业贸易的研究。渔业是国际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欧洲和美洲的边远地区提供渔产品，它们可以拿这些鱼产品交换工业制成品和进口的食品、饮料。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荷兰中，渔业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虽然这种繁荣并不稳定。任何一个想建立近代经济早期历史的模型的人，如果不把渔业包括在内，建立起来的模型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会发现西欧和北美的整个渔业经济发生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一般共识的。[184]

第四章

改变中的商业模式*

4.1 轮船与耕犁

大自然确实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必需品，而贸易却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有用物，提供一切便利品和装饰品。因此，在一国之内，商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成员。他们通过商业交流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分配大自然所能赐予人类的物品，为穷人找到他们需要的工作，为富人带来财富，为统治阶级带来威严。

艾迪逊（Addison）这样说，他接着讲到：

我们的船满载香料、油、酒归来；我们的房间摆满了金字塔型的瓷器，装饰着来自日本的手工艺品；我们清晨呼吸的空气来自地球极其遥远的角落；我们用美洲的草药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我们躺在印度帐篷中休息。

---

* 在此，我应当感谢弗伦奇（E. G. French），他不顾自己的文学创作约稿，热情地承担了翻译本书这一部分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应当感谢伊莎·拉森（Yrsa Larsen），她仔细而耐心地打印了我这部分的初稿和终稿。他们都对我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这就是18世纪初，贸易展现在一个英国国务秘书眼前的美妙情景。众所周知，这种评价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内，即1500～1750年，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对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的赞颂是举不胜举的。对外贸易被认为是保持国家繁荣的主要手段，在一些人眼里甚至是惟一的手段。那个时代的经济文献中常用的一个比喻是：对外贸易是使社会机器运转的伟大车轮，而贸易是国家前进的动力。显而易见，轮船就常常成为这种动力的象征。

初看起来，这种认为对外贸易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繁荣之间有紧密因果关系的看法，或许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近代早期欧洲的绝大部分是农业性的，用稍后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欧洲国家是弱小贫困的。除去一打左右作为首都的城市之外，欧洲城市具有较大的地方性城镇的特征，其功能通常是作【185】为食品和原料市场。一般而言，当时的生产单位较小而且交通不便。通常，相邻地区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是相同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交易无须货币即可进行，直接以物易物或者用其他商品作为中介。确实，大部分居民为日常生计而极度忙碌，他们很难形成艾迪逊式的世界贸易和劳动分工为英国人的早餐桌带来些许好处的观念。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也就是说：他们的需求没有弹性。居民的衣物和家庭日常用具的更新是缓慢的，住宅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当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较低的人均收入和较高的运输成本限制了市场的扩大，而运输成本是由交通网络的结构和运输的快慢决定的。大自然给人们制造了障碍，因而空间成为理解贸易特征的主要因素。商品为了到达目的地，必须克服无数的地方关税和其他经济障碍。安全在商品运输中同等重要。所有这一切，加上战争、瘟疫、歉收和其他天灾等一系列展现在16世纪、17世纪人民面前的无数考验，似乎表明欧洲经济应当被视为一系列相互分离的地区经济。其中，不是政治疆域，而是地理的、气候的、人口的、文化的因素决定了各个地区的生产和交换。

依照这种观点，我们看到的是地区之间的相互隔离，而不是相互作用。国际贸易或地区间贸易的原因被解释为边际需求，这种需求通常来自城镇、人口中的上层阶级、政治机构中的最重要的部门，即宫廷、陆军和海军。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类似问题来解释。在近代早期，经济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份额较大的传统部分和份额较小的现代部分。前者是原始的、停滞的、自给自足的、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后者是现代化的、有活力的、贸易和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其中农业仅仅在紧邻城镇的地区直接地卷入经济创新过程之中。

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经济繁荣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人们深信任何人要想

取得经济“蛋糕”的较大份额，就只有以邻居的损失为代价。这种信念在份额较大的停滞的经济部门确实是存在的。人口中的大部分确实是依靠自己收获的谷物来生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是不重要的。库拉（Kula）【186】教授指出当时波兰的物价总水平依国民产品总量而反向变动；在这种意义上，市场对经济生活具有缓和其波动的影响。实际上，谷物收成的价格波动幅度低于其实物产量的波动幅度。然而，从单个农民或者市民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非常简单的：它通过在许多地区实施基本食品价格管制反映在公共供应政策中。面包的重量和酒的浓度依所谓的“时代环境”而变化，这就是说，“日常生活面包”（daily bread，即城里的普通穷人因为在自己的住所没有烤炉用来烤制面包，而从面包师那里购买的面包）的重量在谷物歉收时就会减少，而在丰收年景时会增加。

农作物收成就好像是社会的脉搏。收成在短期内的波动有可能是剧烈的，而在长期内是温和的。仅有少量的研究现代早期欧洲生产率的资料可资利用，而其中可以得到的资料，却似乎证实并解释了那个时代有关财富总量恒定不变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李·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教授，把15世纪到19世纪法国和比利时的农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按播种面积来算还是按照土地面积来算，产量都是稳定的。教授将其视为一个马尔萨斯式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自耕农、佃农和雇工随着人口的增长将自动地更加贫困，而平均亩产是不变的。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少的人均工作日或人均工时，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和营养不良，以及对土地出租人和放款人的更深的依赖。大体而言，欧洲许多地方的农业产量确实是和可耕地面积成简单的比例关系，这就是土地的价值。卖掉一块土地，用其收入来改善其他方面的概念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

农场的产品首先用来满足农夫及其家人的需要，剩余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其收入用于支付土地租金、税收和其他费用，以及应付各种各样的购物。如果农夫以实物支付各种应付款和税款，那么，接受这些实物的人就成为农产品的销售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入市场的产品数量有多少，是一个不能详尽而知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猜测的是：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市场的产品是少量的。一般而论，即使生产者是依靠市场销售其产品的，但在许多地方实物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对生产【187】资源的使用或者生产总量、生产结构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不同地区之间产品市场化的比例有可能极为不同，然而，距离市镇的远近是其中特别关键的因素。产量和价格在地方性市场上和地区性市场上都呈负相关，收成高价格

就低，收成低价格就高。市场也进行相应的收缩与扩张。

国际市场上的情况就更复杂了。如果有人像维赞斯基（Wyczański）教授那样研究波兰的谷物产量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国际市场的关系，他就会发现：从但泽（Danzig）出口到尼德兰（Netherlands）的谷物数量，在短期内是由波兰的谷物总产量决定的。谷物出口对出口国的直接影响既不是谷物短缺，也不是谷物消费的减少，更不会减少谷物的播种面积。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下一年的出口水平。这就要求助于微观经济层面的分析，但从长期和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是需求决定了出口水平。在这里，价格行情成为重要的因素。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是由大的地区的需求构成的，例如，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需求可以分解为尼德兰地区的需求、法国的需求和南欧的需求。与一国之内的情形同理，价格上升时国际市场扩大（更高的价格可以消化吸收更长距离的运输成本），价格降低时国际市场缩小，只是这时需要额外考虑政治因素和货币因素。就像斯利彻·冯·巴斯（Slicher van Bath）教授指出的，在这样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在国际市场价格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价格和谷物的收获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从较长的时期来看，国际市场的需求可能会引起可耕地比例和不同谷物比例的变化。这里提出的因素主要是对耕地而言的，至于畜牧业，它的产品更像是为市场生产的。在靠近城市的草原地区，现金交易高度发达。

当然，生产率不同于谷物产量和耕种面积的比值，前者比后者更有解释力。在农业部门以外会有一些地区和时期的生产率无疑获得了相当大的增长。技术创新之后的采矿业，采取劳动分工和规模生产之后的纺织业，以及采取较好组织、利用更多知识的一些服务部门，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

【188】如果我们用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商品，例如铜，作为一个例子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铜产量的大幅度波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技术条件，采铜技术在16~18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突破。其二是工业的地区扩散。在15世纪、16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区都出产铜，但是，国际贸易中铜的大部分是由三个重要产地提供的，即：东阿尔卑斯（Alpine）地区［蒂罗尔（Tyrol）］、上匈牙利（Upper Hungary）地区［包括斯洛伐克境内的诺伊索尔（Neusohl）周围地区］、图林根（Thuringia）的曼斯弗尔德（Mansfeld）。16世纪前半期，这三个地区铜的产量处于高峰，达到每年4 500~5 000吨之间。然而，在16世纪后半期，这三个地区铜的产量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至1620年前后，整个中欧地区铜的年产量不超过大约2 000吨的水平。可是，采铜业在17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地——瑞典。17世纪的头20年，

瑞典的铜产量增长了4倍。在30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期间，它成为欧洲最大的产铜国。大约在1650年前后，瑞典的铜产量达到了一个顶峰——年均3 000吨，这样的高水平产量一直持续到1690年。实际上，瑞典的铜产量在1690年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然而，产量数字的增加本身并不能反映相应的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把欧洲看做一个整体，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铜的供应量有着相当大的波动，但欧洲整体的铜产量似乎有一个界限，它的年产量很少超过6 000吨。

农业部门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也有可能得到相似的结论。西博拉（Cipolla）教授检验了一些关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生产率的讨论，他得到了如下的结论：除了一些短暂的时期和一些非常狭小的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系的生产率，在这个时期仅仅获得了非常有限的增长。

耕犁缓慢而安静地划过欧洲大地，只有大自然勉强地给人类施舍。社会的特权阶层对天主教经济制度（*ordo oeconomicus*）做出类似的反抗。比照世俗的各种规定，普通民众则希望人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基本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征兆。很明显，不同地区的相互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许多地区级的市场越来越有活力。当我们依照布罗代尔（Braudel）和斯普纳（Spooner）在本书上一卷的分析来看待产品价格趋势时，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分隔，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市场已经依稀可见。确实，这种情形就像在演奏交响乐时，指挥时而缺席，【189】管弦乐手演奏过多的音调。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称其为不完善控制时期。但是，市场的统一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它的实现特别依靠海上交流。依靠水路连接的地区间比起依靠陆地连接的地区间更容易发展成为一个经济体；水路的存在减小了国内不同地区的差距。谷物贸易为此提供了很多例子。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个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加低廉、更加便利的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比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更早出现。正如本卷其他地方所讲到的，这个时期航路的发展是非常惊人的，更不用说是革命性的了。因此，沿海地区就增加了沿海商品交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常性的洲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在一些领域，欧洲的贸易不应被视为是孤立的，而应将其纳入或大或小的全球贸易中。特别是欧洲和南北美洲的经济联系，对欧洲和美洲的经济都有深远的影响。经济中这些吸引无数同时代人的特征，是使得那个贸易时代**极度辉煌**的重要因素。

然而，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沿着海路繁荣起来。范德尔·维（Van der

Wee）教授在研究安特卫普（Antwerp）兴起的过程中，注意到了16世纪佛兰德（Flanders）地区和南德意志—意大利之间的跨大陆贸易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他强调指出贸易增长、陆上运输部门内技术进步和组织改善的联系。持续降低的运输成本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沿着这条南北欧陆上中轴线的贸易。潜在的资源储备，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未开发的矿产资源，都得到了利用，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收入。直接受益者包括商人、运输工人、纺织工人和矿业工人。增长的经济活动间接地影响到车辆和驮畜的所有者、马具制造者、店主、马夫、集市上的商贩和雇工、工具和器械的制造者、风车和水车的制造者，以及许许多多的食品行业的从业者，例如面包师、酿造师和屠夫。沿着这条陆上中轴线，一些过境贸易商品在一些新的城镇找到它们的市场，随之这些城镇就成[190]为生产和消费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刺激了对其周围地区的谷物的需求，这些地区的荒地和沼泽得以开发和利用，这种或者那种的单一栽培通常会取代先前的多种栽培。消费中心的不断发展吸引着远方的食品的输入，特别是来自北欧、东欧、中欧的牛肉。一些基本的原料和辅助性的原料，例如羊毛、亚麻和染料的需求也有明显的增加。

在范德尔·维教授的模型中，航海贸易的扩张是居于次要的、辅助性的位置，而不是首要的、决定性的。17世纪早期，横贯欧洲大陆的贸易增长为停滞衰退所取代。而快速扩张的西北欧殖民地贸易，则部分地抵消了这种衰退。殖民地贸易引发了收入效应，刺激了英吉利海峡（Channel）和北海（North Sea）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些地区，资源从传统部门转移到扩张的部门。

然而，当考虑到大陆的停滞和地中海世界的衰退，人们就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并非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首先，荷兰—英国扩张的一部分，仅仅是简单地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应活动。其次，在印度的殖民活动仅仅对海外地区产生了活力有限的收入影响。西印度群岛的扩张，是以建立在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为主导的。这种经济很快失去了进步的活力，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而没有产生普遍的有效需求。出现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加勒比海群岛的、以原始的物物交换为基础的海盗贸易也没有可能产生明显的经济增长，仅仅是有大量的船只而已。无论是否挥舞着海盗旗，武装人员都是贸易和繁荣的敌人。欧洲在东印度的活动，对其自身的收入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这一点T. 莱乔杜里（T. Raychaudhuri）教授在其有关17世纪印度的研究中予以讨论。

费伯（Faber）博士对芬兰（Friesland）300年发展的精辟分析，为西北

欧单个地区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证。芬兰处于欧洲发展区域的边沿，它安然地以农业为基础，没有任何与国外市场高度相关的工业部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是高度稳定的部门。相应地，芬兰的社会也是高度稳定的。然而，我们仍可以觉察到芬兰300年间发生的经济社会差别，最明显的就是非农业部门。城市获得了发展，与之相随的是零售商人阶层的出现。从【191】芬兰全境来看，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出现了，在小农和大农场主中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农民分化。在本文中，我们感兴趣的是可观测到的芬兰发展的长期趋势。16世纪和17世纪前半期，芬兰经历了人口增长，价格提高，大规模垦荒，农业集约化，泥煤产量增加，航运、贸易、工艺品制造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强大。大约在1650年，情况有所变化，芬兰经济进入了停滞衰退期。居民人数减少，价格水平回落，垦荒活动急剧下降，农业经营更加粗犷，泥煤生产停滞，芬兰南部到挪威的航运业衰退，对外贸易减少，工厂手工业下滑。社会结构显示出僵化的征兆，政治上出现了寡头政治的倾向。到18世纪后半期，芬兰又出现了前进的趋势。人口增长；价格上升；农业领域，特别是畜牧业，例如养牛业，出现创新；泥煤采掘业扩张；南部和其他地区的贸易都在增加；寡头政治在富有的市民和农民中相对地失去了市场。

经济体系的某些特征有助于解释商人在经济增长时期的作用。在农业部门之外，经济体系需要适当的固定资本、相应的流动资本以及大量的流动性现金。流动资本的最重要的一个消耗就是购买劳动力的工资，它构成了产品成本的较高部分。商业中较高的存货周转率，意味着资金可以相对方便地投入预期利润较高的部门。商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位置。不管有时商人贯彻政府利益的程度有多大，实际上他们很少受到官方的规则条例的约束，他们对许许多多潜在的投资领域都有深入的了解。此外，国家总的货币供应，也就是货币体系基本上是依靠贵金属的流通，而贵金属多少的决定因素则是对外贸易的状况。如果现金的供应量下降，人们就会焦虑不安。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都遭受着运转不良的复本位制，这种货币体制不时地受到来自货币投机者的压力。这也是对外贸易成为国民经济整体中一个重要部分的原因，而商人在其中扮演了某种关键的角色。政府公开的目标就是确保其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大的份额，如此一来，就为国家带来贸【192】易盈余，从而获得金银等贵金属的净进口。对外贸易的关键推动力（这是政治家和商人在短期内考虑最多的问题），经常来自其他方面。萨普（Supple）教授已经令人信服地解释了17世纪的英格兰是如何应用这些理论的。

如果有人想对贸易体系做出一个比约瑟夫·艾迪逊（Joseph Addison）雄辩有力的阐释更加详尽的说明的话，他就会说，贸易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赢利或获取收入的原则指导之下进行的买卖活动。首先，它包括资本的投资，而决定资本持续投资的因素之一就是资本的回报。其次，贸易包括商品或劳务在空间上的位移，即运输。而运输需要时间。商品交易是借助于一系列工具的辅助才得以进行的，是由一个或多个人来安排进行的，并且伴随着这种或那种方式的记账。交易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商品一定需要物理上的位移，但通常是如此。我们可以依据所交易的商品的性质把贸易分为两类：一是真正的货物贸易，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定的分析；一是金融、地产、证券交易，在此我们将不予考察。货物贸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依货物的种类，可分为殖民地商品、谷物、纺织品、金属等；依产品的功能，可分为生产中的原料、成品、半成品，消费品中的奢侈品、必需品；依价值，可分为总额和单价；也可以根据其体积分类，这涉及运输其所需要的运输工具的容量、运输路线（海路还是陆路）、运输的距离。从商业的角度以及交易过程的性质来看，货物贸易可分为批发贸易、零售贸易和沿街贩卖。而在对外贸易中，批发贸易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代商业史中的大部分叙述，都给予了对外贸易和远距离贸易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其中的极为显眼的部分，例如海洋贸易和国际贸易，更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一些无论是从体积、价值还是距离的长远来说在那时都极为重要但却不太引人注目的贸易，例如牛的贸易，没有受到重视。另一个困难源于对“对外贸易”这个概念做出实际的划分。对谁来说是“国外”？部分原因是出于克服上面的困难，我们在后面试图以一种更为有机连贯的方式处理“对外”这个概念。贸易可以分为一系列的循环。从地域看，从地方贸易到洲际往来。从社会层次看，从农民和劳工的生产和消费到地主和王公贵族的生产和消费。为此，就必须简单地探讨需求和消费以及市场及其组织。进而，我们从考察商品的流向入手，试图从地域的角度说明欧洲贸易中哪一个地区的贸易更加平衡，哪一个地区的贸易有赤字。在大多数贸易中，我们都可以区分哪一种是长期的、有规律的，哪一种是偶然的、经常变动的。隐藏在供给和需求交替变化后面的结构变动，对于经常性贸易及其趋势的解释框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依此看来，商业史可以作为反映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一面镜子，反映前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生活的兴衰变迁。

本卷和上一卷的相关部分，是关于贸易组织及其不同工具的研究。许多

与贸易线路、港口和运输工具（例如船、车辆等等）技术性较强的问题在其他部分也有所讨论，商业和关税政策及其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关系也有所论及。此外，相关信息的缺乏使得我们对许多有兴趣的问题只能顺便一瞥。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贸易盈余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贸易条件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对其仅仅进行了为数极少的初步研究。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商业统计资料的断断续续的特征有关，商业统计中的许多可计量的数据存在严重的缺陷。我们知道，这个时期除了合法的贸易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诸如走私等非法贸易。同时还存在着所谓的“危险贸易”，即交战双方的商人在中立者的掩护之下从事的秘密贸易，以及大量的私掠船交易和海盗掠夺。最后，任何对数字感兴趣的读者，如果对本书后面缺乏图表和其他统计工具感到失望的话，他可以参阅本书后面所列的参考书目中的文献，特别是最近的文献，其中包括了本书中的陈述和评价据以建立的资料。 [194]

4.2 需求与消费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格言。又有人说，贸易是使生产和消费得以良好互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机制。以上我们对生产进行了一般性的研究，现在我们来探讨消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着眼于发现对分析 1500～1750 年欧洲贸易的基本情况有帮助的特征。

如果我们以非常宽泛的条件开始对消费的探讨，我们就应当强调指出，大多数群众生活中的大部分就是日常生活的面包。“吃得好就活得好”，这是古代农村地区的格言，值得我们重新提起。人只有苦干才有饭吃，只有吃上了才可能苦干。一位匈牙利人以自己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干得好的人就吃的好”，另一个人就此接着说，“只要我还要吃，我就必须干”。“重”的食物给干重体力活的人，“轻”的食物给干轻体力活的人。人们常常以不让孩子吃饭的方式惩罚他们。吃可以使人漂亮潇洒。一个瘦弱的妻子会使得农夫感觉脸上无光，而对一个健壮的妻子，人们会说有一个男人爱她并且不会在吃上对她吝啬。男人也应当健壮结实。不仅仅对农村来说是如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要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常用的对人类身体宏伟的、夸大的描写就足够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复杂精致但所包含的卡路里并没有真正地减少。农业学

家亨利柏克（Heresbach）在他1570年的《*Rei rusticae libri quattor*》一书中描述了50种不同的猪肉制作方式。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评论瑞典贵族在16～17世纪的日常饮食的变化时，认为这种变化不包括食品和饮料的数量增加。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它的不可能性。

"赐予我们面包吧！"是一个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的祈祷，甚至包括那些面对一大桌丰盛酒菜的人。在历史统计中，难寻饥饿的踪迹，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早期欧洲，饥饿是除了战争和疾病之外，最寻常的造成人类死亡的原因之一。时光变幻无常。给养可能因战争而切断，城市因围困而奄奄一息，港口因结冰而与外界隔绝数个月，歉收之后饥荒就接踵而至。食物【195】资源对人口死亡率的持续压力，是这个时期人口状况的基本特征之一。饥饿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城市总是依靠外部提供给养，而且还在农村肆虐——这些地方还远未成为丰腴之地但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肥沃土地的丰产之地到贫瘠的森林、荒原和海岸。在寒冷的冬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对发生饥荒的农村地区人口进行救援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时饥荒很容易蔓延开来，而且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在欧洲的一些地方，饥荒成了社会的痼疾。戈贝尔（Goubert）教授在他对17世纪博韦（Beauvais）情况所做的开拓性研究中，把法国人分为两大类：能吃饱的和不能吃饱的。欧洲其他地方农村的悲惨情况与此类似，这一切促使人们反思中世纪后期的疾病流行和生存危机。

在西方流行数百年的天主教观念认为，土地的果实是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而食物则是人从上帝那里借来的。相反的，歉收则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而，人类在获取食物的挣扎中，不仅应当努力地工作，而且应当不断地祈祷。对于食物的谦卑反映在宗教仪式中，人们虔诚地听着在沙漠中得到食物的奇迹般的故事。将餐饮膳食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的观念，逐渐演变为将其视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友谊。贡品和圣餐逐渐混合起来。宗教膳食禁忌和其他饮食禁忌，虽然难以界定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就如同声望、流行时尚、权威，以及每一国家和地区特定阶层和家庭的消费标准的主要部分一样。

一般说来，消费模式不是个体行为，因此发现它和历史记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消费模式的变化非常缓慢，特别是对于食物消费来说更是如此，因而，研究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就必须研究它的消费结构。无论是从地区层面上看，还是从国际层面上看，由宗教因素决定的特征是一些贸易规律的决定性原因。一些地方贸易的季节来自于节日的食品需求。在北欧，圣诞节是消

费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大斋戒节对长途贸易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它引起一年中特定时期对特定的食物的需求。冰岛的干鱼和纽芬兰的盐鳕鱼，在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修道院和教堂对圣酒的需求则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例证。

商人满载谷物和肉，像仁慈的天使一样来到，把人们从饥饿的苦难中解救出来。【196】但是，他们也可能被视为恶魔，冷酷地盘算着饥饿人们，紧紧地把持住他们的存货，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取得最大利润时才开始卖出食物。无数地方、地区和国家对垄断和囤积居奇行为的禁令表明，政府当局是如何坚决地不得不用他们的供应政策反对囤积居奇。并非只有商人在困难时期趁机捞取，地方统治者也常常在变幻无常的谷物贸易中趁机利用谷物短缺获利。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强行禁止出口和过境运输、征取高额关税、实行许可证制度等等。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指出：欧洲各地小麦的价格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缩小，18 世纪初以后，这些价格曲线在交汇点上变得比较平缓。他们接着问道：价格差别的消失是否意味着以价格差异为中心的商人资本主义即将消失？商人们依靠极力利用这种价格差异建立的交易制度，是否最终会消灭他们的利润？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前辈人深感恐惧的对饥饿的恐慌是否消失了呢？在一些案例中，多年的谷物短缺和高价，对远距离贸易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例如，阿姆斯特丹的一次食物供应短缺，在当时刺激了大规模的波罗的海贸易，并且持续了下来。16 世纪 90 年代早期，意大利北部的谷物短缺导致了西北欧对地中海的谷物贸易，虽然在谷物危机结束后，其他商品代替了谷物，但这种贸易联系却随之永久化。

对食物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丰富的有关这个时期的预算开支的资料以供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特别是通过研究当时的食谱，得到这方面的有用信息。这种研究手段直到最近还是研究人种学的专用手段，经济史学家对此则毫无兴趣，也许他们可能因此而受到责备。此外，数量资料的缺乏并不能妨碍历史学家得到社会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即使他们不能衡量这些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前的经济是建立在地方的农作物收获之上的，这是一条基本规律。人们利用所能得到的一切。通常，这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日常饮食不平衡。欧洲各地的居民，有各种各样的饮食爱好，有的吃粥，有的吃蔬菜，有的吃肉，有的吃鱼，有的靠狩猎。细而察之，这种饮食上的不平衡起因于贸易的独特性质。例如，黄油在附近的市场上有良好的销路，使得黄油在城市里制作好，然后再销售出去，【197】从而使黄油成为一种奢侈品，反而很难在产奶区农民的餐桌上看到。欧洲食

品贸易中的许多特产，事实上是给外国消费者制造的，而生产者本身并不消费它们。这样的产品确实很多，它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名称。它们是广泛的商品交换的证据，这一点可以从对价格—货币、市场出货清单、产品目录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两种主要的酒精饮料——啤酒和葡萄酒，名声远播，销往各地。它们的主要产地有：阿利坎特（Alicante）和廷图（Tinto），波尔多（Bordeaux）和南特（Nantes），汉堡（Hamburg），不来梅（Bremen）和但泽。当地的历史充分表明，这种产生专门交易的专业化一直延伸到省级水平上。本地面包店、酿造厂、制酪厂产品的销路大小取决于诸如易腐烂性等因素上。它们可能是斯凯恩（Skåne）芥末，哈兰地区（Halland）羽衣甘蓝，斯麦兰（Småland）奶油面包等相当不起眼的产品，都是季节性的属于一省所有的特产，它们从瑞典的一个地区销往另一个地区。

当我们对最小单位的地方——教区——进行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教区，就有一种以上的饮食文化，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殊需求。简单地说，有两种：穷人的伙食和富人的伙食。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例如在婚宴上，牧师有葡萄酒下肚，在日耳曼地区葡萄酒是一种只有通过从国外进口才能得到的消费品；这时农场主喝的是从当地市场上可以买到的白兰地酒；而佃农和雇工却只有就着农场自产的麦酒吃饭。我们可以从一个 18 世纪的瑞典农场，举出其他许许多多的在饮食方面存在差距的社会阶层的有说服力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是有关腌鲱鱼消费的，这是北欧一种极其普通但却非常重要的贸易商品。有三种鲱鱼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种给家长吃，第二种给一家的主要劳力吃，第三种给厨房的女仆吃。家长把他的鲱鱼分为三部分：鱼身归他自己，鱼头归妻子，鱼尾归最小的孩子。主劳力的鲱鱼也分为三部分：中段归自己，上段归第二主劳力，下段归农场主的孩子。厨房女仆把她的鲱鱼剁成块，分给自己和家庭的其他成员。

当然，从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我们不能得到有关各种产品的需求比例，【198】更不可能计算出需求弹性和其他现代消费经济学感兴趣的数量概念。这些例子仅仅说明需求的多样性特征，并列举了一些基本特征。据此，我们把“贸易”这个概念从社会和地理方面分成各种各样的领域和地区。

食物是劳动和服务的报酬。国王和统治者以税收的方式收取食物，并将其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如果还有剩余，那么将通过贸易的方式处理掉。牧师和地方官员收取食物，作为其特殊服务的额外津贴。这也可能和婚嫁丧葬有关，或者仅仅是教区牧师给文盲父母阅读上学的儿子写的一封信而获得少量

的白兰地酒。对仆人来讲，农场主或自治市市民因吃的好、穿的体面而获得的名望比起后者本身实际的薪金来，更有决定性。家庭的自豪感来自于它的食物库存，这些食物不管是房顶上挂着的熏制品，大桶小桶内的腌制品，还是坛坛罐罐的橄榄油、葡萄干、干果和香料。人在旅途总要带食物。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一个传统，宴会时客人自带一些菜，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各自付费。从饮食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分辨出截然不同的时代：巴罗克（baroque）时期，饱食是一种风尚；洛可可（rococo）时期，人们追求食物的精致。在洛可可时期的后期，两种新的饮品——茶和咖啡，代替了葡萄酒、啤酒和白兰地而成为主要的饮料。这时，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下降了。

统治者不时地会担心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在节日和日常家庭生活中消费的无节制，他们发布无数的命令努力限制暴食暴饮。然而，王公贵族和他们的仆从，却并没有树立值得学习的榜样，而是恰恰相反。皇家的酒会宴会才是真正的纵情吃喝的体现。欧洲城堡和庄园精心指定的容量极大的厨房和食品储藏室、酿造室、酒窖就是吃喝饮食在日常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最好见证。餐饮账单、对厨师和酒库管理员下的账单也说明了这一点。大农场的家庭账目、房屋和庭院说明：毫无疑问，家庭并不仅仅拥有在附近就能获得的商品，人们通常也从远处大量地购买商品来满足其消费需求。陆军和海军的军需也是如此。这些消费中心，连同城镇和矿区，在食品的远距离贸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英戈马尔·博格（Ingomar Bog）教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土耳其战争的历次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粗略估计，在1526～1718年之间，【199】土耳其共有65次战事。单单1689年那场战争，就需要供应260 000英担的谷物。这样巨大的需求主要是面向上德意志地区，它同时也对当地的市场和地区性市场造成影响。博格认为土耳其战争所促进的对谷物的需求，是造成当时农业萧条在德意志地区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快地结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17世纪末英国海军对食物的需求，当时有20 000以上的人应征到海军服役，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像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诺里奇（Norwich）这样的城市的总人口数。17世纪前半期，为了供应荷属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基地的船只，每年都有2 000头以上的牛被宰杀。日德兰半岛的牛因其上好的肉质而最适合这种供应，这种牛肉适合腌制，容易入味，适于保存。

食物的易腐程度限制了其运输，但适于水路长途运输的食物种类是相当多的，包括大多数谷类，许多干果，大多数咸鱼或干鱼，大多数葡萄酒和啤

酒，几乎所有的调味品，以及诸如此类的盐和糖。甚至像鱼子酱这样精致的食品，也可以从俄国装船经西欧到达地中海地区。除此以外，大多数商品的销售范围比较狭窄。然而，肉类是个例外。待宰的牲畜从畜牧业者的畜棚经过漫长的跋涉运到待宰的催肥地，屠宰之后经过处理，然后就进入消费者自家的烤炉中。匈牙利和丹麦的牛，经由纵横交错的销售网销往欧洲各地的消费中心，它们包括意大利北部［特别是威尼斯（Venice）］、中欧［维也纳（Vienna）、慕尼黑（Munich）、法兰克福（Frankfurt）是其最大的买主］和西北欧的低地国家（汉堡、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是主要的购买者）。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时期内消费发生了一些基本的长期变化。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有关消费历史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仍无法对其做出一般性的结论。一定的人口数量对谷物消费是相当的没有弹性的，而肉类的消费需求确实是有弹性的。消费依收入的变动而变动。有人认为，中世纪后期实际【200】工资的增加导致了肉类消费的增加。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教授计算出德国每人年均消费达到 199 公斤。依此推断，16 世纪时工资较低，则这时的人均消费也低，但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化可能抵消了消费降低的一些影响。斯库莱尔（Scholliers）有关 16 世纪后半期一个安特卫普泥瓦匠家庭的消费的研究表明：面包占日常生活开支 50% 以下，肉类占 22% 以上。面包和肉类的大量消费，伴随着相同比例的麦酒和葡萄酒消费。酒类的消费可能和饮食的不平衡有一定关系，因为以蛋白质为主的膳食需要大量的酒类饮料来帮助消化。17 世纪、18 世纪北欧的牛肉和猪肉消费下降，与此同时，奶制品、干酪、牛奶和黄油的消费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上升，这种上升在 18 世纪尤其明显。虽然也有一些调整，但蔬菜消费则经历了较少的变化。

在南欧，玉米在人们的消费中占有的位置更加重要。这种作物是在 16 世纪引入葡萄牙，于 17 世纪早期引入西班牙的。1630 年以后的意大利，玉米消费也比以前更加重要。因为它的出口居于次要位置，意大利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在整个 17 世纪期间一直在增长。这些新种类的食物，与人口增长的停滞和经济状况的萧条一起，使得一度飘忽不定的南欧对波罗的海谷物的需求得以平稳，而这种需求曾经是南北欧海上贸易的主要动力。17 世纪荞麦在西欧和中欧种植和消费的扩大，是另外一个植物性食品发生变化的例子，这种变化的影响通过贸易得以传播。

关于饮料消费的情况。啤酒消费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减少，一度存在的大量的烈性啤酒贸易相应地减少，因而在中世纪具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北部城市贸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要找到啤酒消费减少的原因并不是轻而

易举的事情。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来自新的饮料——咖啡和茶——的竞争，它们正成为大宗交易的商品。白兰地的出现也是部分原因，它是作为啤酒的伴料被消费的，加上白兰地的啤酒更上档次。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18 世纪是杜松子酒盛行的酗酒时代。这些结合是不幸的。在这个生产【201】链中，啤酒成为居于从属地位的产品。生产白兰地时需要啤酒来装料，这种用途的啤酒发酵不足，却生产出发酵充分的浓烈的白兰地。同时，白兰地的生产过程产生了一种残渣形式的副产品，这种残渣成为冬季牛饲料中不可或缺的补充物。要不然，在原始的农业体系中，牛饲料仅仅由麦秆和干草组成。拌和了这种残渣的麦秆刺激了奶牛生产更多的奶。像在其他欧洲城市一样，例如哥本哈根（Copenhagen），城市中饲养着相当数量的牛，这些牛被称为“白兰地牛”。这些牛吃生产白兰地时产生的残渣，一天生产 20 升牛奶，而一个喂养得很好的农村的牛才生产不多于 6 升的牛奶。因此，不时地，白兰地成为在同一地方进行的生产链中的一个联结物，它有两种副产品：一是啤酒，二是牛奶。这两种产品都没有像 16 世纪的烈性啤酒那样，为远程贸易和大宗贸易提供基础。

前面已经指出，市场影响了消费模式。一个对卖方有利的市场会影响饮食，使其发生不平衡。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作为交换，市场本身也提供其他可消费的商品。市场是农夫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酱、醋的地方。广泛地看，贸易路线对饮食的影响可以从诸如香料和糖这样的海外产品上看出，这些舶来品首先在社会的富有阶层和城市中找到其市场，城市完全等同于这些商品的市场。随着舶来品价格的逐步降低，它的市场就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更广大的地区。

众所周知，人们居住地的改变会导致他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首先改变的是着装，其次是语言，最后是饮食习惯。城市化改变了消费和需求模式，对餐饮器皿的需求和其他有关餐饮的细节问题都随之改变。农民在低矮的茅草屋里用普通粥碗吃饭，手里拿勺子，轮流用大啤酒杯喝酒；而艾迪逊式的上流社会的宴会吃的东西，则来自远近各地，用的是玻璃器皿、瓷器以及刀叉等高档餐具。这两种景象的差距是非常大的。依时间地点的不同，它们之间有无数的过渡阶段。

餐饮用具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这其中既包括做饭用的器皿也包括吃饭【202】使用的器皿。

这些餐具在地方性贸易，尤其是地区性贸易中流通，小贩把它们运往各地，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纽伦堡的（Nuremburg）小商品贸易。这个时期发

生了铜制餐具向铁制餐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铁制品价格便宜，另一方面是因为铁制餐具易于清洗而且不败坏食物的味道。这种转变可以由这两类重要商品的贸易看出来。在中国陶器大量地进入欧洲市场后，18世纪陶器和瓷器的流通范围明显扩大。我们今天所收藏的主要是其中的引人注目的部分，例如御制餐具、精致的碗、中心装饰品等。然而，一项有关东印度公司进口货物的研究表明，其进口的产品主要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具，例如厨房用的盆和碟等，这些东西最终都打碎了，很难保留到今天。进口陶瓷品对当地的陶器制造是一个补充，而且进口陶瓷品在贸易中的流通范围比后者要广，这就推动了当时欧洲刚刚兴起的陶瓷手工业制造的发展。

吃、穿、住三位一体，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是穿衣还是住房构成了生活开支的第二大项，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它的答案主要取决于居住地，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农村还是城市。然而，穿衣开支和吃饭开支具有相似性，这就使得把它们一并处理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吃饭、穿衣比住房更具有“可消费性”，因而吃穿开支一起成为当前消费的一个函数。

获得衣服与获取食物遵循同样一个道理：人们得到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当地人穿当地就能制造的衣服。几乎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特别是农村，都有地方性的纺织品制造，用来满足当地的大部分消费需求。尽管高度的自给自足，我们仍能够发现地方性的专业化，也就是说，地方性的技术和地方性的产品样式经由卖鞋带、羊毛衫、桌布等诸如此类商品的流动商贩而经常得以传播。很明显，不管当地的纺织品生产状况如何，当地的纺织品供应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不足的。这种补充性的需求，主要是通过与技术先进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贸易来满足的。这些中心位于意大利、佛兰德、布拉班特（Brabant）、荷兰、英格兰、爱尔兰和西里西亚（Silesia），以及欧洲之外的印度、中国、日本，而每一个生产中心的主要品种还在研究之中。

许多上好的织物被视为奢侈品，这并不是说这些物品的重要性仅仅在于【203】它们能够满足富人的需求。“炫耀性消费”已经是一个熟悉的概念。身穿华丽的衣袍所带来的宣传价值是很大的，它可以扩大皇室的威严和声望。16世纪王公贵族和当权者所穿的镶有金银珠宝的重质锦缎和丝织衣物，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宫廷中都可见到，它们全部是进口来的。然而，并非这些高品质的布料构成欧洲衣料贸易总额的最大份额，而是普通的布料或呢料占据了衣料贸易总价值的绝大部分。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不生产纺织品的国家里，这种布构成了进口的相当大部分。16世纪瑞典进口总值的1/3以上是这种布料。就像黑德伯兰（Hildebrand）教授指出的，瑞典16世纪的

纺织品对外贸易的历史意义和政府当局出口此类产品的兴趣的真正原因，正是来源于以下的考虑，这种考虑完全不同于中产阶级和农民对出口的需求。进口的呢料优于本国货不仅在于其美观大方且经久耐用，而且在于其质地统一。消费者完全懂得哪种质量的布料是好的，是他们想要的。这些优点导致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进口呢料在瑞典的使用，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当时，经常用衣料来支付工资，或者工资的一部分。当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和他的继任者建立起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队时，呢料就变得更加重要了。重商主义有一个传统的主张，那就是发展制呢业。之所以要供应这种炫耀性的衣料，其中重要的考虑就是它能体现声望和威严。就像古斯塔夫·瓦萨就此指出的，这就使得瑞典必然和其他政要、皇帝、国王和诸侯一样体面地行动，所以瑞典人再也不比他们粗俗卑微了。

即使是社会的较低层，同样也需要本地不能生产的纺织品。例如，15～17世纪的俄国，只有富裕地主（boyars）和富有的商人才能穿来自佛兰德或英国的衣料，而中产阶级则穿戴来自波希米亚的较便宜的衣服。18世纪俄国努力发展纺织品制造业，就是为了替代来自波希米亚的进口货。即使社会最低层的人有时也可能会穿着来自国外的衣服。西里西亚的亚麻制造业，起初仅仅在当地销售其产品，后来由于其价格低廉，远销南、北美洲的欧洲人种植园，为印度和非洲黑奴提供衣服。印度的纺织业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204】着同样的经历。一种称之为“几呢”（Guinees）的价格低廉的棉布，常常用做遮羞布，而西非海岸和东非海岸的贩奴者则需要这种布。这种布由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卖给那些从事西印度贸易的公司和商人。17世纪后半期，印度的廉价棉布大量地销往欧洲，不仅仅用于做衣服，特别是内衣、手绢等等，而且用于制作床单、窗帘等家庭用品。

4.3　地区和贸易流向

我们要对欧洲贸易做出概括的分析，方法之一就是将其按地区或区域进行划分。这种方法，是自屠能（von Thünen）以来的德国学者专门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按商品种类对贸易进行划分。这种方法为生产和市场情况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机会，为发现地区之间的联系，而且为详细分析评估潜伏在贸易变化之下的各种因素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在以下的部分努力将这两种互为补充的方法结合起来。一些地区的贸易比另外一些地区的贸易

要多。历史学家布鲁诺·库斯凯（Bruno Kuske）和经济学家弗朗斯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都有点被诸如“主导地区”和“主导经济”这样的概念所吸引。所谓的“主导地区”即被其他地区模仿追随的地区。各个地区分布在一个主要市场周围，价格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例子。对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16世纪意大利地区占有的经济优势和消费中心的位置，在17世纪为西北欧所代替。这个转变发生在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的两个国家，具有全球性的商业活动起源于里斯本（Lisbon）和塞维利亚（Seville）。然而，既不是葡萄牙也不是西班牙致力于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它们的原料并不丰富，社会结构也不够成熟，因此这两个【205】国家所从事的主要是过境贸易。德意志地区，至少是它的南部，它的经济主要追随意大利地区。17世纪后起的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部，极其依赖尼德兰地区。东欧部分的经济也越来越面向尼德兰地区，关于它的社会后果受到东欧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由此而导致了不同地区的贸易平衡问题，后面我们将对其展开讨论。

我们借助地理学对地区进行的划分并非没有问题。但是依据粗略的分类，我们首先讨论一些传统的海洋贸易区，例如地中海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大西洋沿岸以及海外贸易。其次我们研究陆上贸易，它的运输是靠江河或者陆路。关于贸易流向，我们的描述和分析将包括选择性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依其体积还是价值，在整个欧洲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并解决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

地中海盆地是欧洲著名的贸易区，它在现代早期的主要情形是大量研究的主题。这方面的荣誉要特别归于布罗代尔教授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他之后有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地中海地区自成体系，它通过东方和东部联系，通过中欧和北方联系，通过西欧和西部联系。地中海盆地可以划分成一些主要的贸易区，它们自东向西分别是利凡特海（Levantine Sea）、爱琴海（Aegean Sea）、亚得里亚海（Adriatic）、伊特鲁里亚海（Tyrrhenian Sea）以及里昂湾（Gulf of Lyons）。人口大规模集中的城市出现了。东部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开罗（Cairo），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它们都是巨大的城市。富裕的伦巴底（Lombardy）平原拥有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佛罗伦萨（Florence）和米兰（Milan），以及强大的海洋帝国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后两者同时也是庞大的商船队伍的出发港。接下来就是法国南部地区，人口稠密的聚居地星罗棋布，发达的交通由马赛（Marseilles）直达罗纳河

(Rhône) 流域。最后是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这是地中海地区的最西端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它的贸易在 16 世纪的地中海兴旺起来并且达到新大陆, 建立了从塞维利亚到美洲的航运。

地中海贸易的主要货物是谷物。体积庞大的货物, 例如谷物、盐、腌制品、油和葡萄酒占据了运输体积的最大部分。干酪、葡萄干和糖也包括在地中海盆地的海上贸易中。尼罗河 (Nile) 为开罗和亚历山大 (Alexandria) 的人口提供谷物, 而且还有所剩余以供出口。黑海 (Black Sea) 岸边土地富饶肥沃的地区, 也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谷物。叙利亚的贸易城市主要是地方【206】性的。然而, 地中海盆地的西部地区, 当地的谷物供应经常不足, 因此, 确保从其他地区运送谷物到这里, 几乎成了这个地区持续性的有时甚至是紧迫性的问题。西西里岛是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谷仓。另外一个谷物产区是意大利的阿普利亚区, 它的谷物供应着那不勒斯和其他地区。西西里岛和伊斯得里亚半岛一样, 同时也是重要的腌制品生产地之一和金枪鱼的供应地。在捕获季节, 这两个岛屿周围水域金枪鱼的捕获量是巨大的。如果没有这两个岛屿的产鱼量, 那么地中海地区的渔业资源就会相对地贫乏些。咸鱼的销路一向很好,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镇是大西洋地区有名的鲜鱼和咸鱼的出口者。葡萄牙人是这种渔业及其贸易的佼佼者。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南部占有橄榄油贸易的大部分, 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生产畅销世界各地的葡萄酒。贸易中的食糖主要来自以上两个地方, 也有一部分来自西西里岛和安大路西亚。

各种各样食品贸易中赢利最丰富的当然要数著名的香料贸易了。香料经过一长串的交易从南亚和东南亚进入亚历山大和的黎波里 (Tripoli), 这才得以进入地中海。这一切要感谢意大利各城市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贸易活动。威尼斯是主要的香料贸易中心之一, 香料从这里销往意大利北部, 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德国南部和中部, 经由海路到达马赛和法国其他地区以及西班牙各城市, 经过直布罗陀海峡 (Strait of Gibraltar) 销往西欧和北欧。

地中海贸易中的许多原料都需要占用很大的运输空间。意大利的服装制造业建立在西班牙优质羊毛的基础上。羊毛经由马拉加 (Malaga)、阿利坎特 (Alicante) 和喀他赫纳 (Cartagena) 到达热那亚、里沃纳 (Leghorn) 和威尼斯。许多地区出产的生丝也大量地远销各地。墨西拿 (Messina) 就是最重要的生丝贸易中心之一。兽皮经由货船从阿尔及利亚 (Algeria) 运往意大利。西班牙是一个皮毛生产大国, 它的著名的皮革制造工业不仅用光了本国所生产的全部皮毛, 而且需要从其他地区进口。矿物贸易中, 铜、锡、铅是远古以来就进行贸易的货物。由于青铜大炮应用的增多, 铜成为最重要

的远途贸易商品之一。它主要从德国南部经由陆路到达威尼斯，再经由地中海到达地中海东部、西部和南部。铅和锡的供应也来自地中海以外地区，主要是英格兰。地中海地区还出产一种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好的矿石，这就是明矾，它是纺织品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

【207】 除了食品和原料外，地中海各城市的产品都有广泛的销路。意大利的纺织品、威尼斯的玻璃器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皮革制品，在地中海地区和地中海之外的地区都有很好的销路。此外还有精致贵重的商品，例如中国和波斯（Persian）的丝绸，印度的印花布和宝石。

16 世纪意大利各城邦代表了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活力，它们和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商业家族在许多方面都是先驱，不仅在运输方面，而且在于他们的贸易组织、贸易记录以及对贸易的金融支持。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我们在这里仅仅举出其中的一个。普拉托（Prato）的羊毛商弗朗赛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他绝大部分的档案材料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梅利斯（Melis）教授的主持下，普拉托学院正在对这些记录材料进行研究。意大利人的商业帝国遍布各地，从利凡特到中欧和西欧。无论到哪里，它们的商业联系或者通过陆路经由德国和里昂与其他地区联系，或者经由海路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然后绕道到达伦敦、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各城邦与相反方向各地方也保持着商业联系。富格尔家族（Fuggers），16 世纪最大的商业帝国，在从德国南部和匈牙利到威尼斯及其以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特别活跃。它们的业务建立在出口铜和银、进口香料特别是胡椒的基础上。方泰柯·泰德斯凯（*Fondaco dei Tedeschi*）为我们提供了德国南部对威尼斯的经济影响的证据，威尼斯是德国商人的商品集散地、仓库和旅馆。最近，法国历史学家布劳斯泰因（Braunstein）博士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详尽的新研究。就像吕兹·马丁（Ruiz-Martin）教授所证明的，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曾经有着紧密的商业往来。教授的成果，是建立在菲力浦·吕兹（Felipe Ruiz）研究所的地中海地区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的。

在 16 世纪后半期，地中海盆地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的供应，尤其是谷物的供应。供应短缺先是在地中海西部出现，然后向东蔓延，最后直至君士坦丁堡。这种实际上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逐渐恶化的短缺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的全面增加。这种背景使得地中海地区不得不从一些以前并不需要的地区，例如西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输入谷物。英国和荷兰，特别是荷兰的船队进行这种谷物运输，同时也贩运北海的鲱鱼及从波兰、俄国和

【208】 新大陆向西班牙和意大利进口越来越多的皮毛。同时，到 16 世纪末，地中

海地区通过意大利城邦同利凡特进行的古老的香料贸易，开始严重地受到来自新的经由好望角的香料贸易的竞争。新成立的西欧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运用其巨大的影响，于16世纪、17世纪之交结束了威尼斯的经济霸主地位。西北欧的贸易国家不断地向地中海盆地渗透，它们带来了新的商品贸易，为利凡特市场带来了纺织品。这就使得地中海地区不再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封闭的世界，这时欧洲的经济中心转移到西北方向。

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吉利海峡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是欧洲古老而极其重要的“地区”之一，它的沿岸有众多港口和江河入海口，形成了港口对港口贸易。这类贸易的种类和贸易量可以和地中海贸易相提并论，而且确实和地中海贸易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同时也和北欧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

和地中海地区一样，大西洋沿岸的贸易大多数也具有体积大、重量大的特征，主要是生产生活用品，例如谷物、盐、葡萄酒和羊毛。在大西洋沿岸和北欧地区的贸易中，盐所占据的支配地位是极其明显的。这两个地区的贸易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我们在它们之间做出区别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从对维吉尼亚·劳（Virginia Rau）和皮埃尔·让南（Pierre Jeannin）两位教授关于食盐贸易的研究成果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上述的结论。作为海盐供应者，法国和西班牙是竞争对手，而盐的消费者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谷物贸易是作为食盐贸易的补充而出现的，只不过贸易的流向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弥补葡萄牙和西班牙日渐严重的食品短缺。实际上，食盐和谷物这两种商品在16世纪的海上贸易中占有关键的位置。它们重大笨粗的特征，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价格会随着实际运输成本的变动而上下起伏。另一个表现就是，很长时期内，船的运载能力都是简单地按照它所能容纳的谷物和食盐的量来衡量的。食盐是通过海峡的东西方航运中体积最为庞大的商品。埃尔西诺（Elsinore）海关把进入波罗的海的航运分为两类：装载压舱物的船和来自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运盐船。

大西洋沿岸北部的商人最积极地参与了大西洋沿岸和北欧的商品交换。在商业同业公会初期，荷兰特别积极地开展这种贸易，后来货物运输支配了这种航运业。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国家，将发展这种贸易作为其重商主义政策的一项主要目标，它们运用关税优惠和津贴的手段，以图本国的船队能参与一部分食盐贸易。但是，直到17世纪末，荷兰才被迫向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船主让出货运市场的部分份额。俄国在18世纪也作为一个食盐贸易的积极参与者而出现，随着它与地中海地区交易的增多，另一条从北欧到南欧的食盐贸易路线得以建立。里斯本和但泽是大西洋 【209】

—北欧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令人惊奇的是，经营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成为荷兰人的专利。正如下面的谷物贸易所要指出的，荷兰具有这种特殊地位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地理上正好居于中间位置，这使得它可以同时与其他贸易终点站进行商业往来。

从大西洋沿岸贸易开始之初，那时最引人注目的贸易——远洋贸易就已经进行着，它东达亚洲，西至美洲。叙利亚人是远洋贸易的先驱。自中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就在探险、捕鱼和殖民三方面动力的结合下，沿着西、南、北三个方向向大西洋扩展其势力。从事贸易的欲望也促进其远洋扩张，特别是沿着非洲海岸的扩张。扩张活动于1496年达到顶点，这一年开通了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南海航线，此后不久就与新大陆建立了联系。葡萄牙人在通往东方的远洋航运中的垄断地位维持了近一百年。紧随其后，一大批欧洲北部的国家作为葡萄牙的竞争者而崛起，它们是：荷兰、英格兰、法国和丹麦—挪威。荷兰人的贸易势力在17世纪达到了特别令人难忘的程度，他们扩张到了整个亚洲海域，从日本经由中国台湾到达东南亚各个贸易站。爪哇岛的巴达维亚是其在亚洲的中心，并由此向前推进到印度、锡兰、波斯和阿拉伯，最后到达非洲南部。

欧亚贸易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欧洲明显的偏爱进口。贸易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欧洲商品寻求新的销售市场，虽然英国公司是个例外，它们起初想把印度当做英国布的销售市场。人们从事这种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那些极好的商品，它们可以使人们享受美食，穿戴华贵，虽然当时的学究们斥责这些商品的奢侈。除了武器和弹药外，能在亚洲找到市场的惟一商品就是金银。欧洲人需求的变化反映在进口商品的模式中。香料特别是胡椒在16世纪是 [210] 最为重要的进口货，但到17世纪时，进口商品的种类更加多样。随着欧洲人饮食习惯的变化，香料失去了市场。这是因为以前大量消费的肉类逐渐不再受欢迎，因而用来加工肉的许多香料也就不需要了。印度东部的纺织品，代替香料成为欧洲进口商品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商品，它占1700年前后荷属东印度公司进口额的40%以上。稍后的18世纪20年代、30年代，咖啡和茶，尤其是茶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大约占1740年前后荷兰公司进口额的1/4。进口数量的增加导致了价格的下跌，茶不再是药剂师货架上的贵重药品，而是成为流行的饮料。

随着茶叶贸易，欧亚贸易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过去的欧亚贸易伴随着稳定上升的保护成本，需要特别复杂的过程将要返回欧洲的货船集中起来一起返回。而且，只有积极地从事亚洲国家的贸易才能经营欧亚贸易。而现在，直接到中国广东的广州（Canton），就可获得大部分茶叶。在广州，清帝国

的官员限定了欧洲人进行贸易的条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自由出入亚洲，这本身就使得过去一些公司对经由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路的垄断没有意义。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导致了对中国的强行干涉。广州新的欧洲贸易伙伴出现了，它们有奥斯坦德（Ostend）、汉堡、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哥德堡（Gothenburg）。从欧洲小国的观点来看，这种新的贸易具有不需要通常所需的高额殖民费用的优点。新的贸易参与者的到来加剧了竞争，贸易利益以高流通额、低回报率、运输加快的形式出现。欧亚贸易由此分为两部分：传统的、缓慢的、昂贵的商品贸易和直接的、快速的、低廉的商品贸易。

大西洋贸易和欧亚贸易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新世界所发生的殖民活动。殖民活动的范围很广，包括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经由北美诸州的种植园殖民地、西印度群岛、葡属巴西，到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混合型殖民地。仅仅在南美洲不太好客的地区，那里的地理条件和人口分布使得白人定居者无法占主导地位，因而建立起工厂制度，这使人联想起亚洲的情形。获得土地和由土著或外部输入的劳动力来开发土地，标志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交流。关于新世界贵金属储藏的采掘，贵金属【211】是由西班牙所属的中美洲矿井运送到塞维利亚和卡迪斯（Cadiz），由此美洲的财富流向欧洲其他地方，这一切对欧洲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财富的这种流动随后由巴西的黄金予以补充，这些黄金经由里斯本进入流通。

在新世界和旧世界贸易中，体积较大而且从纯商业的角度看，至关重要的贸易商品是巴西的木材、糖、烟草和棉花。纽芬兰（Newfoundland）的鳕渔业和北美的皮毛贸易，对国际航运业提出更多的要求。糖和烟草像茶一样，在17世纪时由昂贵的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的商品。这两种商品成为堆栈贸易的基础。堆栈贸易在17世纪后半期的荷兰和英格兰得到发展，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稳定增长。

欧洲向南北美洲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这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的需求。这些商品包括布料、家庭日常用品和工具，以及葡萄酒和其他消费品。特别是到这个时期末，经济快速增长的北美对各种各样工业制成品的需要对英格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700年前后，英格兰的对外贸易，数百年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纺织品出口的单方面依赖，使其出口建立在对殖民地提供更广泛的商品和再出口殖民地商品的基础上。

我们现在来看看跨大西洋的人口的出口。劳动力的运输很快就成为跨大西洋贸易极其明显的特征。葡萄牙（在其成为殖民强国之前就拥有奴隶）首先开始了这种贸易。黑奴随着甘蔗种植园的扩展而遍布葡萄牙、大西洋各

岛屿、巴西及整个新大陆。从非洲到巴西和西印度的奴隶贸易，成为大西洋贸易体系的一个基石，它在17世纪和18世纪达到高峰。这种贸易体系是由各种各样的三角贸易组成的，诸如欧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北美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或者不包含奴隶交易的北欧、北美和南欧之间的三角贸易。在最后一个三角贸易中，北欧的工业制成品换成北美的鱼、肉、木材和谷物，接着又换成南欧的葡萄酒和水果。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向新大陆提供黑奴劳动力的贸易，在国际上竞争极其激【212】烈。这就是17世纪8个欧洲国家参与瓜分西非领土竞争的主要原因。争夺向西班牙殖民地提供劳动力的**垄断地位**，成为斗争的焦点。葡萄牙和法国签订了乌得勒支协定（Treaty of Utrecht）。英国不断地输出超过协定允许数量的**其他**商品，由此扩大了它在西班牙属美洲的影响，以至于与其说是西班牙的贸易殖民地，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贸易殖民地。

大西洋贸易和太平洋贸易之间有多方面的联系。世界各地都知道金属的使用，金属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有些金属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流通的，例如从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由此融入亚洲的金融流通。我们很容易奢谈1500～1750年间的世界经济和全球商业循环。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欧洲内外经济生活脉搏的颤动中，我们逐渐能发现经济生活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在长期内则重复出现。大量的美洲金银经由欧洲进一步到达亚洲，随之而来的是价格革命。阿兹亚·海森（Aziza Hasan）博士是一个印度历史学家，他最近举出与此有关的饶有趣味的统计例证。通过对保存下来的钱币按年代进行排列，他构造了莫卧尔王朝（Moghul）时期印度北部的货币—产量曲线，以及流通中货币数量曲线。将其与流入西班牙的美洲财富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这确切无疑地表明流入欧洲的白银，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期流通到了印度。海森博士同时证实印度的一部分价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洲白银的流入，虽然他所根据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

有许多商品是“世界旅行家”，它们的销售遍布全世界。名叫“**几呢**”的印度纺织品就是其中之一，其名称来源于非洲的几内亚，在那里这种布被用做黑奴的缠腰带。玛瑙贝在非洲奴隶贸易中很受欢迎，这是一种来自马尔代夫附近印度洋深海的蚌类贝壳，它作为货币在非洲的一些地方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玛瑙贝的主要市场，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其主要的供应者，西印度公司和其他从事非洲和美洲贸易的公司是其主要的需求者。当时并非没有把东【213】印度贸易和西印度贸易融合在一起的计划。梦想规避大公司垄断的私人闯入

者特别为这种方案所吸引。但是，大多数方案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个别得以实行的方案都是好景不长。

来自海外的商品和欧洲商品，在欧洲的主要市场上相互竞争。诸如来自爪哇（Java）、孟加拉（Bengal）、马德拉（Madeira）、圣多美岛（Sao Tomé）、巴西、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地区的糖；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亚洲的香料和美洲的香料；莫卡（Mocca）、爪哇和西印度群岛的咖啡。我们选择的一些地点的商业和价格，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波动。良好的观测来源于英吉利海峡来往于波罗的海的航运、经由塞维利亚往来与新大陆的交易、里斯本或菲律宾马尼拉的统计数据，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国际贸易情况。然而，国际市场最好的晴雨表就是阿姆斯特丹商品交易市场的价格。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市场，殖民地商品在这里的历年价格，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了解全球贸易循环的最好资料。欧洲市场的价格趋势确实表现出欧洲市场交易的规律性，即沿着一个构造精细的贸易路线网络前进，然后形成一个全欧洲的再分配体系。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汉堡是这个体系的一些最重要的中心。萌芽中的国际分工开始形成，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于1691年写的那样，“整个世界都参与贸易，就像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中国家就像个人一样行事”。

波罗的海被称为“小地中海”，其中一个地区的地理构成部分确实使人想起另一个地区。然而，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自给程度没有地中海地区高。我们将其放入范围更广的北欧，包括从尼德兰的北部沿海经由北海（North Sea）、卡特加特（Cattegat）海峡和狭长地带到达波罗的海，就此可以把这个地区的贸易分为两类：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所运输的都是日用的重大笨粗的商品。海上贸易商品包括谷物、食盐和咸鱼、羊毛织品和皮毛、木材和其他林业产品，诸如碳酸钾、树脂和柏油、亚麻和大麻，以及铁和铜。食盐和布匹以及16世纪中期以后的鲱鱼的贸易流向是自西向东，其他商品是自东向西流动。陆上贸易虽然仅包括一种商品，但它却占尤其大的运输空间。这就是公牛贸易，它的流向是从北向南。

波罗的海地区是北欧的粮仓，它在16世纪初也是另外一种重要食物——咸鲱鱼——的北方主产区。主要的渔场是瑞典南端的斯柯瑙（Skanör）渔场和吕根（Rügen）岛附近的渔场。腌鱼所用的盐一是来自德国北部的吕讷堡（Lüneburg），这里的盐由汉堡和吕贝克（Lübeck）供应；二是来自法国的比斯开湾沿岸。16世纪前半期鳕渔业衰落了，重要原因就是鳕鱼从波 【214】

罗的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鲱渔业在北海多格滩（Dogger）近岸和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有两个港口城市同盟在竞争北欧的海上贸易，它们是德国的汉萨同盟和尼德兰城市同盟。汉萨同盟的商人在中世纪就在波罗的海贸易、对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的贸易以及北海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但是贸易路线和贸易关系的变化逐渐变得有利于荷兰而不利于德国。荷兰人领导着从北海绕过斯考（Skaw）经由丹麦海峡到达波罗的海的海上航线，很快这条路线上的贸易就超过了从汉堡到吕贝克的陆上贸易路线。丹麦海峡通行费记录表明，在15世纪90年代，荷兰商船就已经成为过往船只的大部分，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荷兰商船的比例还在稳步地增加。然而，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吕贝克都是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皮埃尔·让南在分析1580年左右的航运量时证明了这个结论。阿姆斯特丹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尤其表现在谷物贸易上，它实际上成为整个欧洲主要的谷物市场。谷物贸易和渔业，是17世纪辉煌的荷兰商业帝国的核心。无论是运输巨大笨粗的货物还是普通的货物，荷兰商船都是无可匹敌的。到17世纪末，法国和北欧航运的全部以及英国和北欧航运的大部分，都掌握在荷兰人手中。直到18世纪，英国人才有能力在北欧贸易中对荷兰人形成严重挑战。

荷兰不是汉萨同盟惟一的竞争者。横跨大陆的贸易同时也减少了汉萨同盟城市在西部的活动，安特卫普取代布鲁日成为主要产品的市场；同时，富格尔将铜从中欧经由波兰和波罗的海运往安特卫普，这相应地减少了汉萨同盟在东部的商业活动。北欧国家也积极地同汉萨同盟展开贸易竞争。英国人也是如此。最后，新的贸易路线引起了汉萨同盟内部关系的紧张。同盟内的但泽商人和其他汉萨同盟港口城市的商人发现，同荷兰人合作对他们更有利。以吕贝克为首的温迪城市发现它们被孤立了。而汉堡按照自己的方式独自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其标志之一就是英国商业冒险协会（English Merchant Adventurers），将其德国总部于1611年设在汉堡，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因此，那种认为汉萨城市衰落的想法是不完全切合实际的。汉萨城市因荷兰的崛起只是失去了西部的地盘，而同盟中的一些城市却能适应变化，从北欧新的贸易方式中得利。

[215]

北欧的陆上肉牛贸易从日德兰半岛（Jutland）、丹麦群岛和斯堪尼亚经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Schleswig Holstein）大公国到易北河（Elbe）流域。那里是主要的肉牛市场，肉牛从那里再运往德国北部的各个城市（特别是吕贝克和汉堡）、远至科隆的莱茵诸城市以及荷兰各城市（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和谷物贸易一样，肉牛贸易数量可以从幸存的海关账簿中得

到，而肉牛贸易的背景同样在于西欧，特别是尼德兰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的消费需求。尼德兰地区的人口在1500～1650年间翻了一番，同期的城市人口也大体上翻了一番，而当时荷兰各省的城市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除了意大利北部以外，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就是欧洲的这个西北角。这些城市的食物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波兰的谷物和丹麦的牛。这种贸易关系对有关国家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社会上来说，都具有极端重要性。

17世纪后半期，西欧人口增长停滞，但农产品产量增加，其中英格兰成为谷物净出口国，这一切导致谷物需求和肉牛需求的减少。而同期南欧的谷物需求也在减少。航运业，特别是运粮的减少，对荷兰这个商业共和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他行业的进步没有能够抵消航运业的衰败。直到1730年，荷兰一直在国际贸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荷兰的影响逐渐衰退。荷兰的商业资本进入政府公债和其他风险较低的有价证券领域。欧洲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转移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对面。

我们上面提到，将贸易明确地分为陆上贸易部分和海上贸易部分是很抽象的。在现实世界中，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是混合在一起的。江河作为海港的补给线是特别重要的。此外，一些欧洲的生产区在地理上如此分布，以至于其生产的产品要在不同的市场上销售，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销售路线都取得【216】同样好的成绩。我们这里的例子是欧洲东部（俄国）生产区，它的产品（亚麻、大麻、牛脂、蜡、兽皮和皮毛）远销海外，经由波罗的海港口到达西欧，16世纪中期以后经由北冰洋的阿肯吉尔（Archangel）和陆路到达中欧、波斯和西伯利亚。密斯劳·豪克（Mirslaw Hoch）最近强调，在一系列的有关贸易的地区的研究完成之前，贸易区域的概念都将是变动不定的。因此，在欧洲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仍将中欧再细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部分。

尽管有以上的限制，如果我们试图从东向西观察这个欧洲主要的大陆贸易板块的话，我们就可能同意凯伦本兹（Kellenbenz）教授的做法，指出天然的南北路线。这些线将中欧分开来，而且宽泛地讲，这些分界线和现代早期欧洲的政治格局相符合。第一条线由伏尔加河（Volga）、顿河（Don）、杜维纳河（Dvina）组成；第二条由第聂伯河（Dnieper）、布格河（Bug）和德涅斯特河（Dniester）组成；第三条由多瑙河（Duna）、梅姆尔河（Memel）和维斯瓦河（Vistula）组成；第四条由奥德河（Oder）、维西河（Weser）和莱茵河（Rhine）组成。只有多瑙河是东西流向。许多贸易路线将这些不同的部分连接起来。例如经过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Pskov）的路线，从波罗茨（Plotzk）到维尔纽斯（Vilnius）和考那斯

(Kaunas) 的南方路线，以及经过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和基辅 (Kiev) 的路线。西部的路线与波兰部分和塞本伯格 (Siebengebirge) 相连接，而波兰又和摩尔达维亚 (Moldavia) 和瓦拉几亚 (Wallachia) 连接在一起。诸如华沙 (Warsaw)、克拉考 (Crakow)、里沃夫 (Lemberg) 和开姆尼斯 (Chemnitz) 这样的商业中心就坐落在这条线上。此外，从波兰向西有一个成网络状的贸易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著名的大动脉 (*Hohe Landstrasse*)，它是从西里西亚 (Silesia) 和萨克森 (Saxony) 出发到图林根，经由莱比锡 (Leipzig) 和爱尔福特 (Erfurt)，最终到达法兰克福 (Frankfurt)。西里西亚弗罗茨瓦夫 (Wroclaw) 的布雷斯劳 (Breslau) 是两个呈对角的贸易路线的节点：一条是古老的伯尔尼斯泰因 (*Bernsteinstrasse*) 路线，它由南向北延伸到波罗的海；另一条是从佛兰德出发，经由里格尼兹 (Liegnitz)、布雷斯劳、克拉考、里沃夫、基辅，最后到黑海。中欧贸易区的德国部分被一个陆路和水路组成的网络所渗透，多瑙河和莱茵河是最重要的贸易生命线。富格尔家族的主要据点奥格斯堡 (Augsburg)、雷根斯堡 (Regensburg) 及人口最多的纽伦堡 (Nuremberg)，将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大陆主要地区的过境贸易组织起来。1500 年，所谓的“大雷根斯堡贸易公司”在维也纳、布达佩斯、波恩、日内瓦、里昂、阿维尼翁 (Avignon)、马赛、米兰、热那亚、巴塞罗那、巴伦西亚 (Valencia)、安特卫普、科隆和纽伦堡都开设了办事处。[217] 中欧各城市本身就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消费单位和生产单位，例如，它们从波兰和匈牙利得到巨大的肉牛和其他食品供应。而在生产方面，金属和金属产品为中欧巨大的贸易规模提供了基础。

15 世纪后半期，以中欧的银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扩张就已经开始。这种扩张从德国南部开始，向荷兰特别是布拉班特传播，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虽然这时铜已经代替银成为经济扩张的推动力。铜的贸易越来越集中在安特卫普，集中的程度有赖于旧大陆和新大陆的铜贸易和银贸易，以及经由葡萄牙的香料贸易的结合。许多其他商品，例如布料、亚麻、帆布、蛇麻草和谷物也进入国际贸易中。陆上贸易也在扩张，荷兰和意大利北部成为两个终端。16 世纪中期前后，在这个贸易中轴线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公司及其经营活动。就像范德尔·维教授描述和分析的那样，跨大陆贸易和海上贸易的结合是 16 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它以安特卫普为中心。南德商人协会、葡萄牙王国代理人、英国商会、意大利和汉萨同盟的商人以及荷兰的商人，都是那个短暂而狂热的时代的创业者。这个时代很快就终结于 1585 年帕尔马 (Parma) 对这个城市的征服，以及荷兰人对斯凯尔特河

(Scheldt）的封锁。从此，经济扩张的方式改变了，跨大陆贸易让位与海上贸易；17世纪中期的30年，布拉班特集市的贸易衰落了；德国经济被宗教战争破坏；荷兰和英国对地中海贸易的侵入使得意大利北部一蹶不振。

东南欧部分也许更能比其他部分说明地区划分的困难，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大小和多样性，部分是因为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政治疆界把地理分界割裂了。这绝不是说国界割断了贸易路线，而是说它确实削弱了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导致了贸易路线的变更。东南欧的贸易循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封闭的，因此我们要回到地中海地区，因为东南欧地区属于地中海区域。

意大利各城市，特别是拉古萨（Ragusa）有助于东南欧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商业交往。我们发现拉古萨的商人在16世纪分布在东南欧的许多地方，【218】例如索非亚（Sofia）、瓦尔纳（Varna）、贝尔格莱德（Belgrade）、赫曼斯泰德［Hermannstadt，锡比乌（Sibiu）］、阿尔巴一朱莉娅（Alba Julia）、特梅斯瓦尔（Temesvar）和奥芬（Ofen）、萨洛尼卡（Salonika）和伊斯坦布尔(Istanbul)。拉古萨在地中海海战期间的中立状态，有助于它的这种地位的形成。英国的布料经由拉古萨进口，主要进入塞尔维亚（Serbia）和巴尔干(Bulgaria）地区。经由拉古萨进口的还有丝绸、香料、糖和橄榄油。土耳其地区出口羊毛、兽皮和牛、蜡和蜂蜜，以及大量的谷物（主要是马其顿、希腊和色雷斯)。16世纪末期以后，英国的利凡特公司成为对东南欧，特别是对罗马尼亚公国的摩尔达维亚和瓦伦西亚的海上贸易的代理人。这个地区在奥斯曼政治体系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半自治的。这个结论可参考保罗·塞努弗迪（Paul Cernovodeanu）的研究成果。横跨江河的贸易路线和沿着江河的贸易路线交叉往来。我们可以区分出两条主要的贸易路线，一条是经由贝尔格莱德的古老的色雷斯路线，另一条是经由瓦伦西亚的路线，锡比乌和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是其重要的商业中心。

布加勒斯特也是东南欧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由此向北经由里沃夫、杰罗斯劳（Jaroslaw）和克拉考，或者经由开姆尼斯一卢布林（Chemnitz-Lublin)，沿着伏尔塔瓦河（Moldau）与波兰部分相连。希腊人、意大利人和犹太商人经常通过这条路线。从克拉考、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本伯格、斯洛伐克和上匈牙利到波兰的贸易联系也很活跃。诺伊索尔的大铜矿出产的铜，就是经由这条路线到达波罗的海的。匈牙利地区的牛大量地出口到意大利北部和中欧，然而，土耳其人1568年实施的禁运，中断了这种出口贸易。其他诸多产品——英国的布料，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的纺织品、食盐、鱼和铅以相反的方向流动。哈布斯堡

多瑙河地区是明显的过境贸易区，各种各样的商人在那里经营贸易，其中有许多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维也纳向东南欧欧洲王室和富有的中产阶级提供奢侈品而享有特殊的地位，宫廷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

1. 谷物贸易

这个时期谷物在欧洲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性怎么夸大也不为过。谷物是维持人们生活标准的基本必需品，小麦和黑麦构成了日常生活面包的主要成分。在【219】北欧，大麦是啤酒酿造中的基本成分；而啤酒是北欧日常饮食中和面包一样重要的东西；在南欧，葡萄酒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最后，燕麦也是人畜的一种食物。当马还是必不可少的耕畜和交通工具时，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燕麦供应和其他谷类谷物一样具有至关重要性。无论在何处，谷物都从生产者手中流通到消费者手中，无论是长途还是短途，哪怕是仅仅从路边卸到面粉厂然后再运出。在本地，谷物用马车和麻袋装载着，顺着海岸或由单桅船和驳船沿着江河，从四面八方的乡下运到城市。谷物的同质性使得它非常适于运输，但是它很重，所以较长路途的谷场运输最好是经由水路。确实，我们也遇到一些个别的谷物陆上长途贸易的例子。例如阿基里斯（Achilles）博士在研究 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的谷物价格和谷物贸易时，发现奥格斯堡和伍茨堡（Würzburg）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贸易量。然而，这两个城市对运输来说距离实在是太远了，以至于支付不起运费。也许这两地之间的贸易是以分阶段的物物交换进行的，由此随后的价格比起直接贸易来得要低。无论对谷物的需求是多么的强烈，但是这种商品不能吸收过高的运输费用，这是一个通则。因此，谷物在陆上的流通就限制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马克·奥托伯恩（Marc Ottoborn），一位威尼斯国务委员，通过计算谷物的价格和运输的成本，为我们提供了陆路运输对谷物价格影响的一个很好例证。1590 ~ 1591 年在波兰，为了保证谷物的供应，他计算出在克拉科夫（Cracow）购买的谷物，当经陆路运到威尼斯后，它的价格应该是原来的4 倍。只有在食品严重短缺并且资金充裕时，经过陆路运输谷物才是合情合理的。

布罗代尔教授在其经典著作《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贸易》一书中指出，研究谷物贸易就相当于研究地中海国家的经济弱点，也就是研究谷物短缺。谷物缺乏和结构性的经济变化有关。葡萄和橄榄的种植、手工艺品和制成品的出现与流行是以谷物减产为代价的。人口增长也是一个因素，一些地方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现有资源的承受力就会导致短缺。谷物贸易易于

剧烈波动，谷物的价格波动幅度远较其他商品大。谷物贸易这种变化无常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收成的上下波动，它可能将谷物出口地区变为谷物进口地区；另一方面是由于投机和政府对谷物贸易的随意管制和苛捐杂税。尽管〔220〕谷物不断地从丰裕的地方流向匮乏的地区，但从来没有出现有效的调节措施，以避免饥荒和谷物高价的出现。

16 世纪南欧的谷物供应状况恶化，尤其是在城市。城市是谷物贸易的最大顾客。情况首先发生在西边的葡萄牙，随后西班牙受到影响，接着就是意大利。作为中世纪以来的谷物出口国（其谷物最远到达英格兰），葡萄牙将其农业重点由谷物调整为橄榄和葡萄，通过扩大其海外地区即摩洛哥、马德拉和亚述尔群岛（Azores）的谷物种植来弥补上述政策造成的谷物减产。然而，这些新的谷物产区并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因此，葡萄牙逐渐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地区的谷物供应，它们是安大路西亚、卡斯蒂利亚和西西里岛，以及北部的荷兰。荷兰和布鲁日，以及随后和安特卫普建立起了良好的谷物贸易。这一切都发生在 16 世纪前半期。

16 世纪后半期，西班牙也发生了谷物供应危机，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尤其严重。以前的谷物出口地区安大路西亚，现在不得不进口外国的谷物以满足它自身的消费需求。16 世纪中期前后，意大利也经受了一场谷物危机（其中原因不得而知），这使得其不得不从土耳其市场运输谷物，从利凡特的主要农产品市场向西运送大量的谷物。虽然土耳其在 1555 年宣布出口禁运，但直到 60 年代中期禁令才得以真正实施。这时，土耳其的谷物输出由于一系列的天灾，特别是谷物歉收和瘟疫的爆发而停止了。而此时，意大利的短缺状况有所缓解。像罗马、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意大利其他地区，即阿普利亚区和西西里地区的援助而解决了它们的燃眉之急，这些地区恢复了它们的谷物出口。对威尼斯来讲，从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进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意大利的这种市场状况一直持续到 1590 年。随后，情况有所变化。始于 1586 年的一系列歉收发挥了破坏性的作用。到 1590 和 1591 年，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暴雨盛行，意大利北部面临着食品短缺。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和北方的但泽建立了联系。威尼斯也是如此，第一批大的运粮船队于 1590 ~ 1593 年来到威尼斯。距离直布罗陀海峡一星期航程的利沃纳，在随后的年份里被用来接受大量的到运货物。整队整队的小舰队满载谷物从但泽、荷兰和英格兰来到这里。

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当然，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存在着从西北欧到意大利各城市的谷物运输，例如热那亚是从 15 世纪中期开始的，威尼斯从 1527〔221〕

年开始从荷兰输入，罗马从1530年开始，等等。但是，只是在1586年及其以后的一连串歉收之后，意大利各城市才大量地、经常地从外部输入谷物。我们很难确认谷物危机在意大利持续了多长时间。从1608年开始，从北方的谷物输入量确实减少了。西西里似乎在17世纪初遭受了短暂的谷物短缺，它还没有开始扮演意大利最重要粮仓的角色。北方的谷物在这个世纪的头20年或者30年可能还在流向意大利，但是其他商品代替了谷物作为商业交流基础的地位。主要就是英国和荷兰新的纺织品，这种商品在17世纪30年代的利凡特市场上超过了意大利的布料。

在欧洲的西北部，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荷兰，也存在着谷物短缺，特别是在城市，这至少部分地使得货运进行并且决定其规律。在15世纪末的北欧贸易区，许多和汉萨同盟城市地位削弱有关的重要变化悄悄地进行着。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泽兰（Zeeland）商人和布拉班特商人正在进入东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吕贝克对经由吕贝克—汉堡的陆上东西向贸易路线的垄断，被从新的海港出发的海上航线打破。这条航线向北绕过斯考，经过海峡最后到波罗的海。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是两个从谷物贸易中受益极大的荷兰城市。1501年，阿姆斯特丹从菲利浦获得特许状，可以从事谷物的自由买卖。安特卫普通过1521年的法令获得相同的垄断权。然而，并不仅仅是来自东部地区的货物对于谷物的过境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贸易是16世纪初期以后在许多荷兰城市建立起来的），而且来自西部地区的谷物对这种贸易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包括伯斯（Beauce）、瓦洛斯（Valois）、皮卡（Picardy）、阿图瓦（Artois）以及法属佛兰德。安特卫普市场也供应来自海斯彭（Haspengouw）的谷物。海斯彭是比利时东中部的广大的农业地区，它包括今天的布拉班特、林堡（Limburg）、里格（Liège）和纳慕尔（Namur）省所包括的地区。

16世纪的头20年，安特卫普开始感受到来自附近的根特（Ghent）的竞争。根特很久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谷物产区，但它设法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汉萨同盟的资料和富格尔家族的商业账簿，证实了在16世纪的头25年但泽和斯德丁（Stettin）的海上联系，以及但泽和安特卫普的海上联系。汉萨同盟、安特卫普和瓦尔赫伦（Walcheren）的商人都积极地参与了这种贸易。[222] 有记录的证据同时表明，在这几十年中，安特卫普也向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出口了谷物。在16世纪30年代初期，有关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哪一个是波罗的海贸易中最受欢迎的谷物市场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然而，在这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市场获得了整个荷兰地区的支配权。我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17 世纪、18 世纪荷兰首都著名的谷物交易市场，决定着欧洲的谷物价格。

波罗的海航运和贸易，特别是谷物贸易，成为荷兰北部经济的生命线。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涨落起伏，决定着荷兰社会经济生活的节奏。主要的轴心位于阿姆斯特丹和但泽之间。前面提到的阿基里斯博士研究的假设两个地区谷物价格曲线的平行，可以证实贸易对价格形成的影响，从而可以证实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商业联系。阿基里斯博士进一步推断出阿姆斯特丹和但泽的相关系数，是所有分析过的 16 世纪、17 世纪海陆联系中最明确的。研究同时表明，这两个城市的海上路线是其陆上最长路线的 10 倍或者 12 倍，为此，发现了巴黎和安格尔（Angers）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就是说，利用海运低廉运价的谷物贸易，比相应的陆上谷物贸易对价格的影响更大。阿贝尔和阿基里斯，在对 1551 ~ 1600 年欧洲 14 个城市和省区的谷物价格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欧洲各地的价格，据此描绘了一张引人注目的东西走向的贸易图。它表明阿姆斯特丹和但泽之间的价格差距是 53%，这就是两地贸易的推动力（*raison d' être*），这预示着运输上的障碍可以克服，而且相关的成本可以正好耗尽价格差，而事实确实就是这样的。海峡通行费征收记录，提供了但泽和阿姆斯特丹之间谷物贸易频率和密度的最好数量证明[①]。值得指出的是，但泽和其他重要的贸易中心，如安特卫普、米德堡（Middelburg）、鲁昂和塞维利亚一样，出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阿姆斯特丹交易价格官方记录中。

荷兰的需求无疑和人口增长以及人口的城乡分布有关。据斯利彻·冯·巴斯教授和他的同事估计，荷兰的人口在 1500 ~ 1650 年间翻了一番，【223】其中相当比例的增长发生在城市居民中。这里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根据摩尔斯神父（Father Mols）教授的研究，城市人口占了布拉班特总人口的 35%，黑纳高（Hennegau）的 29%，佛兰德的 40% ~ 45%，荷兰省的 52% 以上。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它不仅显著地包括纺织品的生产，而且在荷兰也包括油和肥皂的生产。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超过了当地食品市场所能提供的。在随后连续的几年里，伴随着这个地区的高昂物价和食品匮乏证实了这一点。

各种因素的综合使得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在谷物贸易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重要位置。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政治因素。1451 ~ 1456 年期间，汉

---

① 见原文第 226 页以后。

萨同盟对佛兰德地区实施的联合抵制，使得荷兰各城市普遍受益，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454～1466年期间，普鲁士和波兰的战争为但泽和阿姆斯特丹提供了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它们在汉萨同盟，特别是在它的温迪分部的授权下和海峡外建立了贸易联系。同样，1469～1474年间，汉萨同盟城市和英格兰之间的斗争，导致了一度充满活力的英格兰—波罗的海贸易几乎停顿，这一点也对荷兰商人有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击退汉萨同盟的努力也对荷兰产生了同样有利的机会，而德国南部对汉萨同盟的攻势也导致了造成了类似的影响。

阿姆斯特丹和但泽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但泽，隐藏在赫尔（Hel）半岛后面，和阿姆斯特丹一样，受到外海的很好的保护。它充当着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是其早期历史的显著特征。从纯商业的角度看，这两个城市的贸易是相互补充的，虽然这并未排除它们之间关系紧张的时期，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随着荷兰通向波罗的海贸易的扩张，但泽向西的积极的贸易活动逐渐缩小。像阿姆斯特丹一样，但泽，尤其是它邻近的城市诸如赞丹（Zaandam），拥有规模可观的造船业。但是，除了与造船和贸易有直接关系的行业之外，但泽缺乏其他行业。

全面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波兰大规模的谷物出口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受益者主要是但泽和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农民和各个地方上的城市。但荷兰和阿姆斯特丹的情况与但泽有所不同，谷物贸易在这两个地方的[224]影响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逐渐传播开来。3/4的波罗的海谷物用于再出口，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各种各样的生意。由此直接引起了大规模的造船业和大量的城市建设活动，其中3/4的仓库都投入到谷物储藏方面。许多人找到了看护谷物的工作。谷物需要定期的翻扬，以避免发芽和自燃的发生。同时，也产生了装卸谷物的工作以及缝制麻袋的工作。一系列次要的行业都直接和谷物贸易有关，例如供应石板、瓷砖和砖等压舱物的这个行业。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业。

16世纪、17世纪经由维斯瓦河的水上贸易量，很可能大大超过了整个波兰的陆上对外贸易量。水上交通的障碍相对要少一些，因而就形成了以维斯瓦河为主干路线的完整的水上交通网络。这就意味着在地理上属于其他地区的谷物和木材都要经由维斯瓦河运输，因而，维斯瓦河就经由纳雷夫河（Narew），在奥古斯都（Augustow）和沿着涅曼河（Niemen）的广大的森林地区建立了联系。同样地，与经由布格河和普里皮亚特河（Pripet）流域的森林建立了联系。瓦尔塔河（Warta）流域的谷物可以经由奈尔河（Ner）

和布尤拉河（Bzura）到达维斯瓦河，而且在17世纪，在莱斯劳的弗沃茨瓦韦克（Wloclawek），维斯瓦河经由其支流跨过高波勒湖（Goplo）和柯尤劳（Kujaw）肥沃的黑土地。从弗沃茨瓦韦克、韦森堡（Weissenberg）和其他地区残存的海关记录来看，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们从各地吸引了多少谷物。莱斯劳（Leslau）的记录表明，经过那里海关的谷物大多来自布列斯特（Brest）、拉瓦（Rawa）、卢布林、三德默兹（Sandomierz）和贝尔兹（Belz）。而立陶宛（Lithuania）、鲁塞尼亚（Ruthenia）和克拉科夫（Cracow）位于人口外迁区的边缘。科蒙顿（Commendon）大主教于1563～1564年间访问了波兰，当行进在维斯瓦河时，他提到当时的波多利亚（Podolia）人口稀少，认为其原因在于当地的居民不能将他们的谷物运到维斯瓦河。大多数出口的谷物都来源于紧邻维斯瓦河下游，即莱斯劳河北部的地区。维斯瓦河最近的竞争对手——奥得河，有助于经由维斯瓦河的贸易和经由但泽的出口，在16世纪、17世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562年，斯德丁（Stettin）结束了它和法兰克福关于从波兰沿着奥得河的支流——瓦尔塔河（Warta）贸易的争论。1573年以后，奥得河的关闭变为永久性的，只是到了17世纪末，奥得河经常性的航行才得以恢复。 [225]

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资料，据此可以对波罗的海和西欧间的谷物贸易进行量化的研究。我们有从东向西许多港口的海关记录可资利用，其中一些记录可以回溯到16世纪。荷兰当时的公证材料，就提供了许多和特许船只从事波罗的海贸易有关的有用信息。一些商人的贸易记录有幸保存下来，其中包括船主详细的账目记录。例如现存的代夫特（Delft）商人冯·阿佳辰（van Adrichem）的记录表明，他的经营活动在16世纪后半期减少了。两个阿姆斯特丹商人西蒙·雷耶兹（Symon Reyersz）和雷尔·德克茨（Reyer Dircsz），他们对但泽贸易的记录包括了1485～1488年。这些原始资料仅仅勾勒了极为广泛的波罗的海贸易的一些小片断，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极为宏大的海峡的记录，它记录了三百多年期间由此经过的每一条船的详尽的信息。许多学者通过将其于其他原始资料共有的标准相对质，企图由此决定这些国际贸易史中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的价值。哈恩豪瑟（Huhnhäuser）教授将海峡的通行记录与罗斯托克（Rostock）的通行记录进行了比较，S. 冯·布雷克尔（S. van Brakel）教授提到了其中的荷兰船队和船主的注册地，阿斯特丽德·弗瑞斯（Astrid Friis）教授将其与英国各港口的记录比较，阿克塞尔·E·克里斯邓森（Aksel E. Christensen）教授在“1600年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这样一个题目下对此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在

这个研究中，他使得三种主要的原始资料相互关联，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估。这三种资料是：荷兰公证记录档案中的特许状，克雷斯·阿佳恩斯·冯·阿佳辰（Claes Adriaensz van Adrichem），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夫特商人的档案以及海峡的通行费记录。这些讨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关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峡通行记录的编辑，由尼纳·邦和纳德·考斯特出版的编辑版本涵盖了1497～1783年，以1660年为分界线。其中的两卷是货运清单，另外五卷是商品运输记录。

我们在此理应不能提出批评。尼纳·邦是抱着如下的信念出版这些记录的，她认为这些通行记录准确地反映了沿着这条欧洲重要的贸易路线上的贸易发展。她认为仅仅通过读取表格上所记录的数字，就可以获得下历史结论所需要的令人信服的主要论据。但是，随后的批评揭示了尼纳·邦所编辑的记录中的许多缺陷，同时表明现在的这个版本应用有限。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有理由抛弃海峡的通行记录。依其连续性和适用范围，虽然这些原始资料无法使用，但它们仍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仍是研究商业史的最好的原始资料。【226】确实需要对这些原始资料进行处理以供多方面的研究使用。现代的数据处理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将其置于新基础上的机会，并已经开始对通行记录中未出版的部分进行处理。当然，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所能使用的资料还只能是尼纳·邦和纳德·考斯特所编辑的版本。

报表显示，在1497～1660年期间，进出海峡的商品多达400 000项以上，而编辑版本所包含的第二个时期，即1661～1783年的商品多达520 000项以上。第一个时期60%左右的商品项来自荷兰的7个联合省，而第二个时期，荷兰的份额仅仅占了35.5%。关于谷物，第一个时期黑麦和小麦的总和为460万拉斯特，其中黑麦占400万拉斯特，小麦占60万拉斯特。第二个时期及以后更长的时间里，通过海峡的谷物是470万拉斯特，其中黑麦为330万拉斯特，小麦为140万拉斯特。黑麦的运输从绝对量和相对量来看，都下降了，而小麦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当考虑黑麦和小麦的相对比率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由于黑麦的关税较低，因而谷物贸易商愿意在报关时宣称其货物为黑麦。第一个时期，荷兰运输了76.5%的黑麦和77.5%的小麦，而在第二个时期，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1%和70%。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直到1720年，荷兰人一直设法维持其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中的地位。

海峡的通行记录进一步显示了但泽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出口港口的地位。第一个时期70%的黑麦和63.5%的小麦都来自但泽，紧随其后的是黑麦供应地坎尼斯堡（Königsberg）、里加（Riga）和利福尼亚—爱沙尼亚（Livo-

nia-Esthonia）以及小麦供应地斯德丁。到了第二个时期，但泽作为黑麦供应者的地位有所下降，其份额下降到42.2%，但是它仍旧保持甚至提升了其作为小麦供应者的地位，其份额达70%。坎尼斯堡的黑麦和小麦的份额都有所提高。18世纪似乎发生了有利于东波罗的海地区的变化。

只是在1669年以后，海峡的通行记录才包括有关谷物的目的地这样的信息。然而，我们可以间接地推知，大部分谷物在1669年之前和之后都进入了荷兰。克里斯邓森教授用他的研究证实了，波罗的海的谷物完全主导了阿姆斯特丹市场，同时也证明了荷兰人有关谷物的东西流动只是绕过了阿姆斯特丹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确实存在由德国北部的汉萨城市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直接的谷物流动，也存在转运贸易，例如往返葡萄牙和波罗的海的贸易。但是我们经过对通过海峡的谷物数量和阿姆斯特丹进出口的分析【227】得知，转运贸易仅占贸易总量的一小部分。所谓的抱怨仅仅是荷兰商人潜在担心的夸张表现，阿姆斯特丹作为欧洲谷物贸易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波罗的海谷物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重要性。谷物交易的行情表中，波罗的海的黑麦和小麦占据了支配地位。

阿克塞尔·E·克里斯邓森，对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末经过海峡的东西谷物运输进行的分析，揭示了这种贸易的数量是大体稳定的。从长期来看，荷兰—波罗的海贸易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在较短的时期内，存在着激烈的年度波动。通常这种波动，是东部和西部谷物收成各自的上下波动的交互作用造成的直接结果，但在某些年份，贸易量的波动起因于战争和其他政治因素。因此，但泽的谷物出口量特别高的年份都是西欧歉收的年份，例如1562年、1565年、1586年以及整个90年代，当时地中海地区的谷物短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557年前后，谷物贸易量达到了低谷，当时波兰国王围攻但泽。17世纪20年代贸易量的急剧下降和瑞典—波兰战争，以及瑞典在1626～1629年对但泽的封锁有关。17世纪20年代的贸易剧减，是谷物危机和但泽危机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危机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4年（1618～1621年）是谷物大量出口的时期。1622～1624年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歉收，引起了谷物出口量的第一次显著下降。随后的1625～1626年情况有所改善，但紧随其后的1627～1630年谷物出口量有了进一步的下降。由于瑞典人对维斯瓦河河口的封锁，这个时期的谷物出口几乎全面停顿。

众所周知，17世纪20年代，瑞典将波罗的海越来越多的地区及其出产谷物的腹地置于其统治之下。但泽本身并没有被征服，但当古斯塔夫斯·阿

道弗斯挥师西普鲁士之后，但泽的关税征收，从而其贸易就处于瑞典人的控制之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相当部分处于瑞典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者处于瑞典的出口许可管制之下。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建立瑞典的国家垄断的想法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想法最早由阿克塞尔·奥克森谢东纳（Axel Oxenstierna）在1623年提出。任何诸如此类的贸易垄断都应该包括经由阿肯吉尔出口的俄国谷物，这是一条新近出现的贸易路线。阿特曼（Attman）教授指出俄国的各大贸易区是紧密相连的。虽然俄国本身在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但它的谷物通常都是经由里加和坎尼斯堡等进入波罗的海市场的。从【228】地理上讲，上述城市的供应区沿着江河直达俄国的许多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向阿肯吉尔供应谷物。因此，贸易很容易从一个地区转向另一个地区。对经过海峡的谷物运输进行的分析令人惊讶地发现，当经由坎尼斯堡和白令海的谷物数量增加时，来自里加和坎尼斯堡的谷物数量就减少，反之则反。因此，瑞典垄断谷物市场的计划就必须同时考虑北方新的贸易路线。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于1627年向沙皇试探购买来自俄国的谷物的可能性，后来确实得到了限量购买的许可。1629年，瑞典和俄国重开谈判。坎尼斯堡和但泽也明显地对瑞典的计划感兴趣，它们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限制供应量从而控制阿姆斯特丹谷物价格水平。虽然实施了这些限制措施，1630年之后，荷兰各大城市的谷物价格还是开始下跌。

这个事件引起了一个问题：来自东部的输出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也就是说，东部的谷物供给和西部的谷物需求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是波兰的谷物收成情况还是荷兰和西欧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价格？阿基里斯教授进行的价格分析使他得出结论：但泽腹地的谷物产量并不总是决定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如果西班牙和法国出现谷物歉收，那么粮价上涨将从西向东蔓延开来。荷兰首先感受到需求增加，随后向东传播。供给和需求在阿姆斯特丹谷物交易市场上相遇。

我们必须指出，波罗的海的谷物并非阿姆斯特丹市场上供给的惟一决定因素。西欧也生产大量的谷物。就像波罗的海地区一样，我们不能精确地知道西欧有多少谷物盈余能用于出口，但我们知道无论如何这些盈余大多数都到了阿姆斯特丹。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经常性地向荷兰出口谷物。法国出产谷物的省份与荷兰谷物市场的距离，比其与本国的谷物短缺省份的距离还要近。汉堡也向荷兰出口谷物，而且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英格兰就恢复了其作为谷物出口国的地位。英国出口谷物的相当比例，运到了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面荷兰的巨大的谷物交易市场。

一些同时代的人宣称，实际上波罗的海谷物对西欧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谷物短缺的年代，必须经过很长的距离（远至白令海的阿肯吉尔）才能得到这些谷物。但泽的一个名叫约翰·考斯特纳（Johann Kôstner）的商人于1660年写了篇短文，探讨但泽的谷物出口贸易下降的原因。他在文中指出，1656~1660年瑞典和波兰的战争至少在5年内切断了但泽的出口贸易，这期间荷兰设法从其他地方得到谷物。他同时还认为，德国的和平将使得来自东部的谷物出口丧失其重要性。只有在西部歉收或者东部的粮价特别低时，出口谷物才是有利的。依据上述的观点，再加上17世纪20年代瑞典的垄断政策的失败，有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阿姆斯特丹的谷物价格决定了但泽的谷物出口量及其出口价格，而阿姆斯特丹的粮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的谷物收成和市场状况决定的。【229】

有其他的证据显示了1650年前后著名的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发生了转折，长期的扩张阶段将要结束。对谷物贸易量和阿姆斯特丹谷物价格进行的分析（例如皮埃尔·让南教授主持的研究）显示，17世纪中叶以后经过海峡的贸易量的周期性波动与以往有所不同。1650年以后的波动比以前大，曲线的波动极为剧烈。1650年以前，西欧谷物需求的周期性收缩并不引起谷物进口量的持续减少，某些年份波罗的海谷物进口的大量增加，也并未打破阿姆斯特丹粮价的水平。然而，1650年以后，情况改变了。

新的危机不仅取决于政治纷争，这充满了随后的年代，包括英—荷战争、荷—法战争及北方战争；而且更取决于欧洲西部和东部所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1650~1660年间，第二次瑞典—波兰战争是但泽的一个转折点，它持续地打击了沿维斯瓦河的贸易。但泽17世纪下半期，每年的谷物出口很少达到50 000~60 000拉斯特的水平，而这个数字是在此之前谷物出口的正常水平。查理五世（Charles X）的征伐仍旧在继续，与之相伴的是肆意破坏和强行勒索。城乡所遭受的破坏程度，可以和德国30年战争期间破坏最严重的地方相比。最为严重的是，南欧和西欧的谷物越来越明显地自给自足。16世纪引入葡萄牙、17世纪初引入西班牙的玉米，在17世纪后半期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常见的食品。17世纪意大利的稻米产量有所增加，而且在1630年的瘟疫和饥荒之后，玉米种植也增加了。这些新的食物来源，加之大多数先前的谷物进口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停滞，共同导致了南欧谷物需求的减少。【230】

但是，仍有许多证据表明17世纪后半期西欧的食品生产增加了，与此相随的是人口增长的普遍停滞。费伯博士提醒人们注意17世纪西欧和中欧

增加了荞麦的种植。1669 年，布拉班特的荞麦第一次出现在阿姆斯特丹谷物市场的报价单上，这就证明了这类谷物开始进入国际谷物市场。30 年战争结束之后，荞麦种植开始在布鲁斯维克（Brunswick）受到欢迎。尽管粮价疲软，但是西欧的许多地区 17 世纪后半期的谷物产量还是增加了。一些地方的粮价疲软正是由于谷物产量的增加。1660 年以后，英格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农业立法，以出口补贴为手段鼓励谷物出口，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中期。另一方面，农业史也表明谷物价格的下降，引起了从谷物种植向畜牧业和工业用谷物种植的转变。人口统计资料显示这时的人口增长是停止的，但是更多的资料无疑是缺乏的。有了以上的限制，我们可以推断，西欧和南欧的普遍情况一定导致了其对波罗的海谷物需求的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655 ~ 1660 年战争之后，维斯瓦河贸易的中断对但泽和波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欧洲东西部的这种谷物供应贸易在欧洲总的谷物需求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精确的计算是绝无可能的。通过获取每年的过境贸易数据（17 世纪前半期的数字是每年大约 68 500 拉[①]），将其换算为磅，然后将得出的数字与估计的西欧平均谷物消费量相比较，费伯博士得出结论：波罗的海贸易所供应的谷物大约相当于 75 万人 1 年的谷物消费量。将其与西欧和南欧的人口总数相比较，这个数字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也许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不应按总人口的标准来衡量，而只能用国际贸易主动脉经过的地方的人口数量来衡量，也就是主要以城市地区的人口数量为标准。而另一方面，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内地以及包括谷物的地方贸易。甚至阿姆斯特丹在除了其著名的国际谷物交易市场之外，也有自己的地方性的谷物交易市场和地方性的内地贸易。这个内地贸易包括莱茵、佛兰德、法国北部、英格兰。我们很难说“内地”的分界线在哪里，在哪里的供应就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除非我们用纯粹的政治标准，将国界作为分界线。但是，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做法。

【231】

谷物的国际贸易和谷物的地方贸易无法分开地交织在一起。在谷物的这个例子中，那种认为存在两个截然分开的部分构成的双重经济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这种观点是合理的，而且从波罗的海来的谷物相对于总需求和总供给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供给和需求的相对较小的变化，就能引起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相对较大的变化。17 世纪后半期的谷物贸易衰落，它在长

① Last，谷物容量单位，等于 80 蒲式耳。——译者注

期内影响了整个荷兰经济，也可以被看做是由总需求相对轻微的较少增加和南欧、西欧谷物市场的微小增加引起的。

这种边际的概念也许尤其适用于研究波罗的海谷物和南欧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需求仅仅是对小麦的需求。如上所述，小麦占经过海峡的所有谷物的比重并不大，即使考虑到海关记录的不准确性。1660 年之前小麦总的数量占同一时期整个谷物运量的 13%。这个比例上下波动，在一些年份比另一些年份更重要。我们知道，南欧的谷物需求是荷兰和地中海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关键因素，而且这种投机性的谷物贸易产生了其他重要的影响，例如对贸易组织的影响。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并依其所供养的人口，这个数量确实比较小。它在饥荒年代可以缓解个别地方的困苦。然而，这种谷物贸易并不能形成长期的、持续的商品流动的基础。看来，只有另外的其他商品才能保持并扩大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业已建立的贸易联系了。

2. 肉牛贸易

一般而言，重大笨粗的商品经过较长的运输要想有利可图，只有经过水路运输。由于牛的运输并不靠其他交通工具，而是自己运输自己，因而它就成为一个例外。古代的运畜道路网络遍布欧洲大陆各地。确实有少量的牛通过水路运输，[①] 但是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研究国际商业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独特贸易的大部分，具有明显的陆路特征。依据当时的标准，这种贸易所经过的距离使其具有国际重要性，它在 15～17 世纪初的期间达到了顶点。阿贝尔教授尝试了将 1601～1620 年间波罗的海出口的谷物的价值，与同一时期丹麦（包括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斯堪尼亚两个公国）出口的牛的价值进行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那个时期谷物出口的年平均价值相当于 55 000 公斤白银，而每年出口的牛的价值是 30 000 公斤白银。和谷物一样，牛这种商品也是运往价格高的地方。从阿贝尔教授所编辑的 1551～1600 年 15 个欧洲城市的猪肉和牛肉价格来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比起谷物的生产来说，牛的生产对反复无常的天气变化的依赖程度要低，相应地，牛的价格要稳定的多。许多地区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都宣称饲养牛以供出口是他们的垄断权。他们要求对农民的小阉牛的优先购买权，这样一来，他们就压低了价格，相应地就增加了他们的利润。另一方面，牛的贸易经常掌握在中等 [232]

① 见下面的第 237 页。

阶级的商人和垄断者手中。牛的实际的饲养在远离城市和其他消费中心的地方进行。在迁移中，牛的重量会减少，因此不得不在靠近消费地点的地方将其催肥。因此，养牛的地区和对牛进行催肥的地区在地理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典型的养牛区位于谷物产区。欧洲北部的养牛区是从日德兰半岛开始，横跨丹麦诸岛到达斯堪尼亚，接着向东到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以及俄国的部分地区和相邻的罗马尼亚。东南欧的养牛区主要是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的南部和中部，而北欧养牛区则向西北欧的城市供应肉牛。

更详细而准确地讲，养牛区的牛肉供应和德国南部及东部地区的消费需求在一条线上汇合，这条线在布雷斯劳—布拉格—维也纳的东边，特别明显地包括波兰和匈牙利。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境内，特别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有大量过剩的牛以供出口，但这是17世纪、18世纪的事。波兰的养牛区分布广泛，包括雷森兰德（Reussenland），就像它的名字那样，这个地区在里沃夫周围，并由此沿着向西的赶畜道经由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向前。同时，里沃夫也是从摩尔达维亚（Moldavia）公国来【233】的畜群的汇集地。摩尔达维亚既是谷物产区也是养牛区。摩尔达维亚作为中欧牛肉的供应者的重要性，随着土耳其版图的扩大而逐渐降低。但是，它大量的谷物和牛随之用于供应土耳其军队和君士坦丁堡。

1430年以后由波兰统治的乌克兰西部的波多利亚省，也是向西输送肉牛的一个重要养牛区。而位于养牛区边缘的克里米亚，也向外出口牛。东欧地区最大的养牛区可能要数匈牙利。确实，从匈牙利运到中欧的一些牛是从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转运来的，然而，大部分牛都是在匈牙利本地饲养的。在15世纪、16世纪的一些时期，牛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对贵族来说更是如此。匈牙利历史学家艾姆伯（Gy. Ember）尝试计算1542年的出口，结果表明活畜出口占当年出口总值的93%以上，仅仅牛就占了87%。出口市场的地区分类表明，肉牛出口占整个对奥地利出口总值的83%，占整个对德国出口总值的比例不低于99.7%。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威尼斯，是匈牙利牛的第三大出口地。匈牙利的出口在16世纪遇到一系列麻烦。土耳其战争导致贸易中断；瘟疫，特别是1518年和1549~1559年的严重爆发也造成了类似的影响。1518年的瘟疫在纽伦堡看来是德国的一场灾难。据信，当时整个德国的肉类供应都切断了。然而，来自匈牙利的肉牛输入绝不可能永久性地中断。18世纪上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牛肉照样由匈牙利供应。但是，16世纪发生的困境，

确实导致了中欧从西里西亚和波兰的肉牛进口的增加。

牛的催肥区紧靠消费中心，位于河流纵横的平原和广阔的草原组成的内部“畜牧区”。北海的沼泽地带和弗里斯兰省（Friesland）是两个催肥区，它们对德国北部和荷兰很重要。这两个地区由赶畜道相连，畜群由人引导着沿着赶畜道行路。它们沿着特殊的线路行进，可能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这是为了普通商路的交通不被这些缓慢移动的畜群堵塞。它们日行大约 2～4 英里，而且每隔 3 天就得休息一次。加快行进速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样一【234】来，牛的体重就会减少。在赶畜途中，路途遥远有时可能远达1 000公里，这期间牛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停靠站。许多情况下这些中转站都是一样的，设有海关的征收点，对牛进行登记并付通行费。同时，有一大群人跟随着畜群。在北欧，通常 20 头牛就配有 1 个赶畜者和 1 个“探子”。探子通常是牲畜贩子的儿子，他的任务是寻找旅店供应膳食以及为牛群寻找过夜场所和干草。牛群通常就在露天的地方过夜。沿着赶畜道兴起了许多出租房，以供过路的畜群和赶畜者使用。

牛在靠近催肥地的一些市场上销售，例如位于魏玛北部图林根州小镇布茨台特（Buttstädt）的著名的肉牛交易市场。那里的交易博览会一年有三次，分别在圣约翰节（St John）、圣米迦勒节（St Michael）和万圣节（All Saints）进行。通常由多达 16 000～20 000 头牛在这里易手。这里售出的牛来自波兰、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到布茨台特的买主来自整个德国中部和西部。另一个著名的肉牛市场位于汉堡西边的韦代尔（Wedel）。来自丹麦的卖主和来自德国和荷兰的买主相遇在这里的春季交易博览会上，交易会从 3 月中旬一直持续到 4 月中旬。这里交易的牛主要来自日德兰半岛，它们可能在 2 月份就出发赶往韦代尔。从维斯塞尔（Vendsyssel）到易北河的路程要花 30 天。当畜群到达韦代尔时，往往瘦得如皮包骨头，因此，这里被恰如其分地成为“瘦肉市场”。然而，牛群在荷兰或德国的草地上经过一个夏天的喂养，已经完全可以屠宰了。韦代尔也有一个秋季交易博览会，这时的牛来自石勒苏益格公国，这些牛不需催肥就可以直接屠宰。

我们特别对西北欧沿岸的肉牛贸易有很好的了解，这要归因于幸存下来的丰富的海关记录资料。韦斯（Wiese）博士在他的专论中使用了这些资料。从丹麦王国过来的牛在石勒苏益格公国经过的海关关口不少于五个，最后的两个关口高特布（Gottorp，在石勒苏益格城内）和雷兹伯格（Rendsborg）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是按头数对牛征税的。除了海峡的货物通行记录外，丹麦王国幸存下来的系统的海关记录，再也没有比高特布和雷兹伯格

的更完整了。海关征收的通行税在丹麦国王和石勒苏益格大公之间分配，因此记录一开始就是双份的，有时是三份，因为在某些时期石勒苏益格有两位【235】大公。登记时极其小心，即使是免税通过的牛也同样记录在案。这正是这份记录最有价值的地方。丹麦所养的牛主要供应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城市，特别是汉堡和吕贝克。然而，也有一些销售到更南边的地区，如科隆；法兰克福处在丹麦牛的销售范围的边缘，它的大部分牛来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

依据前面提到的海关记录，对肉牛运输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的考察发现：1483～1560 年前后，牛的运输量具有上升的趋势，从每年仅仅 13 000 头上升到每年超过 40 000 头。随后的 20 年这个趋势几乎保持不变，接着的 16 世纪 70 年代及其以后，牛的出口数量下降了，1579 年为 26 000 头，1583 年仅为 19 000 头。这种下降最好的解释就在于当时荷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丹麦 1583 年有关肉牛贸易的一条法令提到发生在荷兰的骚动和暴乱，这几乎毁灭了肉牛贸易。这些年间，荷兰商人不再出现在易北河市场上。到了 1596 年，贸易的下降趋势停止了，开始了肉牛贸易的全盛期。直到 1625 年，高特布—雷兹伯格的海关记录表明每年都对 30 000 头以上的牛征税。在一些年份中，这个数字超过了 40 000 头，而 1612 年的数字不低于 52 350 头。1618 年海关记录的片断资料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一年的出口数量更高。

肉牛贸易的繁荣期持续了多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韦斯博士认为在 17 世纪 20 年代，贸易就开始衰退。原因在于 30 年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丹麦国王在 1625～1628 年间的参与可能削弱了供给和需求。例如，日德兰半岛的肉牛输出在阿尔布雷蒂·优西比乌斯·温泽尔·冯·华伦斯坦（Wallenstein, Albrecht Eusebius Wenzel von）战役期间中断了。关于这一点，韦斯注意到 1620 年丹麦的一条法令，其中有一条授权广大群众可以在贵族的农场饲养他们的牛。韦斯由此看到建立养牛“配套体系”的趋势，由此贵族可以规避海外贸易失败的风险而同时又能保持和养牛有关的服务。然而，人们也有可能在赞同雷德韦格·彼德森（Ladewig Pedersen）教授的分析，他认为 1620 年的法令是丹麦资产折现危机的显示。这种危机和国王向贵族借款有关，而 17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谷物歉收又使其加剧。依照这种观点，它确实解了燃眉之急，但并不能解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诸如汉堡和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的肉牛需求，在整个 17 世【236】纪 20 年代会持续下跌。

一旦通向国外市场的路线重新开通，出口就以相对高的速度恢复。估计每年的出口量为 30 000～40 000 头。丹麦幸存的那个时代的惟一统计资料，

记录了 1640 ~ 1641 年的情况。资料显示，所有的出口点海关记录汇总得出的出口总量达 37 500 头。也许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肉牛的出口被限制在经过石勒苏益格大公国的陆上路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初。为了丹麦东部省份和日德兰半岛西岸港口的利益，在 1615 ~ 1623 年期间实行了海上自由运输。从里伯（Ribe）到荷兰的运输量也是重要的一部分，1640 ~ 1641 年间的数字是 7 000 头。它的重要性也反映在丹麦的战舰不时地护送运牛船队到达荷兰。

17 世纪 40 年代早期，丹麦贵族就开始抱怨养牛的艰辛和卖牛的困难。1647 年的一份请愿书中第一次提到了易北河市场的衰落。请愿的诱因是一份有关养牛业和肉牛贸易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易北河市场应当搬迁到里伯（Ribe），由此，牛可以直接经由海路到达荷兰，如果里伯的市场行情不好，可以再将牛运回国内。同时还提议在为期两年的时间内，将出栏的牛的数量减少 1/3。当时其他两个阶层侵害了贵族所要求的饲养出口肉牛的垄断权利，最后请愿书对此表示了遗憾。1639 年，贵族对农民饲养的牛的出口成功地实施了直接禁运。

上述紧张事件的背景，无疑是 30 年战争所造成的市场条件的恶化。易北河市场上的肉牛价格持续下跌。人们一个个地放弃了出口牛肉的贸易，而这曾经是丹麦商人的惟一的保留项目。一份幸存的商业账簿提供了市场条件已经变化的证据，它属于一个叫斯蒂芬·路德（Steffen Rode）的大商人。账簿显示，在 1639 ~ 1649 年的 11 年中，出口肉牛方面总共损失了 19 000 瑞克银币（rix-dollars）。肉牛价格下跌时，圈养牛不再有利可图，特别是在有大量土地的地区。农业产品的其他产品，例如牛奶能使稍大一些的养牛场更好地渡过难关。在西欧海上列强的海上舰队扩张期间，黄油、干酪以及其他类似的产品的市场销量上升。丹麦农业从肉牛养殖业向制酪业的转变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然而困难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37】

当日德兰半岛和斯堪尼亚的情况刚刚有所好转时，正是肉牛贸易在丹麦群岛下降最为激烈的时候。肉牛生产和贸易在这些地区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金时代过去了，但牛的出口仍在继续。17 世纪后半期，虽然有无数次中断以及短暂的下降，但是陆上的肉牛贸易数量保持在每年 20 000 只左右。出口在 1658 ~ 1660 年丹麦—瑞典战争期间彻底的中断，1665 ~ 1667 年间的英—荷战争和路易十四的侵略战争，导致了荷兰在易北河市场上的购买量急剧下降。18 世纪初的北方战争为肉牛贸易制造了麻烦，1713 年和 1745 年的牛瘟也是如此。过去人们一直以为丹麦的出口增长在 1718 年敲响了丧

钟，而且荷兰以对来自丹麦的牛征收沉重进口税的方式对其进行报复，这必然引起出口的突然下降。然而，韦斯博士的分析并不支持这样的推测。相反，18世纪20年代的出口数字比18世纪前10年的数字还要高。直到1734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

肉牛贸易的全盛时期正好是贵族统治的黄金时代。这一点可以由匈牙利、波兰和丹麦的许多例子来证明。来自牛的巨大的收入，被奢侈地用于建造富丽堂皇的豪宅、维持规模宏大的王宫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肉牛贸易是贵族统治的已建立的坚实基础的一部分。但是，牛也为农民提供生计，同时对这种贸易征收的关税也充满了诸侯的国库。阿斯特丽德·弗瑞斯（Friis，Astrid）教授认为，以丹麦为例，肉牛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外国通货大量输入，以至于丹麦的货币结构迅速地从1533～1536年的国内战争恢复过来，而且在后来有了经济实力参加北方7年战争。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商人从这种长途贸易中获得了他们的利润。

对北欧肉牛贸易的相互独立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发现牛要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至少需要转手四次：首先是农场主，他实际上承担了牛的喂养。这个过程有3～4年，农场的喂养能力通常限制在2～4头牛。领主，他具有囤积牛的垄断权利，囤积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冬天，数量为几百头。商人，他组织20头、40头或多达几百头的牲畜赶路1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238】垄断者或屠夫，他们赶在秋季送往屠宰场之前将牲畜养肥。

由于贸易的不同阶段可得到的资料并非是关于同一条牲畜贸易路线的，而且牲畜的质量区别很大，我们很难确认这种贸易可能达到的利润水平。上面所引用的斯蒂芬·路德的商业来往账簿显示，与牲畜运输有关的成本占了其购买价格的23%～30%，也就是牲畜贩子从农场主或地主购买牲畜时的价格。也有一些16世纪早期独立的例子表明，那时的运输成本甚至更高，达到购买价格的46%。经由海路的运输成本大大超过了陆路的运输成本，在斯蒂芬·路德所举的例子中，将牛从哥本哈根经由海路运往荷兰的成本大约为其买价的72%。17世纪海上运费虽然确实有所下降，但是经由海路运输牲畜仍旧是一项成本高昂的生意。

韦斯博士通过对1550～1650年间牲畜贸易中四个不同的阶段，即饲养、蓄畜、运送、催肥的价格进行比较，尝试估计牲畜贸易中不同阶段有关各方占消费者最后购买价格的多大份额。就像韦斯博士本人所认为的，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他的结论。结果显示，饲养阶段占消费者购买价格的29.2%，蓄畜占18.6%，纯粹的交易费用占25.3%，最后的囤积垄断者占26.9%。第

三阶段的费用波动很大，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当时的数字很低甚至有一个阶段（1571～1580年）是负的，这很难纠正过来。韦斯博士认为，16世纪后半期丹麦和易北河市场的牲畜贸易并不是特别有利可图。这些年中，丹麦—石勒苏益格（Danish-Schleswig）出口的75%左右，经过易北河市场远销奥尔登堡（Oldenburg）、弗里斯兰省和荷兰各地，这些地区的价格可能要高一些。1600年以后，牲畜贸易进入最繁荣的时期，价格统计显示当时的利润升高——连续几年牲畜的售价几乎是购买价格的两倍。但是在这个时期（1550～1650年）末，价格又一次下跌了，这一点也由斯蒂芬·路德的商业交易账簿所证实，账簿记录了当时向易北河市场贩运牲畜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然而，牲畜贸易仍在继续的事实表明，要么我们的价格统计资料是不可靠的，要么当时的市场不是依需求、供给成本自行调节的，价格也不是需求互动的结果。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现金维持生活开支或支付税款的小农，喂养并卖掉他的牲畜时，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诸如生产成本或出口和市场价格的理性计算。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市场影响资源在生产中的利用方式，或者说市场影响生产的数量和模式。【239】

在海关的记录中，贵族很少作为牲畜的出口者出现。真正实施贸易的人是商人，一些最重要的大商人来自弗伦斯堡（Flensburg）。大约在1630年以前，只有少数的德国和荷兰牲畜出口商，但在这之后，外国的贸易商才逐渐突出。17世纪中期，向南的路线上第三个海关关口，即图德斯泰德（Toldsted）记录了大约50位丹麦商人、17位德国商人和32位荷兰商人。17世纪后半期，外国牲畜贸易商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荷兰的出口商在1625～1629年、1643～1645年战争期间就来到丹麦。1629年，哥本哈根的一个商人为荷兰的牲畜贸易商做代理，从那时起，从斯堪尼亚由海路直接到荷兰的牲畜出口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荷兰活跃而持续的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荷兰牲畜贩子来到丹麦，这也许稍稍补偿了德国需求的下降对丹麦造成的损失。

3. 铜贸易

有几个特征使得对金属的研究变得很有趣味。中欧的金属采掘业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同时也形成了清晰可见的组织形式。严重的社会冲突，在金属采掘和金属冶炼业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属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其中铜的地位更为突出。人们进行了无数次的努力，企图垄断金属贸易。铜介于真正的造币金属——所谓的贵金属，即金银——和贱金属之间。

依据皇家的垄断权，君主可以以自己确定的价格兑换金银，这项权利和铸币权直接相关。中世纪时，铜并不是真正的铸币金属，因此，虽然在原则上君主为其保留了优先购买权，但是君主并不对铜实施这项权利。然而，在16世纪，君主们将皇家的优先购买权扩大到包括铜的贱金属。这时铜开始用于铸币，而且由于铜可以用于制造大炮，使得它开始具有战略重要性。而且，【240】铜矿经常与其他金属矿共生，这就意味着在一些采矿业中铜是主要目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铜是副产品。最近，韦斯特曼（Westermann）博士证明1460～1560年间，铜仅占图林根金属采掘公司产量的40%，其他60%的产品是银。因此，任何关于这个时期这个地区金属生产和贸易的解释，都必须考虑欧洲白银市场的形势。另一方面，匈牙利地区的诺伊索尔工场，为我们提供了采铜业在生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例子。

不管矿区的君主们是否利用优先购买权获利，他们都通过以货代款对铜征税，例如什一税、通行税等，获得实物收入，而且君主们也经常经营铜矿。如果他们自己不用或者不能用这些铜的话，他们就卖掉它或者委托商人将其售卖，从而处理掉这些铜。16世纪时，商人在铜矿冶炼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体现在铸造过程中，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各样不同品质的铜（精铜、铜条、铜丝等）的精炼，这些铜接着有的成为随后的加工工序（例如青铜铸造、黄铜的制造以及铜线的制作）的原材料。各种铜所具有的工艺上的特点，是决定不同类型铜的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地区生产的铜具有明显的专用性，例如艾斯伯纳（Eislebener）出产的铜最适合做铜线和黄铜器。16世纪的铜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参与了铜矿石的冶炼。虽然，17世纪大多数铜贸易已经确立，但是，这个世纪有无数例子表明铜商和铜的生产，以及各种类型的铜的精炼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不仅在矿石的采掘方面，而且在生产过程的下一个阶段。

王权的利益因商人的利益而开始强化，接着很快两者就出现了分歧。在许多情况下，经常是急需金钱的紧要关头，君主就将金属税收的未来征收权——不管是以通行费、什一税、优先购买权还是以强制征收的方式存在——移交给资本主义的金融家，从而获得大量的现金形式的贷款或预付款。实际上，正是以这种方式，铜成为许多欧洲大国的关键资源。16世纪马克西米利安皇帝（Maximilian）和他的继任者，用中欧的铜和银支持他们所进行的战争。17世纪的瑞典国王也是如此。新教的积极倡导者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通过去斯特丹的中间人，把铜卖给天主教的西班牙。即使是在那个宗教【241】分界壁垒森严的时代，这也绝不是贸易跨越宗教界线的惟一例子。不顾无数

的禁令，匈牙利铜产量的相当大比例运到了土耳其——基督教世界的头号敌人。

“铜买断”（copper purchase），依其字面意思，也就是一个地区铜产量的相当大部分落入很少的几个人手中。商人并非总喜欢过深地卷入铜的生产过程中，但是，不时地，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这么做。例如当一个君主无法归还贷款时，债主不得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这种情况发生在富格尔。一旦卷入生产过程，很难从中解脱出来。在16世纪后半期，贸易条件恶化时，富格尔在蒂罗尔根本就找不到能买它们的铜厂和铜矿的人。

正如本部分其他地方讲到的，中欧有三个主产区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们是东阿尔卑斯山地区、上匈牙利地区和图林根的曼斯弗尔德（Mansfeldt）地区。17世纪，瑞典铜的产量也很大，因此它也可以加入主要铜产区的名单。在短期内，原铜的供应是没有弹性的，产量的波动——有可能很剧烈——通常是由技术或自然原因而引起，而且通过控制铜矿的产量从而控制铜的市场是很困难的。但是，在生产的下一个阶段，人们进行了控制铜的市场的尝试。长期内铜的供应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具有地理性质的变化。

无论是经由水路还是经由陆路，铜都需要很大的运输能力。它的运输通常都委托给和国际铜贸易没有关系的承办人。这里有一个运输铜的例子，匈牙利的铜要由诺伊索尔运往侯亨克琛（Hohenkirchen）的冶炼工场，由此再到纽伦堡、法兰克福和其他市场。一年11 000生奈尔（centner，1生奈尔约等于1英担）的铜产量，需要有效载荷为0.8吨的4匹马的马车220辆，在相距800公里（一个来回就是1 600公里）的两个地方一年来回三次，每次的行程因风向、天气和路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约为68～82天。

铜有许多用途：铸造货币和青铜大炮，制造无数工业品、手工艺品和日常家庭用品，用于制造酿造、蒸馏、烹饪和蒸煮的大缸，在造船中用做屋顶的材料，制作各种各样的仪器、炊事用具，以及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铃、教堂的门、青铜雕像、家具等等）。铜也用于制造珠宝和装饰物，特别是为那些不怎么富有的人。铜的需求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青铜大炮的制造处于繁荣时期。这是新兴民族国家崛起的时期，它们的军队、舰船以及它们所进行的战争，再加上地理扩张，这一切都增加了对大炮，无论是铜炮还是铁炮的需求。青铜铸炮达到了一个完美的高度，特别是德国人和佛兰德人制造的大炮有很大的贸易量，而法国和意大利的产品主要是自用。然而，青铜大炮在17世纪让位于新的廉价——虽然更加笨重，【242】

而且不如铜炮理想——的铸铁大炮，英格兰和瑞典是制造这种大炮的专家。瑞典企业家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于1644年宣称，可以以铜炮1/3的价格获得铁炮来装备战舰，而且1658年瑞典海军的军备普查表明铁炮和铜炮一样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铁炮改进到了甚至从技术的角度看也可以与过去的铜炮媲美的程度，所以在到处都受到欢迎。这样的发展必然对铜的需求造成影响。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特别是家庭用器皿的制造商，铁也具有成本优势。铁制炊具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更加清洁，而且它不像铜那样给食物染上异味。黄铜使用的增加部分弥补了青铜使用的减少，但是黄铜的产量从来没有达到能抵消青铜减少量的程度。

用于铸币的铜是很好的一次性需求的例子。一旦流通中的铜币供应充足，那就只需要更多的铜仅仅用于弥补铜币的磨损，或者发行由商业扩张而引起的额外的货币。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正是发生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的事实。几个国家购买了大量的铜专门用于铸币，但是这种铸币需求是不均匀的，它很可能是导致铜的贸易上下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他的短期波动是由一些行业——诸如制糖业、酿造业、硝石制造业，当然也包括与战争有关的军需品的生产——的市场行情变化引起的。

铜需要最近的通向海洋的路线，这就意味着威尼斯将成为中欧蒂罗尔和匈牙利生产的铜的主要销售出路。尽管由此外销的铜的数量上下波动，但威尼斯将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7世纪初。铜由威尼斯向东销往利凡特，并由此远销印度。对印度来说，铜是欧洲人能够用于与其交换香料的少数集中商【243】品之一。铜向西到达马略卡岛（Majorca）和马拉加（Malaga），并有着两个集散中心销售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各地。进一步，铜加入对非洲和新大陆的贸易中。中欧铜产量的一部分也向西、向北运输。威尼斯是蒂罗尔铜的主要销售市场，德国南部是其补充性的销售市场。16世纪头几十年，匈牙利的铜已经经由但泽销往安特卫普或经由奥得河到达斯德丁，然后在经由汉堡和吕贝克到达荷兰。1508年，葡萄牙人在安特卫普的商馆（factory）作为印度商行（Casa da India）的分支而建立，而且葡萄牙国王通过他的代理人每年都获得大量的铜。安特卫普作为匈牙利铜的重要销售出路，一直持续到16世纪70年代，之后汉堡上升到了显著的位置。整个德国就是铜——特别是曼斯弗尔德供应的铜——的一个重要销售市场，像纽伦堡、亚琛（Aachen，欧洲最大的黄铜器制造中心所在地）和法兰克福都是主要的销售中心。16世纪瑞典铜的最大买主在吕贝克，其后在汉堡和阿姆斯特丹。荷兰对铜的需求增加了，不仅由于一般商业活动的繁荣，而且由于1600年以后荷兰各城

市发展了相当大规模的铜器制造业。

欧洲市场决定了铜的生产和销售条件。前面我们讲过，在短期内调整铜的产出量是不容易的，在半成品销售中，特别是在过剩时期，调节供给和需求的努力同样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这种努力从图谋垄断到寡头安排。早期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雅各布·富格尔，他于1490年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签约购买蒂罗尔的全部铜产量，而且于1494年进入匈牙利市场，从而强化了其效果。1498年，富格尔和他在铜贸易上最近的竞争对手——三个奥格斯堡商会——建立了辛迪加。但是，富格尔将匈牙利的铜以倾销价格运往威尼斯市场，从而破坏了上述协议。虽然他这样做损失了其在奥格斯堡辛迪加中的1/3的股份，但是他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成功了。他的竞争对手们退缩了。从此，匈牙利铜流向了荷兰、蒂罗尔和威尼斯。虽然16世纪前半期中的商业环境是有利的，但这种垄断是短命的。市场不时地出现饱和的迹象。16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图林根的铜商陷入困境，这一方面是 【244】 因为农民战争（Peasant Wars）及其军事征用削弱了纽伦堡和法兰克福市场上铜的需求，而同时对白银的活跃的需求也自动引起了铜的供应量的增加。瑞典铜在荷兰市场上的突然出现也引起了不确定性，富格尔在匈牙利的部署也是如此。这就是随后连续几年破产以及曼斯弗尔德地区集中生产的背景。卡特尔协议于1531～1534年建立，以后又在1537～1540年间重建。1546年以后，富格尔家族对匈牙利诺伊索尔的工场失去了兴趣，在经过几年的国营之后，这些铜矿转手到了其他奥格斯堡商会。16世纪70年代，匈牙利的铜产量急剧下降，其他的主要产地的产量在同期也下降了。

16世纪9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由于需求普遍上升，荷兰市场上的价格在1599～1610年间翻了一番，对外出口量也在增加。铜币的铸造也增加了，特别是西班牙强化使用低级银合金铸币（*vellon* money），其中三个最主要的铸币期是1599～1606年、1617～1619年和1621～1626年。欧洲军火工业对铜的需求也许也是一个应当考虑的因素，此外还应当包括荷兰自己新兴的铜器制造业对铜的迅速增长的需求，这个工业是由德国（特别是亚琛）和荷兰的企业家在17世纪的头10年建立的。

在商业繁荣的时期，阿姆斯特丹成功地将其建成为一个主要的铜制品集散地，这主要应感谢瑞典的铜。以前瑞典的铜在中世纪的商品集散城市吕贝克和汉堡销售。瑞典的铜在17世纪前25年增加了5倍，而且随着30年战争的继续，它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产铜国。作为1614年与荷兰（States General of the Netherlands）结为联盟的结果，1616～1619年间，瑞典的铜大

量地运往荷兰。荷兰给予瑞典大量贷款的条件就是以铜来归还贷款。铜的销售落在私人手中，而且由于数量巨大，所以各种不同的荷兰商人，都着眼于确保其对荷兰铜市场的控制力而相互间进行着竞争。瑞典人针对这种策略的办法是1619年建立的瑞典铜公司。他们将铜的出口转向古老的汉萨同盟市场，但是到了1626年，他们深陷财政危机。这时，铜价出现了下跌的趋势。

[245] 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通过引进铜和银的复本位制、低级银合金（*vellon*）货币体系使得他在不减少铜的生产量的同时限制其出口，以期能够抵消市场行情下跌对瑞典造成的不利影响。然而，这项政策失败了。瑞典并未垄断市场，而且它的战争经费主要依靠铜的收入，因此，铜价的下降严重地威胁着瑞典的资产折现力。荷兰的投资者，特别是特里普（Trip）商行［克莱因（Klein）教授对其经营活动进行了研究］给予瑞典新的贷款，它们的条件是以铜归还贷款为条件，以这种方式它们成功地重建了阿姆斯特丹的铜交易市场。铜价的下降可能和西班牙第三个铸币停止期有关，同时也可能归因于来自铁的不断增强的竞争，这一点也被当时的资料来源所证实。17世纪头25年铜价的高昂可能引起了某种变化，即对铜的需求转变为对铁的需求。值得指出的是，瑞典企业家路易斯·德·吉尔在1644年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阿姆斯特丹市场铜价的第一次下跌，起因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被高昂的铜价所吸引而开始进口海外的铜。

现代早期欧洲以外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出产铜，例如新大陆和亚洲。日本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产铜国，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采铜业之一，而且它的铜制产品超过其他产品成为日本出口量最大的产品。这一点被同时代的荷兰商人所证实，他们留下了许多证据。运铜船在荷兰人开往日本以南的商船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荷兰人将铜转运到东京（Tonkin）、马六甲和其他无数的亚洲市场，从而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8年从日本幕府获得对日贸易的许可，并在1623年之后在与日的贸易上获得垄断权。该公司有助于将欧洲和亚洲的铜市场联结在一起。1620年，荷兰有舆论提出将日本的铜运回荷兰，那年2月份，著名的总督詹·彼得松（Jan Pietersz），即考恩（Coen）写信给费兰多（Firando）的荷兰代理，他要求将当地的一份铜样品运往荷兰。同时，在费兰多的荷兰居民米歇尔·斯派克（Mijnheer Specz）建议，应当把粗铜和精铜当做压舱物运回荷兰。在他看来，这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切实可行，因为返航的商船需要装载重物才能确保安全航行。考恩所要求的少量铜，于1621年春天由莱顿号（Leyden）船运抵欧洲。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将这些样品交由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铜匠进行检验，但结果却令公司的董事们失望。样品的废料太多，而且其质量也不足以让公司的董事们相信进口这种铜是有利可图的。1622 年的一封信中讲到，商船返回欧洲时不再装载日本的铜，直到有新的通知为止。虽然，公司欧洲的经理建议巴达维亚（Jakarta）政府将日本的铜运往波斯，然而，费兰多的代理人却仍对将铜运往欧洲持乐观态度。在以后的几年中，有不同数量的铜被运往欧洲。1624 年，公司的董事们对运铜的兴趣增加了，一些铜在阿姆斯特丹以令人满意的利润销售出去。他们每年运往阿姆斯特丹的铜大约在 200 000 ~ 300 000 荷兰磅，而且还发出了一个铜盘并附带指导说明书作为样品以供分析试验。我们无法十分精确地得知这些订货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因为所有返航的商船运货单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有证据显示 1626 年 2 月有 123 000 荷兰磅的铜运到荷兰，1627 年 11 月和 1628 年 1 月的数字超过了 300 000 荷兰磅。【246】

在上面所提到的信中，德·吉尔说 1626 年从日本运回的铜到了法国的艾克斯（Aix）。尽管德·吉尔告诉他的合伙人说日本铜的质量不及瑞典铜，但是，瑞典国王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代理人康拉德·范·法尔肯伯格（Conrad von Falkenberg）却报告说，日本铜的质量非常好。日本铜在阿姆斯特丹很快地找到了市场，这也是铜价下跌的一个原因。我们很难确定荷兰从日本进口的铜和从瑞典进口的铜哪一个的数量更大。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铜在这些年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出现影响了瑞典的商业政策。德·吉尔认为瑞典确有必要拥有大量的铜，借此为手段就可以以打压价格来威胁荷兰，逼迫其减少日本铜的进口。本质的问题在于莫惹是非。我们可以想像瑞典的特里普家族企业的一个成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经理，他在 1626 年和 1627 年从东印度公司购买所有的日本出口铜。特里普是欧洲主要的武装贸易商之一，它们在铜贸易中占有突出的位置。162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订购日本铜的决定，可以说是它们对特里普公司的一个策略，其目的是通过挖特里普公司的墙角，软化其立场，从而将其拉入荷兰人的怀抱。

【247】欧洲市场上日本铜的出现是短暂的，主要是因为荷兰人 1628 ~ 1633 年在日本所遭遇的困境，以及 1638 年日本对铜实行禁运。禁运的原因在于铜是战备物资，禁运抑止持续到 1645 年。在此期间，荷兰向其设在印度的代理人订购铜。但是，日本铜出口的恢复导致了铜条的倾销。巴达维亚政府在 1646 年 12 月 31 日写给荷兰公司董事会的一封信中讲到，欧洲铜在此没有用武之地。1649 年，第一批日本铜条运抵欧洲，随后的一批是 1651 年运抵

的。接下来为期 4 年的时期中没有铜运往欧洲，在这个时期结束之际，公司的董事会第一次将日本的铜列为公司最需要商品的特别名单中，这时是 1655 年 11 月。这时公司的董事们充分享受着铜价上涨的好处，荷兰的铜价从每 100 荷兰磅 36 弗罗林上涨到 56 弗罗林。他们要求巴达维亚政府，将亚洲节省下来的尽可能多的铜运往欧洲。接下去的 20 多年中，大量的铜持续地运抵荷兰。

这期间日本铜成为欧洲铜市场上报盘的重要因素。1672 ~ 1675 年，日本铜出口达到顶峰，其出口量为估计的瑞典出口量的 1/3 ~ 1/2。相应地，日本铜于 1669 年和挪威铜一起，出现在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市场报价单上，并且一直持续到 1688 年。

很明显，欧洲的需求刺激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进口铜。但是除了欧洲上涨的铜价的推动外，公司对日本铜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因同期印度糖价的剧跌而有所增强。糖是另一种压舱物。1655 年，公司董事要求从亚洲返航的船队装运铜回国，他们命令巴达维亚政府仅仅运送必要的糖即可，节省的空间用来装运亚洲市场卖不出去的东西。由此，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用老装载压舱物的空间的一部分就由糖腾出给了铜。17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大量的铜出口到欧洲，但这并未改变公司的主要原则，即从日本运出的铜从始至终都是主要用于其在亚洲尤其是印度的加工厂，运往欧洲仅仅是第二位的事情。日本对银实施的禁运以及日本金币价格的上涨，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先前的日本金银销售区，也就是科罗曼代尔（Coromandel）海岸、孟加拉、苏拉特、锡兰和波斯，推行第三种铸币金属——铜。在这些地区，日本铜的价格高于其在荷兰的价格，铜在当地贸易和利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尽【248】管日本铜仅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销售总额的 6% ~ 8%，但是来自它的现金收入却占其在印度的商馆现金收入的很大的比例。在苏拉特多达 40 种的商品中，只有香料给东印度公司带来的利润高于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日本铜在亚洲市场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荷兰方面，如前所述，特里普家族在 17 世纪前半期铜贸易中占有显著的位置。1632 年前后，瑞典国王欠下埃利阿斯·特里普（Elias Trip）家族大约 100 万盾（gulden），他们威胁说要在阿姆斯特丹市场卖光瑞典铜的库存而使瑞典破产。特里普家族再三确保自己成为真正的垄断者。1634 年，荷兰和德国铜商组成一个公司，特里普家族在其中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然而，瑞典政府拒绝与这个新的公司做生意。第二年，两大铜业公司分割了市场，一个是属于荷兰—汉萨，另一个属于瑞典。特里普家族在前者占据统

治地位。这种合作持续到 1639 年。再三控制整个瑞典铜市场的企图表明，17 世纪的铜贸易的规模仍是单个的集团或商会无法完全控制的。

4. 纺织品贸易

毛织品，尤其是毛纺布，支配了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历史。这自然而然是英国学者传统的研究领域。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在 15 世纪、16 世纪，以及 17 世纪的部分时间里在纺织品行业上达到自主程度。因此，我们可以中肯地指出，欧洲确实生产除羊毛以外的其他纺织品，而且确实大大发展了传统布料之外的其他纺织品。当羊毛织品还主要是城市的专业领域时，亚麻和帆布制品的生产就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手艺。我们发现早期除了毛织品外，还存在大量的亚麻织品贸易，特别是从德国南部到地中海国家，甚至意大利的城市也购买亚麻布。16 世纪，德国北部的亚麻也渗透到西班牙并由此进入新大陆。17 世纪、18 世纪西班牙市场仍旧是欧洲亚麻工业的主要出路之一，其最受欢迎的亚麻来自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波西米亚以及爱尔兰。【249】

欧洲纺织品贸易的典型特征是市场在社会和地域两方面的展开，以及纺织品朝向轻柔和花色多样纺线的发展。这一点被 17 世纪、18 世纪亚洲纺织品，特别是非羊毛织物的大量涌入所证明。这些进口的纺织品的尺寸、品质、纹理和颜色各不相同，类型繁多，包括成品或半成品的丝绸和棉布。棉布印染术也随着纺织品贸易的进行而传到欧洲。

在纺织品生产和贸易中，样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乔杜里（Chaudhuri）博士恰当地评价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17 世纪前半期的印花布进口，他认为当时的印花布市场是非常广阔的，而且消费极具弹性。在欧洲市场对印花布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刺激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从 17 世纪 20 年代开始，对印花布贸易投下大赌注。对印花布这个新的市场，我们知之甚少。是消费者品位的变化引起了对印花布的强烈兴趣吗？或者说是印度的印花布在价格方面胜过欧洲的同类产品？进口印花布的一部分再出口到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地区。印度棉布的上好品种在古代北非和利凡特地区就被誉为好布料。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欧洲市场对丝绸和亚麻织品的需求急剧扩张。正如约翰（John）教授观察到的，这也是英国国内市场的现实写照。

17 世纪后半期可能是亚洲纺织品在欧洲的全盛时期。可汗（Khan）教授指出，1665～1680 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改变其商业政策的时期，关注的

重点从原料和粗纺织品转向高质量的成品。1683 年，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董事会写信给其在印度的办事处说："我们决心大力开展丝绸和棉布贸易"。17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具有"印度热"的特征，印度棉布是稍后 18 世纪中国棉布的先驱和竞争对手。约翰·卡里（John Cary）在他的《东印度贸易演讲集》记录了 17 世纪 80 年代的第一次浪潮：

> 20 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还能见到印花布，这是当时最华丽的装饰品，它的使用非常少见。但是现在（作者在 1699 年写到），无论男女，很少有人会因穿戴印花布衣物而感到自己衣着良好。这些产品包括男人的印花布衬衫、领带、护腕、手帕，女人用的头巾、睡衣、兜帽、套袖、围裙、睡袍和裙子，以及男女都可用的印度长袜。

【250】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期间也在纺织品贸易上下注，为了获得这些新奇的东西而展开了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 1681 年写到：

> 所有的印花丝绸制品每年都应当尽可能地变换样式和花色图案，英国女士认为这是一条恒久不变的普遍规律。她们说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能够运用更好的丝绸做前几年就出现的同样样式的衣服，在这方面它们能做出两倍于英国的以前未出现的新东西，哪怕是更坏的东西。

各个公司都警惕地分析它们的竞争对手的利润情况。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从荷兰获得的样品发往其在印度的官员。纺织品的发展趋向于高品质。印度丝绸取代了中国丝绸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孟加拉出人意料地成为丝绸主产区。实际上，纺织品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印度公司出口欧洲产品的构成。169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商品相当于 540 万盾，这些产品来自于从日本到也门摩卡的一系列代理点。其中孟加拉的产品占的份额不低于 1/3，而这其中 1/2 都是孟加拉丝绸和棉织品。

1700 年前后，英国公司和荷兰公司的竞争很激烈，特别是在纺织品进口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削弱了，一是由于国内对其垄断地位的反对，这导致了新的竞争对手的建立；二是受到本国羊毛工艺和丝绸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要求禁止印度纺织品的进口。1700 年，在禁止印花布的法案通过之前，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纺织工人的妻子们涌入下议院，威胁那些对此法案投反对票的人。由 3 000 名纺织工组成的暴民聚集起来攻击乔西亚·蔡尔德（Josiah Child）的住所，东印度公司大厦也受到了攻击，公司的财物被抢劫一空。然而，这项法案并未禁止半成品的进口。随后的几年，未

印染的普通棉布的进口迅速地增加，以满足欧洲快速成长的棉布印染业。1720年又通过另外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在英国使用任何白棉布。然而，这些法案并未减缓英国繁荣的亚洲纺织品进口贸易，这些进口货大部分再出口到其他国家。事实上，英国的纺织品贸易在设法超过它的荷兰竞争对手。

在17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是孟加拉丝绸的流行时期，而 【251】 1700年以后，中国纺织品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英国东印度公司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这种贸易后来由奥斯坦德公司进行），因而其获得了更好的起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被废除之后，印度市场的大门敞开了，这导致了价格的上涨，使得贸易的利润减少。最重要的是，1707年奥朗则布（Aurangzeb）死后，印度不稳定的局势开始影响许多纺织品产区的生产和产品质量。

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716年写到，有一些多年从事印度纺织品贸易的商人一致抱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品的质量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价格越来越高。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荷兰公司的一些制成品在印度的买价，几乎和英国公司同一产品在欧洲的卖价一样高甚至比其更高。特别是孟加拉在这时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这些抱怨在以后的几年中还未消失，而且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通过在国外尤其是伦敦，购买亚洲的纺织品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进口产品跟不上潮流。偏偏短短的贸易统计资料似乎也支持这一点。

东印度商会（East india House）所面临的焦虑在欧洲的纺织品贸易中并非独一无二。事实上，很少有其他行业像纺织品行业这样充满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转向毛织品和欧洲自己的纺织业时。1590～1650年间，欧洲的纺织品工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主要的变化是在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纯毛织品的生产遇到很大的困境。当然，这种产品并未消失，只是成了补充性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新兴的生机勃勃的产品代替。这种新产品在品质、构成以及技术上都与以往不同，而且出现了新趋势。人们喜欢更廉价而且重量比较轻和颜色都比较浅的材料，通常称这一类的产品为“新布料”。从技术上讲，这些产品的制作需要较少的羊毛，而且它们应该被梳理成长的，而不是短的。漂洗并非必不可少，而且印染起来更容易，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更多的半熟练工人。总而言之，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更简短而且其成品更便宜，运输费用同样也便宜了。

这种新技术起源于荷兰南部的伊普尔（Ypres）附近地区，并于16世纪60年代向西、向北传播。这其中既有经济动因，也有政治因素。波斯托缪 【252】

斯（Posthumus）教授从其来源广泛的原始资料发掘出的数据，显示了莱顿（Leiden）是如何成为这类新兴行业的一个最大的单一生产中心。1581 年这个城市有 12 000 人，1620 年增加到 43 000 人，而 1660 年则增加到 72 000 人。英格兰，特别是其东部也受益于这个新纺织品生产的传播。一些城市例如诺里奇（Norwich）和考尔彻斯特（Colchester）人口的 1/3～1/2 都有荷兰血统，即使并非所有这些人口都在新的纺织品生产行业（这些行业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但是这种制造业也对这些城市——新式的产品就在这里进行交易——的发展至关重要）。英国人将这种生产区分为原料生产和混纺生产。原料就是呢料，它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由上好羊毛制成。混纺就是用经过梳毛机梳过的棉线或者丝线做纬线、用梳好的纱线做经线纺织而成的织物。这两类织物的样式在最后的成品中，仍旧可以看出来。

对荷兰和英国纺织品生产区的产品范围进行的比较表明：在发展的初期，两国是相似的。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两地因市场竞争等因素的不同而有了差异。威尔逊（Wilson）证明这两个主要的纺织品生产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国际分工。无疑，成本高低以及原料的可得性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英国的成本水平低于荷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的纺织品生产主要在农村进行，而荷兰却主要集中于城市。17 世纪、18 世纪荷兰的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一直在上涨，这部分原因是由于谷物税收的提高。与此同时，荷兰商人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强烈反对对莱顿布料生产的任何保护。阿姆斯特丹在 17 世纪从英国的埃克塞特（Exeter）和托普汉姆（Topsham），进口大量的德文郡（Devonshire）色织条子斜纹棉布，同时也出口许多德国的亚麻织品。这些产品在哈勒姆（Haarlem）漂洗，再以“荷兰亚麻”的名义出口。此外，17 世纪英国逐渐严厉的立法禁止出口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原毛，如前所述，这是莱顿纺织品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在这种环境下，莱顿逐渐专注于生产高档产品。由于其所设计的加工程序繁多，所以价格相对就高，其所用的羊毛来自西班牙。其中一类是雷肯斯【253】（lakens），它成为荷兰的大宗出口商品，远销地中海地区、利凡特、非洲和西印度。但是英国的市场却对雷肯斯紧闭着。在毛料生产上，莱顿在所谓的格雷尼（greinen），也就是一种羽纱的生产上获得了成功。1630 年左右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当时一批瓦龙（Walloon）纺织工人发现了将骆驼毛或土耳其纱线，或山羊毛混入羊毛的方法。此后，丝绸中也可以混入骆驼毛。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相当轻的服装材料，用它可以制作男服，销往法国、利凡特以及其他地区。然而，在其他的毛料生产上，英国明显地占有优势，它们比其

荷兰竞争对手以更低的利润率成功地销售廉价衣料。

新纺织品在荷兰南部的出现将其从衰退中解脱出来。16 世纪前半期，荷兰南部当地的纺织品工业就遭受着不景气，因为当时英国在传统的羊毛织品（这种产品经由陆路和海路销往欧洲各地）中的优势地位压倒一切。这期间，英国的毛织品出口上升了 2/3，增长特别明显的时期是从 16 世纪 30 年代初到 50 年代初，当时伦敦的出口量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出口量。英国的竞争使得荷兰以及其他低地国家传统的纺织品生产陷入困境，因此，许多地方的布匹制造停止了，特别是在 40 年代。50 年代，安特卫普市场的崩溃以及这个贸易中心的衰落，标志着英国传统纺织品贸易的一个转折点。16 世纪的最后 25 年，纺织品贸易急剧萎缩。

曾经持续增长的经过伦敦的英国纺织品出口，现在困难重重，而且蔓延到全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又复活了，英国商会和汉萨同盟之间的敌对状态突然升级，人们用尽一切手段寻求新的销售市场。将英国纺织品销往国外的压力，激发了伊丽莎白时代许许多多的著名的商业冒险，从寻求通往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商路到 1600 年东印度公司的建立。17 世纪初，始于伦敦的传统纺织品出口开始了进一步的下降。20 年代，纺织品贸易急剧下降。伦敦商人在国外的代理人报告说，英国纺织品市场萧条的一个原因是匈牙利和西里西亚的纺织品制造业的竞争。17 世纪早期，波罗的海地区和中欧的战争造成的普遍的不稳定状况和经济崩溃，有利于廉价的本地纺织品工业的发展。价格低廉的当地的毛织品的供应上升了。此外，西班牙羊毛越来越多地【254】进入欧洲主要的纺织品制造中心。佛兰德地区长期性地需要羊毛，布鲁日是其主要的入口港。来自西班牙的羊毛同时也被运往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甚至也包括英国。这一时期，英国国内的羊毛供应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也许主要是圈地运动的结果，因为对羊毛品质的主要影响来自放牧业本身。新的羊毛更适合制造更轻、更薄的织物。

虽然在长期看来英国的其他小港口要向伦敦这样的大出口港让出市场，但是这些小港口的衰落并不是没有变化、持续进行的，而是有一个起落波动的过程。16 世纪 50 年代，经由小港口的出口比伦敦起伏不定的出口更加稳定。衣料出口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羊毛出口的相对恢复，而羊毛出口在很多情况下有利于小港口。17 世纪早期，我们有例证表明在短期内小港口的情况要好于那些大城市。许多向法国、西班牙和大西洋岛屿出口布料的东南部港口，都受益于 1604 年英国和西班牙敌对状态的结束。在伦敦萧条的 1620～1624年，英国西部的一些港口和东部的赫尔港，以及纽卡斯尔

(Newcastle) 港的情况相当的好，这些港口的大危机已经是20年代后期的事了。30年代，赫尔港的布料出口由波罗的海转向荷兰，由此它插足了伦敦商人曾经占支配地位的市场。

17世纪英国和荷兰在地中海的布匹贸易都获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这是以牺牲意大利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法国的纺织品为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意大利辉煌的布匹生产城市——米兰、佛罗伦萨和科摩 (Como) ——都衰落了。甚至意大利的丝绸业也受到了打击，虽然意大利各城市确实为诸如织有金银花的锦缎、丝绸、缎子，以及天鹅绒等奢侈华贵的商品保留了市场。在这些意大利城市中，威尼斯保持其纺织品出口地位的时间最长，直到40年代，它的纺织品产量仍然比较大。此后，威尼斯的纺织品就衰落了。同时，来自北方国家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利凡特市场需要轻薄廉价的织物，然而，成本水平和僵化的生产体制是意大利纺织业发展的障碍。威尼斯的衣料制造业是欧洲最古老、最辉煌的工业之一，它主要以西班牙的羊毛为基础。而羊毛的供应是垄断性的，因而成品的价格就上涨。在北方，以鲁昂 (Rouen) 为中心的法国纺织业成功地在利凡特市场销售轻质的纺织品，但【255】是宗教因素在削弱法国所取得的成功。直到17世纪的最后25年，法国才以其南部纺织城市上好的织物返回利凡特市场。

比萨 (Pisa) 的港口里沃纳 (Leghorn)，它在托斯卡纳 (Tuscany) 大公统治下于1591年成为一个自由港。它成为英国人和荷兰人喜欢的港口，也成为地中海的一个商业中心，同时它也成为进入意大利市场的一扇大门。来自北方国家的纺织品不仅在利凡特市场上取代意大利商品，而且在意大利本土也与其成功地展开竞争。里沃纳很快就成为了一座世界性的繁荣城市，那里居住着意大利人、荷兰人、英国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以及一大群富有的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据说主要是里沃纳和地中海市场，首先使英国经济从传统的纺织品制造业引起的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

5. 贸易平衡

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不可能形成任何系统的账目，其中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在不同的时期都是平衡的。贸易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引起了当时无数人的关注。众所周知，尤其在英国，有许多重商主义者的作品是讨论贸易平衡问题的。贸易平衡是英国公众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有人分析了托马斯·孟 (Thomas Mun) 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一书——它的重要的副题是《我们对外贸易的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The Ba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然而，16世纪、17世纪国际贸易中还有两个地区特别受到那个时代的人的注意，随即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这两个地区就是亚洲和波罗的海地区，它们都在很长的时期内，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这种盈余必然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法抵消掉。虽然这种抵消是如何进行的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足以使我们对此勾勒出一个轮廓。对这两个地区来说，如果对其按地区或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区分的话，就可以增加我们对贸易平衡问题的了解。它们的特性需要详细的说明。

亚洲的贸易平衡问题一看便知。很明显，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与亚洲进行贸易之后，即靠从欧洲输入贵金属来保持贸易平衡。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向欧洲进口亚洲产品，而且一开始事情就很清楚：无论是制成品还是半成品和【256】原料，欧洲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这或者是由于欧洲产品在价格和质量方面没有竞争性，或者是由于亚洲国家在获得欧洲产品（除了一些特殊的种类，例如武器和机械工具）方面的无能或者说厌恶。用来平衡贸易的贵金属（包括金条、银块和硬币）有一部分是来自欧洲自身，而其中大部分来自非洲和新大陆，这就使得贸易具有全球性质。

亚当·斯密在1776年论及这种贵金属从欧洲大陆流向亚洲大陆的推动力时说，"在东印度，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格在欧洲人刚开始同这些国家开展贸易时要比欧洲高许多。"斯密相信在18世纪末这种情况仍旧没有改变："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商品的价格像贵金属那样有利。或者说，和贵金属在欧洲所能购买的劳动和商品相比，它在印度能买到或者说支配更多的劳动和商品。"斯密又说，把银运往印度比把金运往印度更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金和纯银的比价通常是10:1，至多也不过12:1。而在欧洲，它们的比价是14:1或15:1"。这同样适用于横跨太平洋，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白银运输。"新大陆的白银似乎以这种方式，而成为使旧大陆两端的商业交流得以进行的主要商品之一。通过白银流动，相距遥远的世界各地大部分都连接起来。"

对广大的亚洲贸易区——东印度公司在这里进行商业交易并为返回欧洲的商船准备货物——进行的进一步的考察显示，起初亚洲许多地区的金价和银价几乎是互不关联的，而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各地的金银建立起新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比价。这一点也许反映了这个

事实：以前与世隔绝的地区现在参与对外贸易，或者说受到对外贸易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仅仅是欧洲人的活动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如果认为贵金属从美洲（和非洲）经由欧洲进入亚洲，或者由美洲经太平洋直接到达亚洲仅仅是单向交流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因为在亚洲内部也有无数的贵金属生产者，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也是在他们的参与下实现了平衡。

日本无疑是亚洲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国。同时，中国、东京、苏门答腊岛【257】(Sumatra) 和印度也生产金银。16 世纪中期，金银采掘业在日本全国遍地开花，金银产量从这时开始到 17 世纪中期增长很大。此后，产量下降。与之相替的是采铜业的崛起，铜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过。日本的贵金属在其顶峰时期可能和这个新大陆的数字相当。随着亚欧商人和日本的商业交流，这些贵金属在弥补亚洲沿海个别地区的贸易差额方面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贵金属也影响欧洲到亚洲的航运，不仅包括其数量，也包括其构成。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恰当地说，情况已经不像亚当·斯密时代那样简单，当时银占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 17 世纪、18 世纪的活动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极为有趣，这部分原因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活动覆盖整个亚洲，同时在 1639 年之后获得了欧洲对日贸易的垄断权。这个公司的历史，包括了其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获取其所需的必不可少的贵金属的相当大部分，大约为 1/3 ~ 1/2。直到 1688 年，日本白银的输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日本政府于当年颁布了禁止输出白银的法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又把目光转向日本的金币，即所谓的库磅（*koubangs*）。早在 1665 年，公司就获得了出口库磅的许可。在此之前，荷兰就经由中国台湾从中国内地获得金币。但是 1662 年康熙大帝收复中国台湾后，这种贸易就中断了。60 年代末，日本发现大量的金矿，荷兰人由此获得大量的金子以供输出。1670 年前后，金的出口极为繁荣。其后，日本人提高了金价，金的出口量逐渐下降。1685 ~ 1686 年，出现了一个禁止出口金的短暂时期，因为日本政府担心金的出口将会引起国内通货不足。其后，黄金出口又得以恢复，但是维持在适度的规模上，这部分原因是因为 1696 年和 1720 年黄金的成色的下降。

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欧洲黄金的兴趣和对日本黄金的兴趣一样，这表现在 17 世纪 60 年代初巴达维亚政府要求运送欧洲黄金，这是因为黄金的兑换价格在印度各地，尤其是在科罗曼代尔沿岸地区比白银更有利。莱乔杜里教授【258】指出，印度各地对贵金属的需求既不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是毫无限制的。白银和银币最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而黄金和金币却有所不同，它们是惟一

的几乎普遍需要的商品，虽然其价格的地区变化相当的大，而且各地的价格也易于波动。

很明显，印度各邦的货币政策对金银的需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科罗曼代尔基本上是金本位地区，而孟加拉却是银本位（或者说是银—铜复本位）。然而，每隔一段时间情况又会发生变化。例如1656年，属于科罗曼代尔地区的加尔格达恢复了银的流通，这时恢复了银币的铸造以满足增加了的应付给莫卧尔王室的贡品。相反，60年代，莫卧尔皇帝又要求以金塔的形式交纳贡品，这就立即创造了黄金的需求。

荷兰公司和其他欧洲公司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科罗曼代尔地区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引起了金币需求的增加。东印度公司从英国运到印度的贵金属，事实上确实占1662～1680年间黄金需求的极大的比例。欧洲公司从80年代起，在孟加拉下了很大的赌注，白银需求相应地增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时更加依赖来自荷兰本土银币和金条的供应。黄金出口在80年代和90年代从每年240万盾上升到360万盾，而且在1700年达到510万盾的短暂的顶峰。18世纪，黄金出口仍旧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18世纪前30年，白银的年均出口从未低于300万盾。另一个高峰出现在1722～1728年，当时每年有680万～790万盾的白银输往亚洲。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表明，同时也存在一条从欧洲出发经由陆地到达亚洲的贵金属的流通渠道。这些贵金属出口到波斯和印度西北部地区。在盖姆隆（Gamron）、古吉拉特（Gujarat）和苏拉特（Surat），可以在亚美尼亚商人或其他商人那里获得经由波兰和俄国而来的瑞克银币（包括德国）和达克特金币。1697～1698年，在盖姆隆的荷兰公司的代理，向苏拉特和锡兰（Ceylon）运去价值98万盾的商品和货币，其中88.5%都是欧洲的达克特金币。让·巴蒂斯特·塔维尼叶（Jean Baptiste Tavernier）在1678年写的《六次远航》（*Les six voyages*）中也提到此事。荷兰公司的例子也说明我们在以金银比价解释所有的贵金属流动时，需要谨慎行事。有关金银比价的争论【259】甚至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出现在原始资料中，而且在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多地区，人们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人们必须设法利用他们能得到的”，这个结论也适用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很长时期内的科罗曼代尔沿岸地区。

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阿姆斯特丹都是欧洲**优秀**的贵金属市场。东印度公司就是从这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荷兰的“可让渡货币”包括银币（包括达克特，这种硬币只用于出口）和金币，特别是达克

特金币。由于范·迪伦（van Dillen）教授的研究，我们对这个市场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个市场在17世纪期间或多或少具有贵金属集散地的特征。美洲白银和非洲（后来是巴西）黄金运到此地，用来向地中海地区支付谷物款项，以及用来支付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在荷兰南部驻军的费用。它们经由不同的路线来到这里：西班牙白银由骡车从塞维利亚运往巴塞罗那，经由海路到达热那亚，接着在武装押运下用马车经由德国运往荷兰。它也可以由陆路经由法国运抵荷兰。当尼德兰最后获得承认后，阿姆斯特丹的白银舰队就承担了这种运输，每年有30~50艘船从事其中，当然，这些船也运载别的商品。荷兰诗人范代尔（Vondel）在1655年满怀自豪地赞扬了阿姆斯特丹新的市政厅，它的南侧包括贴现银行的地下仓库，这个仓库号称可以容纳整个秘鲁的白银。其他地方规模相对小的白银，也流向阿姆斯特丹。例如，当丹麦国王与其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进行结算时，他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移交一定数量的整袋整箱的银币，它们来自多佛海峡（Dovre）北部挪威的海关收入，或者来自考恩斯堡（Kongsberg）的银矿。

白银市场开始于17世纪30年代，而且持续到18世纪前半期。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体现了货币自由流通的价值。当时的许多作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被迫禁止金银条块的出口，那将是不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口的白银来满足其对贵金属的需求，特别是1695年以后。莱乔【260】杜里博士在分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60~1720年的贵金属出口之后，指出它是在南欧（卡迪斯和里斯本）和西欧（阿姆斯特丹）国家获得其白银供应，而且这种供应以公司广泛的再出口贸易和英国与世界的贸易平衡为条件。

贸易平衡、资本流动和欧洲货币流通的上下波动，这一切都影响着东方对贵金属的可得性及其价格。东印度公司对贵金属的需求达到影响金银价格这样的程度，特别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期。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1717年的观察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他讲到："当船要离开欧洲后前往东印度时，对出口白银的需求将白银的价格抬高到每盎司5先令6分或5先令8分"。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例如丹麦亚洲公司在40年代和50年代对白银的购买，影响到了丹麦的汇率。丹麦的这个例子同样也证明了阿姆斯特丹在贵金属贸易方面领导性的地位。这个城市确实掌握着通往欧洲国际支付体系的钥匙，在这个体系中，贵金属的直接转移构成其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并不是说没有贵金属的转移许多赤字就不能结算。阿姆斯特丹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通过多国间的相互抵消使得一系列的结算

得以执行，而这种抵消是通过使用交易票据实现的。西欧贸易的很大一个部分是靠阿姆斯特丹提供金融支持的，对英国来说也是如此。英国和荷兰之间有一条广泛的双向的支付流——以票据和现金两种形式存在着——跨越英吉利海峡。阿姆斯特丹也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扮演金融支持者和结算者的关键角色。

随着贸易平衡争论的逐步展开，波罗的海地区也被日益增多地进行进一步的划分。按地区对其进行分析，特别是近几年，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出版。例如波兰学者对这种进一步的细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有马克赞科（A. Maczak）、塞姆瑟诺维茨（H. Samsonowicz）、马罗韦斯特（M. Malowist）、玛丽亚·保维卡（Maria Bogucka）、赫罗克（M. Hroch）、威尔逊（C. Wilson）、伊里·赫克谢尔（Eli Heckscher）、布莱斯（J. M. Price）、斯伯令（J. Sperling）、艾斯壮姆（S. -E. Åström）。这对英国—波罗的海贸易的经典讨论也具有相似的影响。对贸易平衡问题最新的概括来自 A. 阿特曼教授，他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研究了俄国市场在 16 世纪波罗的海政治活动中的作用。

对西欧来讲，波罗的海就是丹麦海峡以东的地区。如果像克里斯泰尔森（A. E. Christensen）教授那样依据海峡的通行记录，勾勒出整个波罗的海转运贸易的平衡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无论是按体积衡量还是按照货物的价值衡量，经过海峡向西的贸易流量远远大于相反方向的流量。大体上讲，波罗的海地区的出口值大约是其进口值的两倍。16 世纪后半期和 17 世纪前半期，在所有经过海峡的货物中，进口货物的价值占 30%，而出口货物的价值占了 70%。因而波罗的海地区的出口盈余就占其进出口总值的 40%。确切无疑地，这些贸易盈余的一部分被波罗的海地区的以现金进行的贵金属进口所抵消，虽然这些交易并不经常进入海关的记录。从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荷兰的商业通信就提到经常有大量的现款进入波罗的海地区。许多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经此向东流动。问题是这些流经的贵金属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经过海峡以外路线到波罗的海的进口，减少了过境贸易的赤字。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大陆以及经由阿肯吉尔的北极圈贸易路线，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关系和贸易平衡？这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如何？以及在前面提到的总数后面隐藏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是如何调整的？

【261】

阿特曼教授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对东欧估计的贸易平衡情况进行了校勘整理，其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是片段性的。其中一些贸易平衡仅仅是个别年份的数据，例如 1558 年和 1640 年的维堡（Viborg），1632 年和 1683 年的里加

(Riga)，1641 年的坎尼斯堡。其他一些数据跨越较长的时期，例如纳尔瓦(Narva) 1583～1588 年，1595～1598 年，1605～1608 年；斯摩棱斯克 1673～1679年；但泽 1583 年，1634 年，1640～1649 年。另外一些数据只包括商人中的个别团体，例如俄国人 1606～1612 年在塔林（Reval），1677 年、1679 年、1680 年在里加；英国商人 1699～1670 年在纳尔瓦和阿肯吉尔。所有这些估计数字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东欧的出口盈余通常占进出口总值的 30%～40%。例外的情况包括 1558 年的维堡，1605～1608 年的纳尔瓦，1641 年的坎尼斯堡，1640～1649 年的但泽，这些年份的出口盈余有些低。用阿特曼的话说，"因此我们可以确信 16 世纪后半期和 17 世纪前半期波罗的海港口的出口，大约是同期这些港口进口的两倍。这与 A. E. 克里斯泰尔森教授由海峡的波罗的海贸易的记录计算而来的结果非常相近。"

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陆上贸易。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更不可信的，对由此得出的结论必须有所保留。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总的贸易平衡，似乎显示【262】东欧在 1500～1650 年间出现了贸易盈余。因此，斯摩棱斯克的海关记录显示着这种贸易差额由贵金属的支付予以补偿。顺便提及，斯摩棱斯克也是外国货币交易中心。至于波兰的贸易平衡情况，就更复杂了。波兰的贵金属沿着与俄国和土耳其的边界出口，但是，波兰与德国边境的贸易平衡可能是有利于波兰的。通往莱比锡（Leipzig）和布雷斯劳（波兰西南部城市弗罗茨瓦夫）的商路上的两个海关波兹南（Poznań）和奥斯莱斯劳（Ostrzeszôw）的记录，也支持这个结论。当前研究人员的全面的观点认为，波兰总体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也是有盈余的。对匈牙利的贸易平衡情况，Gy. 艾姆伯和帕克(Zs. P. Pach) 教授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16 世纪匈牙利拥有相当的贸易盈余，这些盈余主要是建立在向西出口牛和铜的基础上。帕克教授认为，16 世纪的波希米亚也用于贸易盈余。

上面所讲的有关陆上贸易关系的论述，包括的时期直到 17 世纪中期。随后出现了一个转折。这时匈牙利的牛贸易和铜贸易开始了明显的下降，由此推测，结果是匈牙利的贸易平衡由盈余变为赤字。这时波兰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30 年战争严重妨碍了从波兰一立陶宛地区向西的肉牛出口。波兰城市将市场拱手相让给布雷斯劳、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莱比锡的交易博览会对于波兰、俄国和中欧、西欧的贸易极具重要性。来自美洲皮毛的竞争也破坏了俄国的贸易，而俄国的皮毛贸易直到 17 世纪末还占有垄断地位。莱比锡市场的情况显示 1750 年左右，东欧的贸易是有赤字的。由此推测说 1650 年前后东欧的陆上贸易已经发生赤字，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要记住，1750

年的情况与1650年的情况有巨大的变化。至于俄国市场和中欧市场贸易的条件，阿特曼教授认为，直到1700年前后政治和经济情况改变之前，俄国似乎一直未出现贸易赤字。

现在，当我们再一次转向经由波罗的海的商业交流时，我们就会发现，1660年左右也是它的一个转折点。直到17世纪中期前后，荷兰在这种贸易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接着，荷兰在这种贸易中的地位相对衰落了，这主要是来自英国的竞争造成的。直到17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一直是有盈余的，但在这之后，英国进入了一个贸易赤字逐渐增大的时期，这部分原因是不断增加的海军储备和铁的进口造成的。荷兰影响力下降【263】的更进一步的原因是谷物进口的减少，尤其是来自但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17世纪中期以后，波罗的海贸易中的赤字在荷兰和英国之间分担。

长期以来，用荷兰瑞克银币和达克特金币偿付出口盈余已经成为惯例。商业实践朝着更多地使用汇票的形势发展，在整个17世纪汇票都是波罗的海贸易的工具。英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多地使用在阿姆斯特丹提取的汇票来进行结算，只有一小部分靠来自英国的贵金属结算。17世纪中期，票据市场也形成了一个转折点：传统的、不灵活的、不流通的外国票据逐渐为一个现代体系所取代，这个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流通性。借由从荷兰向波罗的海出口金银做媒介，阿姆斯特丹的汇票成为贸易的最后支付手段。然而，在波罗的海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俄国市场，依靠金银出口来进行贸易结算一直持续到18世纪。波兰—立陶宛地区和瑞典的情况是混合的，既靠汇票也用金银作为结算手段。莱比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汇票的清算中心。

我们在此所勾勒的体系和17世纪后半期贵金属的短缺紧密相连，这个时期来自美洲的白银进口逐渐减少，而非洲的黄金开采量也在下降。这个时期和18世纪前半期，有许多年发生了严重的白银危机，金银的比价也上下波动。前述的东印度公司强劲的白银需求也导致了白银的供应来源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多。众所周知，巴西的黄金开采始于1690年，这使得荷兰的可兑换银币（包括银达克特和瑞克银币）更加昂贵。当18世纪40年代巴西的黄金产量剧增时，银价的上涨趋势加强了。金价的下跌，导致金达克特（作为贸易补偿物的一部分）实际上大量地从东欧流回荷兰的奇观。【264】

4.4 市场及其组织

"战争、商业、海盗，它们是一丘之貉，而并非互不关联"是一句包含真理和诗意的格言，弗雷德里克·C·劳恩（Frederic C. Lane）和亚历山大·格尤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最近对此很有兴趣。国家对贸易的态度受此影响。公众经常讨论一些商品在本国的供应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这些商品并非在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视其为战略物资或者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但这些商品对许多国家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必需品。此类商品的大多数都是需要极大的运输能力的巨大笨粗的商品，例如盐，蛇麻草和谷物，硝石和黑色火药，木材和木制品，柏油，树脂和大麻，各种金属，武器和布匹。

在每一个国家，此类商品的供应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国家对硬币和金银的流入、获得国外的贷款以及获得与城镇开展贸易的权利的关心，都与此有关。使用少量的当时的统计资料再加上更理论化的思考，用商业的比较差别来解释贸易流向和贸易路线，这是极其诱人而又值得尝试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记住：对当时的政治算术、占主导性的地缘格局和天气状况的熟悉，通常要比使用贸易条件和边际效用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受到国际专业化分工影响的19世纪、20世纪的合理的经济理论，在一个资源转移非常困难，而且技术条件又给资源利用设置了极限的时代，它的应用是有限的。贸易总体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每个国家或城市商业政策的目标，就是确保其在总的市场份额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这就是国家所关心的事情。这样做的动机和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

此外，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贸易提供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近代早期欧洲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许多国家持续性的财政赤字，这也是部分学者最近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对土地和收入征税，在征收和政治方面都充满了困难，而对外贸易却是一个合适的征税对象。它的进行需要依靠货币，因此就可对其以货币的形式征税。对外贸易的从事者是在国家的支持【265】下与国外维持商业交往的，因此，国家就可以要求其有所回报。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征税的一部分可以转移到外国人头上。虽然这有可能招致报复，但是，对外贸易越是对国家重要，国家和商人的关系越是紧密。最后，对外贸易在地理上的分布形式——边界和交叉点界限分明——也使得在选定的地点

对其进行控制和征税都变得相对地容易。

海峡的通行税的征收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通行税，来源于对西北欧最大的贸易大动脉过往船只和商人所征收的关税，最初起源于中世纪时期和瑞典南部的斯柯瑙市场有关的税。发展到近代早期，它演变为一种过境税，名义是弥补确保船只安全通过卡特加特海峡不易通过的水域的必不可少的灯塔和浮标的维持费，实际上成为丹麦国王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这些税款用专车经过短暂的距离从科隆堡（Kronborg）运往弗里德里希堡（Frederiks-borg），在这里，用筛硬币的格栅和嵌入式的斜槽挑出硬币，在国王所用的密室里数好后，滚入城堡的地窖的金银财宝中。就像一首童谣所唱的："国王在计数室里数他的钱"。通行税就这样成为所谓的**国王私用金**（Privy Purse）。有关它的政治和行政历史——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包括了和对外贸易以及国家财政有关的整个复杂的权力争夺游戏。

上述事情的状态也许最清楚地反映在对市场的规则中。市场通常被认为是卖者和买者在一定的地点，在一定的时期内为了交易而不断重现的集会。卖者可能就是生产者，买者可能就是消费者，但这并非是必要的条件。有许多组合形式以及中间形式都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在现实中遇到。对市场的管理是由国王的与领土有关的垄断权而来的，其中一项就是对土地、通行和贸易征税的权利。这是以保护商业和平的名义进行的，其中包括：商业本身的法规和条例、在相关的陆上和水上商路的安全通行，以及维持和保养运河、港口、道路、桥梁、关口等等。地方上的城市和市场通常也是建立在国王的领土上的，而且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建立市场和地方城镇使皇家垄断权的观念很快就确立了。在中世纪，诸侯在其特许政策中往往表现出对建立商业城镇（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范围更广的）的偏爱。但是，在很长时期内，在地方城镇和大城市之外，也存在许多商业中心。【266】

市场的数目是众多的，从日常市场（完全具有地方特征的）到每周一次的市场（附近农村地区的农民和工匠带着他们东西来到集市上），再到那些春季和秋季举行的市场（这类市场的时间安排常常和宗教节日恰好一致）。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秋季市场，是最重要的市场形式。它也有可能在城镇外面举行。在秋季市场上，外国商人常常买走一个主要地区的全部农产品，他们也为农民和市民提供进口产品。国际贸易展览会就是由秋季市场发展而来的，这是一种统治者偏爱的、令人羡慕的市场，它将大规模的贸易吸引到他们的辖区。

汉堡郊外维代尔的牛市，是一个两年举行一次的农村集贸市场，它举办

的时节正好是牛群从北向南来到这里的时候。人群、牲畜和车流在集市上、在农家场院和牛棚、在街道上成群结队地四处拥挤。德意志人、下德意志人、丹麦人、弗里斯兰人以及荷兰人都来到这里。逐渐出现了罗兰（*Roland*），即集市法庭的徽章，在其下是裁决争端的法庭。当卖者和买者在记录簿上写下他们讨价还价的结果时，契约就达成了。如果交易的仅仅是几头牛，那么就用现金结算。而如果交易涉及的金额比较大，那么结算就经过德国代理人进行，然后再用现金或银行汇票对他们进行偿付。除了作为汉堡的供应品来源地之外，维代尔市场对其还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来自货币的流通。诚实是商业交易的根本。契约的签字盖章一般会在集市附近的一个旅馆喝酒时进行。人们通常在上午交易，在下午结算。现金在人们之间转手，一般缝在毛巾布里或者装载亚麻钱袋里，外面标明其数量。低地国家富有的农民来此购买牛并对其催肥，然后在稍后的时间里卖掉它们。农民将他们的钱袋放在旅馆里，旅店老板将这些钱袋放在其卧室的一个木箱中。农民在需要时会随时取走自己的钱袋，他们从来不会怀疑有人会动它。一旦集市结束，维代尔就恢复平静。把瘦牛赶往离城镇比较近的地方，在那里养肥它们。从北方和牛群一起【267】来的赶畜人又长途跋涉赶回去，他们的帆布口袋装着少量的便于携带的商品，例如靴子、笔记簿，或许还有少量的读本。他们把这些东西再卖给日德兰半岛的农民。商人将他们的钱装入密闭的铁箱中，用马将其运往北方，然后再与农民进行结算。在运送钱款途中，商人们希望能避开埋伏在旅店之间的、人迹罕至的荒野中的盗贼。维代尔的夏天很平静，没有什么交易活动。一到秋天，为 11 月的集市做准备的活动就开始了。一切又重演一遍。

在有关欧洲的市场集镇和贸易路线兴起的争论中，堆栈这个概念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较老的商业史著作特别关注堆栈政策，对这种政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有关的法律文件之上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中世纪，这是伟大的城市起源时代。然而，堆栈问题在近代早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它既表现在新的商业中心的兴起，也表现在早已形成的商业中心的衰落。近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阿姆斯特丹作为 17 世纪欧洲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商业中心的地位。这个大城市显著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和其实施的政策以及市场的组织有关？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堆栈政策中使用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在 1500 年以后从地方层次和地区层次传播到全国。

简单地说，“堆栈”（staple）——有时也称其为“储运仓库”（entrepnôt）——这个术语的含义是指在特定的城市或贸易中心引导特定的贸易和商品。谁来指导以及引向何方取决于时间和地点。在堆栈政策后面隐藏着各种各样

不同的利益，有时它们是一致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建立堆栈主要是想引导过境贸易经过某一特定的地区，这个地区要强制性地转载这些经过的商品，可能还会有一个公开声明的有关进出口的关注重点，这会决定（或者说引导）进出口地点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有很多因素混合在一起发生着作用。堆栈一旦建立起来，就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商人会来到商品所在地；缔结契约，记录交易；具有引导性的价格在这里形成；整个商业组织都在扩张，信用体系也在扩大；保险机构和其他降低风险的机构得以出现；一系列的间接作用都对堆栈所在地的经济生活有利。然而，强制性地引导贸易也能产生消极的后果，特别是过境贸易掌握在外人手里时。这时，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过境贸易就具有明显的消极性，因而，这种贸易的间接作用是有限的。广大的腹地有可能经济停滞，而且无论是仅限于当地利益还是由外部控制，持续的堆栈政策可能阻止关联的地区利用经济繁荣或者结构变化提供的有利机会。一项堆栈政策的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大概和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总体来讲，海上的堆栈贸易中心比起陆上堆栈来说，更具有可行性，而且更有利可图。【268】

堆栈前进的方向也可以说就是生产者的利益。堆栈的思想本身就包括商业组织和公司在国外选择地点，并在这些地方实施集中销售，并以此为中心在同业公会一般规则之下将其成员连接在一起。英国布匹贸易史中有这方面的例子。15 世纪佛兰德著名的纺织品生产区需要英国的羊毛做原料，但却不需要英国的布匹。安特卫普是使这个地区第一个允许英国布匹进入的城市，结果是，在 16 世纪前半期，它成为伦敦商人在欧洲大陆最卓越的市场型城市。通过安特卫普，英国的布匹到达德国和南欧部分地区、意大利和利凡特。但是英国商人并未局限于安特卫普，他们也在米德尔堡（Middelburg）和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积极活动。16 世纪随后不久，当安特卫普不再是主要的市场，以及 1563 年荷兰禁止进口所有的英国布匹和其他羊毛制品时，英国的商人冒险公司（the Merchant Adventurers）已经足够强大，他们不再需要佛兰德的商业和金融支持。这时，但泽、波尔多和里斯本也有其贸易堆栈。1564 年，爱登（Emden）被封锁。法兰克福的贸易博览会就是从那里暂时迁移过来的。英国商人的活动范围还达到纽伦堡。汉萨同盟城市不得不屈服。1567 年，汉堡与商人冒险公司协调获得有利的条款，它可以向那里转运堆栈货物。1578 年，来自汉萨同盟其他城市的压力迫使汉堡谢绝了英国人再次给予的特许权利，这样爱登和斯泰德（Stade）就成为英国商人堆栈仓库的首选地。但是汉堡于 1611 年和英国重续协议，

商人冒险公司又重返易北河港口。这个港口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由此既可以经法兰克福向德国中部出口，也可以经由陆路出口意大利。

英国的出口攻势引起其他人的敬畏，但也带来苦难，特别是在德国商人【269】中间，他们都在谈论英国人的骄傲和自豪。英国的布匹商人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四处奔波为其商品寻求销路，他们有办法使消费者来到他们指定的少数堆栈仓库所在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消费者。他们允许顾客在每星期的特定的某一天来观看布匹，通常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这就是所谓的展览日（在荷兰称之为 tooneeltase）。在每星期的其他时间，就只能就已经看过的布匹缔结合同。这种卖方市场也表现在销售条件以及所宣称的国籍原则中，国籍原则禁止英国商人将他们的商品转交给外国商人，以便委托他们进行销售。

当时的出口体制是众所周知的：商人在责任自负、风险自担的基础上从事贸易，他们组成有规章制度的公司，在指定的市场上，共同遵守有关运输和销售商品的规则。最古老的这类公司就是商人冒险公司，1564 规定的它的市场范围是索姆河（Somme）和斯考之间的广大地区，汉堡是其主要的商业中心。1579 年把波罗的海地区划分给东方公司（Eastland Company），但泽、坎尼斯堡和易北河沿岸地区（Elbing）是其堆栈所在地。与俄国的贸易在 1555 年指定给俄国和莫斯科公司，阿肯吉尔是其堆栈所在地。1562 年建立了利凡特公司，1605 年的特许状限定其经营范围为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为其仓库所在地。

为了将本市的贸易专有权以及购买和运输腹地商品的独占权授予自己的市民，许多城市的宪章所体现的原则，都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建立小规模的贸易堆栈的权利，目的是为了将城市发展成为国内贸易中的商业中心。通过禁止外地人或外国人在该城市以外的地方购买某种商品，或者通过给本地的百姓提供贷款，当局努力保护本地居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城市宪章同时还意图促进本市的贸易的发展，以及确保本市居民的商品供应。当局希望在这种宪章的保护下，形成本地或本国的商人阶层。这种愿望在纸面上看来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因为强大的生产者利益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来，他们依惯例在国内和国外经营他们的贸易。城市附近的老百姓在集市日售卖他们的农产品，而从别处来的商人在每年举办一次的市场上自由地进行交易。最重要——从城市当局来看是最令人厌烦的——的是贵族和大地主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交易。许多地方都试图将这种交易的规模限制在仅【270】仅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程度上，但是，欧洲许多谷物和畜产品生产地区都存

在活跃的、规模很大的贸易，而且从事这些贸易的正是贵族。在许多地方，这种生产者利益非常巨大，以至于达到不顾本国商人，企图越过他们而经过规模巨大的堆栈进行出口。

波罗的海地区提供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谷物贸易繁荣时期的波兰贵族和但泽城之间的关系。15 世纪，但泽逐渐从吕贝克和条顿骑士团的势力下独立出来，最后波兰成为其宗主国。凯西米四世（Casimir IV）给予但泽进行堆栈贸易的权利，以及各种各样的商业和政治垄断权，同时还给与但泽商人——既有当地人，也由主要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移民——广泛地进入波兰腹地的权利。但泽很快就超过了易北河沿岸地区、卡尔姆（Culm）和托伦（Thorn），占了从维斯瓦河来的出口商品的绝大部分。这些商品主要有谷物和木材，此外还有钾碱、树脂和柏油。在相反的方向，波兰广大内地也经由但泽获得盐、布匹和其他西欧商品的供应。在 15 世纪，内河贸易的绝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封建农场主和城市商人的手中，拥有大地产的波兰贵族受到繁荣的经济形势的鼓舞，开始表示出对经由但泽出口谷物到西欧的兴趣。由此商人就成为拥有大地产的贵族的代理人，贵族们甚至在但泽安插外国商人。查理五世的特使马克西米里安·特兰西瓦纳斯（Maximilian Transylvanus），感谢波兰和普鲁士贵族出口的谷物。但泽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最强大的城市。

生产者利益集团寻求支配地位的程度，可以由 1565 年波兰国会一项著名的议案来说明，该议案禁止波兰商人出口波兰商品、进口国外商品。这项法律从未实施，因此但泽的商人大难不死。大商人从谷物贸易的繁荣中获得大量的财富，但是其他波兰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却因但泽和大土地利益集团的结盟而遭受损失。高昂的谷物价格使得国内，特别是首都以外地区城市的生活费用升高；同时，西欧的工业品和手工艺品进口的增加，使得国内的生产者陷入困境。隶农制的引入，废除了农民土地并将其并入庄园，这一切都使小农阶级变得贫穷，而这又进一步妨碍了地方城市的发展。【271】

国王或诸侯引导贸易经过城市从而对其控制的财政考虑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诸侯也将自己的贸易引导到城市市场，从而对其提供支援。他们在城市处置自己的以实物形式征收的税和费，或者出售自己土地的出产物。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诸侯可能更愿意将这些货物越过首都性的大城市、地方城市以及本国的商人阶层，直接销往国外。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国外购买者强大的势力以及他们自身财政上的软弱。

常常是获得贷款的机会决定了堆栈贸易中心的选择。瑞典皇家贸易不同

的堆栈中心说明了这一点。瑞典国王从产铜人（*bergsmän*）——采掘和冶炼自有铜矿的小生产者，收取铜作为其实物税收。另外，瑞典国王还用铜来结算他们在国外的债务，他们自己也生产铜。在中世纪主要由产铜人和铜出口者进行的铜贸易，渐渐地对王室财政变得极为重要。16 世纪，无论是在瑞典努力与荷兰和西欧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从而脱离吕贝克的贸易垄断方面，还是在控制西欧和俄国经由波罗的海的商业交流中的努力中——这是瑞典对外政策两个持续的主题，铜的角色都越来越重要。斯德哥尔摩是瑞典国王钟爱的销售地，但是他们也尝试寻求其他销售出路以及销售办法，不时地与外国商人缔结大额的商品出口合同。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统治时期，人们尝试建立经由瑞典卡特加特海峡沿岸的勒杜斯（Lödöse）与西欧的直接贸易联系。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经由陆路将铜运到勒杜斯使得其价格非常昂贵，以至于竞争不过经由海峡通过海路运到斯德哥尔摩的铜。40 年代，瑞典国王试图建立一个贸易公司，由其将铜和铜片运往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将精铜运往东欧。但是，这个计划同样无果而终。

16 世纪 70 年代，当瑞典铜产量急剧增加时，瑞典国王企图建立铜的贸易垄断以图控制供应、维持价格。1580 年的一项法律宣布国王拥有收购产铜人所生产的铜的权利，同时还建立了铜的出口许可制度，以防止除国王库存之外的铜的出口。这种供应垄断政策在 1582 年和 1585 年得以继续，但在 1588 年不得不废止。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努力，国际市场【272】上的铜价依旧低迷，部分原因是由于产铜人的不满。作为取消垄断的补偿，国王对未来的铜的贸易征收特别税。90 年代，经济前景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使得对瑞典铜的需求大大增加。脱离吕贝克这个主要市场的目标终于达到。这时阿姆斯特丹成为领头羊，汉堡和吕贝克成为并列亚军。此后的瑞典铜出口史（在其他部分有详尽的叙述），表明了瑞典国王是如何通过使这些市场相互争斗而处心积虑地寻求支配地位的。

如前所述，在堆栈政策中，与进口有关的各方利益也许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要协调出口各方的利益常常更加困难。在这里，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在决定堆栈在国际商品交易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单独的政治因素并不能决定事情的结果，也就是说广泛的经济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通过对阿姆斯特丹的情况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更明白这一点。它在 16 世纪、17 世纪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有一点显而易见：政府的政策在它的发展中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阿姆斯特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15 世纪后半期，阿姆斯特丹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航运政策，这是后来它具有领导性地位的因素之一。1471 年和 1473 年的政策规定：所有从波罗的海来的由阿姆斯特丹人担任船长的船，必须经过马斯迪普（Marsdiep）、弗利（Vlie）或其他海上入口到达阿姆斯特丹。这个规定同样也适用于那些船长是外国人但船主却是阿姆斯特丹人的船只。这个规定即早期的航海法令，它的目的在于对抗吕贝克，以及反对波罗的海地区和佛兰德地区（主要是布鲁日）的直接贸易。汉萨同盟的章程中也有此类似的规定，它要求其成员将布鲁日作为其堆栈所在地。这些航海条例，显示了争夺从波罗的海来的堆栈商品的控制权的激烈竞争。总体而言，政府对阿姆斯特丹市场的态度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消极的，在那个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荷兰是人们常常引用的实行自由商业政策的例子。然而，正如克莱因教授指出的，我们不难想像一个消极的态度和积极的政府政策产生相同的决定性影响的例子，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政府的政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中性的。【273】这种消极的态度正好是阿姆斯特丹的堆栈贸易所需要的。

在这方面，17 世纪中期的形势很能说明问题。这时的阿姆斯特丹害怕来自汉堡和敦刻尔克（Dunkirk）的竞争，特别是谷物贸易方面的竞争。法国积极地将国际贸易吸引到敦刻尔克，加深并扩大了它的海港，并加强其军事设施。敦刻尔克在运输网络中的地理位置，极其适于连接人口稠密的佛兰德各省和布拉班特地区，这些地区都是阿姆斯特丹谷物贸易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后来敦刻尔克获得了自由港的地位。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的商业交易正苦于进出口税的折磨，这些税在 1651 年提高了，这部分是由于财政原因（正在进行的海上战事需要金钱的支持），部分是由于西兰岛（Zeeland）的农业需要增加谷物的进口税，以此来保护国内市场。西兰岛这些年来一直遭受粮价低贱之苦。增加的关税，特别是更高的出口税，使人们没有理由不担心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发展。从荷尔斯泰因和波罗的海来的运粮船开始绕过阿姆斯特丹的堆栈，直接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1661 年，阿姆斯特丹废除了出口税，但仍维持了进口税，虽然其执行并不严格。阿姆斯特丹的自由放任政策又恢复了。直到 1713 年之前，敦刻尔克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这一年，英国人迫使法国放弃将敦刻尔克作为一个堆栈，因为英国被这个自由港及其偶尔的强盗掠夺行为所激怒。

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不能直接说阿姆斯特丹理应成为北海和西欧供应贸易的中心。因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城市在起初也与阿姆斯特丹一样处于同样有

利的位置，它的航运业在中世纪后期并不具有对荷兰和西兰岛其他城市的优势。这些城市在国际贸易中也很活跃，它们不仅与波罗的海开展贸易，而且也向西与佛兰德和法国开展贸易。盐、葡萄酒和其他商品都集中在这里。和阿姆斯特丹一样，它们也在鲱鱼业上具有某些优势。从 15 世纪开始，这些地区的渔场从斯凯恩南部的水域转移到了北海。中世纪后期荷兰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布匹和啤酒，其中布匹是用英国的羊毛作原料的，而啤酒是用蛇麻草酿制的（蛇麻草是当地的特产）。荷兰同时还出口鲱鱼、盐、葡萄酒、灯油和肥皂。荷兰的竞争主要是和汉萨同盟城市展开的。汉萨同盟传统的从诺【274】夫哥德罗（Novgorod）到吕贝克，经由陆地到达汉堡，并由此经海路到达佛兰德布鲁日的贸易路线，被一条经由斯考的直接海上航线（即我们所知的**不经过陆地**的交通线）所包围。

1451～1456 年，汉萨同盟对佛兰德的禁运帮助了荷兰各城市，普鲁士和波兰之间的战争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战争期间，在汉萨同盟授权之外的通道上，特别是在温迪，商业联系逐渐确立了。特别是**闯入者的港口**（*Klippehäfen*）引人注目的使用，贵族和农民都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这里销售。有两个**普通仓库**，分别在坎尼斯堡和玛利堡（Marienburg），它们都属于条顿骑士团所有。1669～1674 年，汉萨同盟和英国的争斗使得一度兴旺的英国—波罗的海贸易几乎完全停顿，这使荷兰各城市的贸易受益匪浅。荷兰也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脱离汉萨同盟商业霸权的努力。15 世纪的最后 10 年，德国南部商人同业公会，尤其是富格尔，在西欧尤其是在安特卫普展开积极的贸易活动，这也对荷兰产生了决定性的好处。这个商人同业公会通过将匈牙利的铜向西经由克拉克夫和但泽，或经由汉堡运往安特卫普，与汉萨同盟，特别是吕贝克展开激烈的竞争。佛兰德和意大利之间的横贯大陆的贸易，减少了汉萨同盟在西欧的贸易。汉萨同盟在古老的堆栈地布鲁日的贸易，也逐渐被安特卫普蚕食。后来斯凯尔特河的关闭对安特卫普的打击，也为荷兰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进一步的准备。

在探讨荷兰城市成功的原因时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它就是日益增长的欧洲贸易，特别是沿着里斯本和但泽的东西商路的运输者。里斯本是主要的食盐和香料的供应者之一，但泽是主要的谷物供应者。这两个商业中心的地理位置处于商路的两个终点，涉及市场的季节波动，这也许就部分地解释了荷兰作为中介者的作用。每年新产的谷物到达但泽谷物市场的时间，正好就是东方新产的香料到达里斯本的时间。然而，香料来的太晚了，赶不上最后一只从里斯本开往波罗的海的舰队。而荷兰人却处于非常有利的控制这种中

间贸易的位置，这样，里斯本的香料和波兰的谷物都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到达荷兰。商路两个终点站的商人相距太远，他们无法依据从另一方得到的信【275】息而做出商业决定，而荷兰所处的中间位置非常利于它利用两端的市场。这个中间站的存在也可以加快经营贸易的资本的周转速度。

荷兰从未怀疑波罗的海航运和贸易对荷兰北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性，它们称这种贸易为“母亲贸易”或“贸易的灵魂”，而其中的谷物贸易被形容为“这片土地上所有贸易的根源”。我们关于这个时期初的阿姆斯特丹贸易的少量知识，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到1500年，波罗的海航运支配了莱茵贸易，佛兰德和法国北部的贸易，法国西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即船开出时所装载的货物（大多数都是压舱物）少于返回时装载的货物。波罗的海航运所遵循的路线是从阿姆斯特丹到波罗的海然后返回，或者从阿姆斯特丹往西到达一个港口，例如布罗阿日（Brouage），然后再直接到波罗的海，最后返回阿姆斯特丹。

当对谷物贸易进行详细的分析时，我们不难看出谷物贸易的踪迹：它从许多地方性的市场集中到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堆栈，最后到达荷兰人经营的阿姆斯特丹世界市场。这种景象就是市场的层级排列，就像大缸里的水最后都汇集到蓄水池一样，而阿姆斯特丹就是蓄水池，它有引人注目的一排一排的粮仓和著名的谷物交易市场。大城市以外的层次较低的贸易，是断断续续地在季节性市场或者交易博览会上进行的，而阿姆斯特丹大市场上的交易却非常频繁，商人每天都可以进行交易。意大利历史学家古齐亚迪尼（Guicciardini）将其形容为一个永不停息的市场。

范德尔·库伊（van der Kooy）博士描述了这个市场体系的运作机制。依他看来，整个体系的中心市场所在地应该位于海岸上，因为海上航运对大体积货物在市场之间的运输至关重要。而陆上的堆栈面向中心市场分布成网络状。中心市场本身就能够提供任何可以想像到的便利：银行、邮局、保险、储藏、港口、有关商品的知识、加工处理原料和半成品的设施、市场专家、包装设备等等。它同时也是世界各地其他市场的票据交换所。这个中心市场本身自我运转，而且积累资本。但是范德尔·库伊并未真正地解释为什么阿姆斯特丹恰恰成为这个巨大网络的中心，他以“自然的、民族的、偶【276】然的因素”和对市场的三种功能——进口、储藏和出口——的区别的强调，回避了问题的真正所在。他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商人群体来执行这三种不同的功能。进口由“海上贸易者”掌握，他们研究世界各个地区而且奔波于其

间。储藏功能由"二道贩子"来执行，他们专门研究各种商品，他们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他们的储藏在供给和需求不平衡时起着缓冲器或者减震器的作用。阿姆斯特丹的第三种商人由"出口商"组成，就像他们的名称所显示的，他们负责把商品分配到世界各地。

后来的学者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范德尔·库伊的解释。我们可以恰当地指出：17 世纪繁荣时期的阿姆斯特丹市场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像他区分的那样明显。相反，进口、储藏和出口经常都是由同一个公司或同一个人进行的。这一点尤其对那些从事所有这三个领域的经营活动的大商人成立。地区或者商品的专业化也不是 17 世纪的特征，实际上这是 18 世纪随着堆栈贸易的成熟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地区和商品的专业化不能用来解释堆栈贸易的出现和成长。但是，在以上的三种功能之间做出区分，以及研究它们在实际中是如何执行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克莱因教授最近发起了一场对范德尔·库伊堆栈模型的积极的批评。

克莱因试图用一系列的更具活力的评注来补充范德尔·库伊的研究。在评注中，克莱因努力将范德尔·库伊的有关仓储设施的发展具有平抑价格功能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有关荷兰市场具有垄断趋势的观察结果相结合。尽管过去的文献一般都认为垄断是有害的，但克莱因却援引熊彼特的垄断理论争辩说，在一定环境下的垄断趋势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可能是具有生产性的。一些像尼古拉·威廉·波斯托缪斯的学者，过去就在交易所商品价格表现行为的基础上，证明荷兰市场上许多商品都表现出明显的垄断趋势。然而，波斯托缪斯的数据资料具有如下的缺点：这些数据明显地主要来自阿姆斯特丹市场较新、较成熟的阶段，即 17 世纪、18 世纪。【277】垄断的企图尤其表现在供给方面，这方面的不规则性和不可预见性特别大，而商品销售表现出较小的波动。垄断趋势在一些商品中表现强烈，例如铜和香料。

建立垄断需要足智多谋。我们发现了横向和纵向结合的例子，也发现了有时单个公司的实力非常强大，以至于聚集大量存货达到垄断，使它们的竞争对手无路可走。我们将依靠政府当局（包括本国政府和外国政府）的支持而建立的垄断称之为合法垄断。那些在海外航运中享受专有权的大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最后还发现了另一种垄断，它是运用信用武器将外国的某种产品的供应集中在一个出口地。垄断通常存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垄断的趋势却一直存在。这种垄断性的实践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因而减少了交易的成本。在一个波动很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预见的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上，垄断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在计划的时间实施计划好的交易。交

易条件变得更加精确，而且毁灭性的价格波动变小。克莱因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市场变得更加“透明”了。我们发现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堆栈贸易中，毫无疑义的存在理性计算的企业家和市场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不管在欧洲进行比较，还是在欧洲以外进行比较，我们都会发现永久性市场［即建立在货物贮存（无论是实物存储还是存货所体现的资本）基础上的市场和其他建立在设施设备基础上的市场］和较小的不定期的市场（即辅助性的服务尤其是信用缺乏的市场）之间存在惊人的差距。许多年前，就有另一位荷兰学者范勒尔（van Leur）博士，在他对 1600 年前后亚洲集市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种区别，他的研究受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在这种市场体制中，他将流动商贩，即拿着少量商品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商人，提高到中心位置。个别拥有相当大资本的商人的存在并未扰乱他的视线，他将这种特殊的现象称为“政治资本主义”以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依范勒尔的观点，这种市场结构有两个特征：一是缺乏凝聚力，二是存在相当多的市场，“有多少城镇和港口，就有多少市场”。

最近，丹麦学者斯丁戈德（Steensgaard）博士，在对 17 世纪早期欧亚贸易结构危机的饶有趣味的研究中，揭示了这一点。他详尽地考察了突然降【278】临到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海峡（Hormuz）的这场灾难。由此，他进一步发展了范勒尔的见解，他将其与劳恩教授的保护费理论和范·克拉夫伦（van Klaveren）教授的腐败理论结合在一起。在前工业化时期，无论在欧洲还是欧洲以外的地方，保护费都是生产者和商人的一个基本的费用项目，因为权力的运用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还形成了分配可供应商品的基础。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正式的权力运用者，即政府，而且也适用于它们在地方上的代表。在贩运货物中，保护费通常超过运输费用。在斯丁戈德理论中，西欧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中东打败沙漠商队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将保护费内在化，这其中涉及向当地的统治者上交贡物，由此降低了保护费，而且使其更易于预测。

现在我们联系欧洲市场上一些公司的准垄断地位。储存设施的建立使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实施稳定的价格策略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在长期内，可以比以前更加经济地利用稀缺资源。行商市场的透明度比较低，而且短期的供应弹性比较小，因而价格波动比较大，但是通过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市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与过去的制度相比，这些准垄断性的公司依靠其创新性对稀缺资源的利用更加经济。斯丁戈德认为，这使得在长期内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相关产品的价格是有所了解的这

个假设具有了真实性。

尽管以上有关这两种市场结构或体系的讨论，包含大量的基本的正确观察，但是这个“模型”不能普遍地、无条件地应用。它的正确应用取决于不同的地点和观察角度。霍尔木兹的情形到底如何，它本身就能够说明问题。原料和零售商品价格的长期下降并非一定来源于贸易组织，及其对稀缺资源的更好地应用。我们可以指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这个模型的普遍应用。

第一个情况就是范勒尔过分强调亚洲贸易的行商特征。亚洲贸易是范围很广的，包括许多种类。它既包括奢侈品也包括一般的大路货；从事贸易的【279】既有行商也有定点经营的商人。最近几年，许多当地的研究［由梅林科—罗勒弗兹（M. A. P. Meilink-Roelofsz）、阿拉萨拉纳姆（S. Arasaratnam）、莱乔杜里（T. Raychaudhuri）、久普塔（A. das Gupta）、欧姆·布拉卡什（Om Prakash）、英迪拉·阿南德（Indira Anand *née* Narang）等人进行］触及到了海洋贸易中这方面的主题，这些研究有助于将“亚洲贸易”这个模糊的、变动不定的概念分解成为更加具体、更有意义的概念。同时，也对欧洲商业史展开了这种多角度的研究。那些经由海洋运输商品的商人和在港口购买商品然后再倒卖的中间人，也应归入行商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发现市场与市场之间是通过有规律的商路相联系的，海上贸易尤其如此。这对价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贸易区的例子，行商在其中并不是特别显著。这个地区在从亚洲到欧洲的胡椒贸易中特别重要，无论是出口本国的主要产品——胡椒，还是再出口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商品，出口在马拉巴尔海岸地区的贸易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大多数胡椒都在距离海岸 50 公里或更远的内地，由佃农在其种植园里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出口主要集中在卡利卡特（Calicut）和科钦（Cochin），这里形成了实力强大的商人阶层，欧洲商人在这里拥有他们自己的代理商。通过代理人和一套预付制度，海港的商人在胡椒成熟前几个月就买断了胡椒。大部分胡椒并没有卖给欧洲商人，而是卖给来自北方的阿拉伯、古吉拉特和信德（Sind）的商人。马拉巴尔的商人，也将荷兰公司大量进口到当地的印度尼西亚商品转售给北方商人。马拉巴尔商人的财富和地位悬殊，单个的商人或家族性商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任何他们愿意的商品贸易。同时，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商业活动：进口、出口、零售、运输、信贷。商人们的独立性仅仅受限于他们需要保护，这通常由当地的诸侯来提供。和商人一样，繁

荣的贸易也是诸侯的利益所在，商人在得到贸易利润的同时诸侯们获得通行税。诸侯压迫商人的情况也确实有所发生，但在通常，一个大商人能够对付得了一个小诸侯，威胁要迁走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只要马拉巴尔地区还是处于小诸侯的分割统治之下，商人的地位就仍旧保持不变。但是，18 世纪政治情形有所改变，开始了中央集权的过程，这时商人的独立性就结束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更远的日本和中国，我们仍旧很难发现从事欧洲商业交流的行商。在这里，对外贸易处于中央政府严密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部分是通过政府官员，部分是通过向政府负责的商人行会或享有从事对外贸易专有权的商人。【280】1604 年德川幕府（Shogun Tokugawa Iyeyasu）颁布了贸易法令，政府据此监督管理葡萄牙人所进行的贸易。幕府支持京都（Kyoto）、堺港（Sakai）和长崎（Nagasaki）从事生丝贸易的大商人组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排他性地以议定的价格购买葡萄牙人进口的生丝，在其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再卖掉。欧洲人将这种体制称为盘卡达（pancada 或 pancado）。起初盘卡达仅对葡萄牙人的船实行，但是，后来葡萄牙人的贸易衰落了，中国人和荷兰人的船只也纳入了这种体系。长崎当局经常干涉生丝贸易，它购买进口生丝的大部分，然后在生丝价格上涨时抛售。通过这种方式，几乎控制了国内市场。无论在是在日本用自己船的时期，还是随后的 1635 年以后的时期——这个时期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运输掌握在中国船和荷兰船手中，出口贸易，尤其是贵金属和铜的出口，同样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进出口体制同样控制严密，而且有无数的限制条件，其中有一些可以追溯到欧洲与中国贸易的早期阶段，而另一些则是在 18 世纪中期欧洲和中国贸易密切时形成的。这种称之为洋行贸易的体制，将所有的出口商品经由欧洲公司集中到 10～13 个行商手中，行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外国商船的保证人，他们须为外国商人的行为负责。同样，所有的上缴费用和关税都要通过行商来付，而且一切申请都要经过同样的渠道。行商将代理许可出租给欧洲人，他们在规定的区域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外国人被禁止学习中国话，也不能自行打听中国内地商品价格和供应。

第二个削弱“透明度理论”的因素和垄断有关。新成立的公司通常寻求垄断、获准垄断。在某种程度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这些公司获得了各自政府所授予的在本国的垄断，即与好望角以东从事贸易的排他性的权利。但是，这些公司相互之间却在购买商品和出售商品方面进行着竞争。

所有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都集中在进口亚洲产品方面。首先，贸易的主

要目标并非为欧洲产品寻求在亚洲的新市场，而是为了向欧洲供应亚洲商[281]品。其次，这些公司出口经营所瞄准的市场并不是他们各自的本国市场，而主要是进行再出口，这最终需要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市场的需求做出相当精确的估计。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公司本身并不从事再出口的业务，而是将其留给私营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公司的商品拍卖会上购得商品。这些基本特征都强调了竞争因素。当我们对欧洲市场上的再出口贸易的结构和条件进行地理分析时，我们发现了可以相互替代的商品——例如欧洲的纺织品和印度的纺织品——之间的供给竞争。我们也发现具有相同气候的不同的地区出产同样的产品，例如来自爪哇、孟加拉（Bengal）、马德拉（Madeira）、圣多美岛、巴西和西印度的糖。不同气候的地区也可以供应同样的产品，烟草就是这样一种产品，它可以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栽培；丝绸是另外一个例子，它的供应来自中国、波斯和意大利；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的香料是第三种这样的产品；后来还有莫卡、爪哇和西印度的咖啡。金属的生产不受气候的影响，它的供应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日本和西印度的铜及来自中欧和瑞典的铜一起出现在欧洲市场上。

接下来我们要强调的是，把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授予一群商人是一回事，但对他们来讲，保持垄断却是另一回事。荷兰公司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它要防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荷兰市场。这些在16世纪90年代还相互竞争的当地公司，在政府的帮助下于1602年合并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旗下。但正如维奥莱特·巴布尔（Violet Barbour）博士指出的，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是国际资本家，他们在所有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做生意。对许多商人来讲，在任何情况下，爱国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宏伟但却是抽象的。那些在本国公司体系中找不到合适位置的人就会在自己的国境之外的地方，例如荷兰南部、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寻求发展机会。有许多荷兰人把自己的资本和知识给国外的竞争对手以和本国的公司竞争。由此，他们就在亚洲和欧洲扮演了某种闯入者的角色，这就削弱或打破了垄断。

众所周知，在英国这种闯入是非常严重的，以至于我们周期性地发现两[282]个或两个以上的东印度公司。它们之间竞争激烈，而它们的特许状有时来自国王，有时来自国会。1688年，政府的更替导致了闯入活动积极有力的恢复。1698年成立的“英国公司”是老的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尽管早在1702年就有一个合并这两个公司的协议，而且1708年政府批准了这项措施，但是闯入者仍旧进行着他们的活动。另外的原因在于国家对东印度公司的进口货物征收高额的税收，这就刺激了走私活动，因此就导致了闯入活动

的发生。在 18 世纪初的 30 多年中，英国边界之外出现了许多服务于走私者和闯入者利益的企业，它们在哥德堡、哥本哈根、阿尔托纳（Altona）和汉堡，但最重要的是在尼德兰南部的奥斯坦德。有许多英国人为这里的“奥斯坦德公司”服务，该公司的特许状是从查理六世那里获得的。

当在如上所勾勒的更广泛的背景，即欧洲市场中对各种各样的东印度公司进行考察时，我们就很难继续接受那种公认的、将其称之为准垄断企业的描述，更不用说是垄断企业了。然而，这并不排除来自东方的进口产品的转售中确实存在的垄断。我们已经指出，这些公司本身并不从事进口产品的转售，不管是当地少量的消费还是大量的再出口到国外。那么，这种再出口是如何实现的呢？1600 年之前和之后的这个问题都必须解释清楚，这样才能决定“市场透明度”理论的可信度。因为胡椒贸易在这个理论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对这个领域内的情况进行更详细一些的分析考察。

几乎没有其他贸易能像转售进口到欧洲的胡椒那样，清楚地表现出初期的资本主义精神。拥有资本的商人公会努力买到大量的来自大西洋和利凡特的胡椒，而且他们为了投机胡椒的转售和确保其获得最大利润而联合起来。胡椒特别适合于储存（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以一直保留到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出售。伴随着不间断的胡椒贸易中，不断地出现著名的大商人和商人财团。

1505～1506 年间，葡萄牙人垄断了印度贸易，这期间实施了一条惯例。根据这条惯例，无论是在里斯本还是通过在荷兰的代理人，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要全部或大部分卖给葡萄牙国王。意大利的瓜特罗蒂（Gualterotti）和阿菲【283】泰德（Affaitadi）家族，在 15 世纪前几十年在将葡萄牙人的进口商品输入佛兰德中居于主导地位。后来德国商人公会，特别是葡萄牙人和马拉诺人也在这里出现。将大西洋和利凡特市场上的胡椒，也就是将葡萄牙和威尼斯控制的胡椒供应集中起来统一控制的想法虽然从未实现过，但在 16 世纪却一直存在着。威尼斯的参议员在 1527 年建议葡萄牙国王说，除了葡萄牙本国的消费外所有的进口到里斯本的胡椒都应该由威尼斯来控制。1585 年，西班牙的菲力普二世通过合约将葡萄牙进口胡椒的销售权置于威尼斯人的手中。

1577 年葡萄牙人的垄断地位重新建立起来。进口香料的出售由“欧洲协议”控制，根据这个协议，一个公司或公会在一到两年内以议定的价格保证接受来自东方的进口货，而且利益自负地销售这些商品。与这个协议对应的是进口方面的“亚洲协议”，这个金融协定规定，签约人以固定的价格自负盈亏地将东方的香料输入里斯本的印度商行。没有必然的理由使得这两

种协定不能掌握在一个公会手中。1578 年，一个叫康瑞德·路德（Konrad Rot）的奥格斯堡商人，以意大利和葡萄牙公司为合作伙伴，试图达到这个目的。路德将欧洲的胡椒市场划分为“省”，并与其签订价格协议。路德卡特尔的总部是一家贸易公司，它设在莱比锡，是由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 I）为此目的而成立的。销往尼德兰、德意志帝国、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的香料都掌握在它的手中。欧洲其他地区的香料贸易掌握在这个公会的葡萄牙和意大利合作伙伴手中。这个选帝侯的连襟，即丹麦—挪威的弗里德里西二世（Frederik II），也从事胡椒的运输。然而，这个计划却无果而终，这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堡和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干涉。此外，利凡特市场进口香料数量的不确定性给价格的固定也造成困难。最后还有一个原因，路德无力按照契约筹集高达 40 万弗罗林（florins）的预付款给葡萄牙。

菲力浦·爱德华·富格尔（Fugger，Philipp Edouard）和屋大维·富格尔（Octavian Fugger）兄弟，在国际胡椒贸易中短暂而记录完善的活动，使得我们可以了解 16 世纪后半期的胡椒市场形势。1585 年富格尔兄弟在与葡萄牙人的合同中开始对胡椒贸易产生兴趣。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与韦尔瑟（Welser）商行和意大利的罗维莱斯卡（Rovalesca）商行一起参加 [284] 1586～1591年的“亚洲协定”。富格尔兄弟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被迫从“亚洲协定”转向“欧洲协定”。西班牙财政部是如此经常地缺乏现金以至于它常常陷入破产的边缘，它坚持要偿付其在亚洲协议中欠富格尔兄弟的金额，其中的先决条件就是反对一项欧洲协议，而且还威胁要将富格尔兄弟在西班牙—葡萄牙的资产充公。因而富格尔兄弟在 1591 年加入了一个为欧洲协议而组成的国际财团。这个财团包括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意大利的罗维莱斯卡家族和吉罗德·帕里斯（Giraldo Paris）家族，西班牙的弗朗赛斯科（Francesco）和佩德罗·马尔维达（Pedro Malvenda）家族，葡萄牙的安德里亚·希梅内斯（Andrea Ximenes）家族和托马斯·希梅内斯（Tomas Ximenes）家族。这个财团在许多地方都代表欧洲，但主要是在汉堡。货物运往位于汉萨同盟边缘的汉堡，来自里斯本的胡椒汇集到这里，而后在返回时将谷物运往西班牙和意大利。1591 年间，48% 的货物到达汉堡，23% 的货物经过易北河后上岸绕过海峡到达吕贝克，28% 运往阿姆斯特丹。因此，在短期内，汉堡继承了安特卫普在欧洲香料市场的地位，直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获得领导地位。富格尔兄弟对欧洲协议的参与是短暂的。他们早在 1592 年就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德布维拉（Ruy Lopez d' Evora），也就是托

马斯·希梅内斯家族的一个姻亲。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协议中的合伙人不遵守他们之间达成的价格协定。希梅内斯家族是从事葡萄牙胡椒贸易的老手，它为了清除以前的胡椒存货而进行了倾销。

新兴的西北欧东印度公司同样也并不亲自再出口它们运到欧洲的胡椒，它们也将胡椒卖给私营的商会和承包人。我们在这里同样发现大财团，它们购买胡椒的规模并不比16世纪的合同购买量少。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20年将其所有的胡椒都卖给了一个由艾利斯·特里普、格里特·范·斯库恩侯文（Garriet von Schoonhoven）、詹罗尼莫斯·黑茨（Jeronimus de Haze）和菲力浦·卡兰蒂尼（Philippe Calandrini）组成的国际财团。1622年，格特·德克茨·瑞达特（Gert Direksz. Raedt）、科尼利斯·范·盖姆彭（Cornelis van Campen）、汉斯·布鲁厄斯（Hans Brooers）公司买断了约10 000包（bales）的所有的进口胡椒。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保证在一整年内不再提供胡椒出售。而这个财团也保证买断下一年所有的胡椒。这项合同金额高达400万弗罗林，与此相比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阶段的股本为600万弗罗林。通过这项合同，我们可以衡量当时荷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而且在考虑到合同当事人也从事其他商品的交易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会更高。

这些重大的交易合同为我们提供了研究1639～1640年间胡椒贸易的极好机会。这其间的恐慌事件导致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42年放弃了按合同销售这种方式。作为最好的对付过度投机的手段，引入了拍卖销售这种方式。除了早年间将胡椒作为红息分给合股公司的股东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年中也按合同销售其进口的胡椒。合同销售的一个例子是1627年将一大批胡椒，移交给著名的政府战争的承包人和城市金融家菲力浦·伯莱莫奇（Philip Burlamachi）公司。另一个例子是1633年将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进口胡椒卖给一个叫丹尼尔·哈维（Daniel Harvey）的商人，其余卖给詹姆斯·凯姆贝尔（James Campbell）以及其他的东方（Eastland）商人，他们将这些胡椒出口到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胡椒在欧洲市场的分配在1600年之前和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垄断趋势。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1600年前后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这种垄断的趋势有所加强。在短期内，市场根本没有变得更加透明。至于在长期市场是否变得更加透明这个问题，取决于对价格变动趋势的分析。由范德尔·维、格拉曼和波斯托缪斯进行的分析表明，市场并没有更加透明或稳定的迹象。[285]

除了胡椒和铜之外，阿姆斯特丹还从事其他商品的贸易。我们在前面不

同的场合都提到过，在它的全盛期，它主要是作为欧洲最大的谷物市场存在着的。普通的商人在极大的规模上从事谷物贸易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偶尔也会有控制参与贸易的尝试。17 世纪末成立了所谓的“荷兰波罗的海贸易理事会”。然而，它的存在时间不长而且并不特别辉煌。重要的荷兰波罗的海贸易仍旧没有统一的组织。同样地，自由的、私人的航运和商业交往也支配着荷兰通往挪威、英国、法国、伊比里亚半岛以及本地区的所有地方的道路。因此，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充斥着从事各种各样的基本商品（除去谷物以外诸如盐、鲱鱼、木材和砖等商品）贸易的众多的买者和卖者，这就表明垄断和其他类似的投机注定是不稳定而且是短命的。

和别处一样，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是商人。商业贵族和普通商人是有所区别的。将家族作为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家族关系有时——特别是在宗教得以加强时——强大到足以支持远距离的贸易。凯伦本兹（Kellenbenz）教授在宗谱资料的基础上证明从事伊比利亚半岛和汉堡，以及西班牙和利凡特海【286】上贸易的犹太教徒正是如此。17 世纪、18 世纪的雨格诺（Huguenots）派教徒，也组成了一个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网络，由此将他们的市场联结起来。对委托代理贸易——18 世纪著名的贸易——的更为详细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小规模的商人和中等规模的商人，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某种程度的民主化趋势，例如在 16 世纪围绕着安特卫普的北欧的贸易扩张［根据赫尔曼·范德尔·维（H. van der Wee）教授的研究］。参与长途贸易不再是那些能担负起旅行到市场的费用的人和那些封闭的行会（共同体贸易）成员的专有权。小商人在汉萨同盟中保持其地位，而且在管制性公司（regulated companies）中也有他们的位置。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英国，伦敦港之外的独立小港和伦敦港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主旋律**，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及其附近的较小的城市之间的争执也是如此。

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荷兰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城邦国家是一个商人受到高度尊敬的社会，在这里，商人的利益成功地控制了国家的一般经济政策。这里的商人受到尊重。在荷兰，商人中的富有者能够和贵族家庭和共和国的最高级官员联姻。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也常常从事商人这种职业，继续经营自己的家族企业。在荷兰和这些城邦国家以外的欧洲大陆，南欧和东欧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作为老的贵族统治的平衡而出现的、由专制主义创造的新的贵族统治，从中产阶级市民中吸收新成员，这其中就包括那些贷款给统治者而且赊欠货物以装备他们的常备军和舰队的

商人。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国家的债权人在1660年专制主义引入丹麦—挪威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接受国王的土地作为抵押，并由此确立在政府中的地位。然而，这种联盟并不是稳定的。君主们经常根据斯奇勒（Schiller）的格言行事，“黑人有他们的事情可做，否则他们也可以逃跑”。只有个别的国家债权人成功地为他们的子孙确保了其在社会上层中的地位，而大多数债权人的子孙都在贫穷中了却一生。

在要结束我们有关形成国际贸易市场的各种因素的讨论之前，我们要简略论及国家的经济作用。在此，荷兰又与近代早期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不一【287】样，这里的观念是：经济福利的增加来自商业群体，最终导致拥有最小权力的政府。而在欧洲大陆的专制国家，我们更倾向于发现政府根据国家利益而改进的政策。虽然君主和既得利益在共同决定国家政策中的作用根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王权的利益和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君主从来不运用权力促进贸易。他们经常这样做：将自己的金钱投入贸易，并强迫贵族、教士以及身为中产阶级的国家官员参与贸易。这尤其体现在为冒险的海外贸易提供资本。

经济民族主义体制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区别很大，这取决于国家发展的阶段以及改变的成本。一般来说，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中心问题，对工业发展来说尤其如此。贸易管制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在重商主义体系和贸易保护体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前者主要是在西北欧国家，它们和它们的殖民地之间拥有广泛的海外贸易。后者主要是在北欧、中欧和东欧的国家。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发展生产，并培育当地的工业以巩固国内消费和国内市场。对德国政府和大学中的官房主义者来说，专制统治是最理想的体制。

无疑，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内，在许多国家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国家，经济中的市场部分都扩大了。但是国际市场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成本和消费需求的问题，同时也和运输成本有关，因此海港首先成为国际市场的同等物。在谷物贸易中，地方性以及地区性的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仍有区别。前者的价格主要由产量来决定，而后者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因素（战争、贸易路线的关闭、存货和价格的政府管理）和货币因素（货币的数量和流通速度）决定，产量只是次要的因素。说到货币，我们应该记住现代意义上的充分货币化的经济从来没有形成。许多调整的努力都导致了或多或少混乱的货币体系。我们前面提到在表面上看来，欧洲的货币体系是双本位制，但当国家没有金币仍旧能够运转良好时，银币就成为一系列日常交易不可或缺【288】的东西，包括仅仅需要支付较小面额银币的工资支付。

也许这种体系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其市场制度和市场工具。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成功地将对外贸易引导到某些特定的接合地带。虽然走私很普遍，还有众多的证据确实说明这种体制的不完善，但是，到175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几个商业中心，它们控制着它们各自的国家与外界商品交换的大部分。而且从技术上讲，它们的装备比早先任何时候都要好，它们拥有众多的信用机构、储藏设施和交易工具，此外还有管理汇票和其他信用工具应用的相当统一的法律。在商品领域，一系列从前的奢侈品都成为大众消费品，而且常常成为政府课税的新对象。最后，欧洲沿海穷国长期努力寻求建立自己国家的商业舰队，以使它们的对外贸易成为一项活跃的事业，并以此加强国防。这种努力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这种成功要归功于航海法体系，它给本国的船主和厂商以补助金，并实行出口补贴和其他的关税调节。

威尔逊教授在前一卷《剑桥欧洲经济史》中说，英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到的平衡程度比起其他国家来说要高。英国航海法完全反映了英国商业思想和政策后面各种各样的动机和雄心，它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航海法是随着英国殖民地新领土的增长而逐渐完善的，这里既体现了私人利益，也体现了国家利益。对商人来说，国家无疑只是个工具，而不是目的。他们请求国家的帮助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英国当时的许多文献都是商人写的，他们将国家的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视为一体。在他们看来，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企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共同体。稍后，当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行将结束之际，当约瑟夫·艾迪逊在他慷慨的早餐会上欢呼这个商业共和国时，商人们开始逐渐感觉到这个体系有点难以负担，他们开始倾向于自由贸【289】易，而且开始需要新的商业组织形式的出现。

第五章

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

5.1 地方经济中的货币和信贷

1. 金属货币和记账货币

随着中世纪后期城市的扩张，以及对城市各行各业需求的反映，货币经济在各地变得更加普遍。作为城市增长的本质特征，货币经济强有力地渗透到农村经济，它搅乱了由来已久的日常惯例。甚至在16世纪、17世纪，纯粹的物物交换并没有在地方经济中立即消失。货币领域中信贷工具的使用，甚至将物物交换的机会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它在更广的时间范围内鼓励了物物交换。[①] 但是，各个地方的货币使用都在扩大。农村地区的产品，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城市工业通过专业化生产刺激了内部和外部的需求。横跨大陆的贸易以及最重要的大西洋贸易的扩张，为欧洲内部的

---

① 见下面的306～307页。

商品销售开辟了空前的前景。将供给和需求更好地结合起来的市场形成了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每周一次的小市场和大的展览交易会出现在欧洲各地，而且活动得更加频繁。这一切都有助于各种形式的货币和信贷工具在地方经济中的渗透。

首先是金属货币。除了物物交易之外，地方市场上的大多数交易都已经用货币来衡量，并用现金结算。然而，金属货币在地方经济中日益增加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通常基本金属货币及其倍数或部分，构成流通中记账货币的基础。[①] 金属货币越是细分，它所包含的白银就少。但是白银减少的比例必然小于币值的减少比例，因为这时金属货币成本增加的比例要高于币值减少的比例。除了这些偏离以及货币铸造税以外，金属货币的流通价值等于它的贵金属含量的价值。所有金属货币都和流通中的记账货币形成固定的【290】关系，也就是说，前者是后者的基准货币。

反复地增加和减少基准金属货币的含银量，引进新的基准金属货币，接受其他地区的基准金属货币，这些情况都会造成严重的困难。就像佛兰德的格罗特（groat）[②] 一样，如果当局减少基准货币中银的重量，发行一种新的含银量不足的格罗特，并将这种金属货币的倍数和部分作为流通中记账货币的基础。这样一来，当局实际上就将记账货币贬值了。如果过去那种含银量高的格罗特不能换取更多的记账货币——通常也是如此，那么它们就被正式地贬值了。根据格雷欣（Gresham）法则，它们立即退出流通领域被送往皇家造币厂，造币厂以较高的银价吸引旧的格罗特，以便将其重铸为新的含银量不足的格罗特并从中牟利。如果在本地旧的格罗特仍旧按其实际的含银量估价，它就容易被逐到国外。通常从事货币价差投机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货币汇兑商、商人、货币经销商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政府当局。

有时旧的含银量高的基准金属货币在贬值后仍旧保持在流通中，这时它在官方或事实可以兑换更多的记账货币，以此来抵消对其价值的低估。虽然金币并不是记账货币的基准金属货币，但是它被视为一种具有一定记账货币价值的特殊商品。金价在流通中的记账货币单位贬值时升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大银币，它在1519年约阿西姆斯泰勒尔（*Joachimstaler*）颁布以后极其流行，这是建立在中欧不断增加的白银生产以及新大陆运来的大量白银的基础上的。在16世纪初，这种大银币也不是记账货币的基准，因此它们也随

---

① 见范·沃维克（H. van Werveke）：《记账货币与真实货币》，载《比利时文献学与历史学杂志》第8卷（1934年），第123~152页。

② 格罗特，14~17世纪英国使用的面值四便士的银币。

着记账货币的贬值而升值。16 世纪中期，情况有所改变，那时的泰勒（*taler*）逐渐成为流通中的记账货币的基准倍数。

当政府当局决定增加基准金属货币及其倍数和部分（multiples and divisions）的含银量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和新的含银量高的基准金属货币相联系的记账货币就会升值。流通中的记账货币价值的上调也就意味着金币和大银币比价的下跌。同样地，旧的基准银币及其倍数和部分在其流通范围内比价也下跌。如果当局仍保持旧的基准金属货币的流通，那么它的比价将会下跌到不必要的程度。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官方的价值低估，使得旧的基准金属货币自动地消失，从而为新的基准货币开辟道路。但是高成【291】色的基准金属货币，以及随之而来的坚挺的记账货币遇到的阻力通常都很大。不仅地方经济中的习惯力量会反抗基准金属货币和记账货币单位价值的这种随意变动，而且债务的重新评估将加重许多小商人的债务负担。进一步讲，因为新的基准货币不能立即大量足额地供应，所以还得有一段时间允许旧的基准货币的流通以及记账货币单位保持原来的价值。这就导致债务偿还的高潮，而只有有钱人才能从中牟利。因此这种币值重估常常会引起危险的暴乱和起义。

流通中记账货币的贬值和升值，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提升或者降低其比价达到，而不需要发行新的金属货币。当局可以将流通中的格罗特银币的比价上升到 1.5 第纳尔（denier）的记账货币，或者将其比价降低到 0.5 第纳尔的记账货币，其倍数和部分也按同样比例变动。这种办法常常会引起混乱，因而很少应用。常用的办法是改变金币和大银币的比价，这种方法只是贬值或升值了以大银币表示的记账货币。通常比价的上升只是官方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由流通中基准银币的贬值而引起的流通记账货币的贬值予以确认。而基准银币的贬值是由自由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大银币比价的上升引起的。降低大银币的比价通常是为了避免基准银币的贬值，但这种办法注定会失败，除非同时消除引起麻烦的根源，即消除流通中基准银币的贬值。

货币经济中的混乱和紧张，并不仅仅源于因发行新的基准金属货币或大银币比价的上升和下降而引起的记账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也来自于同一地方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会计体系。

例如，低地国家的货币体系在好心的菲力浦（Philip the Good）统治下，于 1433～1434 年进行了改革。这时，以佛兰德银格罗特为基准金属货币的佛兰德金格罗特作为标准记账货币，在整个尼德兰强行推广。在布拉班特，这种记账单位就代替了以布拉班特银格罗特为基准金属货币的布拉班特金格

罗特的地位。但是，布拉班特金格罗特，在布拉班特当地的会计账簿中仍旧【292】作为流通记账货币使用，尽管它丧失了其原先的基准金属货币的地位，而是采取了和佛兰德记账单位固定比例的形式，即 1 佛兰德记账金格罗特等于 1.5 布拉班特记账金格罗特。1433～1434 年改革之后，布拉班特金格罗特的价值随之由佛兰德记账货币单位的价值来决定，也就是间接地由佛兰德银格罗特的含银量来决定。其他条件不变，以上所说的也适用于当时在尼德兰使用的所有其他流通的货币记账体系，例如阿图瓦（Artois）磅、巴黎磅、卢维思（Louvain）磅等等。

为了避免许多流通记账货币体系无休止的贬值，一些私人机构或官方组织成功地使用金币作为它们账簿的记账单位。这些金属货币自然而然有一个以流通的记账货币表示的价格，因而它的价值转而由基准银币的金属含量来决定。因此，所有的金属货币和各种各样的流通记账货币，都以这个比例折合成金币，并将其作为簿记中的记账单位。如果以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金币的市场比价保持不变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稳定只是例外，通常金币的市场比价都上下波动，这就使得簿记员的换算工作更为复杂。通常，簿记员将金币以其初始的以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价格作为记账单位，这样金币就成为流通记账货币的附属，它和这种记账货币之间建立了固定的关系。因此，金币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是由流通记账货币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最终是由基准银币的金属含量决定的。

有时作为记账单位的金币的含金量持续成为记账单位的价值标准，由此，这种记账单位的价值就和流通中的记账货币的价值分离。据此，当流通记账货币相对于金币贬值或升值时，以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作为记账单位的金币的价值就相应地上升或下降。设想金币从流通中消失，金币仅仅是作为记账单位使用，也就是说，这种记账单位代表先前真实的金币所包含的一定重量的黄金。在一些情况下，只需要指出金的重量即可，就像里昂和皮亚琴察（Piacenza）展览交易会上的埃居（*écu de marc*），它代表 1/65 马克（mark）[①] 和埃居同纯度的黄金。从 15 世纪中期以后的热那亚，金达克特就作为具有稳定的含金量的记账单位使用，它的固定分割部分也同样受到欢【293】迎。那时金达克特的比价是 44 先令记账货币。在这个比价的基础上，磅体系以固定的比价和作为记账单位的达克特相结合：用良币（*good money*）的

① 马克（mark），金银重量单位，是一种欧洲的重量单位，相当于 8 盎司（227 克），尤指用于衡量金银。——译者注

磅数来记账，1 磅或 20 先令或者 240 便士的记账良币，等于 20/44 记账达克特，这种记账达克特的价值源于达克特金币的含金量。由此，磅体系彻底成为达克特的附属。此外，旧的磅体系自然地仍旧作为流通记账货币在热那亚使用，其价值来源于基准银币的含银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准银币不断地贬值，因此用磅这种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达克特的比价就持续地上升①。

为了完整起见，我们应当指出：在大银币成功发行之后，与流通记账货币相分离，它们有时也被作为记账单位。17 世纪荷兰银行的盾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然而，它并没有保持独立地位，而是逐渐地发展成为流通中的盾的完全附属品（与以下部分和 338 页以后的部分进行比较）。

2. 通向货币稳定的漫漫长路

地方经济中货币自由灵活地流通所遇到的困难，不仅限于当地的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以及记账货币体系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当局有可能一直禁止货币的出口，而且各种大小面额的金币和银币在欧洲各地及其混乱地流通。

有时当局通过有意增加外国金属货币的比价将其吸引到本地来。与金属货币出产国的情况相比，其他情况也可能导致某一特定地区高估外国金属货币的价值。如果一个国家选择对其货币进行贬值，而在其邻国，由于与本国流通中的当前货币的传统关系，新的成色低的金属货币的比价仍旧保持旧的成色好的金属货币的比价，这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将新发行的金属货币输往币值高估国的投机潮。同样的货币投机流动也会发生在伪造激增的时期，如整个 16 世纪和 17 世纪初随着大银币的成功而发生的情况②。荷兰和【294】德国交界地带的许多地方小领主和帝国城市，都援用自治权自行制造它们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模仿流行的泰勒银币的样式，而且以同样的比价发行，虽然其含银量有所减少。这种减少的结果导致造币厂提高金属货币用金银条块的收购价格，由此将许多上等的银币吸引到造币厂，而仿制的银泰勒却由于其价值的高估在欧洲大地大量泛滥。货币汇兑商可以从投机交易中牟利，这完全依赖于普通人对这种种类极多而且难以察觉的伪造品的无知和无能。

大金属货币和小金属货币的关系也对地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紧张。流通记账货币的价值通常仍旧完全由基准银币及其倍数和部分的含银量来决定，

① 雅克·希尔（J. Heers）：《15 世纪的苦难》（巴黎，1971 年），第 67 页。

② 卡洛·西博拉（C. M. Cipolla）：《5～17 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和文明》（普林斯顿，1956 年），第 33～35 页。

即由整个的较小的银币来决定。大体上，具有有限合法性的代用货币在16世纪、17世纪还没有出现。然而，在实践中，这种功能是由本国或国外的一系列小金属货币来承担的。这些小金属货币从过去发行以来一直保持在流通中，有的已经彻底磨损了，这就是所谓的“黑钱”。这些“黑钱”有时会削弱流通记账货币的地位，导致大金币和大银币比价的上升。然而，一般来讲，基准银币及其倍数和部分是地方经济的货币生活中占有支配性地位的。基准银币控制着日常的交易，因为老百姓频繁地将其作为金属货币和流通记账单位。如果当局希望从金属货币中获得利润，就像16世纪、17世纪它们经常做的那样，它们就自然地集中于使基准金属货币贬值。毕竟，从数量上讲，这样做是值得的。大多数人将基准金属货币作为流通记账货币的习惯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即使基准金属货币是新发行的而且其成色有所降低，仍旧可以安全地对其进行投机。但是，以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大金币和大银币的比价会不可避免地上升。如果相邻的国家（我们称之为B国）的统治者在他的辖区内实施了一项贬值性的货币发行，类似的上升情况也会发生在同样的地区（我们称之为A国）。当B国的基准金属货币在长期内和A国的流通记账货币具有紧密的关系时——情况常常如此，那么B国的统治者就可以指望他新发行的成色差的基准金属货币越过边界流通到A国，并将其当地的基准货币逐出流通领域。更无害但却经常发生的是基准银币的因频繁使【295】用而导致的简单磨损。因为流通中金属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基准金属货币的金属含量，所以基准金属货币的磨损常常导致流通记账货币的调整，即实际的或官方的贬值，以及较大的金白银金属货币比价的上升。

在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世界，有钱人采取保护措施使他们自己不受货币贬值的威胁。从中世纪开始，他们就在交易中特别地使用价值稳定的金币。从近代初开始，他们就在交易中使用价值稳定的大银币。他们经常在其内部簿记中，在当地以及对外国交易中使用这些黄金白银金属货币，它们相对独立于流通记账货币。富人常常处于债权人的角色，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避免流通记账货币的贬值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且他们确实也可以和统治者一起，从中获利。当贷款和利息都是以价值稳定的记账单位表示时，在流通记账货币贬值后，以流通记账货币表示的价值稳定的记账货币的比价就会上升，因而债务人不得不以更多的基准货币来偿付债务。而且因为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的通常滞后于流通记账货币的贬值，所以商人企业家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已经贬值的基准金属货币，这是因为工资是和流通记账货币挂钩的。如果商人企业家按过去得以稳定的记账单位表示

的价格出售商品，那么他们在每一件卖出的商品上都获得很高的利润；如果由于成本的降低，他们在一个以稳定的记账单位表示的较低的价格上出售产品，那么销售额可能上升，总利润将增加。

16 世纪、17 世纪，金银比价以及银铜比价也使地方经济相当地紧张。这期间贵金属生产产生了巨大而又不平衡的扩张，由此扩大了投机机会，这是由于贵金属的官方造币厂比价和市场比价之间存在着差别。15 世纪期间，黄金主要由非洲经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进入欧洲，而 16 世纪前半期，主要是来自新大陆；15 世纪和 16 世纪早期，白银主要由德国、匈牙利和蒂罗尔进入西欧，而从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大量的墨西哥和秘鲁白银进入欧洲，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整个 17 世纪；从 18 世纪初以后，巴西的黄金日渐增多地出口到欧洲；最后，17 世纪，铜在欧洲各地大量流通，特别是来自瑞典的铜以及后期来自日本的铜。贵金属的市场流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它们的比【296】价，金和银的商业比价从 15 世纪的大约 1:9 到 1:10，逐渐发展到 16 世纪末的 1:12 左右，在 1700 年更是上升到 1:15 左右。实际上，受传统的影响，地方对这种比价变化的调整常常慢半拍。而精明的货币批发商却可以从中获利。逐渐兴起的重商主义国家政权也加深了对货币事务的干涉。通过宣布官方的货币汇率，政府当局固定了金银的官方比价。但是，从整个欧洲来看，各国官方的金银比价从未统一，或者说它们从未保持平衡。更进一步，同一个国家内不同金属货币的以官方记账货币表示的价格，在长期内是维持不住的，这是因为市场的波动特征需要某种特定的金属货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通过提高其比价，人为地高估某种金属货币以图特别地吸引它。荷兰政府在 17 世纪非常偏爱白银以供应阿姆斯特丹市场，它迫切地需要贵金属，包括白银，以出口到波罗的海和远东地区。金银的市场比价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与西欧相比，白银对黄金的比价在中东尤其是远东相当高，所以，西方的商人用尽一切手段用白银支付他们在东方的商品购买。

金银比价差异导致的金银的投机性流动，对地方经济极其重要。如果市场上黄金的价格上涨，而黄金的官方或当前比价却并未上升，那么在正式交易中黄金就被低估了，从而导致黄金从流通中消失。这时白银流通就更加频繁，大银币就会代替金币的地位，而且会有充足的基准银币供应地方经济中的日常交易之用。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形势会更加严重。不仅大银币从流通中消失了，而且所有的较小的基准银币（它们以其内在价值流通）也会消失。虽然金币代替了大银币，但是它们不可能承担较小的基准银币的功能，因此，地方经济就会遭受严重的金属货币短缺。幸运的是，从 18 世纪

初以来的近代时期，大体上是黄金的相对市场价格在升高，因此总的趋势有利于白银货币，包括较小的白银金属货币的流通。不过也有一些黄金的市场[297]价格明显停滞或下降的时期，例如1500年前后的几十年和18世纪初期。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收缩影响都是消极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一个仍旧原始的经济中，人口中的大多数只有在确认某种交易媒介是依其内在价值流通时，才会对其信任。只要较小的基准金属货币在地方经济中支配了大多数交易以及流通记账货币，群众就将信任归于这些小金属货币的金属含量上。作为独立的记账单位的基础，金币和大银币就为大额资金交易和国际交易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在既定的框架内，政府当局就可以着眼于灵活的宏观金融平衡。当经济扩张需要一项通货膨胀政策时，或者特殊的战争形势需要额外的支出时，当局就可以通过基准金属货币的持续贬值这种相当简单的方式，扩大流通记账货币的总量，而这一切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大额金融交易和国际经济的稳定性。16世纪的经济扩张，1600年前后的宗教战争，以及一个世纪后的长期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靠这种方式支持的。

宏观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和货币制度毫无规律但却无可否认的过渡有关，它从16世纪的混乱状态过渡到18世纪的恢复和稳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16世纪开始，伴随着贵金属生产的大幅度增长，货币经济的扩张逐渐将金币和更多的大银币带给人口中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金白银金属货币在地方经济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保留较小的白银金属货币作为流通记账货币基础的需要，从而让位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种功能可以转而由较大的金属货币来承担。同时，从16世纪起，特别是17世纪以后，人们日益拥护将大银币作为“基准金属货币”，也就是作为流通记账货币的基础。例如，1681年，荷兰联合省公开宣称它们明确地支持这种建议。但是，直到1694年以后，它才得到共和国其他省份的默许。接受大银币作为流通记账货币的标准（这项政策在18世纪日益普遍），在小银币逐渐降低为普通的有限法偿货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里程碑。

从长期来看，在货币制度稳定的过程中，铜币的大量铸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5世纪末开始，中欧铜产量的上升已经为铸造铜币打开了希望之[298]门。16世纪，铜币的发行量激增，但铜币仍旧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上，而且主要是小面额金属货币。然而，宗教战争期间政府当局对货币的极大需求，以及整个17世纪铜产量和供应量的急剧扩张消除了所有限制。从1599年到17世纪晚期，西班牙经历了惊人的铜币增加；1607～1621年，法国令人吃

惊地发行了大量的铜币；1621 ~ 1623 年，德国度过它著名的铜币泛滥期（*Kipper-und Wipperzeit*）；而瑞典也未能幸免。在此期间，西班牙和德国甚至彻底从银本位转向铜本位，也就是说，流通记账单位的价值是由一整套作为基准金属货币的铜币的金属含量决定的。铜币发行量的急剧增加，造成了记账单位非常迅速而惊人的贬值，从而摧毁了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这也使得人们对将较小的金属货币降为辅币甚至降为代用币有了心理准备。当然，这些措施并非一步到位。总体上，老百姓总是希望恢复旧的银本位（向传统的银币制度的回归，可以在被围困时期发行传统的代用币以作为紧急备用币的情况下看到，如 1573 年的哈勒姆和 1574 年的莱顿）。临时发行的纸币也是如此。1696 年英国货币重铸期间，政府发行证书以代替旧的银币的退出（在新的货币发行前，这种证书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但没有利息）。在法国，18 世纪 20 年代，约翰·劳（John Law）发行了称为皇家银行银行券的纸币。

在货币制度稳定的过程中，重商主义的官方政策作为决定性的重要因素不应被忽视。因为政府当局日益选择健康稳定的记账货币，而这被看做是经济繁荣的标志。17 世纪达到高潮的金属货币技术的进步，以及货币均匀性的提高，这些无疑都有利于货币流通体系的重建。

在和平年代，政府当局日益集中于保持记账货币的稳定。至多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金银比价的改变或者与外国货币比价的改变，进行微小的调整，即所谓的相机调整措施。而在战争年代，当政府急需金钱时，对记账单位价值的操纵就较为常见了，其目标在于通过记账货币的贬值获得额外利益。西【299】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是最近的而且极为危险的例子，法国尤其如此。然而，一般来说，而且从整个欧洲来看，这种背离货币稳定的例子不再是 18 世纪货币经济中的主要因素，而且以金币和大银币作为流通记账货币基准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3. 地方经济中的消费信贷

无论金属货币在地方经济中有多重要，它们绝不妨碍信贷的发展。确实，金融对地方经济的进一步渗透，导致了货币支付需求增加到没有足够的小金属货币来满足它的程度。因此，16 世纪、17 世纪流通手段的持续缺乏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金融在地方经济中的扩张，导致了人们对金属货币信心的增加，从而加强了各种信贷形式得以实际扩展的基础。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消费信贷在地方经济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扩张。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商人经常在农作物收获前，以部分现金或全部以现金从农民那里买断他们的农产品；商人把现金付给农村人，以购买他们在随后的冬天将要纺织的亚麻或布匹。在场外生产出现的城市地区，与此类似的做法也很普遍。由此，农民和工人就得到由其未来的收获和未来的劳动产品为保证的信贷，有时商人还给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通常这种信贷所收取的利息很高，以至于双方的私人关系扭曲成彻底的依赖关系和横行霸道。卷入这种信贷交易的并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在波兰，16 世纪、17 世纪的但泽商人付给内地大小土地贵族相似的预付款，以期将他们收获的粮食将来运往但泽。

展期（Extension of payment）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信贷形式，常常甚至是其基石。在地方经济中，应付款和零售商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由当地的店主、手艺人或者旅店老板保存的账簿，或者更正式地称为往来账户，在城市和农村成为初级簿记的一种通俗形式。这种账目经常是在数月内保持未结的状态，因此可以相互抵销。店主可能有一个酒馆主人的来往户头，而后者将[300]有一个和店主相对应的账户。账目周期性地结算，只有收支差额才用现金偿付。有时，甚至周期性的结算也不是用现金，而是用票据转让来结算，这就使新的抵销成为可能。如果 A 欠 B 的债，同时又有一个第三者 C 欠 A 的债，那么 A 就可以要求 C 将其拖欠 A 的款项付给债权人 B，以减少 A 对 B 的债务；常常可能发生的是 C 本身又欠 B 的钱。依据这种情况，无须使用流动资产就可以进行一项新结算。

在地方经济中，债权转让是经常使用的债务结算方式。它不仅用于没有专门的正式手续的债务结算，而且它还使用期票［writings obligatory，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本票（promissory notes）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借据（notes）］上的贷方余额（credit balance）。其他种类的还有可转换债券（transferable bonds）、债券（bills of debt）、债券（bills obligatory）或者集市法庭（Fair Courts）的借据（*scripta obligatoria*）。① 这些专用文件有时加盖官方的公章而获得正式地位，但是，它们日益变为非正式的文件，即一个普通的借据，它由债务人或第三者发行并由债务人签署。通常这些借据都有一款“见票即付”（payable to bearer）的规定，因此成为可转让的，虽然是不可兑现的。

① 要知道最近有关它们的法律特征及其在英国的重要性的解释，请参看米尔奈斯·豪登（J. Milnes Holden）的《英国法中可兑换票据的历史》（伦敦，1955 年），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凭着地方经济信心的支持，这种借据已经在人们之间流通，从而用以借据形式表示的贷方余额来偿付债务，也就是说，债务偿付通过借据的转换指定给第三方。在整个 17 世纪，在西北欧的商业流通中普遍使用"授权凭证"，这进一步使得债权转让合法化，但它在地方经济中的应用却发展的相当慢。

与西北欧相比，西南欧的商业世界极少用或者根本不用"见票即付"条款，因此此类信贷工具极少流通。而另一方面，16 世纪、17 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遍布私人和公共的储蓄银行和汇兑银行。从这些国家保存下来的账目看，许多小商人都在地方银行中开有活期存款账户，因此许多当前的地方交易中的款项支付也可以通过转账来进行。这些支付所依据的手段大多数都是口头的，而有一些是成文字的。在各种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债务的偿付转让给其在当地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余额。这样的清算银行业出现在西北欧，但其客户主要限于从事批发贸易的商人和贵族家庭。【301】

除了展期及其可能发生的抵销外，还出现了普通的有息贷款形式的消费信贷。甚至在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禁令仍旧很严格时，这种形式的信贷也未完全消失。到近代，违背这种禁令的行为更加频繁地发生。1541 年，查理五世使商业目的的有息贷款合法化，并规定其利息最高为 12%。在英国，也允许有息贷款存在，只要其利息不超过法定的最高限额。然而，在地方经济中，传统的顾虑仍旧存在；直到 18 世纪末，日常生活中赤裸裸的有息贷款仍旧会招致相当大的厌恶，特别是在反对天主教改革者取得胜利的地方。

另一方面，典当业是分布十分广泛的流行消费信贷形式。犹太人、伦巴底人和卡奥尔人（Cahorsins）在 13 世纪、14 世纪就把典当业引进到欧洲各地。奇怪的是，典当业的重要性似乎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早期有相当大的下降。无疑，典当业所收取的高利息率使得这种信贷形式背上了恶名。14 世纪、15 世纪欧洲的经济萧条使得廉价处理典当品和呈保变得相当困难，这使得比较贫穷的借款人陷入无比悲惨的境地，于是普通群众对当铺深恶痛绝。政府当局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15 世纪政府经常采取官方措施以抑制典当商的活动，压低其利率。有时甚至会彻底取消当铺。

在西班牙，当铺（*positos*）从 15 世纪末以来就受到市政当局严厉的监督。16 世纪，尤其是在 17 世纪经常用到这些监督措施。

15 世纪末以来，欧洲经济的扩张以及新的消费信贷形式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传统的抵押贷款的需求。零售贸易的增长以及相关的使用往来账户的习俗，使得在欧洲经济繁荣时期，在地方经济的框架内，通过更加灵活而成本更低的手段度过暂时的收入危机是可能

的。16 世纪后半期，价格革命和宗教战争开始再一次严重地削弱下层人民的收入，而地方经济的萧条更加严重、更加频繁，直到这时使用往来账户才【302】不能完全满足消费信贷的需求。在西欧，抵押贷款再一次成为最重要的信贷形式。但是，这时的社会舆论不同于两三个世纪之前的情况，在当地人民的苦难中，投机赚钱将会受到更加强烈的谴责。因此，这些地区的抵押贷款也逐渐受到彻底的官方监督，最后建立了公立当铺，它的目的在于救苦助难，而不再是赢取利润。

在尼德兰南部，17 世纪初，考伯格（W. Coberger）设计了一个整套完整的地方"债行"（*Monts de Piété*）体系，它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并受其指导。20 年代，奥利瓦雷斯公爵（Olivares）在卡斯蒂利亚西劳而无功地试图获得国会的批准，实施一项 15 世纪末以来就存在的老方案，这个方案的目的也是建立一个由地方银行和当铺组成的集中体系。在其他欧洲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尼德兰联合省引进了市立当铺，其中的主导者就是 1614 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范里宁银行（*Bank van Leening*）。斯德哥尔摩跟着成立了雷根森斯—斯坦德斯银行（*Riksens Ständers Bank*）。甚至在公立当铺运转正常的城市里，私人高利贷者也没有被完全逐出经济领域。有时私营典当商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可以将贷款延期，可以接受票据抵押而不需抵押实物，所贷金额可以比市立当铺所限制的数量更多。

4. 年金信贷

虽然上面所讲的信贷形式通常是用于地方经济中的消费信贷，但是它们也时常被用于投资目的。与延期支付（future delivery）相对，受益人可以用预付现金来负担当前生产成本，甚至投资于扩大生产。

近代在地方市场上出售年金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投资信贷方式，它经历了巨大的扩张。只有 15 世纪、16 世纪中世纪的年金的法律地位彻底改变之后，这种扩张才得以成为可能。向不动产征收年金的封建体系，逐渐演化为土地所有者向第三方转让年金，随后就出现了年金保证金（*bail à rente*），即出售不动产以交纳世袭年金，同时也出现了年金章程（*constitution de rente*），即债务人将从某一特定的资源（通常为不动产）获取收益的权利以【303】定期的年金（通常世袭一代或两三代）卖给债权人的合同。1425 年和 1455 年的教皇训谕，规定了年金保证金和年金章程有三个限制条件：第一，年金必须转让到明确指定的一种不动产上；第二，如果债务人愿意，它们必须是

可以赎回的；第三，它们不能超过所投资资本年收入的10%。[①]

在城市扩张时期或农业繁荣时期，年金体系是一种理想的稳定不动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教皇训谕的影响下，14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年金合同中，就出现了年金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要求赎回的条款，这个条款很快就普遍化了。早在15世纪，尼德兰的大部分城市就规定这种可赎回性自动地适用于所有的年金合同。1520年查理大帝（Emperor Charls）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这项原则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布拉班特地区；1529年又规定适用于整个佛兰德地区。1530年、1548年和1577年 *Reichspolizei-ordnungen* 在德国颁布了类似的措施。1533年亨利二世（Henri II）规定这个原则适用于法国所有的城市。这样，年金保证金和年金章程就成为一种特别适合于长期信贷的信贷工具，只是它允许债务人决定债务的偿付和偿付期限。如果债权人自己需要钱，他可能不得不重新占有他的资本，当然他确实也可以将他的年金卖给第三者。年金的所有权是可以转让的，但却是不可以兑现的。在16世纪的法国，年金的这种转让仍旧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民事程序。而在荷兰，年金转让已经非常简单，因而极为普遍，在安特卫普就是如此。

将年金指定给一份指定的不动产（有时或者是其他的收入来源）是年金合同的本质要素。[②] 如上所述，在长期或中期内，年金保证金或年金章程常常在地方上被用做投资信贷。伯纳萨（B. Bennassar）和菲力浦·吕兹·马丁（F. Ruiz-Martin），已经指出16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农民通过当地的公证人出售的年金合同（*censos consignativos*）的极端重要性，它为开垦荒地、栽培葡萄园和橄榄树以及建立农场提供了经费。H. 索利（H. Soly）证明了16世纪安特卫普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提供经费的：手艺人或者经营小生意的人以年金保证金为条件买得小片的土地，并为建立房屋打下地基，然后以此为基础出售年金，再用获得的资金支持下一步的建筑开发。 【304】

农业进步和城市建筑业革新这两个地方投资的主要方面，[③] 主要是由通过年金获得的信贷支持的。年金给城市和农村的较小的生意人带来长期或中期的信贷。地方经济中投资信贷向小规模的生产单位的渗透，毫无疑问有助

---

① B. 斯奈伯（B. Schnapper）：《16世纪的地租》，载《一种信用手段的历史》（巴黎，1957年），第45页；参见西博拉前面引用书第35页以后。

② 根据B. 斯奈伯所说，从16世纪开始，也出现了没有权利转让的不固定地租，但这似乎是个例外，从这种意义来说，年金可以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

③ 农业在投资中的极端重要性，参见罗伯特·戴维斯（R. Davis）：《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伦敦，1973年），第231~233页。

于刺激16世纪欧洲经济的扩张。在这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永续而可赎回的年金利息的下降：15世纪一般为10%～12%，而16世纪为6%，17世纪末和整个18世纪降到了3%。然而，利率的影响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在17世纪经济萧条期间，许多人抱怨说，即使利率较低的年金保证金或年金章程也不再主要用做投资信贷，而是用于弥补营业赤字和调整欠账。

与年金保证金和年金章程紧密相连的是由土地所有权做保证的抵押信贷。根据R. 艾什顿（R. Ashton）所说，特别是在17世纪抵押人获得依其意愿可以回购抵押土地的权利以后，许多英国大土地所有者都用这种办法获得资金，改善他们的农业经营状况。[1] 17世纪末期，英国成立了土地银行［比斯考（J. Biscoe）银行，1695年；艾斯吉尔和巴贲（J. Asgill & N. Barbon）银行，1695年；凯姆伯伦（H. Chamberlen）银行，1696年］为农业投资提供经费。[2] 17世纪期间，英国组织的特别的农业信贷，对欧洲来说并不是故事的全部。15世纪末以后，纳瓦拉（Navarre）的土地银行（*arcas de misericordia*）和意大利的蒙特谷物银行（*monte frumentarii*）就已经存在。这些都是以优惠的条件借种子给农民或提供其他帮助的粮食银行。意大利的蒙特皮埃斯（*montepios*）、西班牙的当铺（*positos*）以及其他的市立典当机构也常常执行土地银行的职能。

土地银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长期信贷，而是流动资本。甚至在提供流【305】动资本方面，它们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通常，地方农业、工业和贸易中的短期信贷是通过原料供应者的延期付款或者产品购者的预付款来获得的。在场外生产（putting-out）体系中，当他们的雇主应用“先干活后付工资”（long-pay）原则时，农工本身常常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短期资本提供者”。有时雇主用借据、商店的优惠券或者其他工人能够用于购买他们所需的东西的代用币，来支付他们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工人而且包括当地的商人都成为雇主的银行家。

近代地方经济中消费信贷和投资信贷显著增长的先决条件，不仅包括经济生活中更大的诚信，而且包括更大量的资本积累以及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上层阶级是最大的储蓄者。相当一部分储蓄通过中介的公证机构投资于年金购买，农村和城市的中产阶级、官员和地方行政长官、教士阶层和地方公共机构持有许多买自城市和农村的年金。“地租消失了”，李·罗伊·拉杜里

① 艾什顿：《国王和货币市场，1603～1640年》（牛津，1960年），第7～9页。
② 霍斯菲尔德（J. K. Horsefield）：《英国货币史，1650～1710年》（伦敦，1960年），第140页以后。

这样评价16世纪、17世纪的乡村法国。

令人注目的是，社会地位稍低的中产阶层也同样积极地投资于年金，当然是在诸如16世纪那样的繁荣时期。在安特卫普，1545年在市政官员那里有正式交易记录的年金购买者中有21.15%是手艺人，21.19%是行政官员，16.8%是寡妇，16.26%是商人（这其中也包括许多小贩和沿街叫卖者），剩下的20.62%是其他人员。在农村地区，不需公证人而进行储蓄已经成为惯例。在城市，储蓄的潜在接受者为货币汇兑商、金银匠银行家或者公立的汇兑银行。并不是所有的储蓄都用做地方信贷的准备金，但确实有一部分是这样，而在经济扩张时期，更是有相当大部分用于此种途径。

5.2 商业和金融世界

1. 大银币的突破

近代早期，国际贸易仍旧保持着许多传统的要素。实物交易时常发生；倘使另一方希望尽快卖掉自己的商品，实物交易就是抛售自己滞销货的理想手段；在帆船商队的不规律到来可能突然引起存货激增的港口，实物交易经常发生。实物交易掩盖了价格从而减少损失。但是在相当正常的情况下，也仍旧存在着实物交易。硬通货的时常短缺，对这种原始贸易方式的存在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商人和代理商彼此熟悉，而且所从事贸易的又不具有专业性，或者商船和货车打算快速返回的港口和城市，有时实物交易能加快流转速度，增加营业额。 【306】

现金买卖在国际贸易中也很普遍，但却并非包括全部。展期是正常的程序，如此正常以至于范德尔·莫林（van der Molen）的公司在其从安特卫普到意大利的通信中，总是以两个集市或6个月以后交付的价格，来陈述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香料价格。国际市场上延期付款3个月或6个月的习惯做法，意味着支付现金的购买者可以指望额外的收获，即销售价格的折扣。福提瑞（*fortiori*）这种优惠条件适用于提前付款。另一方面，买方通常以现金支付应付款总额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允许其延期支付。当商业票据转让到持票人手中，将付款额转让给第三者时，他们常常会用现金补充，因为他们各自的金额很少正好一致。

原则上，除了偶尔投机于较小面值的基准金属货币以外，国际贸易支付中所用的金属货币都是大面值金属货币。金埃居在里昂和贝桑松（Besançon）—皮亚琴察的展览交易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1550 年以后，大面值的印金属货币开始大量出现，而且在 16 世纪、17 世纪欧洲大陆内部贸易中占据着支配地位。1600 年前后，西班牙里亚尔（*reals*）和比索（*piastres*）获得了国际声誉，只有 17 世纪在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监督之下发行的荷兰白银贸易金属货币能与之相比。在德国，泰勒就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直到 18 世纪，黄金才再次获得更加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英国，几尼金币（guinea）占据着有利地位。

整个近代时期内，硬币的国际流动无疑受到资本流动特别是政府的资金转移的强烈影响。然而，认识不到这种流动中商业因素的影响力是错误的。欧洲在 14 世纪、15 世纪的经济萧条也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教廷税收引起了 13 世纪教会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年度余额大大增加，而这些收入却在意大利或阿维尼翁花掉。与此同时，意大利商人通过他们在西北欧的购买活动，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背上债务，而在意大利形成贷方余额。由此形成的【307】基本平衡在 15 世纪被彻底打破，当时从西北欧到南欧的出口产品急剧下降；相反，从意大利和中东到北方的奢侈品进口却增加了。北方对南方的逆差，起初是由意大利大公司的资本输入支撑的，这些公司通过当地的分支机构将其金融投资扩展到北方，逆差的弥补日益靠出口贵金属来弥补。结果是逐渐耗尽了西北欧的贵金属储备，这就削弱了国际贸易和妨碍了国际支付。15 世纪期间，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展览交易会的复兴与此不无关系，因为这些展览交易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促进并系统化国际支付中的款项抵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硬通货的需要。

苏丹黄金向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大量进口，1450 年后特别是 1500 年以后中欧白银生产的显著恢复，共同影响了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方向。虽然西北欧仍旧向意大利和中东输出贵金属，但是北方逐渐进行的工业重组导致了更好的贸易平衡。农村廉价而品种繁多的大规模生产产品和城市高度专业化的产品，首先代替了外国进口产品，随后出口国外，甚至包括南方。这一切都使西北欧的工业充满了新活力和竞争力。英国和荷兰对汉萨同盟和中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白银的进口弥补了这种顺差。而对伊比利亚半岛的顺差最初由黄金的进口来弥补。

16 世纪上半期引人注目的从新世界到欧洲的黄金运输，加大了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和中欧之间金银比价的差别。由此而来的国际商业交易结算中金

白银金属货币的流动反映了投机活动，投机将白银吸引到伊比利亚半岛，而黄金却从半岛流向西北欧和意大利。官方通过颁布不切实际的金银比价或者实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投机气氛。英国 16 世纪的黄金大贬值就是一个极其著名的例子，当时英国的造币厂颁布了过高的白银价格，由此从欧洲大陆吸引了大量白银，但由此却付出了通货膨胀的沉重的代价。

基准银币含银量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改变常常也有足够的刺激，致使商人在国内外的商业交易支付中都使用现金，即币值被高估的金属货币。成功地伪造的成色较低的大银币进入流通领域，当其对某一特定金属货币的比价预【308】期将要下跌时，或者实际上已经宣布了其比价的下跌，这时会出现同样的投机性支付机会。政府通常会在一到两个月的过渡期内，允许原有的通常是较高的比价存在。投机者可以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赚取利润。

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输入，长期支配着欧洲的金银比价。价格革命造成了有利于粮食而不利于工业产品的贸易条件的改变，同时，严重的铜币贬值出现在西班牙、法国、瑞典，以及时间稍短的德国。这对金白银金属货币商业流动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从波罗的海运输粮食的荷兰，这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从西班牙吸引美洲贵金属以弥补西班牙的贸易赤字。在铜价高估期间，荷兰进一步增强其地位，当时它不仅将波罗的海的粮食而且将瑞典的铜运往德国、法国以及最重要的西班牙。而另一方面，专业化于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英国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不利的贸易条件，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稳定的货币制度，以及流行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这一切都妨碍了英国的出口。因此，为了促进其产品在西班牙和德国的销售，英国人甚至接受铜币。因为昂贵的货币汇兑贴水，这些铜币不能兑换成白银，但是可以用其购买当地的商品运回英国。

阿姆斯特丹不仅对北欧而且对远东（尤其是 17 世纪）来说都是一个主要的商业白银配置中心。投机于相对高价白银的葡萄牙人也早在 16 世纪就将西班牙白银出口到东印度。起初，荷兰人也出口西班牙的里亚尔到利凡特和远东，但从 17 世纪的第二个 25 年开始，荷兰人自己的贸易白银金属货币开始占领市场，从 17 世纪下半期开始在远东白银出口市场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1640 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向远东出口 100 万盾的贵金属；到 1660 年，增加到每年 150 万盾左右；此后继续增加，1700 年达到年均 510 万盾的第一个高峰；1722 ~ 1728 年是第二个高峰，平均每年为 680 万 ~ 790 万盾，这时出口的贵金属主要是荷兰的达克特。同时，一直到

1688年，荷兰人每年都从日本向南亚出口大量的白银。也是在那一年，他[309]们又开始出口日本黄金到南亚。在1640～1680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出口价值高达约133万盾，而且西班牙人也从阿卡普尔科将大量的白银经由太平洋运到菲律宾。①

2. 清算银行体系

16世纪金融技术的进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15世纪对贵金属的渴求，使得国际支付技术明确地走向更好的多边清算体系。其次，16世纪贵金属生产的巨大扩张以及金属货币的国际流动，逐渐导致了信贷领域的创新。

在西欧的南部地区，金融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制度特征，而且主要表现在地方和国际票据交换上。另一方面，南部地区仍旧保持着中世纪后期的一些优良的技术。展期仍旧是商人们常用的信贷手段，这种信贷可以以普通的口头协议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更常用的借据的形式获得。但是，"付给某人或持票人"的条款在15世纪、16世纪的意大利非常少见，如果有的话。信贷的转让需要正式的手续（*cessio*），所以其流通确实并不普遍。但是在里昂，信贷的转让却很普遍，这无疑反映了西欧北部对它的影响。②

有息贷款，无论是有抵押的还是没有抵押的，通常都用于获得商业信贷。对其最大的影响力无疑来自教会对利息的禁令。直到近代晚期，甚至在商业流通领域，简单的有息贷款在欧洲南部的天主教国家也是受到限制的，它们最终为汇票提供的信贷所替代。罗马天主教教会允许汇票的存在是因为汇兑业务被视为交易和约的核心。因此，在16世纪，汇票不仅在[310]南方也在北方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交易工具。隐藏在*distancia loci*和*cambium-recambium*业务中的时间因素包含着信贷的来源。有时交易合同只是有息贷款的简单的掩盖，甚至连汇票也不

---

① 格拉曼：《荷兰和亚洲的贸易，1620～1740年》（哥本哈根—海牙，1958年），第50～72页。

② 在南部，甚至从中世纪开始，稍有地位的商人都有保持他们交易记录的传统。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确实是先驱，最重要的是他们在14世纪引入了复式簿记。1494年，第一个清晰的复式记账教科书，即《算术、几何比及比例全集》（*Summa de Arithmetica*），由弗拉·卢卡·帕乔尼（Franciscan Luca Pacioli）编辑，在威尼斯出版。在德国南部，人们将意大利的技术发展成一整套详尽的技术，特别是上述书中数量处理方法。

需要（这样的交易称为没有结构的交易，即虚假交易）。然而，教会常常禁止这种交易。16世纪更加重要的是连锁（*ricorsa*）汇票，这也是有息贷款的一种隐蔽形式，但是其正式的交易合同伴随着汇票发行。在16世纪，除了连锁汇票以外，发展的存款（*dépôt de foire en foire*）以及在货币汇兑商（银行家）或商人银行家经常账户的信贷缺口（opening of credit），是其他两种非常普遍的商业信贷方式。这两种信贷方式最初分别和展览交易会以及清算银行有关。

展览会交易和清算银行都不是近代的发明，但是在15世纪、16世纪它们在南部地区经历了重大的技术改进。这些地区的金融技术进步的重点放在制度层面上。雷蒙·德·罗维尔（R. de Roover）对中世纪晚期的商人银行和当时的货币兑换者做了区别，他认为前者主要从事货币买卖和套汇交易，而后者却集中于吸收存款和清算银行体系。甚至在15世纪、16世纪，两者的区别并不像雷蒙·德·罗维尔说的那样明显。实际上，这两类金融活动通常结合起来掌握在一个银行手中，就像在佛罗伦萨那样。

15世纪、16世纪，在中世纪后期由货币存款机构发展而来的转账银行（*banchi di scritto*），在南欧地区包括南德，成为流行的商业支付中介。商人通过账户之间的转移偿付其债务。支付的指令通常口头传达给银行家（在威尼斯，这种程序甚至是必须的），但同时书面的转账指令也很普遍，这实际上就是支票，债务人借此将付款让与其在银行的经常账户。这样的权利转让并不引起实际上的货币操作行为，而仅仅是银行划账（*scritta in banco*）。这同样适用于汇票支付，这是通过账目之间的款项转移实现的。通常汇票都指明支付应该在银行完成。在不指明的情况下，要么银行家对其有口头规定，要么有书面指示。当汇票的背面支付说明指明了受益人时——这方面的【311】许多例子都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某种形式的背书。同时，货币汇兑商（银行家）也为其当地的同行开立往来账户，从而使得付与另一家银行顾客的转账，也可以记录在与这家银行的往来账户上。银行家之间进行定期的结算。

人们普遍认为南欧的清算银行体系在15世纪期间，特别是这个世纪末期，经历了严重的危机。意大利尤其如此，那里有数不清的引人注目的银行破产事件，例如90年代威尼斯银行的大量倒闭。这真令人惊奇，特别是因为当时的清算银行体系中存在许多抵销工具来应付贵金属短缺的发生。可能的解释在于大多数清算银行仍旧太小了，它们主要在地方上运作，很少进行地区间或国际间的抵销业务。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15世纪欧洲经济萧

条所造成的互不信任的经济氛围。货币兑换者（银行家）已经自由地对存款实行部分保证金原则，但是投资的机会仍是有限的，而且经常投向具有不确定性的中期贷款。公债常常难以归还，而商业贷款，无论是直接贷款还是经常账户信贷缺口或有抵押的放款，越来越多地因欧洲的各种危机而灾难性地结束。在这种不稳定的条件下，信心——储蓄银行业务的基础——逐渐被间歇性的恐慌所侵蚀。

16 世纪对外贸易强劲的复苏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产生了在南欧建立清算银行体系的新动力。但人们对困难时期记忆犹新。在扩张的第一个阶段即将过去之际，不确定性再次周期性地出现了，这时从意大利开始了建立公立清算银行的运动。1407 年以来，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Casa di San Giorgio*）就已经执行公立银行的功能，但在 1444 年被迫取消了这项实验。然而，16 世纪下半期，公立银行普遍发展而且有所成功。我们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巴勒莫银行（*Tavoli di Palermo*，1552 年）、都灵的圣保罗银行（*Banco di San Paolo*，1563 年）、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Banco di San Giorgio*，1586 年）、威尼斯的利亚托广场银行（*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1587 年）、墨西拿银行（*Banco di Messina*，1587 年）、米兰的圣安东尼奥银行（*Banco di Sant' Ambrogio*，1593 年）。

最著名的意大利公立银行，是根据 1587 年 4 月国务委员会第二号法令【312】建立的利亚托广场银行。它的前身是一个私立清算银行，这个银行在 1560 年以后失去了威尼斯商人对它的信任而身陷困境。虽然这个银行授权给了私人，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威尼斯国会对它的支持。原则上，除了转账之外，也可以提现。但基于经常账户的信贷却是不允许的。此外，1593 年，国会还规定商人必须通过银行的分支机构（*per partita di banco*）支付汇票。在 1605 ~ 1606 年间，所有超过 100 达克特的商业交易都必须在银行结算。实际上，提现在利亚托广场银行很少发生，绝大部分交易都通过清算操作得以结清。而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经常账户上出现大量的借方余额，这不仅是因为商业交易的需要，而且也有投机的原因。由于人们对公立银行很有信心，所以通过银行进行的支付相对于现金支付获得了升水，所以出现对上下波动的升水投机。

比利亚托广场银行甚至更成功的是建立于 1619 年的威尼斯流通银行

(*Banco del Giro*)。起初建立这个银行的目的是处理部分威尼斯公共债务。①这个银行代表国家发行有息债券（*parite*)。政府保证每月支付固定的金额，此外银行支付应付利息以及逐渐偿清本金。这种有息债券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以至于这种公债在一定升水的价格上流通，而且极受欢迎。流通银行的成功吸引了商人的注意，他们日益增多地在那里存款。商人之间的转账和支票的兑现成为流通银行的常规业务。它的竞争力非常的强，以至于迫使一度非常著名的利亚托广场银行于1638年关门停业。

公立的清算银行体系在三方面有所改进，最重要的是加强了信心。这些清算银行，要么在市政当局的直接控制下，要么和可靠的市立公共福利机构有联系，从而置于官方的间接监督下。以下的事实加强了信心的基础：全体存款人，即公众是银行的真正主人；银行管理者仅仅承担了管理功能。其次，账目抵销业务集中起来，特别是在只有一家公立清算银行的城市里。例如威尼斯，直到17世纪第二个25年仍旧是地中海地区著名的商业中心。除【313】了意大利商人之外，许多外国商人都在当地的清算银行有自己的来往账户。那里的集中支付使得有效的多边国际支付清算有可能实现。最后，意大利公立清算银行本身也制造货币。例如那不勒斯公立清算银行，也大量地接受存款，在此基础上，存款顾客为他们的债权人提供由银行支付的支票，而支票上的金额由银行划转到债权人的账户上。如果债权人不是银行的顾客，债务人就给他提供欠款证明（*fede di credito*)，债权人可以将其支付给第三者，或者有可能是第四者、第五者，但这个人必须是这家银行的顾客。这种欠款证明后来开始流通。由于意大利公立清算银行通常允许经常账户的透支，而那不勒斯甚至允许抵押贷款或其他贷款的透支。这样一来，银行实际上就以几种纸币的形式创造了货币。

15世纪初，西班牙就已经存在公立的清算银行，例如巴塞罗那兑换银行（1401年)、巴伦西亚银行（1407年)、马略卡岛（Mallorca）的帕尔马（Palma）银行、萨拉戈萨银行（Saragossa）等，但是它们作为商业机构，在15世纪并未比私人的货币汇兑者（银行家）获得更加持久的成功，后者与公立银行一同存在。而另一方面，卡斯蒂利亚的私人清算银行却在同一时期经历了极为显著的繁荣，这里在15世纪末毫无疑问经历了一场危机。

① 德马克（D. Demarco)：《1808年成立的那不勒斯公立银行的一段历史》，第三届国际经济史大会（慕尼黑，1965年）会议论文选编（巴黎—海牙，1974年)，第113~147页；罗莎（L. de Rosa)：《德马克先生与那不勒斯银行的关系的考察》，第三届国际经济史大会（慕尼黑，1965年）会议论文选编（巴黎—海牙，1974年)，第165~169页。

1446 年胡安二世颁布的一项法令，允许在卡斯蒂利亚建立私人储蓄和清算银行，它们必须得到官方的同意和保证书。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许多清算银行在卡斯蒂利亚出现了：布尔戈斯（Burgos）、阿兰德杜拉（Arande de Duero）、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塞戈维亚（Segovia）、马德里、托莱多（Toledo）、科尔多瓦（Cordoba）、贝乍（Baeza）、塞维利亚等。[①] 卡斯蒂利亚清算银行惊人的成功，是这个地区经济扩张以及当地极其重要的与西北非相联系的贵金属市场的明证。在 16 世纪前半期，通过与卡斯蒂利亚的商品展览交易会交织在一起，卡斯蒂利亚的私人储蓄和清算银行仍旧经历了进一步的扩张。但令人伤心的是，西班牙的私人清算银行没有比卡斯蒂利亚的商品展览交易会的繁荣期存在更长时间，16 世纪下半期，这些银行普遍衰落。

1560 年，政府进行了另外一项徒劳无益的尝试。它颁布法令给予塞维利亚贸易商行（*Casa de Contratación*），使其拥有对美洲贸易专有权以及接受存款和执行清算银行的功能。接受存款有助于与殖民地的贸易，从而加强该银行的资金实力。1595 年，政府授予一个私人团体为期 10 年的特许执【314】照，允许其在塞维利亚建立一个垄断性的私人存款和清算银行，但是这家银行在 17 世纪初破产了。只有西班牙东部在意大利的影响下恢复了公立清算银行，例如巴塞罗那 1609 年建立的修戴德银行（*Banca de la Ciudad*）、巴伦西亚 1649 年成立的托里迪坎维银行（*Tauli di Canvi*），以及早先萨拉戈萨建立的戴伯拉商业存款银行（*Tabla de los comunes depositos*）。

3. 从商业集市到金融集市

在南欧，国际商品交易博览会成为 15 世纪、16 世纪支付技术得以进步的第二个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商人银行在南方的国际交易博览会上的霸权地位是无可争议的。汇票的优势地位与此紧密相连。在商人银行监督下的票据交易不仅可以看到国际或地区间的转账，而且日益包括特殊的信贷业务。此外，票据交易形成了套汇交易的基础，这是南欧商人银行的一项主要金融业务。

受到大陆上日益的不安全、来自海上的竞争以及贵金属贮备的逐渐减少的威胁，横跨大陆的商业交易在 14 世纪、15 世纪曾经一度大量地以商品交易博览会的形式进行。在交易会上，至少能保持一定程度规模经济的营业

---

① 菲力浦·吕兹·马丁（F. Ruiz-Martin）：《1782 年西班牙银行史》（马德里，1970 年），第 13～41 页。

额，而且能将使用贵金属进行国际债务和信贷抵销降低到最低程度。15 世纪以后，横跨大陆贸易的强劲恢复和展览交易会的繁荣发展紧密交织，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事。

四个日内瓦交易博览会，14 世纪作为香槟市场的新近的后继萌芽，于 15 世纪中期达到其全盛期，它们形成了意大利与欧洲大陆贸易的新通道。务实的意大利人居住在日内瓦，许多大商号，例如美第奇家族银行（Medici bank），在此有临时性的和永久性的分支机构。这里和法国、加泰罗尼亚、瑞士、勃艮第的世袭领地（包括尼德兰）、莱茵河地区、英国以及南德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日内瓦市场也成为重要的国际清算中心。作为商业交易的记账单位，金衡制重 28 盎司的金马克（可以分为 64 埃居或 66 埃居）成为最新的稳定而颇有价值的标准，被广泛接受。金马克使得国际借贷抵销相当方便，而且主要集中应用于交易博览会期间的款项支付。最后，日内瓦还有繁忙的票据汇兑业务。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汇票，而且有可能从美第奇家族银行的账户衍生而来，而套汇交易是意大利商人银行的一项普通业务。绕过汇兑市场的系统的信贷创造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所有的汇兑操作，日内瓦都以它们的当地价格标价，即用金衡制重 28 盎司的金马克或者埃居[①]报价。金马克于是不仅支配了商业交易结算，而且支配了货币和汇兑市场。这是支付方式的非凡的简化，它进一步增加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多边清算的尺度。除了以上的优点外，日内瓦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支付和抵偿并不是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而且没有正式的固定汇率。 【315】

通过创造“集市银行”（fair banks），在卡斯蒂利亚的交易展览会上，清算银行体系和集市结算形成一种特殊的结合。卡斯蒂利亚交易展览会——维拉隆（Villalon）、瑞欧塞克（Rioseco）和坎波城（Medina del Campo）——起源很早，但只是在 15 世纪后半期随着西班牙的商业扩张才显现了显著的重要性。1495～1505 年期间，坎波城的 5 月和 10 月交易展览会，瑞欧塞克的 8 月交易展览会，以及维拉隆的大斋戒交易展览会，在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支持下，获得了结算集市的地位。卡斯蒂利亚交易展览会，现在就可以加入已经形成的欧洲商业和结算交易展览会体系［包括里昂、布拉班特、法兰克福—美茵河（Frankfurt-am-Main）］，从而享有了 16 世纪前半期的巨大繁荣。

集市银行是卡斯蒂利亚交易展览会所独有的。在卡斯蒂利亚集市上从事

① 这种埃居起源于一种真正的金币，即萨瓦埃居（*écu de Savoie*）。

存款和清算银行业务的货币兑换者（银行家），为每一个城市或一组城市指派一位代表，他被授权在特定的集市期间为其委托人执行银行业务，而且准予顾客一定限额的信贷。这种临时性的集市银行的重要性起初主要是地方性的，在集市期间，它们不仅兑换钱币，而且通过转移债务，为作为委托人顾客的叫卖小贩和店主，提供赊账购买担保或者购买经费。在里伯罗麦尔（*Libro Mayor*），在这种转账情况下，在地方货币兑换者（银行家）的账目上记入借方，而在另一方即受益人银行的账目上记入贷方。而商贩在获得利润后，以其销售收入偿还地方货币兑换者（银行家）。他们的销售用现金或者期票结算。期票由农民和牧羊人即将收获的农作物或者要剪的羊毛做抵[316]押，或者归于下一次结算，或者是官员的工资，或者是食息者的利息收入。

随着卡斯蒂利亚交易展览会的国际化，集市银行，特别是坎波城的集市银行，获得了全欧洲性的地位。同时管理也更加严格。银行家举行会议的地方连在一起，他们在上午开市两个小时，而在傍晚也开市两个小时，这时商人来向他们债务人的银行家提供到期的期票和汇票，而同时又通知他们自己的银行家。这样，结算就通过在作为债务人的顾客的账目上记入借方，而在作为债权人的顾客或他们的银行家的账目上记入贷方来完成。每隔两天集市上的银行家就集中在一起，进行借贷抵销并汇划结算。汇率仍旧不是系统地固定下来，但是从大量的新的汇兑交易中得到大多数意见。经纪人的信息和运输财宝的船队到达塞维利亚的信息，自然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坎波城集市上结算的重要性可以由集市银行的账册的多少来说明，在1530～1550年的转型期内，每次集市的账册多达13 000～14 000页。在清算和汇兑业务之外，在两次集市之间还有存款或汇票形式的贷款。在内地，汇票也很普遍。然而，1534年以后，开始有了限制这种形式信贷的措施。在16世纪40年代末，跨集市的汇票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地汇票被禁止。这妨碍了塞维利亚的贸易，这里的商人习惯于在卡斯蒂利亚的交易展览会发行债券（*letras de credito*）以装配西印度商船队，在其基础上，坎波城集市上的卖方可以在塞维利亚开出汇票。

随着卡斯蒂利亚的交易展览会的国际化，布尔戈斯的大商号也积极地活动在坎波城。由于它们控制着西班牙北部的生产和出口（首先是羊毛），而且拥有建立在海上保险业上的巨大的财政金融力量，因此它们对清算过程和汇率波动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逐渐地，布尔戈斯大商号的权力被热那亚的金融家所接管，它们和为哈普斯堡皇室财政提供服务的塞维利亚的银行一起，驻扎在卡斯蒂利亚的交易展览会上。支持卡斯蒂利亚汇兑和信贷市场繁荣的

商业资金，现在迅速地被作为贪婪的国库代表的热那亚银行家所榨干。16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预示着商品交易展览会的衰落。此后不久，通往西北欧的大西洋航线变得不安全，塞维利亚和意大利的商业与金融联系在热那亚的指导下得以加强。这不仅决定了卡斯蒂利亚商品交易市场的命运，而且坎波城的清算市场也逐渐衰落。1605 年，它们被交易者（*asentistas*）彻底废弃。【317】

里昂的交易展览会通过一个不同的体系——多方票据交换（*virement des parties*），使得国际清算和转账更加完善。1462 年，法王路易十四决定将日内瓦城的交易展览会迁往里昂。然而，1484 年里昂暂时失去集市特许权，而由博格斯（Bourges）和特鲁瓦（Troyes）获得。所以，直到 1494 年里昂才开始了具有决定性的扩张时期。里昂集市独一无二的成功之处，源于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之间横跨大陆贸易的复兴、法国瓦洛斯诸王对意大利领土的野心，以及里昂的国际贸易和金融霸权从托斯卡纳人过渡到热那亚人在 16 世纪上半期的完成。在里昂集市上，托斯卡纳、米兰和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不仅指挥着范围广大的国际贸易，而且这里同时还集中着国际清算、转账、汇兑和信贷业务，所以来自法国、尼德兰、莱茵和南德的商人不得不仿效他们。这样一来，里昂的四个集市（主现节、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8 月初和万圣节）就获得了双重特殊地位。首先是每年四次的商品交易博览会，每次持续两个星期。其次就是汇票市场，大约持续一个星期。汇票市场并不总是紧接着商品交易展览会，由此逐渐就获得独立地位，发展成为和卡斯蒂利亚相似的特殊的汇兑集市（*foires de change*），也就是汇兑市场。

里昂清算市场的规章制度是很严格的。① 在集市的前两天，商人们集中在佛罗伦萨式凉亭的外面，聆听到期票据的公共点名。汇票有可能被承兑，也有可能被拒付，还有可能在立下拒付证书后被承兑。每人在一份官方证明文件（*bilan des acceptations*）中申请自己可接受的债务和债权，这些条款在商人中具有法律效力。在第三天举行一个新集会（*jour des changes*），佛罗伦萨“国”的领事在这里宣布下一次里昂清算市场举行的日期，以及在外国城市和外国集市上缔结的票据的支付日期。在经过商人正式批准之后，佛罗伦萨人、热那亚人和卢卡人（Lucchese）商议出适用于本届集市期间所缔结的合同的汇率，这些汇率的平均数接着由佛罗伦萨领事予以宣布。效法日内瓦，里昂也以当地的价格报价（固定汇兑），也就是以金马克及其账目上的【318】

① 海克森（R. Gascon）：《17 世纪的城市商业：里昂的市场》第 1 卷（巴黎，1971 年），第 236 ~ 279 页。

分度埃居（每马克汇兑65埃居）标价。因此，所有的债权和债务都以相同的记账单位来表示。

除了公布外国票据的汇率之外，王国的主要中心也公布内地汇票的比价。它们以埃居的一定折扣来表示。最后，虽然并不正式宣布，但是承兑汇票的利率也由此得以决定。承兑汇票是以一定的利息从一个清算市场为下一次集市所借的钱，这是一种在里昂特别普遍的信贷方式，直到1571年罗马教皇颁布禁令。于是汇兑日结算在实际的结算中开始出现，这样的结算或者通过票据交换，或者通过现金。每一位商人都有自己的官方证明信件，上面载明他的借项和贷项。债权人和债务人或者可以相互抵销他们之间的借项和贷项，或者两者商定由第三方，即债务人的债务人付款给债权人的账户。一旦所有的抵免都进行了，那么可以有新的买卖契约为下一期清算市场创造相对应的抵免，或者由新的外国汇票来创造。如果仍有亏空，那就应该用现金来结清余额。如有必要，可以向商人银行借款，其利息在1540～1600年间在2.5%左右波动。

里昂的账目抵销体系的成功，在于其巨大的规模以及它所集中的清算的国际性质。但是从16世纪中期开始，法国国王对里昂货币和汇兑市场无穷无尽的信贷需求日益增加。和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一样，商业资金逐渐被过度的政府提款耗尽。16世纪50年代，国际贸易和货币市场的缺口已经很大，紧张的财政形势严重妨碍了商业交易。1562年以后，每季一次清算期变得极不规律之后，灾难就快要来临了。宗教战争使得里昂集市彻底衰落，只有汇兑集市在17世纪作为意大利和热那亚银行业的附属而仍旧保持着一定的重要性。

贝桑松和皮亚琴察的集市在某种程度上是里昂集市的延续。① 当热那亚的商人银行家通过他们和塞维利亚的关系，在卡斯蒂利亚和里昂的集市上开始加强他们在欧洲国际银行业的地位时，法国君主却想通过里昂在其独占下利用这个新兴的权力。之所以选中贝桑松，不仅因为它离里昂的距离近，而[319] 且因为它为被禁止的常用的有息贷款方式提供掩护。

从1579年开始，热那亚人取得了在欧洲分配美洲白银的无可争议的控制地位，这样的集市就在皮亚琴察举行。贝桑松和皮亚琴察的集市主要是票据清算市场。它们发展成为交易集市的原形，传统的账目抵销技术获得了很

① 达塞尔瓦（J. G. Da Silva）：《17世纪意大利的信贷银行》，第1卷（巴黎，1969年），第25～281页。

大的改进。集市与商品和贵金属贸易的联系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里昂、威尼斯、莱格姆（Leghorn）和米兰的贸易，热那亚人控制下的由西班牙到热那亚和其他地方的白银运输，都在积极进行着。盾（*scudo di marche*）或埃居形成了所有交易的记账单位，它是一个假想的记账货币，其价值起初是由以下七种金币的平均价值决定，这七种金币分别是在安特卫普、西班牙、佛罗伦萨、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威尼斯铸造的金埃居（其固定比价为101埃居等于100盾）以及法国埃居（*écu de soleil*，其比价固定为100法国埃居等于103盾）。1671年以后，一种热那亚大银币也被用做参考货币。

在贝桑松和皮亚琴察的集市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普通汇票交易和连锁汇票交易。[①] 普通汇票交易包括 *cambium-recambium*，它的费用包含在再汇兑中，所以利息实际上是累积的。连锁汇票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有息贷款，它在交易时，出借人和立票人达成一项协议，指定其他地方的第三方为汇票的付款人和受益人。这个第三方不仅承兑这张汇票并将款项付给自己，而且同时又开出一张新的由最初的立票人付与最初的出借人的汇票。所有这一切都依赖双向指令，由出借人和立票人及汇票一起提供给付款人。

这种清算规则受到里昂集市惯例的强烈影响，同时也需要一些重要的技术改进。首先是普通的清算。和里昂的情况一样，每一个汇兑银行在它的 *scartafaccio* 建立它自己的承兑汇票资产负债表，在第三天商人们聚集在一起确定官方汇率。接下来就进行到期汇票的抵销，合同各方通常在这里缔结新的汇兑合同，这是在自由汇率的基础上进行的，银行家只是将官方汇率或多或少地看做他们的指南。有了这些汇票，汇票承兑资产平衡票的最初的贷方余额或借方余额（*avanzo or mancamento*）经常就会消除掉。但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假如有位银行家想对某一特定地区汇拨特大数目的金钱时，他就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他的贷方（*avanzo*）余额。【320】

贝桑松和皮亚琴察的集市上的账目抵销，并不是像里昂那样通过到期汇票的双边或多边结算来进行，而是通过相互签发汇票，以及在其他地方开立汇票进行信贷转让来实现。热那亚人的清偿在余额清算中占了第一位，也就是说，每一个集市的票据抵销和有效的货币及信贷市场的存在有着天然联系。如果仍有余额，银行家就必须通过金埃居的支付来消除它。在集市的第八天，每一个银行家都必须递交一份平衡的结算资产负债表给市场的领事。

除了普通的汇兑操作外，也有连锁汇票，这种业务完全在资产平衡表以

① 曼迪奇（G. Mandich）：《17世纪意大利汇票市场的变迁》（巴黎，1953年），第5～59页。

外运作。贝桑松和皮亚琴察集市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的汇率上。在集市上开立的连锁汇票总是假设其再汇兑率遵循官方的汇率，而且因此贝桑松和皮亚琴察集市上的汇率总是固定为其他集市利率的函数，所以汇票的最初出借人的利润就得到保证。埃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稳定性是这种体系成功运作的重要因素。从热那亚集市开往其他集市的连锁汇票当然也很普遍，然而，那里的汇率并不像贝桑松和皮亚琴察集市的汇率那样稳定，所以风险很大。

热那亚集市对金融技术的改进在于其对国际清算的控制和票据交换。如果热那亚银行家要在其他他们需要钱的集市上购买汇票，他们就在贝桑松以及后来的皮亚琴察集市集中进行他们所钟爱的汇兑业务。相反的，如果他们需要通过抵销在其拥有可利用资金的集市上出售汇票，那么他们就在贝桑松和皮亚琴察集市上集中进行由他们自己支付的汇票（*traite*）。国际套汇交易总是可以使国际货币流动的成本最小化，或者迅速取得额外的投机。黄金相对价格的强劲增长以及相应的投机于金银比价的可能性，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每一个集市上，一小撮具有世界影响的银行家商谈大约 1 600 单汇票的买卖事宜，每单的平均价值超过 1 000 万埃居，其中的 1/3 在资产负债表上相互抵销掉，其余的就进行余额支付。这是一项不平凡的成果。热那亚银行业在南欧的霸权导致了国际清算的集中以及货币的流动，因此达到了相当大的抵销金额。银行业与商业的持久联系，确保了可以通过抵销给商人提供【321】良好的金融服务、支付国际商业债务以及完成国际货币和金属货币的流动。

热那亚集市的第二个技术特征是控制的加强。汇兑银行业务只是由一个数量受到限制的团体来进行的。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热那亚集市的全盛期有 40～60 家汇兑银行。只允许汇兑银行从事汇票承兑业务，其中包括确定汇率以及为了弥补借方余额或贷方余额而谈判买卖的新汇票。由此将国际清算业务置于一个新的热那亚技术银行家协会严格而集中的控制下，并处于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导下。

最后，热那亚金融集市也为在南欧建立一个成功稳定的货币市场打下了基础。票据交易（*foire de change*）的可靠组织、连锁汇票业务的展开以及埃居币值的稳定都使得投资的安全性有所保障。贝桑松和皮亚琴察汇率的发展是这种稳定性的光辉例证。在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遍布全欧的流通记账货币无情的大贬值中，贝桑松和皮亚琴察的埃居币值仍旧保持不变，这就为投资获得相当稳定的而并非壮观的利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这里，需要资金的南欧商人发现了主要的信贷工具。它不仅可以通过作为中间人的商人银行利用汇票提供的常规信贷手段，而且可以在集市上开立连锁汇票，这有助于

获得较长期的信贷。

热那亚商人银行家指导下的贝桑松和皮亚琴察汇票承兑市场，形成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南欧银行和信贷制度发展中的顶峰。它们也有自己的终点，时间表明在南欧经济结构框架内，银行和信贷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最终完全丧失。

4. 安特卫普的现代背书和贴现

16世纪北欧金融技术的进步在于工具方面而不是在制度领域。流通中商业工具的重要革新逐渐聚集到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意大利人在金融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当然对北欧的金融发展有所影响。无数的意大利商号常驻在布鲁日以及后来的安特卫普。与南欧的许多接触，包括佛兰德和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商业通信，也推进了意大利的金融专业技术在北方的传播。1543年，安特卫普一本作者为伊穆平·克里斯托弗（J. Ympijn Christoffel）的出版物《*Nieuwe Instructie... rekeninghe te houden nae die Italiaensche maniere*》，第一次提到安特卫普在意大利人明显的影响下已经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322]

西北欧的金融技术革新并不仅仅是意大利的翻版。北欧的金融技术的进步有其自己的独特性，首先是在安特卫普，后来在伦敦更是如此。这些特征是独特的（*sui generis*），它形成了近代贴现和发行银行体系的直接基础。确实，近代初期西北欧的金融的制度性结构和工具性结构与南欧的大不相同。布拉班特集市（安特卫普和贝亨奥普佐姆）和法兰克福的麦森（*Messen*）也不例外。但是，从15世纪后半期起，在与里昂和卡斯蒂利亚同样的商业金融环境下，它们经历了明显的扩张。它们进而形成了北欧、东欧和南欧之间一个理想的季度国际汇票交易点，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像南欧那样形成真正的汇票交易。直到16世纪末，至于说到支付期限，根本就没有汇票市场，只有每季一次的结算日。

14世纪在布鲁日的货币汇兑业就已经完全形成的存款和清算银行体系，在15世纪、16世纪的北方没有进一步的扩张。相反，15世纪遍布欧洲的存款和清算银行体系的危机，对北方造成的破坏要比南方大。也许存款和清算银行在北方的最新发展对其分布的更加严格的限制，以及勃艮第公爵妨碍性的政策共同造成了这个结果。由于这些银行家与货币兑换者的联系，公爵们将这类银行视为对他们的金融集中政策的威胁，所以在1433年、1467年、

1480 年、1488 年和 1489 年连续地对其发布禁止令。曾经在安特卫普和贝亨奥普佐姆（Bergm-op-Zoom）经营业务的少数几个存款和清算银行，在 15 世纪末之前就消失了。

在 16 世纪初欧洲的商业扩张中，北方的存款和清算银行体系没有明显的恢复。在安特卫普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大都市，存款和清算银行从来没【323】有成为典型的金融机构。当然，随着安特卫普的货币市场获得了全欧性的地位后，逐渐出现了许多货币兑换者或金融经纪人，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清算银行，只有 16 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兴起的现金保管业（*kassiersbedrijf*）预示着未来的变化。在这之后，尼德兰的对外贸易具备了民主的性质，许多国内小商人通过参与制和委托从事世界贸易。具有良好的金融专业技术知识的现金保管者（*Kassiers*）开始为他们的商人客户保管现金，他们代表雇主为其开展代收代付业务。向存款和清算银行体系的过渡并不困难，而且有无数的迹象显示 16 世纪后期采取了系统性的过渡步伐。但是商业衰落和政治金融的不稳定已经影响了安特卫普的经济，使得它不能彻底突破。直到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的现金保管者的业务才得到完全的发展，成为私营存款和清算银行机构。

但是，北方对汇票一无所知。在 1550 年之前，汇票确实不是对外贸易中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工具。在汉萨同盟城市内，汇票的使用是微不足道的。从 16 世纪中期，确切地说是后半期，汇票很快在北方普遍使用，包括汉萨同盟城市和波罗的海地区。即使这样，汇票在北方的对外贸易中没有获得彻底的垄断地位，而且在很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来自其他金融工具的竞争，特别是无记名期票。然而，安特卫普的考斯特曼（*Costuymen*）对此一清二楚。1570 年的方案有 8 种条款给予本票，3 种给予汇票；12 年后的 1582 年这个比例是 10:11；最后，1608 年的方案给了本票 17 个条款，而给予汇票 77 种。

然而，无论汇票对西北欧的对外贸易有多重要，自中世纪后期以来，不同金融中心和集市之间的套汇交易对北方的公司来说就不是一项基本业务，而对南方的商人银行家来说却恰恰相反。在北方，汇票首先是作为国际支付工具，以后又日益成为国际信贷工具。套汇交易并未消失，但一般来说，它只是从属于汇票的商业目的。

而建立在展期基础上的本票，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就是北方对外贸易中典【324】型的、占支配地位的证券，它在 15 世纪、16 世纪继续保持其地位。大西洋经济的扩张通过展期鼓励着更大范围的信贷扩张，以及信贷期限的延长，从

而更进一步强化了通过商业和信贷工具的使用加速货币流通的需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信贷工具就必须是可以汇兑的。早在中世纪后期，就经常开立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但是持票人不恰当的保护，继续妨碍着这种本票的活跃流通。此外，16 世纪中期以后，安特卫普跨集市的存款日益获得成功。居住在安特卫普的意大利人对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543 年的帝国法令允许商人之间的有息贷款，规定其年息最高不能超过 12%。这个法令也鼓励了跨集市存款的扩张，当然也包括没有季度支付日期规定的普通商业贷款。

16 世纪北方有许多处于萌芽期的新的商业中心，在这里起诉常常发生。因为这里的商人群体不像在南方传统的商业中心那里的商人群体那样关系紧密，不知名的、不可靠的新来者不断地来到这里。安特卫普是 16 世纪北方新兴的商业中心的象征。这里第一次采取了具体而成功的措施，简化而且保护商业和信贷工具的转让。

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对具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持票人的法律保护。为了使不履行责任的债务人满足本票持票人的要求，即使附带持票人条款，也首先要求要么从原始债权人那里获得明确的授权（顺便提及这种授权可以随时取消），要么通过正式的手续（*cessio*）进行正式的转让。安特卫普 1507 年的一项司法裁决，授予了本票的持票人在起诉破产的债权人时与原始债权人相同的权力。其他城市，像布鲁日、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乌特勒支都遵循安特卫普的先例。1537 年的一项帝国法令（Imperial Edict），宣布了这个灵活的程序规则适用于整个尼德兰地区。

给予持票人正式的法律担保，极大地促进了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在安特卫普的流通。16 世纪中期和后期的商业通信和法庭记录，都显示出这些本票通常流通 10 次甚至 12 次。在北方，汇票通常也包含持票人条款，而且也可以流通。安特卫普交易所的清算集中于每天的某些时段。1531 年一幢辉【325】煌的新建筑对此开放，这鼓励了商业和信贷工具的使用和流通。尤其是本票，它的期限比较长，特别适合流通。结果，本票不仅作为支付的手段使用，而且推进了债权债务的抵销。本票通常一直流通到有人最终将其支付给本票的债务人为止。

16 世纪安特卫普交易所清算的集中，也鼓励了债权债务的国际清算。更重要的是，安特卫普交易所是商人和金融家的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世界，在它的内部，相互信任关系可以系统地发展。一些公司在交易所获得如此的金融实力和良好声誉，以至于它们签发的本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从而在

市场上自由而平稳地流通。安特卫普的富格尔布雷夫（*Fuggerbriefe*）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从此，打开了可转让本票的大门，它在17世纪的英国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安特卫普不仅改善了对本票持票人的**法律**保护，而且改进了对他们的**金融**保护。因此，技术进步逐渐从**可转让性**过渡到**可兑换性**。对持票人的法律保护暗含着不可靠的威胁，法庭倾向于将所有的转让视为合法的手续，这就免除了转让过程中债权人的所有责任。对持票人的法律保护程度越高，他的金融安全度就越低，特别是他对债务人不熟悉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为了消除这个缺点，安特卫普的商业界将担保原则应用到附有持票人条款本票的流通中。担保是让第三方偿付债务的古老的方式。中世纪后期，担保在欧洲北方和南方的地方商业经济中普遍使用。当局常常利用这种方法将支付的债权人指定为关税包收人、不动产管理员以及市库等等。担保具有重要的法律特征：让与人一直负有为受让人付款的责任，直到债权人宣布债务彻底清偿为止。将担保原则应用于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的流通转让，这意味着持票人获得了更大的金融安全保障。以这种方式，转让过程中不同的债权人就对偿付负有连带责任。安特卫普一些像伊拉兹马斯·斯凯茨（Erasmus Schetz）的银行家，力劝市政当局说服布鲁塞尔政府，将担保作为商业工具转让中对【326】持票人的金融保护而合法化。1541年10月31日的帝国法令使得上述努力得以成功。担保的合法化，在1608年安特卫普的考斯特曼汇编物中也得到相近的说明。[①]“任何人如果被其债务人指定（be reffered）给第三者，由第三者来还债，依次又转手给第四人、第五人以及更多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了转让。如果最后一个人不付款给他的话，那么所有被指定的人都有偿付的义务。”这样的法律规定，对商人们之间形成更加信任的气氛具有相当显著的鼓励效果。

商业通信、账簿、商业经营手册甚至托马斯·康泰里尼（Tomasso Contarini）于1585年在威尼斯国会的证词，这一切都证明了在16世纪的安特卫普，担保原则在具名商业证券（commercial instruments to bearer）流通中得到了频繁使用。安特卫普的法庭记录，在担保的情况下也确认了对持票人的

---

① 'Als ijmant bij sijnen schuldenaer op een anderen wort bewezen, om bij hem betaalt te worden, ende alsoo van handen tot handen voorts tot vier oft vijff persoenen ende meer, die de bewijsinge al aenveerden, indijen hij bij den lesten niet en wort betaelt, heeft tot sijne voldoeninge verbonden alle degene daerop hij bewesen is.' G. De Longé, *Coutumes du Pays et Duché de Brabant. Quartier d'Anvers.* IV: *Coutumes de la ville d' Anvers*（布鲁塞尔，1874年），380, art. 14.

金融保护。在汉萨同盟和英国，附有持票人条款本票也照样流通，而且担保原则也同样适用。

在安特卫普，本票的转手交易特别频繁。证券的流通频率和担保原则在其中的系统应用的关系，在安特卫普第一次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在活跃的具名商业证券转手流通中具体地应用担保原则，就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案使得后续的让与人对情况有所理解。如果需要，账目经常在商人之间充作证明。也有迹象表明安特卫普的证券转让中出现了一种担保票据，它附加在要交易的证券上。根据麦利奈斯（G. de Malynes）所说，在鲁昂和里斯本，担保要在市政登记簿上正式记录，但这是一个相当麻烦的程序。

对本票进行背书作为一种担保的指定形式在 16 世纪的北方很少发生（如果曾经出现的话）。目前我们仍旧不明白这决定性的一步为什么在这个世纪没有迈出，难道是因为总是在本票的背面注明“部分支付”的习惯吗？在英国、诺曼底（鲁昂）和尼德兰，背书条款通常以这样的形式应用（“其中……一部分在票据背面背书”）。[①] 并非所有本票都同样活跃地流通，只有那些值得信任的人签发的本票才迅速地在人们之间转手。【327】

汇票的情况与此不同。从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汇票的使用就渗透到北欧的国际贸易中。这个突破主要是由西北欧商人的商业视野的扩大，以及从事对外贸易的小商人的激增决定的。然而，这两种情况都引起了转让的风险。由于 16 世纪欧洲北部清算银行体系的不发达，通过银行汇票进行支付几乎不为人知，因此通过其他（应付）票据实施票据清算的传统得以继续存在。[②] 而一本 1590 年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名为《范德·梅特财务总管》（*Tresoir van de Mate*）的小册子的作者（它可能是一个安特卫普人），指出了由于简单的持票人条款而使用汇票所冒的风险。杰拉尔德·德·麦利奈斯（Gerald de Malynes）在他 1622 年的《迈克托瑞法典》（*Lex Mercatoria*）中，再次强调了这个缺点。因此，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需要担保有进一步的正式发展。为了保护尼德兰的持票人，1541 年一项适用于所有商业证券的法令清楚地将担保规定为一个必备程序，而担保在原则上已经应用于本票的转手

① 皮尔（J. Peele）：《通向熟练掌握信贷知识之路》（伦敦，1569 年）。

② 汇票和支票中早先使用原始的背书形式的例子见于威尼斯（1386 年）、普拉托（1394～1410 年）、佛罗伦萨（1430～1494 年）、热那亚（1459 年）、里昂（1519 年、1537 年、1547 年）、塞维利亚（1537 年）、坎波城（1561 年及其后）。要获得概览，见雷蒙·德·罗维尔：《美第奇银行的兴衰史 1397～1494 年》，《哈佛商业史研究》第 21 期（马萨诸塞，剑桥，1963 年），第 137～140 页；雷帕尔（H. Lapeyre）：'Las origines del Endoso de letras de cambio en España', *Moneda y Credito: Revista de Economica*, LII（1952）.

交易。

第一次对汇票转让进行官方的正式管理，是 1608 年安特卫普的考斯特曼。为了增加持票人的金融安全，在汇票转让中强行实施联合署名（*avallo*）体系。按照这个体系，所有的连续转让债权人的名字都必须写在汇票上，因此，所有这些人对最后持票人负有最终支付的责任。杰拉尔德·德·麦利奈斯在他 1622 年的《迈克托瑞法典》中，推荐英国使用这个体系，但到这时，一些突发事件已经突然袭击了这个体系。联合署名（*avallo*）体系具有严重的缺陷：所有的让与人此前都必须认识。此外，这实际上是一种担【328】保债券，它给予持票人先于第一债务人要求让与人付款的权利。

因此，安特卫普的商业实践进一步朝着维持特殊的担保原则的方向发展。汇票在发行时就在背面明确地注明在担保下进行转让，例如注明"罗伯特·拉格（Robert Rug）先生签名后由我收讫，我已经将收款权利转让给他"［由塞尔贝（W. Selby）签写］，这是 1611 年 4 月 20 日安特卫普的汇票范本。[①] 这就是现代背书的起源，这时汇票就不仅更易于转让而且更易于兑换，也就是说持票人比早先拥有了更大的金融保证，他们共同为偿付负责而不需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担保。

从 17 世纪初开始，背书在安特卫普发展很快。雷蒙·德·罗维尔和雷帕尔（H. Lapeyre）已经指出，现代背书早在 16 世纪末的托斯卡纳就可寻其踪影，这可以看做是安特卫普的原型。但是汇票在欧洲南部仍不能足够广泛地流通以使背书扩大其有效范围。此外，在整个 17 世纪，背书在意大利遇到法律上的反对。而在安特卫普，恰恰是商业证券广泛的转手流通以及担保的实施，使得背书广泛传播而且获得成功。这个习惯从安特卫普开始传遍了西北欧的其他商业中心，这个扩散过程显然在 17 世纪的第二个 25 年达到了巅峰。根据杰拉尔德·德·麦利奈斯的《迈克托瑞法典》(*Lex Mercatoria*)来判断，这时近代背书在英国还没有形成。而约翰·马略（J. Marius）于 1651 年在英国出版的《对汇票的建议》(*Advice concerning Bils of Exchange*)却详尽地介绍了近代背书，在例子中马略使用更现代的表达方式"某人或指令"（A or order），但原始的说法"某人或他的指令"（A or his assigns）仍旧频繁出现。这是另一个说明商业证券的可兑换性，是非常稳固地植根于担保的古老方法中的例证。

安特卫普不仅为近代背书奠定了基础，而且它在近代贴现（在到期日

① 雷蒙·德·罗维尔：《14～18 世纪汇票的演变》（巴黎，1953 年），第 155 页。

之前以低于票面价值的金额将一项商业所有权提交给第三方）的起源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安特卫普的第一例近代贴现出现在凯特森（Kitson）文件中，它涉及在1536年对一单期票进行贴现。①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外。债权【329】人通常仍旧将他们的本票和汇票保存在文件夹中，直到到期为止。如果债权人突然需要现金，他将会要求一个或多个债务人以一定的折扣提前偿还他们的债务。这仍旧是在中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的古老的程序，即传统的打折。

16世纪，安特卫普货币市场的强劲增长以及商业证券的频繁流通，一定会创造出近代贴现的条件。货币经销商在安特卫普交易所获得重要的地位，他们提供跨集市的信贷。在安特卫普交易所，用具有持票人条款的到期本票和到期汇票偿付债务已经形成惯例。但在 *strettezza* 时期，债权人常常会选择现金。这样货币经销商就从中牟利，他们用现金以一定的贴水尽量收购到期的商业证券，包括本票和汇票。这仍旧不是近代的贴现，而只是以硬通货购买的特殊的贴水。然而，市场上也越来越多地用未到期的证券进行结算，通常用具名本票。一旦货币经销商也开始囤积这种未到期的证券，近代贴现就诞生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安特卫普公司的账目以及安特卫普会计技术手册，包含着大量近代贴现的证据。在16世纪末，贴现也在汉堡得到应用，这可能是受到这里的佛兰德商人流亡者的影响。②

直到出现时为止，安特卫普和汉堡的近代贴现业仍旧更多地和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相联系，而不是汇票。这不难想像，本票通常长期流通，有时甚至达到12个月或者更多，所以将其兑现的需要常常相当迫切。③ 然而，将汇票全面引入西北欧也是为了培育票据贴现。根据1560~1600年间市政【330】法令的证据显示，货币经销商和现金保管者的习惯是在 *strettezza* 时期，在安特卫普交易所以一定的贴水大量买进票据。这样的操作非常普遍，以至于到期票据和未到期票据不再有所区别。1560年3月，从里昂和贝桑松到安特卫普的应该在5月份集市到期的汇票，立即被货币经销者以一定的贴水用现

---

① 参见一个英国商人的代理人在卑奥普佐姆（Bergen-op-Zoom）和安特卫普集市上的账目（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

② 莫里尔（J. Moriel）的现金簿，Antwerp: 14. IX. 1567: 'Jay acheptè de Mathias Zimmerman une chedulle de Jehan Ployart de £ 320. –, quy est a payer adi 20 octobre prochain, pour la mesure jay payé comptant £ 306. – [quoted by 达塞尔瓦（J. G. Da Silva），《17世纪意大利的信贷银行》第531页]. Examples in manuals on bookkeeping'. *inter alia in* V. Mennher, *Praitique brifue pour cyfer et tenir liures de comptes touchant le principal train de marchandises*（Antwerp, 1550）; H. L. V. De Groote, 'De "arithmétique" van Mellema', *Scientiarum Historia*, v（1963）.

③ W. Brulez, *De Firma Della Faille en de internationale handel van Vlaamse firma's in de 16e eeuw*（布鲁塞尔，1959），第403~404页。

金购买。这已经是近代贴现银行业务的一个清晰的例子了。在1600年之前，贴现仅仅是个别的例子，只是在货币市场紧张时才出现。但是1600年以后，安特卫普的近代贴现业具有了规则性特征。17世纪上半期，背书的传播和银行业的持久繁荣一定对此有所贡献。近代贴现银行业从此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事实。

1531年，新开业的安特卫普交易所最初既是为商业交易也是为金融交易准备的。但逐渐地，它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货币和金融交易所。商业合同和协议日益增多地在按照“英国式交易”（English Exchange）来缔结，而它比金融交易所提前一小时开市。贸易逐渐地从金融中分离出来，这就为金融证券的技术发展创造了有利的背景环境。交易所非常的强而有力，以至于1571年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在伦敦伦巴第街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交易所，这几乎是对安特卫普的完全模仿。

金融交易在安特卫普交易所的集中也引起了投机。甚至在北方的城市里，投机也绝不新鲜，但是在安特卫普交易所，投机具有更加系统、更有组织的特征，虽然仍旧紧密地和老实的传统赌博相连。赌博常常和商业及金融交易的结算相联系，也可以就船只的安全归来、菲力浦二世访问尼德兰的可能性，以及未出生小孩的性别等进行打赌。彩票，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立的，都非常受欢迎。早在1524年就有人建议为了防止滥用，应将彩票提交皇帝正式批准。

在这种投机气氛中，期货交易逐渐发展起来。首先出现的是远期交割的固定购买：买主购买商品，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付款，他推测商品的价格会在交割日前上涨，因而在交割日卖掉货物，并且赚取价格差；相反，卖主对商品看跌。这里进行的是差额交易。在价格容易有相当大波动的商品上，例如粮食、盐和鲱鱼，这种投机就很普遍。此外，保证金交易也已经在安特卫普【331】流行，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还没有捕捞前就购买鲱鱼。买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签订合同购买期货，但条件是他可以在两三个月后对合同重新审议，如果他付给卖主一个贴水，他这时就可以撤销购买合同。[1] 投机者在卡斯蒂里亚和里昂的集市上投机于汇率的涨跌，他们保留支付贴水的权利。安特卫普海上保险的发展也同样地和投机紧密相连，许多商人，包括小商人，参与海上保险业，他们期待通过获取保费收入得到投机利润。个别专业保险公司，

---

[1] *Tresoir vande maten, van gewichten, van cooren, lande, vande elle ende natte mate, oock vanden gelde ende wissel*（阿姆斯特丹，1590年），第197页。

在16世纪已经通过估算概率进行风险计算，其结果常常令人失望。

投机性的气氛将使得安特卫普交易所背上不稳定的名声的危险并非空穴来风。安特卫普商人丹尼尔·范德尔·莫林（Daniël van der Molen）在1541年这样写到：*per esser la Borsa chomo un bosco*。从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帝国法令一直努力调控安特卫普交易所的金融活动。投机逐渐采取正常交易的方式。

结论必然是：16世纪是西北欧金融获得巨大进步的时代。这在北方所有成长中的商业中心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但没有其他地方的革新比安特卫普更剧烈，它是北方辉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具名商业票据的频繁流通为后来本票的成功开辟了道路，担保为近代背书后来的突破打下了相应的基础，现金保管业务的发展以及本票和汇票的贴现为近代贴现银行业铺平了道路。这些都是金融工具领域中关键性的革新，它们以安特卫普交易所的成功为支持，直接指向下一个世纪进一步的制度进步。

5. 17世纪欧洲南部的晚期繁荣

16世纪、17世纪南欧的大商人银行日益增多地置身于公共财政中。然而，以公债合同的形式提供的公债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在与尼德兰或德国的贸易中有贷方余额的葡萄牙或西班牙商人使其成为可能，他们成为西班牙政府的地方代表。作为回报，他们在里斯本、塞维利亚、里沃纳或威尼斯接受金白银金属货币。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套汇交易和公共信贷因此形成了西北欧和南欧相互依赖的广泛网络。【332】

当热那亚人复杂的金融活动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保持其在公债合同中的支配地位时，由热那亚控制的票据清算集市，在欧洲的货币运转中仍旧保持着领导地位。热那亚金融霸权的本质问题，仍然是通过清算集市体系来集中意大利的对外贸易。这样一来，热那亚人就能随意处置大量的流动商业资本，这些资本有助于吸收西班牙政府财政的不规则的发展变化。威尼斯的商业全盛期，里沃纳德强有力的上升，那不勒斯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这一切在17世纪初仍旧是这个体系的安全保证。

1620年前后，意大利的大萧条使这一切突然改变。对外贸易，包括威尼斯的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破坏，这对清算集市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1622年，热那亚银行家将他们的清算集市迁移到利古里亚（Ligurian）沿岸的新贝（Novi），而米兰和托斯卡纳的银行家继续在皮亚琴察集会，同时威尼斯商人

转向维罗纳（Verona）集市。一连串的分裂接踵而至，它将对外贸易从国际金融中分离出来，而且破坏了先前形成的地理上的统一。1695 年，进行了最后一次重新组织的努力，意大利的清算集市在圣玛格丽塔（Santa Margharita）、拉帕洛（Rapallo）等地重组。但是到这时，意大利银行业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西班牙霸权的垮台也是意大利银行业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葡萄牙银行家——大多数都有犹太血统，在西班牙加强了他们的地位，特别是 1604 年 1 月的大赦令以后，这个法令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自由迁移。他们渗透到安大路西亚的商业中心，例如塞维利亚、卡迪斯和巴拉美达的圣卢坎（San Lucan de Barramuda）。他们成为西班牙贵族的财务管家，为巴西糖业王国的发展提供经费。通过他们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以及其他北方商业中心的商业联系和人数的优势，葡萄牙人从 17 世纪前半期大西洋经济的蓬勃增长中获利匪浅。最后，葡萄牙人从奥利瓦雷斯公爵那里获得支持。公爵在菲力浦四世（Philip IV）的领导下统治着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他渴望利用葡萄牙人的商业和金融地位，打破热那亚人对西班牙财政的控制。根据 1627 年的《月中付款法规》(*Medio General*)，公爵的梦想实现了，葡萄【333】牙商人银行家在公债合同中日益占了上风。

在意大利，直到 18 世纪中期，清算集市仍旧顽强生存。在 17 世纪为了吸收世界贸易和国际公共财政的扩张而引入的金融技术改进到了这时，为了适合意大利人的需求而充当保守的货币市场。1627 年以后，意大利银行家从西班牙国家的破产中解脱出来，他们利用清算集市仅仅进行国际汇率套汇交易，这是为了利用余额清算（*pagamento in balancio*）体系支持地区或国际货币流动，以及以连锁汇票为手段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余额清算和连锁汇票的信贷功能日益超过其支付功能。

意大利的清算集市从此发展成为确保投资安全的机构。盾（*scudi di marche*）体系保证投资以防流通记账货币（current money of account）可能的贬值，[①] 同时汇率控制确保利息在汇兑操作中起到一定作用。尽管利率可能并不是特别高，但投资回报却是有保障的。而从长期来看，已经投资的资本的购买力上升了，因为从 17 世纪第二个 25 年起，以盾衡量的价格下降了。

---

① 通过与金埃居联系在一起，盾的价值部分地是由世界黄金价格的波动决定的。金价值到 17 世纪末以前一直是上涨的，之后黄金逐渐让位于白银（从 1671 年以后，除了西班牙、热那亚、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皮亚琴察的金埃居之外，热那亚大银币也成为法偿货币，因而从此以后，白银的世界价格也影响盾的价值）。此外，作为一种货币汇兑标准，按照外汇汇率表示的盾的价值也会上涨或者下跌，这种波动也反映了国内或国外对盾充满信心或者丧失信心。更详尽的细节参见：达塞尔瓦（J. G. Da Silva）：《意大利的信贷银行》，第 283 ~ 398 页。

公共机构和宗教团体，以及数量较小的遗产的托管人和巨额财富的管理人，为了安全的缘故，都将他们的流动资产委托给那些在清算集市上活跃的商人银行家。

同时，新一代商人银行家在日内瓦形成。[①] 这里是新教徒的圣地，许多意大利流亡者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这里定居，他们不仅创造了丝绸业的繁荣，而且也创造了繁荣的对外贸易。从1650年起，贵金属手工业发展成为了一项辉煌的制造业，制表业、珠宝加工业和镀金业都经历了壮观的扩张。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令，这导致了最后一次活跃的移民潮，给予法国雨格诺教徒派教徒一个相当大的刺激，促使他们从事贸易和工业。银行业【334】在日内瓦的第二次兴起必须放在扩张的大环境下来看待：贸易和工业的成功刺激了金融的发展，而反过来金融的发展又成为贸易和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

17世纪再次兴起的日内瓦银行体系，通过里昂的清算集市进入欧洲金融市场。尽管自16世纪末以来里昂的世界贸易明显地在下降中，但这个城市在整个17世纪仍旧保持了其作为领导性的国际货币和汇兑中心的地位。1620年以后，皮亚琴察的衰落使得里昂从中收益，它再次成为北方货币市场——阿姆斯特丹、汉堡和伦敦——在南方的一个重要基地。里昂的清算集市为马赛、日内瓦、博盖尔（Beaucaire）和圣加伦（Saint Gallen）的世界贸易提供经费支持。瑞士和日内瓦的商人银行家在里昂稳固地扎根，他们将里昂和其他国际货币市场联系起来。

当1685年南特令（Edit of Nantes）的取消使巴黎银行业出现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时，瑞士和日内瓦银行家在里昂的一批同行（主要是新教徒），在巴黎开办了分支机构。瑞士和日内瓦在巴黎的分支机构和巴黎已有的银行一起发展成为新教徒银行（*Banque protestante*），从而18世纪巴黎的银行体系进化为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具有世界性地位的金融中心（*haute flnance*）。其特征不仅表现在巴黎银行数目的快速增加，也体现在通过设立分支机构、代理人以及外地代理行扩大其地理分布。银行业务也各不相同：传统的国际套汇交易仍旧占有重要地位，但贴现、存款业务和有息贷款也成为银行的典型业务。最后，日内瓦和巴黎的银行界业在相当程度上仍是家族经营的。由于流行的联姻风俗，商人银行家这个圈子因而得以保持封闭性和同质性。

---

① 路希（H. Lüthy）：《法国新教徒的银行业1685～1730年》（巴黎，1959年），第37～49页。

而法国君主的战争政策却将里昂的清算集市拖向灾难。1709 年的金融大萧条对里昂的影响是致命的。到 1720 年，里昂的汇兑集市失去了国际重要性。

6. 阿姆斯特丹的新旧体制

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联系并没有被尼德兰革命所打破。特别是 1585 年之后，大量的安特卫普商人迁移到阿姆斯特丹，这些人通过与留在南方的商人形式多样的联系，确保了安特卫普作为一个重要商业中心（*Dispositionsplatz*）的持久重要性。【335】至于阿姆斯特丹，它的对外贸易能够沿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方向发展。1597 年和 1613 年新版的《安特卫普考斯特曼》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就像在米德尔堡和鹿特丹一样，安特卫普的交易法则和金融技术通常也应用于阿姆斯特丹。1600 年前后，口头债权转让，或通过具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或汇票的转手流通进行的转让，在阿姆斯特丹都很普遍（转手多达 7 人或 7 人以上）。起源于安特卫普而且和商业证券流通紧密相连的现金保管业，在阿姆斯特丹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现金保管人替一大串商人客户保管他们的现金，这些客户将其款项支付转让给他们在现金保管人那里的结余款。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碰巧是同一家现金保管者的客户，那么他们之间的结算就相当简单；如果不是，那么现金保管者就会用现金支付，或者用很快就要到期的或已经到期的属于现金保管者自己的、或者客户的证券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在客户的账户上，转让客户的债权或者属于现金保管者的结余款项）。如果某个商人客户缺乏资金，现金保管者有时会在存款账户上给其预付款或现金；如果货币市场紧张，现金保管者就有可能用现金以一定的贴水大量买进其客户以商业证券形式存在的债权。这种萌芽形式的清算、存款和贴现银行业务，16 世纪后半期就在安特卫普出现，在 1585 年以后尼德兰北部的商业城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后不久，就采取官方措施限制私营现金保管业的发展。17 世纪初，荷兰国会的法令和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和其他地方的市政条令就限制或者禁止债权转让，而且控制或禁止现金保管业务。

这些禁令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只是引起了商人的强烈抗议（例如 1608 年 84 名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联名抗议），同时债权的口头转让或者通过证券转手进行的转让，以及现金保管业务的继续，在加速货币流通中起着重要作用。当局也意识到现金保管者和货币汇兑商所起的金融作用的重要性，

但同时也深信现金保管者和货币汇兑商，是流通中银币和记账货币不稳定的根源。确实，大银币的比价一直在官方比价所允许的水平之上，而且现金保管者和货币汇兑商不断地将成色好的金属货币从货币流通中分离出来，然后以一定的升水将其卖给商人。现金保管者和货币汇兑商于1595年获得官方许可（后来又由1603年和1606年的法令予以确认），可以以不高于1.25%的升水在阿姆斯特丹出售成色好的金属货币，但是实际中的升水通常超过这个最高限额。【336】

当局对货币汇兑业和现金保管业进行有效控制的努力失败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Amsterdam Exchange Bank）于1609年1月31日出现了。现在，控制让位于替代。这个市立汇兑银行代替了货币汇兑商和现金保管者的地位，这两种职业在1609年曾一度被取消。同时，用证券进行的一系列偿付或者由连续的口头债权转让实施的偿付，都被单独的一种债权转让所取代，即转让给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种体系非常有效，以至于不会在任何地方设立机构的英国商会，在当地以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为模型建立了一个汇兑银行。由此导致了米德尔堡（1616年）、汉堡（1619年）、代夫特（1621年）和鹿特丹（1635年）的汇兑银行的建立。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以威尼斯人的利亚托广场银行的章程为其模型，而北方其他的汇兑银行模仿阿姆斯特丹的例子。阿姆斯特丹市对存款负责，而且银行账户的持有者可以随时处置自己在银行的结余，无论是转到第三者户头还是用现金清偿。所有开户的商人都必须亲自递交一份以详细而精确的名称制定的债券。如果转让证书的受益人没有在汇兑银行开户，那么其金额就记入发出债券客户的借方，而受益人就可以用这个证书来到银行收取现金。条例规定商人们所有超过600盾的票据，都必须经过汇兑银行支付。至少在1683年之前，所有的银行服务和转账都是免费进行的。透支被严格禁止，所以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存款都实实在在地保存在银行的金库里。汇兑银行只以官方比价接受足额大金币和大银币的存款，其他金属货币和贵金属在存款时，由银行的货币分析专家估价其真实的金银含量价值，并记入贷方。当用金属货币进行结算时，汇兑银行只以固定的比价放出足额的大金币或大银币［其中包括金达克特和银瑞克达德（*rijksdaalders*）或者卢恩达德（*leeuwendaalders*），以及瑞克银币（rix dollars）和英国的5先令硬币（lion dollars）］。这些金属货币成为著名的“贸易金属货币”，不仅用于国内市场，而且日益出口到波罗的海、利凡特和远东。【337】

汇兑银行总是关心以固定的价格获得商业流通中价值稳定的大金属货

币，这导致尼德兰联合省记账货币的双重体系——荷兰银行盾和荷兰流通盾。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较小的白银金属货币纯度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记账货币价值的下降。由银行正式发行的价值稳定的荷兰瑞克达德（*rijksdaalders*）和卢恩达德（*leeuwendaalders*）——有时以一定的升水——以 50 斯图瓦（*stuivers*）的官价付出，这种金属货币由于其价值被低估而退出日常流通领域。至此以后，以官方（银行货币）比价专门作为贸易金属货币而使用。流通记账货币因在银行购买贸易金属货币而遭受的损失，成为获得价值稳定的出口金属货币而付出的贴水。①

与此同时，尼德兰南部纯度较低的克鲁斯达德（*kruisdaalders*）和达克特（*ducatons*）渗透进荷兰，弥补了荷兰大银币流通的缺口。克鲁斯达德或帕特考恩（*patacons*）成功渗透的原因，在于它们在荷兰以 50 斯图瓦的比价流通，与成色较好的荷兰瑞克达德的官方比价（它的比价也是 50 斯图瓦）相比，这个比价是太高了，但是它们反映了荷兰基准银币和荷兰流通记账货币的真正价值。由于克鲁斯达德或帕特考恩起初并没有作为正式的金属货币被汇兑银行接受，因此它们置身于银行体系之外并在大银币流通中保持着强势地位。1640 年，汇兑银行被迫接受南尼德兰的帕特考恩作为存款金白银金属货币，随后不久也被银行作为贸易金属货币卖出。然而，官方比价的神话继续保持着，即每帕特考恩兑换 48 斯图瓦，而上好的瑞克达德兑换 50 斯图瓦。② 保持官方比价的另一个理由，是基于帕特考恩仍旧以 48 斯图瓦的比价在尼德兰南部有效地流通的事实，因此这些官方比价可以保持南方和北方流通记账货币的统一。这样在北方就出现了双重记账货币体系，即荷兰银行盾和荷兰流通盾。银行盾（相当于 20 斯图瓦）因此成为一种记账货币，它的价值基本上由达克特、卢恩达德、帕特考恩和达克特的综合银含量来决定。③ 与此相对的是流通盾（相当于 20 斯图瓦），它的价值主要是由较小银币的含银量来决定。[338]

随着 1659 年金属货币法令的颁布，情况有所改变。此后北方银行盾和流通盾的官方比价保持在 48:50 或者 100:104.21。起初，受到银发行的成

① 如果一位商人为了增加他的当前银行存款账户，而将当前流通的金属货币存入银行，那么银行的货币分析专家将依这种货币的官方贵金属含量的比例、按照其实际包含金银量的价值对这项存款进行估价。

② 帕特考恩最初的官方比价定在 47 斯图瓦，这个比价相对于瑞克达德的官方比价来说甚至有所低估，这样做的明显目的在于将帕特考恩拒之荷兰门外。汇兑银行在大量购进大金白银金属货币时可以给予一定的升水，它利用权利以 48 斯图瓦的比价获得帕特考恩（曾经一度达到 49 斯图瓦）。

③ 这两种记账货币的差别，见下面的第 290 ~ 294 页。

色稍差的金属货币，也就是银达克特和莱德（*ryders*）支持的银行盾，在这两种体系的记账货币价值中保持领导地位。但是不久后，流通盾占了上风，而银行盾作为一种记账货币仅仅成为流通盾的附属，也就是说银行盾包含的贵金属价值取决于流通盾所包含的贵金属价值，而后一种记账货币的价值取决于正常流通中的白银金属货币。[①] 幸运的是，联合省对货币制度的重组在这时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进展。从 1694 年起，银行盾和面值 3 盾的硬币成为流通货币的基准金属货币，因此记账货币体系中流通盾对银行盾的支配不再是一个缺点。

通过消除大银币比价的上涨，荷兰汇兑银行并未达到其首要目标——直接对货币流通体制进行重组。但是银行盾的出现——它在 1659 年之后发展成为一种记账货币，无疑对 17 世纪期间荷兰货币体制的稳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短期内更大成功的是荷兰汇兑银行在票据交换领域的影响以及（特别是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在国际结算领域的影响。所有价值超过 600 盾的票据都必须在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清算的规定，使得大部分商人都在那里开立账户。开户人的数目增长很快，在 1660 年超过了 2 000 人这个大关。由【339】此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成为地区商业首要的银行家，所有重要的交易都是通过转账来实现结算。对银行盾日益增加的信心和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惊人的扩张，一起使得阿姆斯特丹的汇兑银行具有了国际性质。国际商业交易——即使这些贸易在阿姆斯特丹以外产生而且没有荷兰人参与——日益增多地可以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票据支付。大部分大型商号在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拥有盾结余，并用这些结余偿付其国际债务。国际资本转移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着。通过国际支付的集中，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在 17 世纪期间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票据交换中心。在这里，债权债务的抵销在多边基础上进行，而且银行盾在这里成为硬通货。

除了三位一体的金融功能即稳定的银行货币、灵活的转让和多边国际清算外，荷兰汇兑银行在 17 世纪还执行着重要的外汇汇兑功能，它们给国际

---

① 1659 年，荷兰共和国想一劳永逸地从北方的货币流通中消除帕特考恩和达克特，为此目的发行了成色差的大金属货币银达克特和莱德，其比价和成色好的帕特考恩和达克特一样。这个办法获得了成功，于是银达克特和莱德占领了货币流通市场，而且逐渐作为贸易金属货币占了上风。因为其所包含的白银大约比帕特考恩和达克特包含的少 5%，所以这种变化就意味着银行盾大约贬值 5%。这不仅低估了帕特考恩和达克特的价值，而且低估了较小的银币，它们同样从流通中消失了。当较小的银币通过消除成色较好的金属货币而逐渐适应了新情况时，当前的通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流通盾就再一次定下基调。

范围内的商人提供有质量保障的贸易金属货币。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普遍蔓延的货币危机中，这种贸易货币确实充当了国际贸易，特别是其中需要硬通货支持部分的一种推动力。起初这种贸易货币主要在为荷兰与波罗的海贸易（*moedernegotie*）提供金融支持方面获得成功，而西班牙“八角里亚尔银币”（rials of eight）仍旧在利凡特和远东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是逐渐地，荷兰的瑞克达德和卢恩达德，佛兰德的帕特考恩和达克特，而最终荷兰的瑞德（*rijders*）和达克特也渗透到这些地区。

荷兰汇兑银行的第三个功能是提供信贷。依据其章程，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不能从事信贷活动，但在这个章程之外也有一系列的例外。最初一开始它为荷兰各省和东弗里斯兰伯爵，以及许多造币厂主和阿姆斯特丹范里宁银行（*Bank van leening*）提供为数不多的信贷。其中的阿姆斯特丹范里宁银行成立于1614年，它以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为抵押向商人提供贷款。但是荷兰的汇兑银行提供的信贷是相当有限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借款人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市库。从汇兑银行（*Wisselbank*）建立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经常接受大量的垫付款以装备其舰队。市库也是大量信贷的接收者，特别是从【340】17世纪后半期开始。

汇兑银行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功能就在于贵金属贸易。将贵金属卖给金属货币厂最初主要是由汇兑银行进行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在这个领域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商人喜欢由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做中介而不是直接将贵金属交给金属货币厂厂主，因为银行总是备有各种各样的贸易货币，因而它们能比金属货币厂提供更快捷的服务。1648年后，每年都由30~50只有护卫的船只装满金属货币、贵金属和其他货物，从卡迪斯航行到阿姆斯特丹，这清楚地证明了阿姆斯特丹的贵金属贸易。但甚至在那时，私营的现金保管者和金白银金属货币经销商，也在贸易货币交易中作为商人和金属货币厂厂主的中间人而活动。

为了给予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贵金属贸易新的推动力，1683年1月5日的市政法令，允许该银行在由金白银金属货币作担保时提前付钱。如果每6个月付出少许的管理费，那些在银行存下金白银金属货币作为担保的商人的账户，就可依其价值记入贷方。同时商人还会得到一个写着他名字的存款证书（*recepis*），证书上注明他存下的金白银金属货币（当然是荷兰达克特纸币、法国路易凭单等等）。这些证书是可兑现的，持证人随时可以不需任何正式手续就从银行提取证书上所表明的金白银金属货币，只要已经付过管理费，而且将提取的金白银金属货币数量记入最初存款人账户的借方，或者

通过银行纸币的偿还将这个账户彻底用光，从而实现结算。

这个新体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荷兰贸易金属货币一起，所有的欧洲大金币和大银币，都在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金白银金属货币贸易中发挥着强烈的作用。因此，在 1714～1715 年期间大约有 100 万法国皮斯托尔（*pistoles*）作为抵押品存入该银行。而且从 1763 年起，银行业接受条块形式的贵金属作为抵押。金白银金属货币存款的重要后果，就是商人不再以现金形式从银行提取他们的账款，而从汇兑银行购买存款证书更廉价。从这个惯例开始引起了银行货币事实上的不可兑换性，由此带来了银行货币对流通货币更大贬值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管理层在 18 世纪开始进行银行券的回购和出售。当自由市场上银行盾对流通盾的贴水低于 4.25% 时，银行就回购银行券；当自由市场上银行盾对流通盾的升水高于 $4\frac{7}{8}$ 时，银行就出售银行券。【341】

金白银金属货币作为抵押存在银行的成功，对阿姆斯特丹商业和金融的进一步扩张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确保了阿姆斯特丹在 18 世纪保持世界首要贵金属和金白银金属货币市场的地位，甚至对经由葡萄牙和伦敦到达欧洲的巴西黄金来说也是如此。阿姆斯特丹成为巨大的仓库，所有想得到的国际金白银金属货币都可在这里方便快捷地得到。贵金属交易进一步使得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汇兑交易获得特殊的优势。阿姆斯特丹的汇率非常稳定，金白银金属货币价格涨落的点数非常接近，因为在阿姆斯特丹，通过运输任何想要的金属货币形式的贵金属来替换汇票的成本大大降低。此外，能够立即获得大量的金白银金属货币对票据贴现和其他信贷操作来说都是一个理想的条件。18 世纪，阿姆斯特丹货币和信贷的活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贵金属和金白银金属货币的贸易，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是这种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确实，在 18 世纪金白银金属货币贸易成为阿姆斯特丹银行保持其活力的、惟一主要的、得以幸存的功能。它的银行功能交给了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的私营现金保管者在 1621 年再次获得经营许可，它从 17 世纪 40 年代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随着双重记账货币的出现。为了节省商人的时间并减少他们的麻烦，这些私营现金保管者成为银行记账货币和流通记账货

币的经销商,[①] 而且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也成为贸易金属货币(*negotiepenningen*)的经销商。当1659年流通记账货币和银行记账货币以100比104 $\frac{5}{24}$的固定比价联系在一起后,稳定的银行盾对可能不稳定的流通盾的特殊优势消失了,以流通记账货币进行的交易逐渐占据了上风,甚至以流通记账货币结算的票据的数量也在上升。既然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拥有银行盾的垄断【342】权,[②] 所以私营现金保管者垄断了流通记账货币的兑现和汇兑交易。这样,私营现金保管者发展成为以流通记账货币进行交易的私营存款和清算银行。当18世纪现金保管者在他们之间也引入系统的往来账户清算时,对所有以流通记账货币进行的交易来说,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银行体系。在1660年到引入金属货币存款作为抵押之前这段时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开户者人数和存款数都没有增加,这个事实当然因该归因于现金保管业务迅猛的发展势头。

现金保管者也填补了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第二项空白,即提供全面的信贷。当银行法令禁止账户透支而且这项禁令对商人客户严格执行时,现金保管者却已经在17世纪期间就给其客户提供以流通记账货币进行的经常性信贷,通常是账面贷款、以存款为抵押的预付款或者票据贴现,同时有担保的放宽也时常发生。18世纪,现金保管者的本票和凭证(支票或者在指定银行的存款的权利转让)也很普遍。

阿姆斯特丹从事银行业务的人不仅限于汇兑银行和现金保管者,许多成功的私营商人也发挥着金融功能。德国或波兰的犹太人集中从事金白银金属货币贸易,因而成为货币兑换者。葡萄牙的犹太人是证券专家。最后,还有像霍普(Hopes)、克利福特(Cliffords)或佩尔(Pels)这样的大商人银行,它们在金白银金属货币贸易、货币汇兑和有价证券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且逐渐垄断了国际贷款的发行。

---

① 旺·迪伦(J. G. van Dillen):'Oprichting en functie der Amsterdamsche Wisselbank in de zeventiende eeuw, 1609-1686', *Mensen en Achtergronden. Studies uitgegeven ter gelegenheid van de tachtigste verjaardag van de schrijver*(格罗宁根,1964年),第336~384页。现金保管者也有可能从投机得到额外的利润,如果银行货币的贴水低,这时用流通货币购买银行货币就会获利;相反,如果银行货币的贴水高,这时将银行货币汇兑为流通货币就可获利。

② 米德尔堡和鹿特丹的汇兑银行,分别在1641年和1645年将这两种记账货币体系引入它们的现金保管业。参照斯奈勒(Z. W. Sneller):《*Rotterdams Bedrijfsleven in het Verleden*》(阿姆斯特丹,1940年),第139~142页。Phoonsen在1677年也向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提到这个建议,但是没有结果。参见旺·迪伦:'Een boek van Phoonsen over de Amsterdamsche Wisselbank',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第7章(1921年),第30页以后。

虽然我们在讨论时不能将阿姆斯特丹各种各样的金融家群体的功能彻底分开，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7 世纪以后，大商人银行家在套汇交易和货币汇兑上处于支配地位。这种专业化是随着他们的商业活动而展开的。商人银行家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外地代理商，而阿姆斯特丹国际支付的日益集中，意味着这些代理商充当阿姆斯特丹在众多外国商号的代理人。他们不仅办理阿姆斯特丹和外国的汇票，而且欧洲各经济中心之间的外汇交易也是通过他们才在阿姆斯特丹汇兑市场上得以进行。【343】

如果一个安特卫普商人想给他在卡迪斯的外地代理商开立票据，而在安特卫普又找不到接受人，这时他就将开立票据并委托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商。在将这张票据给代理商时，规定这张票据的转让只有通过以卡迪斯的一个人为受益人的背书才能进行。相反，从卡迪斯到安特卫普的票据转让也可以经由阿姆斯特丹，即使相关的交易当事人定居在伦敦、巴黎或里昂。出票人购买一张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兑付的票据，并委托给安特卫普公司。如果相关当事人是一个伦敦商人，那么这张票据就送往伦敦承兑。在承兑过程中，伦敦商人通过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或直接通过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使得这张票据成为可支付的。这张票据的安特卫普受益人将其背书委托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或在当地的汇兑银行要求将票据金额在其往来账户上记入贷方。①

从范维尔登（Van Velden）的手册《汇兑银行的基础》（*Fondement van de Wisselhandeling*，阿姆斯特丹，1629 年）我们可以推测出，在 17 世纪前半期，除了进行票据交易和有息贷款外，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银行家还在安特卫普和汉堡经常性地提供平价的票据形式的贷款。这种贷款为期 22 个月、26 个月或 30 个月，其回报率为 5% ~7%。例如，可以以下一期法兰克福集市票据的形式获得贷款，而且以事先规定的汇兑率归还票据而不需任何证明文件送往集市。以贴现牌价而不是以平价表示的国内票据，在 16 世纪的安特卫普和里尔之间就已经很普遍，而 17 世纪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和里尔之间大量的票据往来极大地推动了票据贴现。信贷证的使用也很普遍，通过这种方式为了第三方的利益商人可以给他在国外的代理人开出信贷证，奔走各地的经销商再也不需随身带钱。有了信贷证的帮助，荷兰商行的合伙人或者阿姆斯特丹某银行的顾客，可以在中国从商人银行家设在广州的代理人那里提取现款。

---

① 艾维雷特（J. Everaert）：*De internationale eu koloniale handel der Vlaamse firma's te Cadiz*，1670 ~1700（布鲁日，1973 年），第 564 ~567 页。

从大约1700年开始，汇票承兑业务成为阿姆斯特丹各种行业中有利可图的一个部分。承兑银行家愿意接受债权人或其客户的代理人开立给他的汇票，条件是客户保证在汇票到期日时他在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同时，债权人或代理人可以对票据进行贴现并立即获得现金。为了进口中的现金支付或者在出口中有预期的国外买家付款，客户本人也向自己的银行家开立一张汇票并且通过贴现获得急需的资金，这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惯例。【344】

阿姆斯特丹商人银行家的国际地位，不仅使得阿姆斯特丹自身的国际贸易而且很快使得伦敦、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国际贸易，也在很大程度上由阿姆斯特丹的承兑信贷（acceptance credit）提供金融支持。在商业扩张的辉煌行将结束之际，这是阿姆斯特丹货币市场得以持续繁荣的重要因素。承兑信贷并非单独存在，在18世纪，银行家发行的长期公债、保险和有价证券在阿姆斯特丹占有巨大的比例。从17世纪初开始，阿姆斯特丹就有了正规的证券业，它们从事政府公债的买卖，而且参与东印度公司各种各样的会议（1602年），其后参股西印度公司（1621年）。最后，东印度公司的债权也于1621年出现在市场上（上面印刷好了持票人，而且可以在短期通知后偿还）。从1698年开始，东印度公司有规律地发行长期债券，并附有每年支付的息票。

期货交易（Forward business），即在某一时刻进行买卖而在稍后的日子进行交割和付款，是证券市场的早期现象①。东印度公司刚一建立就有人从事"看涨"投机。1607年有一群商人，包括艾萨克·李·迈尔（Isaac Le Maire）、德·茅彻隆（De Moucheron）和其他人，形成了一个"熊市财团"（bear consortium），他们通过虚假的期货买卖和系统的传播利空谣言而进行"看跌价格"的投机。随后1610年的法令禁止了股票的期货交易，除非交易人是它所交易股票的实际拥有者。这种禁止措施不断重申（1624年、1639年、1636年），但是股票市场上的徇私舞弊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种投机交易并不会抑制证券业的正常扩张。到1647年为止，这些投机交易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非常重要，以至于佣金正式地从0.5%降低到0.25%。西班牙，特别是葡萄牙的犹太人是证券方面的专家，他们不仅仅限于期货交易，而且已经深深卷入期权交易。在这种交易中，商品或证券买者或潜在的买者既可以选择履行所签订的合同，也可以选择在付出一定的权利金或获得同意后放弃合约。洛佩·德·维加（Lopez de la Vega），一位在阿

① M. F. J. 斯密斯（M. F. J. Smith）：*Tijd-affaires in Effecten aan de Amsterdamsche Beurs*（海牙，1919年），第21～54页。

姆斯特丹的葡萄牙裔犹太人，在他1688年的《*Confusio de Confusiones*》一书详尽地描述了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的技术策略。至于固定买入（fixed purchase）的期货交易，除了现金交易和保证金买卖之外，洛佩·德·维加已经提到划账交易手段（*Rescounter*），它可以使从事投机的当事人仅仅在每月结算余额即可。至于期权交易，当时已经使用印刷好的表格形式的凭据。【345】

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证券期货交易增长强劲，迅速具备了国际性。英国股票在17世纪就已经在这里交易，特别是在葡萄牙犹太人投机者的推动下；现在，其他国家的证券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发展。在18世纪中期，期权交易安排在每季一次的结算日前后，而且股票的引入进一步刺激了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①

在近代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阿姆斯特丹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使得我们难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然而我们首先应该对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和私营银行也做出区别。同时代的人，不止亚当·斯密一个人，高度而正确地赞扬了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但从纯粹的金融领域来看，该银行几乎没有引入新东西，仅仅是作为几个世纪金融技术进步极限的市立清算银行而出现，这些技术由意大利人在13世纪引入，而且此后一直处于意大利人的控制下。阿姆斯特丹模仿了欧洲南部的公立清算银行，它遵循统一而稳定的记账货币体系原则，这样的原则早已由日内瓦、里昂和皮亚琴察引入。它追随卡斯蒂利亚集市的多边清算体系，只是将所有的往来账户都集中于单独的一家银行而对其有所改进。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贡献就在于将过去的金融技术进步结合到一个和谐的整体里，与过去相比，没有大的突破。更准确地说，通过与过去保持连贯性，市立清算银行达到了成熟和可靠，这震惊了整个重商主义世界。

在17世纪后半期，市立清算银行体系在经济发展的瞬间被一项制度变化超越。1685年之后，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活力不再源于它的清算功能，而是贵金属贸易。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仍旧保持其原有的活力，直到18世纪末。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有关阿姆斯特丹的第二个细微变化。这时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主要归因于私营银行在金融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私营银行体系的活力和创造性。私营银行在17世纪后半期以来，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领导角色。17世纪上半期，【346】

① 在此之前，股票的转让必须在发行股份的公司办公室进行登记。从1720年开始，在转让时给出凭证然后再用其贴换股票成为一种惯例。

严重的危机大大地阻止了它们的发展。在这之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金白银金属货币经销商、证券经销商和商人银行家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进一步发展了近代存款、清算和贴现银行业务，由此为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在18世纪的巨大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量惊人的有价证券继续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其中有汇票、股票、政府公债、私人债券，支票甚至短期债券也很多。然而在银行券的发行方面，伦敦获得相当大的领导地位。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答案。为什么荷兰的商业城市在17世纪初不采用更现代的金融技术，这些技术在16世纪就出现在安特卫普，而且在1585年之后就由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现金保管者和商人，带到阿姆斯特丹和米德尔堡，为什么它们选择起源于意大利的更为保守的银行体系？难道是安特卫普的技术方法太现代了，以至于在一个持续的战争混乱和货币混乱时代难以激起人们的信心？或者是1600年前后从泽兰和荷兰到地中海和利凡特的贸易突破，导致了和它们及意大利银行体系更直接的接触，而意大利银行体系的传统传达了一个更稳定的印象？当然，1600年前后，塞维利亚的贸易商行以及更重要的威尼斯公共清算银行，在阿姆斯特丹大多数有影响的商人中享有特别的名声和威望。这个问题还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7. 英格兰和苏格兰近代银行业的发展

16世纪英格兰的商业繁荣为伦敦金融市场的逐渐发展奠定了基础。意[347]大利商人银行家的存在，众多汉萨同盟成员的积极贸易，商人冒险协会和尼德兰的紧密关系，这一切都为伦敦商业界带来同时代的金融技术革新。安特卫普对伦敦的影响尤其强烈，从1544～1574年，安特卫普是英国国王信贷活动的最主要的金融市场。由托马斯·格雷欣在朗博德街（Lombard Street）建立的皇家交易所在1571年1月正式开业，这个交易所是完全模仿它的安特卫普原型的；从16世纪中期开始，这里汇票的普遍使用以及商业票据的日益流通，与安特卫普相似的发展过程融为一体。

在这种背景下，1600年左右，伦敦的金融市场包含一个业已活跃的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可以满足非商业信贷要求的一系列工具，而且还包括一个范围广泛的由其支配的金融证券。[1] 汇票和本票在短期信贷商业领域占有特

① R. 艾什顿（R. Ashton）：《国王和金融市场1603～1640年》，第2～11页；米尔奈斯·豪登（J. M. Holden）：《英国法中可兑换票据的历史》（伦敦，1955年），第4～29页。

殊的位置，它们非常适合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商业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形成于小范围的商人之间，而且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许多形式的债券都在使用，它们非常适合于长期贷款，因为它们提供了实物附属担保品，因而其安全性大于汇票和本票提供的贷款，后者纯粹是建立在借款人良好声誉的基础上的。抵押品甚至为贷款提供了更好的安全性，因为它将不动产或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品。17 世纪，有土地抵押的长期贷款日益获得成功，特别是借款人在 40 年代获得回购权之后。

早在 15 世纪、16 世纪，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汇票和本票就已经在英国商人之间经常性地转让。在安特卫普的影响下，它们显示了可转让性的初步迹象。根据 16 世纪中期的安特卫普法庭记录，英国商人在“最后的真正的支付”中转让附有持票人条款的票据成为一种惯例。确实，商人冒险协会法庭接受票据转让的连带原则，从而中转债务人仍负有清偿责任，但是，这种转让必须清楚无误地规定而且能经得起保证书（*contre-oblilgatie*）或其他形式契约的证明。承认这种惯例的特别法庭逐渐丧失了它们的影响力，如 1531 年和 1585 年【348】法令中的贸易中心城镇法庭，从 16 世纪末开始的海事法庭。从 17 世纪开始，习惯法法庭（Common Law Courts）日益支配了商业领域的司法裁决。这带来了特殊的问题。习惯法对本票的转让怀有敌意，它宣布本票只有在服务于清偿债务的目的时，也就是说只有证明受让人和让与人的共同利益后才是合法的。习惯法法庭只承认正式的本票，而不承认非正式的本票。[①]

习惯法法庭也怀疑汇票的可转让性，但是此时它们更愿意接受商业界的惯例，因为汇票是典型的、确切无疑的公认商业票据。这样的环境不仅推进了汇票的普遍承兑，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汇票从可转让性到可流通性（from transferability to negotiability）的过渡。效法《*Tresoir van de Mate... vanden Gelde ende Wissel*》（阿姆斯特丹，1590 年），杰拉尔德·德·麦利奈斯在他 1622 年的《迈克托瑞法典》（*Lex Mercatoria*）中已经指出了汇票中持票人条款的缺点，即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流通而且要草拟很多份。而在荷兰使用的通过债权转让进行支付的优点是众所周知的。惟一的区别是英国商人的惯例是要求清楚的证据，而这可以通过将传统的“付给某人或持票人”（payable to X or to the bringer thereof）条款，相当简单地替换为“付给某人或他指定的人”（payable to X or his assigns）条款，而且将债权转让标在汇票的背面而

① 要了解与此有关的法律问题，参见前述米尔奈斯·豪登（J. M. Holden）的著作，尤其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获得。尼德兰从17世纪初就开始了这样的实践。

从可转让性到可流通性的过渡，也受到英国贸易的扩张和进一步国际化的促进。在1600年之前，它主要影响活跃于羊毛特别是布匹贸易中心市场的商人冒险协会这个有限的团体——成员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内部的票据转让。这时的风险是很小的。1600年后，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英国商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以至于不得不在汇票中引入可流通性原则，以弥补日益增加的不熟悉和不确定性。

约翰·马略于1651年发表的《对汇票的建议》，阐述了汇票背书是如何在【349】17世纪第二个25年在英格兰变得流行的。朝向可流通性的关键性步伐在这个时期的后半期迈出：在1699年霍尔特（Holt）首席法官的一项裁决，不仅承认了所有背书人对"付给某人或他指定的人"汇票的个人责任，而且第一次接受了'bona fide holder for value can acquire a good title from a mere finder'。

约翰·马略的书中包含了关于17世纪第二个25年商业信贷发展的其他重要资料，这时汇票贴现和国内票据（inland bills）的使用已经出现在英国经济生活中。这很可能和安特卫普的贴现以及1600年以前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里尔之间的国内票据的使用有关。在英格兰内部，国内票据作为将大土地所有者在地方的收入转移到伦敦的手段而使用在17世纪初就已经形成惯例，同时，也作为伦敦商人将销售收入汇款给内地代理人以给其再补给或进行结算的工具。①

由国内和国外票据的发展和迅速传播支配的汇票基础上的商业信贷，经历着强有力的扩张，与此相对照的却是本票迟缓的合法发展。习惯法法庭继续顽固地认为转让原则不适用于本票，因为本票既用于商业目的也用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能援引商业惯例，而且国内票据的背书可以用做替代品。上议院在1653年、1669年和1672～1673年，多次试图使本票原则上成为可流通的，例如通过背书转让，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直到1704年的本票法案才正式承认了其合法性。

诸如此类法律上的困难，绝对没有妨碍具有持票人条款本票的可转让性的进一步发展。相反，这些困难推进其沿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在伦敦商界，商人们相互熟悉且互相信任，而且他们也知道在安特卫普和荷兰本票频繁地转手流通的惯例，因此一个新的未来向本票的可转让性打开。这种可转让性融入了伦敦兴起的银行体系，这个体系的力量正好来自相互信任和熟悉的环

① L. 斯通（L. Stone）的一个评论，R. 艾什顿在《国王和金融市场》第3页引用。

境，因而很少受到缺乏法律保护的妨碍。

特别是以利息在金融交易中吸收商人投资的银行业，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一样，很久以来就为人所知，它在17世纪极为普遍。货币汇兑商、外汇【350】交易经纪人、掮客和金匠逐渐适当地引入存款银行业务，接受存款并以一定的利息将其贷给第三方。掮客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就已经接受存款，并为其付息，这显示了他们处置存款的一定权威。金匠早在1630年就对这种活动积极参与，但是英格兰的存款银行，直到17世纪40～50年代才在伦敦金匠的推动下获得真正的突破。从那时起，金匠银行家系统地从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那里接受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他们通过在活期存款户头开立信贷证或垫款而提供有息贷款，而且贴现国内或国外汇票以及各种各样的正式的有价证券；为了与定期存款交换，他们还以简单的附有持票人条款的本票发行有息证券；他们还接受可以随时通过支票转让的存款。金匠的票据并不限于存款证明书，他们很快就发行了为贴现业务和贷款融资的票据。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存款、清算、贴现和发行银行券。

起初，伦敦金匠精心设计的金融功能和16世纪、17世纪安特卫普以及后来阿姆斯特丹的现金保管者的功能极为相似。然而，他们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即发行有持票人条款的简单的本票，这种本票迅速传播。这项革新的主要原因在于习惯法法庭对期票可流通性的消极态度。其他类似的环境也有助于伦敦存款银行的迅速成功。英国在30年战争后半期的中立，使得伦敦商人能够吸引一部分欧洲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和转口贸易（carrying trade），而且形成了一条经过多佛的英国“白银大道”，这引起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伦敦金融活动热潮。其次是查理一世于1640年关闭了城堡铸币厂(Tower Mint)，使造币厂属于私人的白银存款转换为强制性贷款，因而自此以后在金匠银行家那里存下的白银似乎更为安全。最后，政府的财政需求也部分地造成了从1640～1672年金匠银行的兴起。除了商业汇票外，金匠贴现所有类型的分配给国王未来收入的公共债券。到1672年止，公债的规模急剧膨胀，以至于财政部不得不宣布延期偿付。随之而来的是恐慌。尽管有严重的【351】危机，伦敦金匠仍旧设法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保持其一般银行家的地位。但伦敦银行业的制度结构将随着决定性的革新而经历彻底的改变，从1688年起这种革新开始将公共财政由不固定状态转为固定的国债。这个转变过程的里程碑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除了重要的财政功能外，英格兰银行还在公司宪章中被授予买卖金银和汇票，以及借款和发行可流通期票的权利。起先，加盖图章的纸币用于英格兰银行对财政部的支付，但是，逐渐地发行了普通

的银行券，即附有持票人条款的、为数量不一的存款发行的本票，以及为了给私人和政府贴现和贷款提供经费而发行的、相似的、其金额为按四舍五入去尾的纸币。[①] 在英格兰银行1708年的特许状重续时，其发行权被更明确地界定为发行银行券的权利，而且宣布英格兰银行为惟一的具有发行权的股份制银行。纸币发行权的垄断是银行竞争能力的一张王牌。在苏格兰，苏格兰银行作为第一家股份银行于1695年成立，而发行纸币的垄断权授予了一家新的机构，为期25年。1727年，皇家苏格兰银行成立，1747年又成立了英国亚麻银行，这两家银行都是建立在爱丁堡的股份银行。

特别是1697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发展更多地归因于它与国家财政的紧密关系，而不是其私营银行业务的发展。技术革新——通过它公债将持久的利息作为担保，短期和长期的有价证券的发行都成倍增长。英格兰银行纸币总是在完全可兑换性的基础上发行，这就是导致公众对新体系抱有信心的另一个因素。英格兰银行在伦敦金融市场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通过不断增长的声望和它与财政的特殊关系，确保了它发行的钞票一步一步稳定地支配了伦敦的市场。乔斯林（D. M. Joslin）估计伦敦金匠在1720年左右发行的纸币总量，可能只占同期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的一小部分，流通【352】中有228万镑该行发行的纸币。[②]

总体而言，英格兰银行是政府银行和伦敦市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偶尔零星地在布里斯托尔和其他大城市流通。英格兰银行的兴起并不意味着金匠银行家的衰落，但它确实决定了伦敦私营银行业的重大结构变化。国库券、政府长期年金和代理纸币的日益流通，和巩固了国家债务的商业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一起（参见第四节），依次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为私营银行家开辟了新的有利可图的业务，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有息的半流通性有价证券。私营银行家可以从其中选择他们自己的证券组合，以及新的贷款抵押。财政转移，特别是从地方到首都的转移，通常都经由私营银行家做中介。同时，在18世纪上半期，贴现业务和抵押贷款继续大部分集中在伦敦私营银行家手中。

伦敦私营银行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其数目增长上，从1725年的24家左右发展到1776年的51家左右。其次表现在其功能的专业化上，特别是1720年以后。伦敦西区（West End）的银行家，例如霍尔（Hoare）、高斯林（Gos-

---

① 这两种纸币最初都是手写的，但很快就出现了印刷形式，而且进一步标准化（尤其是从1698～1699年）。

② 乔斯林（D. M. Joslin）：《伦敦的私营银行家1720～1785年》，《经济史评论》第7卷第2号（1954～1955年），第170～185页。

lings）和蔡尔德（Childs），成为为贵族服务的银行家。他们与大土地所有者的管家通力合作，持有大量的现金库存，为其委托人投资股票或政府有价证券，并管理地主的个人财富。他们也进行抵押贷款，或投资私人债券。

而主要在朗伯德街以内或附近形成的伦敦市银行家（City bankers），却有着相当不同的客户群，他们通常是伦敦市的商人或国内外的代理商。这种银行的抵押贷款很少。它给商人提供承兑并贴现汇票、转账、往来账户垫款和其他金融服务，这些是伦敦市银行的核心业务。这种银行与乡村代理人的关系，主要转向国内票据的贴现以及汇款。这种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在1750年之后它为乡村银行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成为地区间资本流动日益加强的先兆。

在伦敦，英格兰银行和其他股份公司的股票从17世纪末以后通常实行贴旧换新。在1711年南海公司建立之后，股份公司的扩张使得这种交易更加频繁。期货交易和保证金交易激起了巨大的投机行为，这导致了伦敦皇家交易所股票交易的关闭，随后迁人乔纳森咖啡交易所（Jonathan's Coffee House）。虽然18世纪前半期伦敦的股票、债券和公共有价证券获得了强有力的发展，但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和资本市场仍旧具有支配地位。【353】

8. 国际投资模式

16～18世纪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成功，也许首先应该由对外贸易和金融更广泛的获利机会来解释。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个人流动资产的扩张，以及资本更大的流动性。

高利润常常导致大商人的炫耀性消费。死亡后的财产清册和家庭记录给了我们富有的商人拥有财产的一个活生生的图景，他们有极好的城市豪宅和乡村别墅，无数的仆人，昂贵的布料，富丽堂皇的家具和古玩。他们是艺术品的主顾，喜欢珍贵的珠宝和金银餐具。这种财富的展示不仅仅摆阔和自我放纵，它还具有心理功能，它可以提高商人的声望，增加对他们的偿付能力的信心。珠宝和金银器皿还是贷款的潜在抵押品，而且随时可以变现。

商人所获的许多利润都再投入他自己的公司，表现在流动性更强、规模更大的存货，给地方生产者更多的预付款，与世界各地商业代理人更多的账目往来，更多地参与国际外汇交易和海陆运输。这些定量的因素至关重要，因为投资于流动资本在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占有至关紧要的位置，但是世界经济的扩张并不仅仅由流动资本的扩张来决定。金融

和商业技术的实质性进步有助于减少流动资本的资本/产出比。新的或改进的工具刺激了货币流通的加速，因而同样的流动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营业额。市场组织的改善、代理业务的开展（*inter alia* by the commission business）以及运输的合理化组织，同样可以节省相当大的流动资本投资。[354]

改进的商业和金融工具也为商人将利润投资于其他人的公司开辟了新的前景。专设银行的出现和流行是第一个标志。舰船股份的购买以及参与第三方的临时商业组织，特别是海外航行，变得非常流行。借据形式的普通贷款，通常是短期或中期的，变得极度普遍。例如简·盖摩尔（Jan Gamel），他是一位从活跃的贸易中引退的成功的安特卫普商人，其 1572 年财产清单表明他财产中的 52.40% 都是这种贷款。长期投资也相应地快速增长，这主要包括世袭年金（愈加可赎回）的购买、抵押贷款，以及从 17 世纪开始的大型殖民地股份公司股票和债券的购买。短期和长期的政府贷款在成功商人的投资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或许是为期 6 个月的有息贷款，或许是联合贷款（*asiento*-participation），或者是包税，或者是市政年金、地区和行政当局发行的年金以及例如西班牙公债（*juros*）、国家年金或彩票贷款，或者是英国和法国受委托重组国家短期债务的公司的股票，或者是 18 世纪欧洲各国通过阿姆斯特丹银行家发行的政府债券。18 世纪商人的财产清单令人难忘地证明了，个人动产是如何在 1500～1750 年间强有力地扩展，以及个人在自己公司以外的投资是如何地国际化和多样化。在保险业的投资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海事保险以及私人和公共事物的不可预测，在 16 世纪曾一度是投机性投资的目标，17 世纪末随着荷兰和英国传统保险公司的建立而逐渐转变为一种正规的金融事业。

最后，土地和房产形成了重要的投资对象。这种投资后面的动机是极为不一致的：对一些商人来说，拥有地产意味着将其获得的财富重组，提升其社会地位，使其显贵；而另外一些商人则期待其地产通过城市化或上涨的农产品价格获得直接的资本收益，或者通过这种资本增值发现一种获得长期信贷的工具，这种信贷由土地提供的利润所支付的年金来提供经费；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商人也投机于土地不同寻常的低价（就像许多人在宗教战争期间所作的），期待地租的下降不会像地价那样剧烈和迅速。欧洲商人在不动产上的投资，不能简单地作为资产阶级的垃圾（*trahison de la bourgeoisie*，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语）而不予理睬。[355]

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并非专设银行体系所独有，类似的投资模式也出现在存款银行。对这两类银行家来说，随着资本地区流动的加强，金融投资成为

他们共同的投资方式。欧洲重要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为什么在强劲而持续的商业扩张时期，有那么多的成功商人对商业投资置之不理而日益作为商人银行家集中从事金融活动？历史学家常常责备这些商人以这种方式引起了他们国家的商业衰落。P. 克莱因反驳了有关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此类指责。他指出，18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僵化根源于其世界贸易的结构，这种结构是由17世纪荷兰伟大的先驱设计好的；而商人银行家通过将重点转向金融，以最理想的方式利用了阿姆斯特丹仍旧可能的扩张机会。[①]

同样的争论也可以应用到16世纪其他的金融中心。临时合伙制和委托代理的普遍应用，使得从事小生意的商人获得了成功参与对外贸易扩张的机会。相应地，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规模较小的商人的新的特殊推动力，这些商人来自尼德兰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传统的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具有由分支办事处组成的极为严密的体系和资本集中的结构，它们受到来自这种新兴而灵活的组织严重的竞争威胁。为了挽救它们的生意，这些大商号退到金融领域——这个领域需要相当大的流动资本以及广泛的分支网络，而这些条件正是大商号所具备的。也就是说，专业化与国际金融保护了这些商人大公司，使其免遭规模较小的商人公司的竞争。

货币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以及与此相关的1500~1750年间欧洲金融的高涨，也必须放在货币的、周期的、政治性的环境下观察。在尼德兰革命爆发以前，卡洛拉斯（*Carolus*）盾的稳定就意味着安特卫普金融市场的高度安全，就像银行盾对阿姆斯特丹和英镑对于伦敦一样，而稳定的埃居和盾（*Scudo di marche*）对里昂和皮亚琴察分别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农业用地地租的下降趋势增加了在阿姆斯特丹进行商业和金融投资的吸引力。粮食价格的下降和货币购买力的上升有利于债权人，从而刺激了贷款。最后，商业交易逐渐变得不那么不稳定：海盗威胁逐渐减少，大西洋航行风险降低从而成为日常事务；跨大陆贸易的风险也在减少，风险在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之后变得微不足道，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这种贸易则更加安全。 【356】

个人动产的扩张，金融技术和制度的进步，以及更有利的心理环境，这

① P. W. 克莱因：《企业家行为和17世纪、18世纪尼德兰的经济衰荣》，载《内高卢社会史年鉴》，1970年第1期，第1~19页。

一切使的资本供给增加的比例超过了需求增加的比例。安特卫普的短期商业贷款利率，在1500~1560年间由14%左右下降到8%~10%。在宗教战争期间，商业利率再次上升到10%~12%，但17世纪期间，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的商业利率却逐渐下降。在10年代，东印度公司为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垫款支付6.25%的利息，20年代为5%，1653年后为4.25%，1656年后为4%，1685年后为3.5%，而从1723年后甚至降到2.5%。[①] 在欧洲其他金融市场上，利率的变动趋势也是下降的，尽管阿姆斯特丹的利率总是比其他地方低。同时，欧洲利率的发展变化清楚地显示了货币资本流动性大大增加，而阿姆斯特丹的领导地位同时说明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还远未完善。

与供给相比，资本需求的较慢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可以由传统农业在欧洲经济中的优势来解释。[②] 这时的投资机会仍旧是有限的。贸易和工业需要更多的货币资本，但只要在这两个部门的投资还主要是提供流动资本，那么吸收金融资源的机会就不是无穷无尽的。直到发生了工业革命，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关系才经历了彻底的改变，这使得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的关系发【357】生了彻底的改变。

5.3 重商主义国家的财政

1. 公共财政的惯性和动力

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不仅仅是近代国家才有的事。城镇、省、地区常常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这是它们从中世纪以来就保持的权利，这些权利甚至和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收有关。此外还有广泛的属于个人或公共机构的领主权，这也给广大的农村人口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西欧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这里民族国家的权力不断上升，但却无法从金融和财政上证明其权力，这中间存在令人迷惑的鸿沟。民族的重商主义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都需要大量的金钱。但是，传统的制度结构和心理结构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至于不能在税收和公共财政

---

① J. G. 旺·迪伦：'Oprichting en functie der Amsterdamsche Wisselbank, in de zeventiende eeuw, 1609 - 1686', *Mensen en Achtergronden*（格罗宁根，1964年），第376页。

② R. 戴维斯：《大西洋经济的兴起》（伦敦，1973年），第232页。

领域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此，一些重大的欧洲战争使公共财政极度紧张。在这种危机的压力下，常常采取一些经验主义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后来成为根本性革新的来源。

起初，统治者的日常收入建立在皇家领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领主权。到中世纪末期，这种收入仅占公共收入总额的一小部分。而在尼德兰，众多距离很近的城市形成的巨大粮食需求使得农产品保持高价，因而直到16世纪初，皇家领地的经营收入仍旧在公共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之后，相对下降而且下降很快。在较不发达的经济中，例如波兰，直到16世纪末国王通过将皇家领地出租给贵族而获得的收入仍旧是有吸引力的；此后，17世纪的封建化逐渐削弱了国王讨价还价的地位，从而开辟了一个地租降低、王室收入下降的时期。但是皇家领地在公共收入中的作用并未完全结束。和中世纪一样，16世纪的中央政府仍旧常常将公共开支或债务转让给皇家领地的管事。当这些转让需要管家提前支付属于国王的、来自皇家领地经营收益 [358] 的国家税收时，管家就成了统治者廉价的银行家。这同样适用于管家直接转移给中央政府的无息垫款。查里五世皇帝在他的尼德兰领地经常使用这种办法。皇家领地作为获得长期公债的基础而仍旧保持其重要性，形成了发行终身年金和世袭年金极好的“信贷资金”，而且特别适合于作为抵押贷款的抵押品。最后，16世纪、17世纪公共财政极度紧张时，皇家领地的永久性产权转让仍旧进行着。尼德兰革命期间，菲力浦二世卖掉了他大片大片的领地。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伦敦公司（Corporation of London）通过1627～1628年的迪特费尔德·格兰特（Ditchfield Grant），获得了为偿付公债而大规模出售王室的领地权。

除了皇家领地的经营管理外，通行税和关税长期以来也形成了普通公共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对关税和通行税进行了调整，16世纪跨大陆贸易和海上贸易的扩张使其重要性得以加强。通行费的收取通常通过包税契约而委托给第三方代收：有时一个城镇会成为包税人，例如16世纪安特卫普承包了著名的布拉班特水道通行税（Brabant Water Toll）；有时通行费的包税人形成一个财团，就像1604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大关税承包团”（Great Farm of the Customs）。对统治者来说，实行包税的好处是多种多样的。包税契约作为一种行政分权的措施，以适当的成本保证了统治者的收入，而且准许其用当前收入甚至远期收入作为灵活的支付手段。如果统治者需要进一步的贷款，那么包税就加强了统治者相对于大商人和金融家的谈判地位。随着包税人将包税契约分成更小的份额并出售，包税甚至将较小的

储蓄者也纳入统治者的范围，就像17世纪的英格兰所作的那样。[①]

在特别收入中，进出口税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简单的通行税。在16世纪中期的法国—哈普斯堡王朝战争中，尼德兰就已经零零星星地出现了进出口税。尼德兰革命的爆发导致了永久性许可证和通行证体系的建立，而且这个体系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得以幸免，这就形成了近代进出口税体系的基础。另外宗教战争也导致了同样的征税，获得胜利的国家重商主义在近代进出口税中得以制度化。【359】17世纪跨大陆贸易的停滞（或者说缓慢发展），再加之逐渐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对这种收入来源形成了威胁，但在西欧，海上贸易的扩张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

对收入、财产或商品征税，构成了特别收入的第二项可观来源。起初是作为国会对国王的特别津贴，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或例外情况下征收，它是建立在“*ubi commuue periculum, ibi commune auxilium*”的原则上的。虽然近代仍然保持了这个原则，但随着议会批准特别津贴的权力，对皇权专制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障碍，其效力减弱了。

在欧洲大陆，消费税，即酒税或盐税，在16世纪、17世纪经历了惊人的增长。在许多欧洲国家，消费税直到旧制度（*Ancien Régime*）末期仍支配着税收体系。直接税也增加了。在法国，财产继承税（*taille*）已经成为一项永久性税种，这主要由农民来负担。在16世纪的尼德兰，对不动产和动产征税，例如1%税（hundredth penny），已经获得联合省政府（Provincial States）的正常批准。在尼德兰南部，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1/20便士税，即对动产征收5%的税，形成了永久性直接税的基础。在英国，都铎王朝的税负较轻，而无王时期的政府从它们的荷兰敌人那里借鉴了消费税。在1660年的王政复辟（Restoration）时代，议会政府的许多革新都消失了；消费税得以保持，不但成为永久性的而且日益增加。这些税的征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时是直接征收，而通常则是通过包税人或金融家来征收，有时统治者的实物需求会在城乡地方当局之间分配，然后再由他们将其分包出去。包税人通常允许预缴或透支，这样官方也可以直接得到当前或未来的税收收入，并立即支配它们，将其支付给债权人。

无论普通公共收入和特别公共收入的增长是如何有力，无论通过包税人和金融家做中介进行的征税工作是如何相当地规律、迅速、“提前”，可是税收的增加仍旧不能全面满足欧洲各国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公共信贷的系统扩张是

---

① R. 艾什顿：《国王和金融市场》，第79~88页。

税收不足的第一个补充手段。这些信贷形式通常在中世纪后期就已经为人所知，只是其重要性有所增加而且实施的技术有所改进。强制性借款是常用的短期公共信贷手段。有时这些借款来自像富格尔这样的大商号，作为交换，这些商号获得某些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好处。有时这些借款来自因获得统治者所给予的垄断权而对其负有义务的城镇或机构。来自商人和银行家的自愿性短期贷款甚至更普遍，这包括统治者及其官员开立期票而欠下个别大银行家和大商人的钱，而且借钱给中央政府的机构也将这样的期票投入流通。有些期票已经被银行开立给持票人，因而可以迅速地转让。特别是在那些付给持票人或指定人的期票的国家里，短期政府有价证券活跃的交易主要集中在像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样的金融市场，这是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适合于贴现操作的当局的当前或未来收入权利转让也很快加入了这种交易。【360】

当短期政府有价证券交易或多或少局限于银行家、商人、金融家、公务员和货币兑换者时，发展长期公共信贷的效果却涉及了更多的人。出售以公共收入支付的终身年金或世袭年金，这些方式都赢得了公众的信赖而且与教会对利息的禁令并不冲突。与年金契约相似的是出售官职，这为购买者并可能为其后代带来一年一次的收入。16 世纪年金契约中“可赎回”条款的普遍应用，意味着重大变化：购买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年金契约的条件，但是君主却获得了在对其有利时偿还借款的权利。这就使得统治者可以将用高额成本筹集来的公共长期贷款，转换成新的利息较低的贷款。17 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由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条款支配的企业（例如英国的南海公司）来接管长期公共信贷事务成为可能。最后，正式的公债逐渐成为惯例。

公共财政的重组不仅取决于税收和信贷体系的数量扩张，或者说取决于税收形式和信贷的改进，而且与官方和民众对税收和公共信贷的心理态度的缓慢而真实的变化密切相关。国家权力的不断上升，增强了公众对政府贷款的信心，同时官方逐渐意识到了普通群众储蓄的巨大潜力。这一切证明了信任的社会风气是可以维持的。【361】变化的迹象在 16 世纪中期以后就已经显而易见。尽管欧洲各大王朝面临着灾难性的破产，但利率并未恢复到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反复无常的高度（见表 26）。17 世纪期间，公债的利率经历了下降的趋势。虽然 1700 年前后令人担忧的战争气氛造成了新的迫切的信贷需求，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扰乱利率的下降趋势。一方面，信贷体系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所进步；另一方面，官方和民众对信贷的心理态度也有转变。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政府有价证券交易逐渐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是欧洲政治和财政史上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革新。【362】

表 26　布鲁日和安特卫普货币市场对官方短期贷款的年利率（5 年平均值，1401～1570 年）

单位:%

日期（年）	对尼德兰勃艮第和哈普斯堡统治者的短期贷款利率	日期（年）	对尼德兰勃艮第和哈普斯堡统治者的短期贷款利率
1401～1405	—	1486～1490	29
1406～1410	$32\frac{1}{2}$	1491～1495	$27\frac{1}{2}$
1411～1415	32	1496～1500	$19\frac{2}{3}$
1416～1420	32	1501～1505	—
1421～1425	21	1506～1510	$19\frac{1}{2}$
1426～1430	$18\frac{1}{2}$	1511～1515	$20\frac{1}{2}$
1431～1435	$20\frac{1}{2}$	1516～1520	18
1436～1440	$20\frac{1}{4}$	1521～1525	16
1441～1445	18	1526～1530	$17\frac{1}{2}$
1446～1450	$19\frac{3}{4}$	1531～1535	$14\frac{7}{8}$
1451～1455	$19\frac{3}{4}$	1536～1540	15
1456～1460	20	1541～1545	$12\frac{1}{3}$
1461～1465	$19\frac{2}{3}$	1546～1550	$10\frac{1}{2}$
1466～1470	—	1551～1555	$13\frac{1}{3}$
1471～1475	—	1556～1560	(12)[a]
1476～1480	$18\frac{1}{2}$	1561～1565	$(9\frac{5}{8})$[a]
1481～1485	$19\frac{1}{4}$	1566～1570	(11)[a]

a：括号中的数字并不能全面代表 1555 年以后的市场行情，因为这是官方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短期信贷（例如佛兰德的公债），而且 1557 年西班牙国王的破产扰乱了国王和借款人的关系。

资料来源：赫尔曼·范德尔·维（H. van der Wee）：《安特卫普市场的增长和欧洲经济（14～16 世纪）》第 1 章，第 526 页。

2. 政府债券交易的发展

在南欧和北欧各个城镇，由城镇或统治者出售终身年金或世袭年金在中世纪后期就成为公共信贷的流行形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城镇，由这种惯例发展出一个完整的巩固的市债体系，由此使得市政债券交易相当普遍。热那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①] 市政当局发行的公债在这里总是称为凯穆派拉（*Campera*），其中每一份“鲁吉”（*luoghi de la Campera*）的票面价值为100热那亚记账货币；每一次公债的发行都规定了一种税款或者其他信贷资金以此为贷款的还本付息提供资金。1407年，为了重组政府债务，许多公债结合起来，形成了圣乔治银行的核心，这逐渐合并了其他公债。从1453年起，圣乔治银行也以自身的名义发行新的“鲁吉”债券。“鲁吉”债券以其所有者的名字进入圣乔治银行的账户，而且还可以出售或抵押。例如，它们在赊账商业交易中通常被当做担保品。“鲁吉”债券也在广场银行（Piazza Banchi）定期交易，因为其市场价值和票面价值并非总是保持一致，而且利率常常波动起伏，所以投机就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买进和卖出银行团就是专门为此目的成立的。圣乔治银行的“鲁吉”债券非常受欢迎，有11 000以上的名字出现在登记册中，其中包括许多相当显贵的人，有寡妇、孤儿以及教会人士，他们来自热那亚本地以及外地。由此，大部分人口的储蓄都被吸收到政府的钱袋中。

贷款的利息并不是直接用现金支付的，而是记入登记册的 delle paghe。依次£ *de paghe* 的余额也可以交易或者抵押。£ *de paghe* 通常用于转账支付。逐渐地，它们也被圣乔治银行再吸收，因为消费税和其他税种的包税人可以以市场利率用这些£ *de paghe*，偿还他们欠下圣乔治银行的包税债务。有时用现金以其票面价值支付£ *de paghe* 较小的余额。

从16世纪起，罗马教皇的财政经历了类似的发展。以汇票进行贷款，长期以来在将收入从整个天主教世界转移到教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6世纪，这种信贷形式仍旧保持了其重要性。富格尔家族成为教廷在德国、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银行家，负责将教廷的收入汇往意大利，而奢侈品贸易和这种金融合作紧密相连。佛罗伦萨以及后来的热那亚进行的有息的普通贷款同样也很普遍。但是教皇信贷体系的巨大扩张，尤其是在 【363】

① 雅克·希尔：《18世纪的苦难》（巴黎，1971年），第100～142页。

1527年之后，都属于长期年金信贷的范围，并未受到教会法令的禁止。教皇将“金山”公债（*Monte*），即从某已给定税种的收益获取年金的一般权利，卖给个人或银行团，以获取现金。购买者将蒙特分为许多份，然后再将其作为年金证明书卖给罗马城内外的普通大众。罗马城由此发展成为教皇债券的一个重要市场，从罗马到整个意大利的教皇债券都在这里交易。[①]

虽然市政年金证书或教皇年金证书的发行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其转让却继续受到限制措施的妨碍。这些证书仍旧必须在特定的个人名下，它的进一步买卖必须经过复杂的正式手续，因而许多证书就保存在其最初的购买者手里。而对政府短期债券的限制就没有如此严格，从16世纪起，特别是在欧洲北部，政府短期债券通常就有持票人条款，这就为建立真正的政府债券市场开辟了道路。

里昂集市的繁荣以及卢卡人（Lucchese）和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在那里[本维斯（Bonvisi）、思考兹（Strozzi）、帕兹（Pazzi）、卡普尼（Capponi）等]的活动，早已引起法国国王的兴趣。商业扩张以及国际支付的集中，已经在里昂创造出非常吸引人以至于无法漠视的流动资金储备和信贷余额。应法国国王的要求，里昂的大商人银行家将他们在集市期间从商业和金融中获得的国际信贷头寸交由他支配。最初，这只是集市之间的短期信贷，只是偶尔在有战争威胁时给予。到1522年，这种贷款已经演化为对国王从销售巴黎市饭店租金将要得到款项的预付款，由国王的收入为其提供保证。1522年标志着长期国债在法国的诞生。不久发行了类似的年金，在巴黎是1530年，接下来就是里昂。为了简化和统一管理公共财政，从1523年起，法国实施了重大改革，在财政顾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Generalités*）的框架内，【364】建立了中央和省的行政管理部门。

三种偶然同时出现的因素的相互作用，给予里昂市场短期公共信贷进一步的天然优势。这些因素是：1536年精力充沛的红衣主教托农（Tournon）出任里昂的地方长官，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日益需要金钱来进行反对哈普斯堡皇室的战争，以及南德的汉斯·克莱堡（Hans Kleberg）人对里昂金融市场潜力突然有了兴趣。[②] 1542年以后，里昂市场短期公共信贷扩展迅

---

① 戴路缪（J. Delumeau）：《16世纪罗马的债务问题》，载《当代历史杂志》第4章（1957年），第5~32页。

② 伊伦伯格（R. Ehrenberg）：《福格尔时代》第2章，新版[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1963年]，第69~107页、第159页以后。杜赛特（R. Doucet）：《16世纪里昂“伟大的政党”》，载《历史杂志》CLXXI（1933年），473~513；CLXXII（1934年），第1~43页。

速。在佛罗伦萨和德意志南部商人的帮助下，以及狡猾的帝国代理人加斯帕·达斯（Gaspar Ducci）的操纵下，安特卫普和里昂之间的合作甚至投机开始出现。1548 年出台了一项方案，要在巴黎、里昂、鲁昂和图卢兹建立四个公共银行，其目的在于将这些银行的存款用于公债。这项方案并没有什么实效，但是 1549 年、1556 年和 1563 年的皇家法令要仿效里昂的例子在图卢兹、鲁昂和巴黎建立汇兑银行。

在 1547 年弗朗西斯一世去世时，皇家短期债务高达 6 860 000 利弗尔（*tournois*）。其中的 2/3 在 1548 年以前都还清了，但在 50 年代战争时期，债务额再次上升，并于 1555 年高达 4 937 000 利弗尔。皇家债券并没有持票人条款，而是当着公证人经过正式的手续转让。尽管有着非常麻烦的程序，但是政府债券还是开始在里昂金融市场开始流通。在有利的环境下，这些债券甚至以一定的升水进行买卖，1550 年的升水高达 1.25%。而在战争和动荡时期，债券以相当大的折扣处理。在 1551 年秋天，债券的折扣额高达 10% ~12%。在随后的战争年代，甚至利率增加到每年 16%，筹集短期贷款都变得日益困难。在 1555 年复活节市场上，设计了一个大规模的还款计划即大方案（*le Grand Parti*），以处理极为突出的短期债务问题。为此，又增加了新的贷款，其年利率一律为 16%。这些债务，包括其复利，计划在以后的 41 个集市期内（即 10 年）还清，而且以里昂、图卢兹、蒙彼利埃的总收入作为担保。现存的债券都转换为一种重组公债。为了还本付息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大方案（*Le Grand Parti*）从未付诸实施。在里昂新的短期贷款使得短期国债仍旧居高不下。1556 年 11 月 1 日，国王和南德以及意大利的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达成了一项新的方案，由欧伯莱特（G. Obrecht）领导其实施。[365] 在这项方案的作用下，法国皇家信贷曾一度得到维持，而哈普斯堡皇室则被迫在 1557 年 8 月宣告破产。然而，到 1557 年年底，法国君主的短期债务高达 12 200 000 利弗尔，他不得不仿效菲力浦二世的例子。从 1558 年起，国家的破产就已经成为事实。1559 年 4 月，国王重组了 3/4 的短期债务，他将这些负债转换成由里昂城担保的年金，并规定逐渐偿还本金（*Le Petit Parti* 方案）。这个方案再一次失败了，人们对公共财政的信心缩小了，皇家债券以 15% 或以上的折扣进行交易。而佛罗伦萨和南德银行家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对他们偿付能力的信心几乎完全丧失，而这些年的破产风潮将他们在里昂的金融霸权一扫而光。里昂的政府债券市场遭到重创，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从 1557 ~1558 年起，热那亚银行家通过贝桑松清算集市获得

了欧洲公共信贷的控制权。

哈普斯堡皇室统治地区经历了相似的短期政府债券扩张。[①] 皇帝统治权引人注目的扩大及其宏伟的世界政策，为公共财政的扩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视野。首先，财政扩张受到伴随着世界权力的到来而来的新财政机会的刺激。卡斯蒂利亚土地银行（*Hacienda Real de Castilla*）和塞维里亚贸易商行处于最前沿，而阿拉贡王国的领土、意大利的领地，从 1528 年起与热那亚的联盟，还有富裕的尼德兰，都给它以动力。其次，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为新的年金信贷和新的短期贷款提供了坚实的公共资金担保。最后，繁荣的卡斯蒂利亚和布拉班特集市所形成的大量的私人商业信贷资金，逐渐进入政府财政。

早期，意大利和荷兰商人银行家，包括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瓜特罗蒂和尼古拉斯·范·李特根（Nicolaas van Richterghen），都借款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年轻的查理一世国王。这些短期贷款是偶然的、原始的而且代价昂贵，其利率在 20% 左右浮动。在需要信贷时，统治者更喜欢求助于城市，首先是安特卫普。在 1517～1521 年间，查理一世利用安特卫普卖出了大量的可赎回年金。这些年金用城市本金作担保，其还本付息被转让给【366】授权的宾登（*beeden*）和领地收入。其发行利息为每年 6.25%，这对当局很有吸引力。为了给 1519～1520 年的皇帝选举筹集经费，查理一世求助于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南德的银行家，首先是富格尔和韦尔瑟。当 1521 年战争爆发时，皇帝发现他自己不得不以高息筹集新的短期贷款。这些贷款很快就在 1523 年还清了。

虽然以上的短期贷款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安特卫普的真正的政府债券市场。1528 年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从那年起，短期公债就成为安特卫普市场的永久特征。由于皇帝在德国没有正常的收入，他就将在南部获得的流动资金和可能的信贷通过安特卫普转移到他们的目的地。安特卫普和坎波城之间的商业轴线因此具备了金融内容，通过这个轴线热那亚和里昂得以联系起来。

南德商人银行是有关各方中最积极的。富格尔、韦尔瑟、赫尔瓦特（Herwart）、赫希斯泰特尔（Höchstetter）、英霍夫（Imhof）、塔彻（Tucher）等等，都将他们的投资转向公共领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16 世纪 20 年代的

① 凯兰德（R. Carande）：*Carlos Qginto y sus banqueros*，第 2 卷（马德里，1941～1949 年）；伊伦伯格（R. Ehrenberg）：前引书第 2 章，第 25～80 页，第 147～221 页。

商业危机中遭受严重的损失，因而对北欧和中欧贸易的恢复持悲观态度。既然皇帝已经擅取了意大利的控制权，而且成功地终结了德国 *Bauernkrieg* 和西班牙 *Comuneros* 的反叛，因此他们的活动被打上了明显的皇权特征。他们在安特卫普借给皇帝短期贷款，或者从安特卫普经由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其他地方的汇兑市场给皇帝提供金钱，而这些借款的偿还通常在坎波城或塞维利亚经由西班牙财政收入，或即将到来的贵金属运输舰队作担保来进行。这种担保主要以包税权（*libranzas*）的形式来提供，即指定皇家收税官或领地包税人向银行家（债权人）偿债。为了偿还债务，皇帝有时会将包税权转让给银行家。作为对其贷款的偿付，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收到"骑士团领地"（*Maestrazgos*）的包税权，这块领地属于军事领地（Military Orders）。[①]

在 1551 年之前，西班牙很少允许出口贵金属。而经由清算及时的贵金属转移则会引起汇率灾难性地下跌，因此商人银行家在西班牙大量买进商品，以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这导致了商品购买价格的高涨，从而将商业利润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与此相对照，金融交易的收益却相当吸引人。因此，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扩张和哈普斯堡皇室公共财政的增加一同前进。【367】

最初，南德商人银行家一直将西班牙的债券保持到偿还时，而且用他们自己的储备金，或者从局外人那里筹集资金，为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贷款提供经费。然而，从 1536 ~ 1537 年起，南德商人银行家需要来自卡斯蒂利亚的金融支持。他们加紧了在西班牙的商品购买，用从卡斯蒂利亚集市上得到的垫款来支付购买款，并由包税权或他们拥有的其他债券来提供担保，而在西欧卖掉西班牙商品后又努力在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获得直接的流动资金。为了卡斯蒂利亚的私营汇兑银行，富格尔和其他商号也开始将包税权折价卖给坎波城集市的银行家。如果因"白银舰队"未能按时抵达目的地，政府当局不能及时偿付债券，那么卡斯蒂利亚集市上的支付日期就必须延期。1543 年第一次发生了延期，此后延期更加频繁，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这就扰乱了清算集市的正常运转，但是，这里的商业集市仍保持着其规律性。

---

① F. 吕兹·马丁：'Credito y Banca. Comercio y Transportes en la Etapa del Capitalismo Mercantil', *Jornados de metodologia aplicada de las Ciencias Historicas* 24 - 27 *April* 1973, *Santiago de Compostella. Ponencias y comunicaciones, apéndice* [科摩布斯泰拉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la, 1973)]，第 7 ~ 19 页。

安特卫普交易市场上短期公共信贷的年利率在1524年暂时下降到12%，而在30年代更持久地下降到12%，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出现(见表27)。在战争危机期间，利率有所上升，但是总的趋势仍是下降的，到1549年达到了8%~9%的最低点。皇帝和政府的金融代理人积极活动在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上，他们是1528~1531年的吉拉德·斯泰克(Geer-aard Sterck)、1529~1541年的拉扎勒斯·塔彻(Lazarus Tucher)、1542~1550年的加斯帕·达斯和1552年以后的加斯帕·斯凯茨(Gaspar Schets)。大部分贷款的间隔都是两个集市，即3个月或6个月。利率在这时获得了同质性，具备了明显的市场特征。因为安特卫普的大多数政府期票都有持票人条款，有的甚至由银行发行，因而它们的转让非常容易。1531年安特卫普新交易所的开张，鼓励了这种转让。随着国际性商号在安特卫普的积极活动，利用商品贸易的现金流转发展了定期的短期政府债券交易。来自尼德兰政府的信贷证以及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个人债券，各省或某些城镇和地区【368】实体的债券，总收入的领取人的个人债券，代表政府的大商人公司的个人债券以及葡萄牙国王的债券，这一切都在安特卫普汇兑市场(Antwerp Exchange)流通。

表27　安特卫普金融市场对官方短期贷款的年利率(3个月平均值，1511~1555年)　单位:%

日期(年)	冬季集市	复活节集市	圣灵降临节集市	圣巴罗集市
1511	20	20	20	20
1512	20	20	20	20
1513	20	20	29	—
1514	—	—	20	—
1515	—	—	20	20
1516	20	18	—	$18\frac{3}{4}$
1517	18	24	20	18
1518	$17\frac{2}{3}$	$15\frac{1}{2}$	—	21
1519	—	21	$15\frac{1}{2}$	15

续表

日期（年）	冬季集市	复活节集市	圣灵降临节集市	圣巴罗集市
1520	17	$16\frac{1}{2}$	13	$15\frac{1}{4}$
1521	—	$16\frac{1}{6}$	$21\frac{1}{2}$	17
1522	$20\frac{3}{4}$	19	19	$20\frac{1}{3}$
1523	—	$20\frac{3}{4}$	18	15
1524	$12\frac{1}{2}$	—	—	12
1525	12	12	$12\frac{1}{4}$	—
1526	$12\frac{1}{2}$	$12\frac{1}{2}$	—	13
1527	$13\frac{1}{8}$	18	—	19
1528	16	$17\frac{1}{2}$	$21\frac{1}{3}$	$21\frac{1}{2}$
1529	$18\frac{1}{3}$	$20\frac{1}{4}$	18	$21\frac{1}{3}$
1530	19	18	$19\frac{1}{2}$	$17\frac{3}{4}$
1531	$18\frac{1}{2}$	$16\frac{3}{4}$	18	$16\frac{2}{3}$
1532	16	15	16	$16\frac{3}{4}$
1533	—	—	—	—
1534	$13\frac{3}{4}$	$13\frac{1}{2}$	$13\frac{1}{4}$	13
1535	$13\frac{1}{4}$	$12\frac{1}{2}$	13	13
1536	14	$14\frac{1}{3}$	15－18－20	19
1537	17	$14\frac{3}{4}$	16	$13\frac{1}{2}$
1538	12	$12\frac{1}{2}$	12	14
1539	$12\frac{3}{4}$	12	$16\frac{3}{4}$	18
1540	$19\frac{1}{2}$	16	$14\frac{2}{3}$	$12\frac{1}{4}$
1541	12	$11\frac{1}{2}$	12	12

续表

日期（年）	冬季集市	复活节集市	圣灵降临节集市	圣巴罗集市
1542	$11\frac{1}{2}$	12	12	12
1543	12	12	12	12
1544	14	15	17	14
1545	12	11	10	11
1546	11	$11\frac{1}{4}$	12	12
1547	12	12	10	10
1548	10	10	10	10
1549	10	10	10	9
1550	10	10	10	11
1551	11	11	11	12
1552	12	13	14－16	14
1553	14	14	14	12
1554	12	14	$18-14\frac{1}{6}$	14
1555	14	14	14	14－16

资料来源：赫尔曼·范德尔·维（H. van der Wee）：《安特卫普的市场增长和欧洲经济（14～16世纪）》第1卷，第527页。

【369】

1542年法国和加尔德（Guelders）的入侵以及随后年代中的战争狂热，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政府的短期债务随后迅速上升。佛罗伦萨金融家加斯帕·达斯作为皇帝和布鲁塞尔政府的代理人，在安特卫普金融市场上积极活动，他发起了一项投机于里昂和安特卫普间的货币转移，南德商人银行家参与了这项活动。从1544年起，英国商会的主管斯蒂芬·沃汉（Stephen Vaughan）代表亨利八世，在安特卫普金融市场上缔结短期贷款契约。为了给查理大帝新的防御工事提供经费，安特卫普市通过短期期票和销售年金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到1546年为止，富格尔家族拥有的短期政府债券价值高达1 118 000阿图瓦磅，其中包括安特卫普市、布鲁塞尔政府、葡萄牙国王、

英格兰国王和代表包税人（*Rentmeesters*）的加斯帕·达斯发行的债券，其利息从11%～13.5%不等。而富格尔家族本身，也从安特卫普交易市场得到总额为661 404阿图瓦磅或110 834佛兰德格罗特的借款，这其中包括35笔借款，其利息从8%～10%不等。

16世纪50年代，极其野蛮的军事冲突使得官方借款陷入令人恐惧的境地。在1551年12月，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和孟佛雷多（Casal de Monferrato）谈判期间，皇帝的财政状况非常窘迫，以至于他只有劝说热那亚人延长过去的贷款期限并提供新的贷款，条件是允许热那亚人从西班牙出口贵金属。经过艰苦的谈判，皇帝与安东尼·富格尔在1522年5月28日也达成了协议［即菲拉赫（Villach）公债］。在尼德兰地区，佛兰德、布拉班特和荷兰省代表中央政府发行了大量的年金。通过向塞维利亚大量地进口美洲白银、开征新税、卡斯蒂利亚集市短期垫款和重新允许白银出口，皇帝还徒劳无益地试图挽救毫无希望的金融形势。到1555年为止，皇帝在西班牙的短期债务高达24 000 000阿图瓦磅，在尼德兰为6 000 000阿图瓦磅。随着利息的高涨，如此庞大的负债意味着极度的财政紧张，在1556年它为尼德兰政府增加了1 357 287阿图瓦磅的负担。更为糟糕的是，1556～1557年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因此金融市场就处于粮食投机的压力之下。

1557年6月，菲力浦二世颁布了他的第一次破产法令，规定推迟所有以官方收入作担保的债务的偿还，并且由利率为5%的西班牙公债来代替它们。从当年7月1日到9月26日，所有运抵塞维利亚的白银货物都要充公。【370】经过漫长的谈判，1560年11月14日，菲力浦二世与热那亚银行家达成了偿还他们的贷款的协议。新的法令从1557年起再次冻结了所有借给国王的贷款，并通过在塞维利亚的贸易商行发行新的利率为5%的公债券而将原有债务重组。因此商行（*Casa*）似乎就扮演着西班牙国家银行的角色，它为国债服务。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革新，但是，这个试验彻底失败了。当国家开支上升时，而白银的输入量却在减少。此外，富格尔家族和其他南德商人银行家拒绝与此合作，直到两年后他们接受了一项妥协方案，不幸的是新方案的条件对他们更不利。他们中的许多银行家都破产了，南德商人银行再也没有从西班牙国家破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安特卫普金融市场上哈普斯堡皇室官方金融的霸权地位也永远地消失了，它的地位自50年代初以来就受到相当大的削弱，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西班牙的税收、信贷和贵金属进口。

热那亚银行业的复苏是投机取巧策略的杰作。当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

世获得意大利的政治控制权时，热那亚银行家果断地选择了哈普斯堡皇室，并在 1528 年后与塞维利亚和卡斯蒂利亚结盟，保持了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传统友好关系。为了打破佛罗伦萨人和卢西奇人在里昂集市的霸权，以及逃避法国君主的政治控制，他们于 1534 年在贝桑松建立了自己的集市，这个地区处于法国国王和哈普斯堡皇室的控制势力之外。20 年代，查理的军事行动形成了将意大利经济纳入哈普斯堡联合体的出发点。50 年代末，大规模的国家破产（1557 年的哈普斯堡皇室、1558 年的法国、1560 年的葡萄牙）消除了南德商人银行家的影响，为热那亚获得世界金融霸权开辟了道路。南德商人银行家用他们的自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公共财政活动。而热那亚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参与公共财政的程度没有那么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使用的资金来自局外人的存款而不是自有资金。结果，热那亚人更好地经受住了危机，经受住了对最重要的政府银行家的最后一击，从此，"富格尔家族的天下"（das Zeitalter der Fugger，伊伦伯格语）永久性地让位于"热那亚人的统治"（le siècle des Genois，布罗代尔语）。

其他情况的出现也有利于这种变化。在 1559 年的 Cateau-Cambrésis 条约之后，西班牙的世界政策重心转向地中海，而热那亚在地中海的位置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371] 60 年代以及其后的许多年中，意大利与利凡特、西班牙、德国和尼德兰的贸易经历了新的扩张，其结果是产生了银行家可以用来提供给政府的信贷资金。但似乎与此相矛盾的是，热那亚人的统治地位因安特卫普金融市场新的活力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突然失去南德银行家的影响之后，安特卫普被迫永久地放弃了它对哈普斯堡皇室官方财政的垄断权，但它作为西北欧领导性的商业性金融市场的地位却得以完全保持。直到 17 世纪晚期，它一直从北欧与南欧的贸易扩张中得到新的力量，主要是办理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从 1567 ~ 1568 年尼德兰爆发革命、伊丽莎白封锁了来自西班牙的直接的白银运输开始，安特卫普金融和汇兑市场就成为热那亚银行体系中颇有价值的附属部分，尤其表现在为 8 年战争提供经费。

自从查理五世继位后，公债合同就在西班牙公共财政体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1] 商人银行家将在坎波城发行的汇票卖给西班牙国王、国王的大臣以及国王在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这些汇票可以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以固定的高于市场的汇率，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进行支付。这些垫款的偿

① 雷帕尔（H. Lapeyre）：《西蒙·吕兹在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契约贷款》（巴黎，1953 年）；菲力浦·吕兹·马丁：《佛罗伦萨和坎波城之间的汇票交易》（巴黎，1965 年），PP. xxix – lii。

还由西班牙的公共收入、西班牙商品以及（日益增多的）对来自印度的白银的要求权来保证。在1551年和1560年间，尤其是从1566年以后，公债合同常常伴随着从西班牙向外出口白银的许可证。除了这种用于外国的公债外，还有用于国内的公债，它的偿还在西班牙国内进行。这实际上就是对国王的短期贷款，在1575年法令之前，它通常采取在卡斯蒂利亚集市的汇兑银行开立信贷证的形式，而且清楚地表明利率（60年代其年息为7%～8%，1572～1575年为12%～16%）。公债合同通常主要和由大商人银行家组成的银行团签订，这些合同的大部分又通过间接参与或存款转而售给小商人和地方金融家。由大银行家控制的国际联系网络以及他们所享有的信任，使得他们可以代表国王来动员信贷资金，从而实现资金有规律的转移，可以将其转移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欧洲的任何地方。从1557～1560年起，热那亚人［格瑞迈尔蒂（Grimaldi）、根泰尔（Gentile）、森图瑞恩（Centurione）和其他家族］支配了公债合同。与此同时，在1557～1560年之前，热那亚人就将他们对政府的金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小商人对这种贷款的参与的基础之上，偶尔也有局外人的存款参与这种对统治者的贷款。热那亚人上升为西班牙世界政策的领导性银行家，需要更坚固的金融贡献。现在，热那亚人利用卡斯蒂利亚年金公债（*juros de Castilla*）的形式做出系统的努力，以动员西班牙和意大利更广大群众的储蓄。[①] 【372】

以前交易者经常收到“担保债券”（*juros de caucion*），这仅仅是一种保证书，以抵御常规的以财政收入，或到塞维利亚的运输财宝的舰队作担保的债券不能有效地转换为现金的风险。但在1561年1月2日以后的公债中，认购人交易者接受了大量的可赎回债券（*juros de resguardo*）。这不再是作为担保，而是对实际债券兑现的一种临时性垫款。认购人也可以出售这些可赎回债券，只是要求他们在将债券兑现时，将可赎回债券的票面价值归还政府或者提供价值相当的公债券。当一些公债（例如贸易商行发行的公债）以低于其发行价值50%的价值在市场上流通时，投机行为就可能发生。热那亚人接受有效的而且总是可以以票面价值卖出的可赎回债券。当债券兑现时，他们就以公债来偿还政府的临时性垫款。他们所用的公债券是在市场上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购买的，但却可以按票面价值提供给政府。

在1561～1575年间，热那亚银行家在倒卖可赎回债券方面获利甚多。这首先是在卡斯蒂利亚进行的，因为大多数普通的（即可赎回的）公债只

① 菲力浦·吕兹·马丁：“*Credito y Banca. Comercio y Transportes*”，第7～19页。

有卡斯蒂利亚的居民才可拥有。不久卡斯蒂利亚的法人团体，如修道院、医院、牧师会和其他机构，也获得了官方的许可。当外国人也被允许购买西班牙的年金时，购买者渗透到了尼德兰、德国和意大利。在意大利，西班牙年金成为除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官方年金外人们特别渴望的一种投资。尽管年金发行量有相当大的增长，但对年金的信心增长导致了利率的下降（见表 28）。

欧洲的贵金属分配也同样由热那亚控制着，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雇佣军喜欢用黄金支付其薪水，但从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流通货币越来越多的采用白银。而意大利仍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因而热那亚银行在战争财政中成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它将白银换成黄金支付给军[373]队。1566 年的 *licencias de sacas* 造成的倒退，1568 年英国对直接运往尼德兰的白银的短暂禁运，西班牙—热那亚白银通道重要性的增加，这一切都再一次促成了热那亚人对哈普斯堡皇室财政的支配。

表 28　资金总额和西班牙年金的年利息总额（1504～1598 年）

年　份	年度未偿还利息（*maravedis*）	利　率	资金总额（*maravedis*）	资金总额（达克特）
1504	112 362 468	[10]	1 123 624 680	2 996 332
1505	109 016 586		1 090 165 860	2 907 108
1515	129 300 000	[9.75]	1 326 153 840	3 536 410
1516	131 103 000		1 344 646 150	3 585 723
1522	137 926 000	[9.50]	1 451 852 631	3 871 607
1523	139 930 000		1 472 947 368	3 927 859
1524	152 515 000		1 605 421 052	4 281 122
1526	186 555 000	[9]	2 072 833 333	3 327 555
1527	185 184 000		2 057 600 000	5 486 933
1529	232 856 000		2 587 288 888	6 899 437
1536	269 530 000	[8]	3 369 125 000	8 984 333
1538	253 143 000		3 164 287 500	8 438 100
1540	266 700 000	[7]	3 810 000 000	10 160 000
1542	273 155 000		3 902 214 285	10 405 904
1545～1550	323 689 811	6.25	5 170 180 970	13 811 149
1552	299 580 826	6.09	4 919 225 380	13 117 934
1554	329 329 000		5 407 701 140	14 420 536
1560	550 687 280	6.78	8 122 231 260	21 659 283

续表

年　份	年度未偿还利息（*maravedis*）	利　率	资金总额（*maravedis*）	资金总额（达克特）
1566	790 195 000		11 654 793 510	31 097 449
1573	1 031 892 650		13 219 655 600	40 585 748
1584	1 431 318 546	5.81	24 635 431 000	65 694 482
1598	1 737 860 239	5.79	30 011 857 300	80 039 619

资料来源：菲力浦·吕兹·马丁：《信用、银行、商业与交易》，第 14 页。

1561 年以后，年金信贷的强有力的扩张以及热那亚人对年金交易市场巧妙的干预，都未能为日益增长的公共财政提供足够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继续求助于热那亚银行家的短期信贷。到 1575 年，政府的短期债务再次上升，高达 15 184 464 达克特。1575 年 9 月 1 日，菲力浦二世发布了一项法令，据此所有 1560 年 11 月 14 日以来缔结的公债合同都被宣布无效，而且废除了可赎回债券体系。由于热那亚人的漠视或者说联合抵制，政府对在尼德兰的雇佣军的薪水支付非常混乱，以至于在布鲁塞尔发生兵变，随后洗劫了安特卫普。这就是所谓的“西班牙哗变”。1577 年 12 月 5 日，菲力浦二世被迫同热那亚银行家缔结了一项新的协议。据此，政府的短期债务得以重组，其条件是可赎回债券作为预付款仍旧掌握在热那亚人手中，发行新的年利率为 3.33% 的公债，而且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权利。而热那亚人则同意发行一项新的总额为 5 000 000 埃居的公债，而且在意大利各中心立即支付。【374】

1575～1577 年的危机再次巩固了热那亚人在西班牙公共财政中的支配地位。① 然而，热那亚人也从中得到教训。为了加强他们的地位，他们在 1578 年将贝桑松（Besançon）的清算集市迁到皮亚琴察，而且组织西班牙的白银出口主要经过热那亚。为此，菲力浦二世在 1575～1577 年危机之后再次试图粉碎热那亚人的霸权。西班牙银行家，如西蒙·吕兹（Simon Ruiz）被要求在契约（*asiento*）贷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从 1579 年起，佛罗伦萨的弗朗赛斯科·达·美第奇（Francesco de Medici）也被召进西班牙。1583 年，彼得·范·奥德赫斯特（Peter van Oudegherste）递交了一份在西班牙建立公共银行体系的方案。在 1583 年和 1590 年曾一度再次禁止白银出口。最后，菲力浦二世在 1596 年发布命令推迟短期债务的偿还，随后

① 达塞尔瓦（J. G. Da Silva）：《意大利的银行信贷》，第 217～278 页、第 679～691 页。

的1597年11月28日的《月中付款法规》对短期债务进行了重组。作为对1596年法令的反抗，热那亚建立了一个金融公司，以促进热那亚银行家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利益。[①] 该公司还承担了直接监督西班牙国家账户的任务。热那亚人的支配地位在1618年似乎再次得以巩固，当时成立了全部由热那亚人组成的新公司，但实际上这个新成立的公司暴露了热那亚银行家的防御性态度。它们在共同对抗来自当局的可能的打击中携起手来。

1619～1620年信贷危机期间，世界经济的巨大改变严重地破坏了热那亚人的地位，随后的1627年，西班牙国家的再次破产又一次削弱了热那亚人的垄断。西班牙，首先是葡萄牙的银行家，在安特卫普积极活动而且与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裔犹太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在奥利瓦雷斯公爵的支持下试图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而且此时西班牙的世界政策也已经垂死。30年代经由多佛从西班牙将白银运往尼德兰的"英国航路"的开辟，导致了【375】西班牙战争财政组织机构的改变。世界银行体系为西班牙的世界霸权服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富格尔家族和热那亚银行家的时代是公共财政取得引人注目增长的时代。对金钱不断增长的需要，使得需求增加并鼓励寻求新的金融技术和工具。个人财富的流动性更强，而国家的债务更有组织。金融供给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1500～1650年的短期和长期公债利率都有了相当大的下降。但公共财政的基本结构却没有改变，其核心还是可赎回年金提供的信贷和短期垫款，这两种形式都由商人银行家支配。私人银行仍旧支配着公共财政，而君主却作为哀求者出现。始终没有出现真正的公共财政。虽然资金供给和需求都稳定地增长，但受到仍旧原始的金融技术框架的限制，不断地出现灾难性的国家破产和延期偿付。

3. 从短期国债到长期国债

传统的思想和技术在17世纪的法国公共财政中继续起着基础作用。法国国王仍大规模地出售可赎回世袭年金和终身年金。一旦出现一项新的国家收入来源，国王就通过销售年金而得以资本化，这项新的收入就被指定用于偿还年金。对国王来说，将年金的偿还指定给特定的收入有如下好处：如果

① 菲力浦·吕兹·马丁（F. Ruiz-Martin）：《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第四届国际经济史大会会议论文，布卢明顿（*Bloomington*），1968年（巴黎—海牙出版，1974年）。

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收入无法实现，那么年金利息的偿还就可以延期［正如1648～1653年佛隆德（Fronde）一再发生的那样］。而且，年金的可赎回条款允许废除和转换公债。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极为憎恶年金体系，他于1663～1664年制定了一项普遍废除年金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在随后的25年中将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回购国家年金。但食利者（*rentiers*）的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而用一项年金转换计划代替年金废除计划。新发行年金的收益率比以前要低，因此，利率逐渐从7%降到5%甚至更低。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总额大约为20亿利弗尔的资金被8.6亿利弗尔（*tournois*）的服务费所抵销，其平均利率为5.3%。

除了改善政府的预算情况（其结果是1662～1671年法国出现了预算盈余）外，柯尔贝尔还试图通过1674年建立的借贷银行（*Caisse des Emprunts*）来加强公共财政。这个新的银行从私人那里接受可以通过短期通知书提取的存款，而且还发行当局在偿付中接受的、随后完全可兑换的证券（*promesses*）。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用最低限度的流动性储备建立永久性的流动公债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与财政部的现行政策严重冲突，因此在1683年柯尔贝尔死后，李·派尔蒂尔（Le Pelletier）立即决定废除借贷银行并将该银行的存款转换成年金。 [376]

17世纪法国年金的成功以及利率的下降也可以从需求角度去解释。在粮食价格几乎不变或根本不变而且经济形势具有不确定性的时期，年金和其他不动产一样代表着安全的投资，而不像投资于商业和工业那样被看做是投机性的。因而年金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足够的顾客，即卖方市场（*la rente domine*）。然而，年金的发行需要极为繁杂的手续，它必须在巴黎的国会登记，而且要由皇家法令来发布，年金的销售过程本身也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拥有随时可以处置的流通性资源，于是法国国王求助于金融家和银行家。这些金融家都是直接和公共财政有关的，他们首先是皇家官员、财政官员、总管、监督员、税务员等，其次才是私人金融家。除了组织销售年金以外，几乎所有其他公共收入的征收，特别是间接税的征收，都签订合同包给了这些金融家。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类包税人或年金购买者，他们是：财政专员，与专门机构和特殊的财政收入有关；包税人，与皇家领地有关；汇票人，和临时的工作有关，如供应作战部队；职员，和特定的职责有关。从16世纪末起，包税（fermes）日益集中起来（《1584年5个大农场的租约》），一些包税契约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因而只有金融家组成的银行团或辛迪加才能认购。

金融家的介入为法国财政提供了越来越多而且有保证的财政信贷供应。

金融家自身也常常不得不通过发行持票人本票向私人求得信贷。更为明确的是，这些都是由相关的金融家签发的、在固定的日期支付的、附带利息的本票，而且由合同规定的收入作担保。这些债券和政府发行的本票一起，成为【377】活跃的交易对象，仅仅在公共财政专家组成的有限的圈子内流通。许多这类证券交易仅仅和担保的提供有关，而且在1724年巴黎汇兑银行成立以前，不可能有一个有组织的金融市场。证券的流通可能有所增加，但却伴随着贬值和徇私舞弊。

在18世纪初，一种"货币券"（money notes）加入金融家和政府有价证券的行列。在1701年货币重铸期间，发行了一种临时性的证券作为商业中的支付手段，以填补旧硬币存款和铸造新硬币之间的这段空白期。随后这种货币票据大量出现（1704年还带有利息，从1706年起不再有利息）。到1707年，这种货币票据总额达1.8亿利弗尔，从而导致其价值灾难性的下降，随后以年金的名义对其进行了重组。1702年借款出纳处得以重建，它也发行带息本票。1710年现金出借人从12家总包税人组成的辛迪加发展而来，他也在这些资金的基础上开立票据。

17世纪90年代战争时期和18世纪初，有价证券的增值伴随着商人银行家对法国公共财政的深度参与。法国财政部长期以来依靠商人银行家[例如萨缪尔·贝尔纳（Samuel Bernard），赫尔瓦特家族（Herwarth）等等]的服务为法国政府在国外划拨资金。1700年前后，巴黎和里昂的商人银行家，通过同意为当局和金融家的证券提供贴现而更深地卷入公共财政。他们对这些证券的贴现并非通过现金，而是通过他们在国内外的代理行提取汇票来进行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将他们的钱借给国王，借出的仅仅是他们在国际商业界享有的信任。通过利用这种信任，在汇票的帮助下，商人银行家能够大量地吸收在欧洲可以得到的商业流动资金储备。因此，银行家通过串通一气、假公济私而拥有对政府当局的汇兑信贷。这种信贷并非包含在正常的商业交易中，而是仅仅建立在官方的许诺和担保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种信贷包含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因而这种形势维持不了多久。1709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了，国王准许商人银行家延期偿付，这实际上是给国王自己的延期偿付。

当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的公共财政陷入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公债高达30亿利弗尔，其中2/3为年金，另1/3为短期债务。因此，债务重组的要求非常迫切。人们在摄政时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而且采取了优先权。1716年成立了一个名叫维萨（*Visa*）的秘密委员会（Secret

Committee)，该委员会拒付可疑的债权人和可疑的债务，强行降低了长期债务的利率，而且设法重组短期债务。最后，苏格兰银行家约翰·劳的方案【378】(*Système John Law*) 被政府接受，其中包含大量废除短期公债的措施和进行综合性的金融和财政改革。① 首先，劳建议仿效英国和瑞典建立一个公共的发行银行，发行可兑换的银行券以取代金属货币，而且这种银行券也可以用来付税。1716 年 5 月 5 日，劳获得财政委员会 (*Conseil des Finances*) 的许可，建立了资本金为 600 万利弗尔的股份银行 (*Banque Générale*)，其中 2/3 为政府有价证券，另 1/3 为现金。该银行接受存款，进行贴现业务，而且发行纸币。1717 年，劳又建立了西方公司 (*Compagnie d' Occident*)，它获得了法国在新世界领土 25 年的冠名权。它最初的资本金为 1 亿利弗尔，分成面值为 500 利弗尔的股份。其所有的资本金都用政府有价证券认购，其利率固定为 4%。到 1718 年年底，资本金被全部认购。

1718 年劳的股份银行成为皇家银行，发行印有皇家图章的可兑换纸币。其后，从 1718 年 12 月起，西方公司开始合并开展非洲和亚洲贸易的公司，从而完全建立起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这个企业在 1719 年也有了新的名字，即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而且发行了 50 000 新股。它同时获得为期 5 年的征税独占权。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只要是私人包税人征集税收，他们就将收到的银行券呈给劳的银行要求兑现。但印度公司却并非如此，因而，对银行现金储备的压力就得以消除，从而劳建立的体系就愈加平衡。

劳在 1719 年 10 月进一步提出，印度公司应该通过给政府提供利率为 3% 的巨额贷款，从而接管政府的短期债务。为此目的，公司开始进行新股份的发行工作，规定在 10 个月内用现金、银行券或政府债券认购。最后，公司的股份上升到 624 000 股，给国家的贷款总额高达 15 亿利弗尔。这 3% 的利息暂时来自对间接税的承包，但劳对此又提出了一项财政改革建议，即间接税的征收应该简化，应该将其转换为对不动产征收的单一税，其税率应根据政府的需要在 0.5% 和 1% 之间浮动。【379】

当皇家银行发行的自由兑换的纸币成为法定货币，以及 1720 年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时，劳的体系似乎获得了成功。公司的股份的市场价值现在上升到每股 10 000 利弗尔，这预示着不仅包括巴黎而且包括所有欧洲重

① 哈森 (P. Harsin)：《约翰·劳的银行体系》，见旺·迪伦 (J. G. van Dillen) 主编：《主要公共银行的历史》(海牙，1934 年)，第 273～300 页；路希 (H. Lüthy)：《法国新教徒的银行》，第 274～428 页。

要的金融中心股票市场的普遍繁荣。在巴黎，印度公司的股票取代了政府的债券，也就是政府的所有债权人都成为印度公司的股东。但是，这样一来困难也就增加了。财政改革遇到巨大的阻力；间接税的收益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形，而这些税是用来支付巨额国家贷款的 3% 的利息；在殖民地进行的事业同样没有希望。不信任感逐渐增长并迅速转变为恐慌，印度公司的股价猛跌至 200 利弗尔。劳逃离了法国，他的体系彻底溃败，从而对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法国的恐慌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由此产生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股票市场的大崩溃。1720 年 12 月在巴黎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它将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解散，拒付总额高达 5 亿利弗尔的偿债要求，而且将剩下的总额为 6.4 亿利弗尔的证券贷款和银行券重组为年息 2% ~ 2.5% 的年金。独立银行家组成的分裂团体重新掌握了法国的公共财政。法国财政又回到陈旧的结构中，直到 1776 年才建立了一个新的发行银行，即法兰西银行（*Caisse d' Escompte*）。

17 世纪瑞典公共财政也同样在政治和军事扩张造成的严峻压力下步履蹒跚。它首先受到法隆矿（Falun，铜的储藏地）铜产量激增，和根据 1625 年 6 月 6 日国王法令引入的、建立在银和铜基础上的双本位基准金属货币体系强有力的支持。在银泰勒（*talers*）之外，流通中增加了每枚重量为 1 公斤的铜泰勒。从 1644 年起，每枚面值 10 泰勒的金属货币（*platmynt*）开始投入流通。由于铜的市场价格的下跌，这种金属货币每枚包含 19.7 公斤的铜，这使得它无法适合正常的流通。这种情况刺激了银行券的发行。

为了能获得额外的信贷，国王古斯塔夫斯·查理十世（King Charles X Gustavus）于 1656 年 11 月 30 日，准许汉斯·惠特迈彻［Hans Wittmacher，后来获得约翰·帕尔姆斯壮（Johan Palmstruck）的贵族封号］在斯德哥尔【380】摩建立一个银行，将所有的兑换和贷款活动集中起来。1661 年，斯德哥尔摩银行获得了为期 30 年的发行纸币的权利，其后它发行印刷的银行券，印有持票人而且没有利息。这种银行券在瑞典和芬兰活跃地流通，而且也通常用于薪水的支付和税负的上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现代银行券（钞票）。但是斯德哥尔摩银行很快就犯下了它的第一次错误，即过度地发行银行券。当世界市场上的铜价也上升时，银行券的持有者随之越来越表现出对铜金属货币的偏爱，从而使得斯德哥尔摩银行的地位变得极度脆弱。1663 年夏天，出现了严重的银行挤兑，政府徒劳无益地通过对银行券确定一个强制性的比价而吸收银行券。在秋天，斯德哥尔摩银行失败，第二年它就被政府关闭。

在18世纪初，格茨男爵（Baron de Goertz）最后一次尝试为瑞典毫无希望的金融形势找到一个即刻解决的方案，他使用了一项新的权宜之计。在1716年5月和1717年11月，他在流通中投入了1 500万瑞克代勒（*rixdales*）铜金属货币（*myntteckens*）和300万瑞克代勒的带息国债（每份国债的面值从2瑞克代勒到18瑞克代勒不等）。但不久之后，这两种代用币都停止了流通，此时其价值仅为其初始价值的1/3。格茨（Goertz）体系很快就成为历史。

在1544～1574年间，英国国王为了保证不受庞大的英国商人公司（English Merchant Companies）以及后来的伦敦公司（Corporation of London）的束缚，而经常向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寻求短期贷款。将贷款从安特卫普汇兑市场转移到伦敦、债务展期、贷款偿还都需要高超的债务管理技巧，而在这方面托马斯·格雷欣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他总是等待合适的时刻，以他的判断力以及对商人冒险公司和批发商的巧妙利用，获得可以以事先固定的汇价偿还的货币。[①] 1574年后，英国再没有进一步发行外债，所以在短期债务方面，伊丽莎白主要依靠伦敦的货币出借人。她并没有过多地利用短期贷款，皇家财政继续主要建立在领地收入的基础上，例如领地年金、教会收入、罚没收入和通行费。女王也经常性地依靠国会以税收形式准许的补助金和额外收入。这种谨慎的体系依赖于她对经济持久稳定的判断。但是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打破了这来之不易的平衡，现在，极度的铺张浪费成为时尚，对公共开支的限制也放松了，年度赤字成为经常预算的持久特征。债务极为不祥地上升。1610年，索尔斯伯利（Salisbury）伯爵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作为上议院的财务主管（Lord Treasurer），提出了“大契约”（Great Contract），依据此项契约，国王和国会同意取消对领地的监护，作为回报，国王获得永久性的每年为10万英镑的补助金；其他的领地权利也同样被以每年20万英镑的补助金取消了；对食品和酒类的消费税以及新的通行税将创造额外的收入。[②] 毫不奇怪，商人对消费税的反对非常强烈，以至于塞西尔的创举失败了。公共财政面临着巨大的灾难。 【381】

为了给其穷奢极欲的花费寻求经费，国王三番五次地寄希望于国会的好意，但结果并非每次都令国王满意。原则上，只有在紧急时期国会才准予国

---

① 奥斯怀特（R. B. Outhwaite）：《英国国王和16世纪安特卫普的金融市场》，《经济史评论》第19卷第2号（1966年），第289～305页。

② 夏尔·威尔逊（C. Wilson）：《英国的学徒制度1603～1763年》（伦敦，1965年），第91～93页。

王补助金，但每一次抱怨都要由国王来补救。国王和国会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国王逐渐不理会国会而通过领地收入、皇家垄断权和短期借款来寻找解决办法。1611 年制定的关税承包契约（Great Farm of the Customs）落入了商人辛迪加之手，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逐渐成为皇家银行家。国王通过财政部凭证（Exchequer tallies）来利用这些包税人，起初这仅仅是由国库支付的凭据，后来发行了向包税人开出的支票，这些支票由当期或远期关税担保。有时国王也通过向包税人的透支来获得信贷（从查理一世开始，这种信贷还收取利息）。[①] 国王还从王室垄断权获得大量的收入，从皇家垄断权和特许权（包括特许状、垄断权和专利权等）的销售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对国会来说，却不是什么好兆头。1623 年的垄断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规定，垄断权的授予期限最多为 14 年，除非受益人拥有法人地位。这就为系统地出售特许权铺平了道路。利用出售公职和王室地产，成为额外公共收入可供选择的来源。1627 和 1628 年的皇家契约，授权伦敦公司卖掉大片的皇家地产，以偿还该公司为政府筹集的贷款。

斯图亚特王室还进一步及时地集中了伦敦的个人财富作为短期借款的来源。贵族成员以及朝廷中有影响的人都是合适的借款对象，此外还有财政官员和居住在伦敦的外国商人，例如 17 世纪 20 年代的菲力浦·布拉马奇（Philip Burlamachi）和彼得·范劳尔（Peter van Lore）爵士。有时为了给皇家提供贷款而组成辛迪加［例如垄断性的伦敦肥皂制造协会（London Society 【382】 of Soapboilders）］。伦敦公司常常被要求作为中介人，它通常将贷款的发行委托给伦敦同业工会会员公司，通过它们直接向市民借款或者求助于市议员。

通过贴现国库券，金匠银行家最终也成为皇家财政的猎物。在克伦威尔执政时期，这种贴现有所增长，在查理二世统治早期达到了顶峰。在王政复辟时期，国王和议会达成了一致协议，由此国王传统的领地权转换成 120 万英镑的世袭收入。这项收入来源于三种较大的永久性收入来源：古老的关税、荷兰式的新型消费税以及 1662 年设立的壁炉税。从议会获得额外补助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税和消费税的包税人仍旧通过垫款而扮演着王室银行家的角色，但金匠通过贴现业务日益支配了短期公共信贷，他们不仅贴现世袭收入的皇家转让书，而且贴现议会在紧急情况下或战争时期授予国王的补助金。

议会对金匠银行家在公共财政中所处的控制地位的不满逐渐显露出来。

---

① 艾什顿（R. Ashton）：《国王和金融市场》，第 47 ~ 53 页。

当国王在荷兰战争期间寻求新的补助金时，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为了挑战克拉伦登（Clarendon），提出了一个旨在消除金匠作为国王的银行家的提案。这个提案在 1666 年获得批准，它规定在预期的补助金收入的基础上发行短期贷款，贷款必须由公众**直接**支付给国库，而且由于证券实行了编号贷款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偿还。然而，贷款的出借人可以将这种新的"支付指令书"转让给第三方，也就是说，出借人可以将它们通过背书而贴现给银行家。一些支付指令书清楚地指定了用途，它们有可能代表贷款的偿还或者支付所提供的货物的款项。而另一些只是简单的证书，它给予持有人要求政府付款的权利。从 1667～1668 年，由整体的公共收入作担保的后一种证书以不断增长的数量和不断减小的固定面值流通。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一种纸币。这种货币包含着持有者对它的信心，但是，这种信心正受到疯狂的过度发行的毁灭性的削弱。人们越来越急迫地要求偿还支付指令证书上所规定的款项，最终导致国王在 1672 年 1 月被迫准予国库延期偿付总额达 1 173 353 英镑的债务。令议会吃惊的是，大部分支付指令书仍旧掌握在金匠银行家手中。很明显，唐宁的计划没有奏效。更为荒谬的是，债务的【383】延期偿付达到了唐宁最初的目标，国库的停付引起的震动非常强烈，以至于一些银行面临悲惨的境地。金匠银行家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最终消除了。

接下去的几年相对平静，17 世纪 90 年代的战争气氛再次使得公共财政面临严峻的问题。1688 年的光荣革命带来了一个国王—议会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处于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有着良好关系的荷兰君主统治之下，这就为政府当局提供了更坚实的信心基础。在 1672 年之前很流行的私人对官方权利转让证书的贴现，现在已经过时了。这预示着公共财政领域的关键性变革：英国的公共财政逐渐发展成为"国债"。1692 年，模仿荷兰的例子，英国议会也在讨论一项发行 100 万英镑唐提式养老金贷款的议案。这项议案在当年 12 月得以通过，在第二年 1 月 26 日得到国王的批准。① 这项法案有两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养老金的利息支付由立法通过的对啤酒和其他酒类新征收的消费税负担，这就是说**在议会的保证下**创造了一项可靠的信贷资金

---

① 唐提式养老金贷款，源自马萨林（Mazarin）红衣主教的财政顾问洛伦佐·唐提（Lorenzo Tonti，1630～1695 年）。在 17 世纪下半期的联合省和法国，这种贷款普遍应用于私人保险和市财政中。作为借出资金的回报，借出人获得年金，但有一项特别条款，即在年金持有人去世时，剩余的利息追加到活着的年金持有者的年金中去。相应地，活着的年金持有人享有稳定增加的利息收入，直到最后一个幸存的年金持有人去世。1692～1693 年英国的贷款中，债权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年息 14% 的简单年金，另一个在 1700 年之前年息为 10%，而在 1700 年之后实行唐提式安排的年金。参见迪克松（P. G. M. Dickson）：《英国金融革命》（伦敦—纽约，1967 年），第 41～42 页。

来源；而且，这个法案还创立了永久性（即长期）年金，这意味着年金持有者不能要求返还其资本金，可是政府可以在任何它有能力的时候偿还贷款。

1693 年的贷款并没有大获全胜，但是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原则却被引入英国的公共财政。在 90 年代，当时提出并批准了许多方案来为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 1694 年的百万彩票（Million Lottery），1697 年的麦芽彩票（Malt Lottery），土地银行，孤儿资金银行（Orphans' Fund Bank），等等。[1] 在所有的方案中，有一种方案因为其创意和持久的重要性而超过了其他方案，它就是苏格兰金融家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提出的建立英格兰银行的方案。菲力浦·布拉马奇（Philip Burlamachi）和保罗·品达（Paul Pindar）爵士在 17 世纪上半期就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的方案，只是没【384】有获得通过。但是，成功实现这种想法的政治时机到现在已经成熟了。1694 年帕特森提议一项年利率固定为 8% 的 120 万英镑的贷款。为了保证利息的偿付，议会应当对船舶吨位和酒类开征新税以创造一项"永久性"的信贷资金。根据公司特许状，贷款的认购人被授予开展银行业务的权利，例如他们可以接受存款，进行汇票和金银交易，进行担保贷款，等等。发行银行券的权利并未明确，但 1707 年新的特许状中明确包含了这项权利。所有认购人的借出款都不能超过 2 万英镑，其中至少有 25% 必须立即用现金支付，而其余的款项实行分期付款。

议会批准了这项建议。这项建议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 12 天的时间里，整个贷款就被全部认购，第一批分期付款资金转到了国家手中。国库以本票形式持有的贷款可以用来兑换有息国库券，而且可以偿付债务人。收到这种票据的人将其提交给英格兰银行，作为选择，他既可以将其存在银行（他们持有的证书带有利息而且可以兑现，但却不能大量流通），也可以用其兑换现金和银行券。银行券通常是可兑现的"无记名纸币"，以不同的面值发行而且很快就有了印刷版。安特卫普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以帮助政府账户款项的转移，为尼德兰南部进行的战争提供经费。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英格兰银行在其成立初期就深深地卷入了公共财政。

英格兰银行给政府的支持并不仅仅限于长期贷款和政府账户的提现和转账，它逐渐也在准予短期公债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见表 29）。根据 1707 年英格兰银行重续的特许状，国库券的交易已经明确地成为其中心任务。国库券是一种短期的有息政府债券，1696 年成立土地银行的法令中规定了它的

[1] 要了解这些方案，参见霍斯菲尔德（Horsefield）的《英国的金融试验》，第 93 页以后。

发行。它的持有人可以用其支付税收（尽管实际上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消费税委员会拒绝其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在到期日提交给英格兰银行支取现金。国库券的目标是成为财政部凭证和支付指令书新的改进的版本。由于议会的支持，它处于更为安全的控制下，而与英格兰银行的联系使其建立在坚实的制度基础上。虽然这种国库券是记名的，但它仍旧通过背书而转手流通。而且，它具有正规的形式，明显地保留了短期贷款的特征。起初，它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而财政部凭证仍继续作为短期公债活跃地流通。不过，国库券逐渐发展成为英国短期债务的主要工具，而且在18世纪又有所发展。英格兰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必要的，因为银行接受国库券并将其立即兑现，这明显地增加了人们对这种新的政府债券的信心。【385】【386】

1697年采纳了一项新的建议，发行新的长期贷款成立一个东印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有的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1709年又发行了其他贷款，而且两个东印度公司合并成为联合东印度公司。[①] 最后，在1710年，南海公司获得了在西班牙美洲开展贸易的垄断权，作为回报，该公司承担了国家的长期贷款。南海公司很快就更深地卷入政府借贷中。【387】1711年5月，面临着政府短期债券的贬值，爱德华·哈里（Edward Harley）领导的新内阁，将900万的短期债务重组为统一的、永久的、有保障的南海公司基金。为了使重组活动对投资人有吸引力，南海公司不得不以面值将政府的长期债务换成为公司的股票。

因此，三个大公司（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贷款在短期国债到长期国债的过渡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贷款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可赎回的，因而为当局形成了强大的保证。而从公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喜欢做商业或金融公司的股东，因为这些公司拥有支付利息的良好的担保，而且由于这些公司的商业或金融垄断权和经营活动还可以赢利。最终来讲，股票还可升值。

英国的公债仍旧主要由长期年金组成，一些是利率为6%～7%的有效期持续到1792～1807年的年金，而另一些利率为9%，持续到1742年。1717年，英国第一次将部分长期债务（主要是彩票资金）重组为新的年息为5%的股份资金，并由英格兰银行来管理。因为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普通股票市场普遍繁荣，南海公司的股票在1719～1720年疯狂地上涨，有人再次提出将剩余的年金和其他长期政府债券转换成南海公司新的股份。

---

① 迪克松（P. G. M. Dickson）：《英国的金融革命》。

表 29 **英格兰银行金融数据：总**

日　期	3月14日 1696	11月10日 1696	6月25日 1697	8月31日 1698	7月31日 1699	8月31日 1700	8月31日 1701
负债							
(1)银行券	1 124	894	956	502	1 198	927	891
(2)硬币和流通中的现金	887	764	982	1 220	504	762	741
(3)债据	—	—	—	20	15	19	23
(4)纸币总量	2 011	1 658	1 938	1 742	1 718	1 709	1 655
(5)储蓄和支票账户	65[b]	—	—	100	123	100	476
(6)外汇	323	300	254	—	—	—	26
(7)杂项	13	18	27	56	14	13	34
(8)总的对外负债	2 412	1 976	2 219	1 897	1 855	1 822	2 191
(9)对内负债[a]	770	1 325	1 243	2 316	2 301	2 300	2 287
(10)资产负债总额	3 182	3 301	3 462	4 213	4 155	4 123	4 478
资产							
(11)"英格兰银行基金"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2)应收利息	43	50	10	33	2	14	12
(13)对其他政府基金的贷款和贴现	1 567	1 785	1 830	2 401	2 152	2 310	2 364
(14)政府的账户盈余	—	—	42	2	2	2	9
(15)政府资金总额	2 810	3 035	3 082	3 636	3 356	3 526	3 585
(16)贴现票据和应收票据	51	50	40	86	95	173	106
(17)个人账户盈余	64	42	42	37	83	91	86
(18)杂项	—	29	3	10[d]	5	5	66[d]
(19)非政府资金总额	115	121	85	133	183	269	258
(20)股本冲减	—	—	—	—	18	24	35
(21)内部杂项	—	101	18	14	8	4	4
(22)持有现金和金银	258	45	276	429	590	301	596
(23)国库券余额							
(24)总的现金准备率[f]	10.7	2.3	12.4	22.6	31.8	16.5	27.2
(25)净的现金准备率[g]	12.8	2.7	14.2	23.3	32.0	16.6	28.0

a　股本认缴额、股息余额、薪水，等等。
b　贴现
c　国库券净持有额
d　主要的外汇

资产负债表（1696～1710）　　单位：千英镑

8月31日 1702	8月31日 1703	8月31日 1704	8月31日 1705	8月31日 1706	8月31日 1707	8月31日 1708	8月31日 1709	8月31日 1710
1 023	900	683	1 029	847	987	920	541	307
909	1 168	869	922	773	789	569	673	457
102	46	77	51	32	36	30	29	24
2 034	2 114	1 629	2 002	1 652	1 812	1 519	1 244	787
146	227	170	226	198	199	176	171	126
—	—	—	—	—	—	—	—	59
19	31	11	19	16	17	36	149	22
2 198	2 372	1 810	2 247	1 866	2 028	1 731	1 564	994
2 317	2 321	2 291	2 281	2 286	1 713	2 351	4 574	5 211
4 514	4 693	4 100	4 528	4 152	3 742	4 082	6 138	6 206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200	1 600	1 600
6	—	6	—	—	—	—	8	17
					888	798	2 467	2 568
2 024	2 002	1 739	1 677	1 379	861[c]	1 194[c]	607[c]	498[c]
—	—	—	—	—	53	2	33	490
3 230	3 202	2 945	2 877	2 579	3 002	3 194	4 715	5 173
85	75	130	102	161	207	187	245	405
24	45	33	21	63	31	106	48	108
5	2	8	9	12	9	8	6	194[d]
114	122	171	132	236	247	301	299	707
145	316	475	673	904	—	—	—	—
4	2	2	2	2	16	19	482[e]	28
1 021	1 053	507	842	430	475	566	642	296
					1 467	1 570	2 424	3 045
46.5	44.4	28.0	37.4	23.0	13.6	17.1	16.1	7.3
47.3	45.0	28.2	37.8	23.2	23.6	33.4	45.4	32.4

e　包括447 000英镑所有者权益。
f　储备的现金和金银占总的对外负债（包括所有的国库券）的百分比。
g　储备的现金和金银占银行券、存款和支票账户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霍斯菲尔德所著《英国货币史1650～1710年》，第264～265页。

这项建议明显地受到约翰·劳类似方案在法国的成功的启发，议会欣然接受了议案，并于1720年3月通过了南海法令。公众对此的热烈反映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大约4/5的年金以及更多比例的政府债券被食息者转换成公司的股票，他们寄希望于公司股价进一步上升。但是，这种投机性预期在1720年的南海泡沫事件中被戏剧性地扼杀在萌芽之中，公司的股价直线下跌。但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和英格兰银行的支持，南海公司渡过了危机。对公司而言，它被迫放弃了其商业抱负而仅仅充当“政府股份的控股公司”。现在，固定贷款支配了国债的发展，它从1702年的1 280万英镑增加到1763年的13 290万英镑。[①] 国债已经获得了持久而连续的特征，这部分原因是由于1690～1763【388】年之间频繁发生的战争。战争的成本部分，是由因消费税重要性的不断增加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增加来承担的。但更一般地讲，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大大增长，从而使政府可以以更低的利率提供（和销售）国债。约翰·巴纳德（John Barnard）爵士为将利率综合地降低到3%而奋斗，但遭到了三大公司以及它们无数的股东，包括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强烈的抵制。

在准予公债方面，三大公司并不能维持它们的垄断地位。它们不久就遇到被称之为“证券承销商”的银行家联合体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当发行新的政府公债时，这些承销商就认购大量公债，然后又将其销售给自己的客户。证券承销商的地位在18世纪中期以前依次受到“公开认购”体系的削弱，这种体系从1747年起在政府和个人投资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而这正是70年代乔治·唐宁极力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大公司并没有在公债发行中消失，而且证券承销人也继续积极活动，特别是居住在伦敦的荷兰商人和葡萄牙裔犹太人，这些人充当阿姆斯特丹委托人在伦敦的代理，而委托人又吸收荷兰私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储蓄。

荷兰银行界对英国国债的兴趣在18世纪特别强烈。早在17世纪90年代，英国主导性的大公司的股票就出现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逐渐地，荷兰商人银行家通过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做中介，也获得了一部分英国公债。不久，他们也通过同样的代理人大规模地参与国库债券的公开认购。[②] 据估计荷兰在国外的投资超过了10亿盾，据说其中大约有1/3投向了英国，主要是英国的政府债券。

阿姆斯特丹银行家投资于英国国债的兴趣，受到英国政府不断增长的清

---

① 夏尔·威尔逊：《英国的学徒制度》，第313～321页。

② 简·弗里斯：*De Economische Achteruitgang der Republiek in de Achttiende Eeuw*（莱顿，1968年），第64～66页。

偿能力的鼓励，这同时也和阿姆斯特丹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趣有关。从 17 世纪后半期开始，欧洲的重商主义逐渐开始削弱荷兰的商业垄断。[①] 最后，与阿姆斯特丹货币、资本市场上可以得到的流动资金和金融技术，以及阿姆斯特丹银行业的国际地位相比，荷兰公共财政的投资机会也太小了。甚至在荷兰公共财政的框架内，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活动范围也太狭小了。阿姆斯特丹市本身可以指望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大规模的长期贷款，而省政府和其他城镇则可以求助于征税官的财政援助，以及许多消费品和奢侈品包税人的预付款。包税人和收税官因此扮演着地区和地方当局银行家的角色。 【389】

在 17 世纪，外债在阿姆斯特丹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始出现时，征税官也起了主要的作用。[②] 当外国统治者需要金钱时，荷兰议会乐于为认购人提供一定的担保，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缔结的贷款也可能保证荷兰的政治利益。通常都指示征税官以具体的条件销售出这些公债，如果国债的规模超过了征税官自己所拥有的资金，那么征税官就与阿姆斯特丹的大商人银行家接洽，以求得他们的参与，或者按照协议发行征税官个人的债券。这些公债通常在缔结合同时并不是长期的，但可以转变为长期公债。例如，勃兰登堡选帝侯通过阿姆斯特丹海事征税官，在 1616 年发行的年息 7%、总额为 248 000 盾的公债，直到 1680 年还没有偿还。

在 17 世纪，商人银行家自身也直接贷款给统治者。以瑞典的铜作担保，艾利亚·特里普（Elias Trip）借款给瑞典国王。而吉恩·多伊茨（Jean Deutz）在 1659 年以汞合同做抵押，借款给奥地利皇帝。当 1659 年利奥波德（Leopold）一世需要一项总额为 150 万盾的新贷款时，多伊茨公司背离了通常的惯例，即责任自担或者承担集体责任、自己垫款或者组成银行团，而是发行公债筹集所需的金钱。公债通常的发行面值是统一的（通常是 1 000盾），它很快就在流通中被人们接受。在 18 世纪，这样的发行在外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签订的长期公债中，成为通用的办法。

阿姆斯特丹商人银行家成为外债发行方面最大的专家。如果某个欧洲强国想要筹集长期信贷资金，它们就与阿姆斯特丹某个著名的金融公司接洽，要求其作为“承销人”。这家银行就会代表给其指示的政府，组织债券的发行工作。阿姆斯特丹著名银行的通力协作，不仅增加了人们对所发行的公债的信心，而且确保了其在尽可能广大的投资者中的成功，最大限度地降低发 【390】

① P. 克莱因（P. Klein）:《企业家行为和尼德兰的经济兴衰》，第 1～19 页。
② 旺·迪伦（J. G. van Dillen）: *Van Rijkdom en Regenten*（海牙，1970 年），第 457～458 页。

行成本和利息支出。银行家和费佐——霍尔内卡公司（Horneca，Fizeaux and Co.）和范·斯泰豪斯特（Van Staphorst）在阿姆斯特丹销售了大量的法国公债。费佐公司和海塞尔格林（Hasselgreen）是瑞典人的代理，佩尔（Pels）是普鲁士和汉堡的代理人，多伊茨（Deutz）商行和后来的高尔公司（Goll and Co.）代表奥地利皇帝，克利福特家族（Cliffords）主要为但泽和丹麦服务，等等。在18世纪后半期，俄国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求助于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服务。

随着18世纪阿姆斯特丹公债发行的突破性进展，全欧洲的公共财政都经历了彻底的复兴，短期国债越来越被建立在长期债券基础上的长期国债所代替，而且其经费来自国际性的储蓄。英国议会政体为负责任地控制公债扩张提供了最好的保障，因而英国政府的偿付能力是各国中最强的，所以英国政府债券在国外激起了最大的兴趣。

5.4 结　论

公共财政领域的革新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影响。16世纪的金融创新给了欧洲各王室，特别是哈普斯堡皇室以强大的动力去遵循宏伟的世界政策，但事实证明这种创新并不能满足世界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的货币和信贷需求。需求和机会之间的鸿沟，导致当局对商业性货币市场施加了不负责任的压力，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混乱以及灾难性的国家破产。

虽然从短期来看，巨大的国家破产可能给欧洲的经济和公共财政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但从长期来看，国家破产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国家破产从本质上讲是利息和短期债务的延期偿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这些短期公债转换成国家年金。偶尔发生的国家破产因此成为固定长期公债体系发展过程中重大的第一步，这种发展在国家重商主义的全盛期达到了顶峰。在法国，重商主义在路易十四伟大的政治（*politique de grandeur*）时期主要是为[391]军事扩张政策服务，公共财政技术的进步导致了非生产性国家开支的增长，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极小或者毫无贡献，从而引起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在英国，重商主义系统地为经济扩张政策服务，因而金融技术的改进成为近代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动力。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特别是从18世纪持久地开始，短期债务和后来固定的国债对商业、工业以及殖民地基础结构的资金筹措做出了明显的贡献。因此，它们是机器时代突破性成功的先决条件。

18 世纪期间，许多欧洲国家同样地使它们的“重商主义”或“开明专制”有意识的为经济发展政策服务。为此目的，它们也求助于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这些发展对于大陆的基础结构的近代化，以及后来工业革命的成功也同样至关重要。而在荷兰，国家重商主义从来没有采取公认的形式，因此阿姆斯特丹典型的金融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有利于荷兰自身的基础结构，而是和其巨大的可利用资本储备一起，任由其余欧洲国家控制。受制于革命以后有限的政治和商业机会，荷兰别无选择，只有自行消亡。这就是 18 世纪荷兰共和国悲惨的而又不可避免的衰落。【392】

第六章

企业的性质

对任何社会的经济过程的研究都包含诸多主题，所有这些主题都适合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这里的研究其基本原理与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企业史研究所主要强调的仅仅是经济行为方面的问题：企业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对经济行为人进行组织、协调和指导的功能。这一研究的中心是企业家。对企业历史功能的任何真正的理解都需要对企业家的起源、动机和机会做出评价，要评价他们所支配的技术与他们所创造的制度，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各种程度上的革新，他们获得的鼓励、克服的障碍以及取得的成功。

对企业性质的检验不能局限于业主或革新者个人。历史上，政府总是被认为具有企业家的功能，并对经济制度进行组织。早期的现代国家在企业结构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能忽视。[①] 另外，这里的方法并没有严格区分“创造性”企业和“常规”企业；除了在企业行为的任何方面都混合着新的企业形式和传统的企业形式这一事实以外，从经济上来看，明显是重复

① 农业尽管很重要，但我们将不讨论。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前面已经论及，部分是因为这个问题很独特。对农业企业的研究要专门用一章来讨论。

出现的老的企业形式与全新的企业形式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一论点与我们所考察的这个不易受商业变化影响的阶段尤其相关。

一般而言，企业家要么被定义为对企业单位做出重要决策的管理者，要么被定义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这些定义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采用哪一个定义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在现代早期阶段，在工业化经济的大规模企业出现以前，企业的主要问题是风险而不是管理。而企业家承担的风险【393】主要是决策风险，包括了经济单位总体上的风险。他不必然（就像在20世纪也不必然）承担个人的货币损失这种风险。因此下面将会谈到，不确定性和不安全在企业的外部环境和企业的业务过程这两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企业家的任务是在降低风险和获取希望的利润或在其他非金钱目的之间进行平衡。他采用的手段——不管是外部环境的直接重塑，还是单个企业的结构和政策的修正——也就是企业史的主要内容。

本章阐明现代阶段早期企业的不同性质。我们将以不同的观点来阐述不同的问题，每一观点强调企业家的不同方面。国际贸易和金融中以及制造业中，企业的主要特征是我们重点检验的内容。另外，比如功能性的企业家行为这样的例子，可能有助于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性质、贵族企业家的作用以及企业性质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的差别程度这些问题。本章假定主题的多样性只能以选择性的和印象主义的方式来描述。但在叙述企业的类别之前，有必要描绘一下企业所处的一般环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

6.1　企业的基本结构

1. 经济环境

中世纪结束后的经济发展过程显得缓慢、徘徊不前、漫无目的。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没有重大的技术革命，在资本的流动和组织方面没有重大的质变，在劳动力的数量和职业分布上没有显著的变化，结果就是经济体系没有发生飞跃。然而1750年的欧洲无疑比1450年更富有，总人口和产品都增长了，各国的财富自然是以不同的比率增减。多数情况下，农业和工业产品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但是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的相对变化却更容易因商业、金【394】融相关产业这些行业而发生。当时人们对贸易上的浪费的奉承所反映的事实

是：像西班牙、荷兰、英格兰、法国这些国家财富的变化直接取决于它们的国际经济绩效。商业是决定欧洲兴衰的一个有力因素，也是企业财富的重要决定因素。

繁荣的欧洲各国长期的变革在本卷中已有所叙述，无需赘言。但它在阐明影响前工业经济联盟的因素时将是最重要的。这些因素的最好例证，或许是对比一下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和荷兰。

西班牙，一个700万～800万人口的国家，它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社会和经济体制也属欧洲最原始的国家之列，但它却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各控制着一个帝国，招致当时禀赋比它丰富得多的邻国的嫉妒。另一方面，独立后的低地国靠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丰富的流动资本以及超凡的商业智慧在商业开始取得支配地位。在鲭鱼捕捞、波罗的海贸易、造船、欧洲谷物贸易的大通道、渔业、酒、木材、海军储备方面，以及在贸易中心和加工业的建立方面，荷兰已经在西班牙控制的黄金贸易这类经济关系和政治势力上，成为了西班牙的竞争对手。尼德兰例子的大多数经济特征证明了长期发展的企业、利润和势力的可靠性。16世纪中期以后，西班牙经济和政治大厦的崩溃可谓教训深刻：不以生产为目的、被身无分文且狂热的君王所操纵、受制于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内心对有效率企业深深的厌恶之情，这些使得它表面上的经济优势漏洞百出。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生产、出口、进口、加工、再出口。荷兰人由于在生产领域缺乏足够深厚的基础，而可能无法应对18世纪盎格鲁—法兰西人的挑战，但西班牙却在所有方面都处劣势，16世纪的通货膨胀就可以置它于死地。

与欧洲经济中心移向大西洋沿岸相一致，一些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开始了无规律的扩张和收缩。在相当程度上，企业家个人不得不接受这种兴衰的变迁，让企业去适应经济机会的变化无常。然而国民经济注定不是只由非个人【395】力量所创造。大家都接受了荷兰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荷兰人的企业这一事实。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法国这个拥有大量潜在财富的国家，由于明显缺乏企业家精神而就算在和平时期也停滞不前。企业塑造了欧洲经济的不同构成部分，同时也被这些构成部分的兴衰所塑造。

> 贸易所经历的各种变化［迪福（Defoe）写到］或许可以归因于各种发明而带来的制造业的转变；制造业及制成品市场通过战争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处于激荡之中，老的帝国和国家衰落下去，新的帝国又在它们的

废墟上建立起来。[①]

迪福所说的这种激荡也适合于决定企业日常的“风险环境”。战争和违法事件的威胁、骚乱和瘟疫的流行、随意的商业干预以及自然力的变化无常，这些都使得企业的外部环境极不安全。19 世纪以前，人们在自然面前、在人们自己制造的无政府状态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意味着商业企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偶然性的牺牲品。

降低理性的企业家计划工作可能性的因素还不只是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欧洲不发达的经济——耕地只能维持生计，技术和工业化的退步，受资本短缺所困扰——呈现出的结构性特征是，进入经济过程的风险因素限制着企业规模和性质的塑造。或许欧洲市场结构最真实的情况是，市场由落后的信息和交通系统所连接，而且受到市场规模和不完备的组织协调两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因素的后果是，商业企业家除非是在同一个市场上进行买卖，否则他就不得不经常根据事实来做出决策，进行投资。而这些事实可能在他开始研究它们的时候就早已过时了，他的商品最终到达市场时可能根本卖不出去。特别是在商业企业中，特殊的交易常常不得不在即时信息到达后才进行。另【396】外，制造和贸易过程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持续需求或者准确的协调供求的手段，而面临更大的不安全。就算存在像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这样的大贸易中心，或者定期的内陆交易会，也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必然要将不稳定的需求和不持续的供给进行比较才能适应。大多数市场很容易饱和，所发生的调整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所熟悉的细微的讨价还价，而是价格水平剧烈而混乱的变动。

工业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与商业企业家稍有不同，但它也没少受经济性质的影响。尤其是要调整大规模的生产单位时，既无技术支持又不存在潜在需求，通过扩大产出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相应地，工业扩张往往是通过生产单位、投资和劳动需求的增加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资本份额的相对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来完成。另外，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于现代工业企业而言较高，生产单位趋向于分散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那里原材料便宜、生活成本低从而工资也较低，那里劳动力优势更明显。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劳动力供给并不必然是富有弹性的。消费品的选择面不宽，人们习惯于多样化开支，对闲暇而不是高收入的更大偏好使得劳动者对高工资的

---

① 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全面的英国零售商》第 2 卷（伦敦，1745 年），第 231 页。

刺激反应不敏感。经济过程的不持续并没有产生非自愿失业，劳动者的心理是处于自愿状态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在这方面表现出相同的特征——这也是一个附加的特征，熟练劳动力的缺乏持续地阻碍着工业扩张。在不能提供正常的技术教育的社会，工业技术会被小心防范，扩散缓慢，学徒制和行会将专业技术限制在特定的群体内，特殊生产技术在企业、地区或国家间的传递还没有技术人员的流动快。铸造专家，染工，啤酒酿造专家，16世纪德国的矿工，雨格诺的新织布工人，意大利的丝织工，工业革命早期英【397】国的纺织工人和矿工都是这种情况。这对于工业组织的起源、对于宗教迫害、对于移民援助都具有特别的经济意义。

技术的原始特性和工业布局分散化的特征，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制成品缺乏标准化。生产场所超出了企业家所能照看的范围，非熟练劳动力只在原始的机械协助下工作，商人从来不能确定他的商品是否能满足某个市场的需求。除了产品没有市场这种风险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种风险：就算有市场，它也会拒绝商人所惟一能提供的那种商品。

在前工业社会经济行为的所有水平上，资本供给的作用都是独特的和决定性的。给定制造业中的技术性质和商业过程的性质，流动或流通资本的可用性也许是非农业活动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进一步说，由于信用创造机制相对不发达，资本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与货币供给是同一的；这里所描述的这种被所有不确定因素折磨着的经济，一定会发现流动资本的短缺是最大的恐慌。因而国家最关注的是货币流动，企业关注的是资本周转的速度。货币稀缺被认为是一种通货紧缩现象，当局不惜代价地改变这种现象，对资本短缺的恐惧深入到当时对待通货问题的态度中去。经济生活——从而企业行为——的整个节奏由可用货币的变化所决定，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商业在国家和社会眼中的地位。弗朗西斯·培根在他论帝国的文章中说到，如果商业不繁荣，“王国就算羽翼丰满，但没有经脉，就必不健壮”。作为大多数可支配资金的重要来源的发电机和控制器，商业资本家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不只是在商业领域，都是主要的行动者。当时的事实是，真正重要的资本家是海外贸易商：荷兰在相互竞争的商业国中取得的地位和特权就来自于它丰富的资本，而在各国，拥有势力和特权的国际贸易商的影响都是类似的。但是，在较低的程度上，国内的批发商占据了战略性的位置。海外和国内商业【398】的影响深入到了经济中——这是一个商业企业的时代。一位17世纪的英国作家写到：“所有其他职业都得到了来自商业的活力、生命、力量和增长……商人的放纵和冒险，与他们的小心谨慎一样，都是国家的财富和荣耀的

保证。”①

2. 国家和企业

至此我们只考察了企业外部环境的经济方面，强调了经济制度和市场力量对企业的支配。但是，企业家履行经济功能的途径也为政府和政治制度所影响。

最简单地说，国家是否提供保障对企业的持续性和扩张是至关紧要的。比如国内的政治稳定和公共秩序将会彻底降低企业的风险，但这一点往往也不能得到保证。安特卫普的经济压制、16 世纪法国的宗教剧变、30 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蹂躏，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相反，英格兰和荷兰在整个这一时期证明了国内的稳定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到了 18 世纪，当人们不再常常诉诸武力去解决宗教冲突，当战争已在文明人中变得孤立，当收入的增加和政府强制力的提高降低了社会动乱的风险，不安全因素便普遍地减少了。

政府也可以通过提供和加强企业机制方面的管制来帮助企业的活动。因此民族国家出现的同时就在努力打破度量衡和铸币上的差别（各国的变化情况不尽相同），努力通过消除任意性的地方税费和其他国内商业贸易方面的障碍来统一国内市场，建立经济和政治霸权以及一致的法律，亲近本国的而排斥海外的企业家。然而这些加强经济同一性的政策大多只是一种理想，并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哪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很少看到哪个政府对企业的鼓励是绝对没有私心的，对企业家的关爱也不是平等的。结果是国内运输和贸易上的障碍从来没有被彻底清除；政府的财政需要——这也许是经济政策的基本动机——永远只为极少数企业家（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创造或保留了【399】特权，这便妨碍了大多数的企业；贵族或教会、王室或地主、农民或手工业者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从来没有为商业企业的发展做出过足够的牺牲。另外，在一些地区政府对企业环境的影响是完全中性的，比如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大股份公司常常被迫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领事和外交机构——17 世纪早期的北美，企业甚至有自己固定的社会和政府。在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这方面，各国的努力大不相同；但荷兰和英格兰的企业之所以能领导世界，就因为这两个国家国内的动乱最少，在统一国内市场方面最成功，对通货的管理最健全，在为企业经济行为提供有利的法律框架方面最积极。

---

① 引自利普森（E. Lipson）：《英国经济史》第 2 卷（伦敦，1948 年），第 190 页。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商人和公众都在争论政府是否具有或者是否能够行使经济功能，最自由的——官方政策最合适的——企业是否就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但是在政府所做的控制、监管、鼓励或限制这种努力中，它所提供给企业家的并不是持续的、系统性的政策，而是一些任意性的措施。就其实质而言，对这些措施的辩护或是批评，都只是从私利出发的。现代早期阶段的企业家被迫成为常年的院外活动家，政府的保护像生产率和价格上的优势一样，是企业的一个有效的工具。但政府掌握着社会的和经济的衡量标准。在生活水平极低、警察力量无效的社会，与经济进步相比，保持社会稳定也许是更重要的目标，现实有它自己的理由。由于高价格、失业以及经济变动对公共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威胁，我们必然会看到政府管制市场、控制经纪人、阻碍无产者的进步、限制劳动力流动甚至强迫资本所有者从事无利可图的事情。但在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这样的社会政策已基本不存在了。

当然，政府政策常常也是有意对企业进行积极鼓励。比如经济国家主义【400】的主要表现——“重商主义”就是个典型。除非出于特别的原因（比如财政需要），政府才会给予特殊的海外企业家特权，否则基本上都是倾向于欢迎本国而不是外国的商人，尤其是在最可能发生竞争的海外贸易这一领域。因为所有国家都知道国际贸易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已知的经济范围又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国家力量常常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通过差别税赋和补贴、航海法、禁令、特权等等措施给国内的制造商、商人或船主以特别待遇。在殖民地贸易的前景和潜能凸现之后，政府扶持在航海国更为突出；其合理的结果就是贸易战和殖民地战争。荷兰在商业上比英国强大，法国在殖民地上比英国强大，这使得 17 世纪和 18 世纪，处于一个经常性的、好战的经济国家主义状态。另一方面，那些国内产品在外国市场上饱受商品质量良莠不齐之苦的国家，比如 16 世纪和 17 世纪英国的纺织品，政府的另一个任务可能是强行规定工业标准。

在两个领域，政府对企业有着更直接的和选择性的影响。第一，由于贸易、战略或威信方面的原因，政府会创立或发展专业公司。这主要表现在股份公司和殖民地贸易中，以及造船、冶金、重工业和某些国家的奢侈品工业。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企业职能的范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有意思的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似乎更少地运用这种经济发展技术。或者，另外的方法是政府进入市场提供资本的替代品，这在资本供应短缺的国家较突出。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每个政府所有或政府扶持的企业的例子，都

发生在私人资本不愿独立承担企业风险的地方。可供选择的诸多手段有：国家所有、政府补贴、保险市场，或者作为资本替代品的特权。

政府影响特定的企业家行为的第二种方法是政府让出某些特权或职能。商人会发现，政府的经济和财政需要为他们铺好了赚取利润的金光大道。赚取利润的机会不在于购买特权，也不在于贷款给政府而得到某种势力保证，【401】而是在于政府职责的范围和复杂程度扩大的速度快于那些提供收入、提供行政技能、商品和服务的官僚机构增加的速度。结果是，直到财政和行政改革开始为止——有的地方甚至还在此之后——许多企业家应政府之召提供服务、履行国家职能，比如充当承包人、包税人、官方采购人、土地批发者、征兵人、铸币管理者和官僚。事实上，商人职能多大到政府职能范围是无效率的，尽管这同时也强调了企业家技艺的不同方面——政治策略和贿赂、谈判和辩论。这些企业家在消除了一种风险（市场和价格的不稳定以及信息的不确定）的同时，也面临着另一种风险：他们所应付的政治力量是不可靠的，政府的承诺可能只是空头支票。

政府对企业的重要性易于被夸大。政府经济政策的特征就是不连续、无效和谋私利。政府在追求它的政治、宗教或财政目标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作为更大目标的经济利益。管制总体经济的努力往往比那些有助于选举集团，鼓励（常常是阻碍）全体企业的有效的、专门的措施更乐观。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家集团，常常通过购买或辩论使政府相信它们应该得到特权和（或）援助，结果是成功的企业往往严重依赖政府的补助金。但对于企业家整体来说，与政府分享收益不可能相安无事。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或加强企业环境的安全——对它欢迎的商人集团如此，对所有的企业家也是如此。这种帮助不管最后是落实到多数还是少数企业家头上，结果都是企业永远要依赖于政府的帮助，如果不理解这一事实，企业的外部环境就是不可思议的。

3. 意识形态

在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考察环境时，企业与它的“环境”的区别多是人为的。因此很明显，企业绩效受制于社会对商业的态度，社会和法律的制裁也可以约束和支配企业，使其依从于公认的行为标准。但这样的制裁机制却【402】常常为那些被某种教条所约束的企业家所接受。相反，受欢迎的一系列社会道德观念并不是通过刺激那些不刺激就会碌碌无为的商人群体，而是通过商

人和社会的鉴别来对企业家进行鼓励，控制前者就是后者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大量成功企业家的历史事例表明，他们的成功靠的是做一些社会所不赞同的事，这使我们怀疑过分地强调社会哲学是否恰当。任何关于企业意识形态环境的争论，都必须主要集中于企业家的意识形态。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最深远的意识形态变革是随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而来的，而要区分出对待商业企业的态度变化中哪一种是纯粹因宗教改革而起，却是困难的。早期的改革者在对待商业企业的态度上与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一样保守；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新教中心对待企业行为的观点，也并不比中世纪的意大利，或16世纪的安特卫普对待天主教徒的企业的态度要好。事实上，没有哪一种宗教思想能惟一垄断对商业企业的经济意义的看法——虽然当新教神学的不同分支发展起来并被企业家所接受以后，新教无疑在那些经济成功所需的价值计算与被宗教放在世俗行为教义首位的美德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就涉及社会的非商业组成部分而言，对商业的情感上的好恶并不只是以神学原则为基础；在很多情况下，对待不同的逐利企业的态度不只是一种，而是很多种。对企业的接受或诋毁程度基本上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福利水平，取决于地理位置、社会分层等因素。在一个贫穷的农民或工匠——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的共同体，从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里昂和法兰克福的商品或货币交易所中挣钱的金融家或经纪人，不要指望被社会所接受。在僵化的社会结构里，比如法国或西班牙，对社会威望和地位的主要奖励是贵族的出身或准贵族的土地【403】所有权，如果没有显赫的贵族头衔，或者像荷兰那样，没有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单纯的商业和制造业的意识形态环境是不可想像的。最后，像英国这种既有农民和手工业者，又依赖与海外贸易的国家，同时存在着对大规模的商业、制造业的崇敬和对小高利贷者、国内经纪人的毁誉，这也不足为怪。

很清楚，欧洲对待企业的态度，以及企业家对待自己的作用的态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对此的任何简单概括都是没有意义的。从整个这一时期来看，对鼓励企业（或者反对现存的制裁措施）这一价值取向的接受程度并不是在增长，而是有另外的变化。对于欧洲大多数社会而言，在其正常的神学信仰中无疑残留着中世纪官方宗教霸权的痕迹。但这不仅是一个消除那些试图在道德和教义上约束企业家活动的宗教势力的问题。恰当地说，企业家自己——或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他们的经济行为。最简单地说，在这方面有两个显著的发展，每一种发展都不是要创造一个兴旺的新资产阶级，而是要增加那些不被其他世俗观念束缚的

企业家数量。第一个发展是，一些商人开始在宗教意义上强调那些有利于生产力和资本积累的道德价值。第二个发展是，其他企业家通过忽略和否定传统道德训诫的世俗运用，能够打破个人伦理施加在商业行为上的约束。

新教伦理不能靠自己完全解决资本家精神的复兴问题，它的一个结论是更多的劳动可能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它的某些品质已深入到一些企业人员的生活中，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世界上在这些事务上激烈而热切的斗争，自我意识寻找道德价值的物质依据，与信仰连在一起的对勤劳和节俭的崇敬——这是清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的各支系的内容，在 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开始与商业发展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无论是在宗教思想被完全认可的地方，还是在它们只是间接对商人发生影响的地方，都可以说发生了一场商业心理的改变。然而，那些并未明显附着在新教伦理中的企业家，仍然管理【404】着成功的和表现出坚定不移品质的企业和经济。

显然，"资本主义精神"不能仅仅视为与神学思想框架等同。与为欢迎资本积累的宗教道德所接受同样重要的是，绕过对工资一成本、价格、竞争和利润加以制裁这种宗教态度的那种企业家心理得到了改进和强化。如果商业是人类致力于免受任何教派的道德规定影响的一个领域的话，那么很明显，在企业家中纯粹的个人主动性的范围就会放宽。或者说，如果商人成功地追求那种最容易确定他自己的企业精神的宗教信仰的平衡，那么同样的结果也会出现。在每一种情况下，意识形态调整过程初期的烦恼与宗教组织的关系都不大，比如 1593 年霍拉肖·帕拉维西诺（Horatio Palavicino），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孩子的利益劝告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伯爵不要"compt it ill if in the point of profitt a man honestly every waies regard his own commoditie"。[①] 重视"自己的商品"，自利在 18 世纪已经有力而令人信服地与非个人的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模糊了企业行为与非经济行为标准之间的界线。它重新加强了企业自由活动的必要、宽恕各种贪欲等一系列对待经济行为的态度。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资本主义精神"。从这些方面来看，天主教霸权的解体、宗教信仰的粉碎，以及那些宗教势力仍然保持着影响力的地区的缩小——所有这些都是在 15 世纪之后出现的——都加强了对待企业的非个人态度的演化。企业家现在更能正视他们的经济本职。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这些变化只限于后宗教改革时期的话，那就错了。某种程度上的自利是

① 引自斯通（L. Stone）：《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霍雷肖·帕拉维西诺爵士》（牛津，1956 年），第 40 页。

私人企业家的首要基础。经济个人主义对古代企业家特征的强调——就像强调知识革命所引起的受欢迎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一样——远远胜过对新商业道德观那令人吃惊的开化的强调。自利与经济行为的扩大紧紧相连，过【405】于精确地去度量它的发展而引起的结果可能是危险的。如果 16 世纪和 17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可以当做打破中世纪的传统主义、阐释“理性经济伦理”来解释的话，那么变革的程度就大不一样了——重要的是记住，非传统思维方式和商业途径的范围和运用都扩展和增加了。

企业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商人根据宗教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集团，各集团对待企业的态度各不相同。[①] 另外，北欧一些小教派的例子比较典型，它们在商业行为上无疑比其他国家更成功，从而它们被认为对变动的价值的占有更有保障，对待商业的态度也更好。又如，犹太教徒、法国的雨格诺教徒、英格兰的教友派信徒（Quaker），这些宗教集团就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大的商业发展成就。这些例子无疑都表明，独特的思想特性和世界观，对自觉假定企业的功能和自觉完成这些功能这两方面都有所贡献。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它们所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少数人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会产生受欢迎的而不是令人讨厌的结果。异教徒能摆脱大众所受的许多限制（当然，也会丧失许多权利）。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褊狭的社会中从政治和社会的某些领域独立出来，会让这些少数人群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其他领域（比如商业）。此外，少数人群从他们处境的特点出发，会很好地树立能让他们摆脱大众社会的制裁的、正规和非正规的道德与社会价值标准。因此，在对企业的态度不友好的法国社会，雨格诺商人大概从来没有过多数的天主教社会中那种强迫信仰的经历，他们的商业成就之路上许多障碍被清除了。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小教派必然会形成紧密的社会群体。这样，其成员就由非同一般的神学忠诚联系在一起：通婚、教育、个人交往、相互信【406】任、社会平等——所有行为都将它的社会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行为在这种经济环境中都与商业行为密切相关。换言之，少数人群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有利于企业成功的个人信仰；因为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商人能够从下属和助手那里得到信任，得到金融上和功能服务上的保障，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个人企业的效率。因此，少数教派倾向于集中在特定的贸易和工业领域。

只在逻辑上看，在那些经济行为处于最成熟、最有活力阶段的国家中，

---

① 当然，对企业的态度有许多其他决定因素，其中，教育和教养、社会背景和物质需要也许又是最重要的。

一般的社会思想框架就是最有利于企业活动的。而僵化的意识形态，比如在西班牙流行的那种，只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在强大或软弱的商业体系的产生过程中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因素。对企业最大的心理刺激——虽然它常常被描述为“社会哲学”——是积极的、有活力的企业家的出现。积极的企业家是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利因素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当然，也是它们的原因。

6.2　贸易和金融中的国际企业

在现代阶段早期，金融与贸易的密切联系意味着往往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商业企业的金融业。当时的“商业”这个词，包含了比它的特定职能广泛得多的职业。从事国际商业，或者至少是远距离商业活动的企业——因为贸易的战略性作用，因为对成功的贸易者的潜在回报，也因为贸易作为流动资本源泉这一普遍的重要性——在18世纪，就像在15世纪一样，是经济事务中最重要的形式。

1. 经济风险和组织①

如前所述，贸易资本家可以从空间和知识上来划分他的市场，同时也往往可以据此划分他供给的资源：市场和资源供给的波动要快于计划的改变；没有哪个企业家能肯定他可以凭借他的商品到达最终市场后，得到的不确定的信息而了解所有的经济环境。从商业需要的角度来说，信息的传递在数量和速度上都不够；提供关于诸如价格、汇率甚至“时事新闻”这类信息的制度，在18世纪以前随着印刷的价格公报、初期的报纸等的发展而有所增加，但并不意味着能完全解决问题。欧洲主要商品市场（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纽伦堡、威尼斯等）的价格公报出现于16世纪晚期，尽管数量不多。但从17世纪早期开始，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就有了规范的价格周报。伦敦的价格公报的出现较慢，就像它取得重要的贸易中心地位一样；但是在1675年，伦敦的价格公报就已超过了300份。自然，这种公报对商业来说确实很重要：它们可以节省工作量，而且它们比大多数商人自己收集的数据 [407]

① 股份公司制企业将在下面第4节单独考察。

可能更准确。然而，虽然有序的市场对商人来说更有利，但他们仍然需要去搜寻关于市场预测的信息，而且，如果企业家是在另一个地方做出决策，那么价格公报仍然只能像普通信件一样发送。事实上，获得商业计划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商业信函。商人所获得的信息仅仅取决于他的信件。

与不完备的通信和缓慢的交通条件相结合的是不连续和受限制的市场。这两个因素同样也是商业和金融企业的外部经济环境中的重要特征：缺乏功能的专业化以及企业家分散决策的必要。

能保证交易者在单个商品、单个市场甚至单种商业功能上专心处理事务的足够大而又没有干预的市场非常少。同样，由于对商业事务的辅助服务的需求也是间歇性的，保险、运输、仓储、兑换以及银行工具的提供，也常常是商业企业的附带业务，而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由于分散投资（从而分散风险）的需要，在更成熟的经济时代，不同的商业功能要由不同的商人来承担。技术并不是问题，而是市场结构的限制才使得商业信用和金融成为【408】贸易者而不是银行家的业务。

分散的范围和方式，为市场风险对商业企业的决定性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最直接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最无效率的技术，是交易者自己或他的一两个同伴跟着他的商品走，这样不管市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都能保持对自己企业的控制。尤其是在那种相互关联的商品和小市场众多的地方——比如对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需要在一次航海过程中就做出决策，“旅行商”在经济上也许会有优势的。但是要经营多种中介业务或大规模商业，以保证稳定的和多元化的贸易收益，就需要常住的办事处。巡回贸易企业的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少有的大型商业和金融机构网络在每一个地方都永久保留有分支机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世纪的富格尔、庞维西(Bonvisi)、韦尔瑟（Welser）这些企业，它们在政府财政和广阔的贸易领域中无所不为。即便如此，对能减少众多分支机构的国际金融业务的需要也超过对国际贸易的需要。

对大多数商业企业而言，解决通信和分散化的办法是将资源用于委托，或者是合并领取薪俸的那些办事处人员、学徒和代理人。当然，学徒有双重利益能得到保证：当他们学会了专业贸易的复杂技巧后，就可以成为个人代表，而且也可以训练能使商业走向成熟的责任心。但企业贸易线路的重要与否，决定了给予新手的企业家权利的多少。一般来说，企业家也号召那些有经验、熟悉商业业务的商人承担代理工作。但是，代理商的职责很少由专业

人员来承担。一方面，充当代理人和承担代理贸易对企业家自己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他们经常也要处理非商业的海外事务。另外，代理人的职责并不仅限于货物买卖，其职责范围超过了商品交易，包括汇兑、信用、运输和其他服务。对于这些范围来说，商业企业家并不是专家，所以他的代理人具有广泛的功能；而且必须记住，这些代理人在他们自己的权限内常常也是商业企业家。这是一个交互的体制，在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商业中都存在有酬服务，直到 18 世纪中期，如波斯尔思韦特（Postlethwayt）所言：【409】“最高级信用时代的商业惯例才遍及欧洲”。

给定市场结构的性质，商业企业总是被迫在中心控制和外围职责之间进行平衡；而由于可利用的控制技术受到限制，商业企业家又被迫允许其代理人有极大的主动性。基于这一事实，就像基于商品、资本和辅助服务市场上的个人性质这一事实一样，商业企业就面临严重的后果。主动的和非正式的关系要由假定存在的信任和信心来维系。没有任何系统的方法去发现欺诈和度量商业效率，连贯的个人关系也许是关于下属和代理人的诚实和技能的最重要的商业保证措施。这种知识可以从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过程中得到。但是，企业家另外还要依靠两种社会制度：家庭和宗教群体常常为更正式的商业企业结构提供操作上的支持。

企业家与自己家族和教派的众多成员保持商业上和金融上的伙伴关系，以及因此常常要雇佣亲戚和同教中人做办事处人员和代理人，这并不是不合逻辑的裙带关系，也不是固执的排外行为。在一个企业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他所不能直接控制的人，而且到处都是未知的信用风险的商业世界里，家族关系、宗教关系，以及由二者构成的社会团体关系，是商业信心和商业组织的粘合剂。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互相提供服务的不同企业，这些关系上的教训都是一样的：密切的个人关系，无论其基础是什么，在履行其他人不愿提供的经济功能时会更有效率。小教派的例子说明了企业凝聚力超乎寻常的优势和重要性；而且从雇佣同族人做代理人这种趋势，到 16 世纪最大的几个企业——富格尔、韦瑟尔、霍奇斯特（Höchstetter）——的家族合伙这一事实，商业企业的所有领域情况都一样。

各种个人关系纠缠不清的商业中，运用得最广泛的企业家控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经济“理性”这一概念的困难。广泛地说，关于现代阶【410】段的代理企业家被认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理性这一观点，有两种互补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现代阶段的代理企业家打破了那些在利润积累、革新和扩张上一般性地限制着中世纪商人的约束因素。第二种看法是，与中世纪

的企业相比，现代的企业家被认为使用着更多统计的、数量的科学方法去安排他的资源、引导他的各个企业单位。从这两种观点来看，现代早期阶段的企业家到底有多理性？

不可否认，从第一种观点来看——依利润动机行事、追求最合适而不是最古老的商业方法、不惧怕扩张的风险——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三个世纪，大多数商业企业家确实是“理性”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商业企业家，在其普遍的观念上是否比中世纪的企业家要理性得多却值得怀疑，而且，确实存在的那些传统主义被削弱的例子是反映了自发的企业变革，还是反映了对企业活动的环境约束的放松？比如，不管环境（比如市场范围）有不有利，“客观的”、利润导向的企业在中世纪无处不在；16 世纪、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理性”经济行为在扩大经济机会这一功能上，与其动机没什么两样。

单个企业的事例可以更明显地不支持对“经济理性主义”这一概念不加批评的接受。如前述，企业的外部环境——极强的不确定因素、不可能直接控制、决策和最后交易之间的不连续、缺乏任何实际的经济程序模式——并不允许对企业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大量的科学分析。相关的数据太不完全、不值得信任，企业家对其外部环境的影响太微弱，过去的经验太贫乏而不足以指导未来的现实。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企业家在他面临的环境中微不足道，也不是说偶然的政策带来的成功机会与仔细分析后得到的成功机会没什么差别。显然，若其他条件相同，行为的最好指导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但是，很少有企业家在解决问题时只依赖科学方法。他们不得不主要是使用【411】那些零碎的措施，他们部分取决于实用的、经验的方法，部分取决于直觉。

复式簿记方法——企业可用的最“科学”的工具——的使用说明了这一点。复式簿记方法产生与 14 世纪的意大利，并在规范和实践中扩大了其运用范围，16 世纪风行于北欧成熟的商业生产者之中。比如在 16 世纪早期，大富格尔公司就在它的许多分支机构中使用“意大利会计方法”，各分支机构向奥格斯堡总部递交年报，并在这里形成整个企业的收支平衡表。而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将复式簿记主要运用于资本和利润方面（这是复式簿记在“理性的”商业程序中的功能），以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交易进行更好的控制或监督。事实上，复式簿记往往很少是作为一种通过发现和消除错误来保持会计一致性的工具来使用的，[①] 而是用未来计划的观点来度量企业各部

① 耶梅（B. S. Yamey）：《科学簿记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载《经济史评论》1949 年第 1 卷（新序列），第 99 ~ 113 页。

门绩效的一种手段。据此，换言之，它是一种控制技术，而不是计划技术。

竞争不安全的影响并不限于上面说到的内部控制和组织技术。市场不完全所创造的垄断机会，仅仅是这种倾向于鼓励企业操纵供给和价格的商业环境的一个部分。风险和不安全自然会产生设计来靠限制竞争而减少其影响的商业技术。行会和管制公司试图对缺乏统一行动的单个销售组织进行公司自我管制，而其目的却是控制其独立的成员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这一整个阶段的观点来看，这种制度倒退有它相对的重要性。地理条件对这些公司势力的制约以及他们阵营内企业成员的变动[①]都对这些限制性政策有影响——没有哪个组织能长时间地控制可利用的供给。[②]

但是也有那些较小的联合体可以采用的更成功的——虽然并不堂皇——垄断形式。在制造业中，个人或原始的卡特尔对市场的控制既取决于地理隔离程度、稀缺原材料的可垄断性，也取决于特权的行使；对于单个企业而言，要获得特权通常都要与大规模的企业相联合，借此来保护它们的固定投资。[③] 商业企业虽然也在追求特权地位——通过股份公司和做政府债权人而获得，但私人获得垄断地位的情况比工业中更多，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商业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从而有可能在某个方面进行垄断。最适合赚取垄断利润的情况是：相关商品的供给易于控制的市场和需求相对缺乏弹性的市场。这种情况在极小和极大的市场两个极端中会出现。在遍及欧洲城乡的地方性市场上，安全和运输成本问题为垄断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食品供应上——不必奇怪，在食品的价格和供给上有诸多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管制措施。另一个极端是在东方贸易，或者是其在欧洲商业中心的分支贸易上的联合，以期保证对香料贸易的暂时控制；或者是比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这些市场上的商业和金融辛迪加对丝绸或染料、军需品或铜、糖或香料的长期控制。 【412】

2. 贸易和资本

从经济活动的其他方面来看，商业企业更多的是资本的来源而不是使用者。即便如此也可能错误地认为，那时的商业企业完全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经费自给的。说这是错误的理解是因为，首先，大规模企业（小企业也常

① vary，原文为 very，疑有误。——译者注
② 参见下面的第 437 ~ 439 页。
③ 参见下面的第 430 ~ 431 页。

常如此）使用的许多实际资本是合伙人的被动投资，或者是商人的长期借款。其次，信用的使用很普遍。实际上，信用供给或短期融资与中期——甚至长期——资本供给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账面贷款或手写票据能流通几个月甚至几年；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它的 3 个月或 6 个月的债券在 17 世纪后期延期到了 10 ~ 12 年，已表现出了长期资本贷款的所有特征。

在多数时期，短期和长期资本供给的市场特征是其非正规的性质。17 【413】世纪纯粹的金融机构增长缓慢，在 18 世纪先进的商业中心，代理人的专业功能是比较反映各种不同的需要的资本与信用的供求。虽然如此，资本和信用交易仍保留着非正规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性质。这种体制有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资本从几个性质不同的市场流入企业，这些市场相互独立，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倾向难以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家不得不靠他的个人关系来满足资本需要，其他商业服务的提供也不得不如此。除非企业家的活动是资金自给的，否则他就要受制于熟人、亲戚、朋友的商业圈子，受制于企业家个人得到公认的信用值。即使是 17 世纪晚期的股份公司，也倾向于向小投资人和有联系的群体融资。

金融和商业企业的混杂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尤为明显，比如，商人常常把从其他贸易者那里得到的信用工具倒给另一个商人，大“金融家”既在国际商品贸易中开展金融业务，也直接进行国际贸易。那些遍及四海的家族，从 16 世纪的奥格斯堡、热那亚、安特卫普，到 18 世纪与商业毫不沾边的伦敦的实业家，要从他们中间找出一个纯粹的金融企业家，实在是困难。对于那些只是附带有一些商业业务的金融企业而言，其基本特征也与商业活动没什么两样。但资本控制往往反映出他们更专业的企业家职能。其中主要的反映是从对政府的贷款中获得利润。

政府财政导致了国际企业活动中最投机的领域的出现，以及那些活动的重点最重要的转变。虽然提供给政府的贷款大多是用于非生产用途的，但这仍然开拓性地扩展了债权人的经济活动范围。政府的财政需要，至少是在这时期的开始阶段，迅速超过了它长期和短期的创收能力——政府突然破产了，它不得不放弃抵押品或将经济特权给予债权人。结果是那些成为了金融家的企业家，有选择地或者是必然地很快开始涉足众多领域：土地所有权及【414】其管理、矿产的生产和贸易、海关行政或者是商业垄断。通过这些手段，16 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家族垄断了里斯本和安特卫普之间的香料贸易；富格尔家族在同一时期控制了蒂罗尔、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匈牙利铜的生产。

16 世纪强大的国际企业，可以消除许多那些弱小的企业家必须承受的

不稳定和市场限制带来的风险。它们的规模、经济实力、政治威望和市场控制力，所有这些共同使得它们暂时的环境更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它们所从事的商业的性质却也给它们带来了诸多致命的其他风险。像金融时代早期的巴尔迪（Bardi）、配鲁齐（Peruzzi）、美第奇（Medici），它们很容易受到政府耍赖和皇室垮台这些变化无常的事故的影响。出于诱惑，有时也是出于义务，与那些君主债务人打交道时，它们被要求提供超出抵押品价值的贷款是最不安全的。在 16 世纪的欧洲，富格尔家族也许是最富有的企业家族，但它们的大量资本却是对哈普斯堡王朝及其企业的不可流动的贷款。西班牙的金融崩溃——一个反复发生的现象——使得这一家族的地位急转直下。

事实上，在 16 世纪已经看到了"壮丽的"国际金融的终结。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像富格尔家族这种惩戒性的经历；部分是因为各民族国家靠税收而提高了其创收能力；部分是因为狂热的帝国野心的驯服；部分是因为金融机构、正规的辛迪加以及扩大政府贷款的正式、持续的方法的增加——所有这些都倾向于替代孤立的个人和企业在大宗贸易中的投机现象。个人金融企业的一些特征仍然保留下来：经济特权仍然常常伴随着政府贷款；贸易也仍然是国际金融的附属物；金融企业也仍然卷入国际货币流动从而卷入国际组织；仍然可以看到声誉不好的和国际性的个人银行家。但是那些明显可以降低个人风险的制度上的和非个人的安排已逐渐出现在金融领域——有英格兰银行这样的大规模的公司形式；也有像法国的总承包人这种辛迪加形式；还有有组织的政府证券市场，在这里，机构或个人金融中介可以满足政府的各种金融需要。政府金融领域的这种发展只是反映了金融企业"制度化"的一般性增长。 [415]

即使在大规模的金融企业组织正缓慢增长之时，金融和商业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经济现实使这两种企业形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相互间的活动有助于相互增强实力，身兼这两种职能的商人，其经济势力便处于战略地位。对贸易资本的控制使得他们广泛地参与到政府财政、矿业、制造业以及国内土地和货币市场中去。由市场性质所塑造的对专业性功能的厌恶，被前面所说的对所有重要的流动资本的支配性占有这一商业现实重新加强了。商业企业家仍然是经济"通才"。

3. 企业家的变化

广泛地看，商业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在中世纪结束后的 250 年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尽管在流通渠道中的商品量增加了，但欧洲的商品交换

模式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1750年的生产革新也没有足够地提高新的需求。当然，企业的自然风险倒是有所降低。在18世纪，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但与前两个世纪的军事和经济敌对的程度，以及瘟疫和宗教纷争相比，到这个世纪末，物质的安全程度更高了，对贸易的任意干涉更少了。然而，最大的混乱和最广泛的风险因素仍然存在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以及价格的波动，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的市场结构不完全。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改变足以使企业家功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这些一般情形中，一个突出的例外是股份公司的经营领域，[1] 而且并不是欧洲经济内部的股份公司，而是在海外经营的股份公司。非欧洲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自然就赋予商业新的职能，从事欧洲大陆（Old World）之外的商业交易（比如奴隶贸易、亚洲运输业务、殖民地间的商业活动）的可能性使贸易者面临新的环境——贸易者自己在这种新环境的形成中就起着【416】重要的作用。最初，新发现的陆上和海上贸易通道由政府企业直接管理和控制。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实验使政府并不阻止私人企业家承担这方面的职能、扩大新贸易的潜力。新旧商业的重大区别表现在必要资本的数量和性质上：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贸易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包含风险的因素共同增加了公司制企业的风险。此外，由政府特权担保的投资者努力保护他们的固定资本投资。因此从事海外贸易，尤其是殖民地贸易的股份公司的成功是有限的。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供给。在超远距离贸易中，以及在欧洲社会和政治体系与其没有商业利益关系的地方的贸易中，商人会发现企业的控制问题非常严重。这在那些最大规模的股份公司中尤为明显，它们需要有新的管理技术。这些公司从来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个人企业和公司制企业不得不采用与新形势相适应的管理技术。不断流入欧洲的新商品和不断增长的供给，刺激了商业中心和加工业的发展。商业技巧和商业资本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支持着这种趋势的发展。

除了股份公司体制之外——要记住，就算是公司制的商业企业也不得不以老方法来应对新问题——商业企业家只得主要依赖传统工具去处理商业问题。1750年就像1500年时一样，商人被迫要让代理人承担更多的职能，因为信息传递实在是太慢了。对代理人的根本的控制可以通过利润激励、会计和信件来进行。但是作为最后一招，不得不把相当大的主动权交给市场当地的人。结果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商业结构中都仍然起着

① 见下面第439～447页。

重要作用。商人仍然从事跨行业的业务，也充当金融代理人。而且，面对风险和不持续的市场，商人资本家仍然将其能力和资本分散地投入到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市场中去。有两种迹象表明经济扩张已经开始发生作用——至少在重要的商业中心是这样。一种表现是长期合伙企业的增加；另一种表现，尤其在金融和委托代理领域，是专业化功能稍微有所提高。即便如此，也不足以产生任何激烈的方式改变商业企业的一般性质。[417]

4. 企业家的成功

最成功、最成熟的商业企业自然都集中在最成功、最成熟的商业国家的商业中心城市，这是很正常的事。然而成功并不只是一个环境优势的问题。商业企业为何取得成功这个问题当然没有简单的、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但在给定的风险环境中，纯粹的运气因素也不能忽略，当然也不能总是把它视为决定性因素：对于企业家来说，和发明创造一样，机会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波斯尔思韦特所说，不“谨慎从事、仔细判断，不接受教育，而是去盲目崇拜捉摸不定的幸运女神”①，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同样，分散化措施或许可以消除大量的风险，但它也不能避免所有的市场的不安全因素，而且分散到一定程度后，所避免的风险损失可能与分散化所造成的利润损失相等。然而在商人的商业生涯中，利用任何商业机会的潜在能力明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重要的是具有广泛的商品和市场知识，并结合灵活的方法。孟写到，好商人应该具备的是“关于所有职业和所有交易”的知识。② 另一方面，掌握大量与商业领域相关的技术对商人来说也是最有利的：他也必须有占有资本以及获得资本的手段。因此，老传统特别强调获得资本的途径，正直的学徒可能也会去接近雇主闺中待嫁的女儿（或寡妇），取得雇主的信任和贷款。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安全的，资本或信用值使风险的计算成为可能，使贸易者从企业形势的变化中迅速获得实质性的利益。

明智地进行管理的资本是资本增值的最好的土壤，但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这个经济中，明智的管理按一般的直觉要与有意识的理性相联系。就像前面提到的簿记的例子，限制编制计划的范围——与现代商业中的理解一样[418]

① 玛拉基·波斯尔思韦特（Malachy Postlethwayt）、詹姆士·罗伊斯通（James Royston）：《英国商业研究》（1750年），第12页。

②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年初版，1933年重印），第2页。

——既是可能的，也是有用的。一方面，作为商业计划必需的数量上的和实际中的资料不可信，同时也很缺乏。另一方面，商业形式可能迅速变化，加之变化原因的任意性以及相对缺乏连续性和规律性，意味着对现实的判断不能以过去的情况为基础，未来极不确定，不能靠那些长期的或过于僵化的政策去预测。通信的现状强调了经验程序的重要性——但经验程序就不应该是偶然的，要依赖于确定的基础和理性的技能。波斯尔思韦特在论证实践基础的必要性时叹息道："许多人在描述自己的商业能力时，爱自夸说他们没有其他资格，就是有充足的资本和爱冒险的性格。"① 另外，如果存在通过经济特权或官方援助来降低风险的可能，则介入政治势力显然是金融成功的坦途。这些因素所强调的是政治技巧和与高层的友情的重要性，但它所强调的也是控制资本的意义，用所控制的资本可以购买能获取更多财富的机会。最后，在这里简要罗列的因素中，显然也会在成功的商业企业的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是，有幸选到并控制了熟练的、有效率的雇员。给定基本的商业才能，那些固定的由亲戚朋友为其进行经营的企业家显然将获得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企业的结构、企业家的人际关系，以及企业家的天赋和财富，有助于解释成功的商业所取得的成就。

5. 企业家的继承

因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全的职业转换，哪些因素导致企业家不能成功这个问题，与企业家的社会和经济来历、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些问题分不开。而这些内容又与任何特定国家、社会或团体的阶级模式和可接受的社会价值直接相关。

欧洲历史并不缺乏这方面的例子：那些从一贫如洗发迹成为腰缠万贯的商人，或者更多的是"（那些商人）一年花一两百英镑，而他们的父母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四十先令"。② 但是取得巨大商业财富成就的穷人家的和非[419]商人家的孩子只是一些例外。在某些国家——尤其是英格兰和法国——富有的商人成为地主家庭的趋势，使得成功的商人之子不再必然是成功的商人（这种现象在低地国更普遍）。但在总体上，富人，无论是从商人、从专业人员，还是从地主家庭变成富有的商人，显然比穷人要容易。这不仅仅是钱

① 波斯尔思韦特、罗伊斯通：《英国商学院》，第4页。
② 《英格兰的至福，或满意和抱怨之间的对话》（1677年），第20页。

财的问题。教育、机会、社会阶层、家族交游，所有这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者、小农场主或者农民家庭的出身，对于商业转换来说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同样，由于社会成就的标准中并不把商业看成体面的职业，生于地主家庭的长子也是如此——虽然比他小的其他家庭成员会靠像商业这样的世俗职业谋生。虽然职业的横向转换可能很自由，比如在17世纪的布里斯托尔，“卖蜡烛的小店主也将会出售大捆的长袜和一些来自内维斯（Nevis）或弗吉尼亚（Virginia）的原料”。[①] 但是，纵向的转换却非常困难，国家间和不同时期间的职业转换自然也有诸多障碍。进而，职业间的变动取决于社会多数对不同职业的相对尊重和价值取向。当然，这后一点与从“上”而不是从“下”进入某个职业更有关系。有贵族、地主和专业人员背景的人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介入贸易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商业生活的价值认同。

除了共和政体的背景和土地稀缺使荷兰成为一个特例以外，英格兰为进入商业阶级之列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具有多样化的社会结构的所有重要国家都是如此）。因此，排开其经济沙文主义不谈，迪福提及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他写到：

> “当那么多高贵的和富有的家庭……都是靠贸易起家；当……我们贵族的那么多新支系，甚至贵族本身又重新回到了他们发迹之地，即成为了商人；从此……我们的商人在**英格兰不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是最低等的一类人。贸易本身，不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是人们所能从事的最低等的职业。恰恰相反，贸易是人们积累财富、提升家庭地位的最便捷的途径；从而有身份的人和上等家庭也进入了这一领域”。[②]

【420】

英国的商人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成员进入商业领域所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在法国，这个过程相当困难，虽然贵族渐渐地更加关注工业企业，[③] 与英格兰相比，商业阶级也更多地是在自己内部产生。在这两个国家，就像在大多数欧洲社会，对尊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批发商人和国际贸易商人比零售商人和国内贸易商人更有声望。在低地国，这个“商人和技工之国”，商业的地位得到了最高的尊重，也可能得到了最大

① 引自沃尔特·E·敏辛通（Walter E. Minchinton）：《18世纪英国商人》，载《企业家》，英国经济史协会1957年4月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第24页。

② 《完整的英国零售商》第1卷，第318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③ 见下面第449～450页。

的满足。确实，很明显，对企业家的激励绝不是对企业的暂时的金融奖励，考虑商业威望的其他方面就很重要——商人在自己的国家能得到多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一个允许上流人士成为商人的社会，如迪福指出的那样，也会允许商人成为上流人士，虽然反之不必然反是。在现代早期阶段的英格兰——尤其是17世纪和18世纪——财富是获得社会声望的一种手段，但这不只是一个购买荣誉的问题，或者一个家庭在富有的中产阶级和贫穷的贵族之间鱼与熊掌的问题。在商业的声誉没有同样程度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已在法国普遍存在。在英格兰给予商人的那些**实际的**东西以及商人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法国却是被否认的，企业家所得到的那种地位并不是单凭货币就必然能实现的。伦敦和各省的商人贵族成为了政府成员或进入了政治机构，获得了社会职位和权力。而法国——那里的荣誉和官职也是可以购买的——在与英国国会下议院或伦敦商业区的国家机构（法国的商业委员会实际上与之并不真正相同）相类似的地方，却很少有什么商业利益，在地方社团中也【421】鲜有能与英国相比的商人政治寡头。

无论与商业事务相联系的是哪一种声望，在大多数欧洲社会中，这种声望都不是最高的。孟写到："我们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儿子放弃了财富，嘲笑他父亲的职业，设想着成为更荣誉的绅士（虽然只是在名头上）后如何茫然无知地挥霍他的不动产，然后步其父亲的后尘又去做一个勤勉的商人以保持和提高他的财富。"① 这种情况常常也许是代代相传的宿命，如果我们相信商业小册子作家的忧郁注释的话，在除荷兰之外的每一个重要欧洲国家，成功的商人都倾向于把他们的所得投入非商业事务，追求地位和声望的回报。就因此，荷兰必然要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

> 当法国商人获取了巨大的财富时［雅克·萨沃里（Jacques Savary）写到］，他的孩子并没有继承他的职业，而是进入了公共机关……但是在荷兰，商人的孩子一般都继承父亲的职业和贸易，并且当孩子结婚时，父亲会给他相当多的财产。当他自己开始进行贸易时，将赚得更多的财富，而法国最富有的商人在停止贸易后不得不去其他的职业中建立自己的家庭。②

---

①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3~4页。

② 引自巴布尔（V. Barbour）：《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巴尔的摩，1950年），第141页。乔西亚·蔡尔德（Josiah Child）的孩子在备忘录中说得更简洁："荷兰人在贸易上控制着我们。我们总是新手，代代如此。"

显然，经营商业企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荷兰这个最大的商业社会，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由土地稀缺这一现实所决定。部分商人即使停止了活跃的商业活动，也会分散商业投资，去构建金融王国的基础。但英格兰和法国的企业家有更复杂的特征。在法国，成功的贸易者会迅速离开需要承担风险的贸易领域，给自己或后代购买能带来表面上的贵族地位和稳定而持续的租金收入的公共官职和土地。在英格兰，土地和乡村不动产看似对商业资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加之其在资本保值方面的可靠性，社会对乡绅地位的尊重以及所获得的更持久的满足，都比不稳定的商业要强。【422】

另一方面，这里也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迪福写到："当一个人到达了其财富的顶峰，也就经过了他的企业精神的顶峰；除了把自己保持在顶峰位置之外，他便无事可做。"① 如果一个商人不希望把他所有的资源和一生的时间都花费在国际商业事务中，那么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让他投资呢？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资本和收入的）安全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阶段的多数时间内，在大多数经济中最安全的——但并不是报酬最低的——投资是对农村土地和城市地产的投资。对商业资金而言，"当商人的贸易形势开始恶化时，他就已经决定放弃商业了"②，这是很自然的。对于被动的资本来说，土地和不动产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但其他许多投资途径（比如货币市场、航运、早期的股份公司）都有一定的风险，或至少都需要对投资者所不愿看到的变数进行必要的管理。法国的投资途径有官职和年金；荷兰多样化的经济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途径。直到18世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股份公司体制的发展和公共信贷的正规化，才开始为股息之类的相对安全的投资提供广泛的基础和重要的场所。而对某些人来说，这只是资源的无效率的浪费：

> 过去那美好的贸易时代里，我们的祖先辛苦经营，也收获颇丰，那时没有泡沫，没有股票经纪业，没有南海公司的胡作非为，没有抽奖，没有基金，不卖海洋开发债券和公债，没有流通的国库券。一句话，贸易是一条大河，王国的所有金钱都流入它的急流……没有新的渠道和支流分流它的河水……夺去它的洪流。③

不管股票经纪和证券投机的最终影响如何，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商业活动（或属于这一范畴的其他活动）由其性质所决定，并不有利于企业家的持续性或家庭的继承——一旦他们取得了成功的话。然而在其他领域，更

① 《全面的英国零售商》第2卷，第211～212页。
② 同上，第205页。
③ 同上，第234页。

安全，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向贸易那样敞开大门的更壮观、更有利可图、更有势力的业务也并不多见。因而，现代早期阶段商业在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423】是不容怀疑的。

6.3 工业企业

在《完美的大批发商》一书中，雅克·萨沃里描述了工业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 秩序是手工工场的灵魂，没有秩序，工场就不可能继续存在……这种秩序首先要求获得很确切的书籍，或是找来与那些材料有关的书籍……或有关工人所加工的材料的书籍；有关工程、燃料或者运输的书籍；出售、收费的书籍及其他对制造很有必要的书籍。[①]

萨沃里的描述中隐含着三个重要的假定，每一个假定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一阶段的经济史中都能够得到证实。第一，文中暗示商业企业家投资和管理制造业企业是完全正常和可预料到的。第二，企业家控制是工业中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第三，最典型的工业组织形式是“场外生产”体制。

前面已经阐述了商业资本寻找途径进入非商业业务的趋势。商业资本进入工业是不同因素的明显反应：分散化经营的倾向、希望财产安全（使贸易中的原材料和资源供应获得出路）、增加利润的压力，以及保证当出现需求的时候商业能有货供应这种需要。

虽然制造业企业也普遍面临着足够的内部控制问题，像商业中那样需要运用会计技术来解决，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像长期贸易中那样持续存在。原因是制造业（和矿业）企业的内部通讯不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不需要像同样规模的商业企业那样到处设立办事处。控制在降低成本、减少原材料损耗以及保证质量方面是重要的，因为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与工业企业的结【424】构相关。本节的大部分内容将分析这种结构问题。

1. 产业组织

对制造业和矿业单位的基本划分是由它们各自所要求的资本条件的性质

① 雅克·萨沃里：《完美的大批发商》（里昂，1697年），第89页。

决定的。制造业中的技术特征意味着工人必须与昂贵的资本设备恰当地结合，生产单位趋向于集中（下面将会看到，业务规模的结果取决于非技术要素①）。另一方面，固定资本不是很重要，也不太需要将劳动力集中到车间里。给定了需求和劳动市场性质的营业成本、管理负担以及劳动问题并不是合理的，尤其是从通过细分制造工序以限制规模从而降低成本这个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当然这里的一般情况也有例外：温斯考比梳（Winchcombe）、除根机（Stumpe）等工具会暂时有利于纺织品的繁荣，从而创立一种工场组织，使当时的人感到惊讶；或者，在政府援助和贵族企业这些非市场因素的刺激下，劳动力和流通资本可能会结合进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单位中去。但是这些例子在大多数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式中不具代表性。主要的情况是技术简单，而且营业成本负担能够转移到劳动力身上。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组织形式可以是根据工人的能力而将生产任务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在自己家里进行生产（即传统的场外生产体制）；或者是在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中，“业主”在他自己家里劳动，最多有几个人协助（即“家庭内部生产”体制）。

在各种场外生产、家庭内部生产和手工业体制中资本需要的性质和市场结构，是决定生产安排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不是惟一的因素。因此，对那些用相对小的固定和流通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有限的和地方性的需求，由集中在独立的手工业者家庭中有寥寥几个助手（他们可能是雇员，也可能是家庭成员）协助工作的工匠就能满足。与此相对，那些针对遥远市场的，或者原材料易受限制的生产，通过贸易财富上的优势和原材料与工资的集中供给来进行的资本控制和集中生产的可能性就更加明显。在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较昂贵、资本周转时间较长的情况下，这种趋势就更强烈；两种情况【425】都能给资本主义企业家带来物质经济利益。但是，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18世纪英国西部（West Riding）的纺织工业中，那里的商品是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市场而生产，那里的个人物品很便宜，而且能很快地生产出来。这就意味着独立的生产者就算缺乏资本，也能通过迅速转让他的小“股份”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委托的方式出卖资本密集型的工序（比如漂洗工场）而生存下来。

完全排除技术上的原因，从许多方面来看，场外生产体制对于工场组织形式来说，在经济上是一种高级形式。当市场不稳定是企业环境中决定性的

① 见下面第427～431页。

内容时，场外生产方式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面临风险时最有效的回旋余地。它能够适应需求的迅速波动，而且对商人来说成本是最小的。通过吸收待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通过遍布各地的小规模生产单位，这种体制利用了容易得到的和便宜的劳动力。因为它的结构允许广泛的产业扩张，也因为流通资本至关重要，它允许个人企业家在业务规模上密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因为商业资本没有大规模地沉淀为固定资本，企业家就能相对容易地削减他的业务范围。从而这种体制是适应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企业经济环境的一种企业工具。

这并不是说分散化生产是没有限制的。这里有一个已经提到过的缺乏标准化的问题。但相对于商业中的控制问题而言，一个企业不能保证其产品标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是原始的技术工序。这里并不存在增加生产成本的问题。因为在个人企业的情况中，产量是伴随着总业务（即劳动力、资本、原材料）规模的增长而扩大的，从而直接成本至少是成比例地提高。在以场外生产制为基础的企业中，缺乏走向增长的规模经济的任何趋势，确实是因为控制原材料流动、管理更多的劳动力以及协调更多截然不同的生产单位的困难，会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在这种环境中，少【426】有平稳的、均匀的扩张，因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进行大量细节上的管理。对这些细节上的管理，更多地是由专业管理人员（每一个管理人员负责一组生产单位）来进行，或者是与半独立的企业家签订子合同，让他保证完成自己的工作。

2. 大规模工业

场外生产体制尽管有局限，但仍然在许多工业行业中盛行，尤其是在当时最大的工业——纺织业中。然而采用这种体制的先决条件是廉价的和易于学习的技术。与此相反，许多商品其生产的技术要求非常重要，只有集中的生产单位中的生产才能保证这种技术要求得到满足。在这些行业中，劳动只是作为生产的物质手段。显然，在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及金属、船舶、玻璃、面粉、糖、肥皂、书籍、纸张等等产品的生产中，原材料的性质和技术需求使生产趋向于集中。然而——就像在农业企业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固定资本相对重要并不意味着必然要进行大规模作业。森林中吹制玻璃的人、煤矿雇佣的少数工人、旅馆中酿啤酒的人、造船匠，所有这些都代表着到处存在的、有意义的企业形式。我们今天所说的重

工业在当时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普遍。

对工业革命的阐述中，有人认为生产的巨大扩张部分是取决于大规模市场的联合以及有效的交通运输。在现代早期阶段并不存在这些限制真正的大规模企业发展的因素。比如木材燃料的运输需要花费成本，大量使用这种燃料的企业就很正常地会去避免集中在某一地，从而节约原材料成本。因此，英格兰钢铁工业中的大企业控制着许多分散的中等规模的铸造厂和熔炉；在法国，大多数玻璃制造企业从来没有对小规模的企业形成威胁。但是，比原材料供给重要的是市场方面的困难。对于所有的制造业和农业来说，都存在足够的廉价生产的机会：储量丰富的煤田和矿床、原材料的沿海运输、技术上的可能性。对生产规模的主要限制不是高昂的生产成本，而是高昂的销售成本。分散的人口和令人头疼的交通——陆路交通很糟糕，水路又只能到达有限的区域——使就算是最有效率的企业也受到限制。只有在想要开发一个足够有利可图的需求时，大量的营业资本开支才是合理的。[①] 【427】

在这种特殊的市场环境中，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也许在于城市本身的集中。在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城市里，在小范围内就有众多的生产单位，这可能会鼓励“重”工业的出现——只要原材料供应充足而且便宜。但是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只有伦敦的啤酒厂才能从大规模生产中获益，因为啤酒只适合极短距离的陆路运输，这样成本才合理。但另一方面，大规模企业不会喜欢那些原材料运输成本高昂或大城市地区的高价格使成本提高的地方，比如法国皇家厚玻璃板公司（它生产的产品运输成本低于其价格，但是所用的原材料却恰好相反）在成立之后（1665 年），就很快从靠近巴黎的圣安东尼（Saint-Antoine）迁到了诺曼底的图维尔（Tourville）。

如果生产成本不是不能克服的问题的话，通过水路运输可以达到的有利可图的市场将会刺激大规模企业的产生。英国的煤炭公司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沿泰恩（Tyne）河谷，那些通过水路就能直接到达大量的海港，从而到达沿海市场的煤矿得到了大规模的、高水平的投资。反之，内陆的矿山，除非有现成的河流可以直通城市市场，否则就要受到刚性的运输成本的制约。当然，对煤矿而言，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工业，运输成本是决定性因素，

①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原材料的自然集中使得销售成本与地理因素不相关。比如，在铜矿开采中利用大量的资本，并不受那些矿产资源的广泛分布的限制；在瑞典的大铜山的大规模作业，或者是在萨克森的炼铜，都得益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以及对有限的供给的资本控制的收益率。相似的因素也适用于16 世纪早期富格尔家族对阿尔麦登（Alamadén）的水银开采的控制。但是这样的情况非常少。

所以法国的企业家克里斯托弗·马修（Christophe Mathieu）认识到这一点，在18世纪时要求政府无息贷款开一条从矿山通往河流的运河。[1] 水路运输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矿业。在得到原材料及其最终分配这两方面，港口城市适【428】合大规模的业务活动。像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商业中心，它能提供充足的企业资本，以及纸张、木材、糖、沙子、碳酸钾和金属这些低成本的存货，就成为了印刷、锯木、造船、炼糖和玻璃制造这些大规模企业的场所。

通过投入大量资本而获利的企业受到地理、地质、位置这些偶然因素的极大限制。另外，也有更纯粹的“经济上的”限制因素。风险资本的供给和企业家技巧同样也很重要。比如缺乏本土的财富和技巧的瑞典冶金工业，直接依赖自发的荷兰和德国的企业家而促进了钢铁、军工和制铜企业的发展。这里也提出了重工业演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资本的可用性，或者有效需求，其功能也许并不仅仅体现在市场力量上，在创造集中化的企业这方面，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对于采矿和冶金企业来说尤其是事实，因为除英国以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矿产并不是无可争议地由土地所有者所拥有。国王将他的王权置于这些自然资源之上，并不仅仅出于税收的目的：它们是控制企业家开采煤和金属的特许权手段。

对矿产全面的政府所有和管理并不多见，但一旦存在就是大规模的。威尼斯政府的造船所占地为60英亩，工人数在1 000～2 000人之间，是16世纪早期欧洲最大的单个企业单位。重要的政府企业大量地直接把产品生产服务于战争需要，比如军工厂和造船厂。另外，也有想像出一些理由规定政府要促进少数战争用品的生产这样的例子。在法国，戈布兰（Gobelins）、萨伏内里（Savonnerie）、塞里斯（Sèvres）的政府企业成功地通过人为手段建立了大规模的生产单位，甚至设备制造和建筑行业的私人企业也属国王所有。在瑞典，铜的战略重要性为国王所利用，国王是重要矿产的实际所有者，并控制着金属的国际销售。在18世纪的德国，政府不得不经营那些在不发达的经济中私人资本不能维持的业务，而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429】黑森（Hesse）政府认为它们是国家福利的根本。

然而，并没有必要去创建完全由政府出资的大规模政府资助企业。实际上，后一种企业大多数是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组建的。这在军需品企业中

---

[1] 罗弗：（M. Rouff）：《18世纪法国的炭矿》（巴黎，1922年），第224页。

最明显，政府可以为军需品提供稳定的市场，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在英格兰，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这一段时间，艾维里恩（Evelyn）家族与政府签约，为政府生产武器，刺激了萨里（Surrey）的大规模企业的增长。与政府签约负责生产海军所需的铬铁和锚，帮助安布鲁斯·克罗利（Ambrose Crowley）建立了模具厂，保持了在这一行业的领先，或者说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冶炼厂和铸造厂就由巴博·德·拉肖萨德（Babaud de la Chaussade）所控制。[①] 在17世纪早期的瑞典，路易·德·吉尔（Louis de Geer）的军备、制铁和造船企业直接供应政府所需要的物品。但是在大多数这些例子里——就像法国国王对皇家厚玻璃板公司，或者对萨伏尼（Savonnerie）的劳德尔（Lourder）和杜邦（Dupont）家族的奢侈品需求这种情况——单单以合同为基础还不足以出现大规模的投资和组织。即使在现代早期阶段，对军备、金属和皇家奢侈品的需求还不足以稳定地根除经营费用削弱这个问题。企业家越发被迫地依赖于政府，以保证得到直接的补贴、无息贷款、特许权，以及排他性的特权，据此减轻自己的开支，提高自己的产品的市场价格。直到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这种政府鼓励的体制遍及法国。这样皇家制造业和特许状就能保证得到贷款和补贴，得到受尊敬的头衔和实际的垄断，得到税收减免和劳动力方面的特权；而且在法国，至少是从理论上来说，政府统治着工业领域：企业家寻求许可开办工厂的时候往往就需要特权，煤矿创办者要保证地理上的垄断，否则他的投资就只能是打水漂。借助于其垄断地位，皇家厚玻璃板公司1750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工厂之一，雇佣了约1 000人，销售额超过了1 000 000里弗（*livre*）。的确，法国的工业企业像它的贸易公司一样，似乎只有靠皇室的直接或间接协助才能保持大的规模。其他国家的政府在更小的程度上也努力为大规模工业提供市场保障和资本替代品——尤其是在采矿和冶金领域。在16世纪的英【430】格兰，皇家矿业公司以及矿产和电池厂；在17世纪的瑞典，由荷兰人和德国人经营的制铁和军需品企业，以及18世纪柏林的丝厂；所有这些都是这种情况。

很明显，大规模的、集中的企业在成功地运作之前需要有非正常的因素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除了政府干预之外，这些因素是地理的和经济的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只是到了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制造和运输技术

① 巴莫福特（P. Bamford）：《17世纪、18世纪法国的企业家》，载《企业家历史探索》第IX卷，第4期（1957年4月），第207页及其后内容。

的巨大进步才给大规模企业带来了十足的竞争利益。到封建旧制度末期，即使是在英格兰——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使重工业的发展最领先——其他形式的工业组织以及小型的和中型的企业仍然是主流。另一方面，那些确实想要承担某些经济功能，想要直接创立重工业的政府，其努力也会明显受制于经济现实。18 世纪后期，法国政府对待垄断的态度更有选择性了，并受到了批评。但如果一个特定的企业需要持续的垄断，而且政府给予了它这种特权，那么其结果将是抑制而不是扩大大型企业的领域——如果市场需求只能容纳一个而不是两个企业，那么政府给予垄断地位这种方案的效应是创建了早熟的幼稚工业，它永远不可能成熟，直到市场形势在纯粹的经济背景下适合于它的存在为止。在那时，各种工业特许权之间相互冲突，而且也与比如国内征税这些特权相冲突。在有些地方，政府行为是直接从海外吸引不可或缺的资本、技术或企业家才能，这确实可以在克服制度瓶颈方面产生更积极、更有创造性的效果，尤其是在这个知识和工业资本仅仅是随着人员的国际间移动而发生流动的时代。实际上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承担了部分增大了的资本风险。有时，像瑞典，甚至德国，这也是最终工业化的根本条件。

在 15 ~ 18 世纪之间一贯的传统经济制度下缓慢的经济发展，与工业企业中固定资本使用的缓慢增长无疑是一致的。人口增长、城市集中、战争的【431】需求、对扩大的初级产品流动的处理、财富的增加以及内陆水道最终缓慢的改进，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大规模作业的趋势出现了。另一方面，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尤其是燃料）的分配、销售成本、需求的多样化和波动的性质、落后的技术，所有这些因素又严重地限制着单个的和总体的生产单位的集中程度。可能许多工业的特征就是固定资本的高投人，工业发展更多地是在一个最大规模的企业内部生产单位的扩展和增加，而不是产生更多的这种大规模企业。

“重”工业的结构组织适应企业不同业务水平的需要。在小规模企业和成熟的政府企业这两极，所有权形式当然都是直线式的。小规模企业是一种独立的业务，不管农民或工匠是否参与了生产，或者只是土地所有者地产的一个次要附属者，这种企业单一的所有权关系和业务合伙人关系，使得它基本不存在成熟的或非传统形式的企业中的那些管理问题。政府企业由于存在规模的压力，而且缺乏利润激励或（往往是）对管理者没有刺激，所以常常特别没有效率。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等规模的企业，或大规模的私人、半私人企业——的企业基本上都自然地采取了使其能最有效地运用资本

的组织形式。实际上，个人所有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在矿业中，矿产的所有者有足够的财力和（或）事业心去经营他们的业务。英国的煤矿中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几乎所有为数不多的大煤矿财产关系都很简单，就是地主自己所有。但是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采矿和制造业中，像在远距离贸易中一样，需要足够的资本，存在与资本相联系的风险，这里经常采用的组织形式就是合伙制。[①] 企业家就既可以分散他们的投资，又可以分流被动资本资源，而且创业者还可以保持有效的企业经营方向。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向掌握特殊技术才能的人提供利润分成激励。【432】

合伙制在采矿和冶金企业中被认为是标准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运作有年限规定，企业的资本被分成许多“部分”或“份额”。这些部分的数量是固定的——但事实上与投资者的数量并不一致，它们往往能通过直接的出售或者继承而进一步细分。许多合伙制企业通过正式规定的方法而保留了私人的特征，如果不把至少一个买卖特权给予共同创业者，任何合伙人都不能出售他的份额，除了这个买卖特权之外，其他份额就是完全可转让的。即使不存在所有者多样化这个问题，几乎所有大企业也会逐渐面对这个现实。比如16世纪早期，萨克森和波西米亚的一些银矿和铜矿已经分成了上百个资本“部分”。虽然这种极端情况并不多见，但任何大企业的合伙者都不得不调整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平衡。多数情况下，少数合伙人是由一个代理人来代表，合伙条款一般都规定了一个参与管理所需的最低资本份额持有数量。每一个合伙人都拥有独立的、与个人持有份额无关的投票权，这一惯例比较普遍，比如在列日省（Liège）的煤矿，企业根本不体现大部分工业合伙制的管理现实。企业及其资本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合伙人很多，那么对企业的管理一般就由合伙人集体来做，但这多数也只是一种形式。

合伙人的地位与其个人责任有关，从而要求资本的多样化。比如在英格兰，参与的合伙人的责任是无限的（就算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两个矿业和冶金公司也被迫要求分割份额）；但当然也可能以固定的利息率投资合伙，不承担超出贷款数额以外的义务。相反，在法国有三种主要组织形式：无限责任（*société en nom collectif*），即所有的合伙人都承担完全责任；部分有限责任（*société en commandité*），即少数（非管理的）合伙人仅在金融上承担他们的有限份额的责任；而有限责任（*société anonyme*）是一种最类似于股

① 股份公司形式相对较少，像皇家矿业公司和矿产与电池厂这样的企业，至少是在其成立之初——虽然是正式的公司——更多的是带有当时的合伙制公司的特征，而不是现代的股份公司。虽然合伙制仍然是主要的组织形式，但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股份公司也开始增加。

份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有两个大企业，安辛（Anzin）矿业公司和克鲁苏特（le Creusot）公司是以最后一种形式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虽然它们对最大地聚集起来的资本的使用一般是稀少和有限的。部分有限责任是最早出现的形式，它为资本的增长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因为小规模的投资者自己可【433】以减轻繁重的管理责任，避免进一步对他们的资本提出要求这种危险的义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形式在英格兰也可能出现，至少是在 17 世纪，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勒姆（Durham）最有可能通过出租或“包出”部分份额给其他人，从而免除出租人进一步提供资本的义务。①

对于投资的影响是趋向于在所有权和管理之间出现类似的分离，这种趋势被业务控制领域不可避免的发展所加强。大规模的采矿和制造企业的成功需要持续的管理和专门的技术，尽管企业家才能中包括了对资本的改善和配置，但合伙人也必须自己去完成这些工作，或者必须委托一个代理人去执行。管理职能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商业方面的技术——又是在早期阶段——产生了职业管理者，像与安辛企业有关的马修家族的子孙们，最终他们自己成为了矿产的所有者；或者 18 世纪伦敦的大合伙啤酒企业中重要的高薪职员和啤酒酿造专家；或者像 17 世纪后期的约翰·维勒（John Wheeler），他作为管理合伙人与福里（Foley）的三个连锁制铁合伙制企业建立了管理关系。② 像合伙人的“内部人”进入泰纳河畔（Tyneside）煤矿，或者掌握着安辛煤矿的那 6 个人在 1757 年进入该煤矿，③ 这些人补充进了企业家集团。管理已经趋向于日常事物的管理，大规模制造业的控制也与分散的贸易控制不再相同。

工业中的合伙制，就像在贸易中一样，可以作为一种在一般领域中分散资本投资的灵活手段。而且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统一那些从事分散业务的企业家的利益。这些企业家受地理和交通因素所限，将制造业业务分散化。因此，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福里家族的资本通过不同合伙人的参与这种方式，有效地使 13 个熔炉厂、29 个铸造厂、9 个切割厂、2 个铁丝厂和 1【434】个铁砧厂的利益统一起来。④ 连锁合伙体制还不是一种管理工具，就像在煤矿的例子中，人们常常持有一组煤矿的资本份额，它只是一个投资技术。但

① 约翰·U·奈夫（John U. Nef）：《英国煤矿工业的风险》第 2 卷（伦敦，1932 年），第 60 ~61 页。

② 约翰逊（B. L. C. Johnson）：《福利家族的合伙企业：木炭时代末期的钢铁工业》，载《经济史评论》第 4 卷第 3 期第 2 号（1952 年），第 326 ~ 330 页。

③ 罗弗：《18 世纪法国的炭矿》，第 274 页。

④ 约翰逊：《福利家族的合伙企业》，第 324 页及其后内容。

在这里，家族、社会和宗教制度就像在商业中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煤矿中的马修家族、伦敦酿酒业和英国制铁业中的教友派王朝、17世纪瑞典制铁和制铜业中的德·吉尔、特里普（Trip）和蒙马（Momma）家族——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集团是信心和信任的源泉，从而也是资本和管理才能的源泉。

在成功的重工业的产生过程中，商业资本和资本家尤其重要。来自海外和国内商业的投资和企业家渐渐控制了欧洲大量的采矿、冶金、玻璃、糖、盐等等领域的大规模企业。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工业持续地被商业企业所支配：任何成功的工业业务，由于需要时间和技巧，不可避免地多少要产生一些专职工业企业家，其专业化程度与商业并不类似。事实是商业资本家保持着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同时，也从事着他们贸易所需的产品的中等规模的生产。另外，销售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它被贸易者所控制这一事实，意味着像泰纳河畔矿业这种在当地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实际上也就是城市商业。但是这种矛盾局面并不是正常情况。比如，安布罗斯·格罗利先生自然地从他父亲的铁贸易过渡到制铁。当法国的商业资产阶级转向采矿业时，与之相联系的是向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转移，穿袍贵族特权以及想像中的社会尊重吸引了许多人进行土地资源的开采，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就像荷兰的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方法（事实上包括更投机的专业化），在瑞典的金融、地产、船运和铜铁贸易中得到了自我实现一样，英国的制铁专家和酿酒王朝例示了同样的贡献。富有的贸易者自然不是工业企业的扩张中仅有的创造性的企业家。有一些人［比如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直接从小规模的制造业中一跃成为大制造商。富有的中产阶级——比如四个银行家组成的辛迪加，在1702年以接近2 000 000里弗的价格收购了破产的皇家厚玻璃板公司——也有他们自己的企业家实力。

像多数其他企业形式一样，大规模采矿企业和重工业也面临着不可估量的风险。单个企业家——虽然显然不是单个企业——可以通过追求一个稳定【435】的市场或分散利润从而分散投资来避免一定程度上的风险。但尽管如此，对于包含了固定资本基金的不流动这种情况的一个未知的对未来的承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和更高的不确定形式；私人个人要承担大量金钱的损失，而且确实也发生了损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在企业家即将投资开始在某一行业活动之前，他们需要强烈的刺激和很多的帮助。因此法国大多数真正的大规模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政府的资助——在法国和英国，企业家想要

创建企业之时都能得到相当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金钱援助。[①] 固定投资的负担可以通过出租土地、矿山和铁厂来减轻；同时，任何必要的固定设备（比如采矿设备）的大型投资也可以通过长期租借协议这种保险方式而获得。采矿——这里创业者无法预见开支，更不可能获得收入——的风险尤其大，因而这个领域导向私人垄断的趋势特别强，这就不会令人惊奇了。洛锡安省（Lothian）东部和中部的主要矿产所有者在1620年聚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流产的计划："it was proponeit amongis thame that the pryceis of thair collis sould be raised and hichted tuelf pennyes upoun every leade [load] ... and that nane of thame sould sell thair coillis chaiper... guhilk propositioun being verry weele lyked of be the haill company, they all applaudit thairunto..."[②] 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朗格多克（Languedoc）的煤矿企业家说道："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协议，他们按照协议所定的价格轮流卖出他们的煤。"[③] 但很少有垄断是稳定的，风险仍然很高。对于企业家的产生而言，理想的环境实在太少，以至于不能确定在那些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规模经济收益的地方，他们是否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那种具有光明前景的水平上。在工业企业的结构中，市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4 公司制企业

在现代早期阶段的商业结构中，虽然其他企业形式更普遍，但股份公司式的企业是最引人入胜也是最新奇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人以及资本的正式联合，我们将在两种长期存在的商业联合形式中对它进行逻辑上的检验。这两种联合形式的功能是为个体企业提供一个调整的框架，即行会和管制公司。每一种形式都代表着企业家塑造他们企业的直接框架的努力，而又没有一种形式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变革中保留下来。

行会的成员带有宗教和社会满足的性质，这些对于中世纪的企业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现代早期阶段的商业中仍然有着同样的意义。但大多数情况下，行会并没有回复到那种如兄弟般的温暖或纯粹慈善性的企业形

① 见马丁（G. Martin）：《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的工业》（巴黎，1900年），第197~198页；又见奈夫：《英国煤炭工业的兴起》第2卷，第19页。

② 引自奈夫：《英国煤炭工业的兴起》第2卷，第116页。

③ 引自马丁（G. Martin）：《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的工业》，第229页。

[436]

式，它们的商业职能是卓越的。这些职能总体上是排他的和限制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大多数行会的经济政策，即控制竞争以及控制可能进入一个市场进行竞争的商人人数，是传统的企业家见识的产物。这样的组织体现了个人在一个显然受限制且无弹性的市场中对安全的寻求。这种市场中，一个企业家的利润可能就正好是另一个企业家的损失，当地商人的竞争保持了供求之间的相对平衡。虽然行会可能会在它的成员中作为一种初级的平等主义模式来使用，但它也是富有的制造业主和商人这些小集团控制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工具。这些人为了保持对学徒期满的熟练工人、小规模的工匠以及小贸易者的支配，使对他们有利的这种经济结构变得僵化了。

行会作为对静态的或有限的市场的一种制度调整，一种设计来防止竞争或变革的组织，在销售区域或通信手段扩大之时，其重要性便日益下降了。比如在17世纪的英格兰，国内贸易的发展以及进口奢侈品消费的增长，侵蚀了许多手工行会的经济信条和垄断势力；一般来说，工业从行会在城市的势力范围转移向农村也有同样的效果。另一方面，在那些行会还保留着经济势力的地方——比如17世纪的伦巴底（Lombardy）和18世纪的法国和波西米亚——就容易在经济发展和调整中衰退下去。这一阶段，创造性的企业家活动过于个人主义，而且由于不加区别地与传统主义的企业相结合，企业家活动都失去了其创造性，只能在行会的框架内运作。英国和法国政府曾不经意地尝试过靠行会带来协调的经济增长，但却终成泡影。作为起源于中世纪城市经济的行会，是不可能在这个时代的宗教、国家和基本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生存下来的。 [437]

在英国的企业的例子中，共同管理在海外贸易的领域也是很重要的。正如乔西亚·蔡尔德恰当地描述的那样，“那些不是由合股方式，而是靠政府庇护或控制的贸易企业”，为政府带来了商业财富、实力和知识，它们据此要求政府提供金融援助、外交上的服务和有助于它们商业活动的国民经济政策。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它们在提供相互的保护以抗击海盗、在外国设立代表处以及在海外树立权威地位这些工作，都减少了商业的不安全因素。但是从行会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的首要职能应该是经济上的。

在16世纪晚期，在管制公司内作业的商业企业家控制了英国的海外贸易（尽管这种组织的原型，即从羊毛贸易中获取了大量财富的批发商，正在变得相对没什么意义）。伦敦的公司，从更小的范围内来说，这些公司的分支机构或在各省的独立的团体，为了提高安全程度而在成员之间限制过度的竞争，如果它们被非成员（即“闯入者”）激怒，它们会彻底封闭某个专

门的贸易渠道。在排他性的特权支持下，像商业冒险家公司或东方公司或（另一个时期的）利凡特和俄罗斯公司这些大公司，努力将贸易限制在海外的“商业中心城市”。限制商品能够进出口的次数，建立关于成员的买卖模式和条件的管制机构，把零售商、水手等排除在成员之外，这些人为了迅速回收利润而被迫贵买贱卖。管制公司显然是要努力建立出口商品的卖方市场和进口商品的买方市场。不只如此，一些公司（比如著名的商业冒险家公司）还虚伪地试图通过规定正式的个人出口比例来保护小贸易者。而事实是，管制公司的总体观念戏剧性地表现为对待大规模和小规模企业的态度上的冲突，并且如果公司规模对它们有什么影响的话，在开销上它们倾向于偏爱后者而不是前者。在主要是因为“管制良好”的公司的准则，不可避免地是通过延长资本周转周期、靠限制仅有的资本或信用供给来惩罚商业对手。

尽管有这些政策，管制公司也只不过是卖方市场的傀儡，而不是其创造【438】者。由于贸易组织的分享性质，像所有试图限制贸易的组织一样，它们受制于竞争的敏感性、需求的弹性以及政治情感方面的怨恨。它们基本上屈服于所有这三方面。外部竞争者在商业中心城市和航线上进进出出；欧洲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在17世纪的扩张带来了竞争，从而提高了需求弹性；在17世纪英国国会下议院，已经出现了小港口的人反对管制公司控制伦敦港的业务、外来竞争者反对它们对公司的垄断这种强烈的呼声。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这个英格兰支配着纺织品贸易的黄金时期，培育出了一个管制公司的强大体系；但在17世纪晚期，经济现实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剥夺了它们的商业优势，工业和商业势力的一个新联盟扩大了竞争的深度和广度，瓦解了一个旧的企业制度。

行会和管制公司这种合作形式在17世纪的重要性日渐衰落，另一种调整了中世纪的遗产的组织形式出现了。股份公司尽管与旧企业形式有关联，但它从根本上解答了全新范围内的企业问题。对企业合作的根本刺激是资本投资的规模和性质的需要，个人企业家或者甚至是更高水平上的合伙企业，不能或不愿满足这种需要。伴随着资本扩大的合伙观念的混合，以及伴随着世代继承和给予法律上的人格特权的合伙企业的联合，股份公司反映了资本联合的要求，以便在远距离贸易、采矿和冶金、重要的革新项目和专业的金融业务方面管理资本。原始的股份公司形式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贷款人中，以及中欧的矿区就已经出现了。但还是由于扩大贸易路线的经济需求、所有领先的欧洲国家在17世纪加强了对经济业务的参与，以及由此带来的

远距离商业企业和殖民地企业性质的戏剧性变化，才造成了企业合作的扩大。

与众多的传统商业投资相比，对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新贸易成本更高、投机性更强。初始的商业费用和防卫费用更高，资本周转周期更长，从而天灾、损耗、市场波动这类风险更大。很自然地，企业家希望继续通过资本的 【439】 合伙经营来分散投资。然而并不是投资数量也不是伴随的风险导致了股份公司形式的产生——这两个问题在17世纪晚期之前通过合伙经营或辛迪加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公司有永久继承的利益以及明显的法律个性，它比任何不稳定的投资者团体都更长久，它能拥有大量的固定资产，它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排他性贸易权利。这些特性在它们新开发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市场上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的明显特征是对固定资本或"死资本"供给的需要程度非常大。领事、外交和军队方面的服务，大量的运输、仓库和货栈的需要，细致的管理上层结构，共同体的发展（如果是在殖民地的话，则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有成本的，而且是不得不长期处理的事务。显然，没有哪个单个的团体会做这种投资，除非可以给它带来永久的效用，除非它能得到特权，保证至少是本国的其他企业家不能从它已付出了成本的设施中获得商业上的利益。此外，参与供给"死资本"的所有者希望他们的全部份额能获得相等的利益。

企业面临的这些新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份公司的产生。在葡萄牙对亚洲贸易和西班牙对美洲贸易那个大时代，政府试图解决新问题的办法是：垄断性的政府企业，或者刚性的政府控制和税收。另外，大量的亚洲、美洲和非洲商业落入外部人员之手，他们从其他人的投资中获利并不用冒多高的风险。但就私人企业而言，最重要的解决办法则是股份公司——一个能拥有公共财产、能作为一个单位为股东利益而进行贸易并平等地分享收益的制度，它比任何私人团体都能更便利地保证那种保护固定投资所必备的垄断特权。① 这是一种在经历了其他组织形式的不便之后常常采取的解决办法。一些以单个风险投资为基础的非公司制企业（*Vóórcompagnieën*）开始混乱地竞争之后的8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就成立了；在英格兰，由于导致 【440】 了无法分拆的会计问题，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中叶以后也没能永远存在下

① 《专卖法》（Monopolies Act，1624年）颁布后，刺激了英格兰的公司制企业的产生，因为该法规定将不能把垄断权赋予私人、个人。事实上经济冒险随后便与这一原因相联系，但这表明股份公司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更适合于接受1624年的法令所没有限制的那些特权——前面所用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

去——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贸易是由“可分离的航海公司”（1601～1612年）和“一般的航海公司”，或可终止的股份公司所管理。[①]

在16世纪和17世纪，股份公司的突出领域是在商业中；但商业也并不是惟一的一个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投机的领域。16世纪50年代运用于对俄罗斯和几内亚贸易中的公司形式，随着皇家矿业公司和矿产与电池厂的业务转移而很快出现在英格兰。在英国的环境中，采矿和冶金是两个固定成本高且风险大的行业。公司形式也有助于获得和掌握对于成功来说特别重要的合法特权。因此在17世纪的英格兰，紧跟着德国的实践，在银矿、铜矿和铅矿中，同时在铁和黄铜制造业中采用了股份公司形式。将近150年后，在股份公司繁荣昌盛的17世纪90年代，新的铜和铅业公司重复了这种经历。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格兰，随着运用于对利凡特的贸易中的商业技术的延续，在英格兰和荷兰的商业中，都在思考着如何迅速扩大香料的贸易这个问题，这导致了拥有排他性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产生。在17世纪的头10年以及稍后一段时间，股份公司是殖民地活动中必然的选择。对资本的需要使得大多数殖民地公司，无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鼓励的，都纷纷失败了。除了这些努力之外，在渔业和捕鲸中也有过合作的企业关系的经历[比如荷兰的诺德斯克（*Noordsche*）公司，1614年由一些独立的企业组成，表面是为了对付英国人的攻击而组成的一个联盟。又如30年代成立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渔业协会（Society of the Fishery of Great Britian and Ireland）]。在给排水这类公共企业中也同样如此。17世纪的头10年，企业技巧的革新已经超乎想像了，通向下个10年繁荣的股份公司之路也已经准备好了。【441】

股份公司中的私人元素，无论是别无选择还是出于需要，在一些方面并未与政府活动分离。公司所掌握的势力以及它们进行的贸易的战略重要性，意味着政府必然要关注它们的事务和命运。在英格兰，尽管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室（Stuarts）也投资（主要是为了收入而不是为了控制）于某些公司，但大部分公司还是私人所有的。即便如此，公司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从来也很紧密。在欧洲大陆，这种关系更加明显。比如，国民大会（The State General）是公司联合的催化剂。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荷兰东印度公司

① 在1634年公司的一次会议上透露，该公司在印度的债务达到了100 000英镑。见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没有人知道这些航线属于谁》，《重商主义》第1卷（1955再版），第405页。

得以组建。瑞典和丹麦的贸易公司由外国企业家按先进国家的模式组建起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对成熟的经济发展的渴望。当政府所希望看到的股份公司的积极性要大于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动的私人资本时，它产生的环境也就具备了。因此，1621 年组建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大大地剥夺了（通过贸易和战争）西班牙在西半球的控制权，它的一半资本是由政府捐助的，另一半也多是在官方压力下投入的。但是法国却提供了这样的重要例子：试图强迫私人投资者根本看不到任何获利的可能性的那种企业的发展。

在法国，正式的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之间的区别没有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清晰，原因是有诸如无限责任、部分有限责任和有限责任这类企业形式供企业家和投资者使用。然而在法国，真正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公司并不是起源于私人商业的刺激。继亨利四世（Henri IV）之后，黎塞留（Richelieu）和玛扎然（Mazarin）尽全力开拓东印度贸易，在与荷兰的竞争冲突中责成柯尔贝尔在建立远距离商业中开展广泛的实验——直接仿效荷兰和英国在远东贸易中那些更引人入胜的组织形式，建立了经营西半球、远东、利凡特、波罗的海和非洲贸易的公司（有时是殖民地）。这些由政府发起并直接处于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的企业形式，被证明更多的是大量花费了皇室的金钱，而不是为皇室带来财富。东印度公司 800 万里弗资本中，有一半是由国王和公共基金所捐助，诺德公司的比例也差不多。这些捐助的大部分是政府对商业金融家施加压力的结果。这种国家导向的人为公司是对商业效率的一种嘲笑，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经济需要和有效的管理——又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在与荷兰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个宏大的实验证明了阻碍法国企业家的贸易公司发展的因素并不仅仅是资本短缺。【442】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早期，股份公司的特征经历了一次变迁。影响极度膨胀的发行股票开办新公司这种投机行为的因素中，有许多并不是企业家所想到过的。1689 年以后英国股份公司的增长，更多的是反映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渠道因受战争破坏所带来的资本闲置的压力，[①] 而对企业的这种挑战只有股份公司形式的企业才会碰到。许多新公司事实上是在国内业务中形成的，第一次大量的发行股票筹资也并不是以政府章程为基础，而是根据私人的合作协议来进行的。此外，多数这些行为是集中在开发（或承诺开发）新发明——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创业者渴望利用投机的狂热，但就所

① 见戴维斯（K. G. Davies）：《17 世纪后期的合股投资》，载《经济史评论》第 4 卷第 2 号（1952 年），第 292 页。

需的固定资本和革新的风险而言，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股份公司组织形式是必要的。不管这些因素有多复杂，在英国的繁荣时期，发行股票筹资这种方式的优势是较小的——小到在股份公司形式的选择中，所含资本的绝对数量并不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合股原则有一个明显的新运用，至少是在其初期，它并不纯粹是投机膨胀的结果。其基本原理是，信用和金融服务的配置已经被非正常的框架所影响。在银行、保险、国债管理这些领域，大规模的制度化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英格兰，最重要的例子当然是英格兰银行，它对政府的贷款收益保证了它执行金融功能的权利。由于涉及的资金数额和业务性质，这种业务也只有股份公司才能履行。规模更大的南海公司经营着国债服务，以换取值钱的商业特权。两个企业都表现出了“传统”股份公司的三个突出特征：大量的资本储备陷入到长期业务中、严重的风险、享受政府特权。公司和政府财政的相互关系确实很显著。除了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以外，同样的例子还有米林（Million）银行［1695年，其资本部分以米林·洛特里（Million Lottery）这家向政府放贷的保险公司为基础］，以及新东印度公司（其资本的基础是扩大到投资者的200万英镑政府贷款这一特权）。在法国，基于印度公司的约翰·劳体系提供了一次类似于南海公司甚至规模比其更大更复杂的实验。这两个例子的结果都是由于投机过度使得股份公司的声誉严重受损。

【443】

股份公司是对企业形式的一种扰乱，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企业手段。在一个商业扩张的年代，公司垄断并不是流行的策略；17世纪晚期，股份公司自身也渐渐被一些小企业家集团所垄断了，对这一现象的批评很激烈。一个结果是那些“独立的”英国和荷兰的资本家受到更多的刺激，参与瑞典、丹麦、勃兰登堡（Brandenburg）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国内公司发行股票筹资。然而垄断很少是绝对的，外部人员和特许的私人贸易者成功地在大多数贸易区域都建立了企业立足点。事实上，一个有着名义上的排他性特权的公司是否真正阻碍了某些领域内企业的演化，这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通过公司融资的制度安排和物质安排，许多非股份公司形式的贸易是否可以进行，以及取得垄断特权是否是商业革新中大规模投资的必备的先决条件，在这些方面也有争论。

股份公司体制在其执行的企业职责范围内，其能力是有限的。亚当·斯密的判断是，它的有效运用极大地被常规的管理所制约，它的成功在正常情况下都取决于前面所说的那些特权的照顾。事实上，很少有大公司赚取长期

的利润，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相比，资本方面或商业交易方面的问题对于股份公司来说并不重要。在多数情况下，一旦贸易已经开始，那些希望投资于已经有一个股份公司在经营的领域的个人，就能以比这个股份公司本身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灵活性在这一领域活动。缺乏强制性特权的股份公司并不适合于多数商业企业的长期需要，它的成本太高，它的信息传递太慢，它在设计和运用政策方面太烦琐，它的内部控制力太有限。经营国内业务的企业【444】中，其他形式的企业在增加和管理资本方面与股份公司相比也同样很熟练。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它要等到工业化晚期阶段——到那时，对大量特定用途的资本费用的需求扩大了，连续管理的收益也增加了，而且被动的风险资本的供给压力也提高了——才能取得经济上的胜利。

尽管股份公司没有建立在长期的基础上，但它对于企业史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一种不成熟的实验的意义。尽管其他的制度最终转嫁了企业的主要负担，但股份公司作为一种企业技术的革新，指出了企业的新领域，而且也是对企业广泛开拓新领域的一种刺激。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公司——不是指东印度公司或英格兰银行这种在金融上取得成功的公司——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创新。它们开辟了新的航线，使得其他公司可以搭上便车，而且将新世界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起来，这在后来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此外，股份公司组织对当时企业家的吸引力，以及它所提出的管理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能用它的利润来衡量的。

股份公司作为融资工具被活跃的企业家所操纵。没有其他途径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的资本只是在 18 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①] 因为股份公司组织多是源于商人对更有效地运用资本的愿望，而不是源于开发财富新源泉的需要。这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现代公司最重要的社会结果之一，即管理和所有权的分离，这在现代早期阶段并不是大问题。在荷兰，小投资者肯定要抱怨东印度公司由内部集团所控制，但即便如此，真正的管理者还是大股东。在英格兰，与 20 世纪相比，投资者的人数很少，他们各自持有的股份比例很高，他们与管理者的关系很密切，他们自己的商业经验更丰富。一群活跃的企业家反复地感觉到了合作的收益要大于个人企业，但他们在转移风险给其他人时又总是不成功的。【445】

特别是在这里所说的英国公司中，在所有者和股东的全体大会上，对公司政策可能的争论要大于现代的年度股东大会。的确，重要的、需要透彻地

① 这里不包括在 17 世纪以债券的固定利率贷给股份公司的大量资本。

讨论的管理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而在实践中，企业的日常事务当然必须要委派代表来负责；在英格兰，就像在荷兰一样，公司的个人内部控制自然就随正式的管理结构发展起来。比如1691年，东印度公司被8个人有效地控制着，他们每人持有超过10万英镑的股份，占有超过25%的公司总资本。这种体制的某些辩护者认为这是积极有利的，因为“他预期所有的满足都来自于他自己的股份所能带来的利润，这与几乎所有商业世界流行的两个主旋律相联系，即从自己大量的资本中获得利润，但又担心自己的资本被错误地使用而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①] 但也并不只是大规模的所有者才成为管理者。部分因为富有的商人投资于许多公司，部分因为公司管理本身成为了专门的职责，职业公司管理者阶层表现出了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当然无法达到20世纪的水平，虽不包括许多不是投资者的管理者，但也足以产生像托马斯·斯迈思（Thomas Smythe）爵士这样的职业企业家官僚，他在17世纪早期分别多次担任过利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和俄罗斯公司的总裁，以及弗吉尼亚公司的财务主管（与总裁职位相当）。

股份公司的领导人还没有表现出什么价值，至少与其他大规模企业相比是这样，按亚当·斯密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只是帮别人管钱的办事员，他们很勤奋，但“疏忽和浪费……已经或多或少地在这种公司的事务管理中开始流行。”[②] 大多数非投机性的股份公司中，居领导地位的管理者总体上已经表现出是才干突出的商人，并且献身于他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他们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总公司委员会和分委员会都是如此。“疏忽和浪费”可能也存在，但这不必然是由于缺乏管理主动性导致的。更恰当地说，这是从下列事实中滋生出来的：股份公司，包括海外贸易 [446] 公司，明确了那些一般地烦扰着商业企业的真正问题——远距离的大规模的业务的管理。一个股份公司必然要发生大量的业务费用，除非它能通过法律手段击败竞争者，否则它会发现它只能承担这些开支。像任何商业企业一样，对下属的信任随离母公司距离的增加而增长。在通讯落后的那个年代，距离就把下属推到了一个可以不负责任的位置上，最好的管理者也是鞭长莫及。大股份公司这种类型的企业造成的组织问题仅仅是持续了100年，它已经通过系统的方法得以解决。在那个通讯手段匮乏的年代，股份公司贸易在结构上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因为在大规模业务的情况下，对待海外业务不

① 引自戴维斯：《17世纪后期的合股投资》，载《经济史评论》第4卷第2号（1952年），第297页。

② 《国富论》第2卷（艾弗瑞曼版，1910年），第229页。

得不谨慎，除非既能有效地控制市场，又能保证对下属的控制或合作，否则企业就会面临无效率和固定投资造成的金融损失的威胁。

6.5　贵族与企业

封建武士阶级军事功能的下降，给欧洲贵族留下了一个表面的社会价值结构，即把除了不动产管理之外的所有经济职业都视为不体面的。这一因素，加上传统贵族发现自己依赖于其他人的流动资本这一倾向，导致了许多研究者污蔑贵族的企业家功能，认为贵族天生的狂妄和长期的负债，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在非农业和非军事企业中都未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些描述都太苍白，社会价值并不都像想像的这样，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是债务人，也不是所有的贵族债务人借债都只是用于消费。贵族企业在欧洲前工业化时期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的上层阶级的一般行为标准并不鼓励企业家精神。虽然这些行为标准常常被打破，但它们对贵族企业的妨碍比对任何其他社会集团都要强大。

除了贵族道德标准的心理影响以及社会期望的无形制裁之外，还存在一些当时社会水平上的对非农业企业的具体约束。比如，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尽力阻止贵族甚至一般的土地所有者进入手工制造业、零售业或者国内贸易领域。在北欧，城市商业资本家常常运用非经济的手段阻止贵族的竞争。在法国，16 世纪有一系列的法令禁止贵族从事商业，否则将削衔——即失去贵族的身份和特权——而整个这一时期贵族都在小心翼翼地对抗着削衔，他们随时都在发挥着企业家的功能。但最大的障碍恐怕还是在贵族内部而不是外部，他们的见解、行为和兴趣常常与时间、金钱、才能的花费这些成功的经济活动所必备的东西相冲突。不动产管理、朝见国王、追求炫耀性而且具有特权享受的生活、政治活动、对艺术的追求、在军队和教会中的特权地位——所有这些都足以让他们在勤奋的商业生活中分心（有时这些可能比商业中的勤奋更有利）。【447】

另一方面，这些局限也并不是没有抵消的趋势，它们表明一种可能性，但并不是对“贵族经商”的真正障碍。心理上的不情愿可能会被少量的金钱需要，或投身于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非寻利事务所克服；社会下层阶级的敌对也可以通过运用政治上的势力来消除；法国的王国政府从 17 世纪早期开始，就通过一般的法令和许多特别的赦免，大大地减少了削衔的威胁；对军

队人数和神职人员，以及能够补充到其中去的非贵族长子的人数都有所限制；明显消费迟早都需要有明显的收入；某些类型的企业家努力，尤其是在成功以后，所受到的谴责比其他类型要少。事实上，现代早期的欧洲提供了大量的贵族企业家的例子。

在直接经营领地农业以及管理租金账这两方面，对于贵族农业企业来说，机会都非常多。在这方面，西班牙贵族与英国贵族完全相反。西班牙贵族作为城市食利者阶级，与农村格格不入，致力于那些显赫的高花费的业务；英国的改良地主和贵族资本家则是在波罗的海海边开拓欧洲的粮仓。尤其在北欧，从生产跨越到商业的时间很短：16 世纪的丹麦，牲畜贸易大部分控制在贵族手中；同一时期，赫尔斯泰因的贵族所从事的它们自己的土地【448】上生产的产品贸易，在安特卫普已经是一个正规的业务；而普鲁士和波兰的大宗谷物，有一部分也是经贵族之手从农村出售给中产阶级的商人的。

贵族成员中的农业企业家所赞成的价值体系通常是有足够的弹性的，比如在罗马就允许贵族土地所有者从事农业开发，甚至在土地上从事非食用产品的生产，结果是贵族企业在农业中比在采矿和重工业中更积极。自然资源（煤、矿石、木材）的所有权以及所拥有的政治和社会势力，给贵族在那些根本上取决于依赖原材料的位置的工业中，以及在那些往往是政府保有特许和特权的工业中带来了许多特殊的利益。它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开发煤、铁、铅、铜、木材以及水力资源，即贵族企业家可以建立和管理企业，或者是只创立企业，然后将它出租给其他资本家。贵族希望其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更有利可图——尤其是当熔炉和磨房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动机或许更普遍。16 世纪赫尔斯泰因的贵族海因里希·兰曹（Heinrich Rantzau），曾经在他的土地上有 39 个工厂（包括木材加工、面粉、制油、金属、造纸、磨粉），其中大多数都租给了临近的商人；[①] 18 世纪法国的贵族掌握着一些工业特权，他们往往是把这些特权出售、出租甚至赠送出去，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低运费的木炭和煤市场。另一种情况下，贵族保持着完全的企业控制。在 16 世纪的英格兰，什鲁斯伯里伯爵在铁、钢、铅、煤和玻璃这些领域都获利颇丰；[②] 18 世纪的法国，显赫的安辛是两个相互竞争的贵族企业合并而成的企业，由迪克洛伊公爵（Duc du Croy）管理；

① 见克伦本茨（H. Kellenbenz）：《德国的贵族企业家》，载《企业家历史探索》第 6 卷第 2 期（1953 年 12 月），第 108 页。

② 见 L. 斯通：《1540～1640 年：商业中的贵族》，载《企业家》，1957 年 4 月英国经济史协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第 19 页。

18 世纪西里西亚的大多数铁矿和熔炉，也是由贵族所有和管理。[①]

此外，有两种地产发展的形式，严格地说既不属于农业也不属于工业企业——湿地开垦和城市房地产业的改进。17 世纪英格兰的先驱性贵族企业在这两方面是很好的例子。贝德福德（Bedford）伯爵和克莱尔（Clare）伯爵在 1660 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前，每年在伦敦从他们开发的房地产中收取超过 2 000 英镑的租金，前者组织的辛迪加开垦了大平原（Great Level）超过了 30 万英亩的湿地。他们只不过是广泛的这类活动中较辉煌的例子。[②] 【449】

欧洲贵族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贸易活动，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和生产落后的地区，它们主要的商业业务是参加合作企业的远距离贸易和殖民地开发。英格兰贵族自愿地，或者法国贵族稍受强迫地，将它们的资本和威望投入到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商业股份公司中。显然，这里基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企业家成就与这种货币或头衔的消极投资相联系。积极的行为仅仅是属于特别的人或特别的环境，比如对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异常重要的清教徒贵族。在这种不确定的业务中所承担的风险，以及贵族地位给予它们的鼓励，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自身就具备了一定的企业家功能。国民经济发展的概念，正如私人农业地产的发展一样，二者都允许并鼓励贵族从事商业企业业务，而且可能在某些活动中，它们给予其他人的这种鼓励（假定先驱性业务既困难成本又高）比对它们所建立或参与的企业的直接刺激更重要。尤其在 18 世纪，真正的工业活动，以及比如波西米亚的亚麻、棉花和玻璃生产都是在贵族的地产上进行的。[③] 在这些行业中，开明的贵族与中产阶级的企业家一道，引导着在它们的地产上开办的工业和农业企业。这些企业有的是承担了企业家职能的政府管理者开办的，更多的是贵族成员自己开办的。

自然，贵族承担企业家职能的程度在欧洲各国并不一样。法国一方面由于它的绅士阶层和持续授予特权，另一方面由于其有限的应用价值和对匿名合作的追求，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保守。西班牙的贵族在欧洲国家中更多的是与它的中产阶级的努力一样，是被社会所嫌弃的。英格兰在情感和法律上的障碍最少，从而比其他国家都要开明。英格兰企业家的努力巩固了与其他阶级的关系，这是英格兰社会结构的优点。法国的贵族只要一涉足商业领域，那些使它们成为贵族的理由和特权就会被剥夺。资产阶级贵族是许多异常人 【450】

① 弗利茨·莱德林克（Fritz Redlich）：《欧洲贵族和经济发展》，载《企业家历史探索》第 6 卷第 2 号（1953 年 12 月），第 85 页。

② 斯通：《商业中的贵族》，第 17 页。

③ F. 莱德林克：《欧洲贵族和经济发展》，第 85 页。

物中的一类，它们在法国的问题只有借助于革命才能解决。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欧洲贵族企业家的贡献要比其他集团的贡献大。大多数贵族有一个土地所有权基础，如果它们的兴趣转向了生产领域，也可以长期占有其地产；收入是它们所关心的，但宫廷、政治、职业也能给它们带来收入。此外，就算它们并不绝对地反对非农业企业——这一直非常重要——它们也要努力从那些在任何“贵族”企业中都可以见到的合伙人、投资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这类普通大众所从事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最后，许多贵族商业是商人蜕变成贵族之后来经营的，而不是贵族成为商人。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和英格兰，最成功的企业家（通常可以从他自己和他的孩子的行为上看出来）都拥有大片的土地和醒目的头衔作为对他的世俗劳动的一种奖赏。有时，就像在瑞典和法国，国家——希望鼓励经济发展——控制着贵族册封权（对外国人，也对本国人），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增长的工具。法国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贵族特权是可以买到的——在官职购买的过程中，法国的资本和才能从企业家手中转移了出来，而其他传统的贵族却恰恰相反。

然而尽管贵族企业家具有这些重要性，与其相关的特性还是在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土地、金融需要和社会地位可以强烈地刺激人们去从事企业活动。企业并不必然认可阶级障碍。

6.6 国家和企业

对于当时的观察者来说，不同企业家类型之间的分界线往往并不在于职业或阶级的划分，而是以国界来划分的。这与经济沙文主义无关，因为企业【451】家经济成就的判断标准不是单一的。事实上，商业中理想人物的原型最普遍地来自于荷兰的商业，那里的企业家在追求其经济目的的时候，都要为其他贫穷的国家大大地祝福一番。实际上，荷兰——其他商业国家的楷模——是我们所考虑的国家企业形式的意义的一个最好例证。这并不只是因为低地国有两个最鲜明的对照——贫乏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企业家成就。荷兰的企业家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商人，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所有因素都与荷兰本身有着不同的联系。换言之，企业的作用和成就对荷兰非常重要，而且适合于在国家特征方面来对企业进行分析。从一种观点来看，以国家来划分的资本家之间的差异，比如说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的差异，要大于以职业和

阶级来划分的资本家之间的差异，比如商人与制造业主，或中产阶级的与贵族的企业家之间的差异。

一个国家的企业当然是不同因素的组合。基本的因素是资源和地理位置问题：以食品来衡量的财富、原材料、人口、可利用的资本以及位置，这些因素到底能否与其他国家和其他贸易路线相比；下一个因素是，通过积极的或消极的政策，政府为这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还是不利的环境（这里包括了相对自由的生产要素，如国内市场、扩大海外贸易的便利程度、存不存在社会政策的非经济标准）。另外，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也与商业努力的创造性和连续性有关，企业家绩效与企业家动机和机会是分不开的。最后，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企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成就。企业——从资本、技能、活力、动机的供给的角度来看——经常自然地倾向于自给；一个拥有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产生积极活跃的、成功的商人。

我们将分别从这些方面来阐述荷兰、英格兰、法国和瑞典的企业。

荷兰这个商人最多而重商主义者最少的国家在欧洲能够最好地证明，没有限制性的影响，企业就能成功。意大利企业家在中世纪后期、荷兰的企业家在现代早期阶段是欧洲经济的代表。与法国和英格兰相比，荷兰联合省在【452】自然资源上异常贫乏，因此荷兰的商人就卓越地利用了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大陆腹地贸易通道和海上贸易航线这两方面），他们的强盛取决于海洋和商业：

> 除了在商业上取得骄人成就的一群商人之外，荷兰还有什么？让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初始条件。我们会看到一群渔夫、干酪商和士兵在那个国家的泥地上摸索，那里自然不宜于居住。但时过境迁了，由于商业精神已经散布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它已经改头换面了。[1]

荷兰企业家把贸易者、渔夫和水手所掌握的捕鱼技术，扩展到了有效的和成本低廉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上；凭借着低廉的航海成本和无可匹敌的远距离商业知识，他们把欧洲南北方贸易这条利润最丰厚的航线控制在自己手中。作为商业和航海利益的合理扩展，他们广泛而且成功地加入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新贸易之中。因此荷兰在其他国家之间运送了更多的商品，

---

① 引自伯里尼兹（Polinitz）男爵纪念玛拉基·波斯尔思韦特的论文集，《1751～1755年贸易和商业大典》第1卷，第546页。

甚至使荷兰成为了欧洲的仓库。即使国内的原材料不足以让它广泛地发展工业的话，来自其他国家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也可以为利润丰厚的加工业提供基础。即使国内生产的产品供给短缺，通过企业家的活动，荷兰经济也可以输出它自己的资本去赚取利润。在企业职能的三个主要内容（商业、工业和金融）上，荷兰人学得少、教得多。

联合省的企业家在企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方面是幸运的，这些与其经济遗产相结合，在欧洲最令人羡慕。对他国的宽容、没有政治上的动荡、更清晰的社会和贵族科层体制，这些都给纯粹的商业成就带来了声望（因为声望取决于商业成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荷兰社会没有给经济行为的扩张设置什么物质和心理上的障碍，而其他国家正好相反。对这样一个商业国，作为广泛的和充满活力的商业业务的先决条件之一，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了安【453】全和自由。荷兰企业的性质自然地就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从资本和技能的积累来看，它们是经济成功的伴随物，同时又支持着进一步的成功。

在其他国家所见到的对荷兰企业的羡慕只是反映了荷兰企业的另一方面；它对欧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比如，荷兰商人的努力是阿姆斯特丹商业中心成功的基础，而阿姆斯特丹的商品市场又是商业企业在其他国家增生扩散的基础。在贸易上可能的例外就是股份公司，这方面荷兰人并没有形成什么重要的商业技术并教给其他国家。但如前述，总的来看这个阶段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流传给后人。荷兰企业家对欧洲企业的最大贡献，一般说来[1]无疑是激发了（在个人之间，同样也在国家之间的水平上的）激烈的竞争以及竞争精神。

此外，由于缺乏风险资本和（或）企业家才能而在其他领域产生的真空，也被荷兰人所填充。即使是在英格兰这种相对先进的经济中，荷兰人在17 世纪的短期资本和在 18 世纪的长期资本，都是满足伦敦投资市场需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荷兰人对英格兰工业的影响比较有限，但来自于荷兰的专业企业家还是在 17 世纪早期，广泛地参与到了成功的土地开垦项目之中。1630 年，科尼利厄斯·温缪顿就邀请了 18 个荷兰企业联合参与了哈特菲尔德·蔡斯（Hatfield Chase）的排水工程。[2] 在法国，荷兰商人除了参与土地排水工程以外，还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资本投入到了纺织品生产、炼

① 比如，与欧洲经济不同，荷兰企业家显然从他们的高效率和低成本中获益匪浅。
② 见巴布尔（V. Barbour）：《17 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巴尔迪莫，1950 年），第 122 页。

糖、造纸这些工业中。但荷兰企业的迁移还是在相对落后的经济中才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瑞典，来自于荷兰的企业家（最突出的是德吉尔家族）在17世纪是瑞典的经济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部分通过与政府的金融联系，部分作为自己的投资的结果，他们在铁、铜、木材、沥青、柏油、船舶这些行业的金融、生产和贸易方面都有业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丹麦和挪威。在俄罗斯，是荷兰企业家最先建立了锯木厂、纸厂、磨粉厂、玻璃熔炉以及邮政服务。[①] 【454】

荷兰企业家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自然是与他们最成功的时期相一致的。到18世纪，他们成就的巅峰已经过去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荷兰的商业资本家以前从事的业务开始变得不再有利可图。由于缺乏自己的资源，联合省最后无法应对英格兰和法国这些禀赋更好的商业国和殖民国家的兴起，也跟不上其他国家源于加工业和再出口的工业化步伐。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英格兰企业与荷兰的可比性是最小的。英格兰企业花了较长的时间才成熟起来，但它却是建立在稳定得多的国内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它最终由那些对荷兰的商业同样重要的因素所塑造。相对强大和稳定的政府，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与那些逐渐对企业更有利的法律和政策相结合，确保了一个政治上稳定的环境。在整个这一阶段的英格兰，人和思想的社会流动使商业和其他社会构成部分的关系不至于脱节，而这种脱节在其他国家却非常严重。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得企业家的业务活动相对更容易，加之已积累的财富，刺激了进一步的企业活动。然而与荷兰相比，英格兰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直到这一阶段后期，由于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诸如短期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失控的工业化的危险等此类官方看法的衰落，才开辟了相对自由的企业发展之路。都铎王朝（Tudor）时期的英格兰，其经济和经济政策仍然保留着中世纪的遗风，存在诸多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对企业的障碍。对于英国的企业家而言，17世纪实际上是旧的约束和新的自由之间的一个分水岭，这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都有所表现。其后，在很大程度上与荷兰发展初期一样——但这里有更多的国内资源可供使用——商人在建立企业家霸权的战斗中开始稳步前进了。从总体经济成就的角度来衡量，越来越不依赖于国外的技术和资本供给，以及所采用和熟练的企业技术越来越多，英国的企业家在18世纪赢得了这场战斗。【455】

由于受其结构和表现形式所限，法国企业的影响明显地与前面这两个例

---

① 巴布尔：《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第119页。

子不同。从经济潜力来看，法国远比荷兰富足，而且也比英格兰更加多样化，自给性更强。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它所提供给企业的机会都要比其他国家少。封建的和同上主义的残余通过地方通行费、税收和贸易协会这些方式阻碍着物品的自由流动；宗教纷争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动荡使商业环境变得不安全；宫廷的私心或非经济的动机产生的政策，从好处说是大部分私人企业的负担，从坏处说对它们是一种灾难；殖民地战争不是扩大（像英格兰那样）而是约束了商业机会；复杂的封建结构和一系列顽固的价值观共同限制着人们进入企业家阶层，从而制约了企业家绩效，而且很容易使企业家放弃商业业务。因为从事商业是不光彩的事，以及半贵族官僚对有钱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商业才能和资本便与企业界无缘。当然，情况也不完全像这样糟糕，也确实有一些贵族企业家和投资者（尤其是在与不动产相关的职业中）；也有一些买到了贵族荣誉但仍留在商业中的人；在提高大规模商业企业的声望方面，也有一些具体的、并不完全失败的努力；而且法国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商业成就。但与英格兰和荷兰相比，法国企业家所受到的传统的限制更大，拥有的经验和创造性更小，自由的活动更少，受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约束更多，更希望停止企业利润方面的竞争，杰出的商人也太少。

法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就企业而言，法国政府比英格兰和荷兰承担了更积极、更明显的职能。这一因素在两个相关的水平上起着作用。第一，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企业家的衰弱以及私人风险资本的短缺，阻碍了其他更进步的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那种发展，或者是政府觉得必须更强大或更荣耀的那种发展，法国政府被迫参与了特殊企业模式的刺激和培育。最突出的例子是 17 世纪后半叶国家组建的贸易公司；最持续和普遍的例子是皇家制造业和特许制造业——那种直接在金钱上或间接在特权上接受政府的资本补贴的企业。【456】但法国王室和其大臣们被证明在一般的商人事务上远不如企业家做得好，在主动避免业务风险方面也远不如个人那么机敏。即便是在大规模企业持续存在并不断扩张的领域（比如在一些制造业中的情况），也是主要靠它们的特权地位和与之相伴的大量的税收来支撑。政府主动发挥作用的第二个结果是，法国的工业和经济管制看起来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严厉。表面上这些管制直接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经济发展，但实际上它们的目的本身从来就不是鼓励私人企业家。既得利益集团、建立商业或贸易协会、地方团体的利益——所有这些都阻碍了新企业的变革或老企业的扩展。此外，管制力量本身并不总是能知道什么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好的，而且管制措施经常因为财政的而不是工业的原因发生变动，其存在只不

过是把一个成本负担加在了经济和商人的头上。造成法国企业家官方性质的这两个主要因素，在柯尔贝尔这样的政治家手中还有一定贡献和作用，使某些事——虽然比他预期的要少得多——得以实现。但总的说来，法国的国家企业没有给企业家的局面带来多大的改观。

瑞典也是另一个国家企业的原型。从国内生产、经济结构以及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来看，瑞典经济在大多数时期显然是不发达的。尽管经历18世纪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瑞典仍然在许多重要方面落后于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瑞典相对落后的企业性质是与总体的经济形势相交织的，它既是经济形势的结果又是其原因——其主要伴生物是外国企业家在瑞典国内经济中所发挥的不可否认的、突出的作用。

在16世纪，用它的经济史学家的话来说①，瑞典还处于经济发展的中世纪水平。金钱还不是那么重要，还没有广泛地参与到欧洲经济之中，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其国王的位置，使得瑞典的私人企业家与中欧或西北欧的商人基本没什么可比性。而正是这些因素恰好有助于解释国家企业，更确【457】切地说是皇家企业为什么处于支配地位。古斯塔夫·瓦萨国王（1532～1560年）更适合被看成是瑞典经济的商业管理者，他对贸易基础商品的控制，以及他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在这一阶段都是合理的。在他的控制下，瑞典享受着统一和相对和平的快乐，但这是传统的庄园状态下的统一与和平。当古斯塔夫·瓦萨确实需要有见识的商人的帮助的时候——因为制铁工业的发展——他被迫转向了外国，主要是德国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

17世纪，瑞典更多的是参与了欧洲的政治事务，导致北欧逐渐卷入了宗教和王朝纷争。虽然瑞典在作为其他国家财富基础的大西洋和地中海贸易中很少发挥什么作用，但它在铁、铜、林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的扩张，标志着它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并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新关系。但即便如此，瑞典还是在企业家事务方面表现得特别的无能。虽然政府并没有放弃它对经济的兴趣（它保留着重要的工业管制体系，参与生产和出口的操作，努力通过外国商人来刺激发展），但实际上是外国企业家在基本的工业中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荷兰人、德国人、苏格兰人带着商业才能、技术专长和资本进入了支配着瑞典经济主动脉的那些有利可图的事务之中。直到18世纪，外国的影响才开始明显减退。这时，瑞典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经济从战争转向了和平，加之新的注意力集中到了

① 见E.F.赫克歇尔：《瑞典经济史》（剑桥，马萨诸塞州，1954年），第61～70页。

生活水平的改善上，标志着国内企业的春天到来了——在社会和知识方面，同时也在经济领域中。

对于理解现代早期阶段企业的某些方面，从研究企业的国家形态中得出的教训是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把国家视为一个集诸多因素于一身的经济单位，有助于决定企业家的性质。社会的压力、价值、信仰，个人的心理，经济机会，政治的约束或者帮助，国家财富——所有这些决定了商人能做什么。【458】这并不是说人是环境的无助的牺牲品：创造性的企业家总是能够打破环境的约束；木讷的商人总是抓不住机会；企业家才能最重要的部分是最终要依赖于个人的能力和干劲。但企业必须基本上适应（或者仅仅是缓慢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现实，如果不理解导致企业的出现的那些总的力量，就很难说明企业的模式。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是在于一般的而不是功能性的企业的话，这些力量的最好例证就在民族国家这个整体之中。

6.7 结　论

15~18世纪之间，经济企业的特征与现代的、工业化环境中的企业仅仅是有一些间接的类似之处。在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之前，极其分散的商人业务和他的环境的特殊性质，使得对企业家与经济增长、创新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任何广泛的分析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一个变化缓慢的环境中，企业的作用与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的作用同样的重要。在每一种情况下企业的活动都支撑着经济社会的构架。但在现代早期阶段，连续性和多样性的因素比创造性和专业化更明显。

现代已形成定论的是在所有商业资本家中，商人是最重要的，这已由这一阶段的经济史所证实。但商人并不只是专业地承担经济上的功能，他们的商业才能和资源遍及各种水平的经济活动。他们的商业技术的稳定性质以及他们活动的范围，反映了当时经济结构的主要面貌。而且，企业的来源和他们的表现形式同样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承担企业家职能的各种社会集团以及这些职能范围的多样性之外，企业家在国籍、社会和经济态度方面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前面对企业性质的检验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企业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459】题而设计的技术，大多来源于不发达经济中的风险。尽管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但环境似乎仍然是决定企业性质的基本因素。可以预见，在我们考察的

这个几乎没有经历过什么经济发展的阶段，企业的创新和自发性无疑就比后面的阶段显得更加重要。不完全的市场结构，分散的人口分布以及农村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缺乏有效的运输和通讯技术，流动资本的重要性及其稀缺，广泛的但不稳定的政府作用，所有这些都在决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绩效上有着实质性的意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似乎还是市场的规模、结构和不连续，这在塑造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绩效上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

虽然从结构和制度方面来看，现代早期阶段的经济是相对稳定的，但企业家的日常经济环境却是极端地不稳定，它们总是妨碍着企业家的预期。从企业方面来看，这种不稳定导致了强烈的分散化趋势，以及通过不正常的、个人的措施来保证连续性、降低风险。血缘、宗教、特殊社会集团的成员，这些关系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些技巧从来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企业家仅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控制他们的外部环境。更确切地说，现代早期阶段的商人是“冒险家”，因为那些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的风险比他们的后代所面临的风险要难以估算得多。

现代企业的演化可以视为这样一个过程：企业家在知识和物质方面加强了对环境的控制。欧洲企业的进步只是作为这些控制力量增长的产物，或者与其相辅相成。在前工业时期的欧洲，对经济进步的限制程度大致可以表明企业家的经济地位。简而言之，这个时代可以视为是一个为最终的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的时代。但无论是从企业家的重要性还是从这一阶段经济的总体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都是不能磨灭的，也不能以“资本主义”后期的标准来衡量前面所说的那些现象。资本主义——作为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种模式，或者作为关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假定——早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到18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它的技术和任务更加精练、在工业【460】事务中运用得更广泛，它成为了一种更有决定意义的模式。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尽管它还没有遍及整个社会，但它的基础已经存在了。研究现代早期阶段的企业，就是要检验现代资本主义的背景。这里的企业家的作用预示着他们在后一时期的基本功能。【461】

第七章

工业生产的组织

7.1 16世纪展望

1500年以后的欧洲经济形势最大的特征是，工业生产比自黑死病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增长迅速。人口的增加和向欧洲以外地区的拓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新的初级原料来源。16世纪商业的繁荣和社会变化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标准以及衡量舒适度的新标准，例如，奢华。上述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已有的欧洲工业以及催生了多少新的工业，是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

7.2 定　　义

“工业”（industry）一词有着多重含义，在本章中使用时有必要重新定义。这里的定义是：初级或半成品原料的发现以及它们在一定规模上的加工过程。这一规模的最低标准是，作为劳动者个人已经没有能力独立组织生产

并将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广泛涉及那些不仅仅在当地销售产品的行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着重考虑“工业”一词中的“本国”或“产出”阶段的含义。

7.3 分　　布

有许多因素造成了中世纪后期在欧洲特定区域内产业行为的发展。初级原料的充足供应——水、动力、燃料，以及最首要的因素——企业家阶层的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也是必要因素之一。一定地区内陆路和水路交通，政府、地方及市政当局的有关政策也对工业的分布及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洲蕴藏着多种矿产资源，几乎所有的金属矿产在当时都得到了勘探和开采。金矿主要分布在西里西亚、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卡林西亚和蒂罗尔。分布在哈尔茨、萨克森、波希米亚、蒂罗尔、斯洛伐克和波斯尼亚的银矿和铜矿则最为重要。16世纪后半叶，位于西班牙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的矿山被发现。铜矿的勘探在瑞典的弗伦（Falun）和挪威的勒罗斯（Röřås）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此外，在西班牙（Rio Tinto）和英格兰也发现了铜。作为黄铜业必不可少的炉甘石，在狄南统（Dinant）和亚琛之间的维尔勒（Vieille）山，以及伊泽罗姆（Iserlohn）和西里西亚均有发现。汞的开采主要在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波希米亚，而最大的汞矿坐落在伊德里亚（Idria)，在克伦恩（Crain）的哈普斯堡公国内和西班牙的阿尔马登（Almadén)。 [462]

铁资源的蕴藏极为丰富。作为沼泽铁矿，在西欧、中欧、东欧和北欧的许多沼泽地区均有发现。在西班牙北部、厄尔巴岛、法国中央高原（Massif）中部、杜法因（Dauphiné)、法德边界、中欧东部，包括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和乌拉尔、英格兰的部分地区、苏格兰和瑞典，铁矿则以褐铁矿的形式出现。

纺织工业的分布取决于牧羊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亚麻和大麻种植的分布情况。高水准的英格兰纺织业依赖于高质量的英格兰羊毛；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德国北部地区亚麻的种植形成了当地的亚麻织品，与北海沿岸的情况颇为相似，只是那里种植的是大麻。我们所说的“取决于”，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莱顿纺织工业的兴旺依赖的是原料从东西两方面的长距离

运输。哈勒姆（Haarlem）发达的漂白工业，主要是加工从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进口的粗布。

许多工业的扩张需要热量、水和动力。不管它们是否通过燃料、水和风来提供，上述资源的可获得性也会影响到工业的分布。

在一些开采和冶铁的地区，为工业目的而进行的森林砍伐量非常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面阻止进一步的破坏。木材供应紧缺的压力促进了煤炭勘探的发展，特别是在莱茵河区域、英格兰和荷兰南部地区。尽管在平原地区，特别是海岸附近，风车已成为水力的代用品，但当磨面成为一项独立的工业部门时，面粉加工厂通常会集中在山涧或河流边。

除了原料和动力供应以外，影响供应分布的第三项重要因素是可供使用的劳动力。最初，城市中的行会控制着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但随着“参股【463】制度”（*Verlagssystem*）的发展，开始允许商人资本家使用来自乡村的非熟练劳动力和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使用农业劳动力成本低廉，且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训之后有可能转为熟练的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富余劳动力在土地贫瘠地区更加充足。在那里，往往放牧牛羊而不是种植谷物，或土地的继承权在继承过程中容易出现中断。

最后，社会—经济因素也会影响工业的分布。在荷兰北部，地方贵族资助乡村纺织工业的发展以便同由行会控制的城市纺织业竞争。地方土地所有者的态度也会影响矿山的分布。在这个以及其他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拥有资本和企业的“商人主义”的思想在区域层次上影响工业分布的程度，与众所周知的政府政策影响的程度是不分伯仲的。

7.4 组　　织

1. 行会

在欧洲，许多工业的发展直接受到了其组织结构的影响。许多产品是在由师傅、他们的家庭、熟练工人、学徒组织起来的小手工业行会中生产出来的。绝大多数的行会集中在城市中，其生产组织严密，即使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也较为罕见。行会发展成员一般不会突破城市界限。于是，人们会看到，在英格兰，大多数城市以外的矿山和矿主都没有组织行会。然而，在列日，

由于矿山位于城市之中，情况便与前者完全相反。约克有 10 个制铁行会，而在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乡村的制钉工人中却一个行会也没有。17 世纪末期，伦敦的纺织工人已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在利兹（Leeds）周围，组织一个行会以控制毛纺织业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多少回应。

在英格兰，伦敦的行会或“公司”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仍然十分兴旺并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引导了城市当局的政策走向，并为城市管理者提供物质基础。尽管如此，权力和财富已不可避免地开始从行会向将取而代之的商人资本转移。行会出现了合并的趋势。1574 年，北安普敦（North Ampton）的 7 家行会合并为 1 家。在此一年后，其余的行会合并成 4 家大“公司”，而每个公司都包含了多种行业。1622 年，在诺里奇（Norwich），全城的贸易活动被组织在 12 家“大公司”之内。可以想像，这些合并起来的公司不能再像过去专业化的行会那样，严格控制技术和生产标准。但按照 1563 年【464】法案，它们仍然可以排除外来者和实行学徒制。

新兴行业的从业者并不包括在这一体系中，然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仍旧发展了过去的学徒制，有些甚至还获得了采用这一制度的特许权。伦敦的眼镜制造商、马车制造商和枪支制造商即是如此。在伊丽莎白时代及斯图亚特时代早期，还维持着对于“公司”的严格控制，但对于伦敦的新兴行业则获得特许组建公司，并且当这些公司足够强大的时候，便会得到皇家许可从现有公司中分立出来。专门出售进口毛毡的商人于 1604 年获得许可进行合并。钟表制造商和枪支制造商从铁匠中分立出来，锡制盘子制造商也从五金商中分立出来。这些年轻的公司在较大的范围内实现了垄断，其范围可以达到 7 ~ 10 英里，而过去的老公司一般只有 2 ~ 4 英里。

然而逐渐地，控制在不断弱化。为了帮助退伍的士兵找到工作，克伦威尔（Cromwell）暂缓了学徒制度。在伦敦，大范围解雇进一步削弱了学徒制度，国会给予自由人特权使其凌驾于那些到伦敦寻求重建家园的手艺人之上。到 18 世纪，一度强大的行会和公司制度只剩下了一些残余，这进一步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在法国，产业组织经历了一个极不寻常的过程。皇室于 1581 年、1597 年和 1763 年先后三次颁布法令，试图促进行会的社会化。柯尔贝尔的政策是，要在省属城镇和较为开放的农村中建立起类似于过去只存在于巴黎的“公司”。这样，所有的手工业者都会成为行会成员。上述计划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在一些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手工业者仍然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各

自工作。

柯尔贝尔死后，随着政府日益陷入债务重围，政府对行会的兴趣又恢复了，这当然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了能够从行会攫取更多的金钱，政府恢复了对行会的控制与监督。与此同时，皇室对于那些愿意出资购买独立地位的行会也会颁发许可证。与其他地方一样，法国行会的力量随着场外生产的建立而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在西班牙，天主教会的领主们也重组了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行会，并创立了卡斯蒂利亚的行会。16 世纪，一大批新的行会蓬勃兴起，其中绝大多数出现在后半叶。在布尔戈斯，1509～1589 年间，有 10 家行会获得批【465】准；在托莱多，行会拥有 6 项特权；在萨拉戈萨（Zaragoza）则为 7 项。同样的发展在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也可以见到。行会甚至出现在更小一些的城镇和乡村。在萨瓦德尔（Sabadell）的小城加泰罗（Catalan），羊毛编织者的人数之多，足以使他们于 1558 年建立起自己的行会。

最初，行会的行为与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然而，衰退的发生给行会的生存带来了困难。由于行会拒绝变化，进入 17 世纪后，便使自己走上了绝路。1678 年，卡拉坦德（Calataynd）的国会（Cortes）要求完全废除行会。但在许多地方，行会仍旧十分兴旺。在马德里，最大的 5 个行会（*Cinco Gremios Mayores*）就出现在 17 世纪，并且毫无疑问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整个 18 世纪，西班牙行会的数目仍然在增加，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带有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印记。此时，技术和经济上的进步均来自于行会以外的领域，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商人企业家。

在葡萄牙，行会担当了 16 世纪经济扩张的基础。行会向更为专业化的领域扩展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约翰三世（1521～1557 年）曾颁布过专门的法令，对行会的行为领域进行调节。

中世纪时期，尼德兰的手工业行会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然而，进入 16 世纪和 17 世纪以后，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大为减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几乎完全丧失。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大的港口城市，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行会的保护主义和封闭性被逐渐削弱。但在内陆地区，例如佐芬（Zupphen），行会的力量依旧很坚固。

在中欧，尤其在德国，相对于西欧而言，中世纪时期行会的根基更深，稳定性更强。这是因为在许多城市中，都拥有较高的政治自由度，在由皇室直接管辖的城市中更加如此。进入 17 世纪和 18 世纪以后，在一些由于产品细分所形成的新兴行业，以及基于对奢侈品的需求所形成的行业中仍然组织

行会。在其他行业中，则不再出现。在行会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这一影响也开始受到皇室法令的限制。最高统治者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它们被看做皇室所维护的“商人主义”的最大反对者。为了保护“自由技师”，行会受到了压制。18世纪，开明的统治者的思想倾向一般偏向于产业自由化。然而，与那一时期的许多希望一样，极少能够实现。由于政府管理的低效和政策的迟滞，行会还是能够得以生存。最后，当行会被扫除以后，其作用一般由国家的直接控制来代替。【466】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世纪行会体制的发展进程与欧洲大陆极为相近。随着社会变革，行会的危机到来了。变革运动的领导者将行会视为罗马天主教的支持者，并认为会从将行会财富“世俗化”的过程中获益。那些带有宗教特征的行会因此而消失。在丹麦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四世时代（1588～1645年），曾经试图废除行会制度，然而当他去世以后，行会又复活了。惟一的作用是促成了以后更加完备的体制的形成。

早在中世纪，在意大利的各个主要工业中心，产业组织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1500年以后，地方统治者利用他们手中不断增长的权力开始压制行会的权限，限制它们的垄断，降低它们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托斯卡纳、皮埃蒙特（Piedmont）以及在西班牙制度下的各国尤为严重。在这些国家中，行会即使能够生存下来，也必须为保护它们的权力而进行顽强的斗争。尽管如此，一些工艺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罗马（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经济的复苏，同时也造成了对现有行会与新产生的新兴公司的区别对待。16世纪，罗马建立了23个行会，17世纪为24个，从1700～1760年则为13个。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当新的行业（如印刷商、理发师、假发制造商）形成新的行会时，旧的工艺便开始衰退，它们的行会也被迫开始合并。

波兰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国模式的影响，即在各式各样的手工业中组建行会。与德国一样，它们努力将其影响扩大到围绕城市周围的广大乡村。少数特殊的行业例外，它们处在行会制度以外。从理论意义上说，这些行业通常作为皇室随员的面目出现，因而拥有国王授予的某种特权。行会要想与它们公开对立是十分困难的。尽管波兰国民会议（Sejm）在1538年和1552年两度通过法令压制行会，然而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仍有新的行会出现，只有为数不多的行会消失（其中多数在17世纪中期的动乱中）。

在波兰，很少出现限制师傅数目的封闭排外的行会。组织严密的面包

师、屠夫和制鞋商则是例外。他们掌握较高的技术标准，能够制造出区别于他人的“杰作”，并且只有他们的儿子或女婿才能掌握他们的技术诀窍。对这些行业而言，存在着更加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师傅们将自己的作坊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企业。

俄罗斯的手工业组织与西欧和中欧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几乎没有【467】什么管制，在城市中，可以自由地从事手工业生产。许多手工业者供职于庄园和修道院，许多技师都是在没有任何伙伴的情况下独立工作。除了金匠和银匠外，学徒一般为 5 年，但并未要求他们能够制造出杰作。通常，学徒在 1 ~ 2 年内便离开了师傅。在城市中，特别是在莫斯科，每一个行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不仅在面包师内部、鞣革匠内部和皮革工人内部如此，甚至在圣像印刷者内部也是如此。只有到了彼得大帝时期，作为沙皇西化计划的一项内容，才开始进行建立完全形式行会的尝试。

在东欧、南欧的某些特定区域，犹太手工业者进入了制造业并建立了行会。西班牙裔犹太人和德裔犹太人 17 世纪来到荷兰，他们被允许从事钻石切削、烟草处理、印染丝绸等工作，而其他行业的行会则拒绝接纳他们。只有在省属城市中，个别的犹太手工业者会被接纳进入行会。在汉堡、阿尔托纳（Altona）和其他德国城市中，犹太人被排除在行会之外。但到了丹麦古斯塔夫·克里斯蒂安（Glückstadt Christian）四世时，犹太人又被授权可以从事贸易和工业活动。

在意大利的罗马和威尼斯，建立有犹太人的手工业行会。独立的犹太工匠如盔甲制造者、金匠和银匠受雇于各个公国。最初，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只局限在陶瓷、玻璃制造和雕刻等领域。17 世纪时，一些犹太人进入了丝绸制造业，还有些犹太人开设了棉纺厂。在里沃纳，犹太人建立了丝绸、织布和造纸工业，开设了肥皂工厂，而最为重要的则是珊瑚加工工业。意大利也是希伯来图画的重要中心之一。然而，犹太人建立的行会（主要集中在裁缝、药剂师和面包师之中）似乎只在罗马有所出现。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15 世纪和 16 世纪期间，犹太人已经进入了多种行业。早期有关驱除犹太人的法令于 16 世纪后半叶被废除后，犹太人的处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然而，他们仍未取得建立行会的权力。1648 年的一项皇室法案为犹太人产业的进一步扩展铺平了道路。

在波兰和立陶宛，到 17 世纪初已有大约 30 万犹太人在那里居住。此时，在克拉科夫、勒瓦尔（Lwow）和普热梅希尔（Przemysl）出现了最早的犹太人行会。然而，直到 1650 年以后，犹太人社团中的手工业者才获得

土地。整个18世纪，犹太人行会的数目基本维持在数百个的水平，在克拉科夫、勒瓦尔、布罗德（Brody）、卢布林、波斯南（Posnan）、罗西诺（Loszno）、维尔纽斯（Vilna）及其他城市中，犹太人行会的数目一般只有几个，至多不超过10个。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有：皇室的保护、波兰上层社会对行会垄断性的反对，以及波兰社会中不同种族的大量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的存在。在上述国家中，犹太人填补了经济结构中的空白，不断增长的犹太人口本身就造就了颇具规模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基督徒的巨大需求也要由他们来满足。的确，部分手工业者侧重于满足犹太人的内部需求。而那些提供更为广泛物品的犹太人，则有较多的机会与贵族及其他需求奢侈品的人进行频繁的接触。无论在数目上还是在社会上，那些“萧条的工艺”（如服装的制作和维修），对犹太人而言都是主要重要的行业。对于贫困工匠的社会歧视，伴随着手工业行会中对于年长者的过度依赖，有时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碰撞。【468】

2. 场外生产体制

为了购买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原料并出售自己的产成品，手工业者需要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样，他将离不开商人的服务，因为商人控制着进行商品交换的庞大市场体系。商人们提供了粗纺羊毛、棉花、丝绸和金属，另一方面又将产成品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销售。通常，手工业者会部分地陷入对商人的依赖，不仅仅在于对商人所提供的原料的“场外生产”，而且还包括真正的信贷。通过以上途径，手工业者的境域能够有所改善。

“场外生产”制度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它真正的发展是随着出口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乡村工艺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16世纪“场外生产”（*Verlagssystem*）及其变种将许多行业中的工匠与资本家连接在一起，这种结合在采矿、冶金、铁器与木器制作、纺织、印刷和造纸部门中更为显著。离开相应的技术装置和亚麻及棉布碎屑的有组织的供给，要想造纸是不可能的。相对一个造纸工匠而言，一个商人更有条件来组织这些生产要素。对于印刷商极其工场而言，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在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采掘领域，在购买诸如抽水机、熔炼炉及其他必不可少的技术设备时，规模较小的工场常常会陷入负债之中。此刻，商人的帮助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显而易见，这种场外生产在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购买行为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更容易形成。

场外生产中的客体既包括行会中的手工业者，也包括那些自由劳动力。通常，产品的粗加工在农村完成，而最终变成产成品则是在城市中。于是，【469】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东部，场外生产发展到了纵深地区的广大农业人口之中，甚至远在爱尔兰乡村中的纺纱工也被纳入了这一制度内。羊毛或棉花的梳理由行会成员完成，然后织布工将纺好的纱锭带回自己的家中去织布，其工资则按件计算。织好的布被送到企业家的工场中，并在那里完成销售。织布工自己去销售布匹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这一过程通常由被称为“布商”的人来完成。甚至在织布工和布商之间，通常还存在着一个中间人来通过信贷，这种情况在伦敦尤为普遍。在约克郡，织布工一般将生产过程中除纺纱和印染以外的各环节带回自己家里完成。

索林根（Solingen）的金属兵器制造业中，铸剑、回火和打磨是主要的生产过程。然而，只有里德人（*Reider*）被允许出售产品，或带着其商品旅行。同样道理，刀头和刀柄的制作是刀具生产的两个主要环节，然而刀具最终只能由刀具商生产出来，后者也由此变成了企业家。在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小五金行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为了与企业家相抗衡，零散的手工业者组织在一起的情况是极不寻常的。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其后果则是要面临长期的压制。伦敦的毡帽制作者为了摆脱服装商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购买羊毛和销售帽子。然而，数年后，这一冒险活动却以失败而告终。每当行会试图反抗企业家时，后者通常会雇用那些没有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在乡村手工业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在各地的纺织工业中，企业家会因为有农民从事纺纱而从中受益。相对于城市行会中的手工业者而言，农民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在那些行会控制不严格或根本不存在什么控制的地区，例如在胡德斯库特（Hondschoote）、亚美尼亚（Armentières）和韦尔维耶（Verviers）等地，场外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对产业布局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些地方，佛兰德纺织业从城镇拓展到围绕其周围的广大乡村，粗布的生产主要在那里进行。在英格兰的毛纺业和意大利的丝绸工业中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形。

3. 工厂

当生产过程需要专有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时，企业家便有可能将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集中在一个屋檐下来进行，于是便创造了工厂。这种趋势早在中

世纪时期的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就出现过萌芽，进入1500年以后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6世纪初期英格兰人约翰·温斯考比（John Winchcombe）在纽贝里（Newbury）建立的工厂，（据说）在那里雇用了200名妇女梳理羊毛，150名儿童分拣，200名女童纺纱，200名工人织布，200名男童转动织机的转轴，80名工人梳理产品，50名工人整理，40名工人干燥，20名工人漂洗。 [470]

像这样的生产集中在当时还只是个别的，行会的传统和政府政策对工厂这一新兴的组织形式均持不欢迎的立场。直到1750年以后，它才慢慢地成长起来，而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协调生产进程中各个环节的进度。最初，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在遍布英格兰、尼德兰、法国、加泰罗尼亚、德国、意大利北部和东欧等地的纺织工业领域，但各地所采用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从17世纪到18世纪初，最大的工厂几乎都有柯尔贝尔的支持。由冯·罗贝斯（van Robais）在阿布维利（Abbévill）建立的精纺工厂中，有数千名男女工人在那里做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居住在由“围墙和水沟”包围着的集体宿舍中。纺纱过程也包括在工厂之内。织布则在同一城市的其他类似的厂房内进行，每一座厂房内都有30名以上的工人一起工作，他们的劳动也受到技术的监督。然而，在17世纪，要想找到拥有120台织机的丝绸工厂还是十分困难的。

通常，工人们往往被集中在孤儿院、贫民院或感化院中做工。新教徒的伦理和当时的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如下的观念：未就业者应当被安排从事有益的工作。在汉堡、柏林和哥本哈根，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被称为“工厂”的社会福利机构。

纺织工业中的一些工艺流程显然明显地适合工厂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以棉纺厂为例，17世纪末出现在英格兰和荷兰，之后迅速扩展到了瑞士、奥格斯堡和萨克森。与此相类似，在兰斯（Reims）的一家创立于1665年的花边编织厂，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雇用了120名女工。1729年，莫斯科的一家帆布工厂雇工人数达1 162人。工厂制度并不仅仅局限在纺织工业中，在其他许多领域，均可以找到这种制度，如进入18世纪后的冶金、烟草及瓷器制造业等。1700年以后，工厂化生产逐步扩大到了其他工业领域。

4. 大规模生产孕育出采用先进技术的工厂

工厂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劳动力的集中。在许多特定部门内部，如在冶金

和矿业部门内，劳动力的集中与先进技术装置（如抽水机、熔炼炉和机器等）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于是出现了16世纪时，千余名工人在诺伊索尔【471】［在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a Bystrica）地区］铜矿做工，而在蒂罗尔的银矿，雇工人数高达7 000人。1642年，凯斯维辛的采矿和冶炼业中还雇用了大量的外国劳动力。根据奈夫（Nef）所做统计，1700年半数左右的英格兰煤矿的雇工人数在100人以上，有些矿的雇工人数甚至多达500～1 000人。

为了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企业家波尔海姆（Polhem）在瑞典的斯提尔森德（Stiernsund）建立了一家大型工厂。这里，“机器设备的使用减少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数量和强度”。波尔海姆在伯尔顿（Boulton）和韦奇伍德（Wedgwood）的工厂，成为了后来发生的引人注目变化的先兆。在这里，“机器切割铁棒、切割铁条，将铁块轧制成薄板，切割齿轮，制作铁盘、锡器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品，制作农具和钟表配件。”① 相应的技术装置也应用在造船、食糖精炼、酒的蒸馏以及制造肥皂、盐、啤酒、纸张、火药和玻璃等产业部门。法国皇家平板玻璃公司最初只有约两百名工人，到18世纪中期，它已发展成为拥有千余名工人的大型工厂。

7.5 技术进步

1. 采矿和冶金

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冶金技术并没有取得多少引人注目的新进展（西班牙利用汞合金来改进传统的银提取工艺，或许可以看做是一个例外）。然而，商业化的发展、资本金企业的兴起以及印刷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地促进了技术成果的广泛传播。1650年以后，知识阶层开始对手工业者的实践经验产生了兴趣，尽管事实上科学理论在1700年以前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最早的有关冶金工艺的综合性手册是波林古驰（Vanoccio Biringuccio）的《冶金学》，该书于1540年出版发行。书中有关采矿和冶炼的描述，很

① 赫伯特·希顿（Herbert Heaton）：《欧洲经济史》（纽约，1948年），第350页。

快被1556年出版的乔治斯·艾格瑞考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61年）的《冶金学》所超越。在此后的几代人中，它一直被视为有关采矿和冶炼的基本手册。对艾格瑞考拉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拉扎勒斯·艾里克（Lazarus Ercker）的著作《冶金》，该书出版于1574年。书中描述了金属矿产与矿物的基本形态，而书中具有特别意义的部分是有关矿石品位化验方面所作的定义，因为这些定义均来自于作者本人在波希米亚的工作实践。然而，实际上在列氏（Réaumur）完成从铁到钢的实验（1722年）和斯克鲁特（Schlüter）的冶金手册出版（1738年）之前，冶炼领域中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并不多。【472】

在采矿及矿石运输过程中，机械的引进是最有意义的进步。闪烁炉的运用增加了，出现于15世纪末的采矿用的巷道和竖井，此刻也有了较大改进。起重机和升降机被用来提升矿石和水，人们已开始运用水作为动力来推动抽水机。大约在1550年前后，在约阿西姆斯泰勒尔、施瓦茨（Schwaz）和蒂罗尔的凯茨布赫尔（Kitzbühel），以水为动力的抽水机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竖井的开凿也创下了886米的记录。对采矿竖井、起重机、通风设备及其他水力装置的需求加快了矿山的机械化进程，同时也明显地提供了矿山的产量。在德国，那些由大的商人资本，以及得到拥有矿区的王公贵族授权的资本投资的矿山中，也采用了几乎同样的改进措施。

在英格兰，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引发了对炼钢过程中以煤替代木材的新技术的探索。17世纪，人们找到了几种方法，但效率却并不令人满意。直到18世纪初，才真正获得了成功。

1550年纽伦堡的汉斯·罗宾塞格（Hans Lobsinger）发明了木制风箱，由于它能够使大型熔炼炉的温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上升，因而很快就取代了传统的皮制鼓风设施。水轮机也被运用于冲压设备、水磨及金属拉伸。然而，直到1750年，优质的金属薄板还不能生产出来。

钢材生产的最初动因是矿石数量的减少。波林古驰描述了钢是怎样简单地通过铁的碳化和非碳化过程而生产出来的。在罗伯特·普罗特（Plot，Robert）的著作《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自然史》（1686年）中，给出了生产粗钢时铁与木炭混合的比例。1675年，罗伯特·虎克（Hooks，Robert）在其日记中记录了运用模具熔铸钢材。两年以后，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将自己的铸钢与德姆塞驰（Damascus）钢进行了对比。直到1740年以后，由汉茨曼（Huntsman）的生产开始，这种类型的钢才取得了商业意义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中世纪，人们便知晓了运用添加炭的特殊工艺从金属铜中制取黄铜的方法。波林古驰和埃立克（Ercker）都记录了怎样制造黄铜和青铜，并着重介绍了如何铸造火炮。萨沃特（Savot）第一次揭示了如何通过向铜中添加锌来制造黄铜的工艺流程。15 世纪初，纽伦堡的专家和克拉科夫的约翰·瑟泽（Johann Thurzo），先后开发了通过液化手段混合铜和铅生产合金的新工艺。这些进步对欧洲白银和铜的生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锡与锡的合金被镀在铜及铁的表面，也可以作为焊料及白蜡制品。铋的发现在 16 世纪下半叶。最初，印刷字模使用的是与白蜡相类似的金属，后来被更加坚硬也更加廉价的铅锑合金字模所替代。

【473】

铅还可以应用于建筑，尤其在玻璃窗的着色方面。最初，铅是通过铸造生产出来，后来改为碾轧。对用于房顶的薄板的需求在不断扩大，最初薄板是铸造出来的，后来改为碾轧。德考斯（De Caus）在 1651 年注意到，无论是以人力为动力的手工碾轧机，还是以水力或畜力为动力的大型碾轧机，在整个 17 世纪中均有了较快发展，这一趋势在英格兰尤为显著。

熔炼炉既可以用来减少矿石，也可以为制取合金或铸造目的而熔炼金属。用闪烁炉代替开放式炉床的缓慢进程从 14 世纪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到 1700 年，熔炼炉的容量比 16 世纪中期相比平均扩大了 1 倍。

煤炭在冶金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冶金工业的发展，它同时也促进了煤炭行业自身的发展。1612 年和 1613 年，西蒙·斯特蒂温特（Simon Sturtervant）和约翰·罗韦佐（John Rovenzon）发表多篇论文，设计了以煤炭为燃料的熔炼炉。然而，他们的发明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但几乎与此同时，在玻璃制造业中，煤炭成功地取代了木材，伦敦的白蜡商也开始以煤炭为燃料。根据 J. U. 奈夫的说法，从煤炭制取焦炭的方法（即如何清除物质内部所包含的不纯成分）最早发现于内战期间在德比郡为酿酒而干燥麦芽的实践。使用这种经过利用焦炭干燥过的麦芽酿制的啤酒，其口感更甜更纯。其结果（已被证明）使德比郡啤酒一跃成为著名品牌。但这一效应在其他工业领域中的反响却极为缓慢。到 17 世纪末，在冶炼铅矿以及后来的锡矿和铜矿的发射炉中，才开始用焦炭取代木炭。1709 年，在萨罗普郡（Shropshire）的布鲁塞利（Broseley），焦炭被首次成功地运用于冶铁。这一方法一直使用到 1784 年，直到亨利·考特（Henry Cort）发明了他的通过“搅拌”从生铁中冶铁的新方法为止。

矿井的排水是一个严肃的技术问题。15 世纪末、16 世纪初，当白银从含银的铜矿中被发现以后，人类的采矿活动空前高涨，在中欧更是如此。在

这里用来从竖井中向外排水的动力来自于畜力和水力。由于欧洲的银价较高，特别是在美洲的银矿发现之前的时期里，在采矿时即使使用价格昂贵的机械设备也是有利可图的。相反，这些设备却不适用于煤矿，显而易见成本太高了。这也促使人们寻找更为廉价的排水方式，并最终在蒸汽动力上找到了解决办法。纽卡门（Newcomen）的发明，使第一台蒸汽动力设施于1712年在斯塔福德郡投入使用。以此为起点，它的使用扩展到了英格兰、爱尔兰和欧洲大陆。【474】

新的运输手段同样促进了矿业的发展。16世纪，在哈尔茨铺设了木制轨道运输铜矿石。德国的矿产商将这一技术带到了英格兰。1598～1606年间，同样的轨道将位于沃伦顿（Wollaton，靠近诺丁汉）的煤矿与特伦特（Trent）河连接起来。此外，还铺设了连接布鲁塞利（Brosely）煤矿与塞尔文（Severn）的线路。空的煤车由马匹牵引沿着轨道回到煤矿。直到18世纪，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还都在使用马拉的"铁路"将煤炭运至河流或港口。

2. 风车

在沿海风力条件允许的地方一般都使用风车。带有塔楼样式的古老的风车来自于地中海地区。风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柱状风车，其特别之处是在内部有一个能够活动的木制升降机。这种风车，中世纪时期在北海沿岸的平原地区就已开始使用。15世纪末，在一些低地国家，出现了塔楼的顶部可以转动的风车。阿古斯迪诺·瑞莫利（Agostino Ramelli）在其著作《各种机器的设计》（*Le divers et artificiose machine*，1558年）中，画出了这种风车详细的机械图。至此，风车开始遍布荷兰各地。风车的功率也从10马力扩大到30马力，在总动力中的比重也从20%上升到40%。冶金工艺的发展使铸造铁制齿轮成为可能。1745年，埃德蒙德·李（Edmund Lee）设计出了自动"扇叶"。第一家使用风力的锯木厂由科尼利厄斯（Cornelius）于1592年建于荷兰。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这种装有5片或更多扇叶由风力驱动的锯一直使用了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中期被斯堪的纳维亚的由水力驱动的锯所取代为止。在荷兰的许多行业中都使用过风车，其中在赞河边的造船厂中的锯木材最为典型，在那里曾经有900架风车同时工作。

3. 工具

这一时期农民与手工业者所使用的绝大多数工具是由乡村的木匠或铁匠制作的。而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则一般都出现在城市中，它们逐渐演变为工具制造的中心。这些城市包括英格兰的谢非尔德、法国的梯也尔（Thiers）、德国的索林根和纽伦堡。1700年以后，随着钢材变成一种极为普通的金属，金属工具的使用日趋普及。随着社会专业化生产的发展［1568年，画家乔[475]西特安曼（Joost Ammann）画出了他那时期的90种行业，迪德罗特（Diderot）描述了法国250种不同的行业］，单个工匠所使用的工具数目也相应地增加了。与之相对应，绝大多数农具依然保持着传统方式，改进和发明极为缓慢。

4. 纺织业

纺织行业出现了一系列的创新。为使清洗过的羊毛易于梳理，约翰·凯伊发明了整理羊毛的机器（1733年）。在中世纪时期，在梳理羊毛时，就已经出现了专用的手梳，但为了提高产出水平，梳子开始变大，人工梳理也被装有梳理棒的专门机器所替代。1748年，莱明斯特（Leominster）的丹尼尔·伯恩（Bourn）为一种以旋转方式工作的梳毛机申请了专利。这种机器带有一个圆筒，筒外覆盖着毛刷，它既可以人工驱动，也可以用水力驱动。同年，刘易斯·保罗设计了方形梳毛机，同时还设计了带滚筒的梳毛机。此后所有的滚筒式梳毛机都是以伯恩（Bourn，Daniel）的设计为蓝本的。

最先进的压榨亚麻的方法出自荷兰，并在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17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发明家制成了亚麻梳理机。1772年，苏格兰人大卫·唐纳德发明了以水力推动的亚麻压榨机。一年后，受在荷兰参观时的见闻所启发，詹姆斯·斯伯尔丁（James Spalding）发明了另一台机器。

与此同时，用于击打的机器也被发明出来。为了防止损伤纤维，大约在1735年前后，荷兰的一些工厂中使用了一种更为精细的磨具。18世纪初，在荷兰和英格兰已开始使用带有长的铁齿的刷子，这样，植物纤维能够得到有效的梳理。1721年，亨利·布朗（Henry Browne）发明的一种大麻压榨机获得了专利。

在纺纱环节，经线方面仍然在使用纱锭，而此时更为先进的纺机已开始

使用。

飞轮的发明大约在1480年。16世纪初，飞轮与踏板装置被结合在一起。1524年，格莱肯敦·柏伯尔（Glockendon Bible）详尽阐述了脚踏板的工作原理。而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的毛线业行会却在1527年做出决定，禁止使用这一发明。不伦瑞克（Brunswick）石匠出身的技师朱根（Jurgen）于1530年进行了某些改进之后，由踏板驱动的飞轮便（以不同的形式）传遍了整个欧洲。凯伊于1733年发明了飞梭。在约翰·瓦特（发明的最后完成者）的协助下，伯明翰的刘易斯·保尔以一个“使用多组转滚的滚压系统”获得了专利。1741年，保尔的机器在伯明翰投入使用，当时是用两头驴来驱动。1743年，在北安普顿（Northampton），同样的机器则由水轮机来驱动。 [476]

在织布环节，老式的织机正让位于正在兴起的框架织机和脚踏织机。最初在东方用于织造丝绸的推拉式织机，中世纪时期在意大利的丝绸工业中心也有所使用，并从那里传播到法国。法国人加兰特·布兰克（Galantier Blacho）和英格兰人约瑟夫·梅森（Joseph Mason）都对其进行了改进。在法国，那些落伍的织机也得到了改进。里昂的织布工柯兰德·丹根（Clande Dangon），于17世纪初发明了杠杆推拉织机，这一改进将编织宽度从800线提高到2 400线。1725年巴赛尔·布韦肯（Basile Bouchon）发明了不需要人工的自动推拉织机；3年后，凡尔肯（Falcon）又对其进行改进。上述这些织机或许还算不上成功，但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理论在以后出现的多梭织机上则得到了有效的运用。

一些发明为在16世纪已显露雏形的自动织机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基础。据说，但泽的安顿·莫勒（Anton Möller）曾于1586年做过这类发明，但他没有将其成果投入使用。1620年，动力织机的出现使莱顿的纺织界深感不安。1623年以及其后的法令明确禁止它的使用。机械的和半机械的织带机从荷兰和瑞士传遍到其他地区。这种框架织机或者叫做荷兰织机的新机器可以同时编织4~6条带子。之后，这个数目又增加到12条、24条以至更多。旋转织机，又叫新荷兰织机，可以同时编织24条带子。在德国，在许多城市中均命令禁止使用这种织机。然而在多伊茨、穆尔海姆（Mülheim）、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巴门（Barmen）和罗德姆伍德（Radevormwald）等地都建立了织带厂。1685年，皇室颁布法令在全境范围内禁止所有“简化织机”的使用。1719年，应奥格斯堡地方势力的强烈要求，这一法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730年，巴塞尔的汉斯·赫梅尔（Hans Hummel）发

明了以水为动力驱动织带机的新方法，然而他也被禁止在工作中使用这一新的发明。对自动织机的开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贝里（Bury）的约翰·凯伊（John Kay）于1733年发明并获得专利的飞梭。使用这种飞梭编织的布幅更宽，速度和产量也更高。尽管如此，织布自动化的日子还远没有到来。

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脚踏漂洗法也被机器洗涤所取代。1607年，第一架漂洗设施出现在意大利。18世纪初，在德国和法国使用水轮驱动，在荷兰则用风车，其他的地方一般用畜力或人力。15世纪时，从布面上拉起绒毛的机器已经出现。1551年，英格兰的有关法令禁止了这种机器的使【477】用。但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直到17世纪末，这种设备一直都在使用。在剪羊毛环节，马镫状夹子一直使用到17世纪末，直到被反复运动的杠杆代替为止。1495年，英格兰开始禁止剪毛机的使用。以后一直到18世纪末，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8世纪初，漂白大麻和亚麻制品的各种先进技术在荷兰都得以运用。整个生产过程（从浸湿、洗涤到烘干）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在酸解过程中，以往使用的是乳酪中的乳酸，从1756年开始以稀释以后的硫酸所代替。这一发明将漂白的过程缩短了一半。爱丁堡的弗朗西斯·胡姆（Francis Home）最早引进了这一技术，洗涤过程中的脚踏环节成为了历史。在柯尔贝尔时期，巴黎的纺织业中已经开始用机器压光。

其他一些技术创新也促进了欧洲纺织工业的发展。佛罗伦萨的工人于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完善了彩缎和锦缎的织造工艺。在英格兰，伊丽莎白的牧师威廉·李（Lee，William）设计了第一架框架编织机。然而他的发明在本国并未获得多少支持，最后他寻求到了法国亨利四世的资助。实际上，由于手工编织者的强烈反对，机器编织在整个17世纪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在英格兰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纺织业迅速发展，而机器的使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不再受国界的限制。通过移民、抄袭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发明和创新被广泛地传遍和使用。

7.6 投资成本与金融

要建立一家工厂，资本是必不可少的要素。需要建设厂房、熔炼炉、锻铁炉等设施，需要购买原料，需要支付工人工资。以单个工匠为例，他在自

己的家中开辟出车间，通常雇用1～2个同伙，带数目相同的学徒。如果这是典型代表的化，无疑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最初的工匠变成了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想方设法筹建资本以扩大企业的规模。

在采矿和大型冶金企业中，对资本存在着特别强烈的需求。从15世纪末开始，开矿的成本稳步地提高了。1495年，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和约翰·瑟佐（Johann Thurzo）以每年3 000金弗罗林的租金，租下了位于斯洛伐克的诺伊索尔（Neusohl）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a Bystrica）地区的矿山。随着运营成本（*Bergwerksverlag*）的不断加大，矿主（*Gewerken*）被迫向商人们寻求经济上的帮助。16世纪初，一台熔炼炉的预算为500弗罗林，到1525年已经上升到2 000弗罗林。成本主要受王公贵族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的影响。这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商业资本的集中，因为只有它们才能负担得起王公贵族们所希望的报价。1557年，奥格斯堡的曼里克（Manlich）预付了30万弗罗林的定金向曼斯菲尔德（Mansfeld）伯爵租下了一片矿山。 [478]

特别的成本支出还用于 *Saigerhütten* 的建设。一项年产7 000森特（合50公斤）铜的计划就包括了"8 Schmelzöfen，10Saigeröfen，3 Garherden，3 Treibherden 和2 Dörröfen"。[1] 胡特·卢登伯格（Hütte Leutenberg）工厂的建设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耗资3 000弗罗林以上。相反，胡登·斯克瓦扎（Hütten Schwarza）和曼斯菲尔德公司在1472年已经拥有6 000弗罗林，足够满足开办企业的资本需求。1502年，阿恩斯塔特（Arnstadt）公司拥有31 500弗罗林。1554年，斯泰纳克·盖塞尔卡夫特（Steinacher Gesellschaft）公司的资本额已高达236 000弗罗林。

在纺织业中，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投资成本也大大地提高了。15世纪，美第奇（Medicis）所拥有的两家羊毛工厂（*botteghe di lana*）和一家生丝加工厂（*bottega di seta*），这些企业都独立运作。在场外生产制度下，企业的资本额在4 000弗罗林到6 000弗罗林之间。1579年，莱比锡最富有的商人亨利·克拉默（Henry Cramer）借助从尼德兰来的有关专家的帮助，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工厂，他还有一个合伙人莫兹维兹（Meuselwitz）。该厂拥有"eine walkmühle，ein Wirkhaus，eine Färberei 和 eine Wohnkolonie"[2] 由瓦尔提斯（Viatis）和佩尔勒（Peller）于17世纪初建于

---

① 斯特瑞德（J. Strieder）：《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历史研究》（慕尼黑—莱比锡，1925年），第47页。

② 弗伯格（Forberger）：《萨克森的手工业制造者》，第20页。

纽伦堡的德国最大的亚麻制品厂，其资本额高达100万弗罗林。通过场外生产制度，该厂雇用了2 000名织布工及它们的盖塞伦（*Gesellen*）和设备。1710年，冯·罗贝斯（Robais）在阿布维利的工厂里已拥有100台织机，资产额500万里弗（livres）。若干年后，伍德斯坦因（Waldstein）伯爵在奥伯鲁恩斯多夫特（Oberleutensdorf）建立了有10台织机的工厂。全部设备价值5 000弗罗林，每台织机价值20弗罗林，一个纺纱轮37弗罗林，一台羊毛碾轧机170弗罗林，一台金属碾轧机250弗罗林。① 最后两个例子来自于英格兰。1760年前后，汉贝里·杜鲁门（Truman，Hanbury）和巴克斯顿·杜鲁门（Truman，Buxton）合伙开设的斯皮菲尔德（Spitalfield）酿酒厂投资成本为130 000英镑，其中70 000英镑为待偿还债务，24 000英镑为储存的原材料，如酒桶、大麦、酒花和啤酒等，建筑物、工具及公用马匹的租金为30 000英镑。

【479】 在那些经济活动仍以场外生产制度为基础的地方，使用先进技术的成本则相对较低。成本的核心内容不仅仅包括办公室和仓库，影响成本的因素还包括原材料及产成品的存货、从生产开始到获取收益之间的时滞等多方面内容。

企业家如何才能找到投资活动所必需的资本呢？在矿业和冶金（*Saigerhütten*）的例子中，大商人的联合（*Verlag*）是一个解决办法。通常，实业家会与商人合作组建一家公司。美第奇（Medici）便是这么做的。在18世纪的法国，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巴伐利亚人的经历表明，在早期的工厂中，只有1/3的企业家是由原来的工匠或熟练工人演化而来。一般情况下，企业是在有了一场好的婚姻、继承了大笔遗产或找到了投资合伙人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反，在东欧人们的思想要活跃得多。在巴伐利亚，大多数工厂是通过联合建立起来的。而在萨克森，则是纺织商自己建立了工厂。当重商主义占上风时，政府的帮助（通过津贴、奖金和贷款等方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私人借贷不仅来自于商人资本家，而且还来自于社会慈善机构。瑞典的福利机构（*jernkontoret*）不仅通过贷款人（*brukspatroner*）控制生产，而且还随时随地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贷款。

① 弗路德伯格（Freudenberger）：《伍德斯泰因的羊毛工厂》，第381页。

7.7　政府的作用

1500～1700年间的经济政策深受重商主义理论和主张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国家中，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法国的重商主义与中欧和东欧的重商主义就有所不同。系统化的重商主义理论在法国的出现比其他国家要早得多。

在英格兰，都铎以及更早的斯图亚特时期的政策，倾向于建立和发展奢侈品及带有军事特征的产业，如上等纸张、丝绸、玻璃、帆布和枪药等。随着一系列鼓励本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政策法令的颁布，羊毛的出口受到了限制。到詹姆士一世时，则完全被禁止。苏格兰没有采取控制出口的措施，但它跟在英格兰后面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纺织业。1681年，苏格兰也开始禁止毛线及未经漂洗的布匹的出口，同时禁止羊毛制品和其他纺织品的进口。同年，享有政府授权的毛纺厂（Newmills）在爱丁堡西部的哈丁顿（Haddington）建立。1683～1704年间，又有8家类似的工厂紧随其后。而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1707年）的后果之一便是苏格兰的企业无力参与竞争，毛纺厂（Newmills）和其他工厂都被赶进了死胡同。【480】

直到17世纪末，英格兰一直在出口半成品的布。所有的贸易都是在有关法令的委托下，由一家名为"商业冒险家"的公司垄断进行的。在詹姆士一世的支持下，奥尔德曼·科凯恩（Alderman Cokayne）提出了一项动议，禁止"白"布的出口。这样，失业人口会有所下降，而出口染色的成品布又会使英格兰在贸易中的所得大幅度提高。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实质上则是为个人捞取好处。然而，改善出口结构的前提条件——必要的生产技术，在当时的英格兰并不掌握。相反，由于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荷兰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性措施。科凯恩（Cokayne）雄心勃勃的计划不得不终止，而由此所产生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等灾难性后果却一直持续了若干年。

在拉弗玛斯（Barthélemy de Laffemas）的影响下，亨利四世王朝迈出了加快法国工业发展的第一步。柯尔贝尔继续了这一进程并使之系统化。为了规范经济行为，他于1664年重新修订了6年前由拉弗玛斯制定的《对商业的建议》（*Conseil de Commerce*），其中不仅涉及贸易问题，而且也涉及技术、创新和工厂。1669年，贝林泽尼（Bellinzani）被任命为法国工厂的总监察官。

所有的法国企业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家的资助。国家本身也开办了一

些企业，如巴黎和博韦（Beauvais）的毛毡厂以及布雷斯特（Brest）、土伦（Toulon）和罗彻福德（Rochefort）的兵工厂。其他一些企业则被授权在其成品上标注“陛下军需”的字样。国外的专家被不断引进：意大利人制造镜子、花边和其他奢侈品；采矿、建筑和制砖的专家来自瑞典和德国；纺织专家来自荷兰，如冯·罗贝斯（Robais）。为了防止本国技术专家的流失，法国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措施。1682年，那些试图移居国外的人有可能为其选择而丧命。

柯尔贝尔也曾试图刺激法国企业的发展进程。1665年，他将两名织布技师从巴黎派往博格斯（Bourges），以改进那里的织布工艺。由于地方监督官的不懈努力，在普瓦捷（Poitiers）建立了一家织袜厂及一家绒线制帽厂，在凯泰尔劳尔特（Chatellerault）建立了皮件厂。另外的一些工厂则建在医院中，如在波尔多，那里的工厂生产袜子、梳理羊毛、生产花边。部分兵营也变成了工厂。工【481】厂中的工人可以免交租税，也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省级和市镇的社会机构也被要求向工厂提供帮助，工厂可以获得在特定区域内的垄断经营权。柯尔贝尔死后，这些政策便不再坚持。1685年，南特令完全废止了这些政策，这使法国工业受到了很大伤害。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提供了某些支持，特别是在1750年以后，国家通过授权、奖励等措施来资助私人企业的发展。

波旁（Bourbon）王朝在西班牙建立后，仿照法国的做法，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发展。第一批措施出台于1717～1719年间。与法国和英格兰一样，皇室也颁布法令禁止产自亚洲的丝绸及其他纺织品的进口。同时，也禁止成品布的进口。法令还规定减少军事设备制造中对国内产品的使用。18世纪20年代后期，又有一些新的保护措施出台。1726年，政府又下令所有的西班牙人应当只穿着产自本国的丝绸或布匹。1742年10月，对棉纺制品的进口禁令被撤销，然而在巴塞罗那生产商的强烈要求下，有关禁令于第二年的12月份又被恢复。在西班牙，最有意思的创造是“皇家工厂”，它是皇室财产与贵族资产合作的产物。与法国一样，许多工厂的产品明显地带有奢侈品的特征，这些产品被用来装饰马德里的皇宫，如位于马德里的围幔制造厂和位于艾尔德凡索（Ildefonso）的水晶加工厂。另一类企业的作用是对面临破产的私人企业［如位于穆尔西亚（Murcia）的丝绸厂和位于伊茨凯瑞（Ezcaray）的织布厂］提供必要的支持。还有一类企业则是为了满足国家在军事方面的需要。对于那些在技术上日趋落伍的企业［如位于塔拉维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的丝绸厂，以及古德拉加拉（Guadalajara）、圣菲尔南多（San. Fernando）、

布瑞辉伽（Brihuega）及拉格瑞纳（La Granja）等织布厂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鼓励性措施。

政府重商主义政策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若干特许公司，其中有些是为了进行海外贸易而设立，有些则是为了促进工业生产。1746 年，国家投资2 100万里尔（*reales*）[1]，在艾斯瑞玛杜拉（Estremadura）设立了扎拉的迈尔（*Zarza la Mayor*）公司，专门生产出口葡萄牙的羊毛及丝绸制品。一年后，即 1746 年，在格兰纳达和塞维利亚设立了专门向美洲出口的丝绸制品厂。不久，这家公司陷入了困境，并与扎拉的迈尔（*Zarza la Mayor*）公司一道并入了艾斯瑞玛杜拉（*Estremadura*）公司。此后不久，后者又与创立于 1748 年的托莱多商业和布匹公司合并。然而，时隔不久，这一巨大公司便发现自己也有些自身难保了。【482】

与此同时，那些马德里的重要行会，包括最大的 5 家行会都在从事对美洲的贸易，并积极促进出口产业的发展。1748 年，布商行会为促进西班牙布匹生产而建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主要在卡迪斯）趋于合作的首次尝试，其目标是在对美洲贸易中取得一个立足点。

16 世纪以来，德国的君主制定了引人注目的积极的工业政策，这些政策既应用于各独立领地也应用于皇帝直接管辖的城市。在乔治公爵及后来的选帝侯奥古斯塔斯（Augustus）的全力支持下，萨克森的采矿和冶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哈尔茨，则应当感谢不伦瑞克—沃尔夫布特尔（Wolfenbüttel）的朱利叶斯（Julius）公爵的鼎力支持。在德国南部，弗雷德里克公爵是一位典型的贵族商人，他在乌拉奇（Urach）设立了亚麻制品厂，在卡尔夫（Calw）设立了印染厂。外来移民为法兰克福、汉堡等城市带来了新的行业，这些工厂分别建在汉纳（Hanau）伯爵和选帝侯巴列丁（Palatine）的土地上。30 年战争的后果之一是重商主义的观念在其他许多地方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大选帝侯布兰登—贝里促进了亚麻织物在威斯特伐利亚的穿着。雨格诺教徒在流放进程中，对丝绸服装和其他奢侈品行业在史潘道（Spandau）、马格德堡（Magdeburg）等城市，以及安斯巴赫（An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边疆伯爵领地所属的埃尔兰根（Erlangen）和谢沃柏克（Schwabach）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丹麦，最早的国家工业政策出现在克里斯蒂安四世时期，他曾计划将其首都哥本哈根及位于易北河（Elbe）低地的新城科拉克斯塔特（Clücks-

---

[1] 每一个银里尔（real）等于 4 先令（shilling）又 4.5 分（Penny）。

tadt）发展成为工业中心。遗憾的是，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努力并未取得多大成功。由于丹麦国内市场过于狭小，致使其产品在国外市场上无法竞争过那些来自于西欧和中欧国家的产品。

在瑞典，政府规划冶金工业布局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在克里斯蒂安娜女王在位的部分时期内，政府试图将位于贝里斯拉根（Bergslagen）的炼铁厂迁移到其他省份（主要是瓦姆兰德），然而较大的运输成本阻碍了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俄罗斯，工业的发展若离开了国家的初始动力则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彼得大帝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提供了这种动力。1750 年以前，葡萄牙政府和意大利各公国也没有制定积极的工业政策。在奥地利，抛开政府的宣传及比彻（Becher）或豪尼克（Hörnigk）等个别人的努力，应【483】当说在玛丽亚·特丽萨（Maria Theresa）之前，其工业政策也是不成功的。

7.8 私人企业家制度和劳动力

1. 企业家制度

工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企业家。他通常以多种面目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商人。一方面，他为工匠和其他工人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又要为其产品寻找市场。

16 世纪，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出现在德国南部，富格尔家族可谓为他们的先驱。这一家族开发了蒂罗尔和斯洛伐克的铜矿、西里西亚的金矿、卡林西亚的铅矿以及位于西班牙阿尔马登（Almadén）的汞矿。它们在奥格斯堡的竞争对手是格森伯特（Gossenprot）、保穆伽特纳（Paumgartner）和豪克斯特尔（Höchstetter）。后者以及后来的保穆伽特纳发现了位于伊德里亚（Idria）的汞矿。豪克斯特尔（Höchstetter）则活跃在英格兰的铜矿业。纽伦堡的商人们开发了上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铁矿、图林根州曼斯菲尔特和波希米亚的铜矿，以及萨克森的锡矿和银矿。这里最为重要的资本家是福勒·威尔斯特（Fürer Welser）在纽伦堡的分支以及皮芬林（Pfinzing）。能与之竞争的是来自莱比锡及其他萨克森城市中的一批后起企业家。在莱茵河区域，来自亚琛的沃尔夫（Wolff）家族及瑞克特根（Richterghen）是锌

业和铜业中的杰出的企业家（后者与在安特卫普的金融和商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谢茨关系极为密切）。

17世纪上半叶，来自于列日和卢森堡的商人们已活跃于胡恩拉克（Hunsrück）和兰河（Lahn）地区的经济生活中。与此同时，来自亚琛地区的移民对瑞典、汉堡及吕贝克附近地区业已存在的冶金工业进行了有效的改进。17世纪，瑞典的铜、黄铜及冶铁工业在短期内引人注目的增长，从本质上说是与来自于尼德兰的企业家的贡献分不开的。最初他们从列日和纳慕尔移居到荷兰，进而又移居到了瑞典。

这些列日人中的杰出代表是路易·德·吉尔。他集商人、兵器制造商和工厂主于一身，他同时还是瑞典现代钢铁工业的奠基人。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事过所有的生产活动，制造黄铜、钢、砖、线、纸张、纺织品，甚至还在自己的船厂中造过船。在瑞典出现了新的瓦龙人，如宾汉（De Besche）和伦斯（De Rees）。1650年后，蒙玛（Momma）兄弟在肯吉斯（Kengis）、斯瓦帕瓦拉（Svappavaara）和诺尔伯顿（Norrbotten）等地区建立了大型的铁厂和铜矿，令人遗憾的是它们都以破产而告终。

在俄罗斯，杰出的商人企业家是尼德兰人马塞利斯（Marselis），是他将俄罗斯的股份投入到挪威的一处回报颇丰的矿业项目中。在丹麦和挪威，还【484】活跃着另外一批企业家，如葡萄牙的银行家泰克希拉（Teixeira），以及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纽恩斯·亨利奎斯（Nunes Henriques）等。在俄罗斯当然也有本国的商人企业家，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斯特罗格诺夫（Stroganov）。

贵族甚至君主们都对产业行为发生了兴趣，或者准备直接开办自己的产业。在新教徒中，16世纪最著名的例子是不伦瑞克—沃尔夫布特尔（Brunswick-Wolfenbüttel）的朱利叶斯（Julius）公爵，以及丹麦王国中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亨利·兰卓（Henry Rantzau）、斯坦赫尔特（Statthalter）。在天主教徒中，波希米亚的沃尔德泰因（Waldatein）伯爵在位于波希米亚的自己的领地中建立了一家毛纺厂。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波兰的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建立了采矿和冶金业。17世纪末，由一些汉堡的王公贵族们组成的产业大亨，以他们的农奴为廉价劳动力，建立起大批的工业企业，尤其是纺织企业。在斯堪的纳维亚，挪威总督，也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Christain）五世的同父异母兄弟乌尔里克·弗里德里克·吉尔德罗夫（Ulrik Frederik Gyldenlöve），建有自己的木材厂。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五世的大臣乔吉姆·艾金斯（Jochim Irgens），在挪威开办了铜矿。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an）王后的裁缝克劳德·罗克特（Claude Roquette），则从事了瓷器制造业。其他朝中重臣或政府官员在当时的专

治主义与重商主义并存的社会氛围中，都不失时机地利用君主的宠信来实现自己在产业上的梦想。有些则是受君主的委托，直接去执行某些产业项目。

从 15 世纪末开始，与矿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相同步，一批新的冶铁技术诞生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由成功的农民转化而来，如德国的矿主（*Reidemeister*）或瑞典的矿主（*brukspatroner*）。在纺织工业内，情况则完全相反，企业家的角色通常为印染技师所垄断，或者由过去场外生产制度中的“中间人”演化而来。一般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如下论断：商人资本会逐渐控制制造业部门。

从 15 世纪开始，移民中相当比例的人成为了工业企业家。他们之中的先驱是西班牙裔犹太人。16 世纪，他们使萨洛尼卡（Salonica）的纺织工业实现了现代化。此外，还有移民到中欧和北欧的荷兰人，移民到瑞士的意大利人，从法国移民到英格兰、荷兰以及 1685 年废除南特（Nantes）法令后的普鲁士。法国喀尔文派教徒和路德派教徒则移民到了诸如克雷菲尔德（Krefeld)、穆尔海姆（Mülheim）和埃尔伯菲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等地从事产业活动。许【485】多专家抓住了由瑞典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机遇。掌握着德国先进冶铁技术的专家奥地利的格吉尔（Geijer）兄弟，来到了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Gustavus Adolphus)。应路易·德·吉尔之邀请，熟悉冶铁工艺的瓦龙人从列日和纳慕尔来到了瑞典，并促进了那里冶铁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被称为“法国炉”的熔炼炉也被引进到瑞典。[①] 来自于奥地利和德国的铁匠，带来了德国的制铁工艺。在埃斯基尔斯图纳（Eskilstuna）的一家著名的炼铁厂，也是由一个德国家庭建立的，他们便是来自亚琛（Aachen）的莱因霍尔德·瑞德马克（Reinhold Rademacher)。来自荷兰南部的格文特·西林特（Govert Silent）带来了新的造纸工艺。这些带着技术、发明和投资资本，来自各地的专家和企业家，对于开发瑞典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极其重要的。17 世纪的瑞典，积极发挥了移民企业家作用的做法，为那些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的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与此相似，在 1650 年以后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先后引进了维尼厄斯（Vinius）和外国专家，其做法可认为是此种发展类型的另一个代表。

2. 劳动力

即使在中世纪，工业生产中就已经开始使用行会以外的劳动力资源。

① 其他瓦龙人是：高芬（Gauffin)、黑宾特（Hybinette)、斯普龙（Sporrong)、莱莫恩（Lemoine)、桂劳姆（Guillaume)。见赫克歇尔：《*Svenskt arbete och liv*》，第 131 页以后。

在采矿、冶金和纺织工业中更是如此。1500 年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劳动力的分化也加强了。以采矿业为例，在德国中部的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许多矿业公司中，均缺乏引进新的机械设备的资金，同时也必须雇用工资劳动者。随着 16 世纪矿业与冶金业中资本的扩张，雇工中的等级区分也开始出现。从矿场总监、调动人员到各类的工头、矿工、熟练工人、童工和女工。他们的作用各不相同，既有熟练的矿工和冶炼工，有铁匠、木匠这样的手艺人，也有非熟练工人和马车夫。纺织业中劳动力的区【486】分更为明确，在奥地利北部林茨（Linz）的毛纺厂中，工人分为清理工、剪毛工、梳理工、织布工、漂洗工、印染工和漂白工等。在场外生产制度下，雇工们都在自己家中劳动，等级差别并不明显。相反，在拥有 100 名或更多的工人在同一屋檐下工作的企业内，等级区分则极容易产生。在这类企业中，雇工们一般在熟练技师的带领下工作，每个师傅负责领导一批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后者通常从事各式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许多妇女在纺织工业中工作，与之相关的领域，如丝绸、花边编织和亚麻制品业等也更加适于妇女工作。16 世纪，在阿尔卑斯地区和瑞典的矿山中也曾使用过女工，在兵工厂中也有妇女在工作。在印刷业和棉布印染业中，使用了大量童工；采矿和冶金业中的辅助性工作和家乡的各类企业无疑也是童工主要的就业岗位。

在许多"产业工人"身上仍带有农民的本质，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工资（尽管非常重要）只是一项辅助性收入。有些矿山和冶炼企业的生产只能在农闲季节进行。在采矿、冶金和玻璃制造业中，部分工资是以向工人提供可耕作的土地的方式来支付的，还有些工人的工资是以商品或住房来支付的。货币工资的支付也采取了多种形式，中世纪的、以生活费用为标准的支付方式逐渐为协议工资所代替。在卡林西亚的布雷堡（Bleiberg），规定每周工作 6 个半班，每班 9 小时，即全周工作 58.5 小时。频繁的假期也使工业部门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每年的工作日只有 245 天。① 中世纪的传统仍然十分强大。

在这些行业中，既有自由工人也有非自由工人。在采矿和玻璃制造行业内，自由工人是极不稳定的。16 世纪的矿工们经常会从萨克森移居到波希米亚，从德国移居到瑞典、英格兰、西班牙或美洲。非自由工人是指在感化

① 韦斯纳（H. Wiessner）：*Geschichet des Kärntner Bergbaus, II. Geschichet des Kärntner Buntmetallbergbaue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Blei-und Zinkbergbaues in* : *Archiv für vaterlandische Geschichte und Topographie* 36/37 [克拉根福（Klagenfurt），1951 年]，第 275 页。

【487】院或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俄罗斯的产业大亨的领地上工作的工人。自由工人可以组成类似于“熟练工人联盟”[①] 的团体，甚至还可以组织罢工。蒂罗尔和斯泰伦的矿工[②]就曾参加过 1525 年的农民战争，而莱顿的毛纺工人在 17 世纪中组织了多次罢工。

在英格兰，小的技师如锯木厂和毛毡厂中的师傅们，开始发现他们的利益与熟练工人的利益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两者合作，成立组织的行为引起了议会的疑心。在车轮商和裁缝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纽卡斯尔，一个制鞋业者的组织于 1719 年设立了疾病和死亡保险支付制度。到 1721 年，在谢菲尔德，已有多个这类组织。1726 年，议会发觉有必要通过一项法令限制“西部地区毛纺业中各类非法的组织”。到 1749 年，该项法令的限制范围又扩大到了建立于丝绸、亚麻、冶铁、皮革及其他行业中的各类工人组织。

在西班牙，恶劣的工作条件，低标准的工资及工头（*fiestas*）的压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1730 年，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织布厂中爆发了罢工，这在波旁王朝时期的西班牙还是第一次。

7.9 生　　产

1. 采矿和冶金

从新世界进口的黄金转移了人们在欧洲勘探和开采金矿的兴趣。在西里西亚的瑞肯斯坦因（Reichenstein）和哈尔茨的金矿中，对伴生着铜、铅、锌和砷的矿山的开采量锐减。在上述金属的开采开始转移到卡林西亚，尤其是靠近奥伯维拉奇（Obervellach）的地方。原先的那些金矿则划分成较小的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由农民、市民和贵族（通过参股方式）所构成。到 16 世纪中期，这种局面被打破。一些较大的资本家，如奥格斯堡的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er）、加斯泰因（Gastein，1571 年）和 *Wielandsche Gewerken*[③] 的维特摩萨（Weitmoser）兄弟及维兰德家族公司的股东

① 旅行者联盟。
② 矿工。
③ 由维兰德家族组织的公司成员。

等进入了矿业。他们通过关闭那些效益低下的小型矿山来实现采矿的合理化，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黄金的开采。但过量的开采使资源很快就枯竭了，他们所期待的“金灿灿”的局面并未出现。直到1745年在乌拉尔山脉发现金矿之前，欧洲金矿的开采几乎完全停止。

铜和银的开采集中在哈尔茨的戈斯拉尔（Goslar）周围、曼斯菲尔德的乡村、萨尔茨堡（Salzburg）周围、萨克森、波希米亚、蒂罗尔和斯洛伐克。在哈尔茨北部靠近戈斯拉尔和克劳索（Clausthal）原有矿山的地方，一座新的矿山于1500年初建于圣安德鲁斯堡（St Andreasberg）。曼斯菲尔德的矿山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在1521～1537年间，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在厄尔士地区还有一座重要的银矿，1470年以后，其产量有了较快增长。它吸引了来自弗莱堡（Freiberg）、莱比锡、马格德堡和爱尔福特（Erfurt）的大批企业家，也吸引了来自德国南部尤其是纽伦堡的大量投资。重要的矿业中心是施尼堡（Schneeberg）、安娜堡（Annaberg）、布克赫尔茨（Buchholz）和玛利堡（Marienberg）。16世纪20年代末，当许多矿工移居到约阿西姆斯泰勒尔之后，萨克森的矿业生产出现了暂时的萧条。然而，时隔不久生产就出现了恢复，并于1533年达到了顶峰。位于圣安娜和玛利的矿山也于1560年之前达到了最高产量；1577年以后，生产开始逐渐萎缩。 [488]

1540年，欧洲的白银产量达到最高峰，年产量为65 000千克，其中德国的产量为16 000千克。蒂罗尔、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的白银生产也多为德国资本所控制。1557年以后，自美洲进口的白银开始与欧洲自产白银相竞争，并最终完全打败了德国自产的白银。

16世纪上半叶，在挪威的泰勒马克（Telemark）有一些白银被开采。然而不久，矿藏便采光了。1624年，挪威国王在靠近康斯堡（Kongsberg）的地方开发了一个新的银矿，但产量却很低。1627年，一家私人公司接管了该矿山，一些年份的产量曾提高到2 000千克。1661年，国王重新控制了该矿山。

在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时期，瑞典在靠近撒拉（Sala）的地方开采银矿，其产量尚令人满意。在俄罗斯，德国矿工于16世纪末在流向派考拉（Petchora）的吉尔马（Gylma）河畔开发了一个银矿。在西班牙，坐落于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的银矿一直开采到查理五世末年。在希腊，犹太人开发了靠近萨洛尼卡（Salonica）的塞朱考普索（Sidrocopso）银矿。劳动力的来源极其规范，有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及犹太人。16世纪中，其年产白银价值约100万～200万达克特。

在图林根州［包括卢森堡、格拉芬塞尔（Gräfenthal）、阿恩斯泰德

(Arnstadt)、路德斯泰尔特（Luderstalt)、斯泰纳克（Steinach)、纽伦堡、卡林西亚］附近建立了许多的铜冶炼厂（*Saigerhütten*）[1]，富格尔家族在豪恩肯克琛（Hohenkirchen）和福格劳（Fuggerau，属卡林西亚）进行过铜冶炼。多数铜企业是由来自德国南部的资本投资设立的，其中最大的2家企业是由来自于纽伦堡的企业家阿恩斯泰德（Arnstadt）和斯泰纳克建立的铸造厂（*Saigerhandelsgesellschaften*），其投资额分别为10万弗罗林和23万弗罗林。【489】来自德国南部的企业家还开发了古登堡（Kuttenberg)、蒂罗尔、萨尔茨堡（Salzburg）和斯洛伐克［诺伊索尔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 Bystria)，利柏森（Libethen)］的铜矿。加上位于挪威、英格兰和阿尔萨斯的矿山，16世纪欧洲的铜产量已达每年6 000吨。

厄尔士地区（Erzgebirge）的白银是从铅银共生矿中提取出来的。在哈尔茨、西里西亚北部［靠近塔诺瓦茨（Tarnowice)］以及北部的艾弗尔（Eifel）边界等地，铅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铅的产量并不多，每年还需从英格兰、卡林西亚和波兰进口一部分。

大约在1500年前后，卡林西亚在温迪西—布雷堡（Windisch-Bleiberg)、派特森（Petzen）西部和布雷堡（Bleiberg）附近发现了几座铅矿；在布雷堡（Bleiberg)、艾兹堡（Erzberg）北部的路德拉德（Rüdlard）周围以及克鲁森—斯托肯保（Kreuzen-Stockenboi）地区发现了银矿；在雷柏尔（Raibl）发现了铅锌矿。

菲拉赫（Villach）附近的布雷堡（Bleiberg）铅矿最为著名。富格尔家族于1495年在布雷堡（Bleiberg）开发了一座铅矿，以满足它们位于斯洛伐克（Slovakia)、蒂罗尔和拉文特（Lavant）河谷的铜矿和银矿开采的需要。同年，它们还在靠近马科特—阿穆尔德斯坦因（Markt Arnoldstein）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冶炼厂。在这里，它们与德皇马克西米里安产生了竞争，因为后者位于蒂罗尔的铜矿中也需要铅。这场争执以富格尔家族接管蒂罗尔的矿山而告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该冶炼厂已形成每年向威尼斯输送2 500吨铜和22 000马克白银的生产能力。

矿山的股东来自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有菲拉赫（Villach）的市民，也有米尔斯·坦特（Milstatt）修道院的代理人，还有来自德国南部城市如奥格斯堡的安格尔特（Ungelter)、加斯泰因（Gastein）的维尔勒·弗罗斯科摩萨（Virgil Fröschlmoser）的商人。在随后的日子里，小股东们开始为大资

① 精炼厂。

本家的矿山合理化计划让路。于是人们看到，到1585年，富格尔家族已经拥有矿山93座，而实际开采的只有26座；伦特那（Lentner）家族拥有矿山86座，实际开采的也只有18座。

16世纪中期以后，卡林西亚的铅矿日趋萧条。1546年，富格尔家族退出了斯洛伐克的矿山，但仍保留着卡林西亚的矿山。1553～1563年间，铅的年产量约500吨，到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年产量下降到250吨。1570年，它们将位于福格劳（Fuggerau）的矿山出售给了阿诺德斯坦因（Arnoldstein）的修道院主持，并将大量的矿工解雇。

在波兰，含银的铅矿在排水设备的帮助下获得了开采。1450年以后，技术的进步使开矿的巷道已达地面以下40～50米的深度。有时，还会开辟专用的巷道来排除矿井中的积水。波兰的采矿业多集中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克拉科夫地区。塔奴斯凯—高瑞（Tarnowskie Gory）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矿【492】产区，在那里，一座矿业城市已经形成。16世纪30年代，这一地区含银的铅的年产量已达2 900吨。在马拉伯尔斯卡（Malopolska）省南部地区，出现了20多个矿业中心。曾经作为矿业中心之一的奥尔库茨（Olkusz），于1470年前后陷入了困境，但到16世纪初开始，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16世纪30年代，富含银的矿山被发现。波兰出产的铅在斯洛伐克被用于从黑铜中提取白银，在古登堡和约阿西姆斯泰勒尔被用于相同的目的。在中欧市场上，产自波兰的铅是人们熟知的商品之一。

企业扩张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增加，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外来资本。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的市民建立了冶炼厂、安装了排水设备、购买矿业股票或直接建立自己的矿业公司。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参与进来。合股制度（*verlagssystem*）广泛传播，资本家将钱贷给矿产商，并将其作为开采过程中自己投入的股份。正是由于商人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采矿企业部分地变成了与生产过程更加密切的商业人士的银行团。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资本可以从矿石开采到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来监督生产和经营，从而有条件使采矿过程逐步实现合理化。15世纪末，在奥尔库茨（Olkusz），茅斯汀（Morstyn）、瑟佐（Thurzo）和所罗门（Salomon）就是通过以上方式变成了主动的企业家。到16世纪初，伯尔（Ber）、卡夫曼（Kauffman）和博纳（Boner）也步其后尘，富格尔甚至还与瑟佐（Thurzo）进行了合作。然而，这一进程并未有效地促进生产集中。只有生产环节中的一小部分，在冶炼环节上有了一些集中，并雇用了劳动力。在采矿环节，仍然保持着劳动者独立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手工作业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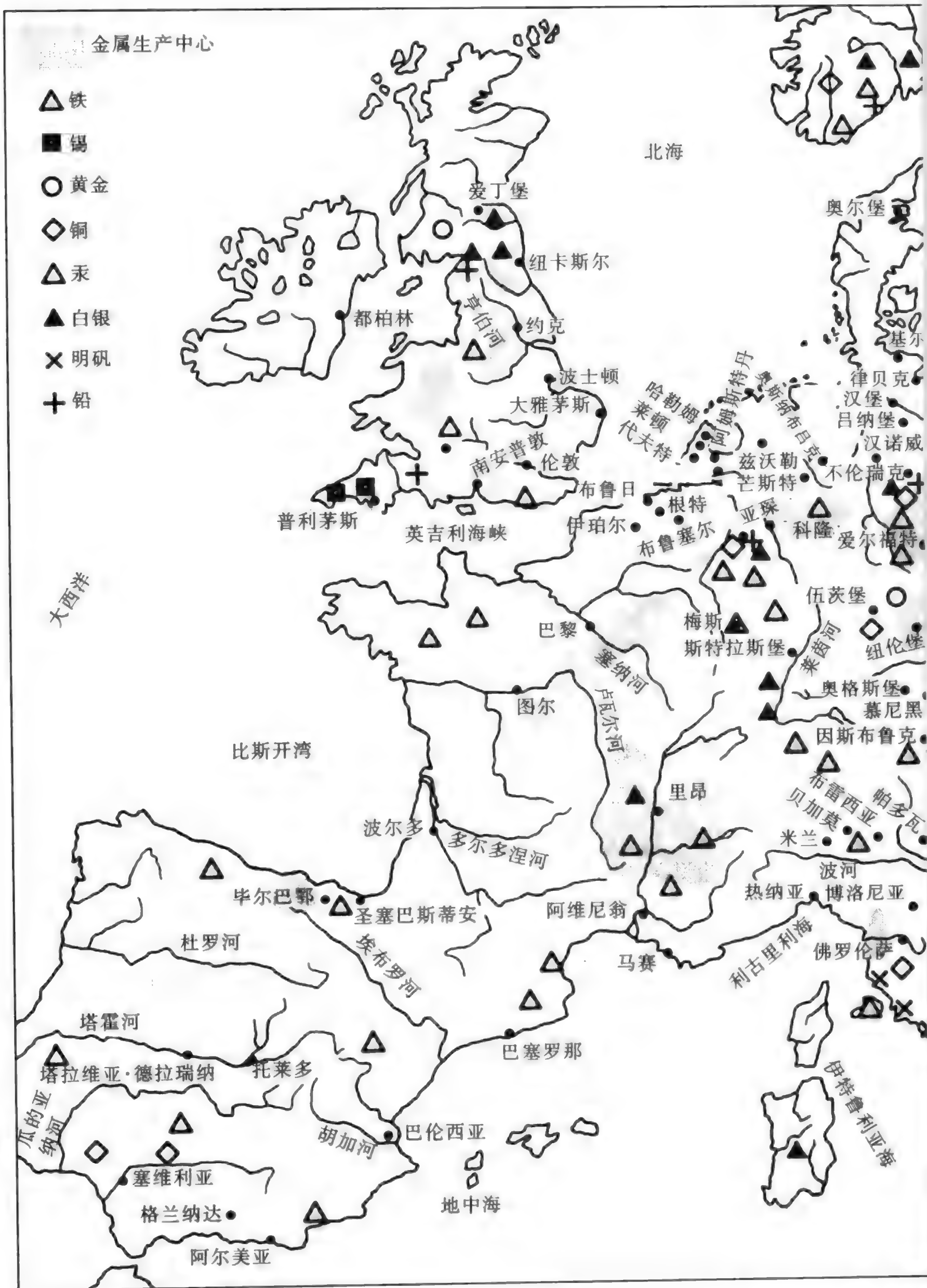

金属生产中心
铁
锡
黄金
铜
汞
白银
明矾
铅
北海
爱丁堡
纽卡斯尔
都柏林
约克
波士顿
大雅茅斯
南安普敦
伦敦
普利茅斯
英吉利海峡
布鲁日
根特
伊珀尔
布鲁塞尔
哈勒姆
莱顿
代夫特
兹沃勒
芒斯特
科隆
梅斯
斯特拉斯堡
巴黎
塞纳河
图尔
卢瓦尔河
里昂
大西洋
比斯开湾
波尔多
多尔多涅河
毕尔巴鄂
圣塞巴斯蒂安
阿维尼翁
马赛
杜罗河
埃布罗河
塔霍河
塔拉维亚·德拉瑞纳
托莱多
巴塞罗那
瓜的亚纳河
塞维利亚
胡加河
巴伦西亚
格兰纳达
阿尔美亚
地中海
奥尔堡
律贝克
汉堡
吕纳堡
汉诺威
不伦瑞克
伍茨堡
纽伦堡
奥格斯堡
慕尼黑
因斯布鲁克
米兰
热纳亚
博洛尼亚
波河
利古里利海
佛罗伦萨
伊特鲁利亚海

图 7　金属生产


纳尔维克
乌普萨拉
斯德哥尔摩
诺夫哥罗德
尼可平
林可平
乔可平
莫斯科
杜维纳河
卡尔马
哥本哈根
玛尔摩
波罗的海
梅梅尔河
布格河
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
坎尼堡
维尔纳
斯特拉尔松
但泽
罗斯托克
涅曼河
斯德丁
法兰克福(奥德河)
瓦尔塔河
马格德堡
奥得河
莱比锡
布雷斯劳
基辅
第聂伯河
布拉格
克拉科
利沃夫
卡门乃茨-波多斯基
奥姆茨
布尔诺
细索尔
纽伦堡
维也纳
布格河
德涅斯特河
雷根斯堡
萨尔茨堡
布拉迪斯拉发
蒂萨河
普鲁特河
皮斯瑞兹
格拉茨
克鲁日
菲拉赫
卢尔雅娜
赫尔曼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
贝尔格莱德
黑海
萨瓦河
多瑙河
威尼斯
亚得里亚海
德林纳河
杜勃罗文克
君士坦丁堡
罗马
那不勒斯
巴里
萨洛尼卡
萨卡亚河
萨瑟瑞河
崔卡拉
爱琴海
曼德列斯河
科林扎
卡坦查若
巴勒莫
墨西拿
爱奥尼亚海

[491]

中心分布图

16 世纪中期，西里西亚及克拉科夫周围的采矿业趋于停滞，在奥尔库茨尤为严重。那些被遗弃的矿山与其说是由于资源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造成的。使用畜力排水的成本之高，以至于拿走了采矿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在马拉伯尔斯卡（Malopolska）省奥尔库茨周围，以及上西里西亚等地势平坦的地方，如果采矿是连续进行的话，则需要建很长的巷道。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直到 16 世纪下半叶，外界还无法满足这种投资需求。与此同时，它们也面临着来自欧洲其他矿业中心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其主要竞争对手来自英格兰、哈尔茨和卡林西亚等地。

奥尔登堡（维尔勒）的菱锌矿的开发，使亚琛的黄铜制造业在大约【493】1450 年以后日益兴旺起来。粗铜来自于曼斯菲尔德以及其他地方。在亚琛和施托尔堡（Stolberg），发展铜业生产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通过安特卫普将产品出口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殖民地。自 1493 年起，奥尔登堡的矿山转由彼德·冯·沃尔夫经营，他是亚琛居民，与亚琛的实业家族冯·里克特根（Richterghen）关系密切。亚琛市长的儿子，尼古拉斯·冯·里克特根（Nikolaus van Richterghen），移居到了安特卫普（Antwrep），与普林根（Proenen）家族合作经营企业。作为冯·里克特根（Richterghen）事业的继承者，伊拉兹马斯·斯凯茨（Erasmus Schetz）接管了位于奥尔登堡的矿山，并控制了亚琛的菱锌矿贸易。他的儿子继续了他的事业［部分年份曾经与威勒米克（Vleminck）合作］，直到 1579 年。

随之而来的宗教冲突破坏了奥尔登堡的采矿业以及亚琛的黄铜制造业。1611 年，普鲁士政府直接掌管了矿山。然而，实际上从 1621 ~ 1648 年，它们还是由来自亚琛的约翰·斯图普特（Joham Stuppart）来经营。据记载，1645 年的产量为2 500吨。亚琛铜业生产的高潮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末，直到企业家中［铜矿矿主（*Kupfermeister*）］的宗教紧张和冲突爆发为止。生产趋于萧条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行会的限制，导致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不能使生产有所提高。许多技师移居到朱里耶斯（Juliers）公国的斯托尔堡，与亚琛相比，那里不存在行会的限制。30 年战争期间，斯托尔堡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增长，1648 年曾一度达到 65 座熔炼炉同时开工的繁荣局面。尽管如此，直到 17 世纪中期，亚琛铜业行会在 10 余年的时间内依然生产了 5 000 吨铜。17 世纪下半叶，斯托尔堡的铜产量才开始超越亚琛。根据 1669 年签订的合同统计，亚琛的铜业在未来 10 年的产量为 2 500 吨铜，而同年斯托尔堡的铜业在未来 5 年的生产计划就达 3 000 吨。从 1730 年开始，亚琛的年产量逐渐将至 75 吨到 100 吨。

瑞典的铜产量自1550年开始增长，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17世纪初。铜业的扩张与来自西班牙的大批量需求密不可分，西班牙的纯铜货币体制形成了对纯铜的需求。当瑞典不得不支付第二次“阿尔瓦斯堡（Älvsborg）赎金”时，瑞典国王将其所有的铜产品让渡给部分商人，由他们在西欧、北欧和中欧的市场上销售。来自上述新市场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铜的生产，其【494】主要矿山弗伦（Falun）得到了扩建，并于1650年达到了最高产量。铜在财政上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王室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商，并且矿山多集中在弗伦和斯图拉铜矿（Stora Kopparberg）地区。为便于铜的销售，政府设立了铜业公司［最初成立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斯（Gustavus Adolphus）时期，在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na）女王时期再次设立］，人们对其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够比王室或斯图拉铜矿的商人们更好地组织铜的开采和销售。第一家皇家公司并不成功，不久便消亡了。第二家公司从一开始就有错误，在支撑了两年之后也消失了。30年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破坏了斯洛伐克的铜矿。由路易·德·吉尔和包括特里普家族在内的部分尼德兰商人经销的瑞典的铜，占据了大部分的欧洲市场。1650年，瑞典铜的生产达到了创记录的年产3 000吨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年均水平要低得多，只有大约2 100吨。1661～1665年间，其年均产量更是下降到了2 000吨以下。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铜产量能与瑞典相比，那就是日本。然而，在17世纪只有极少量的日本产的铜进入了欧洲市场。

1690年，查理十一世派出了由瑞典最为著名的冶金专家瑞克·奥赫里斯（Erik Odhelius）率领的考察团，去考察欧洲其他地方的铜业生产并寻找潜在的出口市场。奥赫里斯（Odhelius）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尽管瑞典的铜产量有所下降，但其产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产量高得多。其产量接近欧洲总产量的一半。1716～1720年间，瑞典铜的年产量降低到1 000吨以下，并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停留在这一较低水平。

在丹麦—挪威王国，也蕴藏着一些铜矿，但不及瑞典那么丰富。最早开采的铜矿位于塞尔福德（Selford）的散茨堡（Sundsberg）。1524年，哈马尔主教莫根斯（Mogens）获得了该矿的开采权。作为变革的内容之一，国王占有了该矿，并引进萨克森的矿工从事开采工作。

1632年，在克维肯（Kvikne）附近发现了高品位的铜矿。皇室官员负责该矿的开采工作。在奥克（Ork）河谷的劳肯（Lökken），特别是在勒罗斯（Röros），还发现了另外一些矿山。1646年这些矿山获得了开矿特许权。最初，挪威的铜矿开采为王室所控制，而资金则来自于国外。后来，汉堡和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泰茨耶罗（Teixeira）和纽恩斯·亨里奎斯（Nunes [495] Henriques），直接从事了该矿的开采。

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发现了铜矿。1574 年，斯托格诺夫（Stroganov）获得了开采权，但直到 18 世纪上半叶，那里的铜矿开采一直是无足轻重的。1722～1724 年，在乌拉尔山脉建立了 14 家铜冶炼厂。

在英格兰，1568 年有两家大公司获得了开采铜矿的特许权。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皇家矿业公司”和“矿业和造炮公司”，它们的开采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来自德国的资本家和技术专家在靠近凯斯维辛（Keswick）的纽斯兰德（Newslands）等地，发展了新的工业，但他们的生产被证明并不成功。锡矿出产于沿海和平原地带。矿业和造炮公司在丁特恩（Tintern）生产黄铜和铁器，1580 年以后，它们在尼斯（Neath）熔炼出自德文郡和康沃尔郡（Cornish）的铜矿石。内战结束以后，这些公司又相继恢复了生产活动。当 1689 年铜和锌的生产开始向私营企业开放以后，它们则失去了垄断权。

萨克森的锡业占有重要的位置。与铜和银不同，由于锡的开采一般都在很浅的表层进行，因而无需很高的投资。萨克森的锡业中心是奥尔登堡，其开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中期之前。在菲克特高原（Fichtelgebirge），也有部分锡矿。在一段时期内，波希米亚是最大的生产基地。锡既是一种制造家庭用品的重要原料，也是炼钢的重要原料。当时的钢铁工业主要集中在上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尤其是阿姆堡（Amberg）、萨尔茨柏克（Sulzbach）和温希维尔（Wunsievel）等地。钢材一般都运送到纽伦堡，在那里再转移到各类加工者的手中。在厄尔士地区，来自纽伦堡和上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企业家开始制造“白锡片”（White-sheet）。锡和铜组成的合金是人们所熟知的“青铜”。16 世纪，许多工厂发展了用青铜铸造大钟和火炮的技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座工厂位于南尼德兰的马林丝（Malines）、纳慕尔和列日、德国的纽伦堡、蒂罗尔的因斯布鲁克和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北尼德兰解体后，荷兰开始铸造青铜大炮。直到 17 世纪，铁铸大炮才开始取代青铜大炮。英格兰的情况较为特殊，16 世纪时就出现了铸铁大炮。

早在 1490 年就在伊德里亚（Idria）发现了汞，但直到 16 世纪更大的矿床发现以前，它一直都默默无闻。维尼夏（Venetinans）家族是最早在这里采矿的人。然而，时隔不久，它们便被皇帝给驱逐了，皇室开始亲自投资开采这里的矿藏。后来，皇帝又被说服将其部分矿山租赁给一个由本国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财团去经营。财团的成员多数是贵族，如奥森堡、莱姆堡（Lamberg）、德瑞克

斯泰因（Dietrichstein）和劳伯（Rauber）等。伊德里亚（Idria）的第三矿业公司（*Gewerkschaft*）成立于1520年，它也是由贵族和一些城市商人所组成的。[496] 1523年，奥登堡（Ortenburg）的加布里埃尔·萨拉曼斯（Gabriel de Salamanca）伯爵被授权开发一座新的汞矿。不久，其他的矿主（Gewerkschäfte）也加入到他的矿山中来，并形成了一个汞销售的卡特尔。奥森堡（*Auersberg*）的商人霍克斯泰尔（Höchstetter）是萨拉曼斯的同行之一。到16世纪20年代末，由于难以找到市场，豪克斯特尔最终破产。

1539年，另一位奥森堡的汉斯·帕马格特纳（Hans Paumgartner）签订了一份新的销售合同。1550年以后，汞矿开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部分原因是由于1550年的一场大火使阿尔马登的矿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汞矿生产中出现了新的合并进程，以满足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上银的开采过程中对汞的需求。阿尔马登的矿山被重建以后，负责管理在卡拉塔瓦（Calatrava）骑士团下的土地的富格尔家族，加强了勘探进程。在一段时期内，伊德里亚的生产转移到了奥森堡的豪格（Haug）、朗诺尔（Langnauer）等公司手中。然而，它们却在1574年倒闭了。此后，伊德里亚的矿山转由大公本人直接控制。

16世纪上半叶，钴开始用于生产蓝色染料和蓝色釉料。在施尼堡、奥博施勒玛（Oberschlema）和潘恩斯泰尔（Pfannenstiel）建立了染料生产厂，其产品出口到纽伦堡、汉堡及荷兰，并影响到了蓝釉瓷砖的发展。

2. 铁

16世纪的英国铁工业，从弗内斯（Furness）的修道院的大湖地区的铁加工工厂到苏塞克斯原野（Sussex Weald）的铁匠铺，都是一种典型的乡村工业。① 与此同时，个别的生产集中也有所出现，在谢菲尔德和伯明翰，铁匠、刃具工人、金属马具工匠和制钉工人在一起工作。但更多的农村中的制钉或制作镰刀的工匠仍然只是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和迪安（Dean）森林中独立地从事经营活动。在苏格兰，小城镇中的垄断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那些掌握在手工业者和商人手中的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的集中。

中世纪晚期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鼓风炉冶铁方法以及以水为动力进行

① 约翰·克拉彭：《从早期到1750年的英国经济简史》（剑桥，1937年）。

锻造的价值的发现)，促进了那些木材和水力资源丰富，同时又有铁矿资源【497】的地方的冶金工业的发展。在都铎时期的早期，苏克塞斯的森林地区的冶铁技师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而以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绅士和贵族，甚至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参股到他们的企业中。

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建起了熔炼炉。当木材和铁矿变得日益稀缺以后，新的生产中心开始出现在北方和西北方。大胆的企业家们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工厂建立在远离苏格兰海岸的地方，以便取得稳定的燃料供应。木炭供给的有限性，刺激了一批“试验者”开始使用在达拉谟（Durham）附近和南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储量丰富的煤炭来做试验。其中的代表之一是达德利（Dudley），他的著作《冶金学》（*Metallum Martis*）出版于 1665 年。直到 1708 年教友派的信徒亚伯汉姆·达比（Abraham Darby）找到了在其位于萨罗普郡（Shropshire）的熔炼炉中添加焦炭的可行性方法为止，试验才算取得了成功。然而，达比（Darby）的创新却传播得极为缓慢，产自瑞典和俄罗斯的用煤炭炼出的铁仍然在进口。达比（Darby）的新工艺只在萨罗普郡（Shropshire）和罗克斯汉姆（Wrexham）等地流传。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批与其相似的教友派信徒如罗林森（Rawlinson）和劳埃德（Lloyd）等。18 世纪初，他们带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进步，在冶铁过程中使用煤炭，并在本行业中进行了大量投资。正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促使英格兰的铁工业开始向以伯明翰和谢菲尔德为中心的地区集中，进而成为英格兰重要的出口产业。在伯明翰附近的乡村，如达德利（Dudley）、威德尼斯堡（Wednesburg）和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都是冶铁中心，以后又发展成为城市。被充足的木材资源所吸引，冶铁业又从兰开斯特（Lancashire）和卢伯兰德（Cumberland）向更北部的苏格兰高地转移。许多农村中的社团生产铁器以供应当地市场。即使到了 18 世纪，在苏格兰绝大多数的金属制品厂仍为乡村中的铁匠所拥有。在伯明翰和谢菲尔德地区，生产逐渐为商人逐步所控制。这样，尽管部分城市工人仍在组织行会，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在农村及老的生产中心以外的劳动力，是在行会或市政当局的种种规章（或保护）以外工作。

16 世纪，在西班牙，以苏姆罗斯托（Somorrostro）为中心的维茨凯亚（Vizcaya）地区，铁矿的开采有了较快的发展。有一部分铁出口到了法国和英格兰，还有一部分则留在国内被制成了造船用的巴斯克（Basque）钢。在半岛的另一端，由于法国人在福克斯（Foix）地区建立了炼铁厂，所用生铁又是自西班牙走私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比利牛斯山脉的加泰罗尼

亚冶铁业的衰落。而在卡斯蒂利亚尤其是在托莱多，却一直保住了武器制造中心的盛名。

在西班牙北部，私人的冶金工业逐渐趋于集中。在两名法兰德斯专家约翰·柯提斯（Jean Curtius）和乔治·布兰德（Georges Brande）的帮助下，配备有鼓风炉的现代化铁厂在阿斯图利亚斯（Asturias）建立起来。1755年，其所有者奥利瓦雷斯（Olivares）被皇帝授权垄断了对军队的大炮及铁器的供应。从1711～1718年，每年出口到英格兰的铁为1 500图拉达斯（*toneladas*），从1729～1735年间，则上升到了1 770图拉达斯。随着来自瑞典和俄罗斯的具有优势的竞争对手的加入，西班牙的生产和出口均出现了下降。【498】

在法国，冶铁工业主要集中在杜法因（Dauphiné）、弗兰克孔德（Franche Comté）、尼韦奈（Nivernais）和洛林（Lorraine）。刀具生产的中心是梯也尔（Thiers），针的生产则集中在莱格尔（Laigle）地区。在柯尔贝尔时期，圣艾提恩（St Etienne）和弗莱兹（Forez）的冶金工业取得了很大进展。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也都刺激了冶铁工业的发展。在靠近列日主教辖区的萨姆布（Sambre）和默兹河（Meuse）之间，发现了铁矿。在豪艾奥克斯（Hoyaux）河谷和弗兰西蒙特（Franchemont）的侯爵封地有丰富的木材资源，这些有利条件促使当地农民开始从事采矿和冶铁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民。到1740年，大约有1 000名铁匠在列日公国工作。生产由商人指挥，他们向铁匠提供原料，后者的工资通过计件方式核算。

在德国，技术进步和日益扩大的市场极大地刺激了采矿业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出产铁，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铁制品工业的兴起。在萨尔流域（Saar），直到18世纪，铁矿的开采一直是在表层进行的。铁工业的最初萌芽最早出现在胡恩拉克（Hunsrück）和杜伦（Düren）的艾弗尔（Eifel）地区。在莱茵河右岸，齐根（Siegen）、迪伦堡（Dillenburg）和塞恩（Sayn）是重要的工业中心。1563年，齐根的冶铁工业发展到了最高峰，铸造厂的数目一度达到32家。这里，拥有鼓风炉的铸造厂的建立比迪伦堡地区还要早，其中最早的一座建于16世纪末。

在拿骚—维尔堡（Nassau-Weilburg）、所罗门（Solms）、黑森（Hesse）和维特根斯坦因（Wittgenstein）的领地，也有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冶铁工业从黑森德海纳（Haina）铸造厂一直扩展到沃尔德克（Waldeck）和索恩兰德（Sauerland）。菲力浦伯爵去世以后黑森的解体，促进了其他地区冶铁

工业的发展。

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的马克（Mark），铁丝出产于阿尔蒂纳（Altena）、卢登斯克伊德（Lüdenscheid）和伊泽罗姆（Iserlohn）。当瑞典减少其生铁的出口以后，改为从塞格兰德（Siegerland）进口铁。16 世纪中期，在散德威格（Sundwig）建立了第一座鼓风炉。在马克地区，卢登斯克伊德很早就实现了生产的专业化，主要负责生铁的锤平，生产半成品的工件；阿尔蒂纳（Altena）负责生产更为精细的工件；而产品的最终完成则是【499】在伊泽罗姆。在伯格（Berg）公国中的索林根（Solingen），剑和匕首的生产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对产自塞格兰德的铁同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需求。

图林根州的铁工业集中于施曼卡尔登（Schmalkalden）县。该地区的矿石中含有锰，因而更加适合于炼钢。此地以生产优质的剪刀而久负盛名。图林根州南部的一座小村庄苏尔（Suhl），以拥有一批善于制造滑膛枪的技师而闻名。到 1527 年，它也发展成为一座城市。从 1530 年起，这里的枪支生产开始在劳动分工被精心组织的新制度下进行。

哈尔茨（Harz）的铁工业集中在施托尔堡（Stolberg）公国，其所有者是勃兰根堡—易北路德（Blankenburg-Elbingerode）。15 世纪末，施托尔堡的女伯爵伊丽莎白，在铁矿资源丰富的靠近艾贝格（Iberg）的盖泰德（Gittelde）和格朗德（Grund）建立了炼铁厂。16 世纪 20 年代，从约阿西姆斯泰勒尔（Joachimstal）移民来的矿业工人开始在安德罗斯堡（Andreasberg）开采铁矿，随之而来的是一批矿业城市如威德斯曼（Wildemann，1529 年）、泽勒菲尔德（Zellerfeld）和劳森泰尔（Lauthenthal，1532 年）的蓬勃兴起。不伦瑞克（Braunschweig）的朱利叶斯（Julius）公爵，一个集组织才能和商业才能于一身的人，从 1568 年开始极大地促进了奥伯哈尔茨（Oberharz）铁矿开采和冶炼的发展。他亲眼目睹了奥伯哈尔茨冶铁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

到 16 世纪下半叶，在萨克森山区的施瓦茨堡（Schwarzenberg）和克罗登多夫（Krottendorf），已建立起 26 座铸造厂。它们将生铁运送到安娜堡（Annaberg）、茨维考（Zwickau）和施尼堡进行深加工并完成最终产品。在汉堡和吕贝克（Lübeck）之间的沿海地区，武器制造业是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

德国南部最重要的铁产地是上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的阿姆堡（Amberg）和萨尔兹巴赫（Sulzbach）。全德国铁的年产量为30 000吨，其中有10 000吨产自这一地区。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其中采矿的深度已达 100 ~ 200 米。15 世纪时，已建成 200 座铸造厂。到 16 世纪，其数

目有所减少，然而这里仍是重要的冶铁中心。

跟随在那些试图自主经营矿业的城市所做的失败尝试之后，来自阿姆堡、萨尔兹巴赫、纽伦堡和雷根斯堡的贵族和商人们步入了企业家的行列。在纽伦堡、雷根斯堡和乌尔姆建起了铁的还原热处理厂，生产斯泰伦（Styrian）钢及其他产品。在施瓦比斯（Schwäbisch）、格曼德（Gmünd）、洛特维勒（Rottweil）和万根（Wangen）则出现了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炼铁厂。

在中欧，铁的冶炼与加工分布之广令人吃惊。实际上，冶铁业是近代德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源泉。16 世纪上半叶，欧洲铁的总产量年均为 6 万 ~ 10 万吨，其中德国的产量占据绝大多数。【500】

在奥地利，冶铁业在 16 世纪中也有了相当的增长。在以卡林西亚的哈登堡（Hüttenberg）为中心的地方，集中了大的铁厂，与农民们简陋的铁工场相比，它们无论是在生产规模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具有巨大的优势。斯泰伦从布雷西亚（Brescia，参见后面的相关内容）那里引进了它的发明。各式各样的铁制品在多种锻造工具的帮助下被制造出来，包括软铁、钢、铁条、铁杆、盘子和铁丝。实际上，16 世纪中期以前，斯泰伦的工业一直由来自于施泰尔（Steyr）的资本所控制。

在东阿尔卑斯地区，只有一家大型企业，那就是在布鲁克（Bruck）和里尔本（Leoben）地区的苏尔［Thörl，靠近阿弗伦茨（Aflenz）］，由保格尔（Pögl）家族开设的盔甲制造厂。塞巴斯蒂安·保格尔（Sebastian Pögl）是马克西米里安皇帝跟前最为活跃的枪械供应商之一。从一开始，他便身兼企业家和商人双重身份。在他死后（大约在 1528 年），他的儿子西伯尔德（Sebald）继续了他的事业。镰刀的生产中心是柯驰多夫—米歇尔多夫（Kirchdorf-Micheldorf），1670 年，36 个铁匠铺共出产镰刀 80 万把。

在阿尔卑斯山南麓，铁的生产集中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Bergamo）地区及厄尔巴（Elba）岛。兵器制造中心布雷希斯诺—伽登［Bresciano Gardone，瓦尔—托姆皮亚（Val Trompia）］在 16 世纪中期达到了其在技术和产量上的顶峰。尽管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兵器生产不断衰退，然而到 18 世纪上半叶时，在上述两个地方仍有一些小企业生存下来。从总体上说，意大利北部采矿和冶金活动的历史要比中欧和东欧早一些，但在整个 18 世纪中，它始终是阻碍其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欧东部地区，铁主要产于摩拉维亚、西泊斯（Zips）和斯洛伐克。在波希米亚，伯迪（Brdy）的矿山及冶炼厂在 30 年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但战后不久，那里的生产便恢复了。在巴尔干，只有贝尔格莱德的萨莫克夫

(Samokov) 铁矿较为重要。哈普斯堡在特兰西瓦尼亚也建立了几家炼铁厂。在波兰，存在着一些由铁匠铺或配备水力驱动的铸造厂所构成的小的铁工场。当地的地主将这些工场租借给城里来的自由企业家（后来也包括农民）来经营。通常，这些经营者还会经营一座磨坊或一座农场，这样，他们便可以用田地中的收获来支付那些临时性工人的部分工资。工人的数目有时可多[501] 达 30 人，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6 世纪，铁的生产集中在韦伦（Wielun）和奥尔库茨（Olkusz）之间的地区，尤其是克拉科夫和森苏加瓦（Censochova）附近的山地（1577 年建有 35 家工厂）以及凯尔采(Kielce) 北部的山地（有 64 家工厂）。

到 16 世纪，斯图克芬（*Stücköfen*）和鼓风炉被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战争的需要。1577 年，斯蒂芬·巴索尔（Stefan Bathory）授权乔治·兰纳（Georg Langner）在斯图姆（Stuhm）建立了一座铸造厂。1598 年，来自贝加莫的卡奇（Cacci）兄弟在靠近凯尔采的克拉科夫主教领地上建立了一家炼铁厂。到 17 世纪上半叶，在那里至少已建立了两座熔炼炉。1620 年，米哈依·沃尔斯基元帅（Marshal Mikolaj Wolski）在靠近森苏加瓦的潘根（Panki）和莱兹沃克（Lazioc）建立了两座熔炼炉。另有一座鼓风炉由伯托奇（Andrzej Potocki）建于哈里茨（Halicz）。在乌克兰的泰德路(Teterew) 的 18 座铸造厂中，很可能也有一座名为斯坦尼斯劳·考恩斯保尔斯基酋长（Ataman Stanislaw Koniecpolski）的鼓风炉。然而，18 世纪后半叶，波兰军队的遣散及波兰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退使得这些冶炼厂几乎瓦解。

在俄罗斯，从中世纪末开始，手工的铁匠铺开始走向衰落。铁通过诺夫格罗德进口到国内，并在内地的乡村进行加工。伊凡·特伦波（Ivan Terrible）希望借助西方移民者的帮助来发展采矿和冶铁工业。16 世纪 50 年代，英格兰的手工业技师和矿工来到了俄罗斯。1554 年，戈斯拉尔（Goslar）的汉斯·斯蒂特（Hans Stitte）聘请了德国的炼铁技师。1558 年，沙皇授权斯托格诺夫（Stroganov）家族，允许它们开发位于卡马河流域（Kama）的铁矿；1574 年，它们又被授权开采西伯利亚的铁矿和其他金属资源。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专家，勘探活动遇到了巨大的障碍。1569 年，一家名为“英格兰公司”的矿业公司获得了在维彻伽达（Wytchegda）边界开矿和建厂的权力。其他的一些授权集中在苏特朱纳（Sotchuna）边界。1628 年，德国勘探家在艾尔贝特（Irbit）地区发现了铁矿，并在杜拉建立了第一座鼓风炉。1632 年，德意志人维尼厄斯获得了经营铁厂的垄断权及大笔金钱，以此为

条件，他被要求居住在杜拉向俄罗斯人传授有关炼铁方面的技术。维尼厄斯发展了杜拉或高罗第斯克（Gorodisce）的冶铁工业。两地都建立起了鼓风炉，也都建有锻造厂。17 世纪 50 年代，在靠近卡希拉（Kašira）的斯克尼伽（Skniga）建立起了更多的工厂。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是尼德兰人马塞利斯（Marselis）和阿克玛（Akkema）。尼德兰人也租用过米罗斯拉维斯基（Miroslavskij）的冶炼厂，并在尤高达卡（Ugodka）建立了另一座鼓风炉。德国人汉斯·肯伯格（Hans Kilburger）在莫斯科附近也建有一座鼓风炉。显而易见，俄罗斯的冶铁业明显地带有“以移民企业和技术为主导”的特征。在这些西方专家的帮助下，到 17 世纪晚期，俄罗斯铁的生产已经可以与瑞典相抗衡了。【502】

彼得大帝在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建立了大量的铁厂，如 1697 年在西伯利亚的维克图尔（Vierkotur）和托布斯克（Tobolsk），1699～1701 年在奈温斯凯（Neviansk）和卡门斯凯（Kamensk）等地。1693 年，在靠近杜拉的凯琛斯基（Katchinsky）又建立起一家新厂。1703 年位于欧鲁乃茨（Olonetz）的工厂被重建。1705 年在靠近彼得堡的塞斯罗柏斯克（Sestrabesk）又建立了另外一些新的工厂。上述工厂的生产状况非常令人满意。从 1716 年起，俄罗斯开始出口生铁。当与瑞典的战争结束以后，彼得大帝又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增加铁的出口上面。正是由于德米多夫（Demidov）及政府官员泰迪彻夫（Tatichev）和海宁（Hennin）等人的不懈努力，1722～1724 年间，又有 5 家新的工厂在乌拉尔山脉建立，其中 4 家生产铜。德米多夫家族在 1716～1725 年间也建起了 4 家工厂，其中一家位于库兹涅茨（Kuznetz）盆地。在西伯利亚，以战争中的瑞典战俘充当部分劳动力，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一家钢厂。最终，在喀山（Kazan）建立起 38 家政府所有的铸造厂，在彼得堡的钢厂数目与此相同；在莫斯科有 39 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奥卡（Oka）河流域则有 70 家之多。精确的生产指标未能保留下来，但 1718 年的总产量据估算应当在25 000吨以上。

尽管产量很高，但俄罗斯工厂中的工具与技术仍然十分落后，产品质量也很低。1730 年以前，政府在生产中占据着支配地位。随着 1735 年伯莱高尔茨（Blagoletz）的高品位矿石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私人企业的发展。德国人斯肯伯格（Schönburg）被任命为矿山总指挥，由他设立的一个委员会主张将所有私人土地上的工厂转变为私人企业。1739 年，位于伯莱高尔茨的工厂被一家公司接管，斯肯伯格、拜伦（Biron）兄弟及一个波兰商人均属于这家公司。乌拉尔山脉的其他工厂也转移到铁匠中的技师及外国人手中。当拜伦兄

弟撤出以后，由国家控制的旧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又有所恢复。1754 年，国家控制的企业再次被卖掉。到 1750 年，俄罗斯铁的年均出口量突破了19 000吨。

在挪威，铁矿的开采开始于 16 世纪 40 年代，当时主要集中在奥斯陆和斯科恩（Skien）地区。海卡达尔·白卢姆（Baerum, Hakadal）和弗萨姆·白卢姆（Baerum, Fossum）的工厂办得较为成功。还有其他的一些铁厂分布在阿伦达（Arendal）的巴布（Barbu）、海德兰德（Hadeland）、艾迪斯沃尔（Eidsvoll）和艾克尔（Eiker）。这些工厂从名义上说都是在为皇室创造利润。然而，现实的情况则是由于其出产和收益很不理想，皇室很快便对它们失去了兴趣。1624 年，一家由丹麦资本投资的私人公司接管了挪威的铁矿。17 世纪 30 年代，另有其他一些企业家获得了开矿许可权。

与其他国家一样，使用鼓风炉从铁矿石中炼铁的技术于 15 世纪中期传【503】到了瑞典。在提高精炼铁的质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由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邀请的德国铁匠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时，人们便已经知道了如何生产出可锻造的具有柔性的铁，但真正的批量生产则是在 1540 年以后。16 世纪末，德国人威廉·冯·维克（Wijk, William van），从尼德兰带来了新的技术。最初，他受雇于查理公爵，后来又投靠了国王约翰三世。在丹纳蒙拉（Dannemora），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炉”取代了旧熔炉，[①] 用一种新工艺生产铁，[②] 这些都为日后的炼钢打下了基础。为了与阿普兰德［主要是丹纳蒙拉（Dannemora），大多数的铁产自那里］的冶铁业相竞争，查理伯爵试图在位于瓦姆兰德（Värmland）的自己的领地上发展冶铁业。然而在 17 世纪上半叶之前，瓦姆兰德的冶铁业并不领先。

到 1600 年，奥斯曼德条形铁（*osmund*）的出口量大大高于铁锭的出口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下事实，即铁锭的产量只相当于奥斯曼德条形铁的一半。到 17 世纪，瑞典的奥斯曼德条形铁失去了往日的重要地位，只有一些小企业还在生产这种产品。

瑞典铁的出口额一直高于铜的出口额，两者的比例大致为 5:3。上述两种产品占瑞典出口总额的 80%。铜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铁则不断上升。自由时期（*Frihesstid*）内，[③] 铁的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 1/3。与之相对，铜的比重下降到原来的 1/10。1720 年，瑞典铁的产量为32 600吨，到 1739 年则上升到了52 000吨。到 18 世纪中期，瑞典铁锭的产量已占欧洲

① 这种炉由木材和泥土混合而成。
② 这是一种起源于列日和纳慕尔主教辖区的炼铁工艺。
③ 指查理十二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

总产量的35%。英格兰是其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在查理十二世执政末期，在英格兰所进口的铁中，有80%来自于瑞典，约占当年英格兰需求总量的40%。这个40%仅占英格兰各类商品的进口总额的4%。新的"铁器时代"还没有开始。瑞典之所以能够成为铁的生产大国，是因为具备以下几项因素：首先它有广袤的森林，可以为冶铁业提供充足的燃料；其次，瑞典的铁矿石比其他国家的矿石品位要高；最后，其冶炼技术在欧洲是最先进的。当柯尔贝尔试图实现法国在冶铁和铸炮方面的现代化时，他选择了移民而来的瑞典工匠来提供技术帮助。英格兰的技师也在努力学习瑞典先进的冶铁方法。直到18世纪，钢的生产在瑞典的冶金工业中还只占很小一部分，在铁【504】的出口总额中大约只占10%～12%。

伴随着生产的大规模扩张，瓦姆兰德成为了瑞典最为重要的产铁省份。一份1695年的对冶炼厂的税收统计表明：瓦姆兰德的铁产量占瑞典全国总产量的22%，纳克（Närke）占17%，瓦斯特曼兰德（Västmanland）占16%，阿普兰德（Uppland）占14%，达拉纳（Dalarna）占7.5%，盖德瑞克兰德（Gästrikland）占6%。哥德堡则充当了瓦姆兰德铁出口的集散地。

这一时期的冶炼厂需要大量的资本。这些工厂一般都由布鲁克斯派路纳（*brukspatroner*）来经营。他们具有与绅士平等的地位，与矿工则有本质的区别，后者的地位通常只不过是普通的农民而已。这些工厂的投资一般都是来自于商人，有些还是外国商人。这些外国商人，通常在设立于斯德哥尔摩或哥德堡的出口办事处购买瑞典的铁。有时，他们会预先交纳一部分货款，有时则提供连续性的信贷。当铁厂获得足够的贷款时，便可以继续向它所雇用的工人、采煤的农民及马车夫提供信贷。有些工厂还生产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以满足瑞典军队的需要。部分小型的兵器也有所出口。其他的商人，如斯特加恩散德（Stjärnsund）的克里斯托夫·波何曼（Christopher Polhem）①，开设了一家专门生产家庭用品和农具的工厂。

3. 玻璃和矿物

欧洲最著名的威尼斯的玻璃制造工艺主要集中在姆莱奴（Murano）岛上，根据1604年的记载，当时有173个家庭从事这一行业。其产品种类十分丰富，从瓶子、贵重的花瓶、镜子到门窗用的玻璃应有尽有。尽管政府出

---

① 参见第488页。

于技术保密的考虑，试图保护其垄断地位，然而自1550年以后，威尼斯的玻璃制造工艺还是传播到了西欧、中欧和北欧的广大地区。

根据乐观的估计，法国的玻璃工厂有两千家之多，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都是昙花一现。第一块大幅的透明玻璃出自诺曼底。诺曼底的玻璃制造商卢卡斯·纳胡（Lucas de Nehou）于17世纪下半叶在位于圣戈拜恩（St Gobain）的工厂中发明了这一方法。在列日主教辖区的低地国家，玻璃制造（*verrerie*）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德国，玻璃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黑森林、图林根州、黑森（Hesse）、威悉伯格兰德（Weserbergland）、哈尔茨（Harz）及厄尔士地区（Erzgebirge）。木材的缺乏在许多地方限制了玻璃工厂数目的增长。作为重要的玻璃工业中心之一的东巴伐利亚（Bavaria）山区，15世纪时已有4家玻璃厂；16世纪时有10家；进入17世纪，只新增加了5家；18世纪上半叶，另有4家新工厂建立起来。波希米亚逐渐发展成为玻璃制造业的中心，甚至在意大利也在模仿波希米亚的水晶玻璃工艺。1739年，曾经将波希米亚的水晶玻璃制作工艺传到威尼斯的布兰提（Braiti），获准在威尼斯而不是姆莱奴岛建立一座熔炼炉。1744年，弗瑞斯莱本（Freyesleben）在埃尔兰根（Erlangen）建立了制镜厂，它同时也生产波希米亚玻璃。许多商人都将玻璃列入奢侈品的名单之中。正因为如此，法国在靠近巴黎的地方建立了圣戈拜恩（Gobain）玻璃厂，彼得大帝也在俄罗斯建立了自己的玻璃厂。

【505】

塞利格一世（Sultan Selim Ⅰ）苏丹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他通过让波斯人中的制陶专家留在伊斯坦布尔做工而从中受益。由此，土耳其的法恩斯（*fayence*）制陶业迅速发展。[①] 首都伊斯坦布尔大规模的建房热潮，极大地促进了门窗用玻璃的生产。摩尔人占领下的西班牙，也有生产和使用带有光泽的陶器的传统。然而，17世纪初，当格拉纳达人（Granada）征服并最终驱逐摩尔人以后，这一传统便消失了。此后，这种带有光泽的陶器主要产自瓦伦克拉。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家庭用品主要产自卡斯蒂利亚的塔拉维拉—德拉雷纳。最初，那里的生产深受意大利制陶业的影响，以后逐渐转向仿照来自于东方的亚洲风格的作品。1726～1727年间，阿兰达（Aranda）王朝建立了阿尔克拉（Alcora）制陶厂，不久它便与威尼斯的工厂展开了竞争。在西班牙南部，蓝陶（*azulejos*）生产的分布极为广泛，其中塞维利亚是重要的生产中心。瓦伦克拉则以生产普通陶器和带有光泽的陶

① 来自马约卡的法恩斯陶器（*Fayence*）、法恩扎陶器（*faenza*）以及来自马略尔岛的马略尔卡陶器（*majolica*）和来自荷兰的陶器（*aardewerk*）都是地方上出产的陶器，以区别于后来的半透明的瓷器。

器为主。在塞维利亚和瓦伦克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建在城外，其中最著名的在马尼塞斯（Manises）和帕特纳（Paterna）。同样，在葡萄牙，陶器生产的分布也较为广泛。

意大利最早的陶器生产中心是佛罗伦萨和法恩扎（Faenza），最早从事这一行业的是卡费格奥罗（Caffagiolo）和杜兰特堡（Durante），在短时期内还包括锡耶纳（Siena）。法恩扎（Faenza）的皮罗塔店（Casa Pirota）则最为著名。1528 年，来自杜兰特堡（Castel Durant）的最伟大的技师尼古拉·佩里派伦（Nicola Pellipario），带着他的儿子戈多·弗塔纳·佩里派伦（Guido Fontana Pellipario）来到了尤比努（Urbino），他们开发出了艾斯托瑞迪上色法（istoriati-painting），从而使那里变成了著名的陶瓷工业中心。

威尼斯的瓷器非常著名，以至于 1520 年费拉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的阿方索（Alfonso）一世为他的药房定制了 42 只陶罐，其制作过程由提香（Titian）负责监督。16 世纪后半叶，威尼斯最为著名的陶器技师是艺术大师多米尼克（Domenico）。

装饰性陶器——法恩扎陶器（*bianco di Faenza*），使制陶业自 16 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分支。这一趋势得到了法兰西和巴伐利亚王室的 【506】 欢迎。法恩扎和其他城市兴旺的制陶业引来了都灵、热那亚、萨沃纳、阿比索拉（Albissola）和卡斯蒂利亚等城市甚至远在法兰西和波希米亚的城市来模仿它们的工艺。在威尼西亚（Venetia）大陆，特别是在帕度亚，奥斯曼王国（Ottoman）的制陶工艺被特别模仿。到 17 世纪末，带有花饰的陶器在阿布鲁齐（Abruzzi）的卡斯蒂利亚（Castelle）和圣昆克（Qunico）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巴萨诺（Bassano）和锡耶纳成为了卡斯蒂利亚饰品的生产中心。直到瓷器被发明出来以后，伴随着人们对中国风格艺术品的追求，花饰陶器的生产才日趋凋敝。

与此同时，制陶技术也扩散到了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广大农村。从 17 世纪末开始，一种带有蓝色图案或花纹的适合绘制亚洲风格图画的瓷器在尼德兰兴盛起来。在法国，陶器的生产地是鲁昂和巴黎［圣克罗德（St Cloud）和塞里斯（Sèvres）］。真正的“中国式”的硬瓷是由萨克森人约翰·弗里德奇·波特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烧制出来的，由此促成了梅森（Meissen）的瓷厂于 1705 年的建立。从那时开始，德意志各公国的君主们都在各自的领地上的工厂中仿制迈斯（Meissen）的瓷器，这几乎成为贵族中的一种时尚。随着吸烟习惯的兴起，一项特殊的行业——陶瓷烟斗制造业出现了，它的中心是荷兰的高达（Gouda），1751 年时共有 374 位烟斗制造商。

1400年以后，当石造房屋开始大规模地取代木制房屋之后，在欧洲对石头与砖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在山区，出现了专门的采石场，如意大利的卡拉拉（Carrara）采石场，德国的本瑟姆（Bentheim）、威悉伯格兰德（Weserbergland）和保穆堡（Baumberge）采石场等。在安德纳克（Andernach）地区，石磨的生产是一项古老的出口行业。黑尔格兰德（Helgoland）和塞格堡（Segeberg）的石灰，科特兰德（Gotland）岛的石灰石和砂石，都是重要的建筑材料。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如伦巴底（Lombardy）、尼德兰和荷兰北部，则是以砖代替石头。在格尔德兰德（Gelderland）和艾瑟尔省（Overijssel），制砖是一项分布极其广泛的行业，其部分产品还出口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甚至远到英格兰。攻城技术的发展，使及时维修被战争破坏的城墙（通常用砖而不是用石头筑成）并建造卫城内碉堡便显得极为必要。这也有力地促进了制砖业的发展。在法国、比利时及德国西部的广大区域内，人们[507]常用石板作为覆盖屋顶的材料。

4. 化学工业

在许多工业生产领域中都要依赖于化学变化和过程。漂白、印染、制革和造纸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在一些金属企业中，如在铅中添加铜元素使之更加坚固，剔除汞中的一硫化汞等，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化学知识。玻璃制造、肥皂、火药、油漆、亮漆、胶及食糖的生产也离不开相应的化学反应过程。

威尼斯、马赛和塞维利亚是重要的肥皂制造中心，这三座城市所需的橄榄油均能得到充足的供给。冰岛、瑞典和西西里的硫磺，以及波罗的海的硝酸钾是制造火药的必备原料。在交通便利且水力充沛的地方更适合建立火药厂，汉堡、吕贝克和纽伦堡正是能够满足上述条件的地方。

5. 木材和煤炭

从矿石的开采到产品的最终完成，对于所有的工业部门来说木材都是最基本的物品。在熔炼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木材。在铁的主产区，如塞格兰德（Siegerland）建立起了专门的木材生产机构，它们砍伐那些树龄在10～15年的树木并将其烧制成木炭，其产品甚至远销到索恩兰德（Sauerland）和马克。在拥有橡树林的地方，特别是在阿登高地（Ardennes）和德国西北

部，人们使用橡树皮来鞣革。在拜尔斯特沃德（Bayerischer Wald）和波罗的海南岸地区，木材被烧制成为钾碱，以供玻璃制造和印染行业使用。

造船和修船过程中两种必不可少的物资是柏油和沥青。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这两种产品在瑞典和芬兰都已实现了大规模生产。18 世纪，俄罗斯加入了这一行列。挪威也应视为一个生产国，只是产量要小得多。在尼德兰和其他西欧国家中，对木材存在着几乎永远难以满足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是为了建房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造船。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被砍伐下来的树干在莱茵河、多瑙河及其他河流中顺流而下。产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从 16 世纪开始，木材加工业日益发展起来。以水力驱动的大锯将树干锯成方梁和木板。在尼德兰，尤其是在赞丹（以彼得大帝访问过的“木匠村”而闻名），以及靠近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等地，大型的木材加工厂是人们所熟悉的景象。【508】

早在 1500 年以前，当人们在中欧地区为各类工业活动准备必需的燃料时，便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面对日趋减少的森林资源，政府被迫限制了用于冶炼和铸造目的的对森林的砍伐。与此同时，开始全力进行以煤替代木炭的试验，即使在哈尔茨和厄尔士地区这类木材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也是如此。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中期，只有位于列日和亚琛地区的煤矿得到了较为深度的开采。到此时，采矿的步伐开始明显地加快了。16 世纪上半叶，列日地区煤的总产量增长了 2 ~ 3 倍，以适应列日及其周围地区的工厂里炼铁及其他金属加工过程中对燃料的需求。此时，产自列日的煤与产自泰恩河（Tyne）的煤在出口市场上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亚琛和鲁尔地区，煤在工业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英格兰逐渐成为第一大产煤国。早在 17 世纪初期，在南部内陆、约克郡、南兰开夏郡及布里斯托尔地区和深谷、森林等地，煤炭已经被广泛使用。在玻璃、制砖、瓷砖、盐的提取、肥皂及其他多种需要加热的生产过程中，均以煤炭作为燃料。约克郡沿海地区铝工业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煤炭的充足供给。纽卡斯尔煤炭贸易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1563 ~ 1564 年间，大约有 33 000 吨煤炭被装船运走，到 1634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452 000 吨。森德兰德（Sunderland）煤炭的出口量也达到了 69 000 吨。在上述出口中，有 1/4 ~ 1/3 是输往伦敦的。1580 年，伦敦进口的由海路来的煤炭降低到 15 000 吨以下；然而，内战结束以后，其进口量很快就上升到了 323 000 吨。

在苏格兰南部、威尔士及英格兰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出产煤，其产量约为

200万吨，大致相当世界其他地方产量总和的5倍。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萨弗里（Savery）和纽卡门（Newcomen）分别发明了蒸汽抽水机（1698年和1710～1712年）。纽卡门（Newcomen）的燃煤蒸汽抽水机，于1712年在达德利堡（Dudley Castle）附近的煤矿中首次投入使用，其任务是抽干矿井中的积水。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设备被介绍到了英格兰及欧洲大陆的许多煤矿之中。列日、蒙斯比（Mons）和沙勒罗比（Charleroi）的例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发明被接受的迅速程度。纽卡门设计的第一台抽水机最早在英格兰投入使用是在1705年，在列日地区的使用是在1720年，在沙勒罗比（Charleroi）地区的使用在1725年，在蒙斯比（Mons）地区则是在【509】1734年。

6. 纺织

（1）不列颠诸岛

传统上，纺织工业多集中在诸如考文垂（Coventry）这样的老工业城市中。然而，从中世纪开始，部分生产和加工过程已转入乡村。纺织工业的技术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使用经过梳理的羊毛的“绒线”织造法，它既没有漂洗也没有发酵；第二种则是真正的“毛织”法，它要漂洗、发酵和剪毛。17世纪，在萨福克（Suffolk）和肯特等地，无论是绒线织造法还是毛织法都呈现出衰落的局面。然而，在另外三个地方（西南部及英国的北部和东部）则特别发展了这两种织法。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南卡斯特伍德（Costwolds），主要生产双幅黑色布料、粗绒布及其他低档产品。粗绒布也产自于约克郡的西区，在利兹附近则更为集中。著名的肯德尔绿色粗呢出产于威斯特摩兰德（Westmorland）。埃利诺·卡罗斯·威尔逊（Eleanor Carus-Wilson）教授指出：正是因为水力的使用，使英格兰乡村的织布业较尼德兰的纺织业更具优势。[①] 移民到英格兰的佛兰德（Flemish）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纺织工人，带来了他们织造“新呢绒”的技术（一种轻型的绒线织造法），这些技术在诺福克（Norfolk）、艾塞克斯（Essex）和萨福克（Suffolk）生根，并使它们发展成为新兴的纺织工业中心。在艾塞克斯（Es-

① 卡罗斯·威尔逊（E. Carus-Wilson）：“毛织工业”，《剑桥经济史》第2卷，第409页以后。

sex)，“贝斯”（bays）出产于克彻斯特（Colchester）、布雷因特利（Braintree）和船坞区。诺里奇（Norwich）出产的“棉毛交织衬里布”则是通过精细的绒线织造出来，有些还加入了丝线和棉线。德文郡（Devon）则主要出产哔叽。16 世纪下半叶，当传统的毛纺织品的出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时，这些新品种纺织品的出口则稳步上升。

英格兰纺织工业的另外一个分支是，使用棉花和亚麻的混合物生产诸如粗而坚固的棉布、斜纹布和有色亚麻织带等产品。它在 16 世纪中逐渐成长起来，但与毛纺业相比要年轻得多。那些为避难而来的纺织工人加快了它的纺织进程。与毛纺业一样，这一进程一开始也是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最初，它出现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波尔顿（Bolton）和曼彻斯特周围，以及多塞特（Dorset）、柴郡（Cheshire）和德比郡（Derbyshire）的部分地区。布商们从在伦敦的土耳其商人那里购买到了一种新的原料——棉花。这种新兴的生产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场外生产制度进行的。当然，也有一些乡村中的独立技师自己雇用了工人进行生产。直到 1750 年，对居住在城里的商人的依赖才逐渐变得较为普遍。

爱尔兰出产的壁缘及其他廉价纺织品，在美洲的农场及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沿岸各国找到了市场。但当 1699 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之后，它们被规 [510] 定只有通过英格兰才能出口。从 18 世纪初开始，棉纺织品的生产在斯派特菲尔德（Spitalfields）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蓬勃兴起。粗纺的花格布及未印染的白布是其主导产品。

18 世纪中期，亚麻行业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最终生产出了能够与欧洲大陆产品相媲美的高质量的产品。爱尔兰的亚麻纺织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小佃农，生活的贫困迫使他们参与到本国的工业生产中来，以赚取工资贴补家中的收入。由于他们的工资很低，保证了爱尔兰的亚麻制品与那些产自德国、荷兰、比利时及卢森堡等老工业中心的产品相比，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在苏格兰，成立于 1727 年的“制造商委托理事会”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亚麻业的发展。大量的纱线出口到爱尔兰和英格兰。苏格兰粗亚麻布主要是为了适应农场的需要。艾尔弗（Fife）、珀斯（Perth）和格拉斯哥（Glasgow）成为主要的生产中心。1742 年出口津贴法案的目标是刺激出口。为了同一目的，1746 年组建了“不列颠亚麻公司”。1741 年，亚麻的产量为 4 858 190码，比 1728 年的产量翻了一番。到 1750 年，其产量又增加到 7 752 540码。

17 世纪和 18 世纪，织袜业在许多落后地区开始传播开来，如北约克郡的山谷及阿伯丁（Aberdeen）的内陆地区等。在多塞特（Dorset）和萨莫塞特（Somerset）的部分地区，乡村中的针织业也是人们所常见的景象。

早在 1500 年以前，伦敦就一直垄断着一个丝绸工业，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主要生产中心的地位。1629 年，捻丝工们联合起来。1685 年，熟练的雨格诺教徒（Huguenot）移民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伦敦以外的地区，生产开始向肯特、艾塞克斯（Essex）和考文垂（Coventry，主要生产丝带）扩散。在卢比（Lombe）的发明出现以后，捻丝转移到了那些水力资源充足的地方，而在斯皮特菲尔德（Spitalfields）等地，仍然停留在手工捻丝阶段。

（2）低地国家

中世纪时期，尼德兰南部地区就已经成为全欧洲数一数二的高度工业化地区。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佛兰德斯、海瑙尔特（Hainault）、布拉班特和默兹河（Meuse）谷地。早期的工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随着市场的 [511] 不断扩大及行会作用的结果，促使工业开始向农村转移并最终站稳了脚跟。16 世纪的宗教和政治矛盾也迫使部分商人移居到英格兰、尼德兰北部和德意志。当纷争趋于平静之后，在里尔（Lille）附近的农村中又恢复了呢料的生产；在纽瓦科克（Nieuwkerke）和伊珀尔（Ypres）地区，纺织工业的纺织势头一直保持到 18 世纪。

棉纺和混合纺织的出现，避免了传统的纺织中心胡德斯库特（Hondschoote）的衰败，在布鲁日地区及一些诸如保波瑞英（Poperinghe）这样的小城市中，这一行业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亚麻制品业则保持了稳步的增长，并在作为中佛兰德斯（Flanders）、泰尔特（Tielt）、罗斯莱尔（Roselaare）、艾特塞格姆（Itzegem）和艾克罗（Eeklo）的原有的出口目的地伊伯利亚的港口中找到了理想的市场。农村中的生产者将其生产的毛线提供给布鲁日、根特、奥德纳德（Oudenaarde）和科特赖克（Courtrai）。1689 ~ 1713 年的战争结束以后，其生产又得以恢复。1765 年，根特地方官员估算佛兰德斯亚麻制品的总产量约为100 000匹（这一数字或许比实际产量要低得多），并满意地看到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出口到了法国、英格兰和德国。在整个 17 世纪，南尼德兰的亚麻生产完全依赖于北尼德兰的漂白厂，尤其在哈罗姆（Harrlem）更加如此。1700 年，一座庞大的漂白工场建立于安特卫普城外的鲍格豪特（Borgerhout）。另外一些类似的工厂也陆续地建立起来。

在城市中雇用的劳动力数量与在乡村中所雇用数目相差无几的另一个行业是织带业。精致的产品一般出自城市，而农村中的女性劳动力织造的产品相对粗糙，她们的产品除了在农村市场销售以外，也有部分产品出口到西班牙及其在美洲的殖民地。

当西班牙人被驱逐出尼德兰以后，他们得到了列日主教的领地。由于在对比利时的出口中遇到了困难，列日地区的韦尔维耶（Verviers）的布商开始在东部地区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幸运的是，在赫弗（Herve）的乡村中正在进行着从传统的种植业向畜牧业转移，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领域中被释放出来，成为发展工业的后备军。正因为有这样的机遇，韦尔维耶（Verviers）的布商们，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取得并保持住了欧洲纺织工业中心的地位，其年产量大约为22 000匹。17 世纪末和整个 18 世纪中，尽管有许多纺织工人被吸引到了莱顿（Leiden）的纺织工业中，列日和林堡（Limburg）地区的纺织工业仍然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这里的工资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王公贵族在他们的领地上都实行了保护性的政策。据估算，18 世纪中期，在维斯德（Vesdre）的纺织工业领域工作的工匠有25 000人之多。

尼德兰的东部也出产亚麻，亚麻布则生产于凯姆彭（Kampen）、迪温特（Devnter）和苏特芬（Zutphen），有部分产品通过迪温特（Devnter）向外出口。此后，特温瑟（Twenthe）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其加工的亚麻则是【514】从格尔德斯（Guelders）的奥维克沃特（Overkwartier）、莱茵河区域及威斯特伐利亚等地进口的。在芬洛（Venlo）和马斯特里赫（Maastricht），亚麻生产与原有的织布工业结合在一起，其产品则出口到了德意志南部及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在泽兰和荷兰，利用进口自英格兰、苏格兰及西班牙的羊毛为原料，纺织工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口部门。它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莱顿、高达和哈勒姆。在印染工艺方面，开始使用茜草和菘蓝。米克莱普（*meekrap*，一种红色染料）主要种植于泽兰，它同时也从其他地区如法国南部进口一部分。菘蓝进口自林堡和朱利克（Jülich），靛青及其他染料也都来自海外。由此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渠道的行业。

随着尼德兰移民的到来，这里的技术和企业都获得了新的活力。从 16 世纪末开始，莱顿的纺织工业日趋繁荣。到 1600 年，莱顿纺织品的年产量上升到40 000 ~ 50 000匹；到 1664 年，达到了其顶峰的144 000匹。从一开始，这里的纺织工业便保持了以往所有城市工业所具有的特征。到后来，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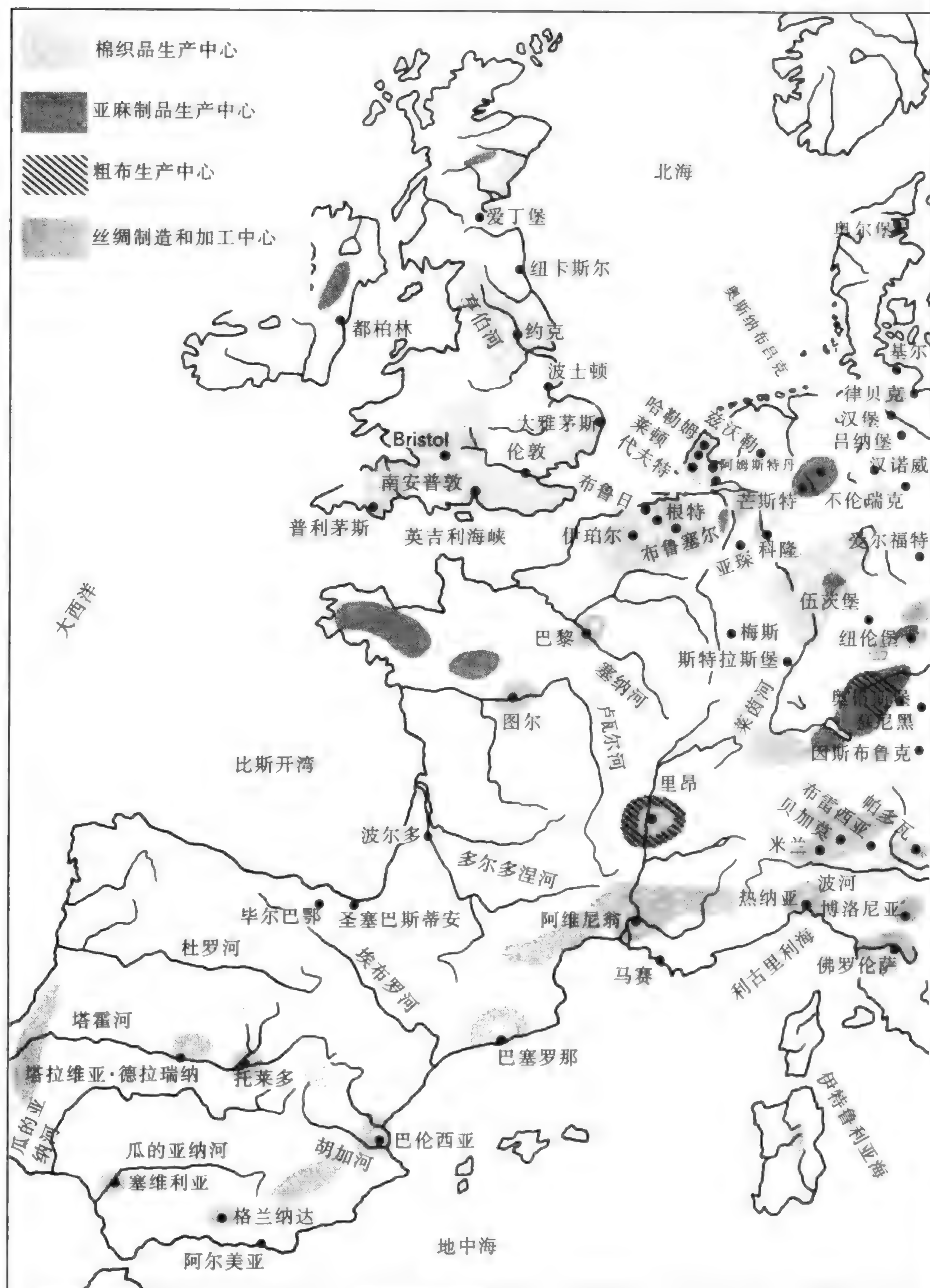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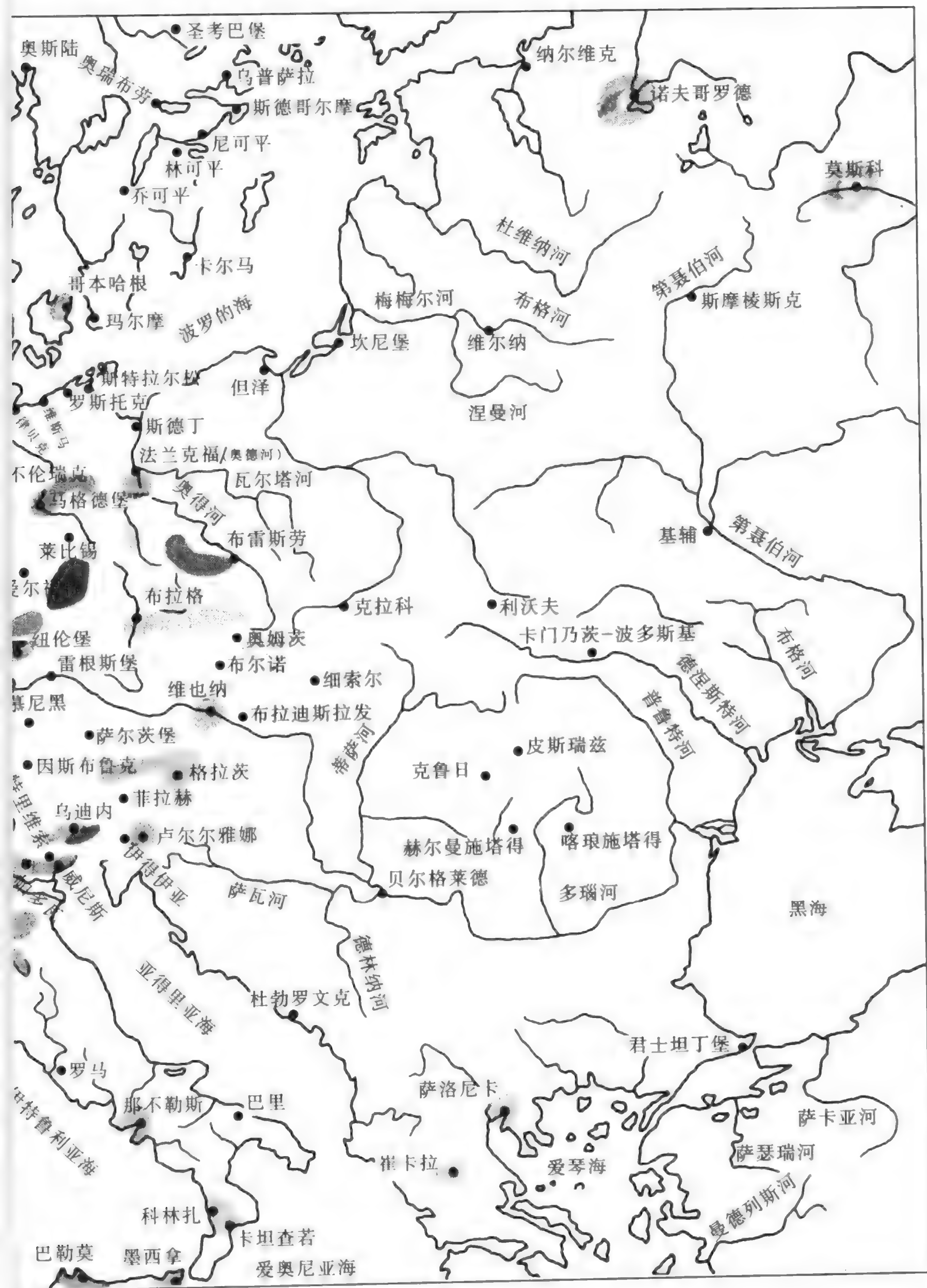

棉织品生产中心
亚麻制品生产中心
粗布生产中心
丝绸制造和加工中心
北海
爱丁堡
纽卡斯尔
都柏林
约克
波士顿
Bristol
伦敦
南安普敦
普利茅斯
英吉利海峡
大西洋
巴黎
塞纳河
图尔
卢瓦尔河
比斯开湾
里昂
波尔多
多尔多涅河
毕尔巴鄂
圣塞巴斯蒂安
阿维尼翁
马赛
杜罗河
埃布罗河
塔霍河
塔拉维亚·德拉瑞纳
托莱多
巴塞罗那
瓜的亚纳河
巴伦西亚
胡加河
塞维利亚
格兰纳达
阿尔美亚
地中海
根特
布鲁日
伊珀尔
布鲁塞尔
科隆
亚琛
梅斯
斯特拉斯堡
莱茵河
伍茨堡
纽伦堡
因斯布鲁克
汉堡
吕纳堡
律贝克
基尔
汉诺威
不伦瑞克
爱尔福特
米兰
热纳亚
博洛尼亚
佛罗伦萨
利古里亚海
伊特鲁利亚海
波河

图8　纺织品生


圣考巴堡
奥斯陆
奥瑞布劳
乌普萨拉
斯德哥尔摩
纳尔维克
诺夫哥罗德
尼可平
林可平
乔可平
莫斯科
卡尔马
杜维纳河
哥本哈根
第聂伯河
梅梅尔河
布格河
斯摩棱斯克
玛尔摩
波罗的海
坎尼堡
维尔纳
斯特拉尔松
但洋
罗斯托克
斯德丁
涅曼河
法兰克福(奥德河)
瓦尔塔河
玛格德堡
奥得河
基辅
布雷斯劳
第聂伯河
莱比锡
布拉格
克拉科
利沃夫
纽伦堡
奥姆茨
卡门乃茨-波多斯基
布格河
雷根斯堡
布尔诺
细索尔
德涅斯特河
维也纳
布拉迪斯拉发
普鲁特河
萨尔茨堡
皮斯瑞兹
因斯布鲁克
格拉茨
克鲁日
菲拉赫
乌迪内
卢尔尔雅娜
赫尔曼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
伊得伊亚
贝尔格莱德
萨瓦河
多瑙河
威尼斯
黑海
德林纳河
亚得里亚海
杜勃罗文克
君士坦丁堡
罗马
萨洛尼卡
那不勒斯
巴里
萨卡亚河
爱琴海
萨瑟瑞河
崔卡拉
曼德列斯河
科林扎
卡坦查若
巴勒莫
墨西拿
爱奥尼亚海

产中心的分布

有很少一部分生产过程转移到了布拉班特的乡村。哈勒姆的漂白业也同样明显地带有城市工业的特征。

其他纺织品的生产与这些国家中业已存在的各种工业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南部地区，挂毯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布鲁塞尔、布鲁日、安特卫普和其他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城市中。雅格布·冯·莫林（Jakob van Mollen）则于1689年在乌得勒支城外建立了自己的丝绸厂。

(3) 法国

法国的纺织工业主要分布在广大乡村。与英格兰和尼德兰相比，法国的纺织工业要落后得多。16世纪纺织工业的扩张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各类地区性的纺织企业不断建立。普瓦图（Poitou）、皮卡、奥尔良周围、贝里（Berry）和朗格多克就是这样的区域性生产中心。在所有这些地方，纺织工业的发展均是建立在场外生产制度之上的。纺织业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赛特瑞（*sayetterie*），开始在亚眠分支繁荣起来，16世纪时，它发展到顶峰。最终，卢维斯（Louviers）、色当（Sedan）、艾尔伯弗（Elbeuf）和阿伯维尔（Abbevill）都发展成为纺织工业的中心。亚麻和帆布制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布列塔尼、诺曼底、下缅因（Maine）和勃艮第。棉纺业最初起步于里昂地区，之后扩散到了诺曼底、孚日山脉（Vosges）和奥尔良。

在波旁奈依（Bourbonnais）、奥弗涅（Auvergne）、瓦雷（Velay）、阿朗松（Alençon）及诺曼底的部分地区专门从事花边生产。丝绸的生产则集中在都兰（Touraine）、下朗格多克、尼姆地区、维瓦莱斯（Vivarais）及普罗[515]旺斯。里昂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繁忙的丝绸工业中心。亨利五世和他内阁的重商主义者拉弗玛斯，十分关注丝绸工业的发展并采取了许多鼓励性的措施。作为柯尔贝尔雄心勃勃的工业发展规划的一项内容，曾经试图模仿荷兰，发展挂毯生产。著名的法国哥白林双面挂毯（*gobelin*）由此产生。

(4) 西班牙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向法兰德斯和意大利出口了大批量的羊毛。其余的羊毛则留在国内加工，其生产中心主要有塞戈维亚及其周围、昆卡（Cuenca）、科尔多瓦（Córdoba）、比扎（Baeza）和乌比达（Ubeda）。棉布的生产在1548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300匹。来自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需求不断地增加，与之相反，对尼德兰的羊毛出口在16世纪60年代遇到了麻烦而有所下降。1584～1589年间，塞戈维亚纺织品的年产量在12 500～13 049

匹之间，最高产量则突破了16 000匹。根据吕兹·马丁的研究，直到1590年，西班牙和印度的市场一直在扩大。胡安·维拉·西蒙纳（Juan de Villa Ximena）的例子反映了1570年以后的生产集中：维拉·西蒙纳在他自己的工厂中雇用了100多名工人，另外还有以15个联盟为半径的范围内的1 000多人被间接地雇用为纺纱工。①

自1586年开始，一场结构性的危机打击了西班牙的羊毛生产，但真正的衰退在1650年以前并未真的到来。在昆卡（Cuenca），生产从16世纪末就开始下降。然而，在科尔多瓦（Córdoba）、比扎（Baeza）和乌比达（Ubeda），产出实际上还是在增长的。企业家聚集的中心是科尔多瓦，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口是新教徒。在其顶峰的1580年和1581年，科尔多瓦（Córdoba）布的产量突破了18 000匹，而在乌比达和比扎却从未超过8 000匹。这一产出水平一直保持到1585年，直到出现了比卡斯蒂利亚还要迅猛的衰退。是因为塞维利亚的资本更愿意投向商业部门而不是工业领域吗？② 无论什么原因，17世纪的人们目睹了西班牙织布业的衰落过程。1733年和1737年的有关重振塞戈维亚和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织布业雄风的努力并不成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贝沙（Bejar）的生产则有所增长。这一局面的形成是贝沙（Béjar）公爵对佛兰德的纺织专家提供保护的结果。1744年，在那里共有145台纺机在工作。

棉纺业的发展得到了波旁王朝（Bourbon）政府的资助，这对于开拓国内市场和殖民地市场是极为有益的。但这还不是加泰罗尼亚棉纺业兴起的真正原因。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对出口纺织品进而从殖民地进口其他商品感兴趣的商人们。与同时代的法兰西和英格兰政府一样，菲力浦五世于1717年和1718年，先后两次禁止进口和销售产自于中国及亚洲地区的丝绸和其他纺织品。1728年，禁令再次被颁布，并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了殖民地所产的亚麻制品、所有产自亚洲的棉纺织品及其它们的欧洲仿制品。这些保护措施鼓励了法国的企业家移居到巴塞罗那建立自己的工厂。由此，棉纺织业扩散到了整个加泰罗尼亚。在18世纪30年代，人们看到在埃斯特班·卡纳斯（Esteban Canals）的工厂中，已经开始生产“印度织品”。在随后的几年中，又有其他一些企业加入到这一行列，有些企业就建立在巴

[516]

① 菲力浦·吕兹·马丁：“Rasgos estructurales de Castilla en tiempo de Carlos V”，载《货币与信贷》第96节（马德里，1966年），第91页及以后。

② 见吕兹·马丁：“La empresa capitalista y la indústria textíl castellana durante los siglos XVI y XVII”，1965年慕尼黑第3届国际经济史大会的通讯。

塞罗那城外。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兴旺发达，以卡潘斯（Campans）和蒙特拉（Mataro）的公司为例，由于缺乏技术和恰当的管理，它们先后都破产了。尽管如此，在1760年时，据说有10 000名工人就业于西班牙的纺织工业部门。

18世纪上半叶，制帽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当时所使用的原料是秘鲁小羊驼（*vicuña*）羊毛。一项颁布于1758年的法案要求出口到美洲的帽子类货品中，至少有一半应当是西班牙的产品。帽子的主要生产中心是马德里、老卡斯蒂利亚（Castile）地区的一些城市以及沿海地区的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塞维利亚、巴拉美达的圣卢坎（San Lucar de Barrameda）和科罗纳（Coruña）等地。建在马德里附近的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工厂则是最为重要的工厂之一。

与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西班牙毛纺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亚麻和大麻制品（如风帆）的生产在16世纪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萎缩。这部分产品主要用于装备船只及出口美洲市场。

16世纪，丝绸的纺织在格拉纳达（Granada）王国兴起，这是来自于热那亚、托莱多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产业在1546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1550年其产量为135 000磅。这是由分散于355个城市和乡村中的40 000名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瓦伦西亚的丝绸工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进入18世纪以后还有了一定数目的增长。而托莱多、巴塞罗那和格拉纳达的丝绸工业却日趋衰落。1742年，维莱尼卡拥有纺机2 400架，到1750年增长到了3 400架。相反，格拉纳达的纺机数目则由1724年的1 000架下降到1750年的200架。在木尔西亚（Murcia），也出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加泰罗尼亚和塞维利亚的丝绸工业从整体上说是行将消亡的。在塔拉维拉—德拉雷纳和马德里（1719～1735年）建立新的大型工厂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没有奏效。在西班牙，实现经济的复苏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517]

（5）德国

德国传统的毛纺业中心集中在莱茵河下游地区的亚琛、杜伦、曼斯特斐尔（Münstereifel）和科隆。与列日主教领地相同步，其毛纺业也是在18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最初的织布业在蒙斯卡罗（Monschau），之后扩展到了广大农村。另外一个纺织工业中心从莱茵河中游一直延伸到黑森（Hesse）。在斯瓦比亚（Swabia）的各个皇帝所拥有的城市及纽伦堡，也从事布的生产。巴伐利亚的纺织工业中心是慕尼黑，1608年，那里的120名织布

师傅，在城里和附近的乡村中雇用了3 000名纺纱工。不伦瑞克、斯特达（Stendal）和阿特马克（Altmark）的扎尔茨威德（Salzwedel）、洛兹（Lausitz）的科特布斯（Kottbus）及西里西亚的高里兹（Görlitz）都是著名的布业中心。与在英格兰和法国的情况极为相似，在这里也是由尼德兰的移民带来了织布的新技术以及织造花边、地毯、丝绸的刺绣及织袜的工艺。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纺织工业在韦瑟尔（Wesel）、不来梅、汉堡、法兰克福、弗兰肯塔尔（Frankenthal）、格拉（Gera）、默兹威兹（Meuselwitz）及后来的克雷菲尔德（Krefeld）均可以见到。

在德国南部的卡尔夫（Calw），毛纺业在这一土地贫瘠但却有着悠久牧羊历史的地区发展起来。16 世纪末，一批颇具远见的印染商在织布业中引进了场外生产制度。到 17 世纪初，已有 500 ~ 600 名织布工人。1622 年，15 位企业家一直同意合并成一家公司。在 30 年战争期间，出现过暂时性的分裂，到 1650 年，他们又恢复了合作。

亚麻的纺织在威斯特伐利亚、下萨克森、斯瓦比亚（Swabia）及德国东部地区均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其原料来自于靠近德国北部沿海的狭长地带，那里同时也产出大麻。科斯费尔德（Coesfeld）、明斯特（Münster）、比勒弗尔德（Bielefeld）、明登（Minden）和赫尔福德（Herford）是威斯特伐利亚场外生产发展的中心。这里也是集中设立担负商品展示与监控任务的机构——督察的地方。最初，督察只出现在个别城市中，后来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接受了这一制度并将其推广到全国。第一个督察机构由勃兰登堡（Brandenberg）政府于 1650 年设立于泰克伦堡（Tecklenburg）。此后，在艾本布伦（Ibbenbüren）、林格锐奇（Lengerich）和威斯特坎普林（Westerkappeln）也陆续建立起来。从 1634 年起，奥斯纳布鲁克（Osnabrück）的亚麻业获得了特许权。战争结束以后，德皇再次确认了这一授权。

在拉文斯堡（Ravensberg），大选帝侯试图按照奥斯纳布鲁克的公开展示体制（*Leggeswang*）来组织本地的亚麻生产与销售。1669 年，建立了 3 个督察机构来监控该州粗亚麻制品的生产。1718 年颁布的法令允许在农村中 [518] 自由地进行亚麻的纺织。从此以后，农村中出产的精致亚麻制品开始稳步地增加。城市中（如比勒弗尔德和黑尔福德）的亚麻纺织开始走向衰败，这与英格兰毛纺工业的兴起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17 世纪，在利伯（Lippe）州的莱蒙哥（Lemgo）、扎尔茨福林（Salzuflen）、多特蒙德（Detmold）、不卢姆堡（Blomberg）和合恩（Horn）均建立起了督察制度。30 年战争期间，这些城市的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亚麻

的生产转由农民来进行。1663 年，赫尔曼·阿道夫（Hermann Adolf）伯爵要求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应当恢复过去的督察制度，并限制本国商人从事亚麻贸易。随后，私人的督察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但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这一让步，丝毫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扩张。

在亚麻的生产过程中，决定其质量高低的是漂白工序。与其他许多最终工序（如印染、食糖的精炼、烟草的切丝等不胜枚举）一样，德国通过出产大批量的粗制亚麻制品而有效地获得了相关技术。在德国，对有关必需技术的开发一直也没有停止。1719 年，以米尔斯（Milse）的温道夫（Warendorf）为蓝本，在拉文斯堡（比勒弗尔德）建立了一家亚麻漂白工厂。漂白工人也被允许在荷兰和爱尔兰工作，以便学习有关漂白方面的技术。

斯瓦比亚（Swabia）部分地区生产的亚麻制品在市场上享有盛誉，其产地从康士坦茨（Constance）湖和施瓦本山一直延伸到了多瑙河和勒克（Lech）河。与圣加伦和拉文斯堡的“大公司”相比，康士坦茨在织布领域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动摇。阿尔高（Allgäu）地区的几座城市如乌尔姆（Ulm）、柏伯瑞克（Biberach）、奥格斯堡、迈明根（Memmingen）和考弗布伦（Kaufbeuren）则保持住了作为纺织工业中心的名誉。这里尤其以出产一种粗糙而坚固的棉布而闻名。进入 16 世纪，这种粗布（fustians）的生产日益萎缩，并最终为亚麻的生产所代替。此时的亚麻制品已开辟出了广阔的海外市场。16 世纪，在乌尔姆周围的城镇和乡村中，共有 450 名织布工，他们将其产品提供给督察进行销售。除了乌尔姆和乌特姆堡（Württemberg）的亚麻布以外，产自巴伐利亚和西里西亚的亚麻布也在这里进行漂白。阿尔高的亚麻制品生产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610 年，到达鲁特柯克（Leutkirch）市场上的经过漂白以后的亚麻布达到5 000匹。作为亚麻制品生产中心的奥格斯堡，1612 年时已经拥有3 024名纺织工人，但半个世纪以后，只剩下了 735 名。

一批新的生产中心出现并与老的中心展开了竞争。16 世纪上半叶，粗布的生产在威斯合恩（Weissenhorn）的富格尔（Fugger）领地上进入了全盛时期，这里也是进入乌尔姆的门户。在乌特姆堡（Württemberg），16 世纪末，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公爵在尤莱克（Urach）组织了一个纺织行会，并为其成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区。与此同时，他也授权给尤莱克，允许它们垄断全乌特姆堡范围内的亚麻漂白业。【519】

一家成立于 1600 年的公司专门从事亚麻制品的贸易，在 30 年战争期间则出现了亏损。在德国中部以东地区，亚麻制品的生产稳步提高。最初在西萨克森，随后是远在东部的劳济范（Lusatia）和西里西亚，也都积极地发

展起了不断扩张的亚麻漂白业。来自斯瓦比亚移民中的纺织工人给当地带来了斯瓦比亚先进的技术，并以牺牲漂白布的生产为代价，开始进行亚麻布的印染。尽管进行了这么多的尝试，实际上大多数的产品还是被运送到德国南部的纽伦堡去印染的。较低的工资限制了人们对这种相对昂贵商品的消费。

各地的生产几乎都是在场外生产制度下进行的。一般情况下，它是通过集中供货合同（如通过行会来购买）进行的。生产的规模可以从投资额中得以反映。德国南部最大的公司其投资额超过了 80 万弗罗林，而纽伦堡的维提斯（Viatis）和佩勒（Peller）的资本额则约为 100 万弗罗林。在西萨克森、东萨克森、上下劳济范（Lusatia）及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共有3 755 名纺织工人，他们每人负责管理一台或多台纺机。如果再加上波希米亚的纺织工人（约 630 人），则亚麻制品的年产值达到了 63 万 ~ 75 万泰勒尔，这里还不包括产自乡村中的亚麻制品及粗制的亚麻布，也不包括产自图林根、汉纳堡（Henneberg）、美宁格—奥伯兰德（Meininger Oberland）和瓦格兰德（Vogtland）的棉纺织品。

与此同时，以赫斯克堡（Hirschberg）和劳尔（Jauer）为中心，西里西亚的亚麻制品的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748 ~ 1749 年间，西里西亚亚麻制品的出口价值约为 367 万泰勒尔（*thaler*）。当哈普斯堡被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二世征服以后，其亚麻制品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正是由于贝尔格（Berg）伯爵于 1527 年的授权及伍珀（Wupper）河充足的水量，使得埃尔伯菲尔德（Elberfeld）和巴门（Barmen）发展成为亚麻制品的生产中心。麻线产自远在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贝尔菲尔德—明登（Bielefeld-Minden）、利伯（Lippe）州、帕德波恩（Paderborn）、哥特根—汉诺威（Göttingen-Hanover）、西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和不伦瑞克等地的亚麻生产中心。当经过漂白以后，亚麻布被销售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德国的科隆、法兰克福、不来梅和莱比锡等城市。

亚麻制带子的编织也在同一时期内发展起来。尼德兰人发明的织带机可以同时编织出几条带子。棉线和丝线也开始成为织带的新原料。到 17 世纪末，出现了经过染色的带子。巴门（Barmen）的约翰·赫里希·伯科姆尔（Johann Heinrich Borkenmühl）发明的一种织带机①，极大地提高了著名的“巴门”（Barmen）产品的出产。在马克，纺织工业是作为本国的基本工业来组织的。1740 年，仅在伍珀塔尔（Wuppertal）一地，就拥有 300 名纺织 【520】

① 这种机器由机械推动以编织环形或平直的带子、靴带、皮鞋带等，属于一种编织机。

工人。从1738年开始，政府允许他们组建行会。

在威塞尔（Wesel）、科隆、法兰克福和汉堡，16世纪中来自于尼德兰的移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丝绸工业的发展。在科隆，带子生产者于1605年组建了行会，此后不久，其成员就发展到了2 600人。到17世纪中期，在雷根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哈瑙（Hanau）、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和汉堡等城市中开始禁止发展新的织带厂，这表明在上述城市中丝绸工业已经出现。限制性政策使科隆的企业家移居到了多伊茨、穆尔海姆（Mülheim）及莱茵河对岸的贝尔格（Berg）公国。在这些地方，来自于科隆的商人们引进了场外生产制度。其他的技术也被不断地引进。克里斯托夫·安德里（Christoph Andreae）和他的儿子建立了自己的漂白工厂，不久，他们便雇用了600名工人处理各种丝绸和棉布。

莱茵河区域最重要的丝绸工业中心是克雷菲尔德，在其人口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移民来的新教徒。18世纪时，那里有一批相当活跃的企业家，为首者是范德尔·莱恩（Von der Leyen）兄弟。正因为如此，这座城市得到了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大帝的青睐。在库马克（Kurmark）、柏林、普斯坦姆（Potsdam）、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及科普尼克（Köpenick），也出产相当数量的丝绸。

棉纺业的发展集中于斯瓦比亚（Swabia），尤其是在奥格斯堡（Augsburg），在那里，棉布的印染自17世纪就已经开始。图林根、萨克森、格拉（Gera）、戈里兹（Greiz）和克姆尼茨（Chemnitz）都是重要的棉纺业中心。

（6）瑞士

中世纪末期，瑞士亚麻的生产集中在圣加伦（St Gallen）地区，其产品在瑞士全境及康士坦茨湖（Constance）地区享有盛誉。这样，通过其产品，圣加伦可以控制其狭小领土以外的亚麻生产。农村中的纺织业逐渐成长起来，到18世纪初，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圣加伦。与此同时，其他的生产中心如何瑞索（Herisau）、特林根（Trogen）、罗夏（Rorschach）、阿伯（Arbon）和哈普特威尔（Hauptwil）也日益壮大，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并都具备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到1600年，另外一些亚麻生产中心在瑞士中部发展起来，生产主要集中在阿高（Aargau）、卢塞恩区（Luzern）[521] 和威洛索（Willisau）等四个地方。

在苏黎世州，自洛迦诺（Locarno）逃难而来的移民促进了当地毛纺、印染和缩绒等工业的兴起。建立在场外生产制度上的毛纺业逐步发展到该州

全境以及扎戈（Zug）、卢塞恩（Luzern）、格拉罗斯（Glarus）和弗雷阿姆特（*Freie Ämter*），甚至还发展到了偏远的托斯（Töss）谷地和图若格（Thurgau）。纺纱和织造在乡村进行，精梳在城里进行，织物的整理工序则由苏黎世的行会来承担。早在15世纪末，棉纺业就从瑞士北部转移到了苏黎世。最初生产的是混纺织物，到15世纪末已经能够生产纯棉织物。

纺纱和织造为农民提供了收入丰裕的新的就业岗位。由于不在行会的限制范围之内，新的纺织工业获得了自由的发展。生产一般由城市中的发展商来组织，另外也有一些乡村中的手工业者发展成为乡村中的企业家。1622年以后，城市中开始推行一项强制性的政策，要求乡村中的产品只能在苏黎世一地的市场上出售。通过场外生产制度，纺织业在天主教的城市中广泛地传播开来。场外生产制度发展的另外一个中心是位于温特图尔（Winterthur）的苏黎世周围地区，纺织工业同样也传播到了安特雷高（Unteraargau）和卢塞恩（Luzern）周围的乡村。日内瓦和纽弗凯泰尔（Neufchâtel）开始出产印花棉布，并以此为起点将这一行业传播到了附近的乡村。

与此同时，另外的几个棉纺业中心在瑞士东部发展起来。对于圣加伦来说，由于疆域过小，使其在劳动力供给的可靠性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邻近各公国政策的影响。其中对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阿彭泽尔（Appenzell）州、圣加伦的修道院和托根堡（Toggenburg）地区、莱茵河谷地及图尔高（Thurgau）；格拉罗斯（Glarus）、乌拉堡（Vorarlberg）的部分地区、斯瓦比亚（Swabia）南部及格劳布登（Graubünden）等地也包括在这一棉纺业地区之内。18世纪初，在上述这些地方，大约有8万~10万人就业于纺织工业部门，其中1/3的人从事于刺绣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多种，而场外生产制度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一般来说，纺纱和织造工序是由农村中的兼职工人来完成的，而纺纱工序更是集中在贫困地区。

进入18世纪，格拉罗斯（Glarus）州、威尔登堡（Werdenberg）的兰德沃泰（Landvogtei）、瓦陶（Wartau）、尤兹纳克（Utznach）和哥斯特（Gaster）发展成为第二个重要的棉纺业中心。与此同时，"企业家"也在这里出现了。到18世纪中期，纺织工业已成为瑞士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

从中世纪开始，瑞士的苏黎世就已经在织造丝绸。在经过15世纪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生产又得以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555年大批洛迦诺难民移居到此，致使丝绸工业得以不受行会的限制而自由的发展。苏黎世人在丝绸工业中仍然保持着垄断地位，他们通过场外生产制度来组织生产。捻丝为苏黎世所垄断，而络纱和缫丝则由乡村中的劳动力来完成。【522】

16 世纪 60～70 年代，来自于洛迦诺的移民和雨格诺教徒将穗带编织（Pasmentry）引进到巴塞尔。这也是巴塞尔惟一能够成功地对抗行会制度的部门。1612 年，它最终发展成为一项“自由”行业，并从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相反，纺织工业中的其他部门，由于行会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巴塞尔实施的限制由私人自由地从事纺织工业的政策，使许多未能成为巴塞尔自由公民的外国人将企业开办到了乡村，并将其产品出售给城里的发展商。然而，由于 17 世纪 60 年代一种新的机械织布机（*kunstsfuhl*）被发明出来并广为传播，到 17 世纪末，穗带编织手工业者的优势便丧失殆尽，就连他们自身甚至也完全可以被非熟练工人所取代。在巴塞尔地区，丝带的编织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在乡村，织工一般是租用巴塞尔、阿尔高（Aargau）或其他地方的发展商提供的纺机。18 世纪，巴塞尔的发展商垄断了丝带编织机的生产和使用。

1550 年以后，立足于巴塞尔的另一个纺织工业部门是刺绣。而男袜的生产也是一个重要领域，它的生产最初由巴塞尔及其主教领地开始，之后传播到了阿尔高州，进而又传播到了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公国、苏黎世州、卢塞恩（Luzern）州和索洛图恩（Solothurn）州。16 世纪手工刺绣和编织在德国的伯尔尼（Bern）州具有重要的地位，花边的生产则发展于纽弗凯泰尔（Neufchâtel）周围地区。

（7）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直到 17 世纪上半叶，上奥地利在亚麻纺织方面较巴伐利亚仍具有明显优势。到 1713 年，尚存在着 83 个由城市中的亚麻制造商及乡村手工业者所组建的行会。在随后的日子里，巴伐利亚的亚麻生产开始不断地改进质量。1730 年以后，奥地利出产的经过漂白的高级亚麻制品开始面临来自巴伐利亚的激烈的竞争。【523】

尽管克里斯蒂安·森德（Sind）于 1672 年在林茨（Linz）建立起了毛纺厂，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原料供应，毛纺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在林茨的工厂中也聘请过外国的技术专家，劳动力则来自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广大地区。为了能够与进口产品相竞争，1730 年，政府要求这家工厂将其产品的品种扩大到 30 个。到 1735 年，该厂雇用的纺纱工达10 000～12 000人。在玛丽亚·特雷萨时期，它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期。1748 年，其毛纺织品的产量达到了11 763匹。除上述企业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小企业。克

雷姆斯明斯特（Kremsmünster）修道院长，于1749年左右建立了一家毛纺厂并雇用了600名工人。另有一家毛纺厂建立于施泰尔（Steyr）。在下奥地利的斯维坦特（Schwechat），18世纪30年代建立了一座棉纺厂。

其他的一些地区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建有一些纺织工业。在这里，工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进入18世纪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除了外国的企业家外，当地的地主贵族们也积极地投入到工业发展进程中。他们将其所拥有的农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把他们组织于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中的工厂中进行劳动。这样的企业主要有：伍德斯坦因（Waldstein）在奥伯卢登斯多夫（Oberleutensdorf）的工厂，考尼兹（Kaunitz）在斯拉瓦克夫（Slàvkov）和德瑞斯诺夫（Drisanov）的工厂，盖拉人（Gallsa）在赫瑞戴克（Hrádek）的工厂，哈瑞克（Harrach）在马恩河（Man）附近的奈美斯特（Namest）和詹诺维希（Janovici）的工厂，豪格维兹（Haugwitz）在珀斯坦因（Potstein）和奥斯劳（Oslau）河附近的奈美斯特（Namest）工厂，以及洛林的弗兰西斯（Francis）伯爵在克莱朱布（Kladrub）的工厂。从18世纪初开始，利用在波希米亚（Bohemian）和摩拉维亚传统的织布业中所积累的收益，当地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工厂，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普莱尼克（Planic）、塞斯克利普（České Lípě）和泰克夫（Tachov）。1650年以后，棉纺业也逐渐建立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家由泰克斯夫（Textor）于1752年建立于布拉格。

在斯洛伐克，一部分商人于1725年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a Bystrica）建立了一家织布厂，同时聘请了来自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专家。然而，几年后，这些工厂不得不关门大吉。在萨斯丁（Sastin）的另外一家工厂发展则较为顺利，它由洛林（Lorraine）的弗兰西斯（Francis）公爵于1736年建立，雇用的工人数目超过了10 000人。

奥地利的丝绸业是一项古老的手工业部门，其生产中心是维也纳和格拉茨（Graz）。在重商主义思想的积极鼓吹者J. J. 比彻（Becher）的推动下，从法国、荷兰和尼德兰聘请了一批熟练的丝绸工人。在辛森多夫（Sinzendorf）公国的领地温道夫（Waldersdorf），建立了一家新的丝绸工厂。与比彻（Becher）所做的绝大多数试验一样，这家工厂也未能维持多久。然而移民而来的工人却留在了奥地利，并由此形成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在他们的帮助下，丝绸工业还是发展起来了。到1702年，维也纳的20家丝绸工厂仍在纳税。1710年，丝绸技师获准组建自己的社团，当时的入会标准限制在那些至少拥有6台纺机的人，符合这一标准的成员只有24～ [524]

30 个。1717 年，日内瓦的塔夫绸制造商弗兰克斯·杜蒙特（Francois Dunant）获准在维也纳建立工厂并雇用 16 名工人，后来又有 15 名工人加入了他的工厂。然而，他所从事的事业也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1727 年，在维也纳，大约有 30 家工厂同时在生产 1~2 个品种的纺织品。在奥地利的其他地方则生产一定数量的丝袜、丝带和服装边饰。

在更远的阿维欧（Avio）和卢弗瑞杜（Roveredo），有几家生产丝绸原料及丝袜的工厂。绸布则出产于格兰德斯卡（Gradisca）、荷里兹（Horizia）、格拉兹（Graz）及其郊区的姆赫—沃斯塔特（Muhr-Vorstadt）。在更北的地方也建有一些工厂。1725 年，11 名奥地利贵族出资组建了一家公司，他们聘请法国技师来组织建厂并负责培训本国的工人。然而，1729 年时的 42 架纺机到 1732 年时只剩下了 24 架。本国的产品显然难以与进口商品相竞争。由于受缺乏资本、产品质量低而成本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布拉格（Prague）的丝绸企业根本没有竞争力。政府所采取的加强丝绸的一些措施在 18 世纪下半叶之前也未见效。区别于纺织业中一般情况的一个特例是“穗带编织品”（Pasmentry）的生产。1736 年，在维也纳有 22 家花边厂，19 名技术标准方面的专家（*Decretist*）和 18 名登门制作服装的裁缝。享有特权的戈贝尔·加利普（Gabriel Garlipp）在约瑟夫斯坦特（Josefsstadt）的工厂，甚至还出口了价值数千盾的丝带。

（8）意大利

意大利的纺织工业发展极为广泛。然而，进入 17 世纪以后却出现了普遍性的衰退。在威尼斯，17 世纪初毛纺业的年产量达 28 000 匹，到 1700 年则下降到 2 000 匹。1600 年前后，在米兰拥有 60~70 家毛纺厂，年产量为 15 000 匹；到 1640 年，其年产量下降到 3 000 匹；进入 1709 年，更下降到只有 1 000 匹。1600 年，科摩（Como）的 60 家工厂的年产量为 8 000~10 000 匹。进入 18 世纪以后，这里的生产则几乎完全停止了。在佛罗伦萨，16 世纪末拥有 120 家工厂，年产量为 14 000 匹；到 1627 年工厂的数目下降到了 62 家，年产量也不足 8 000 匹，并且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停止。当然，这一时期纺织业也扩散到了其他地区。在特雷维索（Treviso）、帕多瓦（Padua）、贝加莫（Bergamo）、特瑞佐（Tremezzo）、莫纳吉欧（Menaggio）、贝拉焦（Bellagio）和瓦尔特林纳（Valtelline）地区，产量还有了一定的增[525]长。哔叽纺织业在克雷莫纳（Cremona）消失以后，又在蒙特塞利（Monticelli）、布斯托（Busseto）、帕尔马及曼图亚（Mantua）公国发展起来。18

世纪期间，纺织工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1724 年，费罗奥（Ferrero）侯爵在英国人科沃德（Coward）的帮助下，在皮埃蒙特（Piedmont）建立起一家毛纺厂。到 1735 年，那里已发展到拥有 30 架纺机的规模。在其他地方，生产都是在较小的规模下进行的，其产品只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然而，上述这些新的增长，似乎难以使那些古老的生产中心恢复往日的繁荣。

在威尼斯，由行会控制的毛纺业生产仍然持续地下降，到 18 世纪中期，其年产量只有 2 000 匹。由此也波及到了印染行业及生产"土耳其红"的染料生产业。与之相对应，由金泰利（Gentili）于 1727 年设立的棉纺厂到 1763 年时，雇用人数已达 1 000 人。18 世纪初，帕多瓦的拉尼拉行会（*università laniera*）通过场外生产制度来组织棉纺生产，其产量超过了 3 000 匹。但随后，其产量有所下降。少数企业也生产长袜、贝雷帽、手套和其他轻便服饰。维克鲁（Vicenza）附近的斯库（Schio）纺织工业中实行的是自由企业家制度。1738 年，由尼克鲁·泰恩（Niccolo Tron）发起成立的一家拥有 44 台纺机的企业里，雇用工人的数目很快就达到了 500 人。凯伊的发明在意大利的首次使用就是在这家工厂进行的。这里的主要产品是伦敦薄呢（*londrine*），同时也仿制卡尔卡松的呢绒。维罗纳（Verona）保留了传统纺织工业的残余，但其最大的产量（在 1725 年）也只有 744 匹。织袜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维罗纳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在贝加莫斯科（Bergamasco），鼎盛时期约有 80 000 人就业于纺织工业领域，进入 18 世纪以后则不断下降。在托斯卡纳，同样也只保留了其辉煌历史的一小部分。被卡茨（Caizzi）称为又一个托斯卡纳（*Schio della Toscana*）的普拉托（Prato），[①] 工业生产相对要兴旺得多。这一成绩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比森泽奥（Bisenzio）各地广泛地建立起场外生产制度的结果。1738 ~ 1739 年间，普拉托（Prato）布的产量为2 000 匹，同时整理了来自整个公国的超过 15 000 匹的布匹。佛罗伦萨生产的布为4 000 匹。据统计，在整个大公国（不包括首都在内）范围内共在 34 个地方设立了 177 家企业。

亚麻的生产在意大利已经发展为一项本国的行业。在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的维切利（Vercelli）建立了一家亚麻加工厂，到 1757 年时拥有纺机 60 台。另外有一些工厂建立于城市以外的地方。在上述地区从事于亚麻业的人数达 500 人。在伦巴底（Lombardy）地区，传统的乡村工业中心巴

① 卡茨（Caizzi）：《意大利工业史》（都灵，1965 年），第 118 页。

斯托（Busto）和格拉瑞特（Gallarate）仍然在生产亚麻、纬起绒织物和帮巴斜纹绸。克多诺（Codogno）和克雷莫纳（Cremona）也是亚麻加工中心，[526] 但都不及威尼托（Veneto）那么重要。在托尔蒙佐（Tolmezzo）的吉阿科莫—里纽希欧（Giacomo Linussio）的工厂，年产量为 25 000～30 000 匹。而弗拉米迪（Gividale Lorenzo Foramiti）于 1744 年建立的工厂，年产量很快就突破了 20 000 匹。

丝绸的生产很早便在热那亚共和国发展起来。到 16 世纪末，那里已经拥有纺机 18 000 台。到 17 世纪初，这一数字又下降到了 3 000 台；到 1675 年时只剩下了 2 500 台。1635 年，帕维亚（Pavia）拥有 25 家丝绸纺织工厂；到 1700 年，只剩下了 10 家。在科摩，直到 18 世纪仍然有 30 台左右的纺机在平稳地进行生产。逐渐地，丝绸工业的生产在皮埃蒙特、伦巴底和威尼托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企业家们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做出积极反应的结果。

在皮埃蒙特（Piedmont）的卡塞尔保根（Casalborgone）、凯塞尔（Caselle）和卡拉格里奥（Caraglio）等地，大约在 1750 年前后，每家缫丝厂的炉子的数量达到 60 个、80 个甚至 100 个。缫丝的生产集中也加强了。1730 年，在撒丁国王的领土上有 126 家缫丝厂，它们多集中在瑞克尼吉（Racconigi）周围地区。在伦巴底，米兰是丝线的生产中心。1750 年，在布里亚泽（Brianza）地区的 13 座城市中拥有 48 家丝厂。贝加莫及其周围乡村共有 60 家丝厂，其产品中的绝大多数出口到北欧地区。

丝绸的纺织则相对要落后一些。在老的工业中心如米兰、威尼斯、博洛尼亚（Bologna）和佛罗伦萨，生产仍然保持着传统的行会组织形式，这样，其产品便难以与外国的产品相竞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 世纪中期在皮埃蒙特所拥有的 1 510 台纺机中，有 1 150 台由都灵的小企业所拥有。与此同时，维杰瓦诺（Vigevano）拥有的纺机数量为 976 台。而在米兰，工业的复兴才刚刚开始。

尽管也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威尼斯的丝绸工业还是设法保住了其主导地位。到 1730 年时，仍有至少 3 000 台纺机在运转。当然，其丝袜的产量已从 18 世纪初的 300 降至 1741 年的 100。另一方面，帕多瓦（Padua）和维琴察的生产却有所增长。自 17 世纪中期开始，犹太商人已经在那里生产丝带。随后，基督徒也开始模仿。在维琴察，丝绸工业适时地代替了日趋衰落的毛纺业，同时也使之有能力与威尼斯相竞争。热那亚共和国的丝绸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住了其历史上的辉煌地位。有关这一点可以从 1750 年以后

其很高的出口数量上得以反映。早在1700年便已拥有1 244台纺机的卢卡共和国，因为18世纪中期奥地利和普鲁士相继实行了限制丝绸进口的政策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佛罗伦萨，在卡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527]时期就已经拥有7 000台纺机；后来，纺机的数目有所减少，但并不十分严重；到18世纪中期，则又有所恢复。在南方，卡坦查若（Catanzaro）的纺机数目在17世纪时一度达到1 000台，但到1700年时，只剩下了400台。那不勒斯和圣卢西亚（S. Leucio）也都从事于丝绸的生产。在西西里、卡塔尼亚（Catania）、墨西拿和巴勒莫等地都曾试图通过特殊的授权来确保其某些生产能够得以生存。与大多数纺织工业一样，丝绸工业对于市场需求的波动及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上的竞争是极为敏感的。

(9) 南欧

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最为活跃的纺织工业中心是萨洛尼卡（Salonica），这里聚集了很多犹太人，同时也有来自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16世纪上半叶，犹太移民在当地纺织工业的纺织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乡村经济的有力支持，那里既从事于种植业也出产羊毛。当地出产的主要产品是厚重的阿巴原色粗呢。轻型廉价的衣料（*sobremano*）出产于普列文（Plevna）。富格尔家族的代理人汉斯·德西沃姆（Hans Dernschwam）曾于1533～1535年在土耳其旅行，在他的努力下，萨洛尼卡犹太纺织工人的产品开始在土耳其境内销售。土耳其军队的制服也是用萨洛尼卡出产的呢绒来制作的。军服的制作由专门的服装商人来完成，他们从马其顿农民手中获得原料并将其赊给制作服装的手艺人。后来，这些服装商人开始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集中生产并试图垄断对军服的供给。犹太人则通过开办纺织厂从中赚取了大量金钱。

1600年以后，来自外界尤其是威尼斯和安科纳（Ancona）以及后来的英格兰和法国的竞争，使萨洛尼卡的生产出现了下降。18世纪中，产自德意志、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呢绒也开始进入奥斯曼市场。土耳其政府允许自由地进口这些外国纺织品。类似于由大臣罗麦（Rami）所做的，借助于萨洛尼卡的犹太人的帮助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纺织厂的尝试，最终都一无所获。

作为萨洛尼卡纺织工业的一个分支的地毯生产，则拥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一位曾经于17世纪访问过萨洛尼卡的土耳其旅行家摩斯塔夫·本·阿卡杜拉·汉德斯奇·哈夫（Mustafa ben Abdulla Hadschi Halfa），称这里出产

的多色地毯“世界闻名”。萨洛尼卡出产的丝线也出口到了安科纳和威尼斯。

犹太人也在其他巴尔干城市生产纺织品，这些城市包括普列文（Plevna）、斯克派（Scopie）、埃迪尔内［Edirne，旧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ie）］、瓦利亚（Veria）、拉里萨（Larissa）和特瑞卡拉（Tricala）。受西班牙裔移民的影响，在特瑞卡拉出现了与萨洛尼卡相类似的劳动分工，为此成立了3家缩绒厂。在罗得岛，犹太人发展了那里的纺织工业，属于苏丹的两家纺织厂也租赁给犹太企业家去经营。这里出产的女衬衣、袜子、斗篷、丝制睡衣和纽扣出口到了安纳托利亚、埃及及其他一些地方。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8世纪时犹太的技师和工人是工业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528】

（10）俄罗斯

俄罗斯早期工业化尝试的最本质特征，说到底就是波动。1500年，一位意大利移民曾经尝试引进丝绸的织造。1625年，一位德意志移民进行了另外的尝试。但所有这些都不成功。1650年以后，“工厂”制度的萌芽开始出现。作为模仿西方工业化进程的赞助人，沙皇亚历克西斯（Alexis）开始鼓励种植棉花和栽植桑树。1681年，俄罗斯建立起了一家天鹅绒织造厂，但时隔不久它就倒闭了。1684年，一名德国人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座毛纺厂。缺乏必要的资本和合格的工人以及国内市场的有限性，都阻碍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到彼得大帝时期，人们对发展工业又产生了新的兴趣。外国专家，主要是法国和德意志人被不断地吸引进来。拥有500台纺机规模的工厂也建立起来了。1702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家生产航海用亚麻织品的工厂，1705年又建立了一家织布厂。到彼得大帝去世时，大约已建立了10家织布厂及同样数目的亚麻制品厂和6家丝绸厂。最为重要的工厂坐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他的工厂分布于沃罗涅（Voroneš）、喀山和阿索沃（Asovo）。俄罗斯同样能够生产穗带编织品、袜子、帽子和挂毯。然而，俄罗斯的纺织品从来没有达到过西欧产品的质量水平，但这并不妨碍其产品的出口。英国就曾经进口过俄罗斯的纺织品，以便向一些殖民地再出口。到18世纪中期，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英国的专家带着英格兰的先进机器来到俄罗斯，科林斯（Collins）和张伯伦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一家印花棉布生产厂，以后又有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中来，从事布匹和丝绸的生产。丝绸工业在俄罗斯的传播尤为广泛。法国人瓦德尔（Verdier）开设在萨拉托夫（Saratov）的丝绸工厂，被视为是俄罗斯纺织工业依赖进口

技术的典型代表。

(11)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

在斯堪的纳维亚，纺织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呢绒及丝绸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鼓励性的重商主义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克里斯蒂安四世、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四世和克里斯蒂安六世统治下的哥本哈根更是如此。到 [529] 1738 年，在哥本哈根已经拥有 14 家毛纺厂，共有纺机 36 台，工人 373 名。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更小的企业。在丹麦，从事毛纺业的人数总计达 1 524人。在挪威，莫伦斯（Jörgen thor Möhlens）的位于西迪斯（Sydnes）（靠近卑尔根）的纺织企业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资本与有效的国内市场的缺乏，阻碍了生产的稳步发展。实际上，生产主要是依靠政府的保护来维持的。

自查理十一世开始，在瑞典的纺织工业中，实施了基于重商主义思想的保护性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使斯德哥尔摩和诺尔雪平（Norrköping）发展成为繁荣的毛纺业中心。彼得·施皮特（Peter Speet）在首都周围建立起了毛纺业，还有一位吕贝克移民在诺尔雪平建立起了毛纺厂。另外一位重要的企业家是阿斯托曼（Alströmer），是他将阿灵索斯（Alingsås）发展成为瑞典的第三个纺织工业中心。

7. 运输业：造船

在英格兰，大型船只（包括商船和战舰）的制造主要集中在港口城市伦敦及其附近的一些小型港口，南安普顿、多佛、波士顿、赫尔、纽卡斯尔和布利斯托尔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地方。在英格兰沿岸的许多港口中，也都从事造船业，但却很少成立起造船业者的行会。自 1550 年以来，海外的扩张，捕鲸及纽芬兰渔场的开辟，沿岸各港口间以及与欧洲大陆间煤炭运输的兴起等，都促进了人们去建造新的商用船舶。到 1630 年，英格兰商船的吨位总数已从 50 000 吨增长到 115 000 吨，并且拥有了 300～400 艘运煤船，其中超过 200 吨的船舶达 145 艘。在到达 17 世纪 80 年代的最高峰（总吨位 340 000 吨）以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只有到了 18 世纪中期，当战争结束以后，商船和皇家海军的船只数目才开始再一次快速增长。1751 年，英国商船的总吨位达到了 421 000 吨。到 1760 年，首次出现了准确的统计结果：大不列颠共有船只 7 081 艘，总吨位 486 740 吨。其中，在每 7 艘船中有 1 艘属于苏格兰。

1680年前后，大约至少有1/4的英国商船是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建造的；其中绝大多数造于荷兰。无论是船壳还是桅杆，荷兰的平底快船都优于英格兰的拥有防御能力的商船。荷兰的设计在提高船舶吨位的同时，还降低了造船和经营商船的成本。英国的造船者，尤其是东北部麦特白（Whitby）和斯卡伯勒（Scarborough）的造船者，也开始模仿并最终发展了荷兰的设计，并由此掀开了400吨及其更大船舶航行的历史。18世纪中，美洲殖民[530]地中的造船业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17世纪中期，东英格兰港口［如伊普斯威奇（Ipswich）］中的造船业出现了衰退，这也许是因为害怕与被俘获的荷兰船舶相竞争的缘故。东北部的港口则专门制造小艇和平底船。为了满足对利凡特、东印度及西印度群岛贸易的需要，英国的造船业大大地加强了。在这一进程中，伦敦的地位没有遇到任何挑战。17世纪中，在布兰克沃（Blackwall）的亨利·约翰逊开办的工厂以及后来的皇家工厂中，造船业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集中。然而，在设计方面，除了自18世纪后开始用铜来包覆船底以外，并未取得特别的进步。

16世纪时，荷兰成为最为主要的造船国。在荷兰的船厂中已装备起以风车驱动的大锯和巨型起重机。遥遥拥有大型的船队，荷兰可以得到廉价的原料供应，如木材、大麻、亚麻和树脂等。这些原料一般是由波罗的海运来。荷兰的工资水平要比其竞争对手高，它们的市场更为广阔，既包括整个尼德兰，也包括它以外的地方。荷兰人还建造了一种“槽船”，它的装备比较简单，没有安装枪炮的前甲板舱室或后甲板舱室，它尤其适合于长距离的运输，其吨位从200吨到500吨不等。当出现战争或海盗威胁时，它的航行则需要护航。

荷兰在造船业主要集中在赞河（Zaan）上。到17世纪末，大约有60座码头建造远洋贸易用的船舶。荷兰建造的船只也的确畅销全世界，甚至在波罗的海的老港口如吕贝克和考恩斯堡等地，也开始使用荷兰的平底船。进入18世纪以后，荷兰在造船领域中的绝对优势逐渐削弱。尽管如此，1707年，在赞丹各船厂中在建的船舶仍有300艘之多。而在阿姆斯特丹，到1736年，从事造船业的木匠仍有2 000多人。在南尼德兰，敦刻尔克发展成为一个造船工业的中心。在法国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也建立起了自己的造船工业，其中，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是最为重要的两个中心。拉罗谢尔（la Rochelle）、南特、波尔多和拜恩（Bayonne）的船厂专门制造用于大西洋贸易的船只。但直到柯尔贝尔时期，与英国一样，法国仍旧从荷兰共和国和瑞典进口大量的船只。进入18世纪后，在法国远洋贸易不断扩大的刺激下，

大西洋沿岸的造船业才赶上了荷兰的水平。

中世纪末，西班牙最好的造船厂坐落在坎塔布连山（Cantabrian）沿岸的桑坦德（Santander）、帕塞杰西（Pasajes）、伦特瑞尔（Renteria）和森托纳（Santona）。自天主教会国王时期开始，造船业也出现在加利西亚（Galicia），与坎塔布连山的内陆地区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森林资源充裕的地方。随着对美洲贸易的兴起，造船业在塞维利亚和卡迪斯（Cadiz）发展起来。[531] 当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以后，那里的造船业出现了一定的衰退。再经过王位继承战争的消耗以后，西班牙的海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直到菲力浦五世和费迪南德（Ferdinand）六世时才开始重建海军。在科罗纳（Coruña）、庞特里达（Pontevedra）、里瓦多（Rivadeo）、诺亚（Noya）及其他地方的船厂中仍在使用传统的造船方法和古老的设备。而 1727 年建于费罗尔（Ferrol）附近的格罗纳（Grana）地区的兵工厂，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菲力浦五世的重臣帕提诺（Patino）极大地促进了武器装备的生产，同时颁布命令重新组织了水手队伍。航海中心也由过去的斯坦德尔（Santander）转移到了拉戈罗纳（la Grana）。然而后来的结构性危机阻碍了造船业的发展。直到 18 世纪中期，当航海业的中心又转移到费罗尔以后，造船业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外国技术的帮助，1749 年第一批专家到达费罗尔。

在葡萄牙，海外开发促进了一批造船中心在靠近港口的地方建立起来，里斯本则是最为重要的造船中心。到 16 世纪中期，大约有 400 名专家在此工作。然而，海外的造船业逐渐与葡萄牙的造船业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最初来自于东非和印度，1650 年以后巴西又加入进来。

热那亚和威尼斯很久以来就是意大利的造船中心。热那亚建造的战舰装备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它们被用于与巴巴里海盗和土耳其人作战。热那亚也由此获得了繁荣。威尼斯的造船业同样以建造战舰闻名。然而，随着木材的日益稀缺及行会的保护，威尼斯的造船业在进入 16 世纪以后则陷入衰退。当最后一批舰队从通往北海的航线上消失以后，转而每年建造几艘 600 吨甚至 1 000 吨的大船。到 1600 年以后，只有在海军的兵工厂里还保留着建造老式战舰的传统。

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许多港口中，都曾经从事过造船业。埃姆登（Emden）、不来梅、汉堡、吕贝克、罗斯托克（Rostock）、维斯马（Wismar）和但泽只是这众多港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汉萨同盟所属的城市中，吕贝克和但泽是最为重要的造船中心。据估算，1650 ~ 1800 年间，在吕贝克共建造了

2 450 艘船只，其总吨位达 150 000 拉斯特[①]。1590～1646 年，这里的造船业达到了其最高峰，这也是吕贝克和西班牙与葡萄牙贸易最兴旺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吕贝克的造船量达 800 艘，其中有 136 艘是载重量在 150 拉斯特～300 拉斯特的大船。在 1609 年的 12 年休战条约签订以后，荷兰取得了在对伊比利亚贸易的实质上的支配权。汉萨同盟则被排挤到只能从事北海和波罗的海范围内的区域性贸易，于是较大的船舶便很少建造了。当反对终止休战条约的战争于 1621 年爆发以后，汉萨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又恢复了，【532】于是对那些能够保障航行安全的、具备护航能力的大型船只又出现了新的需求。荷兰人早在 1595 年就已经设计出来的槽船，直到 1615 年以后才为吕贝克所接受。

充足的木材、树脂、柏油、亚麻、铁及铜和黄铜（主要在瑞典）的供应，确保了斯堪的纳维亚的造船业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竞争优势，从 17 世纪开始，这一优势更为显著。而此时，挪威的造船业却遇到了障碍，在这里，一直坚守着令人不可思议的法令，除非得到国王的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得从事造船。在丹麦，克里斯蒂安五世出于加强防御能力的考虑，积极鼓励造船业的发展，以便大型的战舰能够随时投入战斗。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成功。丹麦王室的中立立场使其大为受益，在各个强国进行战争期间，丹麦的造船业开始兴旺起来。在挪威也是如此，这里真正意义上的造船业开始于 17 世纪的 30～40 年代。此时，挪威与英格兰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活跃起来。从 1629 年开始，在挪威的沿海港口中，停止了战舰的建造，新的造船工业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主要在西尔福—阿格德（Vestfold-Agder）沿海地区发展起来。

瑞典的造船工业中心是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农民的造船业的主要中心是哈兰及其沿海地区，这与在芬兰的斯卡拉格德（Skärgård）和奥斯特保登（Österbotten）的情形相差无几。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上半叶，造船业还出现在科科拉（Kokkola）、皮耶塔尔萨里（Pietarsaari，那里只有很小一部分）及其他地方。造船业是奥斯特保登各城市中最为重要的行业，它们建造的船只甚至销售到了瑞典。与此同时，在奥布（Abo，1732 年）、图尔库（Turku）、赫尔辛基（1745 年）和洛维萨（Loviisa）也发展了造船业。

彼得大帝对造船业倾注的热情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于曾亲临过赞丹的造船厂，他对荷兰的造船工业十分熟知。仿照荷兰的模式，圣彼得堡逐

① 旧时德国和北欧计算船舶运载量的计量单位，1 拉斯特（last）约合 4 000 磅。——译者注

渐发展成为俄罗斯的造船中心。

陆路运输

陆路运输中对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的使用日趋普遍，并由此孕育出了一项特殊的职业——马车制造商。农夫们所使用的马车一般是由乡村中的木匠来制造。日益增长的陆路贸易对于运输的需求以及朝廷的鼓励，都促使专家们建立起自己的工场。16 世纪末，当王公贵族们在旅行中以马车代替马背时，马车制造业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四轮载客马车的出现使马车制造业发展成为一种奢侈品生产业。1660 年以后，出现了豪华马车（*carosse*），其装饰风格变化的种类与家庭内部的护壁板（*boiseries*）一样多。1696 年，专业工厂（*menuisier*、*carossier*、*sellier*）相互合作，为瑞典查理十二世的加冕典礼制造了专用马车。在摄政时期（1715 ~ 1721 年）巴黎拥挤的街道上，小巧的四轮双盖带篷马车要比大型的豪华马车实用得多。这种马车很快就变得极为普通，专业的生产也开始了。【533】

8. 印刷和造纸

活字印刷发明于美因茨（Mainz）①，在其被发明不久，便由从事于实业的商人将其变成了一种新的产业。最初，德国的印刷商垄断了这一技术。由德国人开设的印刷所遍布瓦伦西亚、那不勒斯、布达佩斯、斯德哥尔摩和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在德国南部，纽伦堡、巴塞尔、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这些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也都发展成为印刷业中心。斯特拉斯堡早期印刷业的全盛时期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中期，它们对传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巴塞尔的阿姆拜希（Amerbach）和弗洛芬（Froben）的印刷所则扮演了人本主义思想传播的信使。奥斯格堡的印刷所很快就掌握了将图片和文字合并排版的方法。由安东·科伯格尔（Anton Koberger，1445 ~ 1513 年）开设在纽伦堡的印刷所是最为活跃的出版商。在其发展的顶峰，科伯格尔共有 24 个印刷所，使用了超过 100 人的排字工、校对工、印刷工及插图绘制者。为了扩大其出产和销售，科伯格尔还与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里昂的印刷出版商进行了合作。在他的出版目录上，其品种超过了 200 个。

① 这里的活字印刷指的是拉丁字母的印刷。——译者注

威尼斯一度垄断了意大利的印刷业，到 1500 年，已经建有 150 家印刷所。然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短命的。16 世纪中，名气最大的当属马努蒂尔乌斯（Manutius），它主要印制古代作家的作品读本。弗兰西斯科·马克里尼（Francesco Marclini）和加尔布雷·吉利多·费拉里（Gabriele Giolito de Ferrari）的印刷所则主要出版意大利的文学作品。在法国，巴黎的印刷业只遇到了来自于里昂的埃斯坦因（Estiennes）家族的竞争。罗伯特·埃斯坦因和他的儿子亨利是其国家中最卓越的学术著作出版商，且他们的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了 1674 年。

1502 年，在西班牙，雅各布·科罗姆伯格（Jacob Cromberger）在塞维利亚建立了该国最重要的印刷所，他的儿子胡安（Juan）则独家获得了在墨西哥从事印刷业的特权。

英格兰印刷业的自由发展受到了伦敦书籍出版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的抑制，这是一个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组织，1557 年它得到了皇家授权。类似的限制在欧洲极为普遍。在 17 世纪的法国，为了便于国家控制，政府武断地决定了印刷业从业许可证的数量，巴黎为 36 家，里昂和鲁昂各 [534] 18 家，波尔多 12 家。

在产业规模上实现书籍出版发行的决定性一步出现在尼德兰。克里斯托夫·普兰丁（Christopher Plantin）于 1549 年在安特卫普最早进行了这种尝试，之后，还有坐落在莱顿的埃尔塞维尔（Elzevir）印刷所。普兰丁拥有 22 家印刷所，当他死后，莫尔提斯（Moretus）家族将这些企业接管，并继续经营了 8 代人。从普兰丁在安特卫普工厂里出来的刘易斯·埃尔塞维尔（Louis Elzevir），在印刷和出版过程中将与商业有关的行为（包括批发、零售及二手书的经营）在国际范围内统一到一起。然而，印刷技术本身的进步却很缓慢，到 18 世纪末，只出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创新。

为了满足印刷业的需要，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在欧洲各地开始了以棉布或亚麻的碎片造纸的试验。葡萄牙于 1441 年在雷瑞尔（Leiria）建立了第一家造纸厂，1514 年又有一家建立于巴哈丹（Batalha），在阿尔巴卡（Alcobaça）附近则建立了第三家。1537 年，这家工厂取得了垄断地位，然而到 1565 年政府又授权在阿伦奎尔（Alenquer）建立一座新厂。此后，纸的产量基本没有变化，直到 18 世纪中在路易莎（Louisa）建立起一家重要的造纸厂以后，产量才有所提高。西班牙的造纸业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主要集中在加泰罗尼亚。进入 18 世纪后，随着对纸张需求量的扩大，一些新的工厂陆续建立起来。

法国的造纸工业集中在布列塔尼、杜法因（Dauphiné）、普落旺斯（Provence）和西南部地区，但它们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在凯姆潘（Champagn）和奥弗涅（Auvergne），尤其是在阿姆伯特（Ambert）和梯也尔（Thiers），建有专供出口的造纸厂。

从一开始，意大利和德国就是重要的造纸大国。在米兰、热那亚和威尼斯，制造业都是作为出口部门来发展的。托斯卡纳、里维埃拉—迪塞罗（Riviera di Salo）和那不勒斯王国的造纸工业也十分兴旺。17世纪和18世纪中的一些风吹草动，使意大利的造纸工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利古里亚的规模较小的造纸厂中的生产甚至还出现了严重下滑。尽管如此，在威尼托和巴萨诺（Bassano）的瑞蒙蒂尼（Remondini）的造纸厂中（在1767年）的雇工人数仍达2 400人。

在1500年左右，在德国已建有50座造纸厂，它们主要集中在罗温斯堡（Ravensburg，约有5～6家工厂）和巴塞尔。其他一些工场则分布在斯瓦比亚（Swabia）、巴伐利亚、莱茵河区域和德国北部地区。在上述这些地方，水力资源，商人的资本及原料供应都十分可靠。多伦（Düren）的造纸工业也十分兴旺，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共建立了8家造纸厂，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又有多家工厂建立起来。在科隆东部，造纸工业主要出现在勃吉希—格莱柏克（Bergisch Gladbach）地区。1600年以后，制造业在尼德兰发展起来，最初的工场坐落在多德雷赫特附近、维留威（Veluwe）、北荷兰尤其是赞丹地区。在这里，18世纪中期时，大约有130人（绝大多数为妇女）在工作。随着荷兰式打浆机的出现，荷兰发展成为了欧洲的造纸工业中心。【535】

原料的缺乏限制了造纸厂的规模以及同一地区造纸厂的数量。在上奥地利，其资源状况决定了只允许存在4～5家造纸厂。1693年，这些工厂的产量为3 873令，大约占奥地利总产量的1/4。到1767年，在萨克森有32家造纸厂，而在弗兰克亚［Francoia，奥斯拜西（Au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到1700年时大约有14家造纸厂。

重商主义政策的共同特征是坚持使用本地生产的纸张。1576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俄罗斯的第一家造纸厂，1640年又建立了第二家。彼得一世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杜德劳（Duderow）建立了几家新厂，并由此掀开了俄罗斯造纸工业的新篇章。在弗雷德里克（Frederik）二世时期的丹麦和克里斯蒂安五世时期的挪威，都出现了与俄罗斯相类似的情况。一般说来，这些北方国家（与英格兰一样）总要进口一些纸张，尤其是高质量的纸张。

9. 食品和饮料

提供食品的行业基本上保持着其传统的组织形式。城市里的面包师傅和屠夫都建立有自己的行会。在乡村，农民家庭（像贵族和中产阶级家庭一样）通常是自己来烤制面包，吃自己养殖的动物及自己种植的蔬菜。大规模的食品生产，最初只限于为军队各船队提供食品和饮料。里斯本的企业家就曾在赞伯罗（Zebro）谷地建立起了大型的烤炉，专门为航海业生产饼干。

1450 年以后，人口的不断增长刺激了人们对新渔场的寻找。在北海地区，从海里格兰德（Heligoland）到冰岛，聚集了来自于德国、荷兰、挪威和英格兰等地的渔民。以卑尔根为起点，在德国的财政支持及后来的荷兰在金钱和新技术的支持下，"诺德兰德渔场"（Nordland fishing）组织起来了。从中世纪末开始，纽芬兰沿岸吸引了大批的诺曼底人、布列塔尼人（Bretons）、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格兰人。

第一个将鲱鱼捕捞发展成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国家是荷兰。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它们甚至动用海军来防范有关入侵者和敦刻尔克海盗。由恩克辉森（Enkhuizen）、代夫特、鹿特丹、斯希丹和布鲁列（Brielle）发起组建了联合公司（*Groote Visscherij*），它实际上垄断了荷兰的渔业。在荷兰的西兰岛和弗里斯兰这两个港口中，漂网渔船的数量达2 000艘之多。沿海的乡村如符拉尔丁根（Vlaardingen）和代夫特地区也都参与到鲱鱼的捕捞之中。在欧洲许多地方的市场上均可以见到产自荷兰的鲱鱼。17 世纪下半叶的战争使这一行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有少数几个中心如符拉尔丁根完【536】好无损地进入了 18 世纪。

中世纪末期，葡萄牙人和巴恩克人就已经活跃在捕鲸业中。当鲸群为了躲避捕捞而迁移到更北的海域时，捕鲸者也接踵而来。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荷兰人的竞争。12 年休战条约（1609～1621 年）期间，荷兰的捕鲸业取得了快速发展。1616 年，阿姆斯特丹和其他荷兰港口（参照东印度公司的模式）组建了北方公司（*Noordsche Compagnie*）。1622 年，西兰岛的企业家也加入进来，并最终形成了一家单一的大公司。该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荷兰的捕鲸业，它所面临的惟一难题是缺乏熟练的舵手和火炮射手。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人以北海的港口为后盾与荷兰人展开了竞争，并从后来的战争中受益。在许多工业领域中都需要鲸脂和鲸骨。在靠近捕鲸的地方以及国内的各港口中都建有鲸脂提炼厂。

16 世纪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以大麻酿成并加入蛇麻子作为防腐剂的啤酒的消费大大地增加了。啤酒厂几乎成为各个制造业部门中惟一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入的部门。在德国北部和尼德兰拥有众多的啤酒厂。最重要的生产中心是汉堡、不来梅、不伦瑞克、艾贝克（Einbeck）、罗斯托克（Rostock）和泽布斯特（Zerbst）。它们出产经过防腐处理的啤酒由于能够储存、装桶和运输，因而可以销往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在尼德兰的城镇中也建立了一些啤酒厂，它们多集中在港口及粮食市场的周围。到 1748 年，仅荷兰省一地就有超过 100 家的啤酒厂，雇工人数约 1 200 人。在斯堪的纳维亚，仅在丹麦建有较为重要的啤酒企业——哥本哈根的皇家啤酒厂。到 1640 年，共有雇工 35 人，年产量 20 000 桶。这家公司于哥本哈根的啤酒行会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最终的结果是行会于 1739 年接管了皇家啤酒厂。

在英格兰，最大的啤酒生产中心是伦敦。1700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存在着一种“普通啤酒厂”，它们所销售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私人消费者。在伦敦，有 174 个这样的啤酒厂。与此同时，还存在着 39 000 家“自酿啤酒厂”，即酒店店主所酿制的啤酒只在自己的店中出售。18 世纪上半叶人口的增长、海外贸易的扩张和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啤酒酿造业的发展。到 1750 年，共有 996 家啤酒厂和48 421家自酿啤酒厂。 【537】

进入 17 世纪和 18 世纪，烈性酒（以白兰地和杜松子酒为代表）给啤酒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白兰地的酿造主要集中在波尔多、柯纳克（Cognac）、安大路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另一方面，蒸馏造酒的工艺主要兴起于那些适于造酒的谷物供应充足的地方，如尼德兰和德国北部等。1663 年，阿姆斯特丹的酿酒厂的数目突破了 400 家。对法国及其他国家产品进口的禁令，有效地促进了荷兰烈性酒的生产。由于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自 1630 年才开始酿造烈性酒的斯希丹（Schiedam），很快就发展成为蒸馏酿酒的中心。到 1711 年，那里共建有 85 家酿酒厂。鹿特丹（1650 年有 50 家酿酒厂）和韦斯普（Weesp）也是重要的白兰地生产中心。在德国，蒸馏酿酒主要出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石勒苏益格地区，其中心是弗伦斯堡。奥尔堡是丹麦最重要的酿酒中心。

在任何地方，啤酒厂和酿酒厂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许多早期的酿酒工业中心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其往日的盛名，斯希丹、哥本哈根、奥尔堡和伦敦就是这样的一些中心。

(1) 盐

盐和奢侈品都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物品。从北弗里斯兰群岛（Frisian）沿岸，到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西海岸，再到地中海沿岸，在全欧洲的海滩上都可以找到晒盐池。在所有的地方，盐都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和装饰物，在漫长的冬季里它能保证肉类和鱼的源源不断的供给。

在北尼德兰，海盐的精炼在鹿特丹、伊丹（Edam）和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进行。法国的晒盐池主要分布在保格纽夫（Bourgneuf）湾、卢瓦（Loire）河口的南部、保林（Bourin）、博瓦尔（Beauvoir）、拉布罗德山（La Barre de Mont）、瑙茂提尔（Noirmoutier）岛的南部、奥兰伦（Oléron）岛及布罗阿日。在普罗旺斯（Provence）也出产海盐。在葡萄牙沿海，最为重要的盐业中心是塞杜柏尔（Setubal）、阿维热（Aveiro）和阿尔凯瑟—杜塞尔（Alcacer do Sal），而西班牙的盐池主要分布在安大路西亚沿岸和伊比沙（Ibiza）岛。

海盐或从含盐泉水中提取的盐要比从矿井中开采的盐廉价得多。由此，经北欧港口进口的用做精炼的盐的数量不断地增加，有时甚至会堆满整个港口。德国的王公贵族们纷纷建立和经营起盐精炼厂，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选帝侯、西里西亚的皇帝、威悉河（Weser）上的斯考恩堡（Schauenburg）伯爵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以波罗的海为起点，南到德国南部，东到波兰、特兰西瓦尼亚和俄罗斯，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从事盐矿的开采。在俄罗斯，斯托格诺夫（Stroganov）家族同时也控制了很大一部分晒盐池。产自洛林【538】（Lorraine）、勃艮第（Burgundy）的萨林斯（Salins）以及萨瓦（Savoy）的泰伦太斯山（Moutiers-en-Tarentaise）等地的盐有着广阔的市场。伦伯格（Lüneburg）拥有德国最大的盐矿，16 世纪时，其产量达到了最高峰的 30 000 吨，雇工人数为 500 人。但这只是一个特例，一般情况下，其产量要少得多。

在阿尔卑斯山以东，巴伐利亚的伯爵和大选帝侯所拥有的雷根豪尔（Reichenhall）地区，16 世纪初盐的产量达9 000吨。从 1619 年，特朗斯泰因（Traunstein）也开始产盐，其产量约为雷根豪尔的1/4。萨尔茨堡的大主教拥有哈林（Hallein）的晒盐池。到 1556 年，斯凯伦堡（Schellenberg）的总产量约为21 400吨。然而，由于哈普斯堡领地上市场的关闭及西巴伐利亚的市场已经为当地产品所占领，萨尔茨堡最终不得不停止生产。这一情况表明，斯凯伦堡的生产仍然要依赖于巴伐利亚的政策走向。哈普斯堡的王公自

马克西米里安一世和费迪南德（Ferdinand）一世开始，就在其疆域内建立起了对盐业的垄断，其控制的范围甚至远至波希米亚诸国如哈尔希塔特（Hallstatt）、豪［Hall，蒂罗尔（Tirol）］和奥赛（Aussee）等。1520 年，它们的总产量为26 595吨，到 1618 年则上升到51 224吨；1660 年，其产量为36 445吨，到 1700 年再一次上升到47 345吨。

（2）糖

在被奥斯曼征服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探险开始以前，欧洲糖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如尼罗河低谷、叙利亚、罗得斯（Rhodes）、塞浦路斯、西西里及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还有一些产自于克里特岛（Crete）和马耳他（Malta）。在 1517 年占领埃及以后，奥斯曼人又于 1522 年占领了罗得斯，1571 年占领了塞浦路斯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的入侵使地中海东岸糖的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当乌尔姆（Ulm）的尤里希·卡夫特（Ulrich Kraft）于 1575 年访问这座岛屿时，他发现这里的土地已经荒芜了，工厂也废弃了。这样，在以后的半个世纪内，中世纪时期的三个重要食糖生产者——叙利亚、埃及和塞浦路斯从市场上消失了。产自马德拉、卡纳利（Canaries）和南美洲的具有竞争力的糖几乎将西西里、卡拉布利亚（Calabria）、瓦伦西亚和马约卡岛的产品挤出市场。整个 16 世纪，产自马德拉、圣多美岛、卡纳利、西印度群岛、墨西哥和巴西的糖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其数量也日益提高。摩洛哥的产量自 1519 年以后也有所增加。粗糖的大量进口促进了精炼业在欧洲各地的兴起。最初的一批精炼厂都建立在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安特卫普等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其时间大约在 1500 年后不久。到 1536 年，这类小型精炼厂的数目达到了 19 家。为躲避安特卫普的动乱（1566～1586 年）的移民们与他们所带来的其他技术一样，也将其炼糖的技术带到了阿姆斯特丹。到 1605 年，阿姆斯特丹建立起了 3 家糖厂。 [539]

16 世纪上半叶，威尼斯发展成为新的糖精炼中心。它所使用的粗糖主要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其余部分则来自于里斯本。热那亚从巴塞罗那、格拉纳达（Granada）和瓦伦西亚进口粗糖，但那里的制糖业还竞争不过威尼斯。制糖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英格兰于 1544 年建立的最初两家糖厂所遇到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特点。它们的产品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都无法同安特卫普的产品相竞争。只有当安特卫普的制糖业衰落以后（1558 年），（与阿姆斯特丹一样）伦敦的制糖业才有所增长。1620 年，一位伦敦的制糖商人在利物浦建立起了一家糖厂。1651 年和 1660 年的航海法

案，推动了使用殖民地产的原料制糖的发展。除伦敦以外，在布里斯托尔、格里诺克（Greenock）和格拉斯哥（Glasgow）也建有糖厂，并由此产生了对荷兰和德国制造的锅炉的强烈需求。到1688年，英格兰已经建有50家糖厂，其产品也已经大量地出口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1750年，糖厂的数量增加到120家，而英格兰对糖的消费在半个世纪以内增长了5倍，达到100万英担以上。① 自王政复辟以来，作为再出口贸易的一项主要内容，糖的生产对英国海外贸易的扩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早在14世纪时，在纽伦堡就已经出现了职业的糕点和糖果师傅（*Zuckerbäcker*），但真正意义上的德国第一家糖厂，则是由一位名叫雷蒙哈德·罗斯（Leonhard Roth）的贵族于1573年建立于奥尔森堡的糖精炼厂。汉堡的第一家糖厂建于1585年，在德雷斯顿则为1587年。正是因为有了由尼德兰避难而来的移民，制糖业才成为汉堡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

在威尼斯，制糖业的发展一直持续到17世纪和18世纪，其产品甚至销售到了土耳其市场。通过与西班牙人的合作，热那亚人生产的糖在西班牙市场上占据了较大份额。在西班牙国内，甘蔗的种植和糖的精炼在摩尔人被驱逐后（1609~1611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荷兰人温德伯格（Vanderberg）于1653年在奥尔良建立了法国的第一家糖厂。1662年，又有两家新厂建立于鲁昂。在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的政策保护下，制糖业很快就在敦刻尔克、南特、波尔多、拉罗谢尔（La Rochelle）、鲁昂及其他地方发展起来。1671年，在南特有5家糖厂。1674年，[540] 茅尔莱斯（Maurelles）商业公司在马赛开办了皇家糖厂。为了保护法国本国的糖业生产，1669年起禁止其殖民地生产白糖。到1700年，出口奖励制度的实行，使糖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马赛、南特、翁热（Angers）、奥尔良和索米尔（Saumur）等地都建立起了大型糖厂，雇用人数达“数千人”。18世纪上半叶，马赛的制糖业有了快速的发展，1728年时只有4家糖厂，到1755年则发展到了14家。1770年时，奥尔良糖厂的数目也达到了12家。1700年，法国糖的消费量为200 000英担，而其出口量则要大得多。

1609年以后，特别是与西班牙休战以后，荷兰的制糖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糖厂的数目也增加到110家以上。1661年，阿姆斯特丹共有60家糖厂，其产品销售到欧洲大部分地区。1650年以后，生产开始下降。到1681

① 马克库洛克（MacCulloch）：《大英帝国的统计解释》（第二版，伦敦，1839年）。这里的数字更高，认为1734年有940 800英担［而不是里的（Reed）的数字：650 747英担］，而1755年有1 000 000英担（而不是807 471英担）。

年，糖厂的数目减少到 20 家，产量也下降到每年 8 000 英担。到 18 世纪上半叶，生产又有所回升。1762 年，糖厂的数目恢复到 95 家。

汉堡既是德国重要的港口，也是最大的制糖中心。17 世纪下半叶，汉堡共有 30 家糖厂。到 1700 年，产自汉堡的糖已完全占据了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市场。1690 年以后，大约有 8 000 人从事和糖的生产与贸易相关的行业。到 1750 年，糖厂的数目增加到 365 家，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的雇工人数在 20 ~ 50 人之间。有 80 ~ 100 家糖厂的雇工人数只有 5 ~ 12 人。最大的糖厂年产量为 6 000 英担，糖浆 12 000 英担。与酿酒业一样，制糖业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

据估算，1730 年欧洲糖的消费总量为 150 万英担，到 1756 年已上升到 250 万英担。这其中的 1/3 是由英国人消费的。18 世纪下半叶，糖消费量的激增的确令人惊异。从与日益增长的对其他海外产品消费的联系上，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可可、茶和咖啡所有这些新的饮品都需要加糖。

(3) 烟草

随着美洲产烟草进口量的不断增长，17 世纪中，在欧洲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它专门生产供吸烟、鼻烟和咀嚼用的烟草。荷兰北部则特别地发展成为烟草工业中心。在阿姆斯夫特（Amersfoort）地区、格尔德兰德（Gelderland）省和上艾瑟尔省（Overijssel），烟草被广泛种植，这里出产的烟叶也和从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及海外进口的烟叶相混合。阿姆斯特丹也进入了这一全新的烟草贸易和生产活动中。而荷兰在烟丝的切割、卷烟及包装方面的技术也传播到了绝大多数的欧洲烟草工厂中，在科隆的烟草工厂就是其中的代表。[541]

(4) 奢侈品

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最早强调（或许用词有些激烈）了资本主义初期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与生产扩张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确，有些行业特别满足于上层社会对奢侈品的追求，丝绸织造、花边编织及镜子和瓷器的制作就属于这样的行业。在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中的金匠将他们的作坊发展成为工厂。对从印度进口的宝石的切割和抛光业（一种早已流行于威尼斯和尼德兰的工艺）也不断地发展。大约在 1530 年，德国人乔治·哈维特（Jorge Hervart）在里斯本北部建立了一座钻石加工厂。通过从里斯本的进口，安特卫普发展成为钻石贸易中心。1584 年，在那里组建了专门的钻石

交易市场（*diemantensnydernatie*）。由于安特卫普遇到了麻烦，使法兰克福得以成功地发展起了宝石加工业。到 1613 年，那里的技师数目为 51 人，比安特卫普技师数目的 1/3 还要少（安特卫普尚有技师 164 名）。在布鲁塞尔、梅希林（Mechelin）和列日也有宝石加工业的发展。

一般来说，与大众化产品的生产不同，17 世纪中，奢侈品的生产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集团。天鹅绒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瓦伦西亚、托莱多和塞维利亚。高档服装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和英格兰。上述这些都是生产专业化的代表。后来的生产进程再现了这种差异。从 17 世纪下半叶到 18 世纪初，大城市中的成衣制造和高档服饰的生产之间仍然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马车制造商、装饰工人及马鞍制造者相互合作共同制造豪华的四轮马车。在伦敦或巴黎的工场中，马车的车厢是用皮革来包覆和装饰的。为了完成马车的制造，木刻工、车轮制造者、皮革匠、铁匠和马具制造者协同工作，共同创造出了这一结晶。制造马车也需要大量的资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贵族顾客中有许多声名狼藉的赖账者。

家具及家庭陈设制造业也主要面向奢侈品市场。在 16 世纪的奥格斯堡，【542】在高档家具生产和普通家具生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17 世纪中，国家及政府机构对家具的需求，促进了较大规模企业的出现，柯尔贝尔时期的戈布兰（*Gobelins*）皇家家具制造厂就是这样的企业。在这里，每一种设备都是生产供皇室与贵族宫殿配置的家具所必需的。著名的设计师、画师和雕刻师傅接受委托进行设计。仿照格戈布兰，一个生产豪华家具的新行业兴起了，最著名的工场为查理·布勒（Charles Boule）和他的四个儿子所拥有，其鼎盛年代是 1672～1731 年。在英格兰，谢拉顿（Sheraton）和齐本德尔（Chippendale）生产出了类似的产品。奢侈品制造者（Passmenter），即金银工厂的厂主（主要集中在马赛的高级肥皂制造者中）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展起了自己的企业。"这是一个追求优雅的时代"，在欧洲及海外经济的许多部门中都打上了这样的印记。

7.10 工业生产：扩张与危机

我们已经指出，技术是影响生产和工业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在另一方面，有限的市场机会又在时时刻刻阻碍着市场的发展。中世纪时期

如此，就是到了今天，它仍是影响生产发展的一个因素。

若将工业生产的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话，15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生产扩张和经济增长阶段。欧洲人口的增长直到 1620 年以后，由于战乱、瘟疫及其他因素的作用才停止。这一时期，区域内贸易和海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正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美洲和东印度的与航海有关的企业的需求，海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铜、青铜和黄铜的生产。然而，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天生的发展潜力及欧洲内部贸易的增长。正是由于 15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与哈普斯堡萨克森和曼斯菲尔德那些投资于采矿、有色金属冶炼和纺织工业的大商人们的合作，才使工业领域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到 17 世纪中期，除了银和金 【543】 以外，铜及其系列产品青铜和黄铜贸易，支配着国际金属市场。然而，很快地在生产和市场之间便产生了冲突，其中铜的情况尤为突出。第一次市场危机出现在 15 世纪末。这场危机在威尼斯的影响尤为严重，在那里，产自蒂罗尔和斯洛伐克的铜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一次危机出现在 15 世纪 20 年代并一直持续到 40 年代，此时曼斯菲尔德产的铜在市场上占据着支配地位。为了克服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的矛盾，纽伦堡的商人克里斯托夫·福勒（Christoph Fürer）试图组建一个铜生产商的辛迪加。然而，他们的尝试并不成功。40 年代中期，由于市场方面的困难，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退出了匈牙利的铜矿开采（Ungarische Handlung）。从 16 世纪末开始，铜再次支配了国际金属市场，瑞典的出口开始增长。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汉堡和阿姆斯特丹而言，两个城市中最重要的商人是来自于瑞典、曼斯菲尔德、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的经营铜的商人。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产自德国和尼德兰的铜、青铜和黄铜在市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奠定了基础。在欧洲各地几乎都已经用铜来替代银币，铜也出口到了波兰、俄罗斯和西班牙。在波希米亚（1623 年）及西班牙（1626 年）的有关法令中，均实行了铜币的膨胀性政策。随之而来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在瑞典港口城市的市场上，铜的供给量令人吃惊，于是瑞典政府不得不与尼德兰和汉堡的商人们合作，着眼于大陆进行干预，以便支配国际铜市场。

在纺织品市场上，生产的扩张与危机同样应当给予认真的关注。生产高质量纺织品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感兴趣的各种新型纺织品，如克尔塞手织粗呢、台面呢、塞斯（says）、苏格（*Zeuge*）等。荷兰移民的帮助以及在中欧和东欧基于新型纺织品的新市场的开拓，在一定程度上使英

国纺织工业克服了危机。在欧洲大陆，比利时和德国生产出现的下降，在被转移到新的地方的生产上得以补偿。这些后起的生产中心主要有法国北部（在瓦伦西亚和亚眠地区）、尼德兰北部和瑞士，移民而来的新布商已经将上述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家乡。

16 世纪中，拉古萨（Ragusa）、梭伦尼哥（Solonica）、特兰西瓦尼亚、摩拉维亚、劳济范和西里西亚的生产均有了较快增长，它们生产的部分新产品在东欧地区找到了市场。

在瑞典、德国南部，尤其是德国中部偏东及波希米亚王国，亚麻和纬起绒织物的生产也有所增长。这一增长是工业生产从市场向农村转移的结果。转移的进程开始于中世纪，在 16 世纪中得以继续，到 17 世纪初则有所加【544】强。在列日主教领地、亚琛地区及威斯特伐利亚的冶金工业中，也可以发现与此相类似的现象。瑞典乡村工业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可雇用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不断扩张的纺织生产以及其他与其相关的经济部门，时时刻刻承受着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随着 17 世纪 20 年代经济矛盾的不断扩大，最终爆发了第二次危机。许多人谈到过这场“17 世纪的危机”，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危机”一词的确切涵义是什么。是战争危机？人口危机？思想危机？还是经济危机？当它被用来说明不同经济部门的所有因素以及解释其变化过程时，“危机”一词的涵义往往含糊不清，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了阐明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我们首先应当考虑人口因素。战争中人口的减少不应当被无限制地夸大。的确，在战争中人口会有所减少，如德国就减少了 1/3，但这也是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流行性疾病。

接下来再让我们加入国际贸易因素。西班牙和葡萄牙，与它们在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之间的正常的航运确实有所减少。但另一方面，荷兰、英格兰、法国、丹麦和瑞典的企业与印度、非洲、安的列斯群岛（Antilles）和巴西之间的贸易往来则有所增加。从总体上看，大西洋贸易总量还是增加的。从丹麦海峡海关税收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窥见欧洲的一般情形。以航行于海峡的船只平均载重量为 120～150 吨计算，我们可以发现，1620 年通过的船只次数为5 241次，它也代表了一个活跃阶段的结束。随着 30 年战争的爆发，波动对于西北欧的主要经济活动产生了非常不规则而又很重要的贡献。通过海峡，从波罗的海运来了原料，北海地区也从挪威、阿肯吉尔、地中海和大西洋获得了原料。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料的流动与工业生产之间独家相关关系，这一点在荷兰共和国尤为显著。

通常，战争本身也会对工业生产产生刺激性影响。J. U. 奈夫强调了这一事实，在军备领域更是如此。瑞典的工业化进程就受到了为武力干预大陆而进行军备的影响。1620 年，瑞典出口了大约 7 000 吨奥斯蒙铁和经过锻造的铁。在比利时和德国专家的帮助下，铁的产量开始增长。当 17 世纪 30 年代来自荷兰的需求急剧增加时，其增长尤为迅速。1641 年，瑞典铁的产量 【545】 达到了 15 000 吨。到 17 世纪中期，瑞典铜的产量达到了顶峰，这恰好是 30 年战争和尼德兰 8 年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上述这些战争，同样地促进了尼德兰，尤其是比利时的列日和亚琛周围、汉斯吕克（Hunsrück）、塞格兰德、贝尔格（Berg）公国、马克及纽伦堡周围地区冶金工业的发展。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结束了 30 年战争和尼德兰 8 年战争。1659 年和 1660 年的合约结束了第二阶段的战争，不料想它们也为后来的一个新的合约所代替直到北方战争的爆发。

这里，我们再次强调不能夸大战争对人口减少的影响。一些致命的流行性疾病也使人口数量大为减少。17 世纪 50 年代末期，在丹麦和石勒苏益格爆发了斑疹伤寒，16 世纪末在芬兰爆发了大饥荒，18 世纪的前 20 年又出现了新的瘟疫。我们很难判断人口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内市场产生了影响。18 世纪 30 ~ 40 年代，人口又恢复了增长。在殖民地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 17 世纪中出现了新的增长。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大量的黑奴不断到来，由此产生了对服装和生产工具的大量需求。除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企业外，英格兰和法国的企业，以及其他贸易国家中获得授权的公司都加入到了日益扩大的跨大西洋贸易中，并由此刺激了欧洲工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研究欧洲经济，让我们再次考察丹麦海峡的海关记录。在若干年内，船舶通过的次数随着战争而波动。1672 年，通过的次数暴跌至1 783次。17 世纪下半叶的最高峰出现在 1693 年，达4 689次。北方战争的爆发，又使这一数字下降到 1710 年的1 413次和 1717 年的1 091次。到战争的最后一年，通过量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5 242次）；到 1740 年又增长至4 689次。总的来说，17 世纪初的通过量与 18 世纪 20 年代的通过量相当。在经济衰退年代，波罗的海的贸易量也出现的下降在对挪威、阿肯吉尔（Archangel）及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得以部分补偿。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洲际贸易。从汉堡的海关收入中也可以发现其基本特征，收入的高低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例如，在进行战争的 1673 ~ 1674 年，汉堡海关的收入是 1586 年的 3 倍。

如何判断这几十年间的变化对欧洲工业的影响呢？如果说农业生产倒退了，人口的增长也不景气的话，那么怎样归纳工业发展的轨迹呢？当 1700 【546】

年以后英国的海外贸易出现了快速的发展，而有关冶金和纺织工业部门的资料表明生产只是刚刚恢复，还难以看出明显的增长。1720 年以后，英国的部分工业部门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总的来说它们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尤其是在冶金工业领域。这里还没有考虑俄罗斯在经济意义上的优势，在那里铁和煤炭资源都十分丰富。在英国焦煤生产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信号。然而，生产也远未达到停滞的地步，即便在英格兰也是如此。瑞典布鲁克斯派路纳（*brukspatroner*）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在俄罗斯铁出口的竞争压力下，它们如何被迫在地中海和利凡特寻找新的市场。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铜及黄铜冶炼的扩散。欧洲的纺织工业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印象。在这一行业内，新老交替是极为寻常的。老的工业中心逐渐衰退，莱顿也失去了往日的支配地位。"棉花的时代" 开始了，在移民中的技术创新和政府保护主义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各种新型的纺织品出现在城市和乡村。这一转变在东南欧、东欧和中欧更为普遍。相反，在欧洲大陆的边远地区只能出产满足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在质量上，还不能与西欧的产品相竞争（但泽是少数几个能够与西欧冶金行业相竞争的地区之一）。这样，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的经济结构被一直保存下来，西欧及中欧的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而其他地区既是原料和食品产地又是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即使在以后的产业革命当中，这一结构仍旧得以维系。

7.11 结　　论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了从 14 ~ 18 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业生产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极有必要将北至斯堪的纳维亚、东至巴尔干和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当将上述地域包括进来以后，西欧和中欧活跃的工业中心与边远地区之间的相互依托关系，就变得更加清晰了。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本章所讨论的时期内）工业发展的一些决定性因素。作为原料和食品的供应者及制成品的市场，边远地区发挥着双重作用，它们既是本国经济可能发生的革新的辅助力量，也对西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47]

尽管这些边远地区的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但它们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其作为经济发展的"辅助"这一特征。直到进入 18 世纪，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它们所处的二流地位才有所改善。

最引人注目的是影响不同类型工业发展进程的各种因素的组合。地域上

的优势、法律条件、劳动力的组织、技术进步、投资政策、政府的鼓励措施、企业家的进取心、工人的技术水平、市场的可获得性及其规模、人口的迁徙、战争及其他重大灾难的影响，综合以上这些因素，要做出完整而又准确的分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应当给予注意的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活力和源泉。如果在一个部门中出现不景气，在其他的部门中则会出现新的增长。这种转移的后面存在着固定的但又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因素。乡村工业的扩张，就是对在城市中实施的对从事工业生产的限制性措施的一个回应。这种替代关系不仅发生在不同的产业间，而且也出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作为联系的“纽带”，17世纪所取得的重要的技术创新是18世纪技术进步的前奏，它在后来的产业革命以及工业化的起飞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然而，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转化直接地或毫无阻碍地促进了生产的增长，这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纵观经济发展进程的起伏波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地发现，人们只能从前一阶段给出的特征去理解后一阶段。历史总是对全部过去的透视。【548】

第八章

政府和社会

8.1　军事—官僚君主制与等级社会

自从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政府形式上这一天开始，1660～1789 年这一阶段的欧洲历史就被贴上了“专制主义时代”[①] 的标签。当然，专制君主制在此之前就已存在，有的还延续到了这一阶段之后。就算在这一阶段，有些国家也持续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政体。而在路易十四（Louis XIV）个人统治的初期，法国创造和平环境的技术就像它的战争技术一样在欧洲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其优势还威胁着殖民地世界。法国的专制主义似乎是最成功的政府形式，许多统治者都在努力效仿。

专制主义是 19 世纪初发明的一个词，用来描述独裁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虽然独裁政治在不同的国家执行着不同的功能，但在所有采用这种政治

① “absolutism” 一词通常均译为“专制主义”，但刘北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中译者序言”）认为这是一种误译，应将其译为“绝对主义”，专制主义的英文是“despotism”。为照顾习惯，本章中仍然将“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译者注

形式的地方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对社会施加着类似的影响。但下面我们首先考察的是在18世纪中叶逐渐支配了欧洲的三个主要军事政权［法国、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和哈普斯堡皇室领地］。我们忽略其他较小的政权的原因是：它们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较小从而对它们没有多大兴趣；它们都倾向于仿效其更强大的邻国；它们所效法的对象是别国的社会和政治安排，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战争的需要，这本身几乎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而忽略西欧和东欧外围的主要政权（英国和俄罗斯），是因为每一种政权形式的分支显然都是来源于政权的一般模式。英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过于领先，而俄罗斯在每个方面又都太落后，二者都不是合适的考察对象。

那些对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或社会的集合进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其大多数居民——超过80%——都是靠土地为生，赖以为生的农业在欧洲大部分【549】地区自中世纪早期以来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与盎格鲁—萨克森世界从来没有任何可比之处，从而这种社会并没有一个英语的名字。在法国，这种社会被称为等级社会（*Société d' Ordres*），在德国称之为政治社会（*Ständegesellschaft*）。

在18世纪，这种社会正在被侵蚀，而西欧受侵蚀的程度要大于中欧。通过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租金的提高，这一现象贯穿了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正如当时经常所抱怨的那样，随着繁荣的扩大，对金钱的控制而不是出生或职业渐渐地成为了社会地位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到1789年为止，等级社会关系仍然体现在法律中，而且，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集团中的程度有大有小，仍然被大多数人将它当成一种自然的体制而接受。

这种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被视为是同上主义的（particularist）、社团性的（corporative）、科层制的以及特权的。"特权"这个词直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才由那些先贤们赋予了它现代褒义的性质，这里我们仍然按它的原始意义来使用。同上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包括上层阶级表现出的主要是对个人、对统治者的忠诚，人们的标志是个人性质的，他们直接的知识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关于联邦或国家的知识。

18世纪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意大利和后来变成德意志帝国地盘的大部分地方——是由小型的或极小型的公国和帝王城市组成。但即便如此，在这个存在有足够实力进行统一的重要军事势力的世纪，君主制还是造成了欧洲版图的四分五裂，有的国家直到最近才消失。到1789年，欧洲在创造统一政权或国家意识方面并不成功。

国家意识最强的是法国，但就算法国也远远没有达到一般的水平。等级会议省份（Pays d' États）在它们的特殊法律和习俗上的那种坚持，才称得上是国家意识的一般水平。普鲁士的国家意识非常弱。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常常抱怨他的军官们总是说他们是马克人（Mark）、是波美拉尼亚人（Pomerania）等等，而不习惯使用他们共同的名字——普鲁士人。在1757年的洛伊藤（Leuthen）战役之前，他向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道："现在请记住，你们是普鲁士人……（Wenn Sie... bedenken daβ Sie Preuβen sind）"[①]。【550】半个世纪以后，反对哈登堡（Hardenberg）的领袖们仍然重复着这句话。[②] 在哈普斯堡，当玛利亚·特利萨（Maria Theresa）于1740年就职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中央行政，整个国家像一盘散沙。中央政府只是在1748年才出现，而且仅仅限于奥地利和波西米亚这两个所谓的日耳曼世袭领地。

一般来说，虽然西欧有一定的国家意识，但在其他地方就基本不存在了。也没有什么国际关系需要考虑。每次战争以后行政区的领土都要发生变化，居民也不会怎么反对——惟一可能的情况是，因征服或和平条约提出的领土要求只要能继续让他们有自由，他们就会接受。

社团社会的含义是，大多数的公共事务都由社团或其他类别的团体——比如吉尔德、特许贸易公司或那些敞地（open-field）体制仍然盛行的地区管理农业活动的乡村公社——来履行，希望从事它们所控制的事务的人，就强迫性地成为了社团的成员。在这种条件下，统治者把他统治的对象当做团体的集合而不是当做个人的集合来看待就不足为奇了。法国的国王们习惯谈到的总是构成他们王国的"团体"（corps），或"社会团体"。一方面在那种个人太弱小而不能自立的地方，另一方面在那种国家太弱小而不能保护个人的地方，社团社会都是很自然的安排。

社团安排的必然结果就是特权（按其中世纪时的含义来使用）。所有这些构成社会的集团——不管其目的是为了贸易、商业、农业、行政、战斗、追求知识，还是为上帝服务——都有各自的特权（在法国叫 *privilègees*，在德国叫 *Privilegien*）。特权就意味着有法律保障的特殊权利。有时特权是由单个人拥有，但通常都是属于集团成员所有，其目的（至少在理论上）是为

① 普雷斯（J. D. E. Preuss）编：《弗雷德里克大帝全集》（柏林，1851年），第XXVII卷，第262页。

② 见迈塞尔（F. Meusel）：*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 第3卷（柏林，1908～1913年），第686页。马尔维茨（Marwitz）因试图鼓动一次反对哈登堡的暴动（最后没有成功），以及因表达了反对普鲁士贵族的观点而著名，他有一次说道："*tolle Idee*, aus einem so zusammengsetzten Staat, wie der preuBische ist, alle Abgeornete in eine einzige Versammlung zu vereinigen."

了使团体能够履行其职能。有时，当国家太弱小而连维护和平这种最低职责都无法履行，或者让政府职员去征税都办不到的情况下，不同的团体就有可能去执行一般来说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性质的职能。比如著名的法国征税农庄，【551】它们征收间接税并管理着皇家垄断的盐和烟草，但它们又不是追求利润的私人公司。

因为在等级社会中，除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外，人们不能想像另外的关系，特权就逐渐等级化为科层。在法律出现之前，这种社会不仅是而且应该是不平等的。在全国性的场合，像在法国的国民大会（the meeting of the States General）上，或者普鲁士各邦在新国王就职时的效忠宣誓中，整个社会就由最重要的集团的首领来代表，他在仪式上的地位是由从长期优先确立的秩序所决定的。但这种全国性的场合并不多见。在各种个人团体中，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由科层来管制，从家庭中开始，妻子在法律上有义务服从于丈夫，子女服从于父母，次子服从于长子。圣西蒙（Saint Simon）曾经说过，贵族之间的平等是不能忍受的。巴黎公爵（ducs et pairs）和有法国王室血统的人不仅有更大的特权，而且还拥有立法权，这大大地有别于那些较小的贵族。就算在乡村也有它的科层结构，比如在普鲁士和哈普斯堡领地上的自有地（self-owning area），根据拥有的牲畜数量和耕地数量，农民也分成几种类别——全农民、半农民、1/4 农民——而受不同的法律或习俗的制约；在这几个类别之下的就是大量的农业工人，严格地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Bauer*），而是有不同的名称，比如雇工（*Häusler*）或帮工（*Inneute*），因为他们在公地中没有足够的土地提供给团体耕种。

事实上特权就意味着在法律上个人的私人地位和公共地位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在德国称之为法律的分裂，即这样一种情形，皇家的法令不得不考虑每个城镇、行政区或“领地”的特殊法律特权，也要考虑各阶层和社团类似的特权，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阿贝·西叶斯（Sieyès）的意义上来使用“习惯法”（loi Commun）这个词，即一种运用于每个个人的法律。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是非常古老的。它们的时代要追溯到中世纪，有的甚至要追溯到封建时期。另一方面，被称为专制主义的政府形式却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形式，因为它在法国到达其巅峰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中欧更是要到 50 ~ 100 年之后。【552】

专制主义与君主制的早期形式是有区别的，因为，用穆尼埃（Mousnier）教

授的话来说，国王大权在握，不与任何人分享，[1] 他对权力的控制靠的是常备军以及在中央和各行政区的皇室官员，他们一般被视为组成了一个官僚体制。就像在其他独裁形式中一样，专制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他单独拥有颁布和废除法律的权力，而且可以将不同的法律应用于特殊的集团或个人。没有合法的渠道来表达对皇室的反对意见，除了在法国高等法院（parlements）中存在否决权。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议会也有相似的情况。

在 18 世纪其他的欧洲独裁国家，高等法院阻止皇室意愿的可能各有不同。有一些长期继承下来的反王室的传统，甚至连路易十四也不能把它消灭。它们是一种具有长期培养起来的强烈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的社团。在法国，它们保持了通过"基本法"来限制君主制的中世纪传统，其实这意味着一种既存的习俗，也就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的"中间权利"。[2] 虽然它们宣称有权拒绝为那些违反宪法的皇家法令登记注册，但国王或其幕僚从来没有承认过它们这种权利。在路易十六 1787 年对奥尔良（Orléans）公爵——他宣称没有议会的同意而增加贷款是非法的——的回信中表达的、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的专制主义教义："如果……因为我要这样做，这样就合法。"[3]

像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专制主义的有效的功能，以及在根本上它的存在是取决于一部分人口的积极支持和其他人的默许。但是根据定义，因为专制君主并不去通过允许他的臣民或他们中的任何集团有权参与政策的表述，来追求社会舆论的认同，因而只要存在社会舆论，他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赢得胜利。专制君主制造了对世袭、独裁、势力这些当时社会的本质的信仰。他们小心地避免与社会中最有势力的集团发生抵触。比如弗雷德里克【553】大帝，尽管常常宣称农奴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光彩的，但他还是不去触及私人不动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贵族的反对。

最后，专制君主运用所有独裁者都会动用的武力去镇压或者威胁反对者。他们也是常备军和秘密警察的发明者。如果有必要和有可能，他们还会辅之以审查制度。他们会有规律地把人们不加审判就投入监狱，而且无限期地关押。换言之，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欧洲大陆的专制主义不承

---

① 姆斯尼尔和哈唐（Mousnier and Hartung）：《关于绝对无政府主义的几个问题》，in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di Scienze Storiche. Storia Moderna*，IV（佛罗伦萨，1955 年）。

② 见米歇尔·安东尼（Michel Antonie）：《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议会》第三册第二章（巴黎，1970 年），第 571～598 页。

③ 吉恩·伊戈莱特（J. Égret）：《1787～1788 年革命前的法国》（巴黎，1962 年），第 191 页

认大部分（一般来说是全部）公民自由。

在所有这些方面，专制君主与其他独裁政治中的君主一样都是独裁者。但专制主义有它特别的、区别于其他独裁形式的表现。像拿破仑和后来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他们并不是通过军事政变（*coups d' état*）而取得统治权，也不是通过作为流行运动的超凡的领导者而获得统治权，他们天生就要得到那种地位。就是说，专制主义不是通过革命而产生的，恰恰相反，是从过去的传统中逐渐演变，缓慢地建立起来的。

就像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一样，在主要的大陆国家，专制君主放弃了许多中世纪时期停滞的制度，虽然更东边的那个国家的君主与此背道而驰。他们的特点是将新的制度强加在老制度之上，比如法兰西帝国设立了总监制（intendants），普鲁士的国王们的战争特派员（Kriegskommissarien）控制了或者是多多少少篡夺了现存的地方当局的职能。[1]

虽然专制君主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不会与其他强势集团发生冲突，但他们一般来说［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是个例外］也没有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或财产分配方式的想法。他们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力这一事实，意味着相当程度的保守根植于他们的政策之中。广泛地说，他们接受他们所继承的这个社会，只有在实现他们所想的某种特殊的政策时需要做出一点改变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去打乱这个社会。但如果真这样做了，他们就会带来更大的变革。

第一重要的总是战争。我们一般是从看一个人如何花钱来判断他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个测验运用到18世纪的专制君主身上的话，结论就会很清楚了。就算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会把国家岁入的70%以上用于军事目的——就是说，花在维持他们的武装力量，花在偿还过去的战争积累的债务上。比如普鲁士，那里没有一个公债机制，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金钱以积累所谓的战争基金（war chest）。【554】

为了保护或者扩张他们的贸易和领土，专制君主就有必要去增加他们的人力和金钱资源，而他们的成就只是这种必要性的副产品。如果统治者是来自于他自己的领地，并为防卫和扩张装备了军队，那么他就必须置军队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必须从本地人（至少也应该是统治者的臣民）中任命政府官员，并且军队也应主要由本地人组成。常备军的出现意味着人民要长期受兵役之苦。中世纪时期国王要“靠自己”的观念已经开始不可能实现了，就像英国斯图亚特的反对者在攻击“独裁势力”时始终指出的那样，每一

---

[1] 特别参见海兹（O. Hinze）：*Staat und Verfassung*（哥廷根，1962年），第242页及其后内容。

个维持常备军的地方都出现了新的赋税名目以及沉重的税收负担。

对常备军的需要，以及供养他们所需要的税收，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这一阶段大陆的每一个专制主义政权的政府活动所包括的内容，或多或少都在持续地增加，这导致了皇室官僚机构的持续增长。平民官员不仅需要满足或者帮助满足军队的即时要求——武器、制服、食宿、动物饲料、交通工具、医疗等等——而且还要引导或者控制平民的行为以满足或者加强军队的需要。大陆的每一个主要政权都不得不建立某种形式的征兵体制，但只有法国建立了民兵制度用以驻防以及补充战时陆军之需。

因为征税的数额（以及许多发达的社会中从富裕阶层的贷款）不仅取决于行政势力，而且还取决于可利用的财富的数量，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就产生了监管（如果不是控制的话）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的需要。大陆的每一个主要政权——首先是法国，然后是普鲁士，最后是哈普斯堡（这里，俄罗斯也可以算在内，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也包括英国）——战争、经济政策以及改变行政管理方式的需要，使它们的君主逐渐不同于中世纪的君主。中世纪的君主只不过是掌管着国家大权的地主而已。

[555] 这个过程起初在法国和中欧并不相同。在法国，国王被视为上帝在地球上的化身。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他要被涂上圣油，他的权威因此就更神圣，使他区别于其他也被认为是由上帝授予权力的人。波舒埃（Bossuet）竟然说："陛下是上帝伟大的形象……这是上帝的形象，坐在上天最高的皇位，使整个大自然运行。"[①] 攻击君主的人被视为是亵渎神灵。"基督的称号被赋予了国王，到处看到人们叫他们基督，或是称为老爷。"

在中欧，专制主义稍后才到达它的顶峰，而与此同时，德国启蒙运动也开始了，因此君主并没有获得半神的地位。他们的势力被视为一种自然法则的表现，视为对上帝所创造的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种理解，从而是这种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上帝并没有规定过任何特别的政府形式，君主便从与人民订立的一种契约中获得了他的权威。

但是，这种作为所谓"开明专制君主"（enlightened despots，19 世纪发明的一个词）基本信条之一的信念，并没有减少在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眼中的那种毫无疑问的服从。启蒙的专制君主以作为国家的第一仆人而自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考虑其臣民的愿望。他们的意思只是要使他们的王朝

---

① 布莱蒙特（H. Brémont）：《圣经语录中的政策》，载《节选与评议集》第 2 卷 II（巴黎，1913 年）第 106 页。

利益、他们的个人喜好，服从于国家利益（他们自己解释的那种国家利益）。在实践中，这些君主所受的启蒙最普遍的应用，尤其是约瑟夫二世和弗雷德里克大帝，表现在对那些更原始的、比法国面临着更多的被侵犯和被肢解这类危险的社会的统治中。在那里，他们的独裁和残暴远远大于他们的法国同行。

专制主义在中欧比在法国的时间要短，而且对待既得利益集团比法国更不宽容，因为当时的国家有理由要求它如此。托克维尔（Tocqueville）提到——现代学者也不怀疑这种看法——“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期，人们几乎没有破坏法国任何旧的行政结构。于是人们说，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行政体制。”[1] 霍亨佐伦和哈普斯堡王室的世袭领地还没有资格这样说，因为霍亨佐伦在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Ⅰ）之前还没有适用于所有行政区的行政体系，奥地利和波西米亚也是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才有了这种体系。在中欧开始建立国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中世纪制度的势力，这与法国的实践并不相同。【556】

在法国，比如路易十四削减法国城镇的特权的尝试就因为许多原因而彻底失败了，这些原因中最主要的是城镇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买官行为。用古贝尔（Goubert）教授的话来说：“大城市，尤其是大商人，继续拥有真正的制定政策的权力和强烈的利益，甚至成为国王的代表，在商业上……在法律上，实际上差不多保留了所有的特权……这些城市经常保留了真正的文化的自治。”[2] 相反在普鲁士，从威廉一世开始到弗雷德里克大帝时期，就彻底摧毁了城市的独立。事实上，普鲁士城镇在拥有特殊的法律权利这方面继续保留着特权，比如免除兵役，弗雷德里克大帝向各种类别的城镇居民、有时是作为整体的城镇共同体分配特权。但是所有的城镇财政事务以及大多数其他事务——比如建造大楼，建立工厂，草拟贸易和生产行为的规则，统计人口、房屋和可用兵舍的数量，以及其他政府所关心的事务——都是由“代表”（Commissars）来控制的，比如著名的*Steuerräte*，他们在整个霍亨佐伦按照可利用的规章履行职责。[3]

托克维尔认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早晚都要改变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结构的运动的结果。但18世纪的德国却没有发生这种运动，

---

①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载迈尔（J. P. Mayer）编：《托克维尔全集》第2卷（巴黎，1952年），第127页。

② 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旧制度：第二章权力》（巴黎，1973年），第81页。

③ 见施穆勒（G. Schmoller）：*Deutsches Städtewesen*（柏林，1922年），第375页。

因为他用“封建”来称呼的那些制度在德国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确实，哈普斯堡直到1781年、普鲁士直到1807年，大量的农民还是被限制在土地上的农奴（就算后来他们获得了个人自由，但有土地的农奴仍然保留着，【557】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都还在受奴隶义务的约束，附属于土地）。一般来说，在整个18世纪，分割地产的障碍在法国比较容易被克服。但中欧社会在大多数方面都比较落后，等级社会所受的侵蚀比较小，较晚才建立的国家机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现代的形式。普鲁士的人口规模较小，因此管理的难度较低，从而更有效率。

特别是在它的金融管理、官僚结构以及相对不腐败的公务员这些方面，普鲁士在1789年是领先于法国的。18世纪普鲁士的税收体制是最令其他欧洲国家羡慕的，尽管这只是因为它在管理上更聪明，而不是因为它凭借特权而比其他体制的麻烦更少。另一方面，在每一个管理层次上都坚持小心计账，以及威廉一世和弗雷德里克大帝所表现出来的，尽可能地调整其对外和对内政策的目的和手段的决心，使得普鲁士成为18世纪欧洲惟一保持独裁政治的国家，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在这方面明显区别于法国的行政管理。

德国的官僚体制在19世纪初常常受到斯泰因（Stein）、舍恩（Schön）、洪堡（Humboldt）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攻击，他们把这种体制概括为“mechanischer Staat”，一个德国浪漫主义的怪物。这种体制的缺点已为这些人以及现代历史学家所熟悉。其对普鲁士命运的影响，无论是在好的方面还是在坏的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议。

在18世纪，就像一个美国权威人士所说：“在普鲁士的官僚机制中，权力比在法国得到了更有效的集中，行政措施在运用中也有更高水平的一致。”在普鲁士不会经常发现任何合法权利被无缘由地剥夺的情况，而对于“无能的领导者荒谬而退化的暴政”，普鲁士官僚的心理是“只有听之任之”。① 然而在19世纪初，通过一个还没有被恰当地解释的过程，从这种体制中却出现了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识渊博的人，从他们当中，斯泰因能选择他的合作者，哈登堡可以组建它的智囊团。也正是因为他们，哈登堡的内阁首相（Chef de Cabinet）弗里德里希·冯·劳默（Friederich von Raum-【558】er，他不喜欢为政府服务，于是很早就离开政府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在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可以写出下面的话：

① 沃尔特·L·多恩（Walter L. Dorn）：《18世纪普鲁士的官僚机构》，载《政治科学季刊》第XLVI卷（1931年）、第XLVII卷（1932年），尤其是第XLVI卷，第407页。

> 我们国家不是由贵族、官僚、农民，也不是由行政区组成的，……这里没有强制，反抗力量也就很少。（君主政治的）各个组成部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宪法。各地的官员的地位迄今为止都是君主的代表的替代物，甚至是宪法本身的替代物。只有在更大的整体中才是稳固的、凝聚的。如果这种体制瓦解了，我想在我们国家将不会有什么能够保留下来，除了孤立的团体和个人。[①]

18世纪普鲁士的政治思维中，国家观念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独裁政权中更大，国家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有力。然而在每一个地方，专制君主所发展或创造的官僚体制在促进统一、中央集权和国家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或多或少都有类似之处。

而对这些过程的一个限制却是来自官僚君主制本身的性质。专制君主，就是说他们一般不是也不会是革命者。赋予他们的官员及官员的特权以世袭的性质，这种风气在专制主义中得到发展并达到其顶峰。皇室官僚的主要成员全部或大部分都是贵族（其原因我们稍后再讨论），他们和君主的关系由利益和等级社会的遗产所连接。

另一方面，财富、教育水平、战争和行政管理的成本在18世纪都提高了。专制主义君主制和独裁政治这种双重的社会形式似乎已经逐渐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尤其是在人力和金钱上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并让这些财富能更有效地得到利用的要求。此外，因私利而反对现存秩序的意见重新得到加强，实际上这些意见常常被法国启蒙运动的先贤们以社会公正和人道的名义提出来。

18世纪的专制主义中，允许君主任意地干预行政过程，而且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也不会顾及大臣们的想法，这种现象已经逐渐与公正和有序的政府不相调和。集团和地方的无数特权使得行政事务非常复杂，挫败了建立【559】更理性的税收体系的努力，阻碍着经济增长，而且因为它们导致的纷争，反映为在国民中缺乏任何公共利益。就像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在他的《城市自治论文集》（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②]一书中所说——本书是对由他和杜尔阁（Turgot）提出，但没有呈递给路易十六的主张的概括——法国“是一个组合了不同的乱糟糟的秩序，而且其人民之间相互联系很少的社会。”他总结说，结果就是“涣散而不团结使仆人们

---

① 引自范梅尔（E. von Meier）：《斯泰因和哈登堡的改革》第2版（慕尼黑—莱比锡，1912年）。

② 载于斯彻利（G. Schelle）编：《杜尔阁全集》第4卷（巴黎，1913～1923年），第568页。

和陛下的工作量增加10倍，这样就必然而惊人地减少了您的权力。”

但是任何独裁政权的行政机构中的领导成员是不愿意去推翻现行秩序的，尽管他们也听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教诲，知道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且最初的抗议声也是来自他们中间。但在任何特定的国家，他们的不满似乎都或多或少地与战争或外交上成败的程度相一致。在法国和哈普斯堡，其国际地位在18世纪后半期日益下降或变得不稳定，因而抗议的呼声也是最大的。在哈普斯堡还出现了君主自己起来反对等级社会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普鲁士这个军事君主制最成功的地方，在政府的统治之下，弗雷德里克大帝生命的最后20年是他心情最满足的时期。他每年都要在他最忠实的大臣埃瓦尔德·格拉夫·冯·赫尔茨堡（Ewald Graf von Herzberg）伯爵于他生日那天，在柏林科学院（Berlin Academy of Sciences）发表的演讲中接受一次赞誉。[①] 但这种心情也逐渐被破坏并最终被摧毁了，因为从1793年开始，普鲁士的国际威望便下降了，并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德（Auerstädt）两次战役的惨败后降到了最低点。随后斯泰因和哈登堡便开始着手他们的改革计划了。

实际上18世纪末期，等级社会加上独裁这种双重体制在大陆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已被怀疑。应该将统治集团的成员分割成多少部分以使他们相互制衡这个问题，常常出现在统治者自己的脑海中，在法国尤其如此。【560】

在法国，这种怀疑始于一个改革派的大臣让那些已被证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社会和行政结构更加现代化的尝试。这些尝试导致了政府的瘫痪，导致了国民大会（State General）的召集和革命的发生。在哈普斯堡，约瑟夫二世的多数改革措施不得不被废止。只有在普鲁士这个政府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它可能一方面避免革命这个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迪斯（charybdis）[②]，另一方面避免社会和政治的停滞；所以当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在19世纪初抵达德国时才会说，“万国之都”（vraie capitale）不再是维也纳，而是柏林。[③] 普鲁士的改革者们实际在通过宪法的手段，或者彻底摧毁等级社会来限制独裁者的势力方面并不成功，但是他们却通过比当时所能接受的更激进的手段，扫清了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留在18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和增加兵力之路上的所有障碍。

---

① 1780年、1781年、1782~1787年赫茨伯格（*Herzberg*）先生在柏林科学与文学院公开会议中宣读的论文。

② 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迪斯（Charbdis）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六头女妖。——译者注

③ 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De l'Allemagne*, ed. Comtesse de Pange 第1卷（巴黎，1958年），第240页。

8.2 君主和他们的贵族

在君主们建立他们的专制势力的斗争中，主要的反对者是大贵族家族的领头人，这些人迫切希望控制政策并支配地方政府。最后，君主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并把以前那些极有势力的臣民排除在政府机构之外，或者只是让他们保留在君主能够信赖的位置上。君主从下层出生的人中提升要员，这些人的地位是君主授予的，同样也可以随意地废除。作为暴发户，他们一般都是极能奉承而且残暴，可以依赖他们以加强皇室的意愿。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便产生了这样的传说：专制主义的全盛期是动员资产阶级来击败贵族。

这种传说错误地描述了发达的专制主义社会的性质。这种社会绝对是一个农耕社会，商业团体基本上不存在，或者没什么威望，也没有阶级意识。古贝尔教授在对 1600 ~ 1730 年之间的博韦（Beauvais）的研究中说到，在这个城镇“没有文化，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要求，整个资本主义都是如此。直到 18 世纪 60 年代才能观察到某些事物的出现，它与阶级意识一样，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①] 另一个 20 年就算在法国也不得不忽略，用埃格雷（Égret）教授的话来说，可能“第三等级的觉醒”。[②] 在中欧，城市共同体比法国更少更小，其成员的心理中更多的是奴性，他们的兴起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561】

尽管一些君主确实是从非贵族出身的人中提拔政府要员，但这种情况在法国尽管有必要，但也很少见。1661 年当蒂雷纳（Turenne）听说路易十四的主要顾问是富凯（Fouquet）、里约内（Lionne）和勒泰利埃（Le Tellier）时，他带着疑问地说：“要是三大资本家能够在国家和政府中扮演主要角色就好了。”[③] 然而他的意思并不是 20 世纪所假设的那种。富凯、里约内和勒泰利埃都是来自贵族家庭。富凯在那时其实是一个侯爵，住在 Vaux-le-Vicomte 的城堡中，这个城堡的庄严宏伟，足以激起路易十四的嫉妒。但他们三个人由于职业的家庭的原因，就像蒂雷纳的德国同行后来描述的那样，是 *robe*-pen-pushers 或 *Federfücher*。蒂雷纳是一个法国的元帅（Maréchal de

---

① 皮埃尔·古贝尔（P. Goubert）：*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巴黎，1960 年），第 348 页。

② 吉恩·伊戈莱特（Jean Égret）：《1787 ~ 1788 年革命前的法国》第 5 章、7 章（巴黎，1962 年）。

③ 布鲁彻（F. Bluche）：《18 世纪巴黎最高法院的显贵》（巴黎，1960 年），第 304 页。

France)，他在母亲的那一方是教给他战争技巧的奥兰治王朝（Orange）的威廉一世（William I）的孙子，在父亲那一方又是来自著名的蒙莫朗西家族（Constable Montmorency）的布隆（Bouillon）公爵的后代。这个显赫的军人家庭的后代，自己也是路易十四最著名的将军之一，在64岁那年在战场上结束了他的生命，死得其所。包括他、包括圣西蒙以及其他许多来自宫廷家族的人，都被错误地看成是中产阶级，尽管他们世代拥有贵族的头衔。

这种观点一直被那些以自己的高贵血统为荣的人所表达，直到大革命为止。托克维尔的论断对此负有责任，他认为旧制度时期的法国政府是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但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除了内克（Necker）以外（他是一个外地新教徒），法国的所有大臣、总监或高官没有一个不是贵族。这些官员尽管来自于显赫的贵族家庭，但却一直在特定的圈子中被视为中产阶级，其原因是始终有一种信念（直到1789年才有所减弱）坚持认为在政府工作是对贵族尊严的贬低。

在各个欧洲大陆国家，贵族是各社会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贵族也同样如此，但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数量比较固定。他们与大陆国家的贵族一【562】样得到相当的收入，有着同样的生活风尚。在法国18世纪困扰着其社会生活和后来法国的历史学家的争论，即应该把他们看成贵族还是看成中产阶级，在英国是不会出现的。但英国的模式与主要的大陆国家没有可比性。

在大陆国家，按在法律上的权利来定义，贵族像等级社会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一样，是一种秩序或一种状态。在这里讨论的这个时期，他们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从来不是一个社会阶级。因为在法国，成为贵族相对容易。哈普斯堡在18世纪后半期也是如此，甚至普鲁士也是这样，而且因为贵族的所有孩子都可以继承贵族身份。贵族在每个大陆国家都是人数众多的一个集团，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的区别是在于拥有的财富或财产数量各不相同。在法国，收入最高的贵族是王子、非皇室公爵，以及有贵族身份的总包税人（fermiers généraux）。死于1751～1775年间的总包税人的平均财富估计是390万里弗（按当时的汇率约合170 000英镑）。[1] 一些公爵每年的收入大约相当于26 000英镑或更多。[2] 法国最富有的人——奥尔良公爵［后来的平等菲力浦（Philippe Égalité）］，在大革命时代估计其年总收入大概为1 000万里弗，大致相当于440 000英镑。[3] 当然在最底层的就是赤贫。吉

---

① 伊维斯·杜兰德（Yves Durand）：《几个世纪的总包税人》（巴黎，1971年），第132页以后。
② 卡尔（H. Carré）：《18世纪法国贵族的公共观点》（巴黎，1920年），第41页以后。
③ 黑斯鲁普（B. Hyslop）：《平等菲力浦——奥尔良公爵的特权》（巴黎，1965年）。

恩·梅耶（Jean Mayer）发现，在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的一个地区，有1/3的贵族陷入赤贫境地，他相信在法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赤贫贵族。[①]可能用其他的标准而不是赤贫这一标准来判断，法国相当比例的贵族也是非常贫穷的。从这一证据来看，在其他主要欧洲国家，这种类似的或许是更糟的境况在贵族中可能很普遍。

另一方面，18世纪法国最富有的个人也是贵族，而且贵族也是所有集团中最富有的一个群体；[②] 没有理由怀疑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在这种环境中，尽管贵族身份本身不是一个声望的符号，而且其地位还在日益下降，但是如果没有贵族身份，就不会有声望。在法国，直到大革命为止，成为贵族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目标，因持续的战争而造成的皇室金钱常年短缺问题凭此得到了解决。路易十四卖出了大量的贵族头衔（比如单单在1696年3月就卖出了500个），并允许许多其他人通过购买官职而附带地要求贵族头衔。【563】

内克在他1785年写的《财政管理》(*De l' 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一书中估计，除了给个人贵族的官职外，还有大概3 000个职位立即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后授予了世袭贵族。[③] 这些官职大多数是在议会或其他宫廷机构，尤其是在协助法庭和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但内克也算出，有900个国王的大臣职位职责是非常有限的，这些职位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只不过是那些富裕的金融家、文人［比如伏尔泰（Voltaire）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贵族身份的］以及成功的平民获得贵族身份的一条途径。所有这些官职都成为了买者的个人财富，可以自由地遗赠给他们的继承人或者以随其需求而变化的价格在市场上销售。

卖官这种惯例虽然不是路易十四所发明，但这种现象在他统治的时期要比他的前辈们统治的时期多得多。这表明了王室的金钱需要更迫切，表明了声望与贵族身份的附属关系，还表明在中央政府的业务增加以后，利用新资源的必要性。

在大贵族家族的眼里，路易十四的过错不在于他怎样轻视贵族秩序（惟一明显的一点是，当贵族要求他在宫廷表演中要保持礼节时，他没有照

---

① 吉恩·迈尔（Jean Mayer）：《布列塔的贵族》（巴黎，1972年），第35页。

② 特别参见莱费布（G. Lefebvre），*Études Orléanaises*（巴黎，1962年），第172页；佛斯特（R. Forster）：《十八世纪的图卢兹贵族》（巴尔迪摩，1960年）；森托（Jean Sentou）：《法国大革命中图卢兹的社会财富和社会集团》（巴黎，1969年）；道马德（A. Daumard）和弗雷特（F. Furet），*Structures et relations sociales à Paris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巴黎，1961年）。

③ 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全集》第5卷（巴黎，1821年），第365页及其后。

办），而在于他由于财政的原因而批发贵族称号，从而贬低了贵族秩序；还在于他为了保持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瓦解了贵族的科层体系；在于他在政府班子中排斥王室成员并且他们的替代者是下等贵族［一般来自平民（robe）］，尽管当时为官的还是贵族，而且一般是世袭的贵族。

在法国，用布吕什（Bluche）教授的话来说，卖官是“社会进步的机【564】制”，而且当中欧国家也渴望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时，这种机制在那里也成为必要。玛利亚·特利萨卖官是明码标价的——侯爵是250弗罗林，伯爵是200弗罗林等等。① 在所有方面都不太温和的约瑟夫二世是以买者所能接受的最高价卖官。② 甚至威廉一世也卖官，尽管普鲁士的贵族并不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而且贵族头衔并不附属于官职。

1713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即位之时，为贫穷所困的领土上的大量贵族，确实够得上用“笨牛”（stupid oxen）这个他们的君主所给的词来形容，这驱使他去任用中产阶级，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任用中产阶级的人数比19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个阶段的人数都要多。③ 正如其中一个战争与领土委员会（Boards of War and Domains）的领导、国王任命来教授未来的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宫廷事务官（Kammerdirektor）希勒（Hille），在他尊贵的学生抱怨中产阶级的地位已在贵族之上时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确实是颠倒了。但那些不是很聪明、迷恋于琐事的王子们又应该怎样去发现能帮他们处理国事的能人呢？”④

威廉一世，这个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在智力上低于正常人（在他9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不可能教他数到10，或者学习字母表）、一生中都会突发精神错乱的野蛮人，不可能去判断路易十四模式之后的新模式的好坏。中产阶级的典型是像约翰·安德利亚斯·克劳特（Johann Andreas Kraut）这类人，他被威廉一世委以重任，有时还是他的私人朋友。但威廉一世的雨格诺教徒的家庭教师使他相信，虽然政府可以任用那些不是贵族的人，而且他们的价值比许多贵族还要大，但是“当贵族和中产阶级有相同的功过的时候（gleiche Verdienste besässen），总是应该偏向贵族而不是平民和军官这些中产阶级”。⑤ 这就是威廉一世行为的原则。尽管许多中产阶级被提升为高官，但在文职人

① 维奈罗（I. Vianello）：《18世纪的米兰人》（米兰，1934年），第64页。

② 布莱宁（T. C. W. Blanning）：《约瑟夫二世和开明专制》（伦敦，1970年），第52页。

③ 罗森伯格（H. Rosenberg）：《官僚政治、贵族统治和独裁政治：普鲁士的经验》（剑桥，马萨诸塞，1958年），第67页。

④ 迈瑞英（F. Mehring）：*Die Lessinglegende*（1953年版），第150页。

⑤ 海因里希（C. Hinrichs）：《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汉堡，1941年），第70页。

员和军队的最高职位上，仍然保留着他所信赖的老贵族家族的成员。

这样，在他统治期间，就像在每一个官僚专制主义时代的早期一样，出现了两个分离的科层，一个科层基于其出身和土地财产，另一个科层基于其职能。第一个科层决定着社会威望并遍布宫廷；第二个科层掌管着军队与平民行政之间的关系。但这一般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老的家族怨恨他们被排除于权力和新的官僚正在努力加强的领域之外。暴发户则受辱于他们的低贱出身意识，从而在动用权力满足他们在土地和头衔方面贪得无厌的胃口时残暴不仁。这二者相结合，一方面增加了对接受权威的不情愿，另一方面增加了操作中的残暴，使得这段时间渐渐表现出对效率的一种妨碍。 [565]

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这一时期，土地承载了过多的人口，因而占有土地所能获得的势力是其他途径所不能比的。当对土地的占有与贵族的出身相结合，就意味着拥有控制土地的继承权——这是当时惟一的合法继承形式——这是特权的主要源泉。如果一方面激发了土地所有者的敌对情绪，另一方面又不能满足公务人员，那么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增强其政策的有效性。这是约瑟夫二世拒绝承认的事实，但法国政府逐渐适应了这一事实（尽管只是在18 世纪后半期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弗雷德里克大帝也通过适应这种事实而为他的政策打下了基础。

威廉一世和路易十四因他们的暴发户幕僚的行为，而把他们的武断势力推到了贵族所能忍受的极限。路易十四的战争开销，以及他为支持这些开销而采取的手段与他统治期间折磨着法国的自然灾害相结合，大大地削减了除了为王室服务的金融家之外，所有阶级的收入或者生活手段。威廉大规模地收回王室土地的尝试，就意味着把土地所有者推到了反抗的边缘。他的征兵活动，在引入叫做驻军体制（canton system）的征兵方法之前，导致了整个村庄的迁移。[1] 在他这个时代的普鲁士，就像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一样，都存在地主和农民联合起来抵抗皇家官员强取豪夺的情况。这些事件起到了使他们冷静下来的作用。路易十四死前悲叹道他过于热爱战争了。威廉承认，如果希望臣民“爱戴”（soutenieren）自己的话，就必须“爱戴”臣民。

在整个 18 世纪（除了哈普斯堡，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玛利亚·特利萨时期的温和政策演变成了激进的约瑟夫二世时期更严重的专制主义），早期统治的那种动荡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新的官僚体制的建立，使得程序上更加有序，君主和大贵族家族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常备军和各行政区的皇室 [566]

---

① 布斯凯（O. Büsch）：《普鲁士的军事体系和社会状况》（柏林，1962 年），第 16 页。

官员要反对贵族已不可能。新的官僚体制为执行权力和积累财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事实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相结合，使文人的工作变得更有名望。宫廷（除了普鲁士，在那里整个18世纪几乎都不存在这些制度）不仅是时尚的中心，也是恩惠的主要来源。就像一位法国作家所写：法国国王"是法国头号贵族，但尤其是凡尔赛宫的最高主人"。[①] 结果是在这种环境中显赫的贵族家族结合君主的承认，他们自己整合进了国家机器之中。

官僚机构中贵族的数量确实在增长。1758年贝勒—伊斯勒公爵（Duc de Belle-Isle），可能他在这方面过于敏感了，因为他是富凯的直系后代，在100年前蒂雷纳·富凯还被称为中产阶级）被授予国家军事大臣时，他立即拒绝了。就像他的前任卡迪埃尔·贝尼斯（Cardinal Bernis）所说的那样："他还是犯原来的老错误，即一位法国元帅如不违背命令就无法成为国务秘书"[②]。但最后贝勒—伊斯勒经劝说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在旧制度余下的30年中，许多公爵都像他那样就任于要职。在这一阶段，显赫的宫廷家族的成员通常就任于军事或海军大臣。另一方面，王国中最重要的包括财政事物职责的总检察长（contrôleur général）之职，则持续地被中产阶级成员所把持。但在普鲁士，在威廉一世时期把持高位的中产阶级，到了弗雷德里克大帝时代，除了法庭管理之外，都已被贵族所代替。

凭这些方法，出身科层和职能科层之间的鸿沟消除了。先在法国，然后在普鲁士（但并不是在哈普斯堡领地的世袭土地上，那里的官僚体制建立的时间太短）出现了一个统治精英阶层，从而便捷地跨越了等级社会阶段。[567] 他们的成员有的来自专制主义时代之前的显赫的老贵族家族，其他人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提高其地位。

在法国，如前所述，提高地位的主要手段是买官。从所有低贱的职业中崛起的有抱负和能力的企业家族成员，包括富裕的农民，不断地倒买倒卖官职，直到两代人或更多代人以后能够买到行政法院审查官（maître de requêtes）的职位。这个官职是竞争最高官位——总监、国家大臣和总检察长——的最好的入场券；最高职位并不出售，但只要环境允许，也同样可以按价授予。

在普鲁士，买贵族身份、买世袭官职，以及18世纪中期以后买所有官职都是不允许的，这使得这一进程比较困难。在政府和社会中提高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军队来实现。军队在普鲁士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其

① 弗莱特（F. Furet）：《法国大革命问答集》，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年鉴》，1971年3～4月。

② 米歇尔·安东尼：《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法国议会》，第211～212页。

他国家，因为军队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大革命之前这一阶段末期的和平时期，法国2 600万总人口中，最大军队数是17 万人。而同一时期，普鲁士 550 万总人口中就大约有200 万军人；而且军队中很大比例——超过 50%——的人都是雇佣军，所有军官都是普鲁士人。在 18 世纪末，库尔马克（Kurmark）有 68%、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省有 60% 的成年贵族是现役军官，或者曾经是军官。[①]

在法国，到军队服役是赔钱的事，因为买装备、买军衔、保持军官的生活模式都需要开支。而在普鲁士正好相反，因为任何人只要到达连长职位而且不笨的话，就拥有了一个主要的财源，因为（虽然是非法的）他可以做雇佣军买卖。因为弗雷德里克大帝在藐视中产阶级这方面是臭名昭著的，所以贵族在这些机会上并没有被排斥；没有被授衔的军官可以获得提升，加之他的贵族身份，就可以成为高官；也可以通过伪造贵族头衔来保有军衔。显然，这些现象并不罕见，尤其对于来自于德国其他部分的人更是如此，格奈泽劳（Gneisenau）和约克·冯·沃腾堡（Yorck von Wartenburg）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军队并不是要去发现有才能的士兵；一旦一个暴发户有了一段成功的军旅生涯，娶了一个富到足够让他买到骑士封地（Rittergut）或买到有贵族身份的妻子的话，他的社会地位和他孩子的未来就有了保障。[②] 【568】

对于平民来说，提高地位的途径是大学、国家考试以及受一些皇家官僚的赞助（通常要以为其服务作为报答）。最成功的——一般是牧师、医生、大学教授的子弟，有时也有商人的孩子，自由农民的儿子虽然也有，但很少见[③]——就是像在军队中的那些人一样，被授予贵族身份。

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得到有权有势的地位，所有得到这种地位的人都拥有一大笔收入，至少从普遍的标准来看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法国和普鲁士（尽管两个国家的程度有所不同）财富不仅是对成功的奖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逐渐也成为了取得成功的前提。在法国，大多数贵族已经买不起一个文职或军衔。同样，在普鲁士，许多贵族在升至上尉之前，或在文职中达到不付费的学徒身份之前，连生活费都承担不起。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他说："贵族和财富的分离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总是在经过

---

① 布斯凯（O. Büsch）：《普鲁士的军事体系和社会状况》（柏林，1962 年），第 95 页。

② 见帕雷特（P. Paret）：《1807 到 1815 年普鲁士的改革年代》第二章 "弗雷德里克时代"（普林斯顿，1966 年）。

③ 塞汉德朗（Seihandlung）的领导克里斯蒂安·冯·罗特尔（Christian von Rother，1788～1849 年），是一个从农民提升到最高职位的例子（见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ßischen Geschichte* 第 46 卷，1934 年）。

一个阶段之后破坏贵族或财富，或者对两者均造成破坏。"[①]

正是这些在18世纪后半期区别于精英阶层的混合阶层，其中出现了一些观察者。根据这些人的激进或保守的倾向，他们相信，通过法律手段的变革，必然的结果就是要么被承认，要么被抛弃。杜尔阁在1776年认为，特权的原因不再是显赫的贵族家族反对平民（*roturiers*）的原因，而是富人反对穷人的原因。[②] 对歪曲原有关系的金钱势力的谴责是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普遍现象。在普鲁士也听到了这样的谴责，因为来自贸易、制造业和金融中的利润增长了，因为农业租金的提高导致了土地投机，进而改变了贵族地【569】产的所有权，贵族所抱怨的就是破坏了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特殊关系。[③]

但所有这些并不像当时和后来所说的那样，只靠金钱就能进入统治精英阶层。事实上，作为大众文化基础的金钱，从来不是受教育的贵族成员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下面的话证实了这一点："生活方式和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在两种人（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产生了成千上万的相似点。中产阶级和贵族有着同样的光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光辉确切地讲是来自于同一种根源。"[④] 在伦多夫（Lehndorf）伯爵（普鲁士的一个贵族，他少年时代被从军队中开除出来而受到侮辱，他的妻子又与弗雷德里克大帝任命的一个绅士私奔了）的牛奶场，其令人吃惊的增长可能要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之前，在这里就知道能在富有的中产阶级之中生活"als wäre man bei den vornehmsten Leute"。[⑤] 但在统治精英成员中，老贵族家族以及他们的财富仍然是势力和特权的重要源泉，尽管他们也要与那些新近受封的智慧的、明显为国家服务的贵族相竞争，或者在普鲁士，仍然要与平民相竞争。

事实上在18世纪末的法国和普鲁士[⑥]（但在哈普斯堡的世袭领地上仍然很少见），已经出现了蒂代（A. J. Tudesq）在他的《1840～1849年法国的

---

① 引自乔治·莱费布对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介绍，载迈尔（J. P. Mayer）编：《托克维尔全集》第2卷，第21页。

② 斯彻利（G. Schelle）编：《杜尔阁全集》第5卷（巴黎，1913～1923年），第188页。

③ 见马蒂尼（Martini）："Die Adelsfrage in Preuβen vor 1806"，载于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8）Beiheft 35.

④ 迈尔编：《托克维尔全集》第2卷，第146页。

⑤ *Dreiβig Jahre am Hof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ed. K. A. Schmidt-Lötzen（哥达，1907年），第441页。

⑥ 罗森伯格在他的《官僚体制、贵族统治和独裁政府：普鲁士的经验》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也被当时的许多著作所证实。比如伦多夫，这个对财富贪得无厌的有着普鲁士贵族血统的人指出，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因各种各样的理由而被授予了贵族头衔。他也提到大量的普鲁士贵族男子与中产阶级妇女通婚。弗里德里希·冯·马尔维茨的第一个妻子的母亲，也是俾斯麦（Bismarck）的母亲，就是中产阶级。

大贵族》一书中描述的那种社会的起源，即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统治集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地主（土地仍然是主要的财富源泉）和来自富有的家族，尽管不必然是贵族家族；因为似乎只有富有家族的背景才能产生杜尔阁在法国、斯泰因和洪堡在普鲁士所希望的那种“人的个性的发挥广大”。【570】

但这种社会明显是与等级社会相矛盾的，因为其大部分成员尽管也有特权，也是贵族，但或多或少都是无知的、贫困的。在专制主义年代，国家活动的大规模扩展以及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各集团尤其是贵族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法国，那些连某个军衔或文职都买不起的贵族，他们的经济条件如果不是衰落的话也注定是停滞的。批发贸易由于法律的限制和视为有损尊严而不能涉足。如果没有丧失贵族资格的行为的话，这些追求利润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海外贸易、工业和金融——所有这些都需要资本，而这正是他们所缺乏的。在这些出生于上流社会的穷人中，只有很少数人能从这些约束中解脱出来。

在普鲁士这个平均来说更贫穷、传统更深厚的地方，如斯泰因描述的那样，充斥着“大量贫穷的、没有土地的、债务累累的贵族，他们没受什么教育，赤贫而且专横”,[①] 他们的景况比法国更可悲。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描述了他如何在物质上不适应军队生活、如何不能提供培训、如何长期没有收入、必须在官僚机构中取得成功之后，他的结论是，如果在像他这样的环境中的贵族自己开枪或跳楼自杀了，那毫不奇怪。[②]

法国在18世纪末的很长一段时期，富贵族和穷贵族在收入上的差距实在太大，穷的贵族过不上正常的生活，甚至几乎无法糊口。阿瑟·杨（Arthur Young）惊奇地发现甚至连大革命也没能让贵族们联合起来自卫。[③] 就像当时旺代（Vendée）暴动的领袖之一沙雷特（Charette）将军的一个传记作家，在谈到沙雷特与流亡者的关系时轻蔑地说的那样：

> 在这些一生下来就几乎平等的人们之间，他远未看到由财产带来的平等，而只是看到了一个表象。凡尔赛宫的所有缺点都被移植到了科布伦茨……然而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沙雷特在这些自称将殷勤、雅致和礼貌推至极点的朝臣们中间保持其僵硬而冷酷的表情和有些野蛮的行事方式呢？[④]【571】

---

① 杰拉尔德·瑞特（Gerhard Ritter）:《斯泰因》第3版（斯图加特，1958年），第285页。
② *Briefe eines schlesischen Grafen an einen kurländischen Edelmann*（阿尔托纳，1795年）。
③ 阿瑟·杨:《旅行在法国》（剑桥，1929年），第180～190页。
④ 吉恩·迈尔:《布列塔的贵族》，第248页。

大量贫穷贵族的存在，给思想仍然停留在等级社会中的君主和他的大臣们带来了许多困难。除了哈普斯堡世袭领地，那里的常备军是18世纪后半期的一个创造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贵族的反对，法国和普鲁士祈求于这样一种神话：国家的强大体现了军队的优点，而这里是贵族的特权，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必然的结果就是抵抗金钱势力的侵蚀。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军队改革者们称之为“单纯而坚强的军队”的这种愿望，成为了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促使他采取了许多难以理解的发展经济的措施，比如他禁止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同样的动因在法国启发了洛伊·塞居尔（loi Ségur）于1781年实施的臭名昭著的政策，他只允许在最大的军团中向那些在父亲这一方有四代贵族身份的人出售军衔，这一措施并不是直接针对中产阶级，而是针对那些富人子弟和新近封为贵族的家族，因为他们抬高了军衔价格，使得穷贵族无力购买。[①]

这些措施表达了保守者们的想法，他们希望保存作为一种特权秩序的贵族，从而保存由其构成的整个等级社会。但在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1806年以后的普鲁士，以及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时期的哈普斯堡，许多激进的大臣并不能忍受这种态度。由于对贫穷贵族有利的制度逐渐建立了起来，斯泰因把他们看成是国家的一种负担。他将废除他们的特权，杜尔阁和内克也同样如此。这些人以及被广泛传播的他们的观点，并不是想废除某些特定的贵族，而是想废除这种贵族秩序或状态。他们欢迎英国的贵族模式，在那里，贵族头衔是与土地财富相联系的，而且只授予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并对其社会特权并没有法律上的担保。

关于贵族的权利和职能的这些冲突的观点，早晚都会使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以及每一个贵族个人的意识发生分化。在18世纪末的每一个主要国家，只有弗雷德里克大帝决心不惜代价地支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尽管这种秩序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态度总是矛盾的，哪一派大臣或奉承者得势，他们就倒向哪一边。只有哈普斯堡的约瑟夫和利奥波德（Leopold）乐意看到旧秩序的消失。但他们在贵族以及中产阶级中间都缺乏任何有力的支持，他们没有一个足够强有力的官僚体制——就像先是斯泰因，然后是哈登堡领导下的普鲁士所引入的那种官僚体制——来影响这种改革。

[572]

① 弗莱特（F. Furet）：《法国大革命问答集》，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年鉴》（1971年），第275页。

8.3　重商主义和中产阶级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以前，君主们不可能想像一种贵族秩序或状态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但他们感到有责任要促进贸易和制造业，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战争需求所需要的资源。他们有意识地通过通常称之为重商主义的政策，开始了增加财富的工作。

在欧洲大陆推行的重商主义实质上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它在每一个国家都是随着君主势力的增强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专制主义的其他方面在 18 世纪中期的法国受到攻击，从而重商主义也受到怀疑，但它却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普鲁士和玛利亚·特利萨与约瑟夫二世的哈普斯堡世袭领地，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这在本质上是对战争需要的一种反映，并由专制主义特征的独裁方法所加强，而且以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为借口，不考虑个人利益。

重商主义的性质在前卷已经讨论过了，不用再重复，这里必须描述和考虑的是它的社会后果。推行重商主义的每个地方都被这种野心所驱使：通过赚取别国的财富来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只要力量被定义为相对的概念，则对财富的追求就取决于力量，目标相对来说是绝对的。就像洛克（Locke）曾经指出的那样："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或某个邻国多多少金银……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手段和强大的势力，但金银的份额在世界上只占很小的比例，那么它只能是穷国。"[①] 虽然重商主义者就像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所说的那样，并不相信财富就是占有贵金属，但他们接受洛克的原则，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比竞争对手更富有。结果是，重商主义就意味着经济战争，这种战争是通过使自己的国家尽量自给自足，同时迫使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于自己这一方式发动的。这些目标包括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工业，压缩或禁止进口；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垄断原材料、运输、技术资源。这是一种公然追求强权政治的目标，尤其是在普鲁士，这些目标甚至阻碍了经济增长。比如 1769 年 12 月，汉堡这个普鲁士长期以来就想摧毁的连接西、中欧贸易的贸易中心，就向普鲁士政府指出，普鲁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将来自于自由贸易。普鲁士人并不否认这种意见，但普鲁士人所在意的是控【573】

① 赫克歇尔（E. F. Heckscher）：《重商主义》第 2 卷（英译本，伦敦，1935 年），第 23 页。

制萨克森这样的国家，那里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更发达，但军事上却很无能。普鲁士人指出，像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福利并不是问题，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才是关键。[①]

前卷说过的重商主义者总是极其关注创造一个理想的贸易收支，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工具和纸币，在本国缺乏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必然需要金银以开展国内贸易。有了金银才可能支付税收、招募雇佣兵、购买那些大量的国内不能生产的必需品。重商主义者是更强调对外贸易、工业还是农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差异。

柯尔贝尔的主要传记作者说，他"非常尊重制造业，很难说他是更强调商业还是更强调制造业"。[②] 但是他对农业几乎没什么兴趣，因为如前述，他将农业视为财富损失的原因。[③] 尽管政府已经逐渐（根据所颁布的这方面的法令的数目来判断）更加关注制造业，但中欧的官房经济学家还是传统地认为农业向人口提供主要的生活来源，而对外贸易一般来说是第二重要的，除非必须建立金银储备。【574】

在西欧有一种说法是："从事商业这一高尚职业的商人当之无愧地是社会中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成员。"[④] 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认为"商业为城市和国家带来财富"。[⑤] 18 世纪重农主义得势之前，法国政府的信念是，大规模的殖民地贸易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基础——法国的海外贸易在战争中的崩溃，使得法国政府的借款能力以及支撑战争的财政也随之崩溃，这一事实支持了上述信念。正如舒瓦瑟尔（Choiseul）1759 年向他的奥地利盟友所说的那样："失去殖民地使得信用丧失，导致银行倒闭，商业也随之中断……这不仅需要勇气来面对，而且需要金钱来支持。"[⑥] 法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证实了他的观点。法国的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尤其是在 1763 年到 18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间这段时间，但制造业并没有保持同样的增长，因为贸易的扩大主要靠的是殖民地产品的再出口。[⑦] 相反，在普鲁士，虽然威廉一世时代已经扭转了贸易收支恶化的局面，虽然制造业中雇佣的人口也增加了，但贸易量

---

① 巴斯凯（E. Baasch）编：*Quellen zur Geschichte von Hamburgs Handel und Schiffahrt im 17., 18. und 19. Jahrhundert*（汉堡，1910 年），第 171 页及其后内容。

② 科尔（C. W. Cole）：《柯尔贝尔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代》第 2 卷（纽约，1939 年），第 133 页。

③ 瑙德（W. Naudé）：*Getreidehandelspolitik* 第 1 卷（柏林，1896 年），第 34 页及其后内容。

④ 赫克歇尔：《重商主义》第 2 卷，第 282 页。

⑤ 罗斯拉格（L. Rothkrug）：《路易十四时代的反对》（普林斯顿，1965 年），第 225 页。

⑥ 沃丁顿（R. Waddington）：《七年战争》第 3 卷（巴黎，1899 年），第 445 页。

⑦ 莱布劳斯（E. Labrousse）：《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经济危机》（巴黎，1943 年），第 42 页。

却仍然在下降。[①]

在哈普斯堡和霍亨佐伦统治下的那些更原始的社会中，西欧对贸易的态度是不适合于他们的。殖民地和海外疆土的开拓并不是这些人口稀少地区的统治者的任务，他们还迫切需要移民进入。由于75%或更多的政府收入都被用于海军保障殖民地贸易的安全，弗雷德里克放弃了他曾经最珍视的殖民地计划，如他所说："贪多嚼不烂"。[②] 直到18世纪后期在中欧仍然只有政府才能积累的投资所需的资本，被统治者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花掉了——用于发展在30年战争期间被摧毁了的技术，重建像东普鲁士这样的地区。那里在18世纪早期因瘟疫和饥荒损失了一半人口，另外像匈牙利，那里由于把土耳其人赶了出去而留下了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在欧洲的这些地方，对【575】很少的贸易者来说，商业就是消耗国家金银的奢侈品贸易，它被视为一种对社会的损害。弗雷德里克大帝表达了最典型的态度，他说："我坚决站在工业这一边，因为无论如何我必须让我的人民有工可做。很明显，一个制造业主可以雇佣2 000人，而一个贸易者（*Handelsmann*）只能雇佣20人。"[③] 弗雷德里克所鼓励的商业类型是那些能提供就业、能增加技术知识和熟练工人数量的企业家（但他仍然轻视这些人）。

然而，尽管法国和中欧采纳重商主义政策的先后顺序不同，但在这两个地方激发这种经济政策的目标却是类似的。这些政策在这两个地方都是对内战［在法国是投石党运动（Fronde），[④] 在中欧是30年战争］带来的衰落的反映。在这两个地方都认为君主所解释的那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认为无限度的政府干预是合理的。这两个地方都受到要让国家的经济超过同时代最先进的国家这种意识的刺激，从而这些政策可以看做是克服经济倒退的一种手段。这两个地方都开始向懒惰宣战，劝导有序和勤奋的习惯，都鼓励发明，并开始打破传统的约束。

重商主义者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柯尔贝尔显然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了他的目标（不管是不是因为他培育工业的努力），他让法国拥有了一支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的陆军和海军，从而使法国的优势威胁着欧洲，实际上也威胁着世界。在中欧

---

① 劳特曼（A. Zottmann）：*Die Wirtschaftspolitik Friedrichs des Großen*（维也纳和莱比锡，1937年），第66页。

② 考瑟（R. Koser）：*König Friedrich der Große*（斯图加特，1893年），第1卷，第456页。

③ 海兹（K. Hinze）：《勃兰登堡—普鲁士现代资本主义劳工问题的起源》（第2版，柏林，1963年），第74页。

④ 也译为"福隆德运动（或起义）"。——译者注

重商主义的巅峰时期，哈普斯堡建立了一支比法国还要强大的常备军，弗雷德里克大帝似乎还拥有更可怕的军事力量。弗雷德里克在7年战争中，以少于500万的人口，靠从萨克森和其他征服的土地上的掠夺，加上英国提供的占其战争开支的20%的援助，[①] 就在抵御由约1亿人口联合起来的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Hubertusberg）【576】和约的签订直到他去世这一段时期，他致力于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但继续保留着相当于其人口的4%的军队，尽管亚当·斯密判断，一国所能供养的军队人数最多就是人口的1%。即使在其他君主和大臣不太致力于军国主义的国家，重商主义政策还是带来了军事力量的增长，资源流向战争的规模之大，至今都是不可原谅的。

结果是财富被大量地消耗。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是经济灾难的几年。柯尔贝尔的帝国构想破灭了，他的海军也被消灭了。多数对外贸易都已停止，农业也已枯竭。魁奈（Quesnay）估计损失了450万人口，也就是接近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人口的20%。[②] 如果我们相信古贝尔教授的估计，即在1689～1697年间——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的饥荒和传染病之前这段时间——损失了“至少200万～300万人口”，[③] 那么魁奈的数字也不是不可能。在现代的研究也并未否定的费奈隆（Fénelon）的著名的论断中，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好像“一家陷入困境但却没有储备的大医院”。[④]

但许多这些灾难都要归咎于路易十四违背了柯尔贝尔的原则，当然也与和他无关的自然灾害和价格下降有关，尽管他的政策使这些结果进一步恶化。由于整个18世纪的经济环境更加令人满意，也因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中更加理智，在所有主要国家中都没有再出现这种灾难性的社会后果。战争的规模更大了，开支也就更大，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更短了，并且受到更多直接的限制。在18世纪后半期，这里讨论的这三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都开始增长。

但是，没有哪个大陆国家的重商主义能够与英国相比。赫克歇尔（Heckscher）用英国的标准对柯尔贝尔体制的成就进行评价，结论是法国的重商主义是失败的。许多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人其实也持这种观点。米

---

① 见亨德森（W. O. Henderson）：《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经济政策研究》（伦敦，1963年），第74页。

② 见《魁奈和重农主义》第2卷，（国家人口研究所，巴黎，1958年），第513页。

③ 皮埃尔·古贝尔：《路易十四和他的2 000万臣民》（巴黎，1966年），第170页。

④ 引自拉维希（E. Lavisse）：《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起源》第8章（巴黎，1908年），第272页。

拉波（Mirabeau）对普鲁士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并在弗雷德里克死后得到了许多普鲁士人的支持。现代的观点趋向于根据国家模式的差异来做判断。在英国这一个极端，它在18世纪的成功以及工业革命的成功，都要【577】归结到它的政府控制较少的、相对自由的经济。无数的管制和持续的政府干预，这些大陆重商主义的特征在英国似乎是被排斥的。而在德国这另一个极端，它总是与普鲁士的措施相一致，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话来说就是与众不同。如果可以把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在30年战争中有所得也有所失。但在重商主义政策盛行的时期，德国在靠重商主义创造财富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就。事实上，就像在法国，也只建立起了一小部分新工业。18世纪末，中欧仍然绝对是一个由许多尚未变革的农业构成的农业地区。重商主义的成就主要是与它所形成的社会习惯相联系。吕特格（Lütge）教授认为，重商主义者教育人们理性地处理经济问题；他们逐渐向人们灌输一种新的工作精神；他们产生了一种社会的资产阶级化（*Verbürgerlichung*）。[①]

在法国并不是很强调这些方面，因为法国与君主和贵族相联合的重商主义者的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更少。君主的愿望就是宫廷的荣耀，以及所有的贵族都有能力享受荣耀的生活风尚；爱好战争和征服以及不惜代价地去追求的决心；古代的制度，尤其是高等法院制度对古代风俗的保护——所有这些使得柯尔贝尔的信仰相对更缺乏支持，而这种信仰在中欧更受崇敬。

从逻辑上说，重商主义包括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计划，如果没有统计上的搜集和政府的积极支持，重商主义就是不可能的。柯尔贝尔说："贸易是公共财政的源泉，而公共财政是战争的中枢神经。"[②] 而这些原则却是路易十四和他的两个继承者永远不会接受的。柯尔贝尔1680年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说道："从开支方面来考虑，我恳请陛下您允许我只对他说，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在决定开支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可用的金钱数量，这实在太特别了，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③] 然而柯尔贝尔面临的这种特别，与旧制度时期的波旁王朝所面临的情形具有同样的性质。结果是财政中心主义（fiscalism，或者说就是通过任何办法增加金银，不顾社会和经济【578】

---

① 拉奇（F. Lütge）：*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第3版，柏林，1966年），第403页。

② 赫克歇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17页。

③ 科尔：《柯尔贝尔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代》第1卷，第311～312页。

后果）、腐败和扭曲公正，它使得资源不能理性地使用，不能理性地处理对外关系和战争，它阻碍了经济增长以及所有改革的努力。

然而，尽管路易十四的统治是失败的，法国的重商主义在后来不得不去克服他所留下的许多障碍，但柯尔贝尔还是培育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商人阶级，而且他把法国建设成一个拥有海上霸权和帝国霸权的国家的梦想在18世纪也实现了，尽管有些不稳定。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法国在奢侈品工业和许多技术发明方面领导着世界。虽然法国城市人口的数字太不确定，难以估计，从而很难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法国肯定比其他主要大陆国家有更多的大城市。1789 年巴黎的人口约600 万人，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最大的城市，其规模是维也纳的 3 倍，是柏林的将近 4 倍。

这些事实是很有意义的，法国 18 世纪贸易的增长通常作为例证来支持这种观点，即在重商主义时代，法国的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富已经逐渐超过了贵族的财富。正如马蒂耶（Mathiez）在他的《法兰西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所说的："中产阶级肯定占有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这个阶级不断地发展壮大，而特权秩序则受到破坏。"[①] 莱费布（Lefebvre）也在他的《一七八九》（*Quatre-Vingt-Neuf*）中说到："工商业的复兴创造了新的财富形式（动产），和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国家现存的法律结构使他们无法成为第一等级。但是，经济实力、能力以及未来前景都把握在资产阶级手中。"[②]

50 年来，这些论断对 18 世纪法国社会的发展和大革命的原因提出了可接受的解释。但近来它们所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而且逐渐被抛弃。如前述，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18 世纪法国最富有的人仍然是贵族，而贵族也仍然是最富有的集团。[③] 事实上，并不是贵族向资产阶级花钱使前者更富有，而【579】是资产阶级向贵族花钱使后者更富有。因为成功的中产阶级花钱买贵族头衔使自己成为贵族，把女儿嫁给贵族家庭；如果暴发户比贵族更富有、嫁妆更多的话，这些人肯定是嫁给暴发户了。[④]

乔治·莱费布所说的在 18 世纪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 G. V. 泰勒（G. V. Taylor）教授看来是毫无根据的。[⑤] 泰勒教授

---

① 《革命的法国》（巴黎，1933 年），第一部分，第 13 页。

② 乔治·莱费布：《一七八九》（巴黎，1939 年），第 5 页。

③ 见（原文页码）第 564 页。

④ 见森托（J. Sentou）：《法国大革命中图卢兹的社会财富和社会集团》，第 472 页。

⑤ G. V. 泰勒：《非资本家的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121 卷（1967 年 1 月）。

估计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手中的财富大约只有20%是工业和商业财富，剩下的80%他称之为“所有权财富”（proprietary wealth）。他的意思是这种财富在职能上是非资本主义的，由土地投资、城市财产、年金，以及所谓“贪污的”（venal）公职收入，或者在世袭的基础上购买的公职收入构成。这些形式的财富收益较小，但却很稳定，在1% ~5%之间波动。这种收益并不是靠企业家的努力实现的，而且被视为是一种退化，它“只是所有权和时间间隔所带来的收益”。

“所有权财富”是资产阶级和贵族都同样偏爱的财富形式，因为它能带来显得很优雅的稳定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小工业和商业部门中的许多贵族成员，尤其是宫廷贵族，也投资于极其有利可图但也多少有些风险的企业，比如运输、奴隶贸易、采矿和冶金。

这些分析与所掌握的关于财富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分配的证据相结合，使下列说法不能成立：18世纪在法国看到了一个富有而自信的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他们已有足够的意愿去接管政权。但与之相对，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部分贵族正在采纳中产阶级的思想和实践，后者像下面要谈到的德国那样，贵族正在成为资产阶级（*Verbürgerlicht*）。

中产阶级化或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的反对者封建化或贵族化长期被英语世界所忽略，以至于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名称。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态度与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不一样，从而他们对于英美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为难以给出一个清晰的含义。赫克斯特（Hexter）教授在批判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作家们在中产阶级出现的时候没有试图去定义他们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他自己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在本文中，中产阶级就是Seyssel' s estat moyen——商人、金融家、工业家、城市富人、资产阶级。”【580】在为他的定义辩护的时候，他说他已经“用最严格的措施检验过，确信如果不这样定义的话，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就会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捉摸，从而不可能有其他的定义。”①

赫克斯特教授的定义中，他也一定意识到，排除了资产阶级化的可能，因为这个定义所说的特征，除了其职能以外，并不是中产阶级所特有的。另一方面，桑巴特（Sombart）——他的经典著作《论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出版于20世纪初，他的思想对他之后德国的所有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不是从职能方面，而是从思想态度方面来定义中产阶级的。在桑巴特

①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神话”（《重估历史》，阿伯丁，1961年），第75页。

看来，中产阶级似乎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他从商业文集、从账房的座右铭、从比如像《财富之路》(*The Way to Wealth*)—— 这本书初版于1758年，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共出了146版——这样的著作中推导出了中产阶级的意识。

桑巴特将18世纪的中产阶级——其典型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① ——视为在数字思维能力以及理性计算的习惯，尤其是金钱上的计算方面特别卓越的一群人。他说，这些人相信目的与手段是相关的；他们视懒惰为罪过，并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时间，同样仔细地计划他们的开支（这就是富兰克林创造的短语“时间即金钱”)；他们有节约意识；他们在商业事务中的信仰是可靠、诚实、履行合同；在个人生活中他们鼓吹“正确地”（correctly）生活；节制是他们的主要美德。

无论对桑巴特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做何判断，即他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点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明显的是，这种观点在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文明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其前提条件亚当·斯密已有过表述：

> 在任何不喜欢规范的司法管理的国家，商业和制造业都很难繁荣。在那里，人们会感到自己拥有的财产不安全。在那里，对合同的忠诚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在那里，不能指望政府当局会规范地促使所有有支付能力的人偿还债务。②

【581】

法律规则（这里，法律由专业法官所执行，政府不能对其进行任免，而且政府本身就是他们所判决的对象)；法律面前的平等（也就是没有人可以凭私人的能力在法律上要求一种以出生、地位、种族或宗教为特征的特权)；私人财产的圣洁；企业在合作、国家所有或经营方向上的自由；公民自由（至少是在西欧）以及代议制政府是中产阶级政府和社会的典型特征。所有这些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都是缺乏的，但在旧制度的最后40~50年，统治者渐渐感觉到了这些需要的压力。

麦考尔特·达努维尔（Machault d' Arnouville)、泰雷（Terray)、杜尔阁、卡隆（Calonne)、内克和其他人尝试通过减少或废除贵族的税收特权而使直接税体系合理化。这种尝试，是要在王室和城市贵族的开销上取消国内通行费和习俗上的障碍以及多重征税；是要使制造业脱离行会的控制，使敞

① 更准确地说，桑巴特把富兰克林视为典型的“中产阶级”（der Bürger)，以区别于工业资本家或“资产阶级”（der Bourgeois)。

② 坎南（E. Cannan）编：《国富论》（梅休因，伦敦，1950年）。

地体制中的农业摆脱著名的"集体奴役"（servitudes collectives）的要求；内克尝试在中央金融管理机构中裁减贪污公职的数目，并用政府官员来替代这些职位上的人，莫普（Maupeou）也在司法机关中做类似的尝试；成功的总检察长们反复宣扬破产（这是前一个时期的国王从经济困境中解救自己的一种可接受的手段）既是不诚实的，又是经济上的灾难；马勒泽布（Malesherbe）在任协助法庭的主席期间反对随意的拘禁；杜尔阁和杜邦·德·内穆尔在《城市自治论文集》一书中和在各种建立联合行政区的设计中，表达了建立某种形式的公众代表制度的愿望——所有这些改革上的尝试表明托克维尔的论断是正确的，他说在18世纪后半期，法国统治者的观点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了，而且也证明了在政府管理层中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

这种资产阶级化的过程无疑使官员和商业世界之间的接触更困难了，这种接触是重商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特吕代纳（Trudaine）、罗兰（Roland）和其他政府官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与制造业的关系，就是这种接触的例子。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大臣们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贸易者和制造业主施 [582] 加压力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在履职期间的经验的产物——这个逐渐被证实了的经验就是，等级社会的继续存在与效率和保持国家的威望已不再相容。

另一方面，法国的资产阶级化还做得不够，拟进行的改革并未付诸实施。旧秩序的残余仍然严密地保护着贵族、高等法院这些特定的制度，而且也确实广泛地在所有人口中传播。君主们尽管暂时屈从于大臣的劝说，但仍然在坚定地维护着这些制度。封建化（*Feudalisierung*）通过那些接受了贵族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对改革的反对一直都在进行。在18世纪已经渗透到了权力机构中的暴发户，尤其是总包税人，模仿着大封建君主的生活方式。虽然中产阶级意识逐渐在传播，也开出了许多关于美好世界的空头支票，但他们就算在自己的支持者中也没有根除对老的标准的信仰。除了杜尔阁以外——虽然他自己并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革命行动，但他预见到了并且欢迎革命的前景[①]——就连拥护最激烈的变革的改革者，比如卡隆和内克，都同时认为过激地打破传统是危险的。因此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没有出现过什么革命行动，如托克维尔所说："意外地获得了世

---

① 见杜尔阁1768年7月3日给休谟（*David Hume*）的信，引自邦戈（L. B. Bongie）的《大卫·休谟：反对革命的先知》（牛津，1965年），第50~51页。

界"①，尽管导致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中欧的情况与法国一样，尽管在更大程度上中欧国家是资产阶级化的主要推动者。霍亨佐伦在整个18世纪，以及哈普斯堡在18世纪后半期所进行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增加了中产阶级活动的范围和数量。比如普鲁士的第一份报纸就是由弗雷德里克大帝为反击外国的宣传而创办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记者阶层。学校和大学的建立（哈普斯堡在这方面尤其著名），以及柏林科学院所教导的对知识的尊重，赋予了学术方面的职业新的重要性，其成员【583】也增加了。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持续扩张，由政府发起的对运输和农业的改进计划，以及创建新工业和信用机构的计划，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产生了对教育的更大的需求。城市规模也扩大了。弗雷德里克大帝去世那年（1786年），柏林的人口估计有147 000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同一时期的巴黎略高。当然，居住在柏林的士兵及其家属将近有97 000人。然而虽然他们生活在军营中，但有61 000人被制造业也就是民用产业所雇佣。②

就像在西欧一样，重商主义者在霍亨佐伦和哈普斯堡虽然是国家控制的支持者，但除非在企业家破产（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普鲁士很少见），或由于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确实无力自己经营的情况下，重商主义者从来不支持产权国有。统治者渴望在他们已经放弃了的那些政策限制下发展主动性（比如，除非同意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不管其本质的意图是什么，否则谁也不可能讨得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喜欢）。统治者知道主动性必然来自于奖励。比如在法国，致力于对王室有利的金融业务的人将得到高额的奖励。又比如约翰·安德利亚斯·克劳特，他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负责征收户口税（Kontribution，即普鲁士的人头税）并负责用金银支付政府的收益；他管理着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财政；他因支付军费的需要将汇票引进了普鲁士，他死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数目简直无法估量。③ 7年战争期间积累了更多显然也更大的财富。劣迹众多的丹尼尔·伊齐西（Daniel Itzig），与他的同伴埃伊弗里姆（Ephraim）和艾萨克（Isaac）所做的最臭名昭著的事，是在1759年让普鲁士的货币贬值，到他死时积累了大约100万塔勒（taler，当时10塔勒大约等于1英镑）。斯凯梅尔曼（H. C. Schimmelmann），一个军队承包人，

---

① 托克维尔：《全集》，第96页。

② 海兹（K. Hinze）：《现代资本主义劳工问题的起源》，第171页。

③ 雷切尔（H. Rachel）和沃里奇（P. Wallich）：《柏林的大商人和资本家》（柏林，1938年），第2章第134页及其后内容。

他先是斯德丁（Stettin）一个丝商的学徒，他的财产最低估计有300万塔勒，最高估计有1 400万塔勒。[①]

实际上，弗雷德里克大帝这个吝啬、仔细算计的人，确信富有使人意志消沉的人，也像法国的国王一样，没能发展他的经济、引导他的战争，他不【584】允许他的臣民靠与皇室的利益相一致的企业精神去积累巨大的财富。这就是当时社会模式的一部分——一种在西欧和中欧都非常类似的社会模式，然而在不同的国家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在普鲁士和哈普斯堡世袭领地，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不如法国，城市也较少和较小，但城市居民在18世纪末超过了20 000人，这一点上普鲁士和法国非常相似。[②] 但即使是没有任何可信的数据，当时中欧的商业和制造业团体比法国同行的财富更少、技术更不先进这一点也是确信无疑的。

有人将19世纪中期以前，中欧没有发生过任何重要的革命运动的原因，归结为那里的经济比较落后，从而一直没有产生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这是没有意义的，革命的发生与资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算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这段时期末，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也仍然很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其成员都不会承担革命的义务。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是，大革命是从高等法院为反对政府的改革尝试而发起的暴动开始的[马蒂耶称之为“贵族暴动”（la révolte nobiliaire）]，接着才是平民阶级的暴动。但在被选入公民大会（States General）的平民中，只有13%是商人和制造业主，[③] 剩下的是小官吏、律师、自由职业者。在普鲁士无疑也有这种资产阶级，它们不可能没受过教育，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能比法国要少，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更有影响力。

但是在法国的贵族统治集团中，可以找到代表中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意识的启蒙运动的肇始者甚至是其先贤。而在中欧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却并非如此，早期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并不在哈普斯堡。克里斯蒂安·加尔弗（Christain Garve），布雷斯劳的一个教授，他的同事不无道理地认为他的学术是肤浅的，但他对不同社会阶级的特征的区别有时还是独具慧眼的。他在【585】

① 雷切尔和沃里奇：《柏林的大商人和资本家》（柏林，1938年），第437页。

② 关于德国的资料都是引自摩尔（R. Mols）：《18世纪欧洲城市历史人口统计学引论》第2卷（卢维恩，1955年）；莱因哈德（Reinhard）和阿门高德（Armengaud）：《世界人口通史》（巴黎，1961年）。

③ 考班（A. Cobban）：《法国革命的神话》（伦敦，1955年）。

1802 年发现，在普鲁士，是资产阶级在知识和喜好上教育了贵族。[1] 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先贤托马休斯·沃尔夫（Thomasius Wolff）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晚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莱辛（Lessing）；德国古典文学时期的著名作家；大学教授，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康德（Kant），在 18 世纪后期享有国际性的声誉，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年轻贵族，注定要到官僚机构中供职；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也有一些是来自当地驻军中的地方贵族和官员——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甚至一般来说他们没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哥德（Goethe）是个明显的例外］，莱辛是教区牧师的儿子，康德是工匠的儿子。在成名之前，他们大多数都穷困潦倒。

加尔弗说到："在我们德国，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障碍是最大的，也是最难以克服的。"[2] 这一障碍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英雄年代，通过前面说过的军队中那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而被大大地加强了。弗雷德里克看不起中产阶级和犹太人，尽管他准备同样对这二者进行这种激励，但持续地保持勇气和荣誉感正好是中产阶级本质上所缺乏的。加尔弗在去西里西亚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召见了他，他确实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他在 1798 年写道，国王总是说他好像并未发现单纯的物质奖励掩盖了多大的过失，说中产阶级普遍缺乏这种品质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培养这种品质的机会。[3]

就像贵族的傲慢（*Adelsdünkel*）一般所提到的那样，在 18 世纪末贵族是愤恨中产阶级的。俾斯麦（Bismarck）说他的孩提时代在学校中遭到了贵族的愤恨，他把这种愤恨视为斯泰因和哈登堡改革之前那个时期的遗产。[4] 但在 18 世纪，这种贵族的傲慢开始和中产阶级的许多态度相伴相生。中产阶级不仅反复地向贵族灌输他们所特有的教育和文化，而且教导他们要有仔细【586】算计、勤俭节约的习惯，要藐视到处弥漫的贵族行为模式。自从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以来，在普鲁士这不仅是平民中而且也是军事组织中的特征。

如果说 18 世纪后半期的中产阶级在知识和喜好方面教育了贵族的话，那么军队就是这种教育的学校。在那里，被威廉一世称为"笨牛"的那些人，首先就学会了桑巴特视为中产阶级典型特征的理性计算。普鲁士军队中

---

① 克里斯蒂安·加尔弗（Christian Garve）：《对道德、文学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的初探》第 1 卷（布雷斯劳，1802 年），第 306 ~ 307 页。

② 前引书第 305 页。

③ 克里斯蒂安·加尔弗：《弗雷德里克时代维顿（*Zweyten*）人的精神和性格的片断描述》（布雷斯劳，1798 年），第 2 章，第 155 页及其后内容。

④ 《思维的记忆》（1928 年版），第 49 页。

的军团司令，被要求提供一个政府交给他支配的资金的精确数量，在年度总结中要严格地检查他的人员的品质和装备；但在这种限制下，他仍然可以把军团的事务当成私人业务来经营，包括在和平时期招募雇佣兵。他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家，如果他技术高超的话，可以得到丰厚的利润，但如果他很无能，则最后就会破产，而且很没面子。许多人靠这种方法敛得了可观的财富，这些人还可以得到高薪水、额外津贴，成功的将军还可以得到上尉以上的军官送来的厚礼。[①]

军官们将其财富投资于土地。相反，在法国，土地主要是被视为一种社会威望的象征，并不期望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根据比施（Büsch）教授的研究，18 世纪德国的容克（Junkers）从地产中获得了利润，有时利润还很丰厚。在弗雷德里克大帝建立了土地银行（*Landschaften*），即信用制度之后，大量的贵族地产投机发展了起来。这一包含着高风险的交易，随着地价的下跌和 19 世纪初法国的入侵，使得许多土地所有者破产。

从那些研究德国容克的现代史学著作中，从大量写于 18 世纪的备忘录中，以及从小说家冯塔内（Fontane）所收集的证据来看，18 世纪末，普鲁士的士兵—农民是一群“把土地作为副业的强盗”[②]（引自冯塔内翻译的一本波兰语小说中的一段话）。但他们并没有把这种掠夺的品质与吸收技术细节的兴趣和能力相结合，也没有将其与桑巴特所说的中产阶级的特征，即对待金钱的开支和节约的态度相结合。

在法国，直到大革命为止，君主和宫廷家族仍然保持着对奢华生活的热爱，也多少还保持着桑巴特视为封建君主典型特征的那种生活方式。确实，魁奈视为消费的而非投资的法国经济也许与这种生活模式很一致。在哈普斯堡，政府的建立比普鲁士要晚，那里的大贵族家族更富有，吸收新封为贵族的中产阶级的意愿并不强，[③] 那里“一直坚持着半封建的价值观，包括其消费模式”，并一直持续到了 19 世纪。[④]【587】

另一方面，在普鲁士，正如德尔布吕克（Delbrück）在格奈泽劳手下生

---

① 《旧普鲁士的军事体制和社会生活》第二部分。

② 《暴风雨前夕的本尼斯基》（第 4 版），第 510 页。

③ 见布雷莱德维奇（H. N. von Preradovich）：《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阶层》［威斯巴登（Wiesbaden），1955 年］。

④ 格罗斯（N. T. Gross）：《1750～1914 年：哈普斯堡王朝的产业革命》（丰塔纳欧洲经济史研究所，伦敦，1972 年），第 28 页。

活期间发现的那样，从来没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贵族”。[1] 对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来说，“德国人和中产阶级就是一个意思”。[2] 就算是在18世纪的普鲁士，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虽然并不像托马斯·曼所说的那样。结果是19世纪普鲁士比奥地利更成功地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比法国还要成功，尽管法国发生了革命。

8.4 德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信条

不仅不同国家对启蒙运动这个词的解释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对它的解释也不同。比如德国历史学家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z），在1925年的一本关于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继任者威廉二世的书中谈到，有大量的著作提到了这个词的含义，比如康德的著作《什么是启蒙?》，并发现单单在普鲁士，这个词在17~18世纪就有10个多少有些矛盾的定义。每个人都宣称被启蒙了，但又没有人知道启蒙意味着什么。施瓦茨所说的这种情形早已被大众插图画家丹尼尔·霍多维茨基（Daniel Chodowiecki）在一张图画中概括出来，并在1792年被重印在戈廷根（Göttingen）的日记本里面。这幅画描绘了在丘陵地带，有一个走路的人、一个骑马的人、一个坐马车的人，他们全都面对着初升的太阳。这幅画就是对启蒙运动的描述。但施瓦茨发现，这幅画的标题“日出时的四轮大马车”，同样是对启蒙运动的很好的描述。[3] 【588】这是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广泛确信的一种宣言：他们生活在进步的年代。然而，被许多哲学家描述的那种怀疑，同样也确实在18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发展着。在法国国民代表大会（Constituent Assembly）的辩论中，可以找到这种怀疑的极端表述。

对进步的信仰一般流行于受教育阶层，但一些更成熟的知识分子对是否存在实现进步的机会也感到很疑惑。对进步本身的不同解释是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不断增长的繁荣的经历的结果。达朗贝尔（d' Alembert）在1759年描述了正在成为“启蒙”的这些经历的意义，他说：

---

① 伯兹（Pertz）和德尔布吕克（Delbrück）：《陆军元帅格拉芬·莱特哈特·冯·格乃泽劳》（柏林，1864~1880年），第5章，第12页。

②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29年版），第80页。

③ 保罗·施瓦茨：《1788~1798年普鲁士宗教界和学术界的第一次斗争》（柏林，1925年），第1页。

> 如果仔细检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最主要的使我们激动的事实，或者至少是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成就甚至我们的娱乐活动的事实，不难发现，这就是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有某些方面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新的哲学方法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的热情、对世界赐予我们的景象的那种确定无疑的兴奋——所有这些原因使我们的意识鲜活地膨胀起来。像决堤的四处奔流的洪水，这种膨胀挟着一种惊人的力量，扫除所有阻挡其前进的事物……因此，从世俗科学的原则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事实体验，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的经院哲学争论到贸易的事实，从自然法则到国家专断法则——每一方面都被讨论和分析——作为思维普遍活跃的成果或结果，既在某些方面带来了光明，也在另外一些方面带来了阴影，就像潮起潮落，在海滩上留下了某些东西，但也冲走了许多。[①]

在达朗贝尔所说的这种意识的热情和膨胀中，所谓的专制主义和等级社会中的一些思想被摧毁了。在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的著作中，除了通常所说的法西斯主义以外，从他们那个时代开始，在西欧一直被详细阐述的关于社会和政府的理论的根源在他们那里都可以找到。但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阐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方案，或者没有把这个作为他们论述的目标，而是将其假定为一个合意的条件，特别是自由和平等，在18世纪的环境中，这就在定义上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表述，在19世纪也同样如此。【589】

寻找当时哲学家的信仰的共同基础这种努力，以及将启蒙运动视为“一种欧洲的现象，其发起者由一种单一的思想线索组成了一个知识联合的大家庭”[②] 这种看法，长期以来都是学者们所坚持的，这导致了一些不幸的后果。但这并不属于这里所叙述的范围。现在关心的只是那些被统治者或者其大臣和官员所接受的，或者在多数公众读者中得到支持的启蒙思想。

启蒙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运动，在西欧和中欧有很明显的差异。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物质条件不同，因为法国比中欧有更古老的、更成熟的知识传统，也因为将哲学转化为包含着妥协的实践的任何尝试，在不同的地方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么在成功的地方培养起来的态度也会区别于采纳这种哲学思想的其他共同体。然而在法国和中欧，所有

---

① 引自卡西尔（Cassirer）：《启蒙运动的哲学》（英译本，普林斯顿，1951年），第3页。

② 盖伊（P. Gay）：《启蒙运动：一种解释》，载《现代异端的兴起》［维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Weidenfield & Nicolson），伦敦，1967年］，第12页。

参与启蒙运动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弗雷德里克大帝所说的“理性击败了迷信。人们开始对曾经信以为真的寓言故事反感起来。”

不管支不支持上述观点，从启蒙运动的一般判断以及从其先贤的判断来看，各地的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反“迷信”的，也就是反对那种信仰，尤其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反复灌输的那种信仰。那种信仰被当做信念上的和传统的东西而盲目地接受，持这种信仰的人都不参与理性的争论。

法国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大多是自然神论信仰者，甚至是无神论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主教会就是迷信的体现，是他们长期攻击的主要目标。伏尔泰力劝他的朋友从事反天主教的工作，“无论你做什么，都应打击卑鄙的言论”。但在中欧，自由思想只是在柏林很兴盛并受到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鼓励，他自己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除此以外，启蒙运动的发起人一般都是天主教徒（约瑟夫二世就信仰天主教），这与同时代的法国形成鲜明对照，法【590】国启蒙运动着力解决的是宗教问题。但无论在哪里，无论他们对待宗教的态度如何，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都鼓吹政府和社会的世俗化。

在普鲁士，大部分人口都是路德教派的，尽管皇室属于加尔文教派，而且［如《普通法》的主要作者斯瓦雷茨（Svarez）所说］法律视教会成员为国家公务员。[1] 这样，启蒙运动就比天主教控制的哈普斯堡领地要容易得多。在哈普斯堡，教士都是巨富，而且甚至比法国的教士还更有势力。18世纪后半期，这里的教士受到了攻击，先是玛利亚・特利萨，然后约瑟夫二世继续了更大规模的攻击，这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教会被从它所控制的学校和大学中驱逐出去，剥夺了他们通过审查制度来执行的道德监护人的资格。所有用于祈祷的修道院都被解散，主教的地产也被还为俗用，其所有者靠国家发给薪水度日。到此时仍被天主教限制的公民权利，其他教派的成员也可以享有了，包括犹太人。许多“迷信的”惯例被禁止。教区牧师被指派去向其教民灌输公民道德，包括灌输像新的农业技术的使用这些事务，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2]

约瑟夫二世不仅将教会国有化，而且在执行中使其合理化的这种努力是很不成功的，因为它遭到了大批民众的激烈反对，而且在各个阶级的人口中

---

① 《对法律、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员的研究》，引自斯图泽尔（A. Stölzel）的《卡尔・格特烈・斯瓦雷茨》（柏林，1885 年），第 185 页。

② 对玛利亚・特利萨和约瑟夫二世的教会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概括，见布莱宁：《约瑟夫二世和开明专制》。

都鲜有支持者。但这些努力却是法国和普鲁士的知识分子中广泛赞同的一种典型观点，在格勒图森（Groethysen）和路希（Lüthy，他并不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将启蒙运动的起源归因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而是归因于加尔文主义学说的性质）看来，用格勒图森的话来说，启蒙运动“是有史以来人类价值观最重大的革命”。①

格勒图森通过检验旧制度这个世纪法国所宣扬的教义来追溯大革命的原因，因为有必要，这些教义不得不考虑听众的意见，从而具有公众意见的含义。他强调在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渐渐用完全不同于他们先辈的语言，【591】赋予了关键的宗教话语——上帝、人、死亡——新的意义。

在前启蒙时期，信仰的世界是单一的世界，基督教就是惟一的意识。教会所教的教义支配着人们的整个生活观和世界观。如波舒埃所说，当孩子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教会的语言，这是很自然的事，他究竟如何理解基督教对生命的理解，那只是今后的事。在波舒埃看来，死亡和永生将所有世俗的力量导向了虚无。人被视为带有原罪，上帝就是公正。但是从人的理智来看，上帝的公正是神秘的、无法说明的（比如，它判定父亲的罪过要由儿子来继承）。

伏尔泰的名言表达了启蒙运动对待这种信仰的态度，他对帕斯卡（Pascal）说：“我敢于选择人道主义去反对这种厌恶人类的思想。”② 他宣称人并非生而邪恶，而是当他变坏以后才变得邪恶。启蒙运动所宣扬的所有这些思想，即使在他们保留着对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也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生存条件。宗教，无论其重要性是否还继续存在，都被他们归入了私人生活的范畴。教会对政府发号施令这种现象已不再恰当，像关于高利贷的法律中那种教会对商业事务的指导，或者规定年轻人应该学习什么，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抛弃。由于信仰是生活的指导原则，不能缺少，启蒙运动的发起人就用理性替代了信仰。

理性是一个可以有——而且在18世纪也确实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词，它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而且在运用过程中具有相互排斥的含义。在社会或政治的前后联系上，这个概念在它的最初倡导者那里包含了一种拒绝认可惯例或制度的含义，而这只是因为这些惯例和制度太古老了。理性体现的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一种逻辑的关联，区别于传统的盲目联系，它是一种

① 格罗萨森（B. Groethuysen）：《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第1卷（哈雷，1927年），第12页。

② 同上，第347页。

对个人权利的信仰，具有怀疑和质问的特性。它是一种潜在的革命工具，尽管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革命。

实际上，每一个国家的启蒙运动对政府和社会的性质一般都有一些假定。启蒙运动都相信统治者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虽然对幸福以及其必要的条件有不同的理解）；都认为要有宗教宽容（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言论自由；都批评滥用权力，认为统治者及其官员应该受到法律【592】的约束；都认为法律应该是明晰而精确的，在任何领地和任何人的统治下都应该是一致的，其约束力要来自于国家，与习惯要有区别；都赞赏有序的政府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进步——在每个地方，这种进步都与在法国被称之为“野蛮而不文明的世纪”的普遍情况相对照。但在这些一般性的一致主张中，具体内容又有很大的不同。

在德语世界，18 世纪 20 ~ 70 年代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的人物是沃尔夫（Wolff），他使他那一代人被赋予了人性，他在当时的版画中的肖像总是以初升的太阳为背景。他是莱布尼茨（Leibnitz）的学生，他按他自己最好的理解（但并不是很充分）[①] 把他老师为芸芸众生谋福利的思想一般化、系统化。像笛卡儿（Descartes）和莱布尼茨一样，沃尔夫保留着基督教的信仰，但否认教会有控制或限制思考的权力。他接受莱布尼茨的自然法信仰，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但并不干预人类的活动，只是让他们的活动合乎逻辑。他将上帝比做造钟者，世界就是这个根据可探知的机械原理准确走时的钟。他说：“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形式的上帝只有在合乎理性的情况下才会行动，或者从他的智慧来看，他不可能让任何可以自然发生的事物奇迹般地发生。”[②] 对于沃尔夫来说，自然就是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去发现决定物质世界运转的原则，而且也要去阐述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使人类能不断进步，通向完美，即其真实本性的实现。沃尔夫认为，无论对象是物质世界还是人类事务，理解的任务就像在数学中那样，就在于从那些他认为是自明的、不需要经验调查的命题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过程来进行演绎。他轻视那种伏尔泰认为源于笛卡儿的经验调查，并且对向他学习政治学的学【593】生的惟一要求就是要在思维方法上有一个正确的基础。他认为学生从他自己的逻辑学、形而上学、道德学和物理学中就可以学得很好了。

---

① 贝克（L. W. Beck）在《早期德国哲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年，第 267 页）认为，“很明显，沃尔夫从笛卡儿、莱布尼茨和洛克的著作中受益很少。”

② 布鲁格曼（F. Bruggemann）：《德国文学》的第 2 卷《德国式的世界观》（莱比锡，1930 年），第 2 章。

沃尔夫在1706年就成为了哈雷（Halle）的一名教授，时年27岁。哈雷是马格德堡（Magdeburg）领地的首都，1680年以后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此后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1723年威廉一世要求他48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处死，原因是那些反对他的在皇室受宠的虔信教徒对他的指控（当时是莫须有的罪名，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指控）。沃尔夫从哈雷到了马尔堡（Marburg），许多外国学生随他离开了哈雷。这使普鲁士政府失去了许多外汇，于是威廉一世曾请他回国，但他拒绝了。直到1740年，他的信徒弗雷德里克大帝即位，为了证明理性战胜了"野蛮、无知和迷信"[1] 而将他召回，他这才回到了普鲁士。

沃尔夫为了继续他的教学而拒绝了柏林科学院的一个职位，这时他已老迈年高，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在36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不仅教育了整个中欧的几代学者，而且也教育了牧师、教师、政府公务员等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哈普斯堡世袭领地上，他的学说鼓舞了第一代天主教启蒙运动的推动者。像在德国其他地区的新教启蒙运动一样，他的学说也支持了知识的世俗化。"德国启蒙运动的胜利前进"被认为是"开始于哈雷和莱比锡［戈特舍德（Gottsched）在那里开展他的工作］"。[2] 玛利亚·特利萨的儿子深受沃尔夫哲学的教育，他也深深地影响了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思想。弗雷德里克大帝有一次写信给伏尔泰说，他的"这种思想方式对于各种主体都适用，对善于使用这种方式的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甚至我敢说它适用于任何个人生活的各种情况。"[3] 对于对所有体系建立者都表示憎恶的伏尔泰，这种情感简直就是诅咒。最后他使弗雷德里克大帝相信，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只不过是德国的另一个学究而已，事实也确实如此。此后弗雷德里克便对他不再器重。然而，沃尔夫的世界观（就像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德国学生曾经说过的那样）完美地概括了普鲁士的精神，对弗雷德里克的影响要比伏尔泰的影响深远得多。[4]

【594】

沃尔夫所坚持的理性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这种信念，以及他自己也在最高的程度上被视为任何问题的答案，使得当时的普鲁士对他的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事实被掩盖了。尽管所论述的政府方法在实践中并不成功，但他还是在

---

① 弗劳登斯特（W. Frauendienst）：《作为国家思想家的克里斯托夫·沃尔夫》（《历史研究》第171期，柏林，1927年），第5页。

② 温特（E. Winter）：《约瑟芬主义》（柏林，1962年），第31页。

③ 弗劳登斯特：《作为国家思想家的克里斯托夫·沃尔夫》，第58页。

④ 同上，第64页。

《政治学》中对这些方法给出了一个哲学上的理由。就像将他的一般哲学体系与重商主义的信念相结合一样，他认为国家是通过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一个契约而存在的，作为对物质和道德条件的报答，人民保证绝对地服从于统治者，这必然使他们"遵循自然法则"。

沃尔夫相信自然法则并没有对国家或宗教信仰规定特别的形式，他鼓吹宗教宽容，但坚持专制主义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把国家视为所有权力的源泉，而且认为国家的权力是没有限制范围的。他相信统治者应该是国家的第一公仆，在这个意义上，统治者对国家机器的操作应该与哲学家详细阐述了的理性的指令相一致。这种专制主义的启蒙学说认为，统治者应该是除了国家利益以外就别无他求，应该总是理性地行动，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从来不会突发奇想或一时冲动，从来不会做出随意的判断，而且，他要遵守他自己订立的法律并坚持司法公正。

沃尔夫的哲学体现了官房经济学者长期鼓吹的学说。官房经济学者是一群关心促进"官房经济学研究"的人，用他们的重要代表尤斯蒂（Justi）的话来说，也就是研究"国家这个大家务管理的所有发明"。[①] 他们是在他们生活的不同时期都在政府任过职的大学教授。比如尤斯蒂，他先是个士兵，然后在奥地利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玛利亚·特利萨授予他一个维也纳的教授职位，要求他给官僚机构的候选人讲授贸易、商业、税收和制造业。1760年他到了柏林，在矿产部任职，直到弗雷德里克大帝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投入了监狱。[②]

就像作为国家公务员要求有一定的行政经验，而年轻人的老师又希望他们从大学毕业后就直接为政府服务一样，官房经济学者关心经济学问题，但又纯粹地是从实践的角度来关心。他们鼓吹前面已阐述过的重商主义的学说【595】（在德国，官房经济学和重商主义多少是同义词），在这个过程中将君主的专制权力和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视为正当合理的，这种信念必然会加强重商主义的政策。

因为德国思想的理性和长期的性质，重商主义似乎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赫克歇尔也强调这是德国的一个特点。他说，重商主义相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相关性，并"明显地渴望去寻找它们采取的每一个措施的理性依据"。[③] 对于不熟悉过去的精神态度和实践中的流行风尚的读者来说，可

---

① 斯迈尔（A. W. Small）:《重商主义者》（芝加哥，1909年），第304页。
② 同上。
③ 赫克歇尔:《重商主义》第2卷，第308页。

能从赫克歇尔这段话中听到的意味并不是赞扬。前面阐述的重商主义的学说，是用来教育那个迷信和对传统的盲目崇拜还控制着大多数人生活的社会的；在这种社会，普鲁士的行会可以发布一种法令，在这种法令下，任何工匠都不会去“构思、发明或者使用任何新工具”；[①] 在这种社会里，铁匠的学徒在风箱坏了的时候，不是去检查风箱是否捅了个洞，而认为是魔法使然；在这种社会，乞讨是教会所鼓励的一种光荣的职业；在这种社会，就像一个德国启蒙运动者说的，即使是战争“也还不是一门学问”。[②]

中欧的官房经济学或重商主义与法国有所区别，因为德国的重商主义研究始终是学院式的，这种研究是政府政策的所有支持者的义务，也因为统治者自己就是重商主义的接受力最强的学生。它的学说是宣称对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解释的哲学的一部分，也是国家的官方学说。在普鲁士，这种学说通过国家严格控制的牧师、学校和大学而广泛地渗透到了各个阶级中。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普鲁士一直被视为启蒙运动最卓越的国家。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神话在弗雷德里克的一生中不断加强，并一直持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狄尔泰（Dilthey）在 1901 年所说的那样：“在德国，其他没有哪个地区被如此深地灌输了启蒙运动的思想。”[③] 他的意思是，没有哪个德国的其他地区有这种对理性的信念，把理性理解成一个由无情的逻辑过程发展而成的原则整体，其他没有哪个地区有如此深厚的基础。【596】

弗雷德里克大帝自己把他的行政机构比喻为一台机器，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这种比喻运用在约瑟夫二世身上更合适。它所包含的信念在普鲁士军队中有极端的表述，而且也是 1806 年以后的改革者们始终坚持的。以弗雷德里克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例，这种信念就是，在理性的条件下追求所想要的目标，则可以预计人类就能脱离盲目的服从而自动实现其目标。斯泰因以前的一个朋友和合作者名叫德奥尔多·冯·肖恩（Theodor von Schön），他生于 1773 年，起草了 1807 年的著名法令。这个法令给予农奴以人身自由，对所有人开放了贸易和各种职业，不管出身或身份，这个法令被视为普鲁士历史上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他说自由和人道的思想是第一次在

---

① 拉奇（Lütge）：《德国社会经济史》，第 360 页。

② 艾伯哈德（J. H. Eberhard）：《国家启蒙运动的解释》，载《文学编年史》（伯尔尼，1786 年），第 2 章第 164 页。

③ 狄尔泰（W. Dilthey）：“Die Deutsche Aufklärung im Staat und in der Akademie Friedrichs des Groβßen”，载于《德国概况》第 107 期（1901 年），第 21 页。

普鲁士的历史上得到了承认。①

普鲁士启蒙运动时期的这些属于浪漫主义时代的思想传奇无处不在。这些思想代表着勤奋、节俭、有序、清廉，代表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理性关系，最重要的是代表着公正和法律规则，代表着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代表着由理性所引导的状态监护下的经济和知识的进步。

像其他传奇一样，这种传奇并不意味着与事实相吻合。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一点，正如洪堡清楚地意识到的那样，只不过是在文学、哲学和宗教问题上的自由思考罢了。其范围并不包括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批评，在弗雷德里克的有生之年，除了莱辛以外，没有任何人能指望做出这些批评。过于吹嘘的普鲁士的公正和守法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而且在这些情况下也不总是如此——才是名副其实的，也就是在不牵涉到王室及其官员的情况。所谓的政府干预——国王自己或者尤其是委托他人在内阁中执行司法——和服从权威，即由权威人士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进行判决，在腓特列的时代已经普遍地采用了，其继任者更是扩大了其范围。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现象，不可否认的是弗雷德里克的行为比欧洲大陆其【597】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更符合一般所接受的启蒙运动的原则。② 尽管政府干预和服从权威运用得较广泛，但还没有广泛或任意到在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产生破坏作用的程度，甚至在斯瓦雷茨之类有某种职位的知名人士中也并没有起到破坏作用。弗雷德里克时代的普鲁士在法律和公正方面成效卓著这种说法，事实上流传于整个欧洲。③

尽管弗雷德里克所追求的毋庸置疑是启蒙的政策，但普鲁士的启蒙运动主张在 18 世纪和以后都受到许多法国人的反对，原因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标准不同于盛行于中欧的那种标准。伏尔泰虽然为启蒙原则作辩护，但却也掩

---

① 《自传》第一部分，载于《瑟多·冯·斯考恩部长的文件》第 1 卷［哈雷（Halle)，1875 年］，第 43 页。

② 关于这种观点的理由，见海兹（O. Hinze)：《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历史研究》，载《普鲁士国家法制的发展》第 32 卷（慕尼黑和莱比锡，1920 年）。关于普鲁士司法的武断特征的详细描述，见赫尔（U. J. Heuer)：《普通法和阶级斗争》（德国中央出版社，东柏林，1960 年），第 64 页及其后内容。

③ 斯瓦雷茨在他的《关于国家和法律的演讲》［康拉德（H. Conrad）和克林亥尔（G. Kleinheyer）编，科隆，1960 年，第 609 ~ 610 页］中对弗雷德里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公正进行辩护。这是在 1791 ~ 1792 年间对当时还是王子的未来的威廉三世发表的讲演。如果他不相信普鲁士的公正，他是没有理由阐述他的观点的。斯塔埃尔夫人提到（*De l'Allemagne*，第 225 页），“弗雷德里克政府是建立在军事实力和民事法庭的基础之上的”，并说（第 227 页）她在全普鲁士都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抱怨专断行为的人。但是洪堡实际上在 1792 年发现［《对国家的作用的边界的初探》，《克瑞芬特全集》第 1 卷，雷兹曼（A. Leitzmann）编，柏林，1903 年，第 234 页］政府（他肯定指的是普鲁士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洗脑。

饰不住对弗雷德里克的军事成就的钦佩。狄德罗（Diderot）在看范卢（Van Loo）所画的弗雷德里克的肖像时发现，画中表现了“老虎张大嘴巴咆哮的气势和感觉”。[①] 他宣称启蒙时期君主的原则是“一个专制君主的标准”。他问道：“专制君主有何特征？它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答案是哪个都不是！这两种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其概念上，而且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而不是它窃取的权力的用途。”[②] 卢梭（Rousseau）、达朗贝尔、米拉波和其他许多人都持同样的观点，将普鲁士视为贫穷而又具有专制统治的镇压特征这种国家的典型例子。

19 世纪 50 年代，托克维尔在为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收集材料的时候，他涉猎了德国史并研究了《普通法》这本编于弗雷德里克大帝统治时期但直到 1794 年才出版的书。他指出，这部非凡的文献确实最好地证明了 【598】 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公民和犯罪的法典，而且事实上如斯瓦雷茨所说，它也是一部宪法，因为它详细地表述了不同阶级的人口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认为它对《人权宣言》中的许多原则都已经作了表述，但“在这个完全现代的前提下，我们将看到会出现一个完全野蛮的实体。”因为 *Allgemeines Landrecht* 对专制主义、对农奴、对所有属于不同等级（Stände）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给予了法律上的约束。用现代全能国家的概念来说，清晰、准确和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覆盖了整个霍亨佐伦领地，这与它对独裁政治的承认和中世纪的社会结构相结合，就表现为托克维尔所说的“一种可怕的东西，似乎是从一种创新转变成另外一种”。[③]

哈普斯堡领地所追求的启蒙政策与普鲁士大相径庭。约瑟夫二世在所有方面都比弗雷德里克更激进，尤其是在对待农奴和特权的态度上（这点稍后再叙）。在他的各块领土上，社会结构和行政机构确实需要立即现代化，但是由于缺乏任何阶级的人口的支持，甚至在官僚机构中也没有什么集团对他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他的政策注定要失败。而在加强他的政策的努力中，他求助于专断行为，求助于使用秘密警察，即使按当时普鲁士人[④]而不是已谈到过的法国人的标准来说，他也是被排除在启蒙运动之外的。

---

① 引自斯凯维特（S. Skalweit）：《法国和弗雷德里克大帝》，载《普鲁士的繁荣和官员们对“旧制度”的看法》（波恩，1952 年），第 115 页。

② 同上，第 116 页。

③ 托克维尔：《全集》第 268 页，标题名为《弗里德里希大帝法典》（Code de Grand Frédéric）的脚注。

④ 见斯瓦雷茨：《关于国家与法律的演讲》、“对约瑟夫二世的控诉”，第 614 页。

实际上，中欧将启蒙运动的信条付诸实践的努力无论采取的是哪一种形式，都明显的是按照法国的标准。“启蒙的独裁政治”，不管是不是对专制的一种轻蔑表述，都渐渐成为一个矛盾的词；因为本质上说，法国的启蒙运动代表着自由原则，独裁政治与其是不相容的，而且尤其是在18世纪的中欧，那里的统治者所主要关心的现代化社会，按西欧的标准来说是经济和文化的倒退。

中欧所理解的启蒙运动具有专制主义的合理性和意识形态，君主也努力加强这种合理性和意识形态。反之，在法国，那里的专制政府更古老，而且【599】其低效和腐败至少比普鲁士更甚，但那里的生活水平更高、知识分子群体更成熟。启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不仅是对等级社会的攻击（在中欧多少也是如此），而且（就算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是对专制主义本身的攻击。

法国哲学家同样（实际上是更激烈地）反对无序、非理性和迷信，而且反对对传统的崇敬，这也是中欧的启蒙运动所攻击的目标。笛卡儿的信徒在法国，就像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德国一样，他们都是“理性”圣殿的崇敬者。然而他们是从新的意义上来解释理性，并赋予它新的目的的。

伏尔泰在他的《老实人》(*Candide*)中继续奚落莱布尼茨（Leibnitz）并对笛卡儿说：“他是他那个世纪最伟大的风水先生；但是……却只写哲学小说。这样一个蔑视经验的人，从不援引耶稣的话。他想脱离物质而建筑一种结构，结果只能是建起一座想像的建筑。”[①] 对于哲学家而言，理性并不意味着如笛卡儿所说的那种对演绎的假定从逻辑上推导而来的对世俗原则的“清楚而明显的”理解；[②] 哲学家相信它的意义是牛顿所使用的那种科学方法。法国哲学家强调观察和经验的重要性，一直批评那些以不变的假设来构建体系的哲学家。牛顿《光学》(*Opticks*)的第一句话是：“我在本书中的计划不是通过假定来解释光的性质，而是通过理性和经验来建议和证明之。”[③] 他们坚持认为，不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回答的问题就是无益的问题。

这些哲学家常常被指出，他们不但没有遵守他们自己的原则，而且还不清楚这些原则的含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达朗贝尔、莫佩尔蒂（Maupertuis）和重农主义者——自己就是体系构建者，尽管他们的体系已不再像以前的体系那样包括一切，但包括的内容还是很多。这些哲学家自己所关心的

① 雷内·格鲁斯（René Groos）编：《路易十四时代》第2卷（巴黎，1947年），第107页。

② 《方法论的发现》吉尔伯特·盖德弗（Gilbert Gadoffre）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7页。

③ 格德·布克戴尔（Gerd Buchdahl）：《理性时代牛顿和洛克形象》（西德和沃德，1961年），第13页。

许多事情——在经济学和犯罪学这些社会科学领域很明显——预先从来没有用系统化的方法来检验过。而且，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假定，没有假定就不可能构建任何体系。他们的许多理论在后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与事实无关的，而且正是他们自己所反对的东西。但是对于 【600】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他们的思想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所带来的关于社会和政府的结论。

这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哲学家们所苦苦思索的那些学科的一个副产品而附带出现的，这些学科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杰出的哲学家逐渐开始了解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类知识的有限性。他们都是职业的作家和学者，没有政府事务的经验或者政治野心，具有知识界一般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态度。政府虽然经常向他们咨询，尤其是外国政府，但他们并未将这视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在绘制改革方案方面他们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他们都是贵族，或者是受到保护的贵族，与此相联系，就很难想像启蒙运动会在总体上逆转现存的秩序。然而，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下降，他们的国家的制度显然是不成功的。所有这些背景结合在一起，他们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奚落，并宣称它已经腐烂了，但他们却不考虑革命的可能性。

他们自己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许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信条都是来自于他们观点各异的著作。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定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僚国家和社会联合组织的个人主义。他们不像西欧重商主义时代的前辈那样为人类进步的可能性所困扰（不管这些人自己是不是乐观的），而是将个人视为人类进步的动因。他们将幸福视为最高追求（*summum bonum*），并将是否促进幸福作为对所有人类活动的正确性的根本检验。但他们的思想如果不是全然的话，也起码是在很大程度上囿于个人幸福——将幸福视为个人的精神状态（“le bonheur individuel”）——而将它区别于社会福利（“le boheur commun”或“collectif”）[①]。

但讨论的主题及其现实性似乎也取决于变化的人类环境，这种变化恰好是长期争论的对象。再者，对后来所明确了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革命口号也有一个确定的一致的衡量标准。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些词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无论自由包括哪些内容，它总是意味着公民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 【601】

① 见茂兹（R. Mauzi）：《18 世纪的社会福利》（巴黎，1960 年）；以及特纳德（L. Trénard）在《法国革命编年史》第 35 卷（1963 年）中的评论。

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不受随意的拘禁、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平等的范围尽管常常扩大到财富的公平分配，但它一般的意义还是前面定义过的那种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大革命前，博爱并不是一个流行词汇，而是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的一种观念。杜尔阁和杜邦·德·内穆尔在1775年的《城市自治论文集》(Mémoire sur les municipalités) 中通篇都是对博爱的意义的精彩表述。这篇著名文献的目的是为征税的业务服务、联系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确定征税权移交给地方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下放征税权的理由仅仅是这一措施可能克服那种盛行于所有人口中的观念，即政府是人民的敌人——在杜尔阁看来，这种观念不仅使政府的管制遇到了一个一般性的障碍，而且还彻底破坏了所有意义上的公共义务，就连对邻居应有的义务都被破坏了，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将政府加给他们的苛刻的税收负担转嫁到其他人肩上。

在《城市自治论文集》中，杜尔阁和杜邦·德·内穆尔勾画了他们所设想的结合公共目的的国家轮廓，表述了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构成，(像托克维尔以及他们之前或之后的许多观察者一样) 坚持认为结合中世纪特权的专制主义是合适的政治制度。这是被当局所接受的第一个对政府的尝试性建议［如果排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这本书在大革命以前很少有人读］，尽管这从来没有形成哲学家的信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直到进入18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他们的著作中仍然找不到任何代表政府需要的表述。

重商主义在这种氛围中显然无法生存，尽管重商主义者并不是哲学家们首先攻击的对象，他们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重农主义者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重农主义的奠基人是路易十五的医生魁奈，他在散布于《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的许多文章以及1758年著名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中发展了他的观点。他的体系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首次公诸于众，是在1767年由他的门徒梅西埃·德·拉里维尔 (Mercier de la Rivière) 以《政治社会的自然秩序与原理》(*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为标题出版的一书中，亚当·斯密称这本书是"对这一学说最清楚、最好的说明"。[1]

由于重农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态度 (他们这一群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602】想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流派"或者团体，自己推敲出了一些思想，并

① 引自希格斯 (H. Higgs)：《重农主义者》(伦敦，1897年)，第2页。

将其作为不容争辩的真理呈现给公众）和某些明显荒谬的结论，他们受到其他大多数哲学家的怀疑。他们坚持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宣称可以通过废除所有其他税种而只留下土地税来解决税收问题［即他们所谓的单一税（*impôt unique*），伏尔泰称其为极不公平的税（*impôt inique*）］。他们的计划可以通过所谓的“专制法”（le despotisme légal）来付诸实施。魁奈和太子（Dauphin）的一段对话概括了重农主义的性质。太子问魁奈：“如果你是国王，你会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

“那么谁来管理呢?”

“自然法则（The law）。”[①]

这些学说使得重农主义者被逐渐对独裁政治和自然法则都产生了怀疑的那一代法国人所轻视。尽管他们的学说很失常，但亚当·斯密却说：“他们的理论在所有方面都是不完整的，但却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已发表的最接近于真理的一种理论。”重农主义者一般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们的经济学特征和缺陷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我们只关心其学说的社会含义。就此而言，其学说很难被给予过高的评价。

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的增长只取决于投资，从而将宫廷的非生产性开支、军国主义和明显消费视为灾难而加以谴责。他们强调对个人进行生产刺激的必要，认为需要免除他们过多的税收负担，消除由农业公社体系所设置的障碍，消除由行会所实施的公社控制，消除国家对贸易和工业的管制。他们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完全占有他自己的财产，根据他自己的需要进行处置，个人比任何一直指使着他的家长式权威都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的结论——就此而言，这一结论填平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鸿沟——是（用梅西埃·德·拉里维尔的话来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由于这种完全而彻底的自由……通过提高个人的福利从而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额”。【603】

梅西埃·德·拉里维尔用大写字母写道：“财产、安全、自由，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在他对魁奈的经济学说进行概括时（杜邦·德·内穆尔后来有一个更简洁的概括），他向读者用经济学的语言为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也就是哲学家们所宣称的人道和社会公正。

① 引自希格斯：《重农主义者》（伦敦，1897年），第45页。

8.5 重农主义与农民

农民是专制主义阶段的文明基础。农民在人口中是绝对多数的，而且每个国家的收入都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土地。在欧洲历史的这个阶段，为人所知的是那些由政府推动的贸易和制造业的增长，与其相比较，大多数大陆国家的农业都没什么进步。只是在18世纪以后的法国和普鲁士，以及在此很长时间以后其他中欧国家（不包括东欧），才从被古贝尔教授称为重商主义下固有规律的人口灾难（mécanisme régulier des catastrophes démographiques）[①]的社会中摆脱出来，即歉收带来传染病这种周期性循环（或者是传染病导致歉收）。这在最严重的地区会导致1/4、1/3甚至偶尔可能是一半的人口死亡，比如在1708~1711年间，东普鲁士省的60万人中就有25万人死于饥荒和疾病。[②]

这些大灾难是许多原因引发的，除了直接的自然因素外，还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其中最明显的是农业生产中原始的工具和组织，以及缺乏足够的运输方式。农业生产仍然以敞地体制为基础，仍然主要关注谷物的增长，仍然受制于18世纪法国的农学家所说的休耕地的恶性循环（le cercle vicieux de la jachére），它与下列情况相一致：土地数量满足了耕种的需要之后，剩下的就不能满足放牧的需要。这是肥料短缺的结果，也使得休耕地上长期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运输工具不足就意味着当某地粮食稀缺的【604】时候，很难或不可能把粮食从富余的地方运过来。在法国，一次歉收或者歉收的可能就会导致囤积、投机和恐慌性购买。这就使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歉收会带来的正常的上涨水平，上涨到穷人无法承受的程度。在这方面，政府政策管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法国政府政策的不断失败在这一时期不断地被讨论。在18世纪，只有威廉一世和弗雷德里克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克服了这种困难。

其原因还在众说纷纭的一件事是，当定期发生的夺去人和动物生命的饥荒和传染病已经在欧洲其他地区停止了的时候，法国的农民，用莱布劳斯（Labrousse）教授的话来说，仍然还被失业和低于基本工资的收入宣判着死

① 皮埃尔·古贝尔：《旧政体》；参见《社会学》第1卷（巴黎，1969年），第2章。
② 顿霍夫（Döhnhoff）：*Namen die keinei mehr nennt*（慕尼黑—格莱德巴赫），第108页。

刑。1761～1774年间，杜尔阁在利穆赞（Limousin，这里被公认为法国最穷的地区，但他判断法国还有4/7的地区比这里还要贫穷）任总监的时候在他的《纲要》(*généralité*)中写到，农民因各种各样的灾难（à la plus profonde misère）而减少。[①]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除了某些幸运的农民和某些例外的地区，这在每一个主要欧洲国家似乎都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如此广泛的一种现象，显然不能用独裁政府或者农民自由与否这些理由来解释。从农民的自由程度与其处境的关系来看，因为农奴是一个法律上的而非经济上的范畴，而且在困苦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所以农奴并不必然比自由农民遭受更大程度的物质剥削。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法国大多数的农民都拥有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按意愿自由迁移（尽管实际上在18世纪后半期之前很少有人离开他们的出生地），也没有什么法令限制他们从事他们选择的工作，或者限制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抵押、出售或遗赠他们的土地。

在法国，一般的估计是农民拥有大约35%的耕地。但是农民却占总人口的80%甚至更多，他们中能拥有足够的土地来养家糊口的人非常少——一无所有的人还在增加——以至于大多数农民都要靠做日工、家仆、佃农或者（很少见的）租地农民来补贴生计，或者全靠这些为生。【605】

当时的所有权与今天的意义并不相同，因为当时的自耕农（*propriétaire*）实际上负担着许多义务，使得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耕作自己的土地和处置土地产品。敞地体制在法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很盛行，自耕农（像包括庄园主在内的其他有产者一样）受到村公社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集体奴役（*servitudes collectives*）的约束，比如规定了他应该种哪种庄稼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候播种和收割——这是农业公社体制的必然结果。和其他的有产者一样，自耕农每年都被要求交出一定比例的作物作为教会征收的什一税（*dîme*），虽然这个比例一般来说都低于1/10。对庄园主来说——“没有土地就没有地主”这一原则仍然盛行——自耕农要向他们上缴的封建杂费在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而且可以用货币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财物上缴。这种义务和其他的义务实际上都难以用金钱来评估，要对其进行评估是很伤脑筋的事，比如农民要到庄园主的磨房中为他们碾磨谷物、允许庄园主在自耕农的土地上狩猎等义务。

① 《杜尔阁全集》第2卷，第452页。

除了由农业公社体制以及地主、教会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以外，法国农民还要承担表现为税收和个人服务形式的义务——典型的像皇家徭役(*corvée royale*)，即强迫义务筑路，以及为军队提供运输工具。

当时及其后都有许多人试图估计，有土地的农民被各种苛捐杂税所剥夺的总产品或净产品的比例。但是许多苛捐杂税却是无法度量的，而且在法国的不同地方以及不同类型的农民中变动非常大，所以没有哪一种估计可以宣称是准确的。但很明显，这些苛捐杂税普遍非常严重；它是导致农业低效率的重要原因。

1776年，本瑟夫（Boncerf）在一本叫做《封建税费的弊端》(*Les Inconvénients des Droits Féodaux*)的著名著作中指出，封建税费是数不清的诉讼的原因，这些诉讼代代相传，"吞没了庄园主、附庸农和土地"。[①] 他认为庄园主花在向别人强行收费上的开支要比他们收到的财物更大。杜尔阁在【606】利穆赞任总监的时候，在《纲要》中论证了非理性的税收体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攻击了总检察长制度，指出农民是这种体制的主要受害者，徭役带来的损失以及它对人力和畜力的征用，对农业和农民个人都造成了打击。他强调了由此带来的起诉和关押违反规定者的成本，以及使管理者卷入加强这一体制的努力中去的复杂的计算（complication extrême)，即使要这种体制体现最低程度的公平，都需要大量的调查和计算，就算做到最好也不可能避免不公正和憎恶的产生，结果是产生一个低劣的体制。[②] 他建议以自由的、有偿的劳动来替代徭役，他认为这将保证供求关系容易地将相关各方的利益带入一种和谐状态。

在中欧，就像在法国一样，农民同样承担着村公社、地主和国家所规定的义务，但这些义务在国家间甚至地区间的差异都很大。因此这里的情况一方面不同于等级社会关系仍然被法律所加强的西欧，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

在法国，大批土地被庄园和采邑分割，庄园的土地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domaine proche*）是庄园主自己雇佣劳动来耕种，或者采用分成、承租的方式让别人来耕种；另一部分（*domaine utile* 或 *mouvance*）是由他有权要求其承担封建义务的那些自耕农的土地构成。[③] 类似的构成也盛行于德国西部，比如巴登（Baden)、符腾堡（Württemberg）和莱茵地区（Rhineland),

① 本瑟夫：《封建税费的弊端》（伦敦，1776年），第17页。

② 《杜尔阁全集》第2卷，第213页。

③ 瑟保尔（A. Soboul)：《法国大革命》。

这在德语中被称为地主庄园制（*Grundherrschaft*，*Gut* 表示一种状态，*Herrschaft* 的意思是统治或者支配）。生活在地主庄园制之下的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其地位可以说是介于自由民和农奴之间。这里的自由民是指大革命期间获得自由的法国人，以及在 *19* 世纪获得自由的中欧人，农奴指的是处于地主庄园制控制之下的那些人。

地主庄园制盛行于波兰、俄罗斯以及哈普斯堡的各世袭领地——主要是匈牙利、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以及霍亨佐伦领地的易北河以东的大片地区。在这些地方，地主的地产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企业由地主自己或他的管家来管理，并强迫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为其工作，如俗话所说，这些农民依赖于土地（an die Scholle gebunden）。【607】

在 18 世纪，一般认为生活在地主庄园制下的农民只是比奴隶的景况稍好一些罢了。他们被称为地主的臣民（*Untertanen*），如果他们不是被征召入伍，这个词就是对他们的地位的最好表述。大量的奴隶，加上特有的政府机构、司法和政策，就是一个中欧王国的缩影。地主手上可能有几千这种臣民（表面上并不允许买卖农奴），需要用他们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在本国或外国市场上销售，为地主赚取利润。

农奴阶层又由许多不同的类别组成，按他们拥有土地的多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或菜园）、拥有相当的财产以及牲畜的数量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农奴在不同的条件下拥有土地，要么是根据庄园的规定，要么是签订契约，无论哪种情况庄园主都操纵着他们的利益。农奴的土地所有权几乎没什么保障［在普鲁士，被称为莱斯坦（*Lassiten*）的人数最多的一类有土地的农奴，其财产在 6 个月之内就可能被收回；在波西米亚，同一类农奴尽管通常都是终身租地农奴，但也随时都会被收回土地］。有土地的农奴有义务向地主提供免费的劳力（如果与货币租金相比地主更偏好免费劳力的话，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地主一般都是如此），地主可以免费使用农奴的运输工具和牲畜，在这个阶段，地主在这方面的兴趣持续地增长。所有农奴，无论有没有土地，都受到农奴的个人义务的约束。他们被法律限制在土地上，如果他们未经允许而离开庄园，那就是犯罪，就会被剥夺所有的社会身份和受保护的权利，成为丧失公权的人。他们被迫从事庄园主安排的工作；如果不被允许的话就不能结婚；农奴的所有义务中最令人愤恨的是，如果需要的话，要被迫让孩子到地主家里做一年的家仆。违背而不是遵守这些义务更能维护他们的尊严。

由玛利亚·特利萨的官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之后所做的调查揭示，这些安排经常导致最严重的弊端和残酷。丑闻被揭发所带来的恐怖并不亚于俄罗斯历史的读者所熟悉的那种恐怖。易北河以东普鲁士各省的状况与俄罗斯不相上下，1806 年以后的农奴解放首【608】先关注的就是这个地区。斯泰因有一次在比喻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容克的财产时有一段著名的话："为捕兽而在兽穴边放置的所有东西都是浪费，围绕着这些东西的是坟墓般的寂静。"① 虽然中欧国家的法律给予农奴一定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俄罗斯的农奴所享受不到的，但这些权利在中欧实际上也不可能得以执行。除了在哈普斯堡和 7 年战争之后的普鲁士之外，农奴几乎不会被单独出售，而是在出售他所拥有的土地时被搭售，他似乎并不比在俄罗斯受到更多的保护。无论是什么原因，地主和管家都不可能或不愿意按通行的道德和按利益的需要来对待他。

道德、权宜，这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多少需求。流行的标准就是黎塞留在他的《政治遗嘱》(*Testament Politique*) 中所表达的，农民应该被视为骡子：

> 他们习惯了终日劳累，因此是长期的休息而不是劳动使他们堕落了。但是，这种劳动应该减轻，这些"骡子"的负担应当与其能付出的劳动量相对应。对于人民的补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减轻补贴，尤其当它们对公众有用时，也是合适的。②

这是重商主义者所遗传下来的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所接受的社会关系是静态的，认为每一个阶层或等级都有与其相适应的职能以及相应的生活水平。尤斯蒂所表达的观点本质上与黎塞留的观点是相同的，尤斯蒂说："国家的内部安全在于这样一种结构：公民团体的各组成部分保持着适当的关系，从而产生稳定的结果。"③

但就和其他时期一样，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也有许多原因共同将问题表面化。有时认为，比如像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农民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一种非理性的、弄巧成拙的侵略政策，使国家遭到战争的蹂躏；有时又认为，比如像哈普斯堡的世袭领地，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机构——实际上在这个世纪中叶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机构——来约束地主的苛捐杂税。在重农主义者的思想盛行之前，普鲁士政府就比其他主要大陆国家更关注农业以及农民

① 瑞特：《斯泰因》，第 70 页。

② 高彻罗（R. Gaucheron）编：《黎塞留时代红衣主教的著作集》（巴黎，1933 年），第 102 页。

③ 斯迈尔：《重农主义者》，第 334～335 页。

的福利。在18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引以为荣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的是，旨在维持粮价稳定的皇家储备政策，使农民避免了中欧其他地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饥荒，也避免了整个这一世纪中在法国一直存在的那种粮食匮乏。【609】但是，弗雷德里克对军队的巨大需求以及建立制造业的努力，是以牺牲农业利益为代价的，这将农民的生活标准降低到了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表明弗雷德里克的命运可能已经被农奴所有者所控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

18 世纪后半期不利于农民利益的政府行为（或者无所作为），由于过于无知且缺乏组织性而没有取得成功，其结果被经济的变化所加强。这个世纪末甚至在中欧也出现了人口的大量增长，这种增长与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并不相适应，从而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对外贸易的增长，以及地主们在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中更希望从他们的地产中榨取利润，使得各地都出现了更严酷的封建税费。

托克维尔在谈到 18 世纪末的法国农民时说，在所有人口中只有他们被排除在文明之外。这并不完全正确，除了农民以外，还有一些人的景况也很糟。莱布劳斯教授所描绘的 18 世纪 3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之间这个价格上升、日益繁荣的时期的情景表明，大好形势的受益人是制造业主、商人和金融家，以及农村的市场产品生产者和出租土地的人。佃农和那些忙于生计的土地所有者（包括许多贵族）并没有受益，在城市和农村靠工资生活的人也没有受益。因为虽然工资率和就业率都上升了，但怎么也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8 世纪的法国（同一时期在中欧也显然如此），农民不只是经济中惟一的受害者，从增长的财富或丰裕中受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但在 17 世纪末普遍更糟糕的经济环境中，他们是受损最大的一个阶级；在 18 世纪后半期，他们的苦难渐渐地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现存的税收体制下，不可能对其征税的少数富人与大量根本交不起税的穷人之间的不公平逐渐扩大；【610】人口增长是农民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对纳税人的需要，军队对健壮新兵的需要，企业家、市民和军官对技术熟练者的需要都在不断增长，大量无知、穷困的人口不可能供给足够的数量——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农民问题成为政府最棘手的一件事。

在 18 世纪中期左右，英国的例子和重农主义的信条将原来的思想完全颠倒过来了。重农主义者宣称，国民财富的增长不是靠破坏某个邻国的贸易，而是靠劳动分工以及国家间的合作。在国内事务中，他们认为增加产品首先是农产品的希望在于扩大农业规模，如果不是无限地扩大的话（在他

们的学说中隐含着无限扩大规模的可能性[1]），至少也是扩大到前一代人无法想像的程度。

魁奈的格言表达了重农主义学说的本质："农民穷则国穷"（Pauvres paysans，pauvre royaume）。[2] 魁奈是自己这个阶级的代言人，虽然他死时是一个拥有世袭头衔和许多土地的富有贵族，但他是农民出身——他是一个只有两间农舍的家庭的13个孩子中的老八。但他父母比当时的其他农民相对更富裕一点，因为他们有牛有马，有一定的土地收益，还有一个能赚点钱来补贴家用的小商店，所以能够维持家人和两个仆人的生活。[3] 他们实际上属于被称为富裕农民的那种人。对魁奈而言，法国的未来要靠这些人，尤其是要靠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租地耕种的那些人。

魁奈将法国农业的灾难性局面归因于缺少富裕的租地农民以及佃农（métayage）的盛行，他既将其视为贫困的结果，也视为其原因。这注定了土地耕作的无效率，而且其收益比在农民支付货币地租这种租地体制（pays de grande culture）下要低得多。魁奈相信，如果富裕租地农民能替代佃农的话，将为那些在佃农流行的地区找不到工作的剩余农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611】就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繁荣将刺激贸易和工业，这些转变的结果就是地主的地租和国家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他构建了他的体系来证明这些观点，并说明了实现这些设想的必要条件。

他从下列假定出发：

> 要生产财富必须先有一定的财富做基础。一个劳动者，如果其财产被霜冻所毁，或遭到野兽破坏，或受到征税的影响，或由于其他原因而受损，那么他就不能再继续生产以满足他的花费……他陷入的贫困必然使他继续贫困下去，无法实行他的事业，安顿他的孩子。[4]

"进行耕作的成本"，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魁奈认为农产品会有3倍的增长；如果不能实现，对魁奈来说这就预示着国家行为的每一个方面都将衰落。从这些结论他推导出了著名的"纯产品"（Le produit net）概念，他从来没有对这一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

---

① 莫伊斯（M. Moës）：《魁奈有经济增长理论吗?》，载《社会经济史评论》（1962年特刊）。

② 魁奈：《重农主义者魁奈》第2卷，第973页。

③ 同上，第1卷。杰奎琳·赫克特（Jacqueline Hecht）：《魁奈简介》，载《重农主义者魁奈》（巴黎，1958年）。

④ 同上，第2卷，第540页。

但广义地说，他的这个概念似乎是指除了已投入的必要的耕作成本，包括耕作者自己的工资，然后剩下的那部分产品。“纯产品”成为欧洲所有的大臣和官员们都在使用的词汇，甚至费加罗（Figaro）在博马歇（Beaumarchais）的文章的译文中也在学习使用这个词。这个词的含义是，如果对耕作者的赋税使得必要的生产成本过高，从而不能得到纯产品的话，这个国家就相当于自杀。

以这些假定为基础，重农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就是前面所说的政府和社会应该有所变革。他们对经济自由的要求、对专制的、重商主义的君主以及社团社会和其他类似的组织都是一个挑战。他们坚持对富裕农民的税费要求不能太重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成本，这是对法国政府的税收政策的控诉。他们同样控诉法国贵族的物质特权，魁奈认为这种特权只不过是“无知的贪欲”（cupidité ignorante），[①] 因为佃农的贫困首先损害的就是贵族的利益。农奴制度也是他们控诉的对象，“这个封建的专制制度……它对不利于国家财富增长的制度的反对并不亚于反对君主的统治”。[②] 重农主义者将除以自卫为目的以外的所有战争开支，以及直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作为一种固定模式的宫廷炫耀性消费（除了威廉一世即位以后的普鲁士没有这种现象）的开支都视为灾难，在那些农业投资严重不足的国家则是一种自残行为。他们直接与所有政府都仍然沿用的旧秩序相对立；虽然他们将那一小部分富裕的有地农民阶层视为最应该鼓励的对象，但所有农民的景况也是他们所主要关注的。如魁奈所说：“臣民进行的消费正是收入的来源……这就是……人民的收入和支出为君主带来财富。”[③] 因此，国内市场就要优先于重商主义者主要关心的国外市场；日常消费品就要优先于同样是重商主义者主要关心的奢侈品；“那些人”，也就是像被有文化的农民对待他们的牲口那样来对待、被黎塞留比做干苦力的畜生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612】

然而，他们仅仅阐述了原则，并没有阐述如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像法国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一样，重农主义者也没有考虑将他们的理论用于实践时可能碰到的障碍。他们主张的农民的人身解放、免除农民土地所承担的各种义务，这其实是要摧毁等级社会的根基。

在主要的大陆国家中，重农主义信条呼吁最强的国家也就是最困难的国

① 魁奈：《重农主义者魁奈》第2卷，第981页。
② 同上，第567页。
③ 同上，第460页。

家。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统治期间，普鲁士的重农主义呼声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存的社会安排因其成功而正受到尊崇，而且弗雷德里克所发起的农业改革并未让农奴拥有私人地产（即使是在皇室地产上的农民，也是到了 1804 年才获得人身自由）。相反，法国因为军队缺乏经费而逐渐无法维持其国际地位，哈普斯堡的情况也很相似，因而接受重农主义的信条而增加国民财富似乎是拯救它们的惟一方法。

在玛利亚·特利萨统治下的匈牙利以及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世袭领地，没有人会关心农民的痛苦，因为这些地方已无力去干预农民的事务。玛利亚·特利萨继承了中世纪君主、封建领主和霸主们的共同特征，这些统治者都希望以自己的地产为生，只有在紧急时才允许向各种地产征收直接税，从【613】而税收总额就不足。在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劳动果实的长期争斗中，由于缺乏皇家的官僚机构，君主在哈普斯堡领地上渐处弱势。1741 年普鲁士在莫尔维茨战役（Mollwitz）中的胜利，使所有的欧洲国家确信分割哈普斯堡遗产的时机成熟了。但玛利亚·特利萨从她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只能征召到 16 000个衣衫破烂、装备差劲的人去抵抗普鲁士的24 000人大军。然而埃斯特哈齐（Esterhazy）家族的王子在勃艮第地区（Burgenland）的埃斯特哈齐的宫殿，在当时的外国访问者看来就和凡尔赛宫（Versailles）差不多。

为了挽救这种糟糕的局面，哈普斯堡采纳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教义，但将其与重农主义相混合。在改革中，玛利亚·特利萨最著名的举动是打破了奥地利和波西米亚土地上的强权势力，建立了皇家官僚体制的基础，将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各个省纳入自己单独管辖之下。她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在普鲁士就已开始，并由威廉一世完成了的工作。

就在这项工作取得进展之时，她的许多受官房经济学教育的大臣和官员，受到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农民的景况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 1741 年奥地利已然位于悬崖边，而且老是在这种恐惧中度日，但它还是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尤其是在 1770 年波西米亚的大饥荒之后）小心地处理农民问题。1770 年波西米亚的大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染病，估计夺去了 250 000 人的生命，也就是这个省 10% 的人口。[①] 紧接着，1775 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中［与俄罗斯的普加乔夫（Pugachev）起义基本是在同一时期］，15 000 人向普鲁格（Prague）进军，烧毁了沿途所有的

---

① 怀特（W. E. Wright）:《农奴、诸侯和君主：18 世纪波希米亚的土地改革》（明尼阿波利斯，1966 年），第 44 页。

城堡。这些灾难以及与其相结合的种种不幸——羸弱的新兵、大批贫困而无知的人口限制着经济的扩张——皆因农奴制下的农业而起。

玛利亚·特利萨统治期间颁布了大量旨在管理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以及保护农民不受剥削的法令。1771 年的法令（*Hauptpatent*）和 1775 年的法令（Robotpatent），这两项关于波西米亚土地的法令是真正的产业法典，对诸多问题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规定了可以要求哪一类农民哪一种服务，服务多长时间，要求对所有农民都要有一个记录，所有地主都要注册，对每一次劳动服务都要有记录等等。[①] 【614】

这些法令不可避免地会形同虚设。它们在农村不可能得以执行；地主的信念是，农民是他们的财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而且农民早已适应了那些障碍——所有这些使得管制难以执行，即使皇家检查团常住在每一个庄园里也是如此。事实是，玛利亚·特利萨新建立的皇家官僚机构的官员不会也不可能与地主相对抗。在格伦伯格（Grünberg）对波西米亚农奴制的经典性考察中，他在谈到玛利亚·特利萨保护农民的私人地产的努力时说到："如果要问玛利亚·特利萨给农奴制带来了什么变化……答案是全无变化。"[②] 在地主庄园制下劳作的农奴，就像弗雷德里克大帝意识到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它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要么就忍受，要么就彻底废除。

约瑟夫二世决定废除这种制度，他母亲实际上已经在王室的波西米亚地产上取得了成功，但那里的问题很不一样，而且那里所宣布的成功由于缺乏可靠的证据而并不能确定。对于约瑟夫所希望的结果以及他所采用的手段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描述，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含糊不清的。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的世袭佃农阶级（他的措施对帮工、雇农和其他无地的农奴来说什么作用也没起到，他们却是占大多数的人，这一点我们最后要说明）。因这一目的，他不仅要给予农奴人身自由，还不得不确保有地农奴拥有足够的土地，不受到苛捐杂税的妨碍。

约瑟夫在 1781 年解放了农奴。他 1789 年的法律试图在一地同时以同样的税率向全体土地所有者征税，防止地主对农民提出不适当的要求。有地农民从向地主提供劳役服务这种义务中解脱了出来；现在的基本原则是农民支付的地租和税负绝不能超过其土地总产出的 30%（以净收益来估价被证明

① 格伦伯格（C. Grünberg）：《自由农》第 1 卷（莱比锡，1893～1894 年），第 175 页及其后内容，第 222 页及其后内容。

② 同上，第 275 页。

是不可行的)。[①]

不用说，建立不久的哈普斯堡官僚机构在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努力【615】中，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中包括在缺乏有经验的测量员的情况下要对匈牙利、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所有土地进行测量。最近的观点是认为这些测量最终还是靠采用粗略的但准备充分的办法完成了，而且其准确程度比想像的要高。[②] 然而事实却是，约瑟夫的土地改革尝试根本就是不可行的。他的设想是通过剥夺地主免费使用劳力的权力，从而增加农民耕作自己的土地的时间。他想强迫地主放宽对他们的私有地的控制，让农民能够租种，所以他的改革是想让农民更富裕。结合重农主义的原则，他显然是相信不仅农民会从这种安排中获益，而且地主收到的租金也会高于他的领地在农奴劳动下所能产生的产品收益。但是，事实上，就连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建议（不管是不是已经实施了）遭到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处于变革时期的土地所有者的反对，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将其付诸实践了。

约瑟夫的行为比任何暴君都更专制，他被认为是现代形式的秘密警察的发明者。因为在他的统治下，那些直接向他报告，或者像在玛利亚·特利萨时代那样向宫廷办公厅（*Hofkanzlei*）报告的机构[③]是这个国家最有势力的群体。但他的独裁势力也救不了他。他的主要传记作家米特罗法诺夫（Mitrofanov）在许多方面将他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比较之后发现，他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努力培育一批亲信和坚决的支持者。由于他的军队忙于与土耳其交战，因此他也没有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他的整个官僚机构都反对他的改革，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认为应该减轻农奴的负担。1790年他死之后，匈牙利的贵族便公开起来造反了，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的贵族也濒临造反的边缘。因为他给农民带来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农民的骚乱一直没有停止过，常常还不得不进行镇压。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弟弟利奥波德同意他的目标，但并不赞成他的方法，在赴维也纳登基的途中说那种方法是“极端混乱而无序”。[④]

---

① 罗兹多斯基（R. Rozdolski）：《约瑟夫二世的税收和农业大改革》（华沙，1961年），第118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斯雷奇（D. Silagi）：《哈普斯堡王朝的雅各布》（维也纳和慕尼黑，1962年），第49页及其后内容。

④ 万朱兹卡（A. Wandruszka）：《利奥波德二世》第2卷（维也纳和慕尼黑，1965年），第252页。

约瑟夫的计划彻底地破产了，但它留下了一些重农主义信条的革命性含义的证据——1789 年 1 月在维也纳，宫廷办公厅对约瑟夫的土地和税收改革计划的概括中表明了这种含义：【616】

> 它们将对日耳曼世袭土地上的整个秩序进行革命。它们将改变每一个人的地位，无论是地主还是农奴，改变每个人的财产的价值，从而改变其生产能力的范围，个人间的、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都会改变。它们将大大减少国家的财富，因为农民所得不能弥补地主所失。[①]

在法国，从杜尔阁那个时代完整地继承下来的总检察长们，不管他们是否自认为是重农主义者，一直都努力沿重农主义的路线改善农民的景况。这些努力并没有表现出革命性，只不过是因为当遭到反对时政府就撤销了相关的措施，比如在粮食自由贸易法令的例子和废除徭役制度中都是如此。减少人头税的随意性的计划在一两个地区明显是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情况显得太少而没有什么意义。[②] 减轻农民的直接税负担，将其部分转移到贵族头上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但还是开展得很活跃。因为放下其他原因不论，贵族一直只占总人口的 1% ~2% ，而且在当时的欧洲，没有哪个政府的税收体制，可以在向富有的地主征税的同时不使较穷的地主破产，在这种普遍性现象下，法国的税收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地施行。通过鼓励地主圈地而培植一场农业革命这种英国模式，在法国并未受到庄园主们的欢迎，也被有地农民所反对。这两个阶级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基石，看来政府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战胜他们的了。[③]

莱费布经常宣称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失败注定了法国要发生革命，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如魁奈所言，农民贫穷就等于王国贫穷——法国由于太穷而在与英国的竞争中已不能保持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力量的地位。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要逆势而行，不采取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从而导致了政权的崩溃以及国民大会的革命号召。政权的崩溃给农民提供了机会。尽管连年的歉收已促使农民无所顾忌，但像在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他们也不会去反抗国家势力，除非国家直接地反对他们。在国家势力分裂破碎之时，他们就在法国大部分地区揭竿而起，烧毁城堡和庄园档案，赶跑地主和地方官员。这些事件必然就预示着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617】

① 罗兹多斯基（Rozdolski）：《约瑟夫二世的税收和农业大改革》，第 114 页。
② 见马里恩（M. Marion）：《旧制度下的直接税》（巴黎，1910 年），全书各处。
③ 见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社会经济史年鉴》（巴黎，1930 年），全书各处。

大陆其他主要专制主义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哈普斯堡皇室的世袭领地，虽然18世纪也出现了农民的叛乱，但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无法相提并论，统治阶级仍然保持着团结。无可否认，自从玛利亚·特利萨时代以来，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官僚机构与多数地主之间就已存在分歧。约瑟夫的行为带来的、并由法国革命所加强的混乱造成的恐惧掩盖了这种分歧。哲学家们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仰找不到实质上的支持者。利奥波德被迫取消了约瑟夫的大部分改革措施，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以退为进。他像他哥哥一样深信他的国家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但他不像他哥哥那样相信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上述直接的行为而实现。他希望通过迂回的方式建立一个有利于这一目标的观念体系，比如秘密煽动奴隶性质的匈牙利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地主的统治。[1] 但他在位仅仅两年就去世了，一个反动分子继承了王位。

18世纪末，普鲁士是欧洲惟一一个没有为革命的骚乱所动摇的主要政治势力。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统治期间，只有零星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法国的事态刺激下，在他死后爆发了其他一些农民起义，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但很容易就被军队镇压了。在奇布尔卡（Czybulka）关于18世纪普鲁士农民景况最好的一本书中，他说到：统治阶级“如果要以镇压大多数人来维持局势的话，他们就表现出了少数人所必须的所有品质”。[2] 托克维尔所相信的法国农民比地主庄园制下的所谓“封建”安排中的农民更不满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哈普斯堡世袭领地的情况相悖，甚至整个普鲁士的事实都不支持这种说法。

但在弗雷德里克死后，一些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鲁士官僚机构中的【618】成员，逐渐开始相信反对农奴制的经济理由了。经亚当·斯密修正的重农主义的信条通过柯尼斯堡大学而传入了普鲁士。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亚当·斯密实际上在普鲁士的教授和公务员中找到了他最狂热的崇拜者，他们称他为“圣斯密”（der göttliche Smith）[3]，去他的墓地朝圣，视他为（用冯·马尔维茨1811年书中的话来说）“与拿破仑一起是欧洲最有势力的君主”[4]。

---

① 斯雷奇（Silagi）：《哈普斯堡王朝的雅各布》，第87页及其后内容。

② 奇布尔卡（Czybulka）：《18世纪德国东部农民阶层的地位》（布伦斯威克，1949年），第85页。

③ 见保戴尔斯温（Bodelschwingh）：《冯·维克男爵的生活》（柏林，1853年），第96页。

④ 范恩斯（Rahel Varnhagen von Ense）：《亚历山大·冯·马尔维茨通信集》（慕尼黑，1966年），第93页。

普鲁士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态度的结果表明，19 世纪前半期普鲁士的农业革命会比其他所有大陆国家更彻底，包括法国。① 但这些故事已是下一阶段所考察的内容了。就像专制主义的发展，它到达顶峰和没落的时间在不同国家都是不同的（尽管在西欧总是比中欧要早一些）。等级社会的发展也一样，它的命运多少与专制主义是同步的。

在初版于 1856 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只是剧烈的变迁的产物，这种变迁迟早都会在每一个地方发生。他设想，就算没有革命，"旧的社会结构仍旧会崩溃，在这里最多只是推迟而已"。② 这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但 18 世纪后半期的事实是，贸易和制造业的增长，职业阶层和有产阶级的繁荣，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政府事务的成熟、新的自由景象和创造财富的新机会，这些一起使得等级社会的特权和义务，在各地都逐渐成为了不公正和低效率的源泉。

在这种形式下，最基本也最困难的任务是从严格的控制和等级社会的约束中解放土地、解放以土地为生的人，他们在每一个国家的人口中都占大多数——他们被集体奴役和其他公社所强加的义务所限制；被交给地主的税费和为地主服务的义务所限制；被地主庄园制下农民的奴隶身份所限制；在地主庄园制这种体制中，地主也要承担许多义务，因此也可以说要解放地主。③ 【619】

在托克维尔说各种形式的解放是不可避免之前将近半个世纪，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负责执行东西普鲁士土地改革的德奥尔多·冯·肖恩就表达过了同样的思想。他在 1811 年说："法国大革命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需要变革。这是没有任何人力所能阻止的变革。"④ 【620】

① 见卢奇（Lütge）:《德国社会经济史》，第 436 页及其后内容；又见盖伯哈德特（B. Gebhardt）:《德国历史手册》（第九版，斯图加特，1970 年），第 384 页及其后内容。

② 托克维尔:《全集》第 2 卷，梅耶编，第 96 页。

③ 维尔德（A. Wald）:《自由农的状态》，《历史季刊》（1933 年）。

④ 引自迈尔（E. W. Mayer）:《西奥多·冯·肖恩时期东西普鲁士的重建》（耶拿，1916 年），第 42 页。

参考文献

编者注

为了与剑桥历史系列的惯例相一致，下面所列的参考文献是选择性的和不完整的。其目的不是列出直接或间接出现在书中的所有文献，而是让读者能够更细节地去研究某些主题。参考文献的选择规则是，有更新版本的书和文章未列出，与单独某章的主题间接相关的一般参考文章被压缩到最低程度。如果某章的大部分并不是研究新的内容，只是对知识进行概括和解释，能在二手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内容，则原始材料和二手文献都一并略去，或者只是列出重要的和最关键的文献。

在这些一般性原则的限制下，各章作者可以按他们认为最好的形式自由【621】组合和安排参考文献。因而各章参考文献的"编排"各有不同。

第一章　近代史中经济增长与萧条的历史研究

Ashton, T. 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54.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 1959.

Ashton, T. S. and Schumpeter, Elizabeth Boody. *English Overseas Trade Statistics 1697–1808.* Oxford, 1960.

Bailyn, B.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55.

Bennassar, B. *Recherches sur les grandes épidémies dans le nord de l'Espagn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69.

Beveridge, William (ist Baron). *Prices and Wages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5.

Bloch, Marc. 'Pour une histoire comparée d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xlvi, 1928.

Bogucka, Maria. 'The monetary crisis in XVIIth century Poland and it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1, 1975.

Boxer, C. 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1965.

Braudel, F. *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 Trans. by M. Kochan. London, 1973.

Brown, H. Phelps and Hopkins, S.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Economica*, 1956.

Cipolla, Carlo, *Public Health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1976.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 London, 1970.

Clapham, Sir J. H 'Economic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5. New York, 1930.

Clark, G. N. *The Wealth of England 1496–1760.* London, 1946.

COLEMAN, D. C. '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1, 1957.

'An innovation and its diffusion: the "New Drape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69.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Paper Industry 1495-1850. 1958.

CUNNINGHAM, W.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5th ed. Cambridge, 1922.

DAVIES, N. Z. 'The rites of violence: religious riots in 16th 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May 1973.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1973.

DECHESNE, L.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Belgique.* Paris-Liege, 1932.

DUBY, GEORG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London, 1974.

ELLIOTT, J. H. 'The decline of Spain.' *Past and Present*, 1961.

FELIX, D. 'Profit inf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historic record and contemporary analog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FLINN, MICHAEL. 'The stabilisation of mortality in pre-industrial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I:2, 1974.

FLOUD, R. (ed.). *Essays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74.

FOGEL, R. W. and ENGERMAN, S. L.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71.

GLAMANN, K. *European Trade 1500-175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ed. C. M. Cipolla). London, 1971.

GORSKI, KAROL, 'La Mentalité Polonaise du XVI-XVIIIe siècle.' (Paper as yet unpublished, in prepar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t Los Angeles 1975 and read in preliminary form to the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rancesco Datini*, Prato, Italy, May, 1974.)

GOUBERT, P. 'Historical demography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French history: a research review.'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I, 1970-1.

'Les Fondements démographiques.' In F. Braudel and E. Labrousse (eds.),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Paris, 1970.

【623】

GRIFFITHS, G. TALBOT, *Population Problems of the Age of Malthus*, Cambridge, 1926.

HALE, J. R. *Renaissance Europe 1480-1520.* London, 1971.

HAMILTON, E. J,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omica*, VII, 1929.

'The decline of Sp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I, 1938.

'Profit infl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1-180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 1942.

HAMMARSTRÖM, INGRID. '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Swedish evidenc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HARPER, L.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1939.

HECKSCHER, E. 'A plea for theory in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Supplement to the *Economic Journal*, I, 1926-9).

Mercantilism. 2 vols, Trans. by M. Schapiro. London, 1931. Rev, ed. 1955, edited by E. F. Söderlund.

HICKS, J. R.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69.

HOFFMANN, W. *British Industry 1700-1950.* Trans, by W. H. Chaloner and W. O. Henderson. 1955.

HOUTTE, J. A. VAN.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de lage landen.* Ziest, Antwerp, 1964.

JONES, E. L. 'Institutional determ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Enquiry*, XII: I, 1974.

KEYNES, J. M. *Treatise on Money*, II(London, 1930), 152-63.

KING, GREGORY.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1696(reprinted in J. H. Hollander (ed.), *Two Tracts by Gregory King*(Baltimore, 1936), pp. 54-6).

LABROUSSE, C. 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33.

LANE, F. C. and RIEMERSMA, J. C. (eds.).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Homewood, Ill., 1953.

LE ROY LADURIE, 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 1966.

MACZAK, ANTONI. 'Money and society in Poland-Lithuania of the 16th-17th centuries.' (Paper, to be published, read to the *Istituto Francesco Datini* at Prato, Italy.)

'Progress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eyes of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man.' *Studia Historiae Oeconomicae*, IX, poznan, 1974.

MADDALENA, A. DE. *Rural Europe 1500-1750*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ed. C. M. Cipolla). London, 1970.

MAKKAI, L. 'The Hungarian Purit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cta Historica*, V: 1-2 Budapest, 1958.

MATHIAS, P. *The Brewing Industry in England 1700-1830*. Cambridge, 1959.

MEREDITH, H. O. *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27.

MEUVRET, J. 'Les crises de subsistances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opulation*, I, 1946.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recueil d'articles. Paris, 1971.

MOLS, R.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Louvain, 1955.

NADAL, J. 'La revolución de los precios españoles en el siglo XVI.' *Hispania*, 1959.

NEF, J. U. 'Prices and industrial capialism 19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937.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1973.

OGG, DAVID. *England in the Reigns of James the Second and William the Third*. Oxford, 1955.

PARKER, N. G.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PIKE, RUTH. *Aristocrats & Traders: Sevillian Socie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72.

PIRENNE, H. 'The place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II, 1929.

POSTAN, M. M. *The Historical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1939.

'Sir John Clapham: the economic historian.'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XVII: I, 1974.

POSTHUMUS, N. W.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2 vols. Leiden, 1971.

PULLAN, B.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Oxford, 1971.

[624]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8.

RENIER, G. *The Dutch Nation*. London. 1944.

ROGERS, J. E. THOROLD.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6 vols. Oxford, 1866-87.

ROPER, H. R. TREVOR. *The Gentry 1540-1640*. Supplement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ondon, 1953.

Religion, the Re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1967.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1960.

SCHMOLLER, GUSTAV. 'Volkswirtschaft, Volkswirtchaftslehre und -methode.'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III, 1911.

SELLA, 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17th-century Italy: a reappraisal.'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69.

SIMIAND, F. 'La Causalité en histoir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 de Philosophie*, VI, 1906.

SPIETHOFF, A. 'Anschauliche und reine Volkswirtschaftliche Theorie und ihr Verhältnis zueinander.' *Festgabe für Alfred Weber*, Heidelberg, 1948.

STOLS, E. *De Spaanse Brabanders*. Brussels, 1971.

SUPPLE, B. 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Cambridge, 1959.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26.

THIRSK, JOAN.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In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ed. F. J. Fisher, Cambridge, 1961.

'Seven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e in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1970.

English Peasant Farming. London, 1957.

(ed.).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500-1640*, Vol. IV, Cambridge, 1967.

TOOKE, T. and NEWMARCH, W. A.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1792-1856*.

(Ed. with intro. by T. E. Gregory.) Reprinted London, 1928.
UYTVEN, R. VAN. 'Politique monétaire et conjoncture dans les Pays Bas du XIVe au XVIe siècle.' Paper read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stituto Francesco Datini at Prato, Italy; to be published shortly.
UZTARIZ, GIERONYMO D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e and Maritime Affairs.* (Trans. by J. Kippax.) London, 1751.
VERLINDEN, C., CRAEYBECK, J. and SCHOLLIERS, E.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x, 1955.
VICENS VIVES, JAIM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9.
VILAR, JEAN. 'L'Espagne au temps de Philippe II.' *Ages d'Or et Réalités*, Paris, 1965.
'Docteurs et marchands: l'école de Tolède 1615–1630.' *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Economique*, 1970.
VRIES, JAN DE. *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 1500–17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English trans. 1930.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übingen, 1922.
WEISSER, M. 'The decline of Castile revisited: the case of Toledo.'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2, 1973.
WIEBE, G. *Zur Geschichte der Preisrevolution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Leipzig, 1895.
WILSON, CHARLES.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Collected Essays.* London, 1969.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9.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London, 1965.
'Transport as a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I:2, 1973.
'Tax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empire.'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ian*, 1969.
WOUDE, A. M. VAN DER. 'The A. A. G. Bijdragen and the study of Dutch rural history.'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V:1, 1975.

【625】

第二章　生命革命中的农业

这个阶段所涉及的参考书目和文章非常多，因此，我们在此所罗列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全面的，但是它确实包含了对本章有重要意义的文献。对人口史和价格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相关章节的参考文献。

ABEL, W. 'Wandlungen des Fleischverbrauchs und der Fleisch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dem ausgechenden Mittelalter,' *Berichte über Landwirtschaft*, N. F., XXII, 1938.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Eine Geschichte der Land-und Ernährungswirtschaft Mitteleuropas seit dem hohen Mittelalter. Revised ed., Hamburg, 1966.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Deutsche Agrargeschichte, II, Stuttgart, 1962.
ACHILLES, W. 'Getreidepreise und Getreidehandelsbeziehungen europäischer Räum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VII, 1959.
Vermögensverhältnisse braunschweigischer Bauernhöf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65.
Actes du colloque sur la forêt, Besançon 21–22 octobre 1966. 1967.
ADEN, O. *Entwicklung und Wechsellagen ausgewählter Gewerbe in Ostfries-von der Mitte des 18. bis zum Ausgang des 19. Jahrhundert.* Aurich, 1964.
ANDERSON, C. A. 'Patterns and variabi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diffusion of schooling.'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6.
ANDERSON, R. H. 'Graindrills through thirty-nine centuries.' *Agricultural History*, x, 1936.
APPOLIS, E. *Un pays languedocien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le diocèse civil de Lodève.* 1951.

ARENDS, FR. *Ostfriesland und Jever in geographischer, statistischer und besonders landwirth-schaftlicher Hinsicht.* 3 vols. , 1818-20.

ARNIM, V. VON, *Krisen und Konjunkturen der Landwirtschaft in Schlewig-Holstein vom 16. bis zum 18. Jahrhundert.* Neumünster, 1957.

ASHLEY, W. 'The English improvers.' *Mélanges d'histoire offerts à Henri Pirenne*, I, 1926.

ASHTON, T. 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5.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 1959.

AUBIN, G. *Zur Geschichte des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s in Ostpreussen.* 1910.

AUGÉ-LARIBÉ, M. *La Révolution agricole.* Paris, 1955.

AYMARD, M. 'En Sicile: dîmes et comptabilités agricoles.' *Études rurales*, XXXV, 1969.

BACKHAUS, A. *Entwicklung der Landwirtschaft auf den gräflich Stolberg-Wernigerödischen Domänen.* Jena, 1888.

BAEHREL, R. *Une Croissance: la Basse-Provence rurale.* Paris, 1961.

BAIROCH, P. 'Le rôle de l'agriculture dans la création de la sidérurgie modern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LIV, 1966.

BAMFORD, P. W. *Forests and French Sea Power, 1660-1789.* Toronto, 1956.

BARANOWSKI, B. *et al. Histoire de l'économie rurale en Pologne jusqu'à 1864.* Warsaw, 1966.

BARRY, J. P. and LE ROY LADURIE, E. 'Histoire agricole et phytogéographie.' *Annales*, XVII, 1962.

BAUDUIN, H. O. J. H. and JANSEN, J. C. G. M. 'Aspecten van de Limburgse landbouwgeschiedenis.' *Studies over de sociaal-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Limburg*, XIV, 1969.

BECHTEL, H.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3 vols. , Munich, 1951-6.

BENNASSAR, B. 'L'alimentation d'une ville espagnol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XVI, 1961.

BENNETT, M. K. 'British wheat yield per acre for svevn centuries.' *Economic History*, III, 1935.

BENTZIEN, U. 'Pferde und Ochsen als Spannvieh in der mecklenburgischen Land-wirtschaft vor dem Dreissigjährigen Krieg.'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XII, 1964.

[626] BERESFORD, M. W. 'The commissioners of enclosu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 1946.

The Lost Villages of England. London, 1954.

BERTHOLD, R. 'Wachstumsprobleme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Nutzfläche im Spätfeudalismus (zirka 1500 bis 1800).'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III, 1964.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der Getreidewirtschaft im spätfeudalen Deutschland(1500-1800).' *Acta musaeorum agriculturae*, 1966.

BEST, H.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in 1641.' *Publications of the Surtees Society*, XXXIII, 1857.

BEVERIDGE, W. H. 'Weather and harvest cycles.' *The Economic Journal*, XXXI, 1921.

Prices and Wages in England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5.

BEZARD, Y. *La vie rurale dans le sud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de 1450 à 1560.* Paris, 1929.

BLASCHKE, K, 'Soziale Gliederung und Entwicklung der sächsischen Landbevölkerung im 16. bis 18.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IV, 1956.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von Sachsen bis zu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Weimar, 1967.

BLINK, H. *Geschiedenis van den boerenstand en den landbouw in Nederland.* II, 1904.

BLOCH, M.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2 vols. , Paris, 1952-6.

BLUM, J. 'Th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II, 1957.

'Russian agriculture in the last 150 years of serfdom.' *Agricultural History*, XXXIV, 1960.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61.

BOEKEL, P. N. *De zuivelexport van Nederland tot 1813.* 1929.

BOELCKE, W. *Bauer und Gutsherr in der Oberlausitz.* Bautzen, 1957.

'Wandlungen der dörflichen Sozialstruktur während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BOERENDONK, M. J. *Historische studiën over den Zeeuwschen landbouw.* 1935.

BOG, I. *Die bäuerliche Wirtschaft im Zeitalter des Dreissigiährigen Krieges.* 1952.

BÖHME, O. *Entwicklung der Landwirtschaft auf den königlich sächsischen Domänen.* 1890.

BONDOIS, P. M. 'La protection du troupeau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L'épizootie de 1763.'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 1932.

BONENFANT, P. *Le Problème du paupérisme en Belgiqu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Brussels, 1934.
BOURDE, A. J. *The Influence of England on the French Agronomes.* Cambridge, 1953.
Agronomie et agronomes en France au 18e siècle. 3 vols. , Paris, 1967.
BRAUDEL, F.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2 vols. , Paris, 1966.
and SPOONER, F. '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1967.
BRAURE, M. *Lille et la Flandre wallonne au XVIIIe siècle.* 2 vols. , 1932.
BROADBENT, L. ' Potatoes and weather. '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XXV, 1949.
BROLIN, P. E. ' Omdömen om skördarna i Sverige under 1700-talet och början av 1800-talet. ' *Statistisk Tidskrift*, N. F. , III, 1954.
BROOKS, C. E. P. *Climate Through the Ages.* Rev. 2nd ed. , London, 1949.
BRUNT, D. ' Climatic cycles. '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LXXXIX, 1937.
BUBLOT, G. *La Production agricole belge, étude économique séculaire, 1846–1955.* Louvain, 1957.
BUCHINSKY, I. E. ' Climatic fluctuations in the arid zone of the Ukraine. ' *Arid Zone Research*, XX. 1963.
BULFERETTI, L. *Agricoltura, industria e commercio in Piemonte nel secolo XVIII*, 1963.
BULL, E. *Vergleichende Studien über die Kulturverhältnisse des Bauerntums.* Oslo, 1930.
BUREMA, L. *De voeding in Nederland van de middeleeuwen tot de twintigste eeuw.* 1953.
BUSCH-ZANTNER, R. *Agrarverfassung, Gesellschaft und Siedlung in Südosteuropa.* Leipzig 1938.
BUTTRESS, F. A. and DENNIS, R. W. G. ' The early history of cereal seed treatment in England. ' *Agricultural History*, XXI, 1947.
CAROSELLI, M. R. *Critica alla mezzadria di un vescovo del' 700.* Milan, 1963. [627]
CHAMBERS, J. D. ' Enclosure and labour suppl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 V, 1953.
The Vale of Trent, 1670–1800. London, 1957.
and MINGAY, G. E.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1880.* London, 1966.
CHATELAIN, A. ' La lente progression de la faux. ' *Annales*, XI, 1956.
CHAYANOV, A. V.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Homewood, Ill. , 1966.
CHEVALLAZ, G. A. *Aspects de l' agriculture vaudois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1949.
CIPOLLA, C. M. ' Comment s' est perdue la propriété ecclésiastique dans l' Italie du nord entre le XIe et le XVIe siècle . ' *Annales*, II, 1947. '
CLAPHAM, J. H. ' The growth of an agrarian proletariat, 1688–1832. '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I, 1923.
CLAY, C. ' Marriage, inheritance and the rise of large estates in England, 1660–1815.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 XXI, 1968.
COLEMAN, D. C. ' Labour in the Eng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956.
CONFINO, M. *Domaines et seigneurs en Russie vers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3.
CONNELL. K. H. *The Population of Ireland, 1750–1845.* Oxford, 1950.
CONZE, W. *Agrarverfassung und Bevölkerung in Litauen und Weissrussland.* 1940.
COO, J. DE. *De boer in de kunst van de 9e tot de 19e eeuw.* 1945.
COOPER, J. P. ' 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men in England, 1436–175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 XX, 1967.
CORNWALL, J. ' Farming in Sussex, 1560 –1640, ' *Sussex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XCII, 1954.
CROESEN, V. R. Y. ' Tabakscultuur in Nederland. ' *Agr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I, 1940.
DAUZAT, A. *La Vie rurale en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1946.
DAVIES, A. ' The new agriculture in lower Normandy, 1750–1789.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 VIII, 1958.
DAVIES, C. S.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eshire, 1750–1850.* Manchester, 1960.
DEBIEN, G. ' Land clearings and artificial meadows in eighteenth-century Poitou. ' *Agricultural His-*

tory, XIX, 1945.

En Haut-Poitou, défricheurs au travail, X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52.

DEBUS, A. G. 'Palissy, Plat and English agricultural chemistr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XXI, 1968.

DEFOE, D. *A Tour through England and Wales.* 2 vols., 1948.

DEFOURNEAUX, M. 'Le problème de la terre en Andalousie au XVIIIe siècle et les projets de réforme agraire.' *Revue historique*, CCXVII, 1957.

DEINUM, B. *Climate, Nitrogen and Grass.* 1966.

DELASPRE, J. 'La naissance d'un paysage rural au XVIIIe siècle sur les hauts plateaux de l'est da Cantal et du nord de la Margeride'.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XL1952.

DELATTE, I. *Les Classes rurales dans la principauté de Liège au XVIIIe siècle* 1945.

'L'évolution de la structure agraire en Belgique de 1575 à 1850.' *Annales du XXXIIIe congrès, fédération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Belgique*, II, 1951.

DEVÈZE, M. *La Vie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61.

Histoire des forêts. Paris, 1965.

DEWEZ, W. J. 'De landbouw in Brabants Westhoek in het midden van de achttiende eeuw.' *Agronomisch-historische bijdragen*, IV, 1958.

DION, R.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Paris, 1959.

DOD, J. P. 'The state of agriculture in Shropshire, 1775–1825.' *Transactions of the Shropshire Archaeological Society*, LV, 1954.

DOORMAN, G. *Octrooien voor uitvindingen in de Nederlanden uit de 16e – 18e eeuw.* 1940.

DOROŠENKO, V. V. *Očerki agrarnoj istorii Latvii v XVI veke.* 1960.

DOVRING, 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I:2, Cambridge, 1965.

DUHAMEL DU MONCEAU, H. L. *Traité de la culture des terres.* 6 vols., Paris, 1753–61.

DUNSDORFS, E. *Der grosse schwedische Kataster in Livland, 1681–1710.* Stockholm, 1950.

DUPAQUIER, J. *La Propriété et l'exploitation foncièr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dans le Gâtinais septentrional.* Paris, 1956.

'Etat présent des recherches sur la répartition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Trois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économique*, I, 1968. [628]

EASTON, C. *Les Hivers dans l'Europe occidentale.* Leyden, 1928.

EMERY, F. V. 'West Glamorgan farming circa 1580–1620.'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Journal*, IX-X, 1955–7.

ENEQUIST, G. *Nedre Luledalens byar.* 1937.

ENJALBERT, H. 'Le commerce de Bordeaux et la vie économique dans le bassin aquitain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du Midi*, LXII, 1950.

ENNO VAN GELDER H. A. *Nederlandse dorpen in de 16e eeuw.* 1953.

ERCEG, I. 'Die Theresianischen Reformen in Kroatien,'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ERNIE, LORD.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6th ed., London, 1961.

EUVERTE, G. *Les Climats et l'agriculture.* 1959.

EVERDINGEN, E. VAN. 'Enkele opmerkingen over het verband tusschen het weer en de tarwe oogst.'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V, 1943.

EVERSLEY, D. E. C. 'The home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50–80.'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67.

FABER, J. A. 'Bildtboer met ploeg en pen.' *Estrikken*, XXXI, 1960.

'Cattle-plague in the Netherland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dedelingen van de Landbouwhogeschool*, LXII, 1962.

'The decline of the Baltic grain-trad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 1966.

FEEKES, W. 'Invloed van het klimaat op de groei en de kwaliteit van tarwe.'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 1938.

FEIGL, H. *Die niederösterreichische Grundherrschaft vo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bis zu den Theresianisch-Josephinischen Reformen.* 1964.

FESTY, O. *L' agricultur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47.

FISHER, F. J.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35.

FLATRÈS, P. *Géographie rurale de quatre contrées celtiques: Irlande, Galles, Cornwall et Man.* 1957.

FLINN, M. 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700-1760: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I, 1966.

FOJTÍK, J. 'Naturálne dávky zo zivočíšnej produkcie na Trenčianskom panstve v 17. a 18. storočí.' *Agrikultúra*, VII, 1968.

FORSTER, R. 'The noble as landlord in the region of Toulouse at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 1957.

'Obstacles to agricultural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V, 1970.

FRANKLIN, T. B. *A History of Scottish Farming.* London, 1952.

FRANZ, G.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Munich, 1956.

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Stuttgart, 1961.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auernstandes in der Neuzeit. Munich, 1963.

Geschichte des Bauernstandes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Deutsche Agrargeschichte, IV, 1970.

FRAUENDORFER, S. VON. *Ideengeschichte der Agrarwirtschaft und Agrarpolitik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I, 1957.

FREESE, J. C. *OstFriess-und Harrlingerland.* I, 1796.

FUSSELL, G. E. 'The size of English cattl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III, 1929.

Robert Loder's Farm Accounts, 1610-1620. London, 1936.

Th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 1523 to 1730. London, 1947.

The English Rural Labourer. London, 1949.

Mor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 1731 to 1793. London, 1950.

The Farmer's Tools, from A. D. 1500-1900. London, 1952.

'Low Countries' influence on English farming.'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XIV, 1959.

Farming Technique from Prehistoric to Modern Times. London, 1965.

The English Dairy Farmer, 1500-1900. London, 1966.

'Science and practi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969.

FUSSING, H. H. 'Gessingholm, 1609-1663, en landbrugshistorisk studie.' *Historisk tidsskrift*, tiene raekke, x, 1934-6. [629]

Stiernholm len, 1603-1661, studier i krongodsets forvaltning. Copenhagen, 1951.

GAETANI D' ARAGONA, G. *Evoluzione agricola e incremento demografico nel Mezzogiorno anteriormente all' Unità (1500-1860).* n. d.

GAGLIARDO, J. G. 'Moralism, rural ideology and the German peasan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 1968.

CARCIA-BADELL Y ABADIA, G. *Introducción a la historia de la agricultura española.* 1963.

GAY, F. 'Production, prix et rentabilité de la terre en Berry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I, 1958.

GÉNICOT, L. 'Crisi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 Cambridge, 1966.

GILBOY, E. W. *Wag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Mass., 1934.

GIRALT RAVENTOS, E. 'En torno al precio del trigo en Barcelona durante el siglo XVI.' *Hispania*, LXX, 1958.

GISSEL, S. *Landgilde og udsaed på Sjaelland i de store mageskifters tidsalder.* Copenhagen, 1968.

GOBLET D' ALVIELLA, F. *Histoire des bois et forêts de Belgique.* 4 vols., 1927-30.

GOEHRKE, C. *Die Wüstungen in der Moskauer Rus.* ' Wiesbaden, 1968.
GOERTZ-WRISBERG, W. *Die Entwicklung der Landwirthschaft auf den Goertz-Wrisbergischen Gütern in der Provinz Hannover.* Jena, 1880.
GORCE, R. DE LA. ' L' homme et la nature dans le pays de "Thiérache". ' *Revue du Nord.* XL, 1958.
GOUBERT, P. ' Les techniques agricoles dans les pays picard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XV, 1957.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2 vols., Paris, 1960.
GOULD, J. D. ' Mr Beresford and the lost villages: a comment. '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III, 1955.
'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1962.
GOY, J. and HEAD-KOENIG, A.L.' Une expérience: les revenus décimaux en France méditerranéenne (XVIe-XVIIIe siècles). ' *Études rurales*, XXXVI, 1969.
GRAS, N. S. B.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15.
GRIGG, 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Lincolnshire.* Cambridge, 1966.
GRIZIOTTI-KRETSCHMANN, J. *Il problema del trend secolare nelle fluttuazioni dei prezzi.* Pavia, 1935.
GSTIRNER, A. ' Die Schwaighöfe im ehemaligen Herzogtume Steirmark. '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teiermark*, XXXI, 1937.
HABAKKUK, H. J. ' Economic functions of English landowner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1953.
' The English land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960.
HANDLEY, J. E. *Scottish Farm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Scotland. Glasgow, 1963.
HANSSEN, G. *Agrar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2 vols., Leipzig, 1880-4.
HART, M. L. ' T. ' De invloed van de weersomstandigheden op de kwaliteit van grashooi en kuilgras. '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I, 1960.
' Het verband tussen wintermelk aflevering, ruwvoeder kwaliteit en weersomstandigheden in het zomerhalfjaar. '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I, 1960.
HAUSER, A. *Schweizerische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1961.
HAUSHOFER, H. ' Das kaiserliche Pflügen. '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HAUSSHERR, H.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Cologne, 1954.
HAVINDEN, M. A. '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open-field Oxfordshire. '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IX, 1961.
Household and Farm Inventories in Oxfordshire, 1550-1590. London, 1965.
HEATON, H,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 ed., New York, 1948.
[630] HECKSCHER, E. F. *Sveriges ekonomiska historia fiån Gustav Vasa.* 4 vols., Stockholm, 1935-49.
' Swedish population trends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II, 1950.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s., 1954.
HEDEMANN, P. VON. ' Hemmelmarck, eine Gutswirtschaft des vorigen Jahrhunderts. ' *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 XXX, 1900.
HEISIG, J. *Die historische Entwickelung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altnisse auf den reichsgräflich-freistandesherrlich-Schaffgotschischen Güterkomplexen in preussisch Schlesien.* Jena, 1884.
HEITZ, G. ' Zur Diskussion über Gutsherrschaft und Bauernlegen in Mecklenburg. '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 1957.
' Über den Teilbetriebscharakter der gutsherrlichen Eigenwirtschaft in Scharbow (Mecklenbur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 *Wissenschaftlich Zeitschrift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VIII, 1958/9.
HELLEINER, K. F. '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end of the vital revolution.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Cambridge, 1967.
HÉMARDINQUER, J. J. ' Faut-il "démythifier" le porc familial d' Ancien Régime? ' *Annales*, XXV, 1970.

HENNING, F. W. *Herrschaft und Bauernuntertänigkeit.* Würzburg, 1964.
Dienste und Abgaben der Bauern im 18.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69.
Bauernwirtschaft und Bauerneinkommen in Ostpreussen i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70.
HINTON, R. W. K. *The Port Books of Boston, 1601–1640.* 1956.
HOBSBAWM, E. J.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V–VI, 1954.
HORVÁTH, P. 'K dejinàm pestovania obilnín na Slovensku v 16.–18. storočí.' *Agrikultúra*, I, 1962.
HOSKINS, W. G. *Studies in Leicestershire Agrarian History.* Leicester, 1949.
Essays in Leicestershire History. Liverpool, 1950.
'The Leicestershire farme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XXV, 1951.
'English agricultur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1955.
'English provincial towns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VI, 1956.
The Midland Peasant. London, 1957.
'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1480–1619.'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II, 1964.
'Harvest fluctuations 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1620–1759.'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VI, 1968.
HOSZOWSKI, S. '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cal Sciences*, 1960.
HOTTENGER, G. 'La Lorraine agricole au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 Stanislas*, CLXXV, 1925.
HOURS, H. *La Lutte contre les épizooties et l'école vétérinaire de Lyon au XVIIIe siècle.* 1957.
HOUTTE, H. VAN. 'Avant Malthus. La théorie de la population et le mouvement en faveur de la petite culture dans les Pays-Ba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Mélanges d'histoire offerts à Charles Moeller*, II, 1914.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Belgiqu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Ghent, 1920.
HOUTTE, J. A. VAN. *Schets van een 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België.* Louvain, 1943.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de Lage Landen. Zeist, 1964.
HOWELLS, B. E. 'Pembrokeshire farming circa 1580–1620,'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Journal*, IX, 1955–6.
HROCH, M. and PETRAŇ, J. 'Europejska gospodarka i polityka XVI i XVII wieku: kryzys czy regres?' *Przegląd historyczny*, LV, 1963.
HUNT, H. G. 'Aspects de la révolution agraire en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XI, 1956. [631]
'The chronology of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Leicestershi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1957.
HYAMS, E. *Dionysu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Wine Vine.* London, 1965.
ILZHÖFER, H. 'Die Deckung des Vitaminenbedarfes in früheren Jahrhunderten.' *Archiv für Hygiene und Bakteriologie*, CXXVII, 1942.
IMBERCIADORI, I. *Campagna toscana nel'700 dalla reggenza alla restaurazione, 1737–1811.* 1953.
IMBERT, C.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Aix-en-Provence, 1959.
INDOVA, E. I. *Dvorcovoe hozjajstvo v Rossii; pervaja polovina XVIII veka.* Moscow, 1964.
JACOBEIT, W. *Schafhaltung und schäfer in Zentraleuropa bis zum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1961.
JANOUŠEK, E. 'Die Arbeitsprodiktivität auf dem tschechischen feudalen Grossgrundbesitz im 18. Jahrhundert,' *Acta musaeorum agriculturae*, I–II, 1966.
Historický vývoj produktivity práce v zemědělství v období pobělohorském. 1967.
JANSEN, J. C. G. M. 'Landbouw rond Maastricht (1610–1865).' *Studies over de sociaaleconomische geschiedenis van Limburg*, XIII, 1968.
JIRLOW, R. and POEL, J. M. G. VAN DER. *De inheemse Nederlandse ploegen.* 1968.
JOHN, A. H.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change, 1660–1760.' *Studie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

tion, 1960.
'Aspects of Englis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xxviii, 1961.
'Agric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hgland, 1700-17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 1965.
JOHNSEN, O. A. *Norweg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Oslo, 1939.
JONES, E. L.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and changes in Herefordshire, 1660-1815.' *Transactions of the Woolhope Naturalists' Field Club*, xxxvii, 1961.
Seasons and Prices. The Role of the Weather in English Agricultural History. London, 1964.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60-1750: agri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 1965.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1650-1815. London, 1967.
'Le origini agricole dell' industria.' *Studi storici*, ix, 1968.
JORDAN, W. *Viehseuchen im bayerisch-schwäbischen Voralpengebiet während des 17., 18. und 19. Jahrhunderts.* 1951.
JUILLARD, E. *La Vie rurale dans la plaine de Basse-Alsace.* Paris, 1953.
KAHAN, A. 'The "hereditary workers". Hypoth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factory labor force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66.
'Natural calamities and their effect upon the food supply in Russia.'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N. F., xvi, 1968.
KAHK, J. *Kres' janskoe dviženie i krest' janskij vopros v Estonii. V konce 18. i v pervoj četverti 19. veka.* 1962.
KENYON, G. H. 'Kirdford inventories, 1611 to 1776.' *Sussex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xciii, 1955.
KERHOUEL. M. *L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des prix.* Paris, 1935.
KERRIDGE, E. W. 'The notebook of a Wiltshire farmer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Magazine*, liv, 1952.
'The movement of rent, 1540-16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 1953.
'Turnip husbandry in High Suffol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956.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1967.
'Arthur Young and William Marshall.' *History Studies*, i, 1968.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London, 1969.
KIESEWETTER. H. C. P. *Praktish ökonomische Bemerkungen auf einer Reise durch Hollstein, Schleswig, Dithmarsen...* 1807.
KIRILLY, Z. and KISS, I. N. 'Production de céréales et exploitations paysannes en Hongrie aux XVIe [632] et XVIIe siècles.' *Annales.* xxiii, 1968.
et al. 'Production et productivité agricoles en Hongrie à l' époque du féodalisme tardif (1550-1850),'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p. p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i, 1965.
KISS, I. N. 'Nagybirtokok árutermelése és külkereskedelme a XVII. századi Magyarországon.' *Magyar Mezögazdasági Múzeum közleményei*, 1968.
KIUS, O. 'Die thüringische Landwirth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iii, 1864.
KLEIN, E. *Die historischen Pflüge der Hohenheimer Sammlung landwirtschaftlicher Geräte und Maschinen.* Stuttgart, 1967.
KLEIN, J. *The Mesta, a Study in Spanish Economic History, 1273-1836.* Cambridge, Mass., 1920.
KLIMA, 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Bohemia, 1648-1781.' *Past and Present*, xi, 1957.
KÖTZSCHKE, R. and EBERT, W. *Geschichte der ostdeutschen Kolonisation.* Leipzig, 1937.
KOHT, H. 'Self-assertion of the farming class.' *Mélanges d' histoire offerts à Henri Pirenne*, i, 1926.
KOK, J. *Grepen uit het verleden van de landbouw in de Groninger veenkoloniën.* 1948.
KONDRATIEFF, N. D. '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

politik, LVI, 1926.

KOPPE, W. 'Wie und mit welcher Ergebnissen wurden Ackerbau und Viehzucht vor gut 300 Jahren in Cismar und Körnik betrieben?' *Jahrbuch für den Kreis Oldenburg/Holstein*, 1958.

KRZYMOWSKI, 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1951.

KULCZYKOWSKI, M. 'En Pologne au XVIIIe siècle: Industrie paysanne et formation du marché national.' *Annales*, XXIV, 1969.

KULISCHER, J.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 1929.

'Das Aufkomme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Maschinen um die Wende des 18. und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XXXIX, 1933, II.

KUSKE, B. *Wirtschaftsgeschichte Wesfalens*. Münster, 1949.

LABRIJN, A. *Het klimaat van Nederland gedurende de laatste twee en een halve eeuw*. 1945.

'Verandert ons klimaat?' *Hemel en dampkring*, XLVIII, 1950.

LABROUSSE, C. 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32.

'Comment contrôler les mercuriales?' *Annales d' histoire sociale*, II, 1940.

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I, Paris, 1943.

LADEWIG PETERSEN, E. 'La crise de noblesse danoise entre 1580 et 1660.' *Annales*, XXIII, 1968.

'The Danish cattle trade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1970.

LAFARGE, R. *L' agriculture en Limousin au XVIIIe siècle et l' intendance de Turgot*. 1902.

LAMB, H. H. 'Climatic change within historical time as seen in circulation maps and diagram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XCV, 1961.

'On the nature of certain climatic epochs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modern (1900–39) normal.' *Arid Zone Research*, XX, 1963.

LAMBERT, A. M. 'The agriculture of Oxfordshire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XXIX, 1955.

Landbouwgeschiedenis, 1960.

LANGE, G. *Die Entwickelung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insbesondere der Viehzucht, auf dem Rittergute Bersdorf in Schlesien von 1770 bis zur Gegenwart*. 1907.

LASLETT, P. 'The stud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from listings of inhabitants.'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1966.

LAVROVSKY, V. M. 'Parliamentary enclosures in the county of Suffol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II, 1936.

LECCE, M. 'I redditi di un fondo agricolo mezzadrile nel XVIII secolo.' *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CXVIII, 1960.

LECLERC DE MONTLINOT, C. 'Mémoire sur la culture flamande en 1776.' *Le théâtre d' agriculture et mesnage des champs*, I, 1804.

LEFEBVRE, G. *Questions agraires au temps de la Terreur*. Paris, 1954.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54.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ille, 1959.

Etudes orléanaises. 2 vols., Paris, 1962–3.

LEFEBVRE, L. *Les Droits d' usage dans la forêt d' Ardenne, 1754–1795*. 1942. [633]

LEHMANN, R. *Die Verhältnisse der niederlausitzischen Herrschafts-und Gutsbauern in der Zeit vom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 bis zu den preussischen Reformen*. Cologne, 1956.

LENNARD, R. V. 'English agriculture under Charles II.'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1932.

LENSKI, G.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1966.

LÉON, P. *et al*.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problèmes sociaux du monde rural dans la France du Sud-Est*. 1966.

LEONHARD, R. *Agrarpolitik und Agrarreform in Spanien unter Carl III*. 1919.

LEQUEUX, A. 'L' accourtillage en Thiérach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u droit des pays flamands, picards et wallons, II, 1939.
LE ROY LADURIE, E. 'Histoire et climat.' *Annales*, XIV, 1959.
'Climat et récolt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nales*. XV, 1960.
'Aspects historiques de la nouvelle climatologie.' *Revue historique*, LXXXV, 1961.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2 vols., Paris, 1966.
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 Paris, 1967.
'Les comptes fantastiques de Gregory King.' *Annales*, XXIII, 1968.
'Dîmes et produit net agricole (XVe-XVIIIe siècle).' *Annales*, XXIV, 1969.
LESKIEWICZOWA, J. *Dobra osieckie w okresie gospodarki folwarczno-pańszczyźnianej XVI-XIX w*. Warsaw, 1957.
Zarys historii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w Polsce. 2 vols., Warsaw, 1964.
Materiały konferencji w Rogowie, 16-18 Wrzesnia 1964. Warsaw, 1966.
LIIV, O.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s estnischen Gebietes am Ausgang des XVII, Jahrhunderts*. 1935.
LINDEMANS. P. *Geschiedenis van de landbouw in België*. 2 vols., 1952.
LIVET, G. *L'intendance d'Alsace sous Louis XIV, 1648-1715*. Paris, 1956.
LIZERAND, G. *Le Régime rural de l'ancienne France*. 1942.
LODGE, E. C. *The Accountbook of a Kentish Estate, 1616-1704*. London, 1927.
LOM, F. 'Vyvoj osevních ploch obilnin a sklizní od 16. století v Čechách.' *Sborník československé akademie zemědělských věd, Historie a musejnictví*, II(XXX), 1957.
LOPEZ, R. S. 'The origin of the Merino sheep.' *The Joshua Starr Memorial Volume, Jewish Social Studies*, V, 1953.
LUNDEN, K. 'Agrartilhøve ca. 1600-1720.' *Historisk tidsskrift* (Oslo), 1969.
LÜTGE, F. *Die bayerische Grundherrschaft*. Stuttgart, 1949.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rlin, 1952.
Die mitteldeutsche Grundherrschaft und ihre Auflösung. Stuttgart, 1957.
Strukturelle und konjunkturelle Wandlungen 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r Ausbruch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58.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grarverfassung vom frühen Mittelater bis zum 19. Jahrhundert. Deutsche Agrargeschichte, III, Stuttgart, 1967.
'Die Robot-Abolition und Kaiser Joseph II.'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LUTTERLOH, E. O. *Dienste und Abgaben der Bauern des Herzogtums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in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1969.
LYASHCHENKO, P.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Russia to the 1917 Revolution*. New York, 1949.
McCOURT, D. 'Infield and outfield in Ire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955.
McNEILL. W. H.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Chicago, 1964.
MĄCZAK, A. *Gospodarstwo chłopskie na Żuławach Malborskich w początkach XVII wieku*. Warsaw, 1962.
'Export of grain and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Poland in the years 1550-1650.'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XVIII, 1968.
MADDALENA, A. DE. 'Il mondo rurale italiano nel cinque e nel seicent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VI, 1964.
MALOWIST, M. 'A certain trade technique in the Baltic countries in the 15th-17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960.
'Les produits des pays de la Baltiqu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CLXVI, 1960.
[634] MANDROU, R. *Classes et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5.
MAN'KOV, A. G. *Razvitie krepostnogo prava v Rossii vo vtoroj polovine XVII veka*. Moscow, 1962.
MANLEY, G. 'The extent of the fluctuations shown during the "instrumental" period in relation to post-glacial events in N. W. Europ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XXV, 1949.
'On British climatic fluctuations since Queen Elizabeth's day.' *Weather.* V, 1950.
'Climatic vari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XXIX, 1953.
'Late and postglacial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ose shown by the instrumental record of the past 300 year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XCV, 1961.
MANTEL, K. 'Bedeutung und Aufgaben der Forstgeschichte.'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III, 1955.
MARION, M.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rurale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Revue des cours et conférences*, XXVIII, 1926-7.
MARSHALL, W. *The Rural Economy of Glocestershire.* 2 vols., Edinburgh, 1789.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Midland Counties. 2 vols., London, 1796.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2 vols., London, 1796.
The Rural Economy of Yorkshire. 2 vols., London, 1796.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Southern Counties. 2 vols., London, 1798.
MARTENS VAN SEVENHOVEN, A. H. 'Geldersche pachtcontracten uit de 16e eeuw.' *Verslagen en mededeelingen oud-vaderlandsch recht*, IX: 5, 1942.
MARTIN, J. M., 'The cost of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Warwickshir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IX, 1964.
MASEFIELD, G. B. 'Crops and livestock.'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Cambridge, 1967.
MASSÉ, P. *Varennes et ses maîtres.* Paris, 1956.
MATHIAS, P. 'Agriculture and the brewing and distilling industr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1952.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calculation by Joseph Massi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 1957.
MAVOR, J.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2 vols., London, 1965.
MEDINGER, W.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Domäne Lobositz.* 1903.
MEUVRET, J. 'Les crises de subsistances et la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de l'ancien régime.' *Population*, I, 1946.
'Agronomie et jardinage au XVIe et au XVIIe siècl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II, 1953.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IV, 1955.
MINCHINTON, W. E. 'Agricultural returns and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I, 1953.
MINGAY, G. E. 'The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1730-17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956.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63.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 a reconsider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XXXVII, 1963.
'The eighteenth-century land steward.' *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67.
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68.
MIREAUX, E. *Une Province française au temps du grand roi, la Brie.* 1958.
MORINEAU, M. 'Y a-t-il eu une révolution agricol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XXXIX, 1968.
'D'Amsterdam à Séville: de quelle réalité l'histoire des prix est-elle le miroir?' *Annales*, XXIII, 1968.
'Histoire sans frontière: prix et "révolution agricole".' *Annales.* XXIV, 1969.
'La pomme de terr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XXV, 1970.
MOUSNIER, R. *Progrès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8.
Fureurs Paysannes. Paris, 1967.
MÜLLER, H. H. *Märkische Landwirtschaft vor den Agrarreformen von 1807.* Berlin, 1967.

MÜLLER-WILLE, W. *Die Ackerfluren im Landesteil Birkenfeld und ihre Wandlungen seit dem 17. und* [635] *18. Jahrhundert.* 1936.

MULLETT, C. F. 'The cattle distemper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XX, 1946.

MUSSET, R. *Le Bas-Maine.* Paris, 1917.

NABHOLZ, H. *et al.* 'Der schweizerische Bauernkrieg.' *Geschichte der Schweiz*, II, Zurich, 1938.

NAUDÉ, W. *Die Getrie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zu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

und SKALWEIT, A. *Die Getriedehandelspolitik und Kriegsmagazinverwaltung Preussens*, 1740–1756. Getreidehandelspolitik, III, Berlin, 1910.

NEDELEC, Y. 'Le couchage des terres dans le pays d'Aug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4me série XXXVII, 1959.

NICHTWEISS, J. *Das Bauernlegen in Mecklenburg.* Berlin, 1954.

'Einige Bemerkungen zum Artikel von G. Heitz.'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 1957.

NIELSEN, A. *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Kameralwissenschaft im* 17. *Jahrhundert.* 1911.

Dä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Jena, 1933.

NOU, J.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n Europe.* 1967.

OCHMAŃSKI, J. 'La situation économico-sociale et la lutte de classe des paysans dans les domaines royaux de Kobryń'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X, 1957.

'Gospodarka folwarczna w dobrach hospodarskich na Kobryńszczyźnie.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VI, 1958.

Wiedza rolnicza w Polsce od 16. *do połowi* 18. *wieku.* Warsaw, 1965.

OGRIZKO, Z. A. 'Zernovoe chozjaĭstvo polonikov troice-gledenskogo monastyrja v XVII veke.' *Materialy po istorii sel'skogo chozjaĭstva i krestjanstva SSSR*, IV, 1960.

OJA, A. *Länsi-suomen maatalous isonvihan aikana* (*Agriculture in Western Finland in* 1719). 1956.

OLAGÜE, I. 'Les changements de climat dans l'histoire.'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VII, 1963.

OLIMPIA DA ROCHA GIL, M. *Arroteias no vale do Mondego durante o seculo XVI. Ensaio de historia agraria.* 1965.

OLIVER, J. 'The weather and farming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in Anglese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Journal*, X:3, 1957.

OLSEN, E. *Danmarks økonomiske historier siden* 1750. Copenhagen, 1962.

OLSEN, G. 'Studier i Danmarks kornavl og kornhandelspolitik i tiden 1610–1660'. *Historisk tidsskrift*, tiende raekke VII, 1942–4.

Hovedgård og bondegård. Studier over stordriftens udvickling i Danmark i tiden 1525–1774. Copenhagen, 1957.

OLSEN, M. *Farms and Fanes of Ancient Norway.* Oslo, 1928.

OOSTEN SLINGELAND, J. F. VAN. *De Sijsselt; een bijdrage tot de kennis van de Veluwse bosgeschiedenis.* 1958.

ORDISH, G. *Untaken Harvest. Man's Loss of Crops from Pest, Weed and Disease.* London, 1952.

ORWIN, C. STEWART. *A History of English Farming.* London, 1949.

and ORWIN, C. SUSAN. *The Open Fields.* Oxford, 1967.

PAAUW, F. VAN DER. 'Ritmische opbrengstschommelingen en hun oorzaak.'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II, 1961.

'Ritmische variaties van bemestingseffecten in de loop van de jaren onder invloed van het weersverloop.'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II, 1961.

'Periodic fluctuations of soil fertility, crop yields and of responses to fertilization effected by alternating periods of low or high rainfall.' *Plant and Soil*, XVII, 1962.

'Het weer en de vruchtbaarheid van de grond.'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X, 1967.

PACH, Z. P. *Die ungarische Agrarentwicklung im* 16.–17. *Jahrhundert.* Budapest, 1964.

PANE, L. DAL. 'Per la storia dei libretti colonici.'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1962.

PARAIN, C. 'Les anciennes techniques agricoles.' *Revue de synthèse*, 3rd ser., VII, 1957.

PARKER, R. A. C. 'Coke of Norfolk an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I, 1955. [636]

PETERS, J. 'Ostelbische Landarmut.'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 1970.

PETRÁN, J. *Zemědělská v ýroba v Čechách v druké polovině* 16. *a počátkem* 17. *století.* 1963.

PLAISSE, A. *La Baronie de Neubourg, essai d'histoire agra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1961.

PLUMB, J. H. 'Sir Robert Walpole and Norfolk husband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1952.

POCHILEWICZ, D. L. 'W sprawie kryzysu i upadku gospodarki obszarniczej rzeczypospolitej w drugiej połowie XVII i pierwszej połowie XVIII wieku.' *Kwartalnik historyczny*, LXV, 1958.

POEL, J. M. G. VAN DER. 'De landbouw-enquête van 1800.' *Historia agriculturae*, I-III, 1953-6.

Het dorsen in het verleden. 1955.

'Beschrijving der boerderijen op de kleilanden in Friesland door Dirk Fontein te Salvert, 1779.' *Historia agriculturae*, IV, 1957.

Oude Nederlandse ploegen. 1967.

POITRINEAU, A. *La Vie rurale en Basse-Auvergne au XVIIIe siècle*(1726-1789). 2 vols., Paris, 1965.

PONI, C. *Gli aratri e l'economia agraria nel Bolognese dal XVII al XIX secolo.* Bologna, 1963.

PONSOT, P. 'En Andalousie occidentale: les fluctuations de la production du blé sous l'Ancien Régime.' *Études rurales*, vol. 34, 1969.

PORISINI, G. *La proprietà terriera nel Comune di Ravenna dalla metà del secolo XVI ai giorni nostri.* Milan, 1963.

PORSCHNEW, B. F. *Die Volksaufstände in Frankreich vor der Fronde*, 1623-1648. 1954.

PRANDOTA, W. 'Produkcja rolnicza w folwarkach starostwa Sochaczewskiego w XVI i XVII wieku.'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I, 1959.

PUNDT, A. G. 'French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crisis of 1788.'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IX, 1941.

QUESNAY, F. *Oe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Frankfurt, 1888.

RAMMELAERE, C. DE. 'De beroepsstructuur van de plattelandse bevolking in Zuidoost-Vlaanderen gedurende de 18e eeuw.' *Tijdschrift voor sociale wetenschappen*, IV, 1959.

RAPPARD, W. E. *Le Facteur économique dans l'avènement de la démocratie moderne en Suisse.* I. *L'agricultur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12.

RAVEAU, P.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ropriété dans le Haut Poitou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26.

RECHT, P. *Les Biens communaux et leur partag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agraire et du droit rural de la Belgique.* 1950.

REZNIKOV, F. I. 'Zemledelie v basseíne severnoí dviny v XVII-XVIII vekach.' *Materialy po istorii sel'skogo chozjaistva i krestjanstva SSSR*, IV, 1960.

RICCHIONI, V. *Studi storici di economia dell'agricoltura meridionale.* 1952.

RICHES, N.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Norfolk.* London, 1937.

RIEMANN, F. K. *Ackerbau und Viehhaltung im vorindustriellen Deutschland.* 1953.

RIGAUDIÈRE, A. 'La Haute-Auvergne face à l'agriculture nouvelle au XVIIIe siècle.' In A. Rigaudière et al.,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rurale au XVIIIe siècle*, 1965.

ROESSINGH, H. K. 'Beroep en bedrijf op de Veluwe in het midden van de achttiende eeuw.' *A. A. G. Bijdragen*, XIII, 1965.

'Hoe functioneerde een dorp in het midden van de 18de eeuw?' *Spiegel historiael*, II, 1967.

ROGERS, J. E. T.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8 vols., London, 1866-1902.

ROMANI, M. *L'agricoltura in Lombardia dal periodo delle riforme al* 1859. *Struttura, organizzazione sociale e tecnica.* Milan, 1957.

'I rendimenti dei terreni in Lombardia dal periodo delle riforme al 1859.'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1962.

ROMANO, R. 'Tra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1962.

RÖSSLER, H. 'Über die Wirkungen von 1525.'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ROSTOW, W. W. 'Business cycles, harvests and politics, 1790-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I, 1941.

[637]

ROTELLI, C. *La distribuzione delle proprietà terriera e delle colture ad Imola nel XVII e XVIII secolo.* Milan, 1966.

'Produzione e produttività dei terreni di una famiglia mobile imolese del 700.' *Rivista di storia dell' agricoltura*, VI, 1966.

L' economia agraria di Chieri attraverso i catasti dei secoli XIV-XVI. Milan, 1967;

'Rendimenti e produzione agricola nell' Imolese dal XVI al XIX secol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X, 1967.

ROTHERT, H. 'Ist die Kiefer von altersher in Westfalen heimisch?' *Westfälische Forschungen*, IX, 1956.

ROUPNEL, G.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française.* Paris, 1955.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5.

RÓŻYCKA, M. 'Struktura wysiewów i wysokość plonow w drugiej połowie XVIII wieku w kluczu spatowskim.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V, 1961.

RUWET, J. *L' 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rurales au pays de Herve sous l' ancien régime.* Liège, 1943.

'Prix, production et bénefices agricoles. Le pays de Liège au XVIII[e] siècle.' *Bijdragen tot de prijzengeschiedenis*, II, 1957.

et al. Marché des céréales à Ruremonde, Luxembourg, Namur et Diest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ouvain, 1966.

RYCHLIKOWA, I. 'Prukcja zbozowa wielkiej Własnosci w Małopolsce w latach 1764-1805.' *Studia z dziejo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X: I, 1967.

RYDER, M. L. 'The animal remains found at Kirkstall Abbey.'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II, 1959.

SAALFELD, D. *Bauernwirtschaft und Gutsbetrieb in der vorindustriellen Zeit.* Stuttgart, 1960.

'Die Produktion und Intensität der Land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angrenzenden Gebieten um 1800.'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XV, 1967.

SABBE, E. *De Belgische vlasnijverheid.* I, Bruges, 1943.

SAFRONOV, F. G. 'Technika zemledelija lensko-ilimskich i angarskich krest' jan v XVII veke.' *Materialy po istorii sel' skogo chozjaistva i krestjanstva SSSR*, III, 1959.

SAINT JACOB, P. DE.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 ancien régime.* Paris, 1960.

SALAMAN, R. N.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1949.

SALOMON, N. *La Campagne de Nouvelle 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 après les Relaciones Typográficas.* Paris, 1964.

SALTMARSH, J. and DARBY, H. C. 'The infield-outfield system on a Norfolk manor.' *Economic History*, III, 1935.

SANGERS, W. J. *De ontwikkeling van de Nederlandse tuinbouw.* 2 vols. 1952-3.

ŠČEPETOV, K. N. 'Sel' skoe chozjastvo v votčinach iosifo-volokolamskogo monastyrja v konce XVI veka.' *Istoričeskie zapiski*, XVIII, 1946.

SCHIFF, O. 'Die deutschen Bauernaufstände von 1525 bis 1789.'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XXX, 1924.

SCHIFFERS, H. 'Landschaftlicher und landwirtschaftlicher Strukturwandel im Eupener Ländchen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Neuzeit.' *Zeitschrift des Eupener Geschichtsvereins*, II, 1952.

SCHMIDT, G. C. L. *Der schweizer Bauer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2 vols., 1932.

SCHMIEDECKE, A. *Johann Christian Schubart, Edler von Kleefeld.* 1956.

SCHMITZ, H. J. *Faktoren der Preisbildung für Getreide und Wein in der Zeit von 800 bis 1350.* Stuttgart, 1968.

SCHOLLIERS, E. *De levenstandaard in de XVe en XVIe eeuw te Antwerpen.* 1960.

SCHOVE, D. J. 'European raininess since A. D. 1700.'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XXV, 1949.

'European temperatures A. D. 1500-1900.'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LXXV, 1949.

'Solar cycles and the spectrum of time since 200 BC.'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XCV, 1961.

SCHRÖDER-LEMBKE, G. 'Die Hausväterliteratur als agrargeschichtliche Quelle.'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I, 1953.

'Entstehung und Verbreitung der Mehrfelderwirtschaft in Nordostdeutschland.' *Zeitschrift für Agrar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II, 1954. [638]

Die Einführung des Kleebaues in Deutschland vor dem Auftreten Schubarts von dem Kleefelde. 1954.

'Die mecklenburgische Koppelwirtschaf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IV, 1956.

'Wesen und Verbreitung der Zweifelderwirtschaft im Rheingebie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VII, 1959.

Martin Grosser, Anleitung zu der Landwirtschaft. Abraham von Thumbshirn, Oeconomia. Zwei frühe deutsche Landwirtschaftsschriften. Stuttgart, 1965.

'Die Genesis des Colerschen Hausbuches und die Frage seines Quellenwertes.'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1967.

SCHWABE, A. *Grundriss der Agrargeschichte Lettlands*. 1928.

SCHWERZ, J. N. *Anieitung zur Kentniss der belgischen Landwirtschaft*. 3 vols., 1807-11.

Beschreibung der Landwirthschaft im Nieder-Elsass. 1816.

Beschreibung und Resultate der Fellenbergischen Landwirthschaft zu Hofwyl. 1816.

Beobachtungen über den Ackerbau der Pfälzer. 1816.

Beschreibung der Landwirthschaft in Westfalen und Rheinpreussen. 1836.

SÉE, H. *Les Classes rurales en Bretagne du XVI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06.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Paris, 1921.

La Franc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2.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I, Paris, 1948.

SEEBOHM, M. E.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Farm*. London, 1952.

SERENI, E.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2.

'Agricoltura e sviluppo del capitalismo. I problemi teoretici e metodologici.' *Studi storici*, IX, 1968.

SERRES, O. DE. *Le Théâtre d'agriculture et mesnage des champs*. 2 vols., Paris, 1804.

SEVRIN, R. 'Les cultures industrielles et fourragères dans le Hainaut occidental avant le XIXe siècle.' *Annales du XXXIIIe congrès de la fédération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de Belgique*, II, 1951.

SIEGRIST, J. J. 'Beiträge zur Verfassungs-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Herrschaft Hallwil.' *Argovia*, LXIV, 1952.

Die Gemeinde Unterkulm und das Kirchspiel Kulm. 1957.

SILBERT, A. *Le Portugal méditerranéen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2 vols., Paris, 1966.

SILVA, J. GENTIL DA. *En Espagn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sistence, déclin*. 1965.

'L'autoconsommation au Portugal (XIVe-XXe siècle).' *Annales*, XXIV, 1969.

SIMIAND, F. *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e mouvement général des prix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Paris, 1932.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à longue durée et la crise mondiale. Paris, 1932.

SIROL, J. *Le Rôle de l'agriculture dans les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1942.

SJOERDS, F. *Algemene beschrijving van oud en nieuw Friesland*. Leeuwarden, I, 1765.

SKEEL, C. 'The cattle trade between Wales and England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ourth ser., IX, 1926.

SLICHER VAN BATH, B. H. *Mensch en land in de middeleeuwen*. 2 vols., 1945.

Een samenleving onder spanning. Geschiedenis van het platteland in Overijssel. 1957.

'Een Fries landbouwbedrijf in de tweede helft van de zestiende eeuw.' *Agronomisch-historische*

bijdragen, IV, 1958.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A. D. 500–1850. London, 1963.
'The yields of different crops (mainly cereals) in relation to the seed, c. 810–1820.'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I, 1967.
Yield ratios, 810–1820.' *A. A. G. Bijdraen*, X, 1963.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A. A. G. Bijdragen*, XII, 1965.
'Eigh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XLIII, 1969.
'Constante, fluctuerende en variabele factoren in de productie en consumptie van agrarische goederen in de pre-industriële maatschappij.' *A. A. G. Bijdragen*, XV, 1970.
'Vrijheid en lijfeigenschap in agrarisch Europa (16e–18e eeuw).' *A. A. G. Bijdragen*, XV, [639] 1970.
'Twee sociale stratificatie's in de agrarische maatschappij in de pre-industriële tijd.' *A. A. G. Bijdragen*, XV, 1970.
SMIRNOV, I. I. *et al. Krestjanskie vojny v Rossi* 17.–18. *vekov.* Moscow, 1966.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776.
SMITH, R. E. F. *A Model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n the Russian Farm, 15th–17th Centuries.* 1964.
The Enserfment of the Russian Peasantry. Cambridge, 1968.
SOBOUL, A. '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X, 1956.
'La communauté rurale (XVIIIe–XIXe siècle).' *Revue de synthèse*, 3e série, 1957.
Les Campagnes montpelliérain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58.
ŠOLTA, J. *Die Ertragsentwicklung in der Landwirtschaft des Klosters Marienstern.* Bautzen, 1958.
SOMEŞAN, L. *Alter und Entwicklung der rumänischen Landwirtschaft in Siebenbürgen.* 1941.
SOOM, A. *Der Herrenhof in Estland im 17. Jahrhundert.* Lund, 1954.
'Gutswirtschaft in Livland am Ausgang des 16.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für Ostforschung*, V, 1956.
SOREAU, E. *L'agriculture du XVI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Ie.* Paris, 1952.
SPAHR VAN DER HOEK, J. J. and POSTMA, O. *Geschiedenis van de Friese landbouw.* 2 vols., 1952.
SPEYBROECK, L. VAN. 'De wijziging van het landschapsbeeld en van het leven van den mensch in het Land van Waas in de 18e eeuw.' *Annalen van de oudheidkundige kring van het Land van Waas*, LV, 1947.
ŠPIESZ, A. 'Die neuzeitliche Agrarentwicklung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Gutsherrschaft oder Wirtschaftsherrschaft?'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 vol. 32, 1969.
'Czechoslovakia's place in the agrarian development of middle and east Europe of modern times.' *Studia historica Slovaca*, VI, 1969.
SPRUNCK, A. 'Les derniers temps de l'ancien régime dans le Luxembourg wallon.' *Annales de l'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u Luxembourg*, LXXXIII, 1952.
ŚRENIOWSKI, S. 'W kwestii planów v ustroju folwarczno-pańszczyźnianym Polski XVI–XVIII w.'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V, 1952.
'Oznaki regresu ekonomicznego w utroju folwarczno-pańszczyźnianym w Polsce od schyłku XVI w.' *Kwartalnik historyczny*, LXI, 1954.
STARK, W. 'Niedergang und Ende des landwirtschaftlichen Grossbetriebs in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XLVI, 1937.
'Die Abhängigkeitsverhältnisse der gutsherrlichen Bauern Böhmens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IV, 1952.
STAVENHAGEN, R.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agraires.* 1969.
STEGENGA, T. *et al.* 'De invloed van milieuveranderingen op de melkproduktie per koe per jaar van 1933 tot 1960.' *Landbouwkundig tijdschrift*, LXXIX, 1967.
STEINBERG, S. H. 'The Thirty Years' War: a new interpretation.' *History*, XXXII, 1947.

STOIANOVICH, T. 'Le Maïs.' *Annales*, VI, 1951.

STOLDT, P. H. *Bauer und Herzog. Die Amtsbauern des Herzogtums Sachsen-Lauenburg bis* 1689. 1966.

STOLZ, O. 'Zur Geschichte des Getreidebaues und seines Rückganges im Bregenzerwald.'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 Vorarlbergs*, VII, 1923.

'"Der rechte Kreis", eine dreijährige Fruchtfolge mit Flurzwang im Pustertal nach Belegen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XV, 1932.

Die Schwaighöfe in Tirol. 1930.

STONE, 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XLII, 1969.

SZCZYGIELSKI, W. 'Próba ustalenia wysokości plonów w królewszczyznach powiatu wieluńskiego w latach 1564–1661.'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V, 1961.

'Wysokość plonów w dobrach przygodzkich w drugiej połowie XVIII wieku.'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V, 1961.

'Le rendement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sur le fond européen.' *Ergon*, V, 1966;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XIV, 1966. [640]

SZKURLATOWSKI, Z. 'Wysokość plonów w folwarkach klucza Luboradz na Śląsku w drugiej połowie XVIII i na początku XIX wieku.' *Acta universitatis Wratislaviensis*, XXXVII; *Historia*, X, 1965.

TATE, W. E. 'Opposition to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XIX, 1945.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 to enclosure.' *Agricultural History*. XXIII, 1949.

THIRION, L. 'La commune de Clermont-sur-Berwinn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paysage rural au pays de Herv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belge d'études géographiques* XV, 1946.

THIRSK, J. 'The Isle of Axholme before Vermuyden.'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I, 1953.

'Agrarian history, 1540–1950.' *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Leicester*, II, 1954.

English Peasant Farming: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Lincolnshire from Tudor to Recent Times. London, 1957.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IV, 1500–1640. Cambridge, 1967.

THOMAS, D. 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wedish Population Movements*, 1750–1933. 1941.

THÜNEN, J. H. VON. *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h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 I, Rostock, 1842.

TITOW, J. 'Evidence of weather in the account rolls of the bishopric of Winchester, 1209–135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959–60.

TOPOLSKA, M. B. 'Dobra Szkłowskie na Białorusi wschodniej w XVII i XVIII wieku.'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XI:3, 1969.

TOPOLSKI, J. 'O literaturze i praktyce rolniczej w Polsce na przełomie XVI i XVII wieku.'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IV, 1952.

'La re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TOUTAIN, J. C.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2 vols., Paris, 1961.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Paris, 1963.

TROW-SMITH, R. *A History of British Livestock Husbandry to* 1700. London, 1957.

A History of British Livestock Husbandry, 1700–1900. London, 1959.

TUMA, E. H. *Twenty-six Centuries of Agrarian Reform*. Berkeley, 1965.

USHER, A. P. 'The applic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to economic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L, 1932.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Cambridge, Mass., 1954.

UTTERSTRÖM, G.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955.

Jordbrukets arbetare. Levnadsvillkor och arbetsliv på landsbygden från frihetstiden till mitten av 1800-talet. I, 1957.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in Sweden.'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X, 1961.

VANDENBROEKE, C. 'Aardappelteelt en aardappelverbruik in de 17e en 18e eeuw.'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LXXXII, 1968.
VARGA, J. *Typen und Probleme des bäuerlichen Grundbesitz in Ungarn*, 1767-1849. Budapest, 1965.
VENARD, M. *Bourgeois et paysan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7.
VERHULST, A. *Histoire du paysage rural en Flandre de l'époque romaine au XVIIIe siècle.* Brussels, 1966.
VERVELDE, G, J. *De ongewisheid van de oogst.* 1962.
VICENS VIVES, J. *Historia económica de España.* 1959.
VILAR, P. 'Géographie et histoire statistique, histoire sociale et techniques de production; quelques points d'histoire de la viticulture méditerranéenne.'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I, Paris, 1953.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Paris, 1965.
VOGT, J. 'Zur historischen Bodenerosion in Mitteldeutschland.'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1958.
VOLLRATH, P. *Landwirtschaftliches Beratungs-und Bildungswesen in Schleswig-Holstein in der Zeit von 1750 bis 1850.* Neumünster, 1957. [641]
VOOYS, A. C. DE. 'De verspreiding van de aardappelteelt in ons land in de 18e eeuw.' *Geografisch tijdschrift*, VII, 1954.
WÄCHTER, H. H. *Ostpreussische Domänenvorwerk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Würzburg, 1958.
WALTER, G. *Histoire des paysans de France.* Paris, 1963.
WARNER, C. K. (ed.). *Agrarian Condition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1966
WARREN, G. F. 'The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III, 1923/4.
WASCHINSKI, E. *Währung, Preisentwicklung und Kaufkraft des Geldes in Schleswig-Holstein von* 1226-1864. 2 vols., Neumünster, 1952-9.
WAWRZYŃCZYK, A. 'Problem spadku wydajności dóbr Pabianice w drugiej połowie XVI w.'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XII:2, 1970.
WAWRZYŃCZYKOWA, A. 'Próba ustalenia wysokósci plonów w dobrach Pabianice w drugiej połowie XVI w.'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I, 1959.
'Proba ustalenia wysokósci plonu w królewszczyznach województwa sandomierskiego w drugiej połowie XVI i początkach XVII wieku.'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 1957.
'Problem wysokósci plonów w królewszczyznach mazowieckich w drugiej połowie XVI i pierwszej ćwierci XVII w.'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V, 1961.
Gospodarstwo chłopskie w dobrach królewskich na Mazowszu w XVI i na początku XVII w. 1962.
WEE, H. VAN DER.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3 vols., The Hague, 1963.
WELLMANN, I. 'Földmüvelési rendszerek Magyarországon a XVIII. században.' *Agrártörténeti szemle*, 1961.
'Pest megye viszálya Pest városával piacta vitt paraszti termelvények körül az 1730-as évekken.' *Magyar mezögazdasági múzeum közleményei*, 1965-6.
'Határhasználat az Alföld északnyugati peremén a XVIII. század elsö felében.' *Agrártörténeti szemle*, 1967.
'Esquisse d'une histoire rurale de la Hongrie depui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jusqu'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Annales*, XXIII, 1968.
WESTIN, J. *Kulturgeografiska studier inom Nätra-, Näske-och Utbyårnas flodområden samt angränsande Kusttrakter.* 1930.
(WESTON, SIR RICHARD.) *A Discourse of Husbandrie used in Brabant and Flanders.* 1652.
WIARDA, D.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elung der wirth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Ostfrieslands.* Jena, 1880.
WIATROWSKI, L. 'Gospodarstwo wiejskiew dobrach Pszczyńskich od połowy XVII do początku XIX wieku.' *Acta universitatis Wratislaviensis*, XXXVIII; *Historia*, XI, 1965.
WIEMANN, H. 'Rechnungen des Klosters Meerhusen um 1600.' *Jahrbuch der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und vaterländische Altertümer zu Emden.* XLIII, 1963.

WIESE, H. and BÖLTS, J. *Rinderhandel und Rinderhaltung im nordwesteuropäischen Küstengebiet vom 15. bis zu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66.
WIESSNER, H. *Sachinhalt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Weistümer im deutschen Kulturgebiet.* 1934.
WILSON, C.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1965.
The Dutch Republic. London, 1969.
WINKLER, K. *Landwirtschaft und Agrarverfassung im Fürstentum Osnabrück nach dem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 Stuttgart, 1959.
WINTERWERBER, P.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der Flurverfassung und der Grundbesitzverhältnisse im Kreis St. Goarshausen.* 1955.
WISWE, H. 'Grangien niedersächsischer Zisterzienserklöster. Entstehung und Bewirtschaftung spätmittelalterlich-frühneuzeitlicher landwirtschaftlicher Grossbetriebe.' *Braunschweigisches Jahrbuch*, XXXIV, 1953.
WOLF, I. A. 'Das Entstehen von Wüstungen durch Bauernlege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 1957.
WOPFNER, H. 'Beobachtungen über den Rückgang der Siedlung.' *Tiroler Heimat*, III, 1923. [642]
WOUDE, A. M. VAN DER. 'De consumptie van graan, vlees en boter in Holland op het einde van de achttiende eeuw.' *A. A. G. Bijdragen*, IX, 1963.
WRIGHT, W. E. *Serf, Seigneur and Sovereign. Agrarian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Minneapolis, 1966.
WYCZAŃSKI, A. 'Le niveau de la récolte des céréales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Contributions, communications,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60.
'Plony zbóż w folwarkach królewskich województwa lubelskiego w 1564 roku.'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IV, 1961.
'Tentative estimate of Polish rye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IV, 1961.
'En Pologne. I. L'économie du domaine nobiliaire moyen (1500–1580).' *Annales*, XVIII, 1963.
Studia nad gospodarka starostwa Korczyńskiego, 1500–1660. Warsaw, 1964.
YELLING, J. 'The combination and rotation of crops in East Worcestershire, 1540–1660.'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XVII, 1969.
YOUINGS, J. A. 'The terms of the disposal of the Devon monastic lands, 1536–1558.'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IX, 1954.
YOUNG, A. *A 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768.
A Six Months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4 vols., London, 1770.
The Farmer's Tour through the East of England. 4 vols., London, 1771.
A Tour in Ireland. London, 1780.
Travels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undertaken more particularly with a view of ascertaining the cultivation, wealth, resources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of the kingdom of France. Bury St Edmunds, 1794.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London, 1794.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Lincoln. London, 1799.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Sussex. London, 1808.
ZABINSKI, Z. 'L'indice biologique du pouvoir d'achat de la monnaie.' *Annales*, XXIII, 1968.
ZANETTI, D.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L'approvisionnement de Pavie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XVIII, 1963.
Problemi alimentari di una economia preindustriale: cereali a Pavia dal 1398 *al* 1700. Turin, 1964.
ZANGHERI, R. 'Ricerca storica e ricerca economica: agricoltura e sviluppo del capitalismo.' *Studi storici*, VII, 1966.
ZANINELLI, S. *Una grande azienda agricola della pianura irrigua lombarda nei secoli XVIII e XIX.* Milan, 1964.
ZIJP, A. 'Hoofdstukken uit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de polder Zijpe in de 17e

en 18e eeuw. '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LXX, 1957.
ZUCCHINI, M. *L' agricoltura ferrarese attraverso i secoli.* 1967.
ŻYTKOWICZ, L. ' Ze studiów nad wysokością plonów w Polsce od XVI do XVIII wieku. '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XIV, 1966.
' An investigation in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Masov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XVIII, 1968.
' Studia nad wydajnością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na Mazowszu w XVII wieku. ' *Studia z dziejów gospodarstwa wiejskiego*, XI:1, 1969.
' Plony zbóż w Polsce, Czechach, na Węgrzech i Słowacji w XVI–XVIII w. '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ej*, XVIII, 1970.

【643】

第三章 近代初期的欧洲渔业史

本章欧洲渔业研究的某些方面，是作者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从 1500 年到蒸汽机捕鱼船出现这一阶段欧洲渔业研究的一个总结。

手 稿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Archive de la Marine B_2 B_3
AP. 127
Algemene Rijksarchief, The Hague
Archief van de Groote Visscherij
Norfolk Record Office, Norwich
Great Yarmouth Corporation Manuscripts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 O. 194; 390
E. 190
Scottish Record Office
Customs Rec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Sir Robert Sibbald, Discourses on Trade. 1693. MS. 33. 5. 16.

已发表的著作精选

BANG, N. E. and KORST, K.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6 vols. Copenhagen, 1906–33, 1930–53.
BEAUJON, A. *History of the Dutch Sea Fisheries: Their Progress, Decline and Revival.*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Exhibition Literature, IX: Prize Essays, Pt II, London, 1883.
DALGARD, S. *Dansk-Norsk Hvalfangst* 1615–1660. Copenhagen, 1962.
DARDEL, E. *La Pêche Harenguière en France.* Paris, 1941.
FULTON, T. W.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s.* London, 1912.
GELDER, H. E. VAN. ' Gegevens betreffende de haringvisscherij op het einde de 16e eeuw. ' *Bijdragen en Mededeelingen van het Historisch Genootschap.* XXXII, 1911.
GENTLEMAN, T. *England' s Way to Win Wealth.* London, 1614.
HAHN, L. *Ostfrieslands Heringsfischereien.* Oldenburg, 1941.
HEMARDINQUIER, J. J. (ed.). ' Pour une histoire de l' alimentation. ' *Cahiers des Annales.* XXVIII, Paris, 1970.
INNIS, H. A. *The Cod Fisheries.* Toronto, 1954.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panish Fishery in Newfoundland.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1931.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Exhibition Literature. IX: II. London, 1884.
JENKINS, J. T. *The Herring and the Herring Fisheries.* London, 1928.

A *History of the Whale Fisheries*. London, 1921.

JUDAH, C. B. *The North American Fisheries and British Policy to 1713*. Urbana, 1933.

KRANENBURGH, H. A. H. *De Zeevisscherij van Holland in den Tijd der Republiek*. Amsterdam, 1946.

LA MORANDIÈRE, CH. DE. *Histoire de la Pêche Française de la Morue dans l' 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Des origines à 1789*. 3 vols., Paris, 1962.

LOUNSBURY, R. G. *The British Fishery in Newfoundland 1634-1763*.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34.

LYTHE, S. G. E. *The Economy of Scotland in its European Setting 1550-1625*. London, 1960.

ØSTENSJØ, R. 'The Spring Herring Fisher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est Norway in the 19th Centu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 1963, 135-55.

SEYMENS, M. *Een korte beschrijving van de haringvisscherije in Hollandt*. Amsterdam, 1640.

SIMON, THOMAS H. *Onze IJslandvaarders in de 17e en 18e eeuw*. Amsterdam, 1937.

SMITH, H. 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de in the Shetland Islands 1550-1914.'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Aberdeen, 1972. [644]

STEEN, S. and BUGGE, A. *Det Norske Folks Liv og Historie*. Oslo, 1932-3.

TOMFOHRDE, T. 'Die Heringsfischereiperiode an der Bohus-Len-Kuste van 1559-1589.' *Archiv fur Fischereigeschichte*, III, 1914.

WATJEN, H. 'Zur Statistik der holländischen Heringfischerei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ubach, 1910.

ZORGDRAGER, C. G. *Bloeyende Opkomst der aloude en hedendaagsche Groenlandsche Visscherij*. Amsterdam, 1720.

第四章 改变中的商业模式

ABEL, WILHELM.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Eine Geschichte der Land-und Ermährungswirtschaft Mitteleuropas seit dem hohen Mittelalter*. Hamburg-Berlin, 1966.

ACHILLES, W. 'Getreidepreise und Getreidehandelsbeziehungen europäischer Räum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VII, 1959.

AMBURGER, ERIK. *Die Familie Marselis. Studien zur russ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Giessner Abhandlungen zur Agrar-und Wirtschaftsforschung des europäischen Ostens, IV, Giessen, 1957.

ANAND, INDIRA (NÉE NARANG). 'India's Overseas Trade, 1715-1725.' Unpubl. thesis,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1969.

ARASARATNAM, SINNAPPAH. *Dutch Power in Ceylon*, 1658-1687. Amsterdam, 1958.

ARUP, ERIK. *Studier i engelsk og tysk handels historie. En undersøgelse af kommissionshandelens praksis og theori i engelsk og tysk handelsliv 1350-1850*. Copenhagen, 1907.

Les Aspects Internationaux de la Découverte Océaniqu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6.

ÅSTRÖM, SVEN-ERIK.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nd the Baltic Trade, 1660-1700.' *Scand. Econ. Hist. Rev.*, VIII, 1960.

From Stockholm to St Petersburg. Commercial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weden 1675-1700. Studia Historica, publ. by the Finnish Historical Society, II, Helsinki, 1962.

From Cloth to Iron. The Anglo-Baltic Trade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I. *The Growth,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Trade*.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Commentationes Humanarum Litterarum, XXXIII:1, Helsinki, 1963.

ATTMAN, ARTUR. *The Russian and Polish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00-1650*. Pub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of Gothenburg University, XXVI, Göteborg, 1973.

BANG, N.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m Øresund 1497-1660*. 3 vols., Copenhagen, 1906-22.

and KORST, K. *Tabeller over Skibsfart og Varetransport gennem Øresund* 1661-1783 *og gennem Storebaelt 1701-1748*. 3 vols, Copenhagen, 1930-45.

BARBOUR, VIOLET.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

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r. LXVIII:1, Baltimore, 1950.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1929–30.

BASTIN, JOHN.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the Early Southeast Asian Pepper Trade.*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n Subjects, No. I,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 1960.

BERGIER, JEAN-FRANÇOIS. *Genève et l'économie européenne de la Renaissance.* Collection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Paris, S.E.V.P.E.N., 1963.

BERRILL, K.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960.

BEUTIN, LUDWIG. *Der deutsche Seehandel im Mittelmeergebiet bis zu den napoleonischen Kriegen.* Neue Folge der Abh. zur Verkehrs-und Seegeschichte, ed. Dietrich Schäfer, I, Neumünster, 1933.

BLITZ, RUDOLPH C. 'Mercantilist Policies and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1500–17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I, 1967. 【645】

BOG, INGOMAR. *Der Reichsmerkantilismus. Studien zur Wirtschaftspolitik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59.

'Türkenkrieg und Agrarwirtschaft.' In O. Pickl (ed.),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1971.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450–1650. Die ostmitteleuropäischen Volkswirtschaften in ihren Beziehungen zu Mitteleuropa.* Cologne-Vienna, 1971.

BOGUCKA, MARIA. 'Die Bedeutung des Ostseehandels für die Aussenhandelsbilanz Polens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7. Jahrhunderts.'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BRAKEL, S. VAN. 'De Directie van den Oosterschen handel en reederijen te Amsterdam.' *Bijdragen v. Vaderl.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4. R. IX. 1910.

BRAUDEL, FERNAND.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I–II, rev. ed.,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aris, 1966.

BRAUNSTEIN, PHILIPPE. 'Venedig und der Türke (1480–1570).' In O. Pickl (ed.),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1971.

BRULEZ, WILFRIED. *De Firma della Faille en de Internationale Handel van Vlaamse Firma's in de 16e Eeuw.* In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No. 35, Brussels, 1959.

CERNOVODEANU, PAUL. *England's Trade Policy in the Levant 1660–1714.* Bibliotheca Historica Romaniae, Economic History Section, Studies, XLI:2, Bucharest, 1972.

CHAUDHURI, K. 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 1963.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60–1640. London, 1965.

'Treasure and Trade Balanc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Export Trade, 1660–172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 1968.

CHAUNU, H. and P.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I–V, Series Ports-Routes-Trafics, No. VI, Paris, S.E.V.P.E.N., 1959.

CHAUNU, PIERRE.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ème, XVIIème, XVIIIème siècles). 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et Indices d'Activité.* Series Ports-Routes-Trafics, No. XI, Paris, S.E.V.P.E.N., 1960.

CHRISTENSEN, AKSEL E.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around 1600. Studies in the Sound Toll Register and Dutch Shipping Records.* Copenhagen-The Hague, 1941.

CIPOLLA, CARLO M. *Money, 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6.

'Per una Storia della Produttività nei Secoli del Medioevo e del Rinascimento.' *Prato Conference Papers*, 1971 (mimeographed).

Città, mercanti, dottrine nell'economia europea dal IV al XVIII secolo. Saggi in memoria di Gino

Luzzatto. Biblioteca della Rivista Economia e Storia, XI, Milan, 1964.
COORNAERT, E. *Les Franço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 fin du XVe-XV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61.
CRAEYBECKX, J. 'Les François et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 1962.
Un grand commerce d'importation: les vins de France aux anciens Pays Bas, XIIIe-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58.
DAS GUPTA, ASHIN. *Malabar in Asian Trade*, 1740–1800. Cambridge South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1967.
DAVIS, RALPH.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954.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 1962.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2.
DELAFOSSE, MARCEL and LAVEAU, CLAUDE. *Le commerce du sel de Brouag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Cahiers des Annales, Paris: Colin, 1960.
DERMIGNY, LOUIS.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Series Ports-Routes-Trafics, XVIII, 4 vols., Paris, 1964.
DILLEN, J. G. VAN. 'Amsterdam als wereldmarkt der edele metalen in de 17de en 18de eeuw.' *De Economist*, LXXII, 1923. [646]
Van Rijkdom en Regenten. Handboek tot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 tijdens de Republiek. 's-Gravenhage, 1970.
ELLEHØJ, SVEND. 'Christian IV's tidsalder.' *Politikens Danmarkshistorie*, VII, Politikens Forlag, Copenhagen, 1964.
EMBER, GYÖZÖ. 'Ungarns Aussenhandel mit dem Westen um die Mitte des XVI. Jahrhunderts.'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FABER, J. A. *Drie Eeuwen Friesland, Economische en sociale ontwikkelingen van 1500 tot 1800*, I–II. *A. A. G. Bijdragen*, XVII, Wageningen, 1972.
'Het probleem van de dalende graanaanvoer uit de Oostzeelanden in de tweede helft van de zeventiende eeuw.' *A. A. G. Bijdragen*, IX, 1963.
FARNIE, D. A.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Atlantic, 1607–1783.'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 1962.
FISHER, F. J.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Dark Age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a*, N. S., XXIV, 1957.
FISHER, H. E. S. *The Portugal Trade. A Study of Anglo-Portuguese Commerce 1700–1770*. London, 1971.
FRIIS, ASTRID.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d the Cloth Trade. 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England in its Main Aspects 1603–1625*. Copenhagen-London, 1927.
FÜGEDI, ERIK. 'Der Aussenhandel Ungarns am Anfang des 16. Jahrhunderts.'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urope in the Russian Mirror. Four Lectures in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1970.
GLAMANN, KRISTOF. *Bryggeriets historie i Danmark indtil slutningen of det 19. århundrede*. Copenhagen, 1962.
'The Dan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Michel Mollat (ed.),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S.E.V.P.E.N., 1970.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The Hague, 1958.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1645–1736.'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1953.
Otto Thott's Uforgribelige Tanker om Kommerciens Tilstand. Et nationaløkonomisk Programskrift fra 1735. Københavns Universitets Fond til Tilvejebringelse af Læremidler, 1966.
'Studie i Asiatisk Kompagnis økonomiske historie 1732–1772.' *Historisk Tidsskrift* II: II, 1947–9.
GOUBERT, PIERRE. *Beauvais et les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Paris, S.E.V.P.E.N., 1960.

GOULD, J. D. *The Great Debasement. Currency and Economy in Mid-Tudor England.* Oxford, 1970.

HAMMARSTRÖM, INGRID. *Finansförvaltning och varuhandel 1504-1540. Studier i de yngre Sturarnas och Gustav Vasas Statshushållning.* Uppsala, 1956.

HASAN, AZIZA, 'The Silver Currency Output of the Mughal Empire and Prices in India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VI, 1969.

HECKSCHER, ELI F. *Merkantilismen. Ett led i den ekonomiska politikens historia.* I-II, Stock-holm, 1931.

HICKS, JOHN.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69.

HILDEBRAND, K.-G. 'Salt and Cloth in Swedish Economic Histo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1954.

HILDEBRANDT, REINHARD. *Die 'Georg Fuggerischen Erben'. Kaufmännische Tätigkeit und sozialer Status 1555-1600.* Schriften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VI Berlin, 1966.

HINTON, R. W. K.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t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9.

HOSZOWSKI, S. 'The Polish Baltic Trade in the 15th-18th Centuries.' *Polan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in Stockholm*, Warsaw, 1960.

HOUTTE, J. A. VAN.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vènement et apogée.' *Annales E. S. C.*, XVI, 1961.

【647】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de Lage Landen.* Antwerp-Zeist, 1964.

HROCH, MIROSLAV. 'Die Rolle des zentraleuropäischen Handels im Ausgleich der Handelsbilanz zwischen Ost-und Westeuropa 1550-1650.'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HUHNHÄUSER, A. 'Rostocks Seehandel von 1635-1648.'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Rostock*, VIII, Rostock, 1914.

JEANNIN, PIERRE. 'Les comptes du Sund comme source pour la construction d' indices généraux de l' 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Europe (XVIe-XVIIe siècles).' *Révue historique*, CCXXXI, 1964.

Les Marchands au XVIe Siècle. Collections Microcosme *Le Temps qui court*,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57.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XVIe siècl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II, 1956.

KELLENBENZ, HERMANN. 'Der kontinentale Handel zwischen Ost-und Westeuropa vom 15. Jahrhundert bis zum Beginn des Eisenbahnzeitalters.' *V. Int. Kongress der ökonomischen Geschichte, Leningrad, August 1970* (mimeographed).

'Der Pfeffermarkt um 1600 und die Hansestädte.'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XXIV, 1956.

Sephardim an der unteren Elb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vom Ende des 16. bis zum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 40. Wiesbaden, 1958.

Südosteuropa im Rahmen der europäischen Gesamtwirtschaft.' In O. Pickl (ed.),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1971.

Unternehmerkräfte im Hamburger-, Portugal-und Spanienhandel 1590-1625. Veröffentlgn. d. wirtschaftsgeschl. Forschungsstelle, X, 1954.

KERNKAMP, J. H. '"Straatfahrt": Niederländische Pionierarbeit im Mittelmeergebie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XVIII, 1965.

KHAN, S. A. *The East India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Oxford, 1923.

KIRCHNER, WALTHER.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Europe 1400 to 1800, Collected Essay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eries, XXXIII, Bloomington, Indiana, 1966.

KLAVEREN, JACOB VAN.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Spanien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Forschungen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 1960.

'Fiskalismus-Merkantilismus-Korruptio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ichte*, XLVII, 1960.

KLEIN, P. W. (ed.). *Van stapelmarkt tot welvaartsstaat.* Universitaire Pers Rotterdam, 1970.

De Trippen in de 17e eeuw. Een studie over het ondernemersgedrap op de Hollandse stapelmarkt. Assen, 1965.

KOBATA, A. '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II, 1965.

KOOY, T. P. VAN DER. *Hollands stapelmarkt en haar verval.* Amsterdam, 1931.

KRANNHALS, DITLEV. *Danzig und der Weichselhandel in seiner Blütezeit vom 16. zum 17. Jahrhundert.* Leipzig, 1942.

KULA, WITOLD. *Théorie Economique du Système Féodal. Pour un modèle de l'économie polonaise 16e–18e siècles.*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XV, Paris, 1970.

KUMLIEN, K. *Sverige och hanseaterna. Studier i svensk politik och utrikeshandel.*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a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s Handlingar, LXXXVI, Stockholm, 1953.

KUSKE, BRUNO.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Verflechtun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n Niederlanden bis zum 18. Jahrhundert.' *Köln, der Rhein und das Reich*, Cologne-Graz, 1956.

LANE, F. C. *Venice and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C. Lan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966.

LE ROY LADURIE, 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 S.E.V.P.E.N., 1966.

LEUR, J. C. VAN.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and Economic History.* Selected Studies on Indonesia by Dutch Scholars, I. Bandung, The Hague, 1955.

LÜTGE, F. *Struktur-Wandlungen im ostdeutschen und osteuropäischen Fernhandel des 14. bis 16. Jahrhunderts.* In Bayer. Akademie d. Wissenschaften, Philos. -Hist. Klasse, Sitzungsberichte, I, Munich, 1964. [648]

MACZAK, ANTONI. 'Der polnische Getreideexport und das Problem der Handelsbilanz (1557–1647).'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MAGALHÃES-GODINHO, VITORINO.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1969.

MAKKAI, LÁSZLÓ. 'Der ungarische Viehhandel 1550–1650.'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MALOWIST, M. 'Un essai d'histoire comparée: les mouvements d'expansion en Europ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 S. C.*, XVII, 1962.

'The Problem of the Ine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966.

'Les produits des pays de la Baltiqu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LII, 1960.

MAURO, FRÉDÉRIC. *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1570–1670).* Ports-Routes-Trafics, No. 10, Paris, S.E.V.P.E.N., 1960.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Model: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between 1500 and 18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61.

MEILINK-ROELOFSZ, M. A. P.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1962.

MELIS, FEDERIGO.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a dei secoli XIII–XVI.* Istituto Internazionale di Storia Economica 'F. Datini'. Firenze, 1972.

MICHELSEN, L. 'Het Kapitalisme te Antwerpen in de XVIIde en XVIIIde Eeuwen.' *Nederlandsche Historiebladen*, II, 1939.

MINCHINTON, W. E.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Editor's Introduction', London, 1969.

MOLLAT, MICHEL (ed.). *Le Rôle du Sel dans l'Histoire.* Publication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Paris-Sorbonne, Série 'Recherches', XXXVII, Paris, 1968.

MOLS, R.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s.* 2 vols., Gembloux-Louvain, 1954–6.

NAUDÉ, W. *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zu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

NORTH, D. C. and THOMAS, R. B.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II, 1970.

ODÉN, BIRGITTA. *Kopparhandel och statsmonopol. Studier i svensk handelshistoria under senare 1500-talet.* Kungl. Vitterhets Historia och Antikvitets Akademiens Handlingar, Historiska Serien, V. Stockholm, 1960.

Rikets uppbörd och utgift. Statsfinanser och finansförvaltning under senare 1500-talet. Bibliotheca Historica Lundensis, I, Lund, 1955.

ÖHBERG, ARNE. 'Russia and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I, 1955.

PACH, ZSIGMOND P. 'The role of East Central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Études historiques publiées à l'occasion du XIIIe Congre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I, Budapest, 1970.

Die Ungarische Agrarentwicklung im 16.-17. Jahrhundert. 1964.

PARRY, J. H.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2nd ed., London, 1966.

PEDERSEN, E. LADEWIG. *The Crisis of the Danish Nobility 1580-1660.* Odense, 1967.

PICKL, OTHMAR. 'Die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auf den Handel zwischen Ungarn und Italien im 16. Jahrhundert.'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Grazer Forschungen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 Graz, 1971.

'Der Handel Wiens und Wiener Neustadts mit Böhmen, Mähren, Schlesien und Ungarn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6. Jahrhunderts (mit einem Exkurs über den Ochsenhandel von Ungarn nach Venedig im letzten Viertel des 16. Jahrhunderts).'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ed.).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Türkenkriege.* Grazer Forschungen zur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I, Graz, 1971.

POSTHUMUS, N. W. *Nederlandsche Prijsgeschiedenis.* I, Leiden, 1943.

De Oosterse Handel te Amsterdam. Het oudst bewaarde koopmansboek van een Amsterdamse vennootschap betreffende de handel op de Oostzee 1485-1490. Leiden, 1953.

【649】

PRAKASH, OM.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50-1717.' Unpublished thesis, 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 1967.

PRICE, JACOB M. *The Tobacco Adventure to Russia. Enterpri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Quest for a Northern Market for English Colonial Tobacco 1676-1722.*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LI: I, Philadelphia, 1961.

RABE, HANNAH. 'Aktienkapital und Handelsinvestitionen im Überseehandel des 17. Jahrhundert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X, 1962.

RAMSEY, G. D. *English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Centuries of Emergence.* London, 1957.

RAU, VIRGINIA. *A exploração e o commercio do sal de Setúbal.* Lisbon, 1951.

RAYCHAUDHURI, TAPAN. *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1605-1690. A Study in the Interrelations of European Commerce and Traditional Economic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deel 38, The Hague, 1962.

ROOVER, RAYMOND DE. *L'Évolution de la Lettre de Change, XIVe-XVIIIe Siècles.*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no. IV,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VIe Section, Paris, 1953.

RUIZ-MARTIN, F.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No. 27, Paris, S.E.V.P.E.N., 1965.

SAMSONOWICZ, HENRYK. 'Les foires en Pologne au XVe et XVIe siècles sur la toile de fond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n Europe.'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SCHOLLIERS, E. *Loonarbeid en honger. De levensstandaard in de XVe en XVIe eeuw te Antwerpen.* Antwerp. 1960.

SILVA, J. GENTIL DA. *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Lettres Marchandes des Rodriques d'Evora et Veiga.* Paris, S.E.V.P.E.N., 1956.

'Trafics du Nord, marchés du Mezzogiorno, finances gênoises: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Ième siècle.' *Revue du Nord*, April-June 1959.

SLICHER VAN BATH, B. H. 'Die europäischen Agrarverhältnisse im 17. und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 *A. A. G. Bijdragen*, XIII, 1965.

'Les problèm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pré-industrielle en Europe occidentale. Une orientation et un programme. ' *A. A. G. Bijdragen*, XII, 1965.

SMOUT, T. C. 'Scottish Commercial Factors in the Baltic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1960.

Scottish Trade on the Eve of Union, 1660–1707. Edinburgh, 1963.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 Océan Indien. Paris, S.E.V.P.E.N., 1972.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I-III, 1927–8.

SOOM, ARNOLD. 'Der Kampf der baltischen Städte gegen das Fremdkapital im 17. Jahrhundert.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X, 1962.

SPERLING, J.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Mechanis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62.

SPOONER, F. C. *L' 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Series Monnaie, Prix, Conjoncture, IV, Paris, 1956.

STEENSGAARD, NIELS. *Carracks, Caravans and Companies: The structural crisis in the European-Asian trad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17, Studentlitteratur, Lund, 1973.

SUPPLE, B. 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A Study in the Instability of a Mercantile Economy.* Cambridge, 1959.

TOPOLSKI, JERZY. 'La Re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TVEITE, STEIN. *Engelsk-norsk trelasthandel 1640–1710.* Bergen-Oslo, 1961.

UNGER, W. S. 'Trade through the Soun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 1959.

VINER, JACOB.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printed, London, 1964.

VLACHOVIČ, JOZEF. 'Produktion und Handel mit ungarischem Kupfer im 16. und im ersten Viertel des 17. Jahrhunderts. '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eleuropas*, 1971.

VOGEL, WALTHER. 'Handelskonjunkturen und Wirtschaftskrisen in ihrer Auswirkung auf den Seehandel der Hansestädte 1560–1806. ' *Hansische Geschichtsblätter*, LXXIV, 1956. [650]

VRIES, J. DE. *De Economische Achteruitgang der Republiek in de Achtiende Eeuw.* Amsterdam, 1959.

WEBER, MAX. *Wirtschaftsgeschichte. Abriss der universal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Ed. S. Helmann and M. Palyi, 3rd ed. rev. J. Winckelmann, Berlin, 1958.

WEE, HERMAN VAN DER. 'Een dynamisch Model voor de seculaire Ontwikkeling van de Wereldhandel en de Welvaart (12e–18e eeuw). ' *Historische Aspecten van Economische Groei*, Antwerp-Utrecht, 1972.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I-III, The Hague, 1963.

'Typologie des crises et changements de structure aux Pays-Bas (XVe–XVIe siècles). ' *Annales E. S. C.*, XIX, 1963.

WIESE, HEINZ. 'Die Fleischversorgung der nordwesteuropäischen Grosstädte von XV. bis XIX. Jahrhunde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internationalen Rinderhandels. '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CLXXIX, 1966.

and BÖLTS. *Rinderhandel und Rinderhaltung im nordwesteuropäischen Küstengebiet vom 15. bis zum 19. Jahrhundert.* 1966.

WILLAN, T. S. *Studies in Elizabethan Foreign Trade.* Manchester, 1959.

WILSON, CHARLES.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II, 1960.

England' 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1965.

Profit and Power. A Study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Wars. London, 1957.

WOLÁNSKI, MARIAN, 'Schlesiens Stellung im Osthandel vom 15. bis zum 17. Jahrhundert. ' In I. Bog (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WYCZAŃSKI, ANDRZEJ. 'La base intérieure de l' exportation polonaise des céréales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In I. Bog(ed.), *Der Aussenhandel Ostmitteleuropas*, 1971.

第五章 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

原始资料

AMZALAK, M. B. *O economista Isaac de Pinto, o seu 'Tratado da circulação e do credito', e outros escritos económicos* (1771). Lisbon, 1960.

BALDASSERONI, COMTE P. *Leggi e costumi del cambio che si osservano nelle principali piazze di Europa e singularmente in quella di Livorno*. Pescia, 1784.

BARRÊME, F. *Le Livre des monnoyes étrangères ou le grand banquier de France. Dédié a Monsieur Colbert*. Paris, 1685.

BELLONI, C. *Dizionario storico dei banchieri italiani*. Florence, 1951.

BIGWOOD, G. and GRUNZWEIG, A. (eds.). *Les Livres des comptes des Gallerani*. 2 vols. Brussels, 1961.

BLOK, P. J. (ed.). *Relazioni Veneziane. Venetiaansche berichten over de Vereenigde Nederlanden van 1600–1795*. The Hague, 1909.

BOISGUILLEBERT. P. DE.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Ed. E. Daire. Paris, 1843.

BORLANDI, F. *El libro di mercatantie et usanze de' paesi*. Turin, 1936.

BOYER, C. *Briefve méthode et instruction pour tenir livres de raison par parties doubles, en laquelle se voit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s négoces que faict Lyon en toutes les principales villes d'Europe*. Lyons, 1627.

BRANTS, V. (ed.). *Les Ordonnances monétaires du XVIIIe siècle. Albert et Isabelle, 1598–1621...* Brussels, 1914.

BUONINSEGNI, T. *Trattato dei cambi*. Florence, 1573.

Capitoli delle fieri di qualsivoglia sorte di mercanzia nella città di Piacenza rinovati 1685. Piacenza, n. d.

CASSANDRO, G. *Un trattato inedito e la dottrina dei cambi nel cinquecento*. Naples, 1962.

CHAPPUZEAU, S. *Lyon dans son lustre*. Lyons, 1656.

CHAUNU, H. and P.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8 vols. Paris, 1955–60.

[651] CLEIRAC, E. *Usance du négoce ou commerce de la Banque des lettres de change*. Paris, 1659.

COPPI, A. *Dissorso sulle finanze dello Stato Pontificio dal secolo XVI al principio del XIX*. Rome, 1855.

DAVENANT, C.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other Trade of England...* 2 vols. London, 1698.

DENUCÉ, J. *Inventaire des Affaitadi, banquiers italiens à Anvers de l'année 1568*. Antwerp-Paris, 1934.

Koopmansleerboeken van de XVIe en XVIIe eeuwen in handschrift.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ch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III, no. 2.) Antwerp-Brussels-Ghent-Louvain, 1941.

DILLEN, J. G. VAN. *Bronnen tot de Geschiedenis der Wisselbanken: Amsterdam, Middelburg, Delft, Rotterdam*. (Rijks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ën, no. 59–60.) 2 vols. The Hague, 1925.

DUTOT. *Réflexions politiques sur les finances et le commerce*. Integral edition by Paul Harsin. 2 vols. Paris, 1935.

FERRARA, F.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i banchi veneziani.' *Archivio veneto*, 1871.

FISHER, F. J. (ed.). *Calendar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Lord Sackville of Knole, Sevenoaks, Kent*. II (Great Britai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London, 1966.

GIRAUDEAU. *Le Guide des Banquiers de l'Europe*. Paris, 1727.

GUERAUD, J. *La Chronique lyonnaise de Jehan Gueraud, 1536–1562. publié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une table par Jean Tricou*. Lyons, 1929.

GUICCIARDINI, L. *Description de tout le Pays-Bas*. Antwerp, *1567*.

HARSIN, P. (ed.). *Oeuvres complètes de John Law (avec préface de P. Harsin)*. *3* vols. Paris, 1934.
HEERS, J. *Le Livre de comptes de Giovanni Piccamiglio, homme d'affaires génois 1456–1459*. Paris, 1959.
HOC, M. (ed.). *Placards monétaires de Philippe II (1555–1598). des archiducs Albert et Isabelle (1598–1621), de Philippe IV (1621–1665) et de Charles II (1665–1700)*. *3* vols. Brussels, 1934.
IRSON, C. *Pratique générale et méthodique des changes étrangers*. Paris, 1687.
KLARWILL, V. *Fugger-Zeitungen: Ungedruckte Briefe an das Haus Fugger aus den Jahren 1568–1605*. Vienna-Leipzig-Munich, 1923.
LA PORTE, SIEUR DE. *Le Guide des négocians et teneurs de livres*. Paris, 1685.
LAFFEMAS, B. DE. *Les Trésors et richesses pour mettre l'Estat en splendeur*. Paris, 1598.
Advertissement et réponse aux marchands et autres, où il est touché des changes, banquiers et banque-routiers. Paris, 1600.
LAMEERE, J. P. A. (ed.). *Recueil des ordonnances des Pays-Bas, 1506–1555*. 2nd Ser. *6* vols. Brussels, *1893–1922*.
LAPEYRE, H.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foires de Lyon. Extrait de Homenaje à D. Ramon Carande*. Madrid, 1963.
LE BRANCHU, J. Y. (ed.). *Ecrits notables sur la monnaie (XVIe siècle: de Copernic à Davanzati)*. 2 vols. Paris, 1934.
LE GENDRE, F. *L'arithmétique en sa perfection*. Paris, 1663.
LE MOINE DE LESPINE, SIEUR. *Le Négoce d'Amsterdam ou traité de sa banque*. Amsterdam, 1694.
LECOUREUR, J. *Traité de la pratique des billets entre négocians*. Louvain, 1682.
LEFÈVRE, J. (ed.). *Correspondance de Philippe II sur les affaires des Pays-Bas (1577–1591)*. VII, Brussels, 1940.
LUYPAERT-DE COMBELE, O. 'Een onuitgegeven Spaanse memorie over theorie en praktijk van het krediet in de 16e eeuw.'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 CXXVI, 1960.
MALYNES, G. *Consuetudo vel lex mercatoria, or the Ancient Law-Merchant...* London, 1622.
MARECHAL, M. *Traicté des changes et rechanges licites et illicites et moyens de pourvoir aux fraudes des banque-routes*. Paris, 1625.
MARIUS, *J. Advice concerning Bills of Exchange*. 4th ed. 1651.
MATTHEWS, G. T. *News and Rumor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Fugger News-letters*. New York, 1959.
MENNHER, V. *Praitique brifue pour cyfrer et tenir liures de comptes touchant le principal train de marchandises*. Antwerp. 1550. [652]
MISSELDEN, E. *Free trade or the Meanes to make Trade florish*. London, 1622.
MOLLAT, M. and FAVREAU, R. *Comptes généraux de l'Etat bourguignon entre 1414 et 1420*.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 la France, directed by R. Fawtier, Documents Financiers, V: I.) Paris, 1965.
MÜLLER, K. O. *Welthandelsbräuche (1480–1540)*. Reprinted Wiesbaden, 1962.
MUN, T.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or The Bal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n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Edited by his son John Mun. London, 1664.
PEELE. J. *The Patheway to Perfectnes in the Accomptes of Debitour and Creditour*. London, 1569.
PEGOLOTTI, F. B.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Lisbon-Lucca, 1766.
PERI, G. D. *Il negotiante di... diviso in quattro parti (1638, 1647, 1651, 1672–1673)*. Venice, 1682.
PHOONSEN, J. *Wisselstijl tot Amsterdam*. Amsterdam, 1711.
Les loix et les coutumes du change des principales places de l'Europe... Amsterdam, 1715.
PINTO, I. DE. *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edit...* Amsterdam, 1771.
POSTHUMUS, N. W.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I. Leyden, 1946.
Privilèges des Foires de Lyon, octroyez par les roys très-chrestiens aux marchands français et estrangers y négocians sous lesdits privilèges ou residans en ladite ville. Lyons, 1649.
REATZ, C. F. *Ordonnances du duc d'Albe sur les assurances maritimes de 1569. 1570.*

1571(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9th Ser.,v). Brussels,1878.

Recueil des Edits, Déclarations,Arrests et Règlements du Roy,au sujet des Lettres,Billets de Change et Billets payables au Porteur et concernant les Faillites et Banqueroutes. Depuis 1684 jusqu' à present. Rouen,1718.

RICARD,J.-P. *Le Négoce d' Amsterdam.* Amsterdam,1722.

RICARD,S. *Le Nouveau Négociant contenant les réductions toutes faites des mesures,poids et monnoyes de France.* Bordeaux,1686.

ROSA,L. DE. *I cambi esteri del Regno di Napoli dal 1591 al 1707.* Naples,1945.

RUIZ-MARTIN,F.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Paris, 1965.

SACCIA,S. *Tractatus de commerciis et cambio.* Frankfurt-on-Mainz,1648.

SAVARY,J. *La Théorie et pratique des nombres méthodiquement proposée dans l' usage des financiers.* Paris,1644.

Le Parfait Négociant,ou instruction générale pour ce qui regarde le commerce... Paris,1675.

SAVARY DES BRUSLONS,J.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commerce.* 5 vols. Copenhagen,1759-65.

SEGARD,R. *La Pratique des changes contenante la façon de prester et changer licitement avec l' extrait des décisions de la roue de Gênes.* Lille,1613.

SILVA,JOSÉ GENTIL DA. *Marchandises et finances.* II-III. *Lettres de Lisbonne, 1563-1578.* 2 vols. Paris,1959 and 1961.

STOURM,R.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1895.

STRIEDER,J. *Die Inventar der Firma Fugger aus dem Jahre* 1527.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Suppl. XVII.) Tübingen,1905.

TAWNEY,R. H. and POWER,E. (eds.). *Tudor Economic Documents,being selecte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England.* 3 vols. London-New York-Toronto,1951.

TERLINDEN,C. *Liste chronologique provisoire des édits et ordonnances des Pays-Bas. Règne de Philippe II(1555-98).* Brussels,1912.

TERLINDEN,C. and BOLSEE,J. (eds.). *Recueil des ordonnances des Pays-Bas.* Brussels,1957.

Tresoir vande maten,van gewichte van coren,vande elle ende natte mate,oock vanden gelde ende wissel. Amsterdam,1590.

TURRI,RAPHAËL DE. *Tractatus de cambiis.* Genoa,1641.

UZZANO,G. A. DA.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1442). Lisbon-Lucca,1766.

VASQUEZ DE PRADA,V. *Lettres Marchandes d' Anvers.* II-IV. Paris,n. d.

VERCAUTEREN. E. 'Note sur les opérations financières de Charles Quint dans les Pays-Basen 1523.' *Revue historique*,CLXXI,1958.

VILLALON,C. DE. *Provechoso tratado de marcaderes y reprovacion de usura.* (Photographic [653] reproduction of the edition of 1546.) Valladolid,1945.

WHEELER,J. *A Treatise of Commerce.* Ist ed. Middelbourg and London,1601(reprinted,New York,1931).

WILSON,T. *A Discourse upon Usur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H. Tawney. London, 1962.

研究文献

AMSTAD,R. *Des Conceptions monétaires et bancaires en France et de la pratique des banques à Lyon de 1660 à 1720.* Basle,1949.

ANDREADES,A. *Essai sur la fondation et l' histoire de la Banque d' Angleterre(1694-1844).* Paris, 1901.

ANDRIANI,G. *Le fiere di cambio genovesi.* Genoa-Sampiedarena,1931.

ARMINJON,P. and CARREY,P. *La Lettre de change et le billet à ordre.* Paris,1938.

ARNOULD,M. A. 'L' impôt sur le capital en Belgique au XVIe siècle.' *Le Hainaut économique*,I, 1946.

'L' Incidence de l' impôt sur les finances d' un village à l' époque bourguignonne: Beussoit-

sur-Haine, 1400–1555. ' *Contributions à l'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 Brussels, 1962.
'L' Impôt dans l' histoire des peuples. ' *L' Impôt dans le cadre de la ville et de l' Etat.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pa 6–9 Septembre 1964. Actes.* (Collection d' Histoire, XIII.) Brussels, 1966.
'Prolégomènes à l' étud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es Pays-Bas espagnols. ' *Recherches sur l' his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Belgique.* (*Acta Historica Bruxellensia*, II.) Brussels, 1970.
ASHLEY, M.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Policy under the Cromwellian Protectorate.* London, 1962.
ASHTON, R. *The Crown and the Money Market, 1603–1640.* Oxford, 1960.
BABBIERI, G. *Origini del capitalismo lombardo.* Milan, 1961.
BADALO-DULONG, C. *Banquier du roi. Barthélemy Hervart, 1606–1676.* Paris, 1951.
BAETENS, R. 'Een Antwerps handelshuis uit de XVIIe eeuw. De firma Van Colen. '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1960.
BARATIER, E. and REYNAUD, F.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I: *1291 –1480.* Paris, 1951.
BARBOUR, V.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17th Century.* Ann Arbor, 1963.
BARTIER, J. *Légistes et gens de finances au XVe siècle. Les conseillers des ducs de Bourgogne, Philippe le Bon et Charles le Téméraire.* (Mémoires de l'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no. 50.) Brussels, 1955.
BARUCHELLO, M. *Livorno e il suo porto.* Livorno, 1932.
BASAS FERNANDEZ, M. 'Burgos en el comercio lanero del siglo XVI. ' *Moneda y crédito*, LXXVII, 1961.
BENASSI, U. 'Per la storia delle fiere dei cambi. ' *Bolletino storico piacentino*, X, 1915.
BENNASSAR, B. 'En Vieille-Castille, les ventes de rentes perpétuelles.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1960.
Valladolid au siècle d' or. Une ville de Castille et sa campagne au XVIe siècle. Paris-The Hague, 1967.
BERGIER, J.– F. *Genève et l' économie européenne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1963.
Zu den Anfängen des Kapitalismus: das Beispiel Genf. (Kölner Vortäg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X.) Cologne, 1972.
'La dynamique de la banque privée. ' *Quarta Settimana di Studio: Credito, Banche e Investimenti, Secoli XIII–XX. Prato, 14–21 Aprile* 1972. Xerox copy.
BIGWOOD, G. *Le régime juridique et économique du commerce de l' argent dans la Belgique du Moyen Age.* (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Mémoires, 2nd Ser., XIV.) 2 vols, Brussels, 1921–2.
BISSCHOP, W. R. *The Rise of the London Money Market, 1640–1826.* (3rd ed.) London, 1968.
De opkomst der Londensche geldmarkt, 1640–1826. The Hague, 1896.
BLOCH, M. 'Le problème de l' or au Moyen Age. ' *Annal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3.
'Les mutations monétaires. ' *Annales: E., S., C.*, 1953.
Esquisse d' 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 Europe. Paris, 1954. 【654】
BOGUCKA, M. 'Les dernières recherches sur l' histoire de la Baltique. '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Handel zagraniczny Gdańska w pierwszej Polowie XVII wieku. Wrocław-Warsaw-Cracow, 1970.
'L' emploi des lettres de change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crédit à Gdansk, au cours de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in Polish). *Roczniki Dziejów Społecznych I Gospodarczych*, XXXIII, 1972.
'Amsterdam and the Bal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I, 1973.
BONZON, A. 'La Banque à Lyon aux XVI, XVII et XVIIIe siècles. ' *Revue d' histoire de Lyon*, I–II, 1902–3.
BOREL, F. *Les foires de Genève au XVe siècle.* Geneva-Paris, 1892.
BOSHER, J. F.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e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1970.
BOUVIER, J. and GERMAIN-MARTIN, H. *Finances et financiers de l' Ancien Régime.* (*Quesais-je?*) 2nd ed., Paris, 1969.

BRAAMCAMP FREIRE, A. *Noticias da Feitoria de Flandres* (Arquivo Historico Português). Lisbon, 1920.

BRAUDEL, F.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 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 En relisant Earl J. Hamilton. De l' Histoire d' Espagne à l' Histoire des prix. ' *Annales d' histoire sociale*, 1951.

' Le pacte de ricorsa au service du roi d' Espagne et de ses prêteurs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Milan, 1957.

and LABROUSSE, 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1660-1789.* Paris, 1970.

and ROMANO, R.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 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1951.

and SPOONER, F. '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Ed. by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Cambridge, 1967.

and SILVA, JOSÉ GENTIL DA. '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et prises de conscience: quelques témoignages sur le XV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1959.

and JEANNIN, P., MEUVRET, J., ROMANO, R. ' Le déclin de Venise au XVIIe siècle. Aspetti e cause del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 *Civilità veneziana. Studi*, 9. Venice-Rome. n. d.

BRESARD, M. *Les foires de Lyon au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14.

BRIDREY. E. *La théorie de la monnaie au XIVe siècle. Nicole Oresme, étude d' histoire des doctrines et des faits économiques.* Paris, 1906.

BRISMAN, S. ' Den Palmstruchska Banken(1657-1668). ' *Sveriges Riksbank, 1668-1918*, edited by C. Hallendorff, I. Stockholm, 1918.

BRULEZ, W. ' Les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de la ville de Saint-Omer dans le troisième quart du XV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1952.

' De wisselkoersen te Antwerpen in het laatste kwart van de 16e eeuw. '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XI, 1956.

De Firma Della Faille en de internationale handel van Vlaamse firma' s in de 16e eeuw.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Klasse der Letteren. Verhandelingen, no. 35.) Brussels, 1959.

' The Balance of Trade of the Netherlands. '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IV, Leyden, 1970.

BUCKLEY, H. ' Sir Thomas Gresham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s. ' *The Economic Journal*, XXXIV, 1924.

BUIST, M. G. *At Spes Non Fracta: Hope & Co. , 1770-1817, Merchant Bankers and Diplomats at Work.* The Hague, Nijhoff, 1974, VIII, 716f.

BUYTEN, L. VAN. ' Politieke en administratief-technische aspecten van het stedelijk financiewezen in de Zuidelijke Nederlanden tijdens de XVIIe en XVIIIe eeuw. ' *Handelingen van het 41ste Congres van de federatie van de Kringen voor Oudheidkunde en Geschiedenis van België, Mechelen, 3-6 november 1970.* Vol. II. Malines, 1971.

CAHN, J. ' Der Strassburger Stadtwechsel.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ältesten Banken in Deutschland. '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 XIV, 1899.

CAILLET, L. *Note sur le mode de paiement des tailles royales à Lyon et la circulation des monnaies étrangères dans cette ville sous Charles VII et Louis XI.* Châlon-sur-Saône, 1908.

[655] *Etude sur les relations de la commune de Lyon avec Charles VII et Louis XI (1417-1483).* Lyons-Paris, 1909.

' Lyon et les Lucquois. ' *Revue d' histoire de Lyon*, VIII, 1909.

CAIMATI, R. ' L' attività bancaria a Siena nel seicento attraverso la ricostruzione e l' analisi statistica di cento bilanci del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 ' *Archivi Storici delle Aziende di Credito.* I. Rome, 1956.

CALDERON QUIJANO, J. A. *El Banco de San Carlos y las comunidades de Indios de Nueva España.* Madrid, 1963.

CARANDE, R.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2 vols. Madrid, 1941-9.

El credito de Castilla en el precio de la politica imperial. Madrid, 1949.

'Das Westindische Gold und die Kreditpolitik Karls V.' *Spanische Forschungen des Görresgesellschaft* ,I,10. Münster(Westphalia)1955.

CARRERA,PUJAL,J. *Historia de la economia española.* 5 vols. Barcelona,1943-7.

CARRIÈRE,C.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au XVII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économies maritimes.* 2 vols. Marseilles. 1973.

CASTELOT,E. 'Les bourses financières d'Anvers et de Lyon au XVIe siècle.'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XXXII,1898.

CASTILLO,A. 'Dans la Monarchie Espagnole du XVIIe siècle: les banquiers Portugais et le circuit d'Amsterdam.' *Annales :E.,S.,C.*,XIX,1964.

'Population et"richesse"en Castille dur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Annales :E.,S., C.*, XX,1965.

CAUWÈS,P. 'Les commencements du crédit public en France;les rentes sur l'Hôtel de Vill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IX-X,1895-6.

CHABOD,F. *Note e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economica-finanziaria dell'Impero di Carlo V.* Padua,1937.

CHAMBERLAND,A. 'Le budget de l'Epargne en 1607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Revue Henri IV* ,II:5,1908.

CHANDLER,G. *Four centuries of Banking as illustrated by the Bankers,Customers and Staff associated with the constituent Banks of Martins Bank Limited.* I.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Liver Bird. Liverpool and London.* London,1964.

Charles Quint et son temps.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Sciences humaines,Paris 30 septembre-3 octobre 1958.)Paris,1959.

CHARLETY,S. 'Le voyage de Louis XIII à Lyon en 1622. Etude sur les relations de Lyon et du pouvoir central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1952-1622)'.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1900-1.

Histoire de Lyon.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Lyons,1903.

CHARPIN-FEUGEROLLES,COMTE DE. *Les Florentins à Lyon* . Lyons,1889.

CHAUDHURI,K. 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xport of Treasur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VI,1963.

CHAUNU,P. 'Séville et la"Belgique",1555-1648.' *Revue du Nord* ,XXXXII,1960.

CIPOLLA,C. M. *Studi di Storia della moneta.* I. *I movimenti dei cambi in Italia dal secolo XIII al XV.* (Pubblicazioni della Università di Pavia. Studi nelle Scienze Giuridiche e Soziale,no. 101)Pavia,1948.

'Note sulla storia del saggio d'interesse. Corso,dividendi e sconto dei divendi del banco di S. Giorgio nel sec. XVI.' *Economia internazionale* ,V,1952.

Mouvements monétaires dans l'état de Milan (1850-1700). Paris,1952

Money,Prices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Fif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1956.

Le avventure della lira. Milan,1958.

'Aspetti e problemi nell'economia milanese e lombarda nei secoli XVI, XVII.' *Storla di Milano*,XI. *Il declino spagnolo,1630-1706* . Milan,1958.

CLAPHAM,J. *The Bank of England. A History,1694-1914* . 2 vols. Cambridge,1944.

CLARK,G. 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2nd ed. ,Oxford,1960.

CLERJON,P. *Histoire de Lyon depuis sa fondation jusqu'à nos jours.* 7 vols. Lyons,1829-45.

COLE ,C. W.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2 vols. New York,1939.

COORNAERT. E. 'La genèse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grand capitalisme et économie traditionnelle à Anvers au XVIe 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II,1936. [656]

'Caractères et mouvements des foires internationales au Moyen-Age et au XV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 milan,1957.

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fin XVe et XVIe siècles)* . 2 vols. Paris, 1961.

COUDY,J. 'La"Tontine Royalle"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XXI, 1957.

Courtols, A. *Histoire des banques en France*, 2nd ed., Paris, 1881.

Cozzi, G. *Il doge Nicolò Contarini. Ricerche sul patriziato veneziano agli inizi del seicento*. Venice-Rome, 1958.

Craeybeckx, J. 'Aperçu sur l'histoire des impôts en Flandre et au Brabant au cours du XVIe siècle.' *Nord*, XXIX, 1947.

'La portée fiscale et politique du Iooe denier du duc d'Albe.'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Belgique*. I. Brussels. 1967.

Cuneo, C. *Memorie sopra l'antico debito publico. Mutui, Compere e banca di S. Giorgion in Genova*. Genoa, 1842.

Cusumano, V. *Storia dei Banchi della Sicilia*. I. *Banchi privati*. Rome, 1887.

Dahlgren, W. *Louis de Geer. hans Lif och Verk*. 2 vols. Uppsala. 1923.

Daire, E. *Economistes français du siècle*. Paris. 1843.

Davis, R.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Economies*. (World Economic History. General Editor, C. Wilson.) London, 1973.

Delumeau, J. 'Le problème des dettes à Rom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V. 1957.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59.

L'alun de Rome. XVe-XIXe siècle. Paris, 1962.

Demarco, D. 'Quelques moments de l'histoire des banques publiques napolitaines des origines à 1808.'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roceedings*. Paris-The Hague, 1974.

Denucé, J. 'De Beurs van Antwerpen. Oorsprong en eerste ontwikkeling.' *Antwerpsch Archievenblad*. 2nd Ser., VI, 1931.

Italiaansche koopmansgeslachten te Antwerpen in de XVIe-XVIIIe eeuwen. Malines-Amsterdam, 1934.

De Hanze en de Antwerpsche handelscompagnieën op de Oostzee-landen. Antwerp, 1938.

Despy, G., *et al.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Belgique*. (Acta Historica Bruxellensia: travaux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e l'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II.) Brussels. 1970.

Deyon, P. *Le mercantilisme*. Paris. 1969.

Dickson, P. G. 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New York, 1967.

Dietz, A. *Frankfurter Handelsgeschichte*. 4 vols. Frankfurt, 1910-21.

Dietz, F. C. 'The Receipts and Issues of the Exchequer during the Reign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XIII: 4. Northampton, 1928.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485-1641, 2 vols. 2nd ed., London, 1964.

Dilis, É. 'Les courtiers anversois.' *Annal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archéologie de Belgique*, 6th ser. 1910.

Dillen, J. G. van. 'Een boek van Phoonsen over de Amsterdamsche Wisselbank.'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VII The Hague, 1921.

'Amsterdam als wereldmarkt der edele metalen in de 17e en 18e eeuw.' *De Economist*, II, 1923.

'Amsterdam marché monétaire des métaux précieux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Revue historique*, CLII, 1926.

'La Banque d'Amsterdam.'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XV, 1928.

'De Girobanken van Genua, Venetië en Hamburg.'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XLII, 1927.

(ed.).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of the History of Banking and Credit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banking.) The Hague, 1934.

[657] 'De opstand en het Amerikaanse zilver.' *Tijdschift voor Geschiedenis*, LXXIII, 1960.

Mensen en achtergronden. Studies uitgegeven ter gelegenheid van de tachtigste verjaardag van de schrijver. (Historische Studies uitgegeven vanwege het instituut voor geschiedenis der rijksuni-

versiteit te Utrecht, no. 19.) Groningen, 1964.
Van Rijkdom en Regenten. Handboek tot de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 tijdens de Republiek. The Hague, 1970.
DOMINGUEZ ORTIZ, A. *Politica y hacienda de Felipe IV.* Madrid, 1960.
DONNET. F. *Coup d'oeil sur l'histoire financière d'Anvers au cours des siècles.* Antwerp, 1927.
DOUCET, R. 'L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en 1614.'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VIII: 2, 1930.
'Le "Grand Parti" de Lyon au XV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LXXI. CLXXII, 1933–4.
Finances municipales et crédit public à Lyon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37.
'La Banque en Franc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XXIX: II, 1951.
DUBY, G.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France, Angle-terre, Empire, LXe-XVe siècles). Essai de synthèse et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s*. 2 vols. Paris, 1962.
EHRENBERG, R. *Hamburg und England im Zeitalter der Königin Elisabeth*. Jena, 1896.
Das Zeitalter der Fugger. Geldkapital und Kreditverkehr im 16. Jahrhundert. 2 vols. 2nd ed.. Hildesheim, 1963.
EINAUDI, L. 'Teoria della moneta immaginaria nel tempo di Carlomagno alla rivoluzione francese.'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I: I 1936.
EMMANUELLI, R. *Gênes et l'Espagne dans la guerre de Corse, 1559–1569.* Paris, 1964.
ENDEMANN, W. *Studien in der romanisch-kantonistischen Wirtschafts-und Rechtslehre bis gegen Ende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 2 vols. Berlin, 1874–83.
ENNO VAN GELDER, H. *Munthervorming tijdens de Republick, 1659–1694.* Amsterdam, 1949.
ESPEJO, C. and PAZ, J. *Las antiquas ferias de Medina del Campo*. Valladolid, 1908.
ESPINAS, G. *Les finances de la commune de Douai des origines au XVe siècle.* Paris, 1902.
EVERAERT, J. *De internationale en koloniale handel der Vlaamse firma's te Cadiz, 1670–1700.* Bruges, 1973.
FAVREAU, R. 'Les changeurs du royaum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 CXXII, 1964.
FEAVEARYEAR, A. *The Pound Sterling. A History of English Money*. (2nd ed., rev. by E. Victor Morgan.) Oxford, 1963.
FELLONI, G. *Gli investimenti finanziari genovesi in Europa tra il Seicento e la Restaurazione.* Milan, 1971.
FILANGIERI, R. *I banchi di Napoli dalle origini alla costituzione del Banco delle Due Sicilie (1539–1808)*. Naples. 1940.
FOURNIAL, É. 'Réalités monétaires et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Annales: E., S., C.*, 1958.
FOURQUIN, G.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Paris, 1969.
FRIEDMANN, E. *Der mittelalterliche Welthandel von Florenz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Ausdehnung (nach der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des Balducci Pegolotti)*. Abhandlungen der K. K. geograph. Gesellschaft in Wien, x: 7, 1912.
FRIIS, A.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 The two Crises in the Netherlands in 1557.'
The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 2, 1953.
FRIIS, A. and GLAMANN, K.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Wages in Denmark (1660–1800)*. I. London, Now York, Toronto, 1958.
FUCHS, R. *Der Bancho Puhlico zu Nürnberg*. (Nürnberger Abhandlungen zu den Wirtschaf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no. 6.) Berlin, 1955.
GANDILHON, R.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ouis XI*. Rennes, 1940.
GASCON, R. F. 'Nationalisme économique et géographie des Foires. La querelle des Foires de Lyon (1484–1494).' *Cahiers d'histoire publiés par les universités de Clermont-Lyon-Grenoble*, III 1956.
'Les Italiens dans la renaissance économique lyonnais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es études italiennes.* V, 1958.
'Quelques aspects du rôle des Italiens dans la crise des foires de Lyon du dernier tiers du

XVIe siècle. ' *Cahiers d' histoire*, v, 1960.

[658]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XVIe siècle :Lyon et ses marchands.* 2 vols. Paris, 1971.

GASKIN, M. *The Scottish Banks. A Modern Survey.* London, 1965.

GENEVET, A.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des Agents de change de Lyon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 à l' établissement du Parquet en 1845* . Lyons, 1890.

GIESEKING, H. ' Das Bankwesen in Genua und die Band von S. Giorgio. '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 edited by J. G. van Dillen. The Hague, 1934.

GIOFFRE, D. *Gênes et les foires de change. De Lyon à Besançon* . Paris, 1960.

GIRARD, A. ' La guerre monétaire, XIVe-XVe siècles. ' *Annales d' histoire sociale*, XX: III-IV, 1940.

GIRY, D. *A la recherche des traditions bancaires de l' Occident méditerranéen.* Montreal, 1965.

GLAMANN, K.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 Copenhagen-The Hague, 1958.

' European Trade, 1500–1750. '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 II. London, 1974.

GODDING, P. *Le droit foncier à Bruxelles au Moyen-Age.* (Etudes d' histoire et d' ethnologie juridiques. no. I.) Brussels. 1960.

GOLDSCHMIDT, L.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s.* 3rd ed. , Stuttgart, 1891.

GOMEL, C. *Les causes financièr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892 and 1893.

GORIS, J. A. *Etude sur les colonies marchandes méridionales(Portugais, Espagnols, Italiens) à Anvers de 1477 à 1567. Contribution à l' histoire des début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 Louvain, 1925.

GOUBERT, P. *Beauvais et la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 Paris, 1960.

GREPPI, E. ' Il Banco di S. Ambrogio. '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x. 1883.

GRICE-HUTCHINSON. M.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1952.

GROOTE, H.L.V.DE. ' Zestiende-eeuwse Antwerpse boekhoudingen en cijfermeesters. ' *Scientiarum Historia* , II-III, 1960–1.

' De" arithmêtique" van Mellema. ' *Scientiarum Historia*, v, 1963.

' De Zestiende-eeuwse Antwerpse schoolmeesters. ' *Bijdragen tot de Geschiedenis inzonderheid van het oud Hertogdom Brabant(Antwerpen)* , 3rd ser. , XIX-XX, 1967–8.

' De zestiende-eeuwse Nederlandse drukken over boekhouden en handelsrekenen hoofdzakelijk in betrekking met Antwerpen. ' *De Gulden Passer*, XXXXIX, 1971.

GROSSMANN, J. *Die Amsterdamer Börse vor zweihundert Jahren(1672–1673). Nach den Akten des Wiener Staats-Archiven.* The Hague. 1876.

GUILLON, A.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législation française des faillites et banqueroutes avant 1673* . Paris, 1903.

HAEBLER, K. ' Die Finanzdekrete Philip' s II und die Fugger. '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XI, 1894.

HAMILTON, E. J. '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 ' *Economica* , Nov.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 1934.

War and Prices in Spain, 1651–1800 . Cambridge, Mass. , 1947.

'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Western Europe.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XXVII, 1947.

' Plans for a National Bank in Spain, 1701–1783.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VII, 1949.

' Spanish Banking Schemes before 1700' *The 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VII, 1949.

HANAUER, ABBÉ A. -C. *Etudes économiques sur l' Alsace ancienne et moderne.* 2 vols. Paris, 1876–8.

HANKE, L. ' El otro tesoro de las Indias durante la êpoca de Carlos V. ' *Revista del Institut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 1959.

HARSIN, P. *Les doctrines monétaires et financières en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 Paris, 1928.

Crédit public et Banque d' Etat en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s . Paris, 1933.

' La Banque et le système de Law. '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of the History of Banking and Credit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 collected by J. G. van Dillen. The Hague, 1934.

'La Finance et l'Etat jusqu'au système de Law.'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II. 1660-1789*. Edited by E. Labrousse *et al*. Paris, 1970.

Recueil d'études. Liège, 1970. [659]

HARSIN, P., *et al. Finances publiques de l'Ancien Régime. Finances publiques contemporains. Processus de mutation, continuités et ruptur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pa. 16-19 septembre 1971: Actes.) Brussels, 1972.

HAUSER, H. 'Reflexions sur l'histoire des banques à l'époque moderne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 1929.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 of 1557.'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9-30.

La modernit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30.

Les débuts du capitalisme. New ed., Paris, 1931.

'La crise de 1557-1559 et le bouleversement des fortunes.' *Mélanges Abel Lefranc*. Paris, 1936.

and RENAUDET, A. *Les débuts de l'age moderne.* 4th ed., Paris, 1956.

HECKSCHER, E. F. 'Natural and Money Economy as illustrated from Swedish Histor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31.

'The Bank of Sweden i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Bank of Amsterdam.'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edited by J. G. van Dillen. The Hague, 1934.

Sveriges Ekonomiska Historia. Stockholm, 1935.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Mass. 1954.

HEERS, J. *Gênes au XVe siècle. Activité économique et problèmes sociaux*. Paris, 1961.

HILL, C.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17th Century*. London, 1962.

HINTON, R. W. K. 'The Mercantile System in the Time of Thomas Mu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3, 1955.

The Eastland Trade and the Common Wea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9.

HOBSBAWM. E. 'The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1954.

HOLDEN, J. M. *The History of Negotiable Insftruments in English Law.* London. 1955.

HOMER, S. *A History of Interest Rat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63.

HORSEFIELD, J. K. 'The cash ratio in English Banks before 1800.'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VII, 1949.

British Monetary Experiments, 1650-1710. London, 1960.

HOUTTE, J. A. VAN.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Expansion et apogée.' *Annales: E., S., C.*, XVI, 1961.

'Declin et survivance d'Anvers (1550-1700).'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V. Milan, 1962.

IMBERT, G. *Des mouvements de longue durée Kondratieff*. Aix-en-Provence, 1959.

ISAAC, J. 'Le Cardinal de Tournon lieutenant général du Roi.' *Revue d'Histoire de Lyon*, XII, 1913.

JACQUETON, G. 'Le trésor de l'Epargne sous François Ier (1523-1547).' *Revue historique.* LV-LVI, 1894.

JANNET, C. *Le crédit populaire et les banques en Italie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85.

JANSSENS, V. 'Het ontstaan van de dubbele koers courant geld-wisselgeld in het geldwezen der Zuidelijke Nederlanden.'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IX. 1954.

Het geldwezen der Oostenrijkse Nederlanden.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Klasse der Letteren, no. 29.) Brussels, 1957.

JASSEMIN, H. 'La Chambre des comptes et la gestion des deniers publics au XVe siècle.'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 LXXXXIII, 1932.

JEANNIN, P. 'Anvers et la Baltique au XV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XXXVII, 1955.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des villes de la Baltique avec Anvers au XVIe siècl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XXXIII, 1956.

les Marchands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57.

L'Europe du Nord-Ouest et du Nord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69.

JENNINGS, R. M. and TROUT, A. P. 'Internal Control: Public Finance in 17th Centu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 1972.

JOSLIN, D. M. 'London Private Bankers, 1720–178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II, 1954–5.

[660] KELLENBENZ, H. 'Les foires de Lyon dans la politique de Charles V.' *Cahiers d'histoire*. V, 1960.

Die Fuggersche Maestrazgpacht, 1525–1542. Tübingen, 1967.

KERNKAMP, J. H. *De handel op den Vijand 1572–1609*. 2 vols. Utrecht-The Hague, 1931 and 1934.

KERR, A. W. *History of Banking in Scotland*. 3rd ed., London, 1918.

KLEIN, P. W. *De Trippen in de 17e eeuw. Een studie over het ondernemersgedrag op de Hollandse stapelmarkt*. Assen, 1965.

Kapitaal en stagnatie tijdens het Hollandse Vroegkapitalisme. Rotterdam, 1967.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and the Economic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Annales Cisalpines d'Histoire Sociale*, I, 1970.

KLEINCLAUSZ, A. *Histoire de Lyon*. 3 vols. Lyons, 1939–48.

KOENIGSBERGER, H. G. and MOSSE, G. L.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1.

KOPF, 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Messen von Lyon.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Anteils der oberdeutschen Städte im 16. Jahrhundert*. Ulm, 1910.

LABROUSSE, E. 'Recherche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à 1800.'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939.

LAFAURIE, J. 'Les "Billets de Monoye" et les "Billets de l'Estat", 1701–1716. Essai de catalogues des "Billets de Monoye." Les "Billets de l'Esta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 pour l'histoire du papier-monnaie*, V, 1950.

'Les billets des Banques de Law. I. La Banque Générale (1716–1718); II. La Banque Royale (1719–172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 pour l'histoire du papier-monnaie*, VII, 1952.

LANDES, D. G. 'Vieille Banque et Banque nouvelle: la révolution financièred du XIX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I, 1956.

LANDRY, A. *Essai économique sur les mutations des monnai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de Philippe le Bel à Charles VII*.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no. 185.) Paris, 1910.

LAPERCHE, A. *Essai sur le prêt à intérêt au XVIe siècle*. Rennes, 1902.

LAPEYRE, H. 'Las origines del Endoso de letras de cambio en España.' *Moneda y Credito: Revista de Economica*, LII, 1955.

Simon Ruiz et les asientos de Philippe II. Paris, 1953.

Une Famille de marchands: les Ruiz. Paris, 1955.

'La banque, les changes et le crédit au XV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I, 1956.

'Une lettre de change endossée en 1430.' *Annales: E., S., C.*, 1958.

'Banque et crédit en Italie du XVIe siècl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III, 1961.

'Alphonse V et ses banquiers.' *Le Moyen Age*. 1961.

LATTES, A. *Il diritto commerciale nella legislazione statutaria delle città italiane*. Milan, 1884.

'Genova nella storia del diritto cambiario italiano.' *Rivista de diritto commerciale*. I. 1915.

LATTES, E. *La libertà delle banche à Venezia dal secolo XIII al XVII*. Milan, 1869.

LAURENT, H. *La loi de Gresham au Moyen Age. Essai sur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tre la Flandre et le Brabant à la fin du XIVe siècle*. Paris, 1933.

LAWSON, W. J. *The History of Banking, with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Origin,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Banks of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London. 1850.

LEGIER, H. J. 'L'Eglise et l'économie médiévale. Un exemple: la monnaie ecclésiastique de Lyon et ses vicissitudes.' *Annales: E., S., C.*, 1957.

'Réalités monétaires,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réalités historiques.' *Annales: E., S., C.*, 1959.

LEJEUNE, J. *La formation du capitalisme moderne dans la principauté de Liège au XVIe siècle*. (Bibli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Liège, LXXXVII.) Paris, 1939.

LESAGE, G. L. '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Franc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e siècle.' *Annales :E., S., C.*, III 1948.

LESCURE, J. 'Esquisse de l'évolution du change et des théories relatives au chang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10.

LEVASSEUR, E. 'Foires et marchés en France pendant la royauté féodale (XIIIe, XIVe et XV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10.

LEVY-BRUHL, H. *Histoire de la lettre de change en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33.

[661]

LIÈVRE, L. *La Monnaie et les changes en Bourgogne sous les ducs Valois.* Dijon, 1929.

LODOLINI, A. 'I Monti camerali nel sistema della finanza pontificia.' *Archivi storici delle aziende di credito*, I. Rome, 1956.

LONCHAY, H. 'Recherches sur l'origine et la valeur des Ducats et des Ecus espagnols.'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no. II, 1906.

'Etude sur les emprunts des souverains belges aux XVIe et XVIIIe siècles.'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Classe des Lettres*, 1907.

LONGÉ, G. DE (ed.). *Coutumes du Pays et Duché de Brabant. Quartier d'Anvers.* Vol. IV: *Coutumes de la ville d'Anvers.* Brussels, 1874.

LOPEZ, R. S. and MISKIMIN, H. A.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Econ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XV, 1962-3.

LOPEZ YEPES, J. *Historia de los Montes de Piedad en España. El Monte de Piedad de Madrid en el siglo XVIII.* 2 vols. Madrid, 1971.

LÜTHY, H.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2 vols. Paris, 1959-61.

LUZZATO, G. 'Les banques publiques de Venise. Siècles XVI-XVIII.'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ua, 1954.

'L'oro e l'argento nella politica monetaria veneziana dei sec. XIII-XV.'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veneziana.* Padua, 1954.

An Economic History of Italy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1.

MADDALENA, A. DE. *Prezzi e aspetti di mercato a Milano durante il seculo XVII.* Milan, 1949.

'Les hommes d'affaires lombards sur les foires de Bisenzone 1579-1619.' *Annales: E., S., C.*, 1967.

MAGELHÃES-GODINHO, V.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 Paris, 1969.

MALOWIST, M. 'Les mouvements d'expansion en Europ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E., S., C.*, 1962.

MANDICH, G. 'Delle fiere genovesi di cambi particolarmente studiate come mercati periodici del credito.'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IV, 1939.

'Di una tentata speculazione cambiaria in Venezia nel 1636.'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VII, 1942.

Le Pacte de Ricorsa et le marché italien des change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3.

MANDROU, R. *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 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Paris, 1961.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67.

MARÉCHAL. J. 'Bruges, centre du commerce de l'argent aux derniers siècles du Moyen Age.' *La Revue de la Banque*, 1950.

'Le départ de Bruges des marchands étrangers (XVe et XVIe siècles).'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d'émulation de Bruges*, LXXXVIII, 1951.

MARENGO, E., MANFRONI, C. and PESSAGNO, G. *Il Banco di San Giorgio.* Genoa, 1911.

MARION, M.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I. *1715-1785.* Paris, 1914.

MARQUES, A. H. DE OLIVEIRA. 'Notas para a história da feitoria portuguesa na Flandres, no seculo XV.'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II. Milan, 1962.

MARTIN, G. 'La monnaie et le crédit privé en Franc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les faits et les théories (1550-1664).' *Revue d'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II, 1909.

L' histoire du crédit en Franc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I. *Le Crédit public.* Paris, 1913.

MATEU Y LLOPIS, F. *La moneda española.* (Breve historia monetaria de España.) Barcelona, 1946.

MATTHEWS, G. T.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1958.

MAURO, F. *Le Portugal et l' 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 1570-1670. Etude économique.* Paris, 1960.

'Marchands et marchands-banquiers portugais au XVIIe siècle.' *Revista portuegesa de historia*, IX, 1961.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aspects économiques. Paris, 1970.

MEES, W. C. *Proeve eener Geschiedenis van het Bankwezen in Nederland gedurende den tijd der Republiek.* Rotterdam, 1838.

[662]

MELIS, F. 'Di alcune girate cambiarie dell' inizio del cinquecento rinvenute a Firenze.' *Moneta e credito. Rivista trimestriel della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1953.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Studi nell' archivio Datini di Prato). I. Siena, 1962.

'Motivi di storia bancaria senese: dai banchieri privati alla banca publica.' *Note Economiche*, nos. 5-6, 1972.

MERTENS, J. E. *La naiss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 étalon-or, 1696-1922. Les faits et les théories. Essai de synthèse économique et sociologique.* Paris, 1944.

MERTENS, L. *Les Changes et les fonds publics à Anvers depuis le XVIe siècle jusqu' à 1792.* Antwerp. 1894.

MEUVRET, J.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t utilisation économique de la monnaie dans la France du XVIe et XVIIe siècles.' *Etudes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1947.

'Manuels et traités à l' usage des négociants aux premières époques de l' âge moderne.'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 1953.

'Circuits d' échanges et travail rural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Milan, 1957.

'Vers une économie historique; Monnaie et vie économique en France de 1493 à 1680.' *Annales: E., S., C.*, XV, 1960.

Etude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Recueil d' articles. Paris, 1971.

'Les Français et l' Argent.'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Paris, 1972.

MICHIELSEN, A. *De evolutie van de handelsorganisatie in België sedert het begin der 18e eeuw.* (Bibliotheek van de Handelshoogeschool. Instituut voor handels-en economische wetenschappen. Universiteit te Leuven.) Turnhout, 1938.

MICHIELSEN, L. 'Het kapitalisme te Antwerpen in de XVIIe en XVIIIe eeuw.' *Nederlandsche Historiebladen*, 1939.

MISKIMIN, H. A. 'Le problème de l' argent au Moyen-Age.' *Annales: E., S., C.*, 1962.

MOLLAT, M. 'Recherches sur les finances des Ducs Valois de Bourgogne.' *Revue historique*, CCXIX, 1958.

MORINEAU, M. 'D' Amsterdam à Séville.' *Annales: E., S., C.*, XXIII, 1968.

MOUSNIER, R.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en France sous Henry IV et Louis XIII*, Rouen, 1945.

'L' évolution d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pendant les guerres de la Ligue d' Augsbourg et de la Succession d' Espagne.' *Revue historique*, 1950.

NATALIS DE WAILLY. *Mémoire sur les variations de la livre tournois depuis le règne de Saint-Louis jusqu' à l' établissement de la monnaie décimale.* Paris, 1857.

NIELSEN, A. *Dä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Jena, 1933.

NORDMANN, C. J. *La Crise du Nord au début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2.

'Monnaies et finances suédoises au XVIIe siècle.' *Revue du nord*, CLXXXIII, 1964.

OLDEWELT. W. F. H. 'Twee eeuwen Amsterdamse faillissementen en het verloop van de conjunctuur, 1938 tot 1838.'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LXXV: 4, 1962.

OUTHWATTHE, R. B. 'The Trials of Foreign Borrowing. The English Crown and the Antwerp Money Market in the mid-XVI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X, 1966.

PAMPALONI, G. 'Cenni storici sul monte di Pietà di Firenze.' *Archivi storici delle aziende di credito.* I. Rome, 1956.

PARKER, G.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e in Europe, 1500–1730.'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London, 1974.
PERROY, E. 'A l'origine d'une économie contractée: les crises du XIVe siècle.' *Annales: E., S., C.*, 1949.
PIKE, R.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The Genoese in Sevilla*. Ithaca (New York), 1966.
PIRENNE, H. 'L'Instruction des marchands au Moyen-Ag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29.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yen-Age.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completed by Hans van Werveke, Paris, 1969.
PLATBARZDTS, A. *Sveriges första Banksedlar(1661–1668)*. Stockholm, 1960.
POHL, H. *Die Portugiesen in Antwerpen, 1567–1648*. (Habilitationsschrift der Hohen Wirtschaft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Cologne, 1968. [663]
'Die kastilischen Staatsfinanzen am Ende des 15. Jahrhunderts.' *Öffentliche Finanzen und privates Kapital in Späten Mittelalter und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9. Jahrhunderts*. (Forschungen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VI.) Stuttgart, 1971.
'Zur Bedeutung Antwerpens als Kredietplatz im beginnenden 17. Jahrhundert.' *Die Stadt in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Festschrift Edith Ennen*. Bonn, 1972.
POLIAKOV, L. *Le Commerce de l'argent chez les Juifs d'Itali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s*. Paris, 1965.
PÖLNITZ, G. VON. *Jakob Fugger. Kaiser, Kirche und Kapital in der Oberdeutschen Renaissance*. Tübingen, 1949.
Fugger und Hanse. Ein hundertjähriges Ringen um Ostsee und Nordsee. Tübingen, 1953.
Anton Fugger. I. *1493–1535*. Tübingen, 1958.
PONTI, E. *Il Banco di Santo Spirito fondato da S. S. Paolo V con breve del 13 décembre 1605*. Rome, 1941.
POSTAN, M. M. 'The Rise of a Money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IV, 1944–5.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100–1500. London, 1972.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Cambridge, 1973.
POSTAN, M. M., RICH, E. E. and MILLER, E.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I.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1963.
POWEL, E. T.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ey Market(1385–1915). An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es as a Centralized, Co-ordinated Force*. London, 1915.
PRATO, G. *Problemi monetari e bancari nei secoli XVII e XVIII*. Turin, 1916.
PRESSNELL, L. S. 'Public Mon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Bank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1952.
(ed.). *The Country Banks*. Oxford, 1956.
PUSCH, G. *Staatliche Münz-und Geld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unter den Burgundischen und Habsburgischen Herrschern, besonders unter Kaiser Karl V*. Munich, 1932.
RAMSAY, G. D. *English Overseas Trade during the Centuries of Emergence*. London, 1957.
RAMSEY, P. 'Some Tudor Merchants' Account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eds.* A. C. *Littleton and* B. S. Yamey, London, 1956.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Men and Ideas Series, no. I.) London, 1963.
(e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REDLICH, F. *Die Deutsche Inflation des frühen 17. Jahrhunderts in der Zeitgenössischen Literatur: die Kipper und Wipper*. (Forschungen zur internationalen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edited by Hermann Kellenbenz.) Cologne-Vienna, 1972.
REMOND, A. 'Economie dirigée, et travaux publics sous Colbert.'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9.
RENOUARD, Y. *Les Relations des Papes d'Avignon et des compagnies commerciales et bancaires de* 1316 *à* 1378. Paris, 1941.
Les Hommes d'affaires italiens du Moyen Age. Paris, 1949.

RICARDS, R. D. *The Early History of Banking in England.* London, 1929.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1694-1744).'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of the History of Banking and Credit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 Collected by J. G. van Dillen. The Hague, 1934.

RICHET, D. 'Le cours officiel des monnaies étrangères circulant en France au XV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CCXXV, 1961.

ROBERTS, M. *Gustavus Adolphus. A History of Sweden.* 2 vols. London, 1958.

ROBINSON, W. C. 'Mone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1959.

RODRIGEZ Y FERNANDEZ, I. *Historia de Medina del Campo.* Madrid, 1903-4.

ROGERS, J. E. THOROLD. *The First Nine Years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xford, 1887.

ROMANO, R. 'Banchieri genovesi alla Corte di Filippo I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I, 1949.

'Trá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LXXIV, 1962.

'Le marchand italien entre Moyen Age et Renaissance.' *Odrodzenie i Reformäcja w Polsce*, VIII, 1963.

[664]

ROOVER, FLORENCE EDLER DE.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Charles V on the Commerce of Antwerp, 1539-42.'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VI, 1937.

ROOVER, R. DE. *The Medici-Bank. It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Operations and Decline.* New York-London, 1948.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Italian Merchant Bankers, Lombards and Money-Changer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Banking. Cambridge, Mass., 1948.

Gresham on Foreign Exchange. An Essay on Early English Mercantilism with the Text of Sir Thomas Gresham's Memorandum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change. Cambridge, Mass., 1949.

'Anvers comme marché monétaire au XVIe siècl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I/IV, 1953.

L'évolution de la lettre de change,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53.

'The Origins of Discounting.' *South African Bankers' Journal*, 1956.

'Cambium ad Venetia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Foreign Exchange.'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 Milan, 1957.

'La balance commerciale entre les Pays-Bas et l'Italie au XVe siècl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XXVII, 1959.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No. 21.) Cambridge, Mass., 1963.

San Bernardino of Siena and Sant'Antonio of Florence. The Two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of the Middle Ages. Boston, Mass., 1967.

'Early Banking before 1500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 la Banque*, 1971.

ROOVER, R. DE and SARDY, H. *The Bruges Money Market around 1400. With a Statistical Supplement.* (Verhandelingen van de Koninklijke Vlaamse Academie voor Weten-schappen, Letteren en Schone Kunsten van België, Klasse der Letteren, no. 63.) Brussels, 1968.

RÖRIG, F. *The Medieval Town.* London, 1967.

ROSA, L. DE. 'Observations à propos de la relation de M. Demarco sur les banques napolitaines.'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roceedings.* Paris-The Hague, 1974.

ROUCHE, ABBÉ A. 'La nation florentine à Lyon, au commencement du XV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de Lyon*, XI, 1912.

RUIZ-MARTIN, F. 'Las finanzas españolas durante el Reinado de Felipe II (Alternativas de participación que se ofrecieron para Francia).' *Cuadernos de Historia*, II, 1968.

La Banca en España hasta 1782. Madrid, 1970.

'Credito y Banca. Comercio y transportes en la etapa del capitalismo mercantil.' *Jornados de*

metodologia aplicada de las Ciencias Historicas 24–27 April 1973, Santiago de Compostella. Ponencias y comunicaciones, apéndice. Santiago de Compostella, 1973.

RUTENBURG, V. *Statuti di Monte di Pieta, 1463–1499. 'Gubbio'*. Moscow-Leningrad, 1965.

RUWET, J. 'Un aspect de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liègeoise au XVIe siècle: le change. *Scrinium Lovaniense.* (Mélanges historiques Etienne Van Cauwenbergh. Université de Louvain. Receuil de travaux d'histoire et de philologie, 4th ser., fasc. 24.) Louvain, 1961.

SAINT-GERMAIN, J. *Samuel Bernard, le banquier des rois.* Paris, 1960.

SAMSONOWICZ, H. 'La structure du commerce de Gdansk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e siècle.' *Przeglad historyczny*, LIII: 4, 1961.

SÁNCHEZ SARTO, M. 'Les banques publiques en Espagne jusqu'à 1815.' *History of the Proncipal Public Banks 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of the History of Banking and Credit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 Collected by J. G. van Dillen. The Hague, 1934.

SAPORI, A.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medievale.* Florence, 1947.

'La Banca Medici.' *Moneta e credito*, VIII, 1949.

Le Marchand Italien au Moyen-Age. Paris, 1952.

SARDELLA, P. *Nouvelles et spéculations à Venise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Cahiers des Annales, no. I.) Paris. 1950.

SAUTIJN KLUTT, W. P. 'De Amsterdamsche Prijs-courantiers in de 17de en 18de eeuw.' *Bijdragen voor Vaderlandsche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1875. [665]

SAYERS, R. S. *Banking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1963.

SAYOUS, A. E. 'La spéculation dans les Pays-Bas au XVIe siècl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5th ser., XLVI, 1901.

'Observations d'écrivains du XVIe siècle sur les changes et notamment sur l'influence de la disparité du pouvoir d'achat des monnaies.'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1928.

'Les placements de fortune à Genève depuis le XVe siècle jusqu'à la fin du XVIIIe.' *Revue économique internationdle*, 1935.

Les Origines du marché à terme sur marchandises. Les origines de la bourse en valeurs. Brussels, 1936.

'La genèse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la pratique des affaires et lear mentalité dans l'Espagne du XVIe 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II. 1936.

'L' affaire de Law et les Genevois.' *Revue d'histoire suisse*, XVII, 1937.

'Die grossen Händler und Kapitalisten in Amsterdam gegen das Ende des sechzehnten und während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XXXXVI-XXXXVII. 1937-8.

'Augsbourg au temps des grandes faillites.'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8.

'La crise financière de 1709 à Lyon et à Genèv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8.

SCHÄFER, E. *El Consejo realy supremo de las Indias.* 2 *vols.* Seville, 1935 and 1947.

SCHANZ, G. *Englische Handelspolitik gegen Ende les Mittelater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Zeitalters der beiden ersten Tudors, Heinrich VII und Heinrich VIII.* 2 vols. Leipzig, 1881.

SCHICK, L. *Un grand homme d'affaires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Jacob Fugger.* (Affaires et gens d'affaires, no. II.) Paris, 1957.

SCHNAPPER, B. 'Les baux à vie (Xe au XV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1957.

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 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dit. Paris, 1957.

SCHNEE, H. *Die Hoffinanz und der moderne Staat.* 4 vols. Berlin-Munich, 1958–63.

SCHULTE, A. *Geschichte der grossen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 1380–1530. 3 vols. Stuttgart-Berlin, 1923.

SCOVILIE, W. C. *The Per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 1680–17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0.

SÉE, H.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2 vols. Paris, 1948.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Esquise historique). 6th ed., Paris, 1951.

SENTENACH, N. ' El maravedi, su grandeza y decadencia. '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XII, 1905.

SHAPIRO, S. '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Banking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Proceedings.* Paris-The Hague, 1974.

SHAW, W. A. *Histoire de la monnaie, 1252–1894.* Paris, 1896.

SIEVEKING, H. *Genueser Finanzwezen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Casa di S. Giorgio.* 2 vols. Freiburg-Tübingen, 1898–1900.

' Die Hamburger Bank, 1615–1875. ' *Festschrift von Melle*, 1933.

SILVA, JOSÉ GENTIL DA. *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Lettres marchandes des Rodrigues d' Evora et Veiga.* Paris, 1956.

' Capitaux et marchandises, échanges et finances entre XVIe et XVIIIe siècle. ' *Annales :E., S., C.*, 1957.

' Le sconto à Gênes. A propos d' un croquis. ' *Annales :E., S., C.*, 1958.

' Trafics du Nord, marchés du "Mezzogiorno" finances génoises: 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a conjonctur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 *Revue du Nord*, CLXII, 1959.

' L' histoire des changes: les foires de "Bisenzone" de 1606 à 1650. ' *Annales :E., S., C.*, 1962.

En Espagn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subistance, déclin, Paris, 1965.

Banque et crédit en Italie au XV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1969.

' Fructification du capital et dynamique sociale dans les sociétés commerciales (XVI–XVII siècles). '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Munich* 1965 : *Proceedings.* Paris-The Hague, 1974.

[666]

SMEDT, H. DE. *Antwerpen en de opbloei van de Vlaamse verrehandel tijdens de 16e eeuw. Rijkdom en inkomen van de Antwerpse koopman Jan Gamel volgens zijn staat van goed, 1572.* (Licentieverhandeling: Wijsb. & Letteren. Afd. Moderne Geschiedenis, Univ. Leuven, 1970.) Louvain, 1970.

SMEDT, O. DE. ' De keizerlijke verordeningen van 1537 en 1539 op de obligaties en wisselbrieven. ' *Nederlandsche Historiebladen*, III, 1940.

De Engelse Natie te Antwerpen in de XVIe eeuw (1496–1582). 2 vols. Antwerp, 1950–4.

SMIT, H. J. *De opkomst van den handel van Amsterdam.* Amsterdam, 1914.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2 vols. London, 1925.

SMITH, M. F. J. *Tijd-affaires in Effecten aan de Amsterdamsche Beurs.* The Hague, 1919.

SNELLER, Z. W. ' Het wisselaarsbedrijf in Nederland vóór de oprichting der Stedelijke Wisselbanken. '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XXXXIX, 1934.

Rotterdams bedrijfsleven in het verleden. Amsterdam, 1940.

SOLY, H. ' Grondspeculatie en kapitalisme te Antwerpen in de 16e eeuw. ' *Economisch en Sociaal Tijdschrift*, XXVII, 1973.

' Het "verraad" der 16de-eeuwse burgerij: een mythe? ' *Tijdschrif tvoor Geschiedenis*, LXXXVI, 1973.

SOMBART, W.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6 vols. Munich, 1921–8.

SOMMA, C. DE. ' L' attività bancaria della confraternità dello Spirito Santo dalle origini alla crisi monetaria del 1622.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i banchi publici napolitani. ' *Archivi storici delle aziende di credito*, I. Rome, 1956.

SORESINA. A. *Il Banco Giro di Venezia.* Venice, 1889.

SPERLING, J. '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Mechanism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V, 1962.

SPOONER, F. C. *L' 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Paris, 1956.

SPUFFORD, P. *Monetary 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the Burgundian Netherlands, 1433–1496.* Leiden, 1970.

STEFANO, M. DE. *Banchi e vicende monetarie nel Regno di Napoli, 1600–1625.* Livorno, 1940.

STELLA, A. ' La crisi economica venezian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XVI. ' *Archivio veneto.* LVII-LIX, 1956.

STEVELINCK, E. *La comptabilité à travers les âges.* (Catalogue d'une exposition organisée à l'occasion du premier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des historiens de la comptabilité, Bruxelles, 3 octobre–8 novembre 1970.) Brussels. 1970.

STONE, L.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STRIEDER, J. *Zur Genesis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Forschungen zur Entstehung der grossen bürgerlichen Kapitalvermögen zu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und zu Beginn der Neuzeit, zunächst in Augsburg.* Leipzig, 1904.

Studien zur Geschichte kapitalistischer Organisationsformen: Monopole, Kartelle und Aktien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und zur Beginn der Neuzeit. Munich-Leipzig, 1914.

STROMER. W. VON. 'Das Schriftwesen der Nürnberger Wirtschaft vom 14. bis zum 16. Jahrhundert. Zur Geschichte oberdeutscher Handelsbücher.'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Nürnbergs.* II. Nürnberg, 1967.

Oberdeutsche Hochfinanz, 1350–1450. 3 vols. Wiesbaden, 1970.

Sveriques Riksbank, 1668–1224. Stockholm, 1931.

TANGELDER, F. B. M. *Muntheer en muntmeester. Een studie over het Berghse muntprivilege in de tweede helft der zestiende eeuw.* Arnhem, 1955.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26.

TAYLOR, H. 'Trade, Neutrality and the "English Road", 1630–1648.'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XV, 1972.

TAYLOR, R. E. 'Luca Pacioli.'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Eds. A. C. Littleton and B. S. Jamey. London, 1956.

TOPOLSKI, J. 'La régression économique en Pologn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VII, 1962.

TOUSSAINT, P. *Les Foires de Chalon-sur-saône des origines au XVIe siècle.* (Collections d'études sur l'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Bourgogne, XXII.) Dijon, 1910. [667]

TREVOR-ROPER, H. R.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XVI, 1959.

ULLOA, M. *La Hacienda Real de Castilla en el reinado de Felipe II.* Rome, 1963.

USHER, A. P. 'The Primitive Banks of Deposits, 1200–16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V, 1934.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I.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Early Gredit System. Banking in Catalonia: 1240–1723. Cambridge, Mass., 1943.

VAESEN, J. *La Jurisdiction commerciale à Lyon sous l'ancien régime. Etude historique sur la conservation des privilèges royaux des Foires de Lyon (1463–1795).* Lyons, 1879.

VAZQUEZ DE PRADA, V.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I–IV. Paris, n. d.

VERCAUTEREN, F. 'Note sur les opérations de Charles Quint dans les Pays-Bas en 1523.' *Revue historique*, CLXXII, 1933.

VERLINDEN, C. 'De zeeverzekeringen der Spaanse kooplui in de Nederlanden gedurende de XVI eeuw.'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II, 1948.

'En Flandre sous Philippe II: durée de la crise économique.' *Annales: E., S., C.*, VII, 1952.

VIAL, E. 'Jean Cleberger. Ses origines. Sa vie.' *Revue d'histoire de Lyon*, XI–XIII, 1912–14.

VIARD, J. 'La Chambre des comptes sous le règne de Philippe VI de Valois.'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Chartes*, LXXXXIII, 1932.

VIGNE, M. *La Banque à Lyon du XVe au XVIIIe siècle.* Lyons-Paris, 1903.

VILAR, P. 'Problems of the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1956.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des structures nationales. 3 vols. *Paris*, 1962.

VILLERS, R.' Réflexions sur les finances publiques en Europe aux XVIIe–XVIIIe siècles.'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1962.

VRANKRIJKER, A. C. J. DE. *Geschiedenis van de belastingen.* Bussum, 1969.

VRIES, J. DE, *De economische achteruitgang der Republiek in de achttiende eeuw.* Leiden, 1968.

VUHRER, A. *Histoire de la dette publique en France.* Paris, 1886.

VUITRY, A. *Le Désordre des finances et les excès de la spéculation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IV et au commencement du règne de Louis XV.* Paris, 1885.
WASCHINSKI, E. 'Zwischenstaatliche Wechselkurse aus dem letzten Viertel des 16. und im ersten Drittel des 18. Jahrhundert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XXXVII, 1960.
WEE, H. VAN DER. 'Sporen van disconto te Antwerpen tijdens de 16e eeuw.'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X, 1955.
'Het geld in de XVIIe en XVIIIe eeuw.'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XIII, 1959.
The Growth of the Antwerp Market and the European Economy (Fourteenth-Sixteenth Centuries). 3 vols. The Hague, 1963.
Anvers et les innovations de la technique financièr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nnales :E., S., C.*, XXII, 1967.
Historische aspecten van de economische groei. Tien studies over de economische ontwikkeling van West-Europa en van de Nederlanden in het bijzonder (12e–19e eeuw). Antwerp-Utrecht, 1972.
and VAN CAUWENBERGHE, E. 'Histoire agraire et finances publiques en Flandre du XIVe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XVIII. 1973.
WERVEKE, H, VAN, 'Monnaie de compte et monnaie réell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III, 1934.
'Les origines des bourses commerciales. Faut-il abandonner la thèse Guicciardini-Ehrenberg?'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XV, 1936.
Miscellanea Mediaevalia. Ghent, 1968.
WESTERMANN, E. *Das Eislebener Garkupfer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europäischen Kupfermarkt, 1460–1560.* Cologne–Vienna, 1971.
WILSON, C.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1.
[668] *Mercantilism.* (Pamphlet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G. 37.) London, 1958.
'The Other Face of Mercantilism.'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1959.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1965.
WILSON, J. S. G. *French Banking Structure and Gredit Policy.* London, 1957.
WITTROCK, G. *Karl XI :s. förmyndares finanspolitik, 1661–1667*, Uppsala, 1914.
Svenska Handelskompaniet och Kopparhandeln under Gustaf II Adolf. Uppsala, 1919.
WOLFF, P. *Commerce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vers 1350, vers 1450).* Paris, 1945.
'Le problème des Cahorsins.' *Annales du Midi*, LXII, 1950.
WOLONTIS, J. *Kopparmyntningen i Sverige, 1624–1714.* Helsingfors, 1936.
WYCZANSKI, A. 'En Pologne. L'économie du domaine nobiliaire moyen (1500 – 1580).' *Annales: E., S., C.*, 1963.
ZARB, M. 'Aperçu des relations ayant existé entre la Provence et Genève au cours des XVe et XVIe siècles.' *Provence historique*, VI, 1956.
ZELLER, G. 'Deux capitalistes strasbourgeois au XVIe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 1947.
ZERBI, T. *Le origini della partita doppia. Gestioni aziendali e situazioni di mercato nei secoli XIV e XV.* Milan, 1952.
ZORN, W. 'Grundzüge der Augsburger Handelsgeschichte 1648–1806.'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XXXIII, 1956.

第六章　企业的性质

考虑到本章主题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它与第四卷和本卷其他章节主题的交叉重叠程度，我们认为在此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参考书目是不合适的。相反，我们下面所列出的书目是本章所讨论的主题的有选择性而相对简洁的介绍。这些书目的使用应当与相关章节

的参考书目一并使用。

6.1 企业的基本结构

BRAUDEL, F.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a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CHAUNU, H. and CHAUNU, P.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3 vols, Paris, 1956.
CHRISTENSEN, A. E. *Dutch Trade to the Baltic c. 1600.* Copenhagen, 1941.
COLE, C. W.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2 vols. New York, 1939.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1943.
COLEMAN, D. C. 'Eli Heckscher and the idea of mercantilism.'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7.
DOBB, MAURICE.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46.
GRAS, N. S. B. *Business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1939.
HAUSER, H.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en France.'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1902.
HECKSCHER, E. *Mercantilism.* 2 vols. Revised edition. 1955.
JUDGES, A. V. 'The idea of the mercantile stat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39.
MARSHALL, T. H. 'Capit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gilds.'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929.
REDLICH, FRITZ, *The German Military Entrepreneur and his Work Force: A Study i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2 vols. Wiesbaden, 1964.
ROBERTSON, H. M.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1933.
SAMUELSSON, K. *Religion and Economic Action.* London, 1961.
SAYOUS, ANDRÉ E. 'The bourgeoisie of Geneva in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6.
'La Genèse du système capitaliste: La Pratique des affairs et leur mentalité dans l'Espagne du XVIe siècle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1936.
SÉE, H. 'Dans quelle mesure Purtains et Juifs ont-ils contribué au progrè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Revue historique*, v, 1927. [669]
'Le capitalisme commercial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1924.
The Origins of Modern Capitalism, 1927.
SOMBART, WERNER.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1913.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15.
STRIEDER, JACOB.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early European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1929.
SUPPLE, B. E. 'The great capitalist man-hunt.' *Business History*, 1963.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26.
'Modern capitalism.'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3.
TROELTSCH, E.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2 vols. London, 1931.
UNWIN, GEORGE. *The Gilds and Companies of London.* London, 1908.
'The Merchant Adventurers' Company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n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George Unwin.* Edited by R. H. Tawney. London, 1927.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30.

6.2 贸易和金融中的国际企业

ASHTON, ROBERT. *The Crown and the Money Market, 1603–1640.* Oxford, 1960.
BARBOUR, V.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50.
BRAUDEL, F. and ROMANO, R. *Navires et merchandises à l'éntree du port de Livourne (1547–1611).* Paris, 1951.

CASTILLO, A. 'Dans la monarchie espagnole du XVIIe siecle: les banquiers portugais et le circuit d' Amsterdam. ' *Annales*, 1964.

COLEMAN, D. C. *Sir John Banks, Baronet and Businessman: A Study of Busi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r Stuart England.* Oxford, 1963.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London, 1745.

DICKSON, P. G. M. *The Sun Insurance Office, 1710–1960: The History of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British Insurance.* London, 1960.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1967.

EHRENBERG, RICHARD. *Capital &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A study of the Fuggers and their connections.* New York, 1928.

GOUGH, J. W. *Sir Hugh Myddelton: Entrepreneur and Engineer.* Oxford, 1964.

HOUTTE, J. A. VAN. 'Anver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 *Annales.* 1961.

JEANNIN, P. 'Le cuivre, les Fuggers et la Hanse. ' *Annales*, 1955.

KELLENBENZ, H. 'Les Fuggers et le marché internationale du poivre c. 1600. ' *Annales*, 1956.

KLARWILL, VICTOR VON (ed.). *The Fugger News-Letters.* London, 1924.

LAPEYRE, HENRI. *Une Famille de marchands: les Ruiz. Contribution à l' étude du Commerce entre la France et l' Espagne au temps de Philippe II.* Paris, 1955.

LOPEZ, R. 'Le marchand génois. ' *Annales*, 1958.

LÜTHY, HERBERT.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 Edit de Nantes à la Revolution.* 2 vols. Paris, 1959.

MC GRATH, P. V. *Merchants and Merchandise in seventeenth-century Bristol.* Bristol, 1955.

MATTHEWS, GEORGE T.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1958.

MINCHINTON, W. E. 'The merchants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7-8.

MORET, MICHELE. *Aspects de la société marchande de Sévill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67.

PELLET, JEAN. *Commerçant de Gros, 1694–1722: contribution a l' étude du négoce Bordelai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7.

SAVARY, J. *Le Parfait Négociant.* Lyons, 1675.

SAYOUS, ANDRÉ E. 'Le Rôle d' Amsterdam dans l' histoire du capitalisme commercial. ' *Revue Historique*, 1938.

SCHICK, LEON, *Un grand homme d' affaires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Jacob Fugger.* Paris, 1957.

SÉE, H. 'Le Commerce des Hollandaise à Nantes pendant la minorité de Louis XIV. ' *Tidj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1926.

[670]

SILVA, J. GENTIL DA. *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Lettres marchandes des Rodrigues d' Evora et Veiga.* Paris, 1956.

STONE, LAWRENCE. *An Elizabethan: Sir Horatio Palavicino.* Oxford, 1956.

STRIEDER, JACOB. *Jacob Fugger the Rich: Merchant and Banker of Auggsburg, 1459–1525.* New York, 1931.

TAWNEY, R. H. *Lionel Cranfield: Business and Politics under James I.* Cambridge, 1958.

UPTON, ANTHONY F. *Sir Arthur Ingram, c. 1565–1642: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an English Landed Family.* London, 1961.

WILSON, C. H.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41.

YAMEY, B. S. 'Scientifi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I, 1949.

6.3 工业企业

BAMFORD, P. 'Entrepreneurship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IX: 4, April, 1957.

BOISSONADE, P. *Le Socialisme de l' état, l' industrie et les classes industrielles pendant les deux*

premières siècles de l' ère moderne. Paris, 1927.

Colbert, le triomphe de l' étatisme, *la fondation de la suprématie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1661 –1683*. Paris, 1932.

BONDOIS, P. M.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grande industrie en France au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898.

COLEMAN, D. C. *The British Paper Industry, 1495 – 1860: A study in industrial growth*. Oxford, 1958.

DONALD, M. B. *Elizabethan Copper: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of Mines Royal, 1568–1605. London*, 1955.

Elizabethan Monopolies: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of Mineral and Battery Works from 1565 to 1604. Edinburgh and London, 1961.

DOWNES, R. L. ' The Stour partnership, 1726–36: a note on landed capital in the iron indust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50.

GILLE, BERTRAND. *Les Origines de la grande industrie métallurgique en France*. Paris, 1947.

JOHNSON, B. L. C. ' The Foley partnerships: the iron industry at the end of the charcoal era.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 IV: 3, 1952.

MARTIN, G. *La Grande Industrie en Franc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Paris, 1900.

NEF, J. U. '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5.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1932.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 Chicago, 1940.

RAMSEY, G. D. *The Wiltshire Woollen Indus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xford, 1943.

REMOND, A. *John Holker, manufacturier et grand fonctionnair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46.

ROUFF, M. *Les Mines de Charbon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22.

SCOVILLE, W. C. *Capitalism and French Glassmaking, 1640 –1789*. California, 1950.

SÉE, H. ' Remarques sur l' évolution du capitalisme et les origines de la grand industrie. ' *La 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 1924.

' Remarques sur le caractère de l' industrie rurale en France et les causes de son extension au XVIIIe siècle. ' *Revue historique*, 1923.

UNWIN, GEORGE, ' The history of the cloth industry in Suffolk. ' In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George Unwin*. Edited by R. H. Tawney. London, 1927.

WADSWORTH, A. P. and MANN, J. DE L.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 – 1780. Manchester*, 1931.

ZELLER, G. ' L' industrie en France avant Colbert.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0. [671]

6.4 公司制企业

BONNASSIEUX, PIERRE. *Les Grandes Compagnies de commerce*. Paris, 1892.

BOISSONADE and CHARLIOT, P. ' Colbert et la Compagnie de Commerce du Nord.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28 *and* 1929.

CHAUDHURI, K. N.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Study of an Early Joint-Stock Company, 1600 –1640*. London, 1965.

DAVIES, K. G. *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 London, 1957.

HARSIN, P. ' La création de la Compagnie d' Occident. '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56.

HUSSEY, ROLAND D. *The Caracas Company, 1728–1784: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Spanish Monopolistic Trade*. Cambridge, Mass. , 1934.

RABB , THEODORE K.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Cambridge, Mass. , 1967.

RICH , E. E. *The History of the Hudson' s Bay Company, 1670–1870*. 2 vols. London, 1958–9.

SCOTT, W. R. *The Constitution and Finance of English, Scottish and Irish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1720.* 3vols. Cambridge, 1910-12.
SMITH, R. S. *The Spanish Guild Merchant.* Durham, N. C., 1940.
WILLAN, T. 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Russia Company.* Manchester, 1956.
WOOD, A. C. *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 Oxford, 1935.

6.5 贵族与企业

FREUDENBERGER, H. *The Waldstein Woollen Mill: Noble Entrepreneur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Cambridge, Mass., 1962.
HABAKKUK, H. J. 'Economic function of English landowner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3-4.
KONETZKE, RICHAR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 nobleme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3-4.
OHLIN, PER GOR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Swedish aristocracy.'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953-4.
REDLICH, F. 'European arist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VI: 2, December, 1953.
STONE, LAWRENC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第七章 工业生产的组织

AMBURGER, ERIK. *Die Familie Marselis.* Giessen, 1957.
ANDERSON, R. and R. C. *The Sailing Ship.* London, 1926.
ASTEN, HERBERT VON. 'Wolfgang Wilhelm und Philipp Wilhelm von Pfalz-Neuburg und der Aufbau des Montangewerbes in den Herzogtümern Jülich und Berg. *Annal. d. Histor. Ver. f. d. Niederrhein*, CLXI, 1959.
AUBIN, HERMANN. *Das westfälische Leinengewerbe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Leinwanderzeugung.* Dortmund, 1964.
AUBIN, H. and KUNTZE, A. *Leinenerzeugung und Leinenabsatz im östlichen Mitteldeutschland zur Zeit der Zunftkäufe.* Stuttgart, 1940.
BARKHAUSEN, ERNST. 'Die staatliche Wirtschaftslenkung in freies Unternehmertum.' *Vierteli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V, 1958.
BLAICH, FRITZ. *Die Wirtschaftspolitik des Reichstages im Heiligen Romischen Reich.* Stuttgart, 1970.
BODMER, WALTER. *Die Entwicklung der schweizerischen Textilwirtschaft im Rahmen der übrigen Industrien und Wirtschaftszweige (Schweizerische Industriegeschichte).* Zurich, 1960.
BOG, INGOMAR. *Der Reichsmerkantilismus.* Stuttgart, 1959.
[672] BRAUDEL, FERNAND.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s).* I. Paris, 1967.
BRAUDEL, FERNAND and SPOONER, FRANK. 'Prices in Europe from 1450 to 1750.'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Cambridge, 1966.
BRAUDEL, F., SPOONER, F. C., PORTAL, R., ASHTON, T. S., LEUILLIOT, P. and VIDALENC, J. 'Commerce et industrie en Europe du XVIe au XVIIe siècle.' *Relazioni V, Xe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Rome, 4-11 September 1955; Florence, 1955.
BULFERETTI, LUIGI and CONSTANTINI, CLAUDIO. *Industria e commercio in Liguria nell' età del risorgimento.* Milan, 1966.
BURWASH, H. 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1460-1540.* Toronto, 1947.
CAIZZI, B. *Storia dell' industria italiana dal XVIII s. ai giorni nostri.* Turin, 1965.
Industria e commercio della Repubblica Veneta nel XVIII secolo. Milan, 1965.
Industria, commericio e banca in Lombardia nel XVIII secolo. Milan, 1968.
CAMPBELL, R. H. *Scotland since 1707, the Rise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Oxford, *1955.*
CHRISTENSEN, A. E. *Tiden intil ca 1730.* Industriens Historie i Danmark. Copenhagen, 1943.

CIPOLLA, CARLO M. 'The decline of Italy, the case of a fully matured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 1952.

CLOWES, G. S. LAIRD. *Sailing Ships, their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32.

CONRAD, GILL. *The Rise of the Irish Linen Industry.* 1925.

COORNAERT, E. *Un Centre industriel d'autrefois, la draperie-sayetterie d'Hondschoote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1930.

DAVIS, G. W. *The Early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Manchester-London, 1920.

DAVIS, RALPH.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ton Abbot, 2nd ed., 1972.

DICKINSON, H. 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team Engine.* London, 1963.

DONALD, M. B. *Elizabethan Copper. The History of the Company of the Mines Royal.* London, 1955.

ENDREI, WALTER. *L'évolution des techniques du filage et du tissage du Moyen Age à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Paris, 1968.

ERCEG, IVAN. 'Organisation und Produktion des Tuches in Dubrovnik-Ragusa in XV. und XVI. Jahrhundert.' *Secunda Settimana di Studio, Produzione, commercio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XII–XVII secoli*, Prato, 10–16 April, 1970.

FANFANI, AMINTORE.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Milan, 1959.

FISCHER, FRANZ. *Die blauen Sens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Sensenschmiedezunft zu Kirchdorf-Micheldorf bis zu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Graz-Cologne, 1966.

FISHER, F. J. 'Commercial trends and policy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1940.

FLANAGAN, J. F. 'Figured fabric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FORBERGER, RUDOLF. *Die Manufaktur in Sachsen vom Ende des 16. bis zum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1958.

FREUDENBERGER, HERMANN. *The Waldstein Woollen Mill. Noble Entrepreneur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Bohemia.* Cambridge, Mass., 1963.

'Three mercantilistic protofactories.'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I, 1966.

FRITZ, SVEN. *Studier i svenskt Bankväsen, 1772–1789.* Stockholm, 1967.

FURGER, FRIDOLIN. *Zum Verlagssystem als Organisationsform des Frühkapitalismus im Textilgewerbe.* Stuttgart, 1927.

GARDLUND, T. 'Manufakturdiskonten och fabrikatindustrins finansering.' *Studier tillägnade Eli F. Heckscher.* Uppsala, 1944.

GILLE, B. *Les origines de la grande industrie metallurgique en France.* Paris, 1949.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ussie du Moyen Age au XXe siècle. Paris, 1949.

GOLDENBERG, S. 'Commercio, produzione e consumo dei panni di lana nei paesi romani (XIV–XVII sec.).' *Secunda Settimana di Studio.* Prato, 1970.

HALL, A. R.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progress of technique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V, Cambridge, 1965.

HAMILTON, HENR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Scotland.* New ed. London, 1966.

HAUSER, HENRI. *La Pensée et l'action économique du Cardinal Richelieu.* Paris, 1944.

HASSINGER, HERBERT. *Johann Joachim Becher.* Vienna, 1956.

'Der Stand der Manufakturen in den deutschen Erbländern.' *Di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um die Wende vom 18. zum 19. Jahrhundert*, ed. F. Lütge, Stuttgart, 1964. [673]

HEATON, HERBERT.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Rev. ed., New York, 1948. esp. ch. XVII: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organisation: 1500–1750.'

HECKSCHER, ELI F. *Svenskt arbete och liv. Från medeltiden til nutiden.* Stockholm, 1941.

HEITZ, GERHARD. *Ländliche Leinenproduktion in Sachsen, 1470–1555.* Berlin, 1961.

HOFFMANN, ALFRED. *Wirtschaftsgeschichte Oberösterreichs.* I, Salzburg, 1952.

HUSA, VACLAV, PETRAN, JOSEF and SUBTOVA, ALENA. *Homo Faber.* Prague, 1967.

HUTCHINS, J. G. B. *The American Maritime Industries and Public Policy, 1789–1914.* Cambridge, Mass., 1941.

KELLENBENZ, HERMANN. 'Die Unternehmertätigkeit der verschiedenen Stände während des Übergangs zur Neuzeit.'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XLIV, 1957.

'Industries rurales en l'Occident de la fin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 S. C.*, XVIII, 1963.

'Standewesen und Merkantilismus in Schleswig-Holstein und Skandinavie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 1964.

'Probleme der Merkantilismusforschung.' *X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Rapports IV*, Vienna, 1965.

'Ländliches Gewerbe und bäuerliches Unternehmertum in Westeuropa vom Spätmittelalter bis ins 18. Jahrhundert.' *Deux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Economique à Aix-en-Provenc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nomic History 1962* (=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Sorbonne, Sixième Section-Scienc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Congrès et Colloques VIII), The Hague-Paris, 1965.

'Les Industries dans l'Europe moderne (1500-1750).' *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e siècle, cartographie et typologie.* Lyons, 7-10 October 1970. Colloques Internationaux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Sciences Humaines, No. 540., Paris, 1970.

'Die Aachener Kupfermeister.' *Zeitschrift des Aachener Geschichtsvereins*, LXXX, 1970.

'Rural Industries from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eter Earle (ed.),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500-1800.* Oxford, 1974.

Wolltuchproduktion und Tuchhandel. Secunda Settimana di Studio. Prato, 1970.

KELLENBENZ, H. (ed.). *Kupferproduktion in Europa.* (Contributions by P. JEANNIN, P. BRAUNSTEIN, K. GLAMANN, H. POHL, S. TVEITE, J. VLACHOVIČ, J. JANAČEK, O. PICKL and F. TREMEL.) Cologne, 1976.

KIRCHGÄSSNER, BERNHARD. *Merkantilis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und fürstliches Unternehmertum. Die dritte Kurfürstliche Hauptstadt Frankenthal.* Speier, 1968.

KLEIN, P. W. *De Trippen.* Assen, 1965.

KLIMA, ARNOŠT. *Manufakturni obdobi v Čechách (Die Manufakturperiode in Böhmen).* Prague, 1955.

KRÜGER, HORST. *Zur Geschichte der Manufakturen und der Manufakturarbeiter in Preussen. Die mittleren Provinz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58.

KULA, WITOLD. *Szkice o manufakturach w Polsce w VIII Wieku.* Warsaw, 1956.

'Die Meissner Porzellan-Manufaktur in der sächsischen Manufakturgeschichte.' *250 Jahre staatliche Porzellan-Manufaktur.* Meissen, 1960.

LANDES, DAVI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66.

LEBRUN, PIERRE. *L'Industrie de la laine à Verviers pendant le XVIIIe et au debut du XIXe siècle.* Liège, 1948.

LENTZE, HANS, 'Nürnbergs Gewerbeverfassung des Spätmittelalters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Nürnbergs*, II, Nuremberg, 1967.

LÉON, P. *Economies et societés préindustrielles.* II *1650-1780, Les Origines d'une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 Paris, 1970.

'L'industrialisation en France en tant que facteur de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Premièr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 Econ., Stockholm.* The Hague-Paris, 1960.

LEWIS, M. A. *The Navy of Britain.* London, 1948.

LIVI, C., SELLA, D. and TUCCI, U. 'Un problème d'histoire: La décadence économique de Venise.' *La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Venice-Rome, 1961.

[674]

MADDALENA, A. DE. 'L'industria tessile a Mantova nel 500 e all'inizio del 600.'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ontani.* IV, Milan, 1962.

MATHIAS, PETER.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London, 1969.

MAURO, FRÉDÉRIC. *Histoire générale du travail, La prérévolution du travail.* Paris, n. d.

MOLENDA, DANUTA. *Gornictwo kruszowe vo krenie zloz slasko-krakowskich do polowy XVI wieku.* Wro-

claw-Warsaw-Cracow, 1963.
Nance, R. Morton. 'The ship of the Renaissance.' *Mariner's Mirror*, XLI, 1955.
Nef, J. U. 'Coal mining and utilization.'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The Conquest of the Material World. Chicago-London, 1964.
'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e 1450–161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CLIX.
Norberg, James. 'A note on knitting and knitted fabric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Patterson, R. 'Spinning and weaving.'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Peyer, H. C. *Leinwandgewerbe und Fernhandel der Stadt St. Gallen von den Anfängen bis 1520.* 2 vols. St Gallen, 1959/60.
Pickl, Othmar. 'Die Salzproduktion im Ostalpenraum am Beginn der Neuzeit.' *Österreichisches Montanwesen, Produktion, Verteilung, Sozialformen*, ed. M. Mitterauer, Vienna, 1974.
Pölnitz, Götz Freiherr von. *Jakob Fugger.* 2 vols., Tübingen, 1949–51.
Anton Fugger. I–III(III:1), Tübingen, 1957–71.
Portal, Roger. *L'Oural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0.
Ramsay, G. D. *The Wiltshire Woollen Industr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5.
Redlich, Fritz. 'Der deutsche fürstliche Unternehmer, eine typische Erscheinung des 16. Jahrhunderts.' *Tradition*, 1958.
Ress, F. M. *Geschichte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er oberpfälzischen Eisenindutrie.* Regensburg, 1950.
Reuter, Ortulf. 'Die Manufaktur im Fränkischen Raum. Eine Untersuchung großgewerblicher Anfänge in den Fürstentümern Ansbach und Bayreuth als Beitrage zur Gewerbegeschichte des 18. und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s.' Dissertation, Munich-Stuttgart, 1961.
Roover, Raymund de. *The Medici Bank.* Cambridge, Mass., 1963.
Ruiz-Martin, F.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Paris, 1965.
Un testimonio literario sobre las manufacturas de paños en Segovia por 1625. Valladolid, 1966.
'Rasgos estructurales de Castilla en tiempo de Carlos V.' *Moneda y Credito*, XCVI, 1960.
Schick, Léon. *Un Grand Homme d'affaires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Jacob Fugger.* Paris, 1957.
Schiwank, Hans. 'Die Technik im Zeitalter des Barock.' *Die Technik der Neuzeit* (ed. Friedrich Klemm). Potsdam, 1941.
Schmitz, Edith. *Leinengewerbe und Leinenhandel in Nordwestdeutschland (1650–1850).* Cologne, *1957.*
Schremmer, Eckart. *Die Wirtschaft Bayerns-vom hohen Mittelaler bis zum Beginn der Industrialisierung-Bergbau, Gewerbe, Handel.* Munich-Leipzig, *1914.*
Schubert, H. R.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from c. 450B. C. to A. D. 1775. London*, 1957.
Schulte, Fritz. *Die Entwicklung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in Rheinland-Westfalen im 18. Jahrhundert.* Cologne, 1959.
Schumpeter, Elizabeth Boody. *English Overseas Trade Statistics 1600–1808.* Oxford, 1960.
Sée, H. *Französ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I, Jena, 1933.
Sella, Domenico. *European Industries 1500–1700.*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I: 5, London, 1970.
'Les Mouvements longs de l'industrie lainière à Venis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nnales*, 1957. (Repr.: 'La industria della lana in Venezia nel secoli sedecesimo e diciassettesimo.'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I (Turin, 1959).)

[675]

Singer, Charles, Holmyard, E. J., Hall, A. R. and Williams, Trevor.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 III, Oxford, 1957.
Slawinger, Gerhard. *Die Manufaktur in Kurbayern. Die Anfänge der großgewerblichen Entwicklung in der Übergangsepoche vom Merkantilismuszum Liberalismus.* Stuttgart, 1966.
Smith, Cyril Stanley, 'Metallurgy and assaying.'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Sombart, Werner,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I/II, Munich-Leipzig, 1925.

SPIESZ, ANTON, *Manufacturne obdobie na Slovensku, 1725–1825*. Bratislava, 1961.
'Die Manufaktur im östlichen Europa.' *Kölner Vorträge zur Sozias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Heft 2, ed. H. Kellenbenz, Cologne, 1969.
SPOONER, FRANK C. *L' économie mo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Paris, 1956.
SPRANDEL. R. *Das Eisengewerbe im Mittelater*. Stuttgart, 1968.
STRIEDER, JAKOB. *Studien zur Geschichte kapitalistischer Organisationsformen. Monopole, Kartelle und Aktien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und zu Beginn der Neuzeit*. Munich-Leipzig, 1914.
Die deutsche Montan-und Metallindustrie im Zeitalter der Fugger.' *Das reiche Augsburg*, ed. Deininger, Munich. 1938.
TREMEL, F. *Der Frühkapitalismus in Innerösterreich*. Graz, 1954.
USHER, A. P.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Rev. ed. Oxford, 1954.
VICENS VIVES, JAIM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9.
WADSWORTH, A. P. and MANN, J. DE L.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1965.
WAILES, REX. 'Windmill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III, Oxford, 1957.
WESTERMANN, EKKEHARD. *Das Eislebener Garkupfer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en europäischen Kupfermarkt 1460–1560*. Cologne-Vienna, 1971.
WHITE, LYN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1975.
WILSON, C. H. *Profit and Power*. London, 1957.
WISCHNITZER, MARK. *A History of Jewish Crafts and Guilds*. New York, 1965.
YERNAUX, JEAN, *La métallurgie liègeoise et son expansion au XVIIe siècle*. Liège, 1939.
ZORN, W. *Handels-und Industriegeschichte Bayrisch-Schwabens 1648–1870*. N. p., 1961.

第八章　政府和社会

这里所列的书目不能说是全面的，它仅仅是作者在撰写本章时所参考书目的列表，或者是有助于理解所探讨的主题。

想对这个阶段的政府和社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以下两套相关的书是有帮助的：W. L. Langer 编撰的《现代欧洲的兴起》，G. Barraclough 编撰的《欧洲文明丛书》。

Allgemeines Landrecht. 1974.
ANER, K. *Der Aufklärer Friedrich Nicolai. Giessen*, 1912.
ANTOINE, M. *Le Conseil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Paris, 1970.
ARENDT, H. *Rahel Varnhagen*. Munich, 1959.
BAASCH, E. (e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von Hamburgs Handel und Schiffahrt im 17., 18. und 19. Jahrhundert*. Hamburg, 1910.
BAUMGART, P. 'Absoluter Staat und Judenemanzipation.'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und Ostdeutschlands*, XIII-XIV, 1965.
BECK, L. W. *Early German Philsophy*. Harvard. 1969.
BESENVAL, BARON DE. *Mémoires*. Ed. Ségur, Paris, 1805.
BLANNING, T. C. W. *Joseph II and Enlightened Despotism*. Longman, London, 1970.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ainz. Cambridge, 1974.
BLOCH, M. 'La Lutte pour l' Individualisme Agraire.' *Annales d'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E. S. C.)*, vol. 2, 1930.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 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2 vols. Paris, 1964.
[676] BLUCHE, F. *Les Magistrat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0.
BODELSCHWINGH. *Leben des Freiherrn von Vincke*. Berlin, 1853.
BONCERF. *Les lnconvénients des Droits Féodaux*. London, 1776.
BOSHER, J. F. *The Single Duty Project*. London, 1964.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Cambridge, 1970.

BOSSUET, J.-B. 'Politique tirée des propres paroles de L' Ecriture Sainte.' H. Brémont, *Textes Choisis et Commentés*, II, Paris, 1913.
BRUGGEMANN, F. *Das Weltbild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II. *Reihe Aufklärung.* Leipzig, 1930.
BRUNSCHWIG, H. *Société et Romanticisme en Prus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3.
BÜSCH, O. *Militä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ßen.* Berlin, 1962.
CARRÉ, H. *La Noblesse de France et l' 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20.
CASSIRER, 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F. A. Koelln and J. P. Pettigrove, Princeton, 1951.
COBBAN, A. *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55.
COLE, C. W.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2 vols. New York, 1939.
DAKIN, D. *Turgot and the Ancien Régime in France.* Methuen, London, 1939.
DARDEL, E. *Commerce, industrie et navigation à Rouen et au Havre au XVIIIe siècle.* Rouen, 1966.
DARNTON, R. 'Literary Low Lif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LI, May 1971.
DAUMARD, A. and FURET, F. *Structures et relations sociales à Paris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1.
DEMETER, K. *Das deutsche Offizierskorps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1650-1945.* Frankfurt a/M, 1965.
DILTHEY, W. 'Die deutsche Aufklärung im Staat und in der Akademie Freidrichs des GroBen.' *Deutsche Rundschau*, CVII, 1901.
DöHNOEF, M. *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 Mönchen-Gladbach, 1962.
DORN, W. L. 'The Prussian Bureau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LVI, XLVII, 1931, 1932.
DUCLOS, C. P.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oeurs.* Ed. F. C. Green, Cambridge, 1939.
DUPONT DE NEMOURS, P. 'De l' Origine et des Progrès d' une Science Nouvelle, 1768.' *Collections des Economistes et des Reformateurs Sociaux de la France.* Paris, 1910.
DURAND, Y. *Les Fermiers Généraux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1.
EBERTY, F. *Jugenderinnerungen eines alten Berliners.* Berlin, 1878.
EBERHARD, J. H. 'Über die Zeichen der Aufklärung einer Nation.' *Literarische Chronik*, II, Bern, 1786.
ÉGRET, J.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Louis XV et l' opposition parlementaire. Paris, 1970.
FLAMMERMONT, J. *Le Chancelier Maupeou et les parlements.* Paris, 1883.
FONTANE, T. *Wanderungen durch die Mark.* 4 vols.
Vor dem Sturm.
Der Stechlin.
FORSTER, 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60.
FRAUENDIENST, W. *Christian Wolff als Staatsdenker.* Berlin, 1927.
FREYMARK, H. *Die Reform der preußischen Handels und Zollpolitik.* Jena, 1898.
GARVE, C. *Fragmente zur Schilderung des Geistes, des Charakters und die Regierung Friedrichs des Zweyten.* Breslau, 1798.
Versuche über verschiedene Gegenstände aus der Moral, der Literatur und de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Breslau, 1802.
Über den Charakter der Bauern und über ihr Verhältniss gegen die Gutsherrn und gegen die Regierung. Breslau. 1796.
GAY, P. *Voltaire's Politics.* Princeton, 1959.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I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67.
II *The Science of Freedom.* New York, 1969.
GÖRLITZ, W. *Die Junker.* Glucksburg. 1957.
GOUBERT, P. *Familles marchandes sous l' Ancien Régime.* Paris, 1959.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Paris, 1960.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çais. Paris, 1966.

L' Ancien Régime. I La Société. Paris, 1969.
II *Les Pouvoirs.* Paris, 1973.

GROETHUYSEN, B. *Die Entstehung der bürgerlichen Welt-und Lebensanschauung.* 2 vols. Halle/Saale, 1927-31.

GROSCLAUDE, P. *Malesherbes témoin et interprête de son temps.* Paris. 1961.

GROSS, N. 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759-1914.*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ollins. London, 1972.

GRÜNBERG, C. *Die Bauernberfreiung und die Auflösung des gutsherr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Böhmen, Mähren und Schlesien.* Leipzig, 1893-4.

HAUSSHERR, H. *Hardenberg. I 1750-1800.* Cologne-Graz, 1963.

HECKSCHER, E. *Mercantilism.* Trans. M. Schapiro. 2 vols. (Rev. ed. London, 1955.)

HENDERSON, W. O. *The Stat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russia 1740-1870.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1963.

HEROLD, C. *Mistress of an Age. A Life of Madame de Staël.* London, 1959.

HEUER, U. J. *Allgemeines Landrecht und Klassenkampf.* [East] Berlin, 1960.

HIGGS, H. *The Physiocrats.* London, 1897.

HINRICHS, C. *Friedrich Wilhelm I. Jugend und Aufstieg.* Hamburg, 1941.

HINZE, K. *Die Arbeiterfrage zu Beginn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in Brandenburg-Preußen.* 2nd ed., Berlin, 1963.

HINZE, O. *Regierung und Verwaltung.* Gottingen, 1967.
Staat und Verfassung. Göttingen, 1962.

KANT, E. *Was ist Aufklärung?*

KANPP, G. F.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er Ursprung der Landarbeiter in den älteren Teilen Preußens.* 2nd ed., Munich, 1927.

KOSELLECK, R. *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 Stuttgart, 1967.

KOSER, R. *König Friedrich der Große.* 2 vols. Stuttgart, 1893-1903.

KULISCHER, J.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2 vols. 2nd ed., Munich, 1958.

LABROUSSE, E. *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 ancien régime.* Paris, 1943.

LACOUR-GAYET, R. *Calonne.* Paris, 1963.

LAVISSE, 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VIII-IX. Paris, 1906-10.

LEFEBVRE, G. *Quatre-Vingt-Neuf.* Paris, 1939.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under the titl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 J., 1967.)
La Grande Peur. Paris, no date. (Translated by J. White, London, 1973.)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2nd ed. Paris, 1963.
Etudes Orléanaises. Paris, 1962.

LEHNDORF, GRAF. *Dreißig Jahre am Hofe Friedrichs des Großen.* Ed. K. A. Schmidt-Lötzen. Gotha, 1907.

LÜTGE, F.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3rd ed. Berlin, 1966.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grarverfassung. Stuttgart, 1963.

LÜTHY, H.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2 vols. Paris, 1959-61.
Le Passé Présent: combats d' idées de Calvin à Rousseau. Monaco, 1965.

MANULE, F. E. *The prophets of pairs.* New York, 1965.

MARION, M.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e] siècles.* 2nd ed. Paris, 1968.

MARTINI, F. 'Die Adelsfrage in Preußen vor 1806.'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geschichte.* 1938, Beiheft 35.

MATTHEWS, G. T. *The Royal General Farm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olumbia, 1958.

MAUZI, R. *L' Idée du bonheur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60.

MAY, G. *Madame Roland.* Columbia, 1970.

MAYER, E. W. *Das Retablissement Ost-und Westpreussens unter der Mitwirkung und Leitung Theodors von Schön.* Jena, 1916.

MEIER, E. VON. *Die Reform der Verwaltungsorganisation unter Stein und Hardenberg.* 2nd ed., Mu-

nich-Leipzig, 1912.

MEINECKE, F. *Idee der Staatsräson.* Ed. W. Hofer. 2nd ed., Munich 1960. (Translated by D. Scott under the title *Machiavellism*, London, 1957.)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Paris-London, 1767.

MEUSEL, F. *Friedrich August Ludwig von der Marwitz.* 3 vols. Berlin, 1908-13. [678]

MEYER, J.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2.

MITROFANOV, P. VON. *Joseph II, seine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Tätigkeit.* Vienna, 1910.

MOLS, R. *Introduction à la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des villes d'Europe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Louvain, 1955.

MONTESQUIEU, BARON DE. *De l'esprit des lois.*

MORNET, D.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5th ed., Paris, 1954.

MOUSNIER, R. *La Ve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y IV et Louis XIII.* Rouen, 1945.

MOUSNIER, R. and HARTUNG.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 *Relazioni del X Congresso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Storia Moderna*, IV, Florence, 1955.

NAUDÉ, W. *Getreidehandelspolitik.* Berlin, 1896.

NECKER, J. '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Oeuvres Complètes*, ed. Baron de Staël, V, Paris, 1821.

OLIVIER-MARTIN, J. M. *L'Organisation corporativ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1938.

PARET, P.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1807 to 1815.* Princeton, 1966.

PARISET, F. G. (ed.). *Bordeaux au XVIIIe Siècle.* Bordeaux, 1968.

PRERADOVICH, H. N. VON. *Die Führungsschichten in Österreich und Preußen.* Wiesbaden, 1955.

QUESNAY, F. *François Quesnay et la Physiocratie. I Études, Biographie.* II *Textes Annotés.* Published by l'Institut National d'Etudes Démographiques. Paris. 1958.

RACHEL, H. and WALLICH, P. *Berliner Großkaufleute und Kapitalisten.* II, Berlin, 1938.

RAUMER, F. VON. *Lebenserinnerungen und Briefwechsel.* Berlin, 1861.

REINHARD, M. *Le Grand Carnot.* 2 vols. Paris, 1950-2.

REINHARD, M. and ARMENGAUD, 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Paris, 1961.

RITTER, G. *Stein.* 3rd ed., Stuttgart, 1958.

Friedrich der Große: ein historiches Profil. Leipzig, 1936. (Translated by P. Paret, London, 1968.)

ROSENBERG, H.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 1958.

ROZDOLSKI, R. *Die große Steuer-und Agrarreform Josefs II.* Warsaw, 1961.

SAINT JACOB, P. DE.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60.

SCHMOLLER, G. *Deutsches Städtewesen.* Berlin, 1922.

SCHÖN, T. VON. *Aus den Papieren des Ministers Theodor von Schön.* 6 vols. Halle, 1875-83.

SCHWARTZ, P. *Der erste Kulturkampf in Preußen 1788-1798.* Berlin, 1925.

SÉGUR, COMTE DE. *Mémoires, souvenirs et anecdotes.* Paris, 1825.

SÉNAC DE MEILHAN, G.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richesses et le luxe.* 1787.

Des Principes et des causes de la révolution en France. 1790.

SILAGI, D. *Jakobiner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aufgeklärten Absolutismus in Österreich.* Vienna-Munich, 1962.

Ungarn und der geheime Mitarbeiterkreis Kaiser Leopolds II. Munich, 1961.

SKALWEIT, S. *Frankreich und Friedrich der Große.* Bonn, 1952.

SMALL, A. W. *The Cameralists.* 2nd ed., New York, 1909.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 Cannan, Methuen, London, 1950.

SOBOUL, A.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6.

SOMBART, W. *Der Bourgeois.* Leipzig, 1913. (Translated by M. Epstein under the titl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15.)

STAËL, MADAME DE. *De l'Allemagne.* Ed. Comtesse de Pange. 2 vols., Paris, 1958.

STEIN, R. *Die Umwandlung der Agrarverfassung Ostpreußens.* Jena, 1918.

Stölzel, A. *Carl Gottlieb Svarez.* Berlin, 1885.

Svarez, C. G. *Vorträge über Recht und Staat.* Ed. H. Conrad and G. Kleinheyer, Cologne, 1960.

Taylor, G. V.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 Hist. Review,* cxxi, Jan. 1967.

Tocqueville. A. de. *Qeuvres Complètes.* Ed. J. P. Mayer, ii, Paris, 1952.

[679] Tudesq, A. J. *Les Grande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9.* Paris, 1964.

Vergleichende Enzyklopedie. Sowjetsystem und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i (article on absolutism), Freiburg, 1966.

Voltair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lettres Philosophiques.
L' Ingénu.
Siècle de Louis XIV.
Candide.

Wandruszka, A. *Leopold II.* 2 vols. Vienna and Munich, 1965.

Wangermann, E. *The Austrian Achievement 1700–1800.*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3.

Winter, E. *Der Josefinismus. Die Geschich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Reformkatholizismus 1740–1848.* Berlin, 1962.

Wilson, A. M. *Diderot: The Testing Years 1713–59.* New York, 1957.

[680] Zeller, G. *Aspects de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sous l' ancien régime.* Paris, 1964.

索　引

① 原书页码,即本书的边码。——译者注

[691]

【730】

【741】

译后记

经过大家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我们终于可以向出版社交稿了。当2001年2月接到经济科学出版社送来的原版书时，我们非常高兴自己能参与这样一套经济史名著的翻译，为中国的世界经济史研究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出版社要求译者树立精品意识，对大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了保证译文的高质量，我们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相关领域内的学者和博士生，由我牵头，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翻译审定工作。

本书汇集了多人的辛劳，各个章节的分工如下：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高德步教授；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萍博士、王海清；第三章，王海清、黄萍；第四章、第五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蔡挺博士；第六章，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张林博士；第七章，王海清译，中国人民大学成教学院吴慧修改；第八章，张林；索引，蔡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王晓亮。此外，蔡挺负责翻译了目录、序言、全书中的插图以及参考文献中的相关部分。

全书由高德步负责审定。

由于译者的水平和时间所限，译文难免会有某些不太恰当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我们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本书再版时做相应的修改。

最后，我们要对为此书的完稿和出版做出极大贡献的人士表达最诚挚的谢意。本书涉及大量的法文和较多的德文，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精通法语的张丽萍博士热心地帮助了我们，而有关的德语部分则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吕致文博士的帮助。当然，没有经济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也是难以想像的。

高德步

2002年3月12日于人大静园7楼